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伟人大谋略



伟人大谋略

拿破仑·波拿巴谋略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最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革命家。

拿破仑出生于科西嘉岛。早年崇拜卢梭。1793年投身法国大革命，成为一名革命将领，历任法国内防军司令、意大利军团总司令、英吉利军团总司令、东方远征军总司令等职。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先后任第一执政、终身执政，掌握法国政权，内政上推行资产阶级改革，健全资本主义制度、巩固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外交上实行远交近攻政策，联合俄国，对付英、奥。1804年拿破仑成为法兰西帝国皇帝，达到他一生事业和声望的顶峰。1814年被迫退位，1815年东山再起，失败后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直至逝世。享年52岁。

拿破仑统帅军队，先后取得了四十多次大战役的辉煌胜利，几乎打败过欧洲大陆上的所有与他作对的国家军队。他改革了欧洲奉为经典的线形战术体制，建立了近代军事体制和战略战术理论。他指挥的许多战役都成为近代战争的范例。

拿破仑在军事上的辉煌胜利，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保卫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有力地推动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拿破仑在政治上、外交上也展示了他超群的斗争艺术，成为他的时代里最伟大的谋略家之一。

一、尽一切可能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

拿破仑·波拿巴出生在科西嘉贵族家庭，自幼性格倔强，固执，任性好斗，正像他的名字拿破仑——意为荒野的狮子——一样。他沉默寡言，酷爱读书，是兄弟姊妹中的绝对权威。1779年进入法国布里埃纳军事学校学习。尽管他学习成绩优异，却受尽轻浮、骄傲的贵族们的歧视和侮辱。他们像法国对待刚从意大利夺来的殖民地——科西嘉——那样，对待来自科西嘉的身材矮小的拿破仑。拿破仑强烈的复仇意识日益炽烈，自信心也在反抗中被不断强化而膨胀起来。1784年，拿破仑被推荐进入著名的巴黎军事学校学习。他对炮兵发生了浓厚兴趣。他狂做地宣称，他的佩剑只有剑带属于法国，而剑刃却由他自己掌握。毕业后要求分配到离家较近的法国东南地区，担任炮兵少尉。

外表如冰的拿破仑，内心正燃烧着难以抑制的反叛之火。他一面迷恋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一面关心着科西嘉的命运。拿破仑被卢梭那种慷慨激昂的语言、热情奔放的思想鼓舞着。他在手稿中写道：一个十分狡猾的凶手在谋杀了合法君主并成功地窃取王位后，同样受到上帝法律的保护，……。人民有比篡权者更多的权力去驱逐一个篡权的君主。注重现实和行动的拿破仑，在启蒙思想的激励下，刻苦研究军事学和军事技术，准备成为一名炮兵战术家。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看到：“鲜血流遍法国，到处流着自由的和民族的敌人污秽的血。很久以来，这些人就是以牺牲别人来养肥自己的。”他感到这是迈向幸福的重要一步。他离开军队，回到科西嘉，从事革命事业，希望在自己的祖国建立像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民族解放运动失败后，他来到巴黎，向共和国陆军部汇报了自己的活动。但他没有得到任何任命，没有在革命洪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角色。

1793年，土伦叛乱，英国和西班牙乘机干涉法国革命，各地反革命势力闻风而动，土伦成为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焦点。正当共和国军队对土伦久攻不下，炮兵指挥受伤致残时，拿破仑来到土伦，被任命为炮兵副指挥，代行指挥职权。命运之神终于向这个雄心勃勃却屡屡受挫的青年军官伸出援助之手，拿破仑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展示才华、初试牛刀的机会。但天平的砝码却不在他这一边。土伦的敌人中有西班牙人、英国人、保王党人等共两万余人，配备有强大的炮兵，拥有港口军舰的火力支援和源源不断地获得从海上运来的物资供应。拿破仑接管的炮兵，只有四门24吋和16吋的大炮，两门臼炮，既无炮弹，也没有维修工具，炮兵甚至不会使用大炮。拿破仑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他以惊人的毅力开始工作，派人四出打探，从各地搜集了14门加农炮、4门臼炮和必需的弹药补给；又去里昂等地搜集军械、大炮，进一步加强炮兵。他亲自组织和训练炮兵，使炮兵成为可以战斗的部队。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充沛的精力坚守岗位。需要休息，他就身裹大氅，睡在阵地上，从未离开过炮群。

准备就绪后，拿破仑根据地形和敌兵部署，提出让炮兵控制阵地，让步兵穿插进去，炮兵猛轰、步兵迂回，从海上、陆地同时进攻土伦的计划。初来乍到的年轻军官提出的方案，自然被搁置一边。不久，新到任的指挥官却赞同这个计划，拿破仑提出的战术方案被批准实施。总攻发动的那个晚上，大雨滂沱，狂风呼啸，拿破仑等军官率军誓死作战，首先拿下了土伦制高点

——马尔格雷夫堡高地。拿破仑指挥炮兵从高地向海上的英国舰队、西班牙舰队和土伦城猛烈轰击，迫使英国、西班牙等海军纷纷退出战场，整个土伦城失去了军舰的炮兵保护；步兵直插土伦城。拿破仑在冲锋时坐骑被炮弹击毙，他的小腿受伤，但仍然坚守岗位，直到全城解放。恩格斯后来评价说：“土伦则是因拿破仑巧妙的袭击和坚决的进攻，以及它的守卫者的错误而收复的。”12月22日，24岁的拿破仑被晋升准将，任意大利军团炮兵指挥。

当时欧洲各国封建统治者和英国相互勾结，从四面八方包围法国，国民公会派兵四面作战。拿破仑大胆提出出击敌人防守薄弱地区的建议：即由奥地利防守的意大利北部出击敌军，诱使奥军增援该地，一旦法军获胜或出现相持，莱茵军团立即向奥地利心脏发动进攻，使奥军首尾不能相顾，从而打破敌人的包围。他指出“共和国无法维持四个军团同时进攻；共和国缺乏足够的军官、炮兵和骑兵。到处发动进攻是军事上的错误。不应分散自己的进攻力量，而应集中这些力量。围攻敌人的堡垒是这样，战争体系也是这样：集中火力进攻一点，打开缺口，破坏平衡，其它就变得无能为力，而阵地也就这样被占领了”。拿破仑的方案未获批准，罗伯斯庇尔就被送上断头台，拿破仑被当作雅各宾派投入监狱。刚刚透出亮光的人生马上又被一层厚厚的乌云笼罩。雄心勃勃的拿破仑被打入伸手不见五指的地狱。

出狱后，一无所有的拿破仑奔走于革命新贵的门前，却怎么也低不下他那倔强的头颅。当他鼓足勇气去求土伦作战中的一位已身居高位的战友时，被对方恶作剧地任命为步兵指挥，去镇压旺代叛乱，而他实际上根本无法行使指挥权。无事可作使他心灰意冷，不修边幅，头发蓬松，一幅惹人生厌的外表，脸色发黄而显出病态，以写小说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和志向，排遣心中无限的苦闷和悲哀，甚至无心谈恋爱。连巴尔扎克也充满同情地写道：“你要有种，你就扬着脸一直往前冲。可是你得跟妒忌、毁谤、庸俗作斗争，跟所有人斗争。拿破仑碰到一个叫奥里勃的陆军部长，差一点把他送到殖民地。”在1793~1795年，法国打败反法同盟，迫使西班牙、普鲁士、荷兰等除奥地利和英国以外的所有西欧国家与法国签订和约。在这次重大军事胜利中，却没有拿破仑这位军事奇才的参加。

对外战争的胜利，却无法缓和热月党人内政上的错误政策所引起的人民的不满情绪，保王党乘机叛乱。叛军占领了大片地区，仅巴黎就有叛军三四万人，而此时政府军队却远在国外或边境，巴黎只有支持国民公会的军队5千人。在这危急关头，参加过土伦战斗的热月党人巴拉斯被任命为内防军司令。但他基本上是一个军人政治家，必须寻找一位英明果断的将领作助手。命运之神再次向绝望中的拿破仑招手。拿破仑受命于危难之际，面对8倍于己的敌军，镇静自若，积极投入保卫杜伊勒里宫的战斗。

拿破仑上任，立即以异乎寻常的精力迅速重新部署了国民公会的防卫，抢在叛军之前，从巴黎西北的一个营房运回40门大炮，准备用炮火猛轰叛军队伍，以弥补步兵人数的不足。叛军控制了巴黎的主要街道，在兴高采烈的凯旋音乐伴奏下，举着旗帜向杜伊勒里宫进发。拿破仑不等叛军开火，先发制人，下令炮兵向毫无准备的叛军队伍进行突然的猛烈轰击，叛军仓促应战，用步枪还击，无谓地抵抗了一阵，留下200具尸体仓皇逃窜了。另一股叛军从河对岸企图通过大桥冲向杜伊勒里宫，拿破仑从正面和侧面打退这股5千人的敌人，叛乱者很快溃散了。整个战斗实际只打了一个小时，第二天，叛军总部投降。

这次战斗是拿破仑军事上第二次辉煌的胜利。虽然战斗规模不大，不够激烈，但这次以少胜多的胜利拯救了国民公会，意义远远超过了土伦战役。它使拿破仑不仅在军界，而且在社会各阶层和政界中，都威名大震。巴黎人把他看成一个具有指挥天才、果断精神和坚强毅力的人，称他为“葡月将军”。督政府的权贵们对拿破仑的超凡才华赞赏不已。国民公会向拿破仑表示敬意，感谢他拯救了共和国。不久，拿破仑升任法国内防军和巴黎卫戍军司令。拿破仑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设法把热月党人、雅各宾党人和王党分子之间的冲突和仇恨所破坏的社会秩序稳定下来。他整顿了国民自卫军，改组了警团，清洗了王党分子，查封了雅各宾俱乐部，稳定了除贫困和失业以外的所有社会动荡源。拿破仑依靠其足智多谋、果敢力行的军事才能，抓住了仅有的两次人生机遇，使他平淡的人生立即放出异彩。特别是葡月事变，使他一夜之间，由一个生活艰难，想方设法弄钱生存的闲居军官，锋芒毕露，一跃成为手握首都军事大权和治安大权的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的面前展现出一片锦绣前程，即使权倾一时的督政官也可能成为他囊中之物。

二、奇货可居待机而动

葡月将军的殊荣和独掌巴黎治安大权，足以使任何将军趾高气扬地享受生活，谋取更高的职位。拿破仑却不屑于如此，这离他的抱负还相差太远；葡月的功勋远没有为他攫取最高权力提供充分条件。他不愿把自己埋在巴黎的轻桃生活里；也不愿以自己的权力周旋于各种派别和权贵门前；更担心巴黎稳定的表面后面潜伏的各种危机，使自己成为派别斗争的牺牲品或工具；又不愿像富歇那样靠窥测风向、玩弄手腕和阴谋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宁愿直中取，不愿曲中求。他要求远离这个政治漩涡的中心，作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将军，向法国证明自己的卓越才干，统兵在外，坐观事变，待机而动。拿破仑清楚：任何政治家上台，都离不开一把镇国宝剑；任何国家和人民，都需要一个卫国的干将。拿破仑要以自己的军事天才统帅大军，再建奇功，既展现自己的才华，又可等待机遇的到来，获取在巴黎无法达到的成功。

1796年3月2日，年仅27岁的拿破仑谋求担任了意大利军团总司令。他选择意大利作为自己建功立业、待机而动的发迹之地，一是由于他面前制定的进攻意大利、两路消灭奥地利的作战计划吸引着他；一是由于意大利是欧洲各国的薄弱地区，进可攻，退可守，阿尔卑斯山脉把意大利战场同欧洲其他地区相对隔开，部队相互增援、机动的可能性不大，易于掌握战场情况，是独建功勋的好地方。他心中炽烈地燃烧着的施展军事才华、追求成为伟大统帅的强烈欲望，驱使他去于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1796年，反法联盟已被打破，但奥地利与英国相互配合，仍然严重威胁着法国的安全，只有彻底打败奥地利，才能最后解除共和国的后顾之忧。奥地利军队主力集中在莱茵河地区，法国政府也把这一地区当作主要战场，而交给拿破仑的却是一支半饥饿、衣衫褴褛的军队，炮兵、骑兵严重不足。拿破仑对军队中存在的、令人生畏的种种困难条件毫不介意。他只要求督政府同意他组织向意大利北部进攻。面对比他预想的更坏的情况和日益恶化的形势，他当机立断，率领3万人的意大利军团，冒着敌人的炮火翻越阿尔卑斯天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奥撒联军的两军结合部猛击，15天内赢得了6次胜利，缴获了21面军旗和55门大炮，俘敌1.5万名，杀死杀伤敌军1万名，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富饶地区，迫使撒丁王国成为拿破仑的后备阵地。拿破仑进一步扫除奥军力量和援军，再次取得歼、俘敌万余人的辉煌胜利。但此时法军在莱茵河地区失败，奥地利立即抽调军队，派阿尔文齐率6万余人解救意大利奥军的覆亡命运。拿破仑运用集中兵力，两翼侧击的战术消灭了援军三分之一，迫使奥军元帅交出曼图亚要塞投降。拿破仑成为意大利北部的统治者。

拿破仑乘胜率军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军。奥军抵挡不住受到胜利鼓舞、斗志旺盛的拿破仑军队的前进，忙派出代表要求停战议和。拿破仑同他们签订了停战协定，战争胜利结束。拿破仑在意大利北部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就强烈地“不再把自己看作仅仅是一个将军，而是把自己看作为注定要对一国人民的命运起决定影响的人。在我思想上出现了我能够成为在我们政治舞台上出色地扮演一个主角的想法”。从1796年到1797年4月的整整一年期间，拿破仑同奥军为主的反法联军进行了14次大会战，70次战斗，击溃了5支奥军精锐，俘敌16万人，变意大利这一次要战场成为决定战争进程的主要战场，从而锻炼出一支战无不胜的拿破仑大军，作为拿破仑手中谋

取最高权力的主要砝码，使任何政治家都不能忽视这支大军的存在。大作家司汤达在《巴黎修道院》中说：“1796年5月15日，波拿巴将军率领着一支年轻的军队进入米兰。这支军队刚刚越过洛迪桥，向全世界指出，经过多少世纪以后，恺撒和亚历山大终于后继有人了。”

拿破仑的胜利翻开了他人生辉煌的一页。他似乎觉得成为主角的时候不远了。他开始利用政府与保王党的矛盾，向督政府暗送秋波。他7月14日写信给督政府，“我明白了，克利希俱乐部是想踏过我的尸体去毁灭共和国”，督政府“如果需要武装力量，你们可以召唤军队”。他派自己的副官拉瓦莱特到巴黎，作为自己的正式代表，指示他不要卷入任何党派斗争，在巴黎的政治斗争中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随后他又派自己的助手奥热罗将军到巴黎，他在带给巴拉斯的便条上写道：“奥热罗将军因料理私事，请假回巴黎。他将面告诸位，远征意大利的军人们绝对效忠于宪法，效忠于督政府。”“如果你们害怕王党分子，你们可以调动意大利军团，它将迅速扫除这些舒昂党人、王党分子和英国人。”拿破仑还答应送上3百万金法郎，以缓和督政府财政困难。但以平息叛乱威名大震的奥什将军担任陆军部长，因不足法定年龄30岁，遭到大肆攻击，于7月22日愤然辞职，奔赴莱茵前线，在前线暴亡。28岁的拿破仑不寒而栗，他只好在幕后支持奥热罗率巴黎第17师粉碎了王党叛乱。政府派拿破仑的副手奥热罗接替奥什指挥莱茵方面的12万大军，这位将军立即站在政府立场上指责拿破仑。督政府与拿破仑的矛盾和冲突又开始了。

拿破仑的功勋和对政府的忠诚，并没有为他提供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的机会，反而处境尴尬、进退失据，处在一个十分危险的火山口上。敌人被打败，和平实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拿破仑不仅没有任何可增加他的荣耀的事可做，而且有可能使他实际上丧失自己已创造的这些条件。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拿破仑走上了远征埃及的道路。正如德国思想家、伟大的诗人歌德所说的：“拿破仑之所以进行这次远征，是因为这段时期他在法国没有什么能使自己成为统治者的事可干。”他决定找一个可以使自己避免卷入任何政治冲突、被迫在条件不成熟时出场的任何事件的地方，再次以辉煌的业绩激起法国人的热情，以等待时机到来。

拿破仑把自己当作未来的领袖。而巴黎的督政官贪得无厌地用拿破仑从意大利勒索来的大量财富塞满了自己的腰包，却对拿破仑持有极端的不信任感，惧怕拿破仑的功业将动摇他们的地位。他们只是由于离不开他，才容忍他。拿破仑曾在外交上作过努力，显示了高超的外交才能，但督政府却不支持他的意见，双方甚至发生了严重的矛盾。法国人不会在和平时期渴望一个将军来统治他们；他们只有病入膏肓，才会觉得需要医生。拿破仑清楚地意识到，从意大利征服者一跃而为法兰西统治者的时机远未到来。他必须等待，尽量维持与督政府的关系，并设法免受其害。

埃及远征并未取得预期的辉煌胜利。但在16个月中，他占领了马耳他岛，征服了上下埃及，消灭了土耳其的两支军队，生擒其总司令并缴获了规模宏大的野战炮和辎重。整个法国都把拿破仑当作征服东方的英雄来崇拜。

机会终于来临。英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结成强大的反法联盟。奥地利军队再次夺取意大利，在莱茵河屡败法军。王党分子乘机叛乱。法国再次陷入四分五裂中。督政府的官员们面对这种局面，束手无策。人民、民族和共和国都需要威武之剑来保卫。拿破仑得到这个消息，立即从床上跳起来，

抓住报纸，整夜地看来看去，口中不断地发出愤怒的叫喊，心中迸发着抑制不住的亢奋。第二天清早，他把舰队司令叫来，密谈了两个小时，接着赶往开罗。他一面准备回国，一面组织部署一次对土耳其作战的胜利，为自己壮行，为法国鼓舞士气；让消沉绝望的法国人看到：只有拿破仑才能赢得胜利。而他已来到祖国身边，与人民共患难。

拿破仑对亲信马尔蒙说：我决定返回法国。你同我一起走。欧洲事态的发展使我作出这个重大步骤。法国同时会听到关于我返回祖国和土耳其军队在阿布基尔被歼灭的消息。我将鼓舞他们的斗志，重振军队的信心，激发公民对光明未来的希望。拿破仑终于等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利用这个机会，把他那超凡的军事才能，出售给共和国和人民，只要他们拥护他来统治，拥护他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而不是那些善于演讲和空谈的律师们。

拿破仑到达巴黎，受到巴黎人热烈欢迎。当时的报纸写道：“波拿巴登陆的消息传来时，我们开始简直不敢相信。但这是真的。在夜晚的活动场所，在剧院，在公共集会，消息迅速地传播开来。在最偏僻的小酒馆，人们喝酒庆祝他的归来，...”“我们每个人向他欢呼，因为他带给我们新的希望”，“伴随拿破仑而来的是光荣、和平和幸福。”卢森堡宫外面激动的人群拥挤在大街上，想见埃及归来的将军，热烈地向他欢呼。

拿破仑私下让亲信大肆招待在巴黎的将领们。许多将领簇拥在他周围出出进进。督政府的前外交部长、卓越的外交天才塔列兰，决定公开支持拿破仑；著名阴谋家、不倒翁、警察总督富歇，这个制造阴谋的能手，从拿破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决定投靠拿破仑，从内部策划政变。最后拿破仑同督政官西哀耶斯结成临时联盟。西哀耶斯想找一把利剑巩固自己的地位，想把拿破仑当作自己的盾牌；拿破仑需要西哀耶斯的政治影响，利用他扶自己跨上法兰西骏马。

拿破仑被巴黎人当作救星。1799年雾月18日，元老院任命拿破仑为首都及近郊武装力量总司令。拿破仑到元老院发表演说，声言要拯救危急中的共和国，要逮捕那些企图制造困难和混乱的人。将军与他一道发誓。接着他对军队讲话，赢得了军队的欢呼，拿破仑一手高举着共和国的旗帜，一手高举屠刀，恐怖在人们心头漫延。那些政客们害怕了，与拿破仑同谋的两位督政官带头辞职，其他三位也在恐惧中辞职，督政府就这样跨台了。五百人院在士兵的刺刀威胁下开会，通过解散议会的决定。元老院通过了建立新政府的决定，把共和国权力移交给三执政，拿破仑、西哀耶斯、罗歇·迪科。拿破仑是真正的执政，唯一掌握实际权力的人。从此以后15年内，拿破仑一直是法兰西的主宰者。

拿破仑以自己的军事才能、巨大功勋及建立的强大军队作为本钱，巧妙地避开国内政治纷争，等待成为法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的机会。1799年反法同盟的进攻及其成功，客观上使拿破仑等到了这个机会。他的聪明之处，是他尽量地给人民以希望，但他却不依靠人民，而是利用督政府内部的矛盾，利用政客们的怯懦，举起利剑，恐吓他们胆怯的灵魂。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交出了政权，拿破仑成功地发动了一次不流血的政变，这充分表明拿破仑不论指挥作战，还是进行政治斗争，一切都是那样深思熟虑，知彼知己，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功。

三、有条不紊地抓住关键问题

歌德说：拿破仑摆布世界，就像洪默尔（德国音乐家）摆布钢琴一样，任何时候他都胸有成竹，应付裕如。拿破仑那种一天工作二十来个小时的惊人旺盛的精力，他那卓越的想象和构思能力及毫无休止地追根究底的作风，他那对国务活动的广泛兴趣和丰富知识，使拿破仑每天都能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从而把斐扬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热月党人、督政官们留下的一团乱麻理出头绪，使国家进入建设的轨道。他信心十足地宣称：“我们已经结束了大革命的浪漫史，现在我们必须开始写它的正史了。在应用伟大原则时，我们仅仅着眼于那些实际的和切实可行的东西。”拿破仑胸有成竹地运用注重实际的策略把各个工作和各种政治力量转移到现实的轨道上来。

政治家要对纷乱的政局理出头绪，首先必须对法国内外形势了然于胸，并抓住关键。拿破仑处理国事成竹在胸，主要是他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了若指掌。他在雾月政变中，利用人民的欢迎，军队的支持，督政府内部矛盾和这些政治家的怯懦，没有杀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甚至没有遇到任何象样的抵抗就取得了成功，就成为法国第一执政。然而这些暂时屈服的政治力量没有消失，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发展着，一旦政治气候适宜，或拿破仑面临困难，他们会像抛弃督政府那样抛弃拿破仑。拿破仑必须认真对付这些人物。督政府留下的是个十足的烂摊子，它不是一项政策失误的结果，而是诸多矛盾交互影响的结果，而且还有深层的经济、文化心理原因。拿破仑自己对议会活动非常陌生，对法国政治人物不了解，对立法、财政都缺乏经验，特别是他的地位时时会受到来自立法、行政等方面的挑战。他的权力和权威需要得到认可和接受。他一直得到军队的支持，但对文官不了解。军队可以保卫他的政权和国家，但却不会经营管理这个国家，他缺乏一个忠于他的文官集团，为他经营、管理他的政权和国家。……。拿破仑通过对现实的认识，逐步对各种情况了然于胸，为他胸有成竹地处理各项事务、制订各项政策提供了基础。

拿破仑在这些纷纭复杂的矛盾中，找到了问题的关键。这就是必须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和权威，与一切企图限制、削弱他的权力和影响的任何企图和力量作坚决而又策略的斗争，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没有权力和权威，任何事情都做不成。雾月政变建立了拿破仑、西哀耶斯、罗歇·迪科三执政共同掌权的执政府。拿破仑虽位列第一执政，但他在人们眼中，依然是一个杰出将军，共和国的保护者，但在政治上，却是个初出茅庐的30岁的小伙子，人们仍习惯于请教西哀耶斯。

西哀耶斯在议会和政府中的影响仍然十分巨大。元老院委托西哀耶斯提出新宪法草案。这位法学家经过十多天的缜密思考，精心制作了宪法草案。草案规定：由元老院选出终身大选长，大选长由3千人组成的卫队护卫；大选长任命两个执政分别负责战争与和平，接见外国使节，以自己的名义颁布法律；元老院有权罢免大选长。这个草案显然是西哀耶斯与元老院相互勾结的产物，无疑是对拿破仑的挑战。拿破仑要么出任这个徒具虚名的大选长，要么在大选长之下找一个职位，如两执政中负责战争和军事、外交的执政，可以指挥海军、陆军、外交，但内政、财政、国库、警察却掌握在另一执政手中。像拿破仑担心的那样，“一个为了军队需要钱，需要征兵，一个却什么也不给。这样的政府是畸形的造物”。这个草案中无论那个角色都与拿破

仑渴望扮演的角色有天壤之别，都是拿破仑无法接受的。

对手正是在拿破仑认为是关键问题的地方向他提出挑战。他们想把雾月政变的胜利者的荣誉之花插在拿破仑头上，却把果实留给自己，不给他真正的权力。拿破仑坚决反对这个草案。年轻的拿破仑在议会斗争中虽缺乏经验，却不缺乏敏锐的洞察力。拿破仑对草案提出了修正：取消大选长，把文、武两个执政的职权全部划归第一执政。这样，限制独裁的宪法草案，变成了建立一个权力无限制的独裁政府的法案。拿破仑在讨论中，面对年迈的对手，采取了简单却十分实用的战术——疲劳战术，故意把讨论延长到深夜，使对手连站起来发言的力气都没有了。精力充沛的拿破仑却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见解，议员们心力交困，无奈地通过了拿破仑的宪法修正草案。1800年，宪法交付全民公决，拿破仑大获全胜，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这部共和八年宪法。

拿破仑没有急于统率大军，打败入侵法国的反法同盟。这些敌人的存在和强大增加了拿破仑的筹码。利用这一筹码，拿破仑首先通过立法改变，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拿破仑把议会分为四个院：由第一执政任命组成的参议院，在第一执政提议和主持下负责提议、草拟各种法案；保民院负责审议各种法案，并向立法院提出审议报告和意见；立法院不经辩论就投票赞成或否决法案，人称哑吧院；元老院负责批准法案。第一执政也可以直接向元老院提交法案。除元老院为终身专职议员外，其它各院议员实际上均由第一执政任命。能对第一执权力构成威胁的立法权，被置于第一执政的影响和支配下。行政权、司法权则完全集中于第一执政。第二执政、第三执政只是作为第一执政的助手和参谋，起咨询作用。拿破仑实际上已成为共和国的君主。

拿破仑掌握权力之后，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建立自己的官僚集团，延揽人才，建立一个忠于自己、有才干的政府。宪法通过前夕，西哀耶斯和罗歇·迪科辞职。拿破仑提拔法学家康巴塞雷斯和经济学家勒布伦出任第二、第三执政。一个在立法上帮助他，一个在财政上帮助他，以补他在这两方面的不足。在用人政策上，拿破仑抓住两点：一是用有才能并愿意出力的人，而不问其品行、经历、地位、影响如何，特别注意选用具有批判精神的年青人。他对化学家贝托莱、数学家蒙日、天文学家拉普拉斯、法学家康巴塞雷斯、经济学家勒布伦都是热情相待。特别是对康巴塞雷斯始终信任。拿破仑外出时，总是让他代理国政。

二是善于客人。拿破仑对反对过他或伤害过他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都加以使用。他试图把各个方面的人物团结在他的周围，为他的政权服务。大革命以来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大多数被拿破仑收罗过来，从而加强了政权的稳定性和代表性。在拿破仑选择的人物中，有投靠新政权的王党分子、有斐扬党人、有吉伦特党人、有雅各宾党人、有热月党人、有督政府的显要人物，甚至包括情敌、政敌贝尔纳尔特，曾负责监视和谋杀拿破仑的克拉克尔、“连父亲都可以出卖”的外交家塔列兰、“玩弄阴谋就像他一定要吃饭一样”的富歇。只要有才能并愿意为他的政权服务，不问过去属于哪一派的，他都一概录用，并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他说：“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时代，对于过去，我们应该仅仅记住好处而忘掉坏处。时间、实际活动和经验造就了许多有才干的人，并且改变着这些人的素质。”德国诗人歌德热情地赞赏拿破仑的用人政策。他写道：“只有本身具有伟大才能的君主，才能识别和重视他的臣民中具有伟大才能的人。‘替才能开路！’这是拿破仑的名言。拿破仑自己确实别具识人的慧眼，他所用的都是用得其才，所以在他毕生全部

伟大事业中都得到妥当的人替他服役，这是其他君主难以办到的。”拿破仑的用人政策帮助他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帝国，使他在国家活动的各个领域都有一批得心应手的执行者在推行他的政策。

掌握了巨大权力的拿破仑，通过广用各式人才来弥补其治国经验不足、缺乏必要的专门知识的弱点之后，第三步就是建立切实有效的行政机构。在中央，建立了以拿破仑为主席的参议院。参议院下分陆军、海军、财政、立法、内务五个组，集中各方面的精英分子进入这个咨询机构，并且负责以发布意见的形式解释法令，扩大参议院的权力，使之具有最高行政裁决权，在处理行政机构的争议中起调整作用。同时任命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人担任各部部长，在第一执政的领导下处理各种行政事务。

在地方，拿破仑实行改革行政的措施，取消了地方自治和选举制度。各级行政区都由一名行政长官领导；地方所有官吏都由政府委派；省长由拿破仑亲自任命。这些富有经验和行政能力的省长，直接向中央负责，职权专业化，提高了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拿破仑政府的基础。这个“行政制度的力量完全在于能够确保不折不扣地贯彻政府的法律和法令，……执行法令要一竿插到底，从部长直到被治理的百姓，不容中断；它要把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以电流的速度传达到社会组织的基层去”。拿破仑的内政部长夏塔塔尔准确地概括了拿破仑体制的特点。

有了坚实的军事和政治基础，拿破仑还需要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这就是经济基础。拿破仑的第四步措施，就是调整经济，改善恶劣的经济状况。因为这是人民拥护政府的根本性和持久性依据，是取得对外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国家政权巩固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拿破仑发展经济的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改革财税体制。拿破仑任用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瑞士银行家内克的同事、具有丰富财政经验的戈丹为财政部长，要他建立一个财政系统。其改革措施有：先后取消了地方政府确定税额分配和征收部分直接税的权力；建立了全国直接税管理局，负责征收直接税；重建期票证券制度，收税专员以预订支付的期票形式提交国库，由银行为国库兑现，加强了国库的地位，充实了国库；整顿和加强财政机构，改革税收制度，加强间接税的征收；厉行经济紧缩政策，健全会计制度，严厉打击贪污和盗窃国家财富的罪犯。这些措施使国库收入大大增加，稳定了财政，使国家拥有了雄厚的物质力量去克服各种困难、推行各种新政策。二是发展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政府以巨额津贴，建立新企业，举办工业展览会，鼓励机器生产，支持建立法兰西银行。拿破仑认为，强大的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工业和发达的商业。经过调整，财政收入增加，国家预算到1802年消灭了赤字，达到平衡。同时还修建了巴黎到各主要城市的公路，开拓运河，进一步加速了资本主义发展。政府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巩固了国内市场，使贸易额成倍增加。法国经济开始进入大革命以来的发展时期，新的制度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开始结出硕果。

拿破仑在政治、经济上巩固自己的统治、整顿内政、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同时平定了国内的叛乱，向欧洲各国提出和平提议。在和平提议被拒绝后，他出奇不意地发动了第二次意大利战役，打败了反法同盟的急先锋奥地利，迫使奥地利接受停战条件，实现了相对的和平局面，有力推动了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

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取得政权后，他充分了解、分析了各种情况，按照

事物发展的内部逻辑，分清轻重缓急，有条不紊地抓住一个接一个的关键问题，使通过政变把自己强加给法国的阴谋活动，变成了巩固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打败国外敌人、建立强有力的进步政权的革命性措施，从而使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成果真正地表现出来，并在各方面显示了这种革命和新制度的优越性、进步性。这完全是拿破仑胸有成竹、环环相扣的政治谋略成功的结果。

四、远交近攻离间大国

拿破仑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巩固了他的政治、经济基础之后，立即把国际问题当作重点问题。当时的法国还处在第二次反法联军的包围之中。经过八年战争的法国迫切需要和平，刚上台不久的拿破仑更需要和平，哪怕是短暂的喘息机会。尽管反法联军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拿破仑的身价，使他一举成为法国的最高统治者，但他已达到自己目的，急需时间来解决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拿破仑向英、奥、俄三国君主建议尽快停止军事行动，遭到英国等三国傲慢的拒绝。拿破仑并不感到遗憾，因为他清楚，对于这些正在获得胜利的强盗，要他们接受和平，除非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没有别的办法，和谈建议只是想了解三国对法的态度而已。拿破仑决定以战求和，这是通向和平的唯一道路，也是自己向法国人民显示自己作为他们的救星和保护神的能力的唯一办法。先教训干涉者一下，再谈和平，再确定法国外交方针，成为拿破仑的既定计划。

拿破仑认为，要战胜英国，就必须摧毁英国的海上霸权。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需要等待时机。眼下的反法联盟是他的主要敌人，而奥地利是三国中承担对法主攻任务的国家，是法国最大的威胁。拿破仑决定把奥地利当作攻击的对象。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取得了胜利，把意大利的法军截为两段，或者打退，或者包围。囊括意大利并由意大利进军法国，成为奥军的如意计划。拿破仑认真分析了战局形势，决定再次出兵意大利。

1800年5月，拿破仑统帅法军从瑞士这个意想不到的地方，翻越天险阿尔卑斯山，向东前往米兰，夺取奥军补给线，切断了奥军退路，而没有去被围的要塞解救那里的法军。奥军全军回师救护其后方，以优势的炮火几乎挫败了拿破仑。但拿破仑极为镇静，利用敌军松懈而猛烈反扑，以5千人的代价歼敌1万余人。奥军损失超过三分之一，急忙向拿破仑求和。拿破仑取得了第二次意大利战役的胜利，便启程回国解决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外交问题。

拿破仑利用意大利战役胜利的有利时机，展开了自己的外交谋略。拿破仑始终把英国当作自己的主要敌人。英国利用法国大革命引起的国内政局动荡，几乎夺取了法国大多数海外殖民地，利用其海上霸权对法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使法国失去了广大的原料供给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而且一直是欧洲大陆反法力量的后台。拿破仑一时无法打败这个敌人，就必须首先实现欧洲大陆上的和平。欧洲大陆上的大国有三个——普鲁士、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力量较弱，奥地利力量较强，与法国紧相接连，是反法的主要力量，但它与法国力量相当，如果没有普、俄两国的支持，奥地利不会对法国构成致命威胁。俄国虽然积极唆使欧洲大陆其他封建国家武装干涉法国，主要是为使自已能够乘机肆无忌惮地对土耳其和波兰进行掠夺。俄国在地理上与法国相距较远，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两国之间的矛盾还未发展到尖锐的程度，而俄国同奥地利在中欧、意大利、巴尔干冲突，同英国在地中海和土耳其的冲突却日益激化。拿破仑决定在外交上实行远交近攻方针。

拿破仑为寻求同俄国接近的途径，派人到柏林活动，委托中立的普鲁士向沙皇保罗一世传递信息。他看到英俄争夺马耳他的尖锐矛盾，便于1800年7月采取了一项重大外交步骤：法国外交部长塔列兰致信沙俄政府。信尾几句话表示，法国可以立即无条件地将6千名俄国战俘连同他们的军旗，送回俄国，并为战俘配备新的武器和军服。接着拿破仑亲自致信保罗，重申法

国抗击英国保卫马耳他的决心。他击中了英俄关系的要害，决心用马耳他这个不和的种子扩大俄、英矛盾，促使俄国同法国接近。

保罗一世看到他咒骂的拿破仑如此“友好”地对待俄国战俘并要保卫马耳他不受英国侵犯，而自己的盟友英国却背信弃义，把原由沙俄控制的马耳他据为己有，于是决定与法国建立友好关系。保罗比拿破仑走得更远，他写信给拿破仑说：两个强国确立协调，就能对其它地区发生有益的影响，建议法国在英国沿岸采取措施。8月29日，保罗一世宣布对英国所有船舶的封港令，并出面组织了有瑞典、丹麦和普鲁士参加的针对英国的保护中立国贸易联盟，把英国从波罗的海排挤出去。12月，保罗和拿破仑又交换了一些友好信件：前者把路易十八逐出俄国，后者下令停止对俄国船只的一切敌对行为。沙皇甚至建议组成俄法联军，会同伊朗人和阿富汗人把英国赶出印度。拿破仑同反法联盟的首脑人物保罗一世的结盟，是拿破仑反对欧洲干涉主义的一大突破，是拿破仑分化瓦解敌人营垒、争取敌人营垒主要成员为自己盟友的远交近攻策略的一大胜利。

正当拿破仑对俄外交取得重大胜利、准备集中力量打击英国的时候，保罗一世于1801年3月11日在米海洛夫宫被人勒死。拿破仑认定这是英国人干的，是英国对他的暗算。尽管拿破仑仍然坚持法俄联盟的政策，但却把外交重点转向同奥地利和英国的谈判上。因为奥地利与俄国的关系因法俄关系的密切而破裂。奥地利害怕法俄联盟将使自己更加孤立而处境危险，急于同法国讲和。拿破仑却指示谈判代表约瑟夫不要急于签订和约。他利用马伦哥战役后，签订的停战协定期满派莫罗将军率莱茵军团在巴伐利亚击败奥军，并向维也纳进军。奥地利在战场上失败，不得不接受拿破仑的相当苛刻的和谈条款。奥地利因此几乎丧失了莱茵河左岸的一切地区。拿破仑利用保罗一世的帮助，牵制了奥地利东方集团，从而打败了奥地利，终于达到了他要求的一切。

拿破仑战场上和外交上的胜利，使英国用英镑和舰队唆使他人火中取栗的政策山穷水尽，无法施展。反法阵营内只剩下一个孤单单的英国，英国只能放弃战争政策，与法国和谈。1801年10月1日，英法两国代表在伦敦签订了预备和约条款，后在法国东北部召开了亚眠和平会议。1802年3月27日，法国全权代表约瑟夫以及西班牙、巴达维亚全权代表同英国全权代表康华里勋爵签订了亚眠条约。除特立尼达及锡兰岛上的荷兰属地外，英国必须将法国大革命以来所占领的一切殖民地归还给法国及其盟国；法国退出那不勒斯、罗马和厄尔巴岛，英军必须退出它在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占领的所有港口和岛屿；英国退出马耳他，退出埃及；英法双方保证土耳其领土完整。孤立的英国被迫作出巨大让步，但英国不会长期屈从于条约的束缚。拿破仑一面乘机竭力削弱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地中海地区的势力和影响；一面丝毫不怀疑英国很快要破坏和约，并作好战争准备。

拿破仑利用反法同盟中的矛盾，远交俄国，改善了法俄关系，使法俄关系发展形成了结盟的基础，从而离间了俄英关系、俄奥关系，使处于法俄两大国之间的奥地利陷入绝境。拿破仑一举打败了卧榻之旁的孤立无援的反法急先锋——奥地利，从而进一步孤立了英国。英国政府屈于拿破仑的军事压力，接受了亚眠和约，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了拿破仑的目的：既打败了反法联盟，又解除了英国对大陆的封锁，同时取得了地中海上的优势，收回了海外殖民地。可谓远交近攻，离间大国，一计安邦，从而结束了欧洲的十年战

争烽火，确立了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无论海上还是陆上，都没有战争了，出现了连续几年的和平时期。

拿破仑此时被当作伟大的英雄崇拜。1802年，全民公决推选拿破仑为终身执政。1804年成为法兰西帝国皇帝。外交上与军事上的胜利，使这一切顺利而自然地实现了。

五、废弃线形战术大力改革兵制

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封建各国兵制都采用线形兵制和线形战术。这种兵制和战术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和他的主要助手利奥波德侯爵创造的。他们把强征来的士兵编成纵队，以死板的长方阵，在战场上横列向前运动，一直保持着固定人数。部队采用齐步走步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仿佛故意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炮火面前一样。士兵们使用的步枪全是铁通条式的，笨重却射击准确。弗里德里希一世的最高原则是：“迅速地装填子弹，进行齐射，沉着地向前运动，冷静地观察敌人射击，要求这一切都保持平稳寂静。”这种用军棍训练出来的、运转准确的战争机器，在法国大革命以前，特别是拿破仑改革军制以前，是欧洲最通行的军事编制方法，在欧洲几乎是战无不胜的。

这种兵制的战斗队形各部分的组成、行列和间隔距离都是严格规定的；战斗中队形的变换、步法、步幅、行进速度和使用武器的动作以及其它一切行动都有严格规定。射击是同排同时射击，前后排轮流射击。这种战术的最大优点在于火力集中。一旦压住对方火力，前后排交替射击前进，不给对方喘息机会，巧妙地解决了装子弹与射击交替过程中的混乱和火力下降问题；另一个特点是纪律严明。严格的规定防止了士兵的厌战、偷懒和投机取巧，任何人一旦离开自己的位置，立即会被发现。这种欧洲最先进的兵制，在法国大革命后，遇到了严重的挑战，逐渐地暴露出自身致命的弱点，有待于改革。

在法国大革命中，那些奋不顾身的自由战士英勇地抗击欧洲封建国家的干涉。他们没有时间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很难也不可能按照这种操典式的线形战术作战。即使在作战受挫时，也不像线形方阵中的士兵那样无可奈何、听天由命、或者设法逃走，他们每个人各自为战，为自己的理想、信念作战，充分发挥着他们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献身精神，英勇顽强地战斗到最后，给敌人以最大的打击。这不是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是迫不得已。法军总司令给陆军大臣的信中说：“这支军队的情况很可怕，如果我们按照士兵的愿望前进的话，我们一定会失败，……但是我们更不能进行防御战……除了实施大胆突击，使敌人感到震惊和陷于混乱以外，别无任何可能。”绝望状况下的狂热冲击，一次又一次失败，一次又一次集合起来，视死如归的战斗每次都被敌人击退，联军阵线屹立不动，战士们溃散为无数小队和小群，卧倒在战场上，怒火喷射又束手无策。既然堂堂正正的进攻无法摧毁这部战争机器，于是他们采用自己的办法对付可恨的敌人了。“士兵们不断地向前运动，但不成纵队，而是分散疏开，以每个战士为单位。”每个人都利用适当的地形，像猎人接近野兽那样屈身爬行，匍匐前进，隐蔽自己，开枪射击。无数射手的枪弹像下雨一样时强时弱地射向敌人，联军各排的齐射火力虽然十分猛烈，却很难命中这些分散的射手，炮兵火力的效果也降到了最低限度。

这种作战方法使联军部队无所适从，推翻了他们的全部军事艺术。共和国的士兵看到敌人对他们无可奈何，他们牢牢记住这一点，从此就开始采用这个新的战斗方式作战。这种新的战斗方式越向自觉的战术方向发展，损失就越小，成果也就越大。联军的战线在起消耗作用的散兵火力下很难扼守。在这种散兵作战方式的反复运用中，产生了现代散兵战。法军总司令卡尔诺根据实践经验，创立了新型的、独立的、步兵、炮兵、骑兵混编的战术单位

——师。直到拿破仑统帅意大利军团，才从根本上放弃了线形战术，开始逐步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兵制。因为线形战术不仅不适应散兵战，而且有许多根本缺陷：一是这种操典式的严明战术，使部队缺乏机动性和灵活性，很难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的需要。亲自参加过反法联军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企图为军事艺术建立一套死板的理论，好像搭起一套脚手架那样来保证指挥官到处都有依据，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二是这种线形战术将士兵排成三线，形成一个非常狭长而中空的边形，只能以战斗队形作为整体来运动，整体一旦被打乱部队就会丧失战斗力。三是这种始终保持队形的战术，行动缓慢，易于丧失许多机会。四是这种战术只能在平坦的地形上，整齐运动，无法适应山地、河流、湖泊和沼泽地等复杂地形。五是线形战术的战斗往往是依靠火力优势，取决于一次突击，成败在此一举，一旦受挫就很难恢复队形和攻击力，调整部署更为困难。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拿破仑放弃线形战术，改革兵制，既可以克服以上弱点，又可以利用敌人的这些弱点，夺取战争胜利。

拿破仑吸收法国大革命以来，共和国将士的战斗经验和一系列新思想，完全放弃线形战术，彻底改革兵制，增强部队的机动性、灵活性，从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运用一系列战略战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建立了一支在欧洲一度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从而成为欧洲新型兵制的楷模。当他们都学会运用这种新型兵制以后，整个欧洲的兵制改革就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拿破仑的具体步骤是：首先，他把调动士兵自觉无畏地作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放在首位。因为现代散兵作战，没有士兵内在的积极性，根本无法进行。它的重要性超过了任何其它因素。当拿破仑就任意大利军团总司令后，面对这支衣衫不整、缺衣少食的部队，对各种物资条件的缺乏并不在意，而是全力鼓舞军队的士气。他们对他们讲话说：“我想带你们到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去，富饶的地区和繁荣的大都市都将受你们支配，你们在那儿将会得到尊敬、荣誉和财富。意大利军团的士兵们，难道你们的勇敢精神和坚忍力量不够吗？”拿破仑相信士兵不是可以随意摆动的棋子，“士兵是有理智的生命，必须给予指挥，……他喜爱争辩，因为他是聪明的”。所以拿破仑兵制改革的重点首先是发挥士兵的英勇作战精神和主动性。法军由大革命的民主意识武装起来的将士的革命热情，在拿破仑兵制中得到充分的张扬和发挥，士气远远高于反法联军的各国部队。

其次，拿破仑在军队队列上采用以自主的散兵作战为基础的横队作战、纵队作战、散队作战等各种灵活队形，聚散无常，变化多端，充分地适应了战场环境、条件千变万化的需要。根据情况随时变化，充分发挥部队的灵活性；在兵种上巧妙组合步兵、炮兵和骑兵队伍，利用各兵种的长处。炮兵火力猛烈，是线形战术的有力克星。炮兵出身的拿破仑最善于利用炮兵打击成队形和密集的敌人，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打乱敌人的阵形。步兵灵活、快速、适应各种地形、交通条件，拿破仑常用他们迂回、穿插、阻击和冲锋，是军队的主体力量。骑兵在突袭和平原地区追击敌人效果显著，……拿破仑能根据战场情况，巧妙地交替或同时使用他们达到战役目的。

第三，新的队形和兵制必须运用新的战略战术的指挥，才能充分发挥新兵制的优点；拿破仑已成形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也只有实行新的兵制后才能显示其威力。主动、灵活、快速的军队，既克服了旧兵制的各种弱点，又能巧妙地利用旧兵制的弱点、不适应进行打击，成为死板、不灵活、行动迟

缓的旧兵制的克星。拿破仑采用集中兵力打击其一点，或出其不意，或迂回前进，两翼包抄，使敌军的队形调整不及，就遭到猛烈打击而失败。拿破仑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旧兵制面前，屡战屡胜，而当欧洲各国也相继学习拿破仑兵制改革，并采取了拿破仑的战术后，拿破仑作战取胜就相对困难得多。

第四，旧军制的士兵需要长时间的训练，不是一时半刻能补充的，拿破仑完全改变了这一点。他要求士兵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拿破仑的士兵一般只要训练七八天就上战场，在战场上学习各种实战技术。1806年，他写道，“我的新兵不需要在训练营里呆八天以上”。恩格斯评论说“拿破仑能用一个月的时间在补充队里训练出新兵营，第二十月行军，第三个月就投入战斗，但是他每一个营都有足够的有经验的军官和军士，每一个连有一些老兵，而在战斗的时候把新兵和老兵编在一起，可以说，把新兵装在老兵的框子里”学习作战的知识和技术。

第五，拿破仑在军队后勤上奉行以战养战、因敌制胜的思想。他认为“物资的缺乏、贫困和艰苦是训练好兵的学校”。他以意大利北部的富饶鼓舞士气。拿破仑大军所到之处，战胜之后，首先是打开军需仓库装备部队，从而克服了由于运输线过长而不能远距离作战的弱点。作战时常常把敌人的军需供应地和供应线当作进攻目标。但他这种以战养战的原则在冰天雪地、寸草不生的俄罗斯的冬天遭到了失败，也使他的战争逐渐带上了浓厚的侵略战争性质。

第六，拿破仑改变了那种从贵族骑士或军校生中选拔将领的惯例。他说过一句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拿破仑从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中提拔了一大批具有实战经验、英勇善战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担任军官或将领，充分提高了部队作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部队始终在有丰富经验的军官的指挥下作战，有效地利用他们的经验和勇敢带动部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正像恩格斯说的那样：“1813年以后，法国的一套战术成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共同财富。旧式的线形战术和募兵制彻底废除了”，“革命战争包造了拿破仑这样的人物，他把这种新的作战方法发展为一套正规制度，并吸取了旧制度中有益的部分，因而立即使这种方法达到像弗里德里希使线形战术所达到的那样完善的程度。这时候，法国军队几乎无敌于天下，直到他们的敌人学会他们的经验并按新形式编组自己的军队时为止。”拿破仑军制改革的核心是增强了军队的灵活机动性，也使拿破仑的各种战术得以运用自如，从而使拿破仑取得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争胜利，推动了欧洲军事制度的根本变革，奠定了拿破仑伟大军事家的地位。

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拿破仑一生指挥过的重大战役，几乎超过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恺撒大帝指挥过的战役之和，除过滑铁卢战役的意外失败以外，几乎战无不胜。恩格斯热情地评论拿破仑把他的“战略和战术发展到那样完善的程度，以致现代的将军们一般地不仅不能胜过他，而且只能试图在自己最光辉和最成功的作战中抄袭他罢了”。拿破仑在整个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凭着欧洲大陆这个舞台，以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导演了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以致他的敌人在没有学会他的战略战术以前根本无法将他打败；甚至那个时代及稍后时代的伟大军事理论家如克劳塞维茨、若米尼著的许多军事著作几乎成了拿破仑战略战术的注脚。拿破仑指挥的许多战役都是以少击多，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拿破仑军事谋略的胜利。拿破仑军事战略艺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在军事上，要作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首先必须准确地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及其军事部署的内在联系，并且对敌军的行动和战略战术作出正确判断。在拿破仑成名的第一次战役，即土伦战役中，拿破仑认真观察了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看到敌人在共和国军队久攻不下的情况下，错误地以为其固守中央阵地，依靠海舰炮火支援的防御体系是坚不可摧的，而未进一步了解法军内部变化，如法军炮兵力量从几乎没有作战能力，发展成作战能力较强的力量，敌军同样没有看到里昂战役胜利对土伦战役军心的鼓舞和对部队供应的增加。拿破仑发现，敌军部署十分严密，其优势炮火主要在海港的军舰上，而法国炮火射程却无法达到那里，不压住敌军舰上炮火就无法攻克敌军阵地，但是拿破仑没有选择中间突破，或彻底打破守敌防御的措施，而是决定利用突然袭击，以优势兵力夺取马尔格雷夫堡高地。该高地虽不是敌军防御体系的关键，但只要占领该高地，就可以用猛烈的炮火打击敌人整个防御体系的炮火保护伞，从而使敌人失去其炮火优势，再用步兵迂回敌人两翼的侧后，使敌人整个防御体系全面陷于崩溃。为此拿破仑选择12月16日这个大雨倾盆的夜晚，出其不意地发动总攻，在敌人还未判断出对方的真正意图的时候，拿破仑已占领高地，利用高地以猛烈的炮火打击那些高枕无忧的英国、西班牙军舰。军舰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受迎头痛击而无法还手，只有仓皇逃之夭夭。整个土伦城失去了炮火保护，拿破仑放手让炮兵把炮火密集地倾注在土伦城里的敌军阵地上，毫无还手之力的敌军被法国步兵突破防线而彻底失败。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地夺取高地，把毫无防备的军舰当作重点打击的对象，从而打破了敌人的优势和防御体系。

拿破仑担任意大利军团总司令后，积极主张以意大利为主攻方向，但督政府却派莫罗将军和儒尔当将军各率八万军队在易北河和莱茵河流域作为对奥地利作战的主战场，交给拿破仑的是支他的前任舍雷尔所说的“没有军饷，没有军粮，没有饲料，没有鞋袜，没有衣服，没有营帐，没有扎营工具，没有运输工具，只有30门大炮的3万衣衫槛褛的叫化子军队”。由于舍雷尔一直未在这里打开局面，所以奥地利军队对意大利军团像督政府一样，认为它是起配合作用。奥军和撒丁军联合虽比法军的意大利军团强大，但北靠阿尔卑斯山使他们几乎无法从奥地利得到任何及时的增援，拿破仑认为这是法奥作战中最薄弱的战场。拿破仑出任时，一部分法军进逼热那亚，奥军主观地以为拿破仑的主攻方向在热那亚，把主力全部开往热那亚布阵，拿破仑出其

不意地冒着英国海军的炮火翻越阿尔卑斯山天险，直插奥撒联军的结合部，他没有按一般规律和原计划攻打弱敌撒丁军，而是乘撒丁军不敢出援，出其不意地从背后打击已展开阵形防守热那亚的奥军，使强大的奥军损失数千人，整个作战部署被打乱，慌忙从热那亚撤军，拿破仑立即占领了通往奥地利的意大利的政治中心米兰的通道，奥军立即在米兰周围展开防守队形，拿破仑却调转目标，直扑撒丁军，一举打败撒丁军，迫使其投降并向法军交出所有军需仓库而成为法军的后备阵地。拿破仑挟连战连胜的余威进逼奥军，在迪洛桥附近，发现几千名奥军准备过桥，拿破仑立即猛攻，使敌军进退两难而全军失败。拿破仑在第一次意大利战役中能善于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出其不意地给敌军一次次打击，使意大利这个次要战场成为法奥战争的主战场。

雾月政变后，拿破仑成为第一执政，励精图治，向英、奥、俄三国建议停战，遭到拒绝，奥地利更是要报一箭一仇，想从法国手中收回意大利，进而进击法国。拿破仑决定以武力打败反法同盟的包围，把目标再次放在意大利。当时奥军正在围困热那亚的法军，拿破仑率军从瑞士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既没有去解热那亚之围，也没有打击奥军侧翼，而是直接在奥军将领梅拉斯根本没有想到的地方和方向出现，直接进军米兰，夺取了梅拉斯的供应、仓库、医院，切断其与奥地利的联系。张着口袋等拿破仑钻的梅拉斯的整个被署被打乱，仓皇回军保护其补给地，暴露出奥军的破绽。最终在马伦哥战役中，拿破仑击败奥军。第二次意大利之战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出其不意地夺取米兰，既占领了法军在该地的立足点，又补充了翻越天险所造成的装备不足，同时调动了敌人，使敌人不能按自己的部署进行作战，而只能临时适应拿破仑的作战计划，从而使怯军在优势敌人面前处于主动地位，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拿破仑出其不意，攻击不备的战略战术在以后的战役中反复运用，成为他的一条作战原则。但运用这个作战原则有四个前提：一是作战计划要十分机密地制订，作战准备过程，甚至进军也不能使敌人明确地判断出自己的作战方向、地点和意图。只有在敌人毫无准备或者发生错误判断的情况下，战术策略才能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二是指挥官必须准确和详细地掌握敌军的有关情报，正确选择突破口。这种突破口既是敌人不备的地方，又必须是敌人防守的某种要害或潜在要害，可以打乱敌人的防御或作战部署，或者调动敌人，迫使其在十分不利或没有准备的地方和条件下作战，三是这一战术原则要求必须有把握初战告捷，攻其不备而不能夺取，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它不仅失去出其不意的意义，而且反而受制于人无力自拔。四是战役指挥者不仅能在战前选择敌人不备之处，也必须根据战役发展的形势选择出其不意的进攻方向并能适时地调整作战计划，企图一战致敌于死地是不现实的，必须要有能利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所带来的作战机会连续作战的能力和决心。如果浅尝即止，见强即退，就不能达到影响敌人的目的。同样的战略战术，运用于千变万化的战场，成败往往在于各种因素的变化及其把握上。战争是一种变幻莫测的学问，是智谋、勇气、雄才和信心的综合运用。高明的战术原则只有在战争中才能逐渐把握其要害，拿破仑是这方面的光辉典范。

七、集中兵力 各个击破

拿破仑在《论攻击战》中，对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阿尔道夫、秋林、叶甫尼根亲王和弗里德里希大王在攻击战中运用的原则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这些军事家的共同原则是：保持兵力集中，下让它们有容易被攻破的地方，高速度地赶往极重要的据点……。”拿破仑反复强调保持兵力集中、行动迅速、大胆勇敢和精心组织是进攻战中必须遵循的规则。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是拿破仑一贯提倡并反复运用的主要军事谋略。

拿破仑认为，战争胜利的关键是牢牢掌握战役主动权；掌握主动权的要害，首先是必须正确选择进攻的时间和地点，即在出其不意的时间和地点向敌人发动进攻；进攻的成败在于是否能集中兵力，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战役的胜利不仅取决于这些谋略的制订和运用，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战役实施中能否正确运用自己的这些有利条件，坚定、果断、沉着、巧妙的运用自己有限的兵力，实现击败敌人的目的。因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成为拿破仑军事思想和谋略的中心环节。

1793年的土伦战役中，拿破仑集中兵力攻占马尔格雷夫堡。然后进一步集中炮兵的全部炮火打击英国、西班牙军舰，从而改变了战局形势，牢牢掌握了战役主动权。土伦战斗后，拿破仑就向上级提出通过意大利进军维也纳的作战计划。他明确提出：“共和国缺乏足够的军官、炮兵和骑兵。到处发动进攻是一种军事上的错误：不应分散自己的进攻力量，而应该集中这些力量。围攻堡垒是这样，战争体系也是这样，集中火力进攻一点，打开缺口，破坏平衡，其它就变得无能为力，而阵地也就这样被占领了。”这个计划没有被采纳，但充分反映了拿破仑的战略战术思想已完全成熟，特别是他将土伦经验进行升华。“攻击堡垒是这样，战争体系也是这样”，充分表明拿破仑已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当作他战略战术思想的中心内容了，只是还需要大规模战役实践的印证和完善。

1796年，拿破仑率意大利军团进军意大利北部。他明确地说：“进攻必须是集中一致的，为保证给养，军队平时可以分散部署，但作战时，军队则必须集中，统一指挥是取胜的必要条件。”当法军到达前线，大战开展前夕，拿破仑看到法军人数上的弱小及炮兵、骑兵人数不足的缺陷，决定不能持久作战，必须集中兵力以弥补人数不足的缺陷，以灵活性弥补炮兵不足的缺陷，以选择有利地形弥补骑兵不足的缺陷。于是他迅速决定，率军进攻奥撒联军阵地中的一片楔形山区。这是敌军易受攻击而不利士兵集结或展开的地区。集中兵力首先从这里打击敌军，以便把奥军和撒丁军双方联系切断，使法军掌握战场主动权。拿破仑利用奥军判断错误、防守热那亚之机，集中兵力悄悄地钻进奥撒两军阵地之间，即蒙特诺特附近的山岔地区。4月12日，拿破仑指挥法军从正面、后方及两侧向蒙特诺特发动猛攻。奥军阿尔热托四面楚歌，完全失去抵抗能力，损失3千余人，奥撒联军被完全隔开，而无法会合，阵地陷入混乱。奥军司令在热那亚没有发现法军，回撤途中才听到法军获胜的消息。拿破仑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利用奥军调整部署之机，以一支军队威胁撒军后方，集中兵力连续攻击，给奥军各部队以重创，并打退撒丁军，打开通往米兰和都灵的两条道路，使奥军急忙龟缩退守要塞和渡口。奥地利军队的兵力优势已经完全丧失，士气低落，胆颤心惊，无力主动出去。拿破仑立即再次集中兵力，向力量较弱、又失去奥地利军队支援的撒丁王国军队

猛扑，从正面攻去，配合左右迂回，使撒丁王国军队向首都都灵方向溃退。法军取得所需的军需仓库后，发挥骑兵平原作战的优势，便乘胜追击敌人，扩大战果；迫使撒丁王国订立城下之盟，将一些城市、它们的所有大炮和仓库交给法军。撒丁军成为法军的警备部队，撒丁王国成为拿破仑军队的后备阵地。最后拿破仑掉转方向，集中全力向奥地利军扑去，奥军退保米兰。法军集中兵力，直捣洛迪，彻底打败了奥地利军队，完全占领伦巴第地区。

由于奥地利军队在莱茵河地区击退法军，立即派 4.7 万名精锐驰援意大利战场、拿破仑的优势地位立即变成劣势。奥地利援军企图利用法军围困意大利奥军的最后一座堡垒——曼图亚，一举歼灭连续作战的法军。拿破仑若不立即攻克曼图亚要塞，就会腹背受敌，从而失去战场主动权。但曼图亚要塞仍有守军 2 万余人，奥地利军队在此长期经营，粮草充足，弹药丰富，防御工具完备，法军一时难以攻克。拿破仑为避免被动，果断地秘密撤围。他认为占领要塞，围困要塞都是次要的，在野战中取得胜利才是关键。奥地利增援部队以为法军仍在围困曼图亚要塞，兵分三路向曼图亚进军。拿破仑乘奥地利援军判断失误，战场情况不明，兵力分散，军队被加尔达湖和明乔河隔开的弱点，调动全军，集中兵力猛攻奥军的一个军团，然后再进攻其它两个军团，5 天内俘敌 2 万人。奥军猛烈反扑。再次分兵急进，拿破仑在奥地利军队前头进军，歼灭了曼图亚要塞出来与援兵会合的奥军，4 天后又回师打跨了援军，最后围困曼图亚这个孤立的奥军唯一据点。奥地利老元帅维尔姆泽在疾病和饥饿的打击下，处在法军重围和猛攻下，孤立无援，除了投降没有别的出路可走。

奥地利不甘心失败，再次调集 6 万人增援绝望中的维尔姆泽元帅。奥地利援军依仗兵力优势，企图分兵以包围拿破仑军队。拿破仑看到曼图亚奥军基本上已无作战能力，就留下 8 千余人包围这个要塞，主力撤围，以逸待劳，迎击敌军，阻止两路奥军会合。拿破仑考虑到敌军有备而来，他不能在平原地区以 2 万之师对敌人 4 万之众作战，就佯败后退，暗中则集中全部力量，迂回到阿尔文齐军尾部，把他们诱入辽阔的沼泽围绕的几条大路上。阿尔文齐的优势兵力无法展开，骠悍的骑兵将无用武之地，拿破仑从侧面猛击奥地利军队。奥军阵形变换不齐，出现混乱，但战斗却异常激烈，一个小小的路桥，双方都几次易手。心急的拿破仑亲自擎旗，冲向桥头，把法军旗帜树立在桥头，法军士气大振，预备队赶到，一齐冲杀，阿尔文齐军队终于支持不住，逐渐退缩，被法军打败。法军士兵对拿破仑亲自冲锋陷阵十分敬仰，亲切地称拿破仑为“小伍长”。一个月后，阿尔文齐恢复了元气，再次组织奥地利军队向法军进攻。奥军采取多点进攻，多点牵制，重点突破的战术。用多点进攻扰乱法军阵线，试图让拿破仑无法判断或判断错误，给奥造成突破取胜的机会。拿破仑观察了战场形势，敏锐地发现敌军真实意图是重点进攻利沃里阵地。他就立即调动全部机动部队增援利沃里。在利沃里阵地上，拿破仑再次集中全力从三面猛击奥地利军队，摧毁了奥地利军队的前锋。奥军损失兵力 1.5 万余人，丧失了所有大炮和全部军需品，奥军余部仓皇逃跑。拿破仑派一支部队追击逃敌，自己则率主力飞速南下，直扑曼图亚。法军在曼图亚附近从天而降，突然出击并包围了奥军。经过激战，拿破仑大军击跨并俘虏了普罗韦拉的全部奥地利军队。1797 年 2 月 2 日，曼图亚要塞守军 1.8 万人在老元帅维尔姆泽带领下向法军投降。年仅 28 岁的青年统帅拿破仑以胜利的胸怀接受了奥军投降。为了不让奥国老元帅维尔姆泽难堪，拿破仑没有

出席受降仪式。事后，他对老元帅更是礼遇和敬重有加。拿破仑作为一名将帅之星，在法国，在整个欧洲名声大振。

原订由莱茵河和易北河两军团承担的主攻任务，现在由拿破仑军团承担了。拿破仑打开了通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大门。为阻止拿破仑进军，奥军杰出统帅查理大公前来应战。受到空前胜利鼓舞，斗志昂扬的意大利军团，使奥军吃尽苦头而无法挡住法军的去路。4月初，拿破仑大军出现在距维也纳只有100公里的泽默林，整个欧洲都注视着拿破仑闪电般的进军。4月7日拿破仑部队的先头部队到达累欧本，迫使奥地利接受和平条款。拿破仑的意大利军团单个地顶住了欧洲最大国家之一的力量，恩格斯评论说：“1796年拿破仑在……远征中，成功地 endetail （各个）歼灭了优势的敌人。”第一次意大利战役是拿破仑第一次指挥大规模战役，成功地实践了拿破仑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战术思想。

1805年拿破仑打破欧洲第三次反法联盟，再次成功地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当时英国主要依靠海军，法军主要是陆军，两军没有共同的大战场，而且英国主要策略是以海军牵制法国，出钱鼓励奥地利、俄国、普鲁士进攻法国。1805年8月，奥军15万人进攻法军，俄军10万人赶来增援奥军，拿破仑为了避免自陷劣势而被动，迅速集中兵力17万人在俄国到达前先击溃奥军主力，士兵们欢呼“我们的皇上创造了战争艺术，不用武器而用我们双腿而作战”。拿破仑部队的神速和机动牢牢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性。拿破仑占领维也纳后，继续追击敌人，在奥斯特里茨与俄奥联军遭遇，拿破仑用外交手段稳住坐观事变的普鲁士，集中兵力击溃联军，歼、俘敌共3.5万余人，取得辉煌的胜利，史称“三皇会战”。但1806年拿破仑胜利回师之时，在英俄的支持和纵容下，普鲁士充当了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急先锋，拿破仑集中18万精锐兵力，发动耶拿战役。他并命令军官说：“我以巨大的优势的兵力集中在如此狭窄的正面上，你应能认清我是不容许敌人有任何机会的，不管敌人怎样部署，我都要以两倍于他的兵力来向他进攻。”在那拿战役和奥尔斯塔特战役中一举击溃普军13万人，拿破仑巧妙地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原则，先后打败了奥地利军队、俄国军队和普鲁士军队，除俄国遭受重创外，普奥两国几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这是拿破仑巧妙地运用神速进军和外交手段使敌人各不相顾，然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范例。

拿破仑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策略分两个层次：一是在战略上集中优势兵力，对多路敌军中的一路实行击破，使敌人的战略体系被打破，然后次第歼灭其它各路敌军；二是在战术上，即具体的战场指挥上，认真了解、分析敌情、选择突破口，然后集中兵力一举打破其防御体系，使敌人不得不调整部署，在运动中各个消灭敌人。总而言之，不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集中兵力的目的都是打乱敌人的部署计划和防御或进攻体系，破坏其部署的平衡，迫使敌人被动改变作战部署，然后利用敌人的弱点、露洞和破绽，各个消灭敌人，从而达到总体的作战目的。

实施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战术需要许多条件。首先，军事指挥者必须了解双方的军队状况，对战场地形状况及与战役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状况有清醒的认识。其次，军事指挥者必须准确判断敌人的战略意图、战术目的和战场状况的变化，及时调整和制定作战计划。第三，正确选择突破口作为打击目标。第四，应巧妙地利用各种手段使敌人作出有利于自己进

攻的判断或失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有时是从战役状况出发发现突破口，选择打击目标，有时则需要自己诱使敌人自乱阵脚或作出错误判断而寻找机会，创造条件促使战略战术的实施和运用成功。

恩格斯评论说：“拿破仑虽然在许多战役中，就整个说来兵力始终比入侵的敌人少得多，但他每次在攻击地点都能够造成优势，而且经常获得了胜利。”著名军事家若米尼说：“所有一切战略行动，只要它的目的是想连续地把我军的主力投掷在敌人作战的正面上、不同各点上，而且他们所应用的原理就是以大吃小的办法，那么这种行动也都可以算是够‘巧妙的’。拿破仑在1796年，1809年和1814年的行动，都可以算是这种行动的模范。”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这部军事经典著作中说：“要取得相对的优势，也就是在决定性地点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就往往必须准确地决定决定性地点，并使自己的军队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方向，就必须有决心为了主要的东西（即为了大量集中自己的兵力）不惜牺牲次要的东西。……拿破仑在这方面做得十分突出。”集中优势兵力可以打破敌人战场体系的平衡，改变敌我力量的总体对比，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可以收到迅速结束战斗并取得胜利的效果。

八、两翼包抄迂回前进

拿破仑作战，从来不按敌人的设想进行，他既不在敌人设想的地区出现，也不在敌人预测的时间出击，更不进攻敌人预设的阵地，不按敌人所熟悉和了解的战术作战。拿破仑作战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根据自己的判断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而其关键的策略是对敌人实行两翼包抄，迂回前进的作战手法。拿破仑运用“迂回前进”的战术不止30次，几乎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作战中，拿破仑在选定的突破点集中优势兵力，首先进攻敌人侧翼，或重点进攻某一翼，或两翼同时进攻或轮流向两翼进攻，迫使敌人为加强两翼而削弱中央，于是他抓住战机立即进攻已削弱了的中央，直插到敌军之间，从而彻底击溃敌人。这是拿破仑善于运用、现代战争中最有效的战术。

在许多成功的战例中，奥斯特里茨战役是最有意义的一次。在攻克土伦的时候，拿破仑提出两翼迂回的作战方案。第一次进军意大利，从战略上，就是想从意大利这薄弱环节的奥地利军队的侧翼，迂回进军维也纳。虽然由于正面法军主力未能有效牵制奥军主力实施突破、甚至遭到失败，但侧翼意大利战场的胜利，使奥军主力不敢乘胜进军，只能派援军反复争夺意大利，以保其侧翼安全，但却被拿破仑一次又一次击败，拿破仑胜利实施从侧翼迂回进军维也纳战略措施，从而迫使奥军求和。这是拿破仑迂回前进战术在战略上的一个成功运用，如果拿破仑不仅是意大利军团的总司令，而是指挥法军主力的话，他侧翼迂回，两路夹击的战略收效更大。

第二次意大利战役中，拿破仑率军经瑞士迂回奥军后方，打乱了奥军部署。在马伦哥战役打响后，奥军很快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拿破仑命令德塞集中18门大炮向已获胜的奥军猛烈轰击，士兵和骑兵向奥军侧翼猛扑过去，奥军立即全线溃退。法军损失5千人，德塞阵亡；奥军损失1万余人，被迫求和。这是拿破仑在战役过程中运用侧翼迂回攻击的战术，扭转战局的典型战例之一。

1805年拿破仑率法军主力5万余人在奥斯特里茨与亚历山大一世率领的俄军7万人、奥皇弗兰茨二世的奥军万余人对峙，历史有名的三皇会战展开了。战役开始前，拿破仑利用沙皇急于求战而不听库图佐夫建议的情况，示弱退却，使沙皇看到优势所在，坚定了决胜的信心，拿破仑也达到了速战的目的。拿破仑充分掌握敌方的意图和敌人判断的失误，洞悉了敌人企图切断法军南下维也纳和多瑙河的退路并将法军压缩于山谷中加以歼灭的计谋。这个计谋正是拿破仑善于运用的迂回前进，两翼包抄的战术。俄奥联军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破仑对这种班门弄斧的战术大熟悉了，他决心用自己的迂回战术打击对手的迂回战术。他巧妙地利用敌军的计谋，率军沿着泥泞的道路，忽而前进，忽而后退，并故意放弃普拉岑高地，将自己左翼暴露在敌人面前，向山谷退却，将计就计，诱敌迂回，以便在运动中攻击其侧背而取胜。拿破仑以少数兵力利用河川进行防御，主力迂回并集结在般托维茨至波省之间地区。

1805年12月2日，俄奥联军开始进攻，联军北面两个纵队由巴格拉吉昂指挥，横越布尔诺-奥斯特里茨大道攻击法军北段；君士坦丁大公指挥俄国近卫军则作为预备队在两支俄军后面。中央由奥军2.5万人攻击中路，联军主力3.3万人在普拉岑高地以南向巴赫河南段攻击，并攻占了一些地区。拿破仑看到了普拉岑高地几乎没有俄军防守，立即命令两个师奇取高地，将敌

军切为两段。俄军在行军中受到侧面攻击，秩序大乱，向四方溃逃，俄皇和总司令库图佐夫及其司令部都在这支纵队后面，因而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拿破仑立即命令主力进攻敌军北路的侧翼，敌军南路受到法军从南面和东南的夹击，拿破仑利用局部优势将敌军围逼到结冰的湖泊上，用大炮击碎冰面，致使敌军整团地落水被淹死或被俘。俄奥联军几个小时内被歼灭，两个皇帝狼狈逃跑，总司令库图佐夫受伤，险些被俘，损失共 3.5 万人。这次战役是拿破仑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迂回歼敌的战术方针的成功典范，是拿破仑一生获得 40 次大胜仗中最光辉的一次。

两翼包抄，迂回前进的战术在中国古代的战例中比较多。但在欧洲，拿破仑以前是被当作非正规战术而很少应用的，这不是以前的将领们没有想到这个战术，而是封建时代兵制所决定的。当时欧洲的军队多数是由封建领主自备马匹、武器，甚至军需物资，在自己的农奴中征兵出战的。这些领主、骑士和一般士兵由于各自利益不同和他们的集散性，要求军队严格地统一行动，而不能轻易分兵。因为一旦分兵就不易集中，由此可能招致更大的失败，部队缺乏主动性和灵活性，作战以正面对峙为主。拿破仑之所以广泛应用这种包抄迂回战术，是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士兵多数是由革命的群众组成，富有战斗和保卫民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拿破仑更善于把他们的情感和信心激发起来，而且行动神速，分合自如，才使这种战术能够有效运用。

两翼包抄，迂回前进的战术在战略战术上都有重大意义，首先，在战略上侧击敌人，使敌人的大兵团不敢贸然急进，不敢拉开距离，因而无法主动进攻。第二，侧击敌军，使敌军无法按原计划进军，从而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迫使其调整部署。临战调整部署既可能使新计划仓促制订，难以考虑周全，露出破绽，也可能使各将领乃至部队对新计划短时间很难形成一致而深刻的认识，从而忽视战略要点或对要点理解不一致，或不知道何处是要点和关键，而盲目作战，目光局限于眼前，有的追击，有的退缩，有的固守，阵线陷入混乱。第三，侧击敌军可以自己决定进攻的时间、地点和使用兵力，可以充分利用地形、气候和敌军部署中对自己有利的一切因素，而不去在敌人设想的时间、地点与其作战，从开始就把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使敌人处于应付之中，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使其一步步陷入被动。第四，侧击敌人往往选择进可攻、退可守的情况和地形进行，既能避敌锋芒，也能进退自如，侧击成功则能夺取战役胜利，失败则可自保并适时调整部署以利再战，扰乱敌人的部署和计划。

要运用这一战术，必须作到首先要准确判断敌人的意图和部署状况，正确选择时机和战场。其次必须集中兵力给敌人之猛烈打击。初战务求必胜，从而达到打乱敌人防御体系的目的。第三是兵贵神速，出其不意，使攻击具有强烈的突然性和隐蔽性，既不能让敌人有所准备，也不能让敌人立即判断出我军的意图。拿破仑的战略战术原则在近代战争和现代战争中被广泛运用，成为军事艺术的规则和范例。

九、主动出击广建藩篱

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封建君主恨之入骨，一次次组织反法联盟，武装干涉法国，对法兰西共和国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自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到拿破仑退位期间，和平是暂时的，战争却是经常性的。拿破仑一次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并没有彻底根除这种经常性干涉战争的基础。为保卫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国人民的和平生活，拿破仑对战争并不仅仅是被动防御，只要敌人发动了战争，拿破仑就不会坐等他们打上门来，而是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将敌人消灭在侵略战争的发动初期，进而迫使敌人接受和平条件；同时为了巩固胜利果实，防止敌人的再度入侵，拿破仑往往在这些占领地建立若干共和国或王国，作为法国的藩属国，以屏障法国，作为法国与各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

1796 年到 1797 年，拿破仑取得了第一次意大利战役胜利，拿破仑命令军队说：“我们是一切老百姓的朋友，特别是布鲁图家族、西庇阿家族和一切我们奉为典范的大人物的后裔的忠实朋友。……唤醒罗马人，使他们摆脱几百年的奴役造成的昏沉欲睡的状态。这将是你们的胜利果实。”他在告伦巴第人民书中宣称，“意大利最光辉的日子即将来临！快快武装起来！自由意大利既是人口众多又是十分富庶。让危害你们自由的敌人发抖吧！”

伦巴第人民已经受了 80 多年的异族统治，他们渴望摆脱奥地利的殖民压迫，热烈欢迎拿破仑军队的到来。拿破仑在伦巴第废除了奥地利的殖民政府机构，组成市政府和国民自卫队，有力地推动了意大利的民主革命和统一运动。在拿破仑胜利进军下，以伦巴第为中心建立了内阿尔卑斯共和国。这个仿效法兰西共和国政体的新共和国版图北起阿尔卑斯山主脉，南至里米尼，西到提契诺河，东抵明乔河，在拿破仑支持下成立的一些意大利共和国成为法兰西有力的同盟国，有效地屏障着法国边境。

拿破仑上台后，英、俄、奥结成第二次反法同盟，以奥地利为主力从意大利对法展开攻势，拿破仑没有正面救援被围困的法军，而是主动出击，袭击奥军背后，彻底打败了意大利的奥军主力，迫使奥地利退出莱茵河左岸，将其所属的比利时、卢森堡交给法国，承认法国庇护的瑞士、荷兰、热那亚、伦巴第等共和国，并再次扩大内阿尔卑斯共和国。

第三次反法联盟再次形成时，作为欧洲封建制度堡垒的奥地利再次成为法国的主要打击对象，拿破仑一面利用外交手段诱使普鲁士中立，一面迅速集中兵力，在俄军未到达之前，击溃奥军，夺取维也纳；接着击溃奥俄联军，迫使奥地利投降；然后又打败普鲁士和俄国，迫使普鲁士投降。根据签订的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仅留下“旧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其他领土全部割去，分别成为威斯特法利亚王国、华沙大公国；在奥地利割让的领土上成立了萨伐利亚王国、符登堡王国、巴登公国。在此前成立的莱茵联邦面积再次扩大。拿破仑利用反干涉战争占领的领土，建立许多中小国家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治上、军事上成为法国国外的卫星国和军事盟国，有力地屏障着法国的安全，使法国与欧洲各种反法力量问始终保持着—个缓冲地带。主动出击，广建藩篱是拿破仑对付反法同盟的一种攻势防御策略的杰作。

阿伯拉罕·林肯谋略

阿伯拉罕·林肯（1809～1865）是美国第十六届总统，著名的演说家和政治家，美国南北战争的领导人，是美国人民公认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总统。

林肯 1809 年生于美国西部的穷人家庭，一生几乎没有进过什么中学和大学的门槛，自学成为律师和演说家。曾先后当选伊利诺斯州议员、国会众议员，1860 年当选总统，领导美国南北战争，保卫了国家和政府的完整，彻底废除了奴隶制，把美国的民主制度推向新阶段。1865 年被奴隶制分子刺杀。

林肯由于他的崇高品质、杰出才能和巨大贡献受到美国人民的爱戴和永远的尊重，被美国人民称为“诚实的亚伯”。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是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国家救星”，伟大的解放者，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一、修身养性做高尚正直的人

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各有其成功原因和业绩，但归纳起来，无非两种类型：一种是由于历史的机遇使他的独特才干得到充分发挥，使他得以完成其他人无法完成的业绩，使后人在回顾历史时，由于无法回避他们的巨大功绩而无法忘却他们。另一种是由于自身的德行和才干使一次或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由他们承担和完成，他们不仅由于自己的巨大贡献，而且尤其由于他们的优秀品质使后人永远无法忘怀，他们甚至被当作圣人和偶像力千秋万代的人们传颂和崇拜。

阿伯拉罕·林肯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位被人们当作圣人崇拜的领袖人物。在美国历史上不可胜数的伟大领袖人物中，林肯的形象永远是高居于其他所有人之上的，“是美国有史以来或从过去直至将来最伟大的领袖”，不论他逝世了多少年，他仍然鼓舞着，感动着全美国乃至全世界各地各阶层的人们的奋斗勇气和善良的心灵。美国的每个学龄儿童都知道林肯，以至于他这个“国家救星”和伟大解放者的不朽形象被推到接近神的地位。这并不是偶然的原因或人们盲目崇拜的结果，而是林肯从他开始长大成人，踏入政途，就始终如一地注重自身的修养而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正是这种高尚的品德和自身的修养，使林肯从他所生活的环境和人群中脱颖而出，日益成为当地当时的重要人物，成为他周围的人们的共同朋友和完全可以信任的领袖。

林肯家境贫寒，他从小酷爱学习，总是把书本塞在衬衫里，把玉米饼装满裤袋就去耕地了，晌午坐在树下边吃边读，晚上一边帮助家里人烧火做饭，一边用木炭在地上写字。他并不因学习而躲避劳动。随着他长大成人，每天从早到晚劳动，伐树开荒，劈栅栏木条，犁、耙、铲、锄、挤牛奶，无活不做；经常帮邻居盖房，拉大锯，便放圆木，杀猪；抽空给人帮工，挣得衣食费和住宿费。他的勤劳使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喜爱，不论是父亲还是兄弟姐妹，还是继母和所有邻居，都喜欢这个勤快和乐于助人的小伙子。全家搬到伊利诺斯州的梅肯县，他在那儿除了做自己的农活，还帮助邻居劈了三千余根栅栏木条，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欢迎和信任，从此在这里定居下来。他开始注意当地公益和社会事业，把自己的主张提出来，如改进河道以利航行等。他一边做店员、当船员，一边同所有的人打交道、交朋友。一个妇女买东西时多付了几美分，林肯步行了六英里路把钱退还给她；当他发现给一个顾客少称了半两茶叶，就跑了几英里给她补上；……诚实的林肯被人们交口称赞，治安法官看到林肯勤学善良，就帮助他学习法律和文书写作。平时他极力主张兴办教育、出版、宗教和道德事业，主张改进航运和交通，这位没有任何有钱有势的人支持的小伙子，得到了当地人的衷心支持，促使他开始步入政界。

林肯参加了同印第安人的“黑鹰”战争，担任连长。有一天，一位印第安老人从营地附近经过，士兵们立即冲上去要杀死他，林肯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厉声制止，狂暴的士兵骂他是懦夫。他果断地说：“选择你们的武器决斗吧。”他为一个与自己作战的部族的老人，要冒生命危险来保护他，而不是用连长的权力压服士兵，使士兵感到他的同情心和平等待人。他不以势压人的品质，深深地得到士兵们的拥护。回到家乡后，他开始与贝里台伙开商店，但对用烈性酒、火药、枪支换取大人和小孩的钱深感不安，就把股份让给了贝里。但后来贝里死后留下了1100美元的债务，林肯主动承担下来。这对年收入不足50美元的林肯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国债”。有一次林肯为了保

护寡妇杰迈玛的房子，将一条街道设计成弯的。诸如此类的事，枚不胜数。

林肯正是在这些小事里陶冶了自己的情操和德行，正是这些小小的事情使这位贫苦青年赢得了他所交往过的人们的喜爱、信任和尊敬。随着他工作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位高尚的青年人，特别是他担任邮务员和律师以后，接触的人更多，几乎成了当地家喻户晓、人人信任和喜爱的人物，这使林肯这个普通人在 1834 年当选为州议员，并在议会里成为公共帐目及支出委员会负责人。1838 年再次当选州议员，担任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并成为议会里辉格党的领袖人物。林肯的初步成功，与他高尚的德行赢得人们的信任有密切的关系。在那个“你帮我的忙，我就帮你忙”的幕后政治交易道德日下的时代里，林肯成为一颗光芒四射的政治明星。

林肯通过这些日常行为，锻炼了自己高尚的情操和坚韧的性格。这种品格使林肯不论作为平民百姓，还是作为议员或者候选人，甚至总统，都始终操守如一，使他像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在任何地方都闪着他那德行的光芒，处处都能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支持。不论他说什么，做什么，希望什么，都有许多人相信他是真诚的，可以信赖的，以至于在 1860 年总统选举中，选民们把林肯称作“诚实的亚伯”，“劈栅栏木条的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平民总统的形象。人们相信这位靠自己奋斗，而不是靠钱袋或者权势支持登上政治舞台的人的确能为人民办事，能了解民间疾苦。许多中下层人民热情地支持林肯，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和集团也相信林肯是个很好的中间人物，而不会投身任何财团或政治派别去反对其他派别。林肯的品德和形象成功地帮助林肯赢得了选举。

林肯德行和情操的修炼使他养成了坚毅的性格，执着的个性。这使林肯不论遇到何种困难也决不退缩，决不轻易放弃。对他来说，不打完最后一张牌，决不会认输；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毫不畏惧或者放弃原则，他只是坚定不移地作自己认为应该去做的事，踏实地追求实效，促成成功；他的品质不允许他作任何违背自己原则的事，也不会因为敌人的强大、困难无法克服而自乱阵脚，他能够冷静、坚定地应付一切困难。正是林肯这种品质和同情心，使林肯从内心一开始就反对奴隶制。当他第一次听到、看到买卖奴隶，他就从内心反对它，即使在南方那种谁反对奴隶制就是反对法律的地方，他做为州议员和辉格党领袖，他还是对奴隶制的议案投反对票，并提出明确而策略的抗议书。林肯的德行使林肯同情孤立无助的人，关注奴隶制问题，同情奴隶。他成功地领导了南北战争，是美国废除奴隶制的英雄。正是巨大的同情心使他关注奴隶问题，并承担了废除奴隶制的历史使命。

林肯正直、诚实而富有同情心，甚至亲自要求赦免一个 19 岁的逃兵。不论人们怎么反对他，他决不报复，宽恕待人，以至于南北战争将以北方的胜利而结束，南方的领导人也相信林肯会宽恕他们而不会报复他们。林肯这位律师出身的总统直至战争胜利都抱定一种想法，要把反对者“吓”出美国，而不想把他们全部抓来处死。南北战争结束后，林肯在白宫广场的集会上演奏“迪克西”，并把这首 1861 年南方联盟总统就职典礼上确定的“国歌”，称为他听到的“最好的曲调之一”，他严格地把战争期间被赋予政治意义的一切东西，恢复其本来面目。客观公正地对待一切战争中的人物和事物、而不是仇视一切与他做对的东西；同时向所有人表明他决不会报复，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大家还是一家人。他语重心长地说：“我所要处理的事情意义重大，容不得以恶行事。”他努力弥合国家已产生的在政治、经济、特别是人

心上的裂痕，把维护联邦当作自己的根本目标。他要人们“努力完成正在从事的事业，包扎国家的伤口，关心经历战火的人，关心他们的遗孀和孤儿，为争取和维护我国及世界各国的正义和永久和平而贡献一切”。

林肯品质高尚，但他并不是为了某种利益而这么做，而是出于他真诚的信仰。他说：“你能在有的时候欺骗某些人，也能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林肯的所作所为，可对苍天，可对大地，可对自己的良心。他是一位光明磊落、堂堂正正、问心无愧的政治伟人。这正是林肯政治神话的奥秘所在，也是林肯成就伟大事业的关键之一。

二、虚怀若谷爱憎分明

常言道，宰相肚里能撑船。大凡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都必须具有广阔的胸怀，宽容大度的品质。林肯从小学会了与各种人物相处，养成了一种宽容大度的气质，特别当他成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时，更十分注意宽容为怀，善于与各种气质、个性和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人相处，把各种政治势力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共渡国家困难时期，但林肯的宽容并不是一味的甚至无原则的妥协，而是有着旗帜鲜明的色彩，他决不容忍邪恶和非正义，绝不容忍敌人的嚣张气焰，而是坚决站在正义和道德一边，抑制和打击各种罪恶行为，反击各种攻击，对敌人决不妥协，坚决斗争，对正义和一切善的事业大力支持，毫不怜惜自己。虚怀若谷、抑恶扬善，推己及人构成了林肯政治领导艺术的一大特色。

1838年，林肯以绝对多数的优势当选州议员，但在议长选举中却成为众矢之的而落选。但林肯并不气馁，作为辉格党领袖，在议会中积极与其他党派合作，凡是有利于州建设和人民利益的议案，他都坚持支持而不抱任何党派成见。同年，他被提名为辉格党的五名总统选举人之后，积极为哈里森竞选总统而奔走。1843年，全国政治形势处于危机的边缘，辉格党人依然各行其事，林肯立即站出来，呼吁党要团结，他警告人们“一栋裂开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林肯不断写信给编辑、政界人士、选民和选区工作人员，呼吁团结，宣传自己的政见。他的对手竟然恶意中伤林肯，说林肯把“醉汉”同基督教徒和教会会友相提并论，攻击说林肯不承认耶稣，不承认赎罪和报应的教义，甚至说基督是私生子等等，企图利用宗教势力和人们的宗教情感来反对品质高尚的林肯。林肯被迫散发传单，对自己的宗教观点作一次最全面、最具体的阐述，他说：“我只感到任何人都无权去伤害他可能生活在其中的公众的感情和伦理。所以，假如我果然犯了这一条，那我决不会怨恨由此而谴责我的人。但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对我捏造罪名，散布流言蜚语，那我就毫不客气地谴责他。”林肯这里没有谩骂，没有以牙还牙，没有以怨报怨，只有坦诚地表白、满腔的义愤和义正辞严的申诉。当林肯在国会议员的职位上，作出引人注目的成绩，他的事业接近辉煌的顶端时，新一届的国会选举开始了。由于党内流行着一种“轮换制”的习惯，林肯坚决地退出竞选，以党的领袖身份主办报纸，巡回演讲，为党内的其他同仁竞选奔走呼号，而不仅仅看重自己的政治命运和前途。

林肯当选总统，激起了奴隶主集团的激烈反对，他们公开叫嚣流血，扬言要踏着堆积如山的尸体把军队开进白宫，许多州相继脱离了联邦，数以万计的信诅咒林肯是给国家带来灾祸的“猩猩和猿猴”，辱骂林肯是小丑和魔鬼，诉求上帝鞭挞他，火烧他，绞死他，《纽约论坛报》甚至恫吓林肯，让他自动退出冲突舞台，否则将由刺客之手把他赶进坟墓。但林肯没有惧怕，也没有激动，他呼吁“让我们时刻记住所有的美国公民都是一个共同国家的兄弟”，“让我们忘掉一切党派，无视一切党派，我们又将成为同胞兄弟”，“我愿尽可能地像华盛顿、杰佛逊和麦迪逊那样对待你们”，“我赞成那些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措施”，“当我看到一个民族被他们身上的枷锁——暴政压迫时，我的性格决不会指使我再在他们身上加上更多的负担，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更为痛苦。我宁可竭尽全力地解除这种枷锁，而不去加上任何压垮他们的东西”。林肯面对各种政治攻击、背叛、分裂和谋杀，平静

地说出自己的良好愿望，并坚定地表明自己的信仰、思想和主张。为了维护正义和法律的尊严，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将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

林肯待人虚怀若谷，毫不抱有成见。有一次他去拜访麦克累伦总司令，适逢总司令外出，林肯就同随员一起等候总司令归来。不料麦克累伦回家后得知总统在等他，却带理不理地走过林肯总统和国务卿坐等的房间上楼睡觉去了，总统随员们愤愤不平，林肯却说：我们最好不要计较繁文褥节和个人尊严，并表示说，只要他能为我们赢得胜利，我愿为他牵马。麦克累伦多次退回林肯给他的备忘录，甚至每次林肯去看他都吃闭门羹，但两人在用人上和政见上却十分一致，将军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总统在处理黑鬼问题上是非常正直和相当妥贴的”。林肯虽然不断地与将军发生冲突，蒙受耻辱，但仍然任用他、容忍他，足见林肯的胸怀。

内战爆发后，大批将领弃职投入叛军怀抱，甚至包括林肯的亲戚和器重的人，林肯对这些人既不加以指责，也不惩罚，甚至继续保护他们在北方的财产和家属。部队中有许多士兵开小差，有的团缺员达三分之二。有人建议处死开小差的士兵，林肯断然悲伤地拒绝了，他不愿采取这种不人道的古老方法来稳定军心。林肯经过慎重考虑，作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决策——解放黑人奴隶，让广大黑人参加到解放自己的伟大斗争中来，从而根本上扭转了南北战争的局势。

林肯虚怀若谷，善于理解人。常言道，各家有各家难念的经，各人有各人的难处。林肯深知这一点。他不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或企望去要求别人，而是按每个人的处境和个性去理解人，既不求全责备，也不对人的各个缺点、不足甚至“怪癖”无限上纲，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自然的事，就像人们的面孔一样千差万别。他只要求每个人都尽力地工作，在工作中尽力贡献自己的才智，甚至对那些出身南方，在内战中离职投身叛军的军官也充分地理解、同情和宽恕。他与各种不同品行、才智、性格的人都能相处，使这些人成为他忠诚的帮手和朋友。即使对那些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也充满同情，但他并不因自己的宽恕和同情蒙蔽了自己的远见卓识，他始终坚信，无论在公事或在私事中，都应保持同样的公平合理的态度。

林肯无论在担任总统前，还是担任总统后，他总能充分尊重所有人的尊严，而不论这个人是如何对待他，也不论这个人是谁；即使有人不尊重他，他也对对方充分尊重，从不恶意攻击任何人；他相信事实胜过雄辩，他只用事实和正义去回击对他的攻击，也只用事实和正义去揭露种种恶行。他接见各阶层的人，不论种族、肤色、阶层、地位的人都给以尊重。在一个集会上，一名工人大声说：“我听说你是美国最高的人，看来你还没有我高。”林肯大声答道：“你过来咱们比一比。”总统和煤炭工人当众背靠背站在广场中央比个子，这在美国历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林肯给部下很少发布命令，常常都是以建议的方式提出自己的主张，激励部下发挥创造力，……。林肯和任何人都平等相处，没有任何优越感，甚至从不用严厉的语言批评和刺伤别人。他经常用合适的故事准确、清楚而友善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对失败的下属，他仍然充满信心，尽可能地鼓励和安慰他们，给他们一定的宽限期，让他们尽快扭转局面。林肯常常是责任自己承担，荣誉归于下属。他从不搞垮一个人，和人好合好散，这样，他才成为绝大多数人的永久朋友。

林肯并不一味妥协、宽容，他从来不对邪恶势力低头，无论是来自何方的错误和有害的主张、思想或行为，他都坚持斗争。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斗

争精神，抑恶扬善、爱憎分明的立场，使他日益接近人民，投身于正义的事业，成为南北战争时期扭转历史、创造未来的伟大人物。正是他对迫害奴隶、压迫奴隶的非人统治的强烈愤慨及对废奴主义者英勇斗争的无限同情和支持，促使他认真研究奴隶制问题，逐步走上反对奴隶制扩张和存在的斗争的道路。虽然美国南北战争是资本主义经济与奴隶制经济的一次战争，是资本家和农场主争夺自由劳动力的战争，但林肯却完全是力争人权、争民主、争平等而斗争，他不仅要求给黑人以平等的地位，也要求妇女享有合法的选举权。林肯正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民有、民享、民主”的理想社会而斗争，正是这种崇高的理想使他能够激励全世界各阶层人们为争取自由民主而英勇斗争。

三、正义为则抑恶扬善

和那些为了自我实现，建功立业而投身政治的人不同，林肯投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更多的是他酷爱正义的事业，更多的是他要改变落后和不合理的现实。他想用他的政治和社会理想改造所处的世界。林肯做人、做事极讲原则，只要合乎正义的事情，他会不顾一切，甚至冒生命危险去实现它；他同那些违反正义，践踏人性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同情、理解和支持那些善良的事业，反对那些有言人类自由、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的人和事情。凡是他所反对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人和事有害于社会和人类；凡是他所赞成的，原因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它有利于大众、社会和国家。林肯的一生高扬着正义和善良的旗帜，团结一切进步人士为正义事业而奋斗。正是他这种正义准则和捍卫正义的斗争，使千千万万的人有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和奋斗目标，使他成为一切进步人士的代表和象征，他在政治斗争中成为不可战胜的正义的化身，任何对手在他的面前都显得渺小。谁要反对林肯，谁就是要反对一个高尚而正直的人，谁就处在一种被动的地位而无法取得胜利。

当林肯在伊利诺斯州定居后，他认真地考察了当地的地理交通和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认为只有改善当地河道和发展交通，才能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他在一个议员的竞选演说会上，向议员提出改进河道以利航运的建议，但他遗憾地发现，这些所谓的政治家，根本不注重人民的生计，竞选纲领只不过是拉笼选票的方法和手段而已，只是一些空头支票。林肯决定自己投身政治，用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实现自己的计划。林肯于1832年3月9日写了一篇文章，宣布他将跨入政界，竞选州议员，他对自己的观点和政纲充满信心，并准备同任何竞选者进行辩论。如果他当选，那些可以改进加芒河航运的任何考虑周到的立法措施他都将支持和认可，因为这是造福人民的事业，他赞成设立全国银行，赞成内地建设计划，如修公路、铁路、运河、桥梁等。1834年林肯当选州议员后，立即投入成立州银行和修运河的工作。他对国会与杰克逊总统在银行问题上的斗争十分关注：总统拒绝给国家银行延长营业执照期限的优惠，指责银行是收买报刊、政客和议员的一股“金钱势力”。参议院谴责总统在银行问题上的方针违犯宪法和法律，总统对此提出抗议，参议院拒不将总统的抗议写进国会议事录中。林肯和辉格党代表一样，赞成参议院的议案，但明确表示，参议院应允许把总统的抗议写入国会议事录，因为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保留意见的权利。可见林肯服从党的利益，更服从正义和法律，不论任何人，那怕自己的盟友，也不能无视正义和法律赋予每个人的权利；林肯可以为一个印第安老人的生命去决斗；勇敢地投票反对州议会宣称蓄奴州对奴隶所有权不可侵犯的议案，并特别为此写下了温和而又毫不含糊的书面抗议书，公然指出奴隶制度是建立在非正义和错误政策之上的。这一切充分反映林肯和那些政客们不同，他不是把政治当作实现个人目的的捷径，而是当作实现正义事业的舞台，把正义作为衡量事物的准绳。

林肯初涉政治，他看到了政治幕后的种种交易以及各种政治人物的不同动机，看到了政治的卑鄙、肮脏，特别是废奴主义者伊莱贾·帕里什·拉夫焦伊到奥尔顿办报，其印刷机被投入河中，仓库被纵火烧毁，人也被暴徒开枪打死。林肯感到非常震惊，面对人们的沉默和容忍，林肯向青年学会发表了题为《永葆我国政治制度之青春》的演说。他指出，参加美国革命（指独立战争）的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赢得的权利正在受到侵犯。无论什

么时候，如果听任一小撮歹徒聚众闹事，……任凭他们焚烧教堂，抢劫仓库，把印刷机扔进河里，枪杀编辑，随心所欲地吊死或烧死他们所讨厌的人，而又让他们逍遥法外，那么我可以断言，这个政府必定是短命的，这充分地表达了林肯的政治思想以及他对国家前途、人身自由和个人义务的热爱，他主张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辩论，包括废奴主义者。在这个反对奴隶制就是犯罪的地方，林肯如果出于政治策略和个人利益是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显然，他既要从事政治，又要把正义客人政治范畴，使正义成为衡量一切的准则。正是这种神圣的政治思想激励和支配着林肯奋斗前行的。

林肯的出身、经历、家境没有一样使他像他同时代的其它政治家那样，拥有丰富的可供利用的各种政治资源。林肯可以说是一无所有，除了正义和追求正义的决心、才干外。正是这种正义的力量和他为正义而奋斗的勇气使他和他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使他和他的国家及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林肯才成为和华盛顿、杰佛逊一样的奠定美国政治社会制度的伟大人物。

林肯看到民主党入实行代表大会提名制卓有成效，比由党的领导核心提名更富有民主精神。他作为辉格党的领袖人物，积极组织州辉格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林肯当选国会议员后，积极维护美国中下层人民的利益。他说，“如果我们不首先付出劳动，那么地球上除了阳光和空气以外，就不会有什么美好的东西可供我们享用；既然大多数的好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那么享受这一切东西的权利，应属于那些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出这些东西的人们。但有史以来偏偏总是有一些人劳动，而另一些人不劳动却享受着大部分劳动果实，这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要力求使每个劳动者得到他劳动产品的全部或尽可能接近全部，这是任何一个贤明政府最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我们由此可以理解，林肯在一片反对声中当选并就任总统，其中谁支持他，谁反对他是再明显不过了。林肯为废除奴隶制而奋斗并不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是出于正义。正义之灯指引着林肯为此奋斗了终生。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人拥有比林肯更为广泛的政治基础，也没有人更像林肯那样遭到剥削阶级的仇恨。南方的奴隶主反对他，北方的大财阀们也反对他。1862年，战争使经济形势恶化，价格上涨，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林肯提出了一项保护劳工使其免受泛滥成灾的货币之苦的、向有钱人筹集战争基金的方案，遭到了大批有权有势、影响很大的显赫集团的反对。他们密谋弹劾林肯，卑劣地造谣说白宫里暗藏着一名女间谍，甚至指控这个女人就是林肯夫人。担任战争指导委员会委员的参议员举行秘密会议，审查有关林肯夫人不忠于联邦的各种报告。反对派是多么地恶毒，企图把叛国罪和间谍罪强加在林肯身上。

林肯一生坚持正义，抑恶扬善，他是美国人民真正的领袖，他为正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至最后献出他宝贵的生命。

四、始终如一灵活机动

历史上许多政治家，怀抱崇高的社会理想都往往与社会现实、与生活在尘世中的各色人物难以合拍，使事业功亏一篑而成为理想的殉道者。林肯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但却不十分固执己见而死搬硬套，他善于根据现实而逐步灵活机动地调整自己的方针和政策，十分策略而明智地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自己的目标。林肯坚信：政治家必然用像灯塔一样的崇高理想和美好的前景蓝图，照耀人民前进的道路，但在实际工作和制定政策时却不能离开现实和人民太远，不能使他们无法跟上你的想象和思维，否则，不仅自己的政策目标无法实现，你的理想和蓝图也会让无数的人望而却步。林肯的这种始终如一的政治理想和灵活机动的领导策略、充分体现在他解放黑人奴隶。废除奴隶制的斗争策略中。

林肯基于正义的信念，一开始接触奴隶制问题，就明确指出奴隶制是建立在非正义的、错误的政策基础上的，但他没有立即提出废除奴隶制的主张，而是认为根据宪法，国家有权废除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他选择一条近似于改良的道路，支持一切促使奴隶制废除的议案和政策。当废奴运动兴起后，他同情甚至支持废奴主义者的主张和斗争，但他自己没有投身废奴运动，而是运用法律武器和自己的讲坛证明废奴主义者有宣传自己思想的自由和权利，反对任何对废奴主义者的迫害和镇压，当他成为国会议员后，他不仅努力支持各种社会改革方案，而且千方百计地防止蓄奴州的任何扩张，维护密苏里妥协案为蓄奴州划定的界线。

当美国旨在扩大蓄奴州地盘的侵略墨西哥战争爆发后，许多人都反对扩大蓄奴州，反对这场不正义战争，林肯也和这些人持相同的观点。但他没有直接反对总统没有说出、也无法说出的战争目的，而是针对波克总统反侵略战争的谎言，要求总统说出让人民流血的具体地点。林肯的提议虽不像有的议员那样充满火药味，但却是绵里藏针，击中要害。总统一旦说出这个地点，战争的性质不言自明，而这一起码要求又是如此正当、认真，林肯把波克总统推向要么当众撒谎，要么说明真相的两难境地。

1854年，内布拉斯加法案在国会通过。该法案建立了两个准州，南面的堪萨斯，北面的内布拉斯加，这实际上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使奴隶制可以在北部的广大地区推广。林肯听到这个消息，如同听到夜间火警的钟声，立即在新英格兰有3050名牧师致参议院的备忘录上签名起誓：“我们严重抗议通过内布拉斯加法案”，道格拉斯得意洋洋，继续四处演讲，一直讲演到林肯所在的伊利诺斯州首府，他叫嚣“我们阵营中的一小撮叛徒想把我们伟大的有着光荣历史传统的伊利诺斯州变成一个崇拜黑人、让黑人和白人平等的社会”。他用人民主权解释内布拉斯加法案，得到许多人的赞赏。林肯第二天在同一个地方面对同一批人发表了著名的“皮奥利亚演说”，严正指出：无论在什么地方奴隶制，它最初传入时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林肯列举种种事实说明它是极不公平的制度，他虽不主张立即解放他们，但确信，让奴隶制扩展到北部是错误的，为了联邦，我们能做的首先是恢复密苏里妥协案。林肯清楚，主张立即解放奴隶正中道格拉斯一伙人的圈套，也不会得到广大白人群众的支持，更无法实现废奴目标。

林肯竞选总统的过程中，反对奴隶制的态度更加坚定，但他并不急于提出解决争端的办法，而是反复申明：奴隶制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

立场、观点，不能对赞成奴隶制的人妥协；我们要继续先辈们的民主精神，也不排斥现代经验，让我们坚信正义就是力量。他表明自己决不退却，也不妥协，而要为正义战斗到底。他甚至巧妙地拒绝了有些人关于奴隶制问题的询问，他十分清楚：不论南部还是北部，都有坏人要对付，这些人急于获得某种新材料，借以炮制新的颠倒黑白的谎言。言多必失，而且往往是有些问题说得越具体，失误的可能性越大。林肯十分机智地不给任何人以兴风作浪的把柄。林肯始终如一的坚定立场和灵活机动的斗争艺术使自己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全国的战争叫嚣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林肯一时成为众矢之的，但他决不退缩，决心与一切反动力量大干一番。在他起草的就职演说稿结尾，他庄严地宣布：你们能容忍对政府的攻击，我却不能从保卫它的立场后退。和平还是战争，这一严肃问题要由你们而不是我来回答。国务卿西华德认为火药味太浓了，要求删去这两句话，用一些亲切的语言，镇定自若和振奋人心的话结束演说。林肯接受了建议，却将这句话改头换面后写出来，只是在最后加上大家是朋友而不是敌人，希望我们天性中更善良的性灵被触动，必将奏出联邦的大合唱。林肯不仅仅是改变了语气，而且十分巧妙地把反对奴隶制的争端，改成捍卫还是反对政府和联邦的争端，从而大大地扩大了自己的阵营。同时林肯组织了一个包含保守派和激进派的联合内阁，把更多的政治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尤其争取到军队里哪些倾向保守的军官们的支持。

主题的变换，使更多的人不论在奴隶制问题上态度如何，只要拥护联邦、反对分裂就是站在政府一边的人，这扩大和巩固了林肯政府的基础，使林肯经受住了最初的、准备不足的内战。内战初期，林肯几乎完全回避奴隶制问题，那些逃到北方被军队抓住的奴隶要不要返还奴隶主，林肯又一次遇到了棘手的问题。这个从来也不承认奴隶是财产不是人的总统，却巧妙地利用敌人的逻辑把奴隶称之为“禁运品”加以没收，灵活地避开了可能来自各方的争论。南方数以万计的奴隶逃往北方军营，高声呼喊“我是禁运品”。但当戴维·亨特少将以奴隶制与军法不容为由宣布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南卡罗莱纳州的所有奴隶永远自由时，林肯反对实施这一军令，原因是林肯不愿不考虑人们的社会思潮而一意孤行，更不愿把那些拥护联邦的蓄奴州推向叛乱者一边。他提出一个有偿的逐步废除奴隶制的方案，由国家购买奴隶并给予自由，因为国家的大多数人似乎对黑人关心得较少，只是急于获得军事上的成功。他向人们表示：当解决奴隶制的时机到来时，确信我一定会尽我的职责，哪怕付出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林肯坚定不移，但清楚欲速则不达，他不仅充满理想，而且也十分现实。实际上，历史上任何重大政策的实现，即使它是最合乎正义和真理的，也必须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具备后才能实现，坚定的政治家往往不是急于收获，而是辛苦耕耘，扎实地创造条件，脚踏实地地工作，待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时候一举成功。

1862年，林肯在公开信中表明：我要拯救联邦，通过最短的途径去拯救它。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所有奴隶或需要解放一部分奴隶，我愿意这样做，我在奴隶制和黑人问题上所做的工作是因为我相信那将有助于拯救联邦。林肯到了做出决定的关键时刻，把这场战争称为内战，称为维护联邦，欧洲各国以人民主权理论为借口，准备承认南方政府，这会导致美国分裂。但如果

以解放奴隶为口号，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就失去了这种借口。林肯立即签署了解放哥伦比亚特区奴隶的法令，肯塔基州通过立法解放了所有的奴隶。国会承认了海地等黑人国家。林肯感到时机已开始成熟，他终于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解放奴隶。1862年9月22日，林肯发表了《初步解放奴隶宣言》，宣言表示：反叛州和地区的奴隶从1863年1月1日起永远获得自由，宣言像一股催化剂使整个南北美洲，甚至全世界关注美国的地区都沸腾了，不论各国统治者的反应如何，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旗帜鲜明地欢迎和支持它。

1863年1月1日，林肯以正义的名义，出于军事需要力理由。公布了《最后解放奴隶宣言》，不仅重申了初步宣言的主要精神，并宣布所有反叛州和地区的奴隶无条件永远获得自由，特别宣布黑人将参加军队、为保卫联邦及自由而战。

林肯坚持正义立场，始终不渝地为解放奴隶而斗争；他根据现实条件的可能性，在不同时机和条件下，提出了灵活机动的各种方针、主张、政策，为逐步实现这一目标奋斗。一旦时机成熟，他毫不犹豫地签署了这个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像在这个文件签名这样更加确信自己正确、与这个文件相联系的名字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历史性文件，最终完成了自己追求的一桩伟大事业和历史使命。历史证明，仅有善良的愿望和正义的激情，并不能使林肯成为伟大人物，因为当时对这一历史使命抱有极大热情并为之不惜一切地奋斗着的人成千上万，但正是林肯能够因时因地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各种灵活多变的有步骤的策略，才只有林肯成为完成废奴使命的最伟大的英雄人物。

五、和而不同进退自如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必须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这个社会基础愈加广泛，其内部的利益、主张和分歧也越多，任何站在某一集团或阶层利益上的主张和行为都有可能削弱这种基础。政治家必须超越这种分歧，站在更高的角度，提出更为远大的、更为一致的目标，团结和领导全体支持者共同奋斗。在林肯的领导艺术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善于发现人们的共同点，以共同使命团结所有的支持者而从不断然支持这一派而反对另一派，让意见分歧的人坐在一起寻找他们的共同点。领导者永远是一个公正的调解人和引导者，既与所有的人和派别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又不服从或完全接受某种意见，对任何事情都站在自己更高的角度去思考并得出有利于整体事业发展的见解和主张，用这种共同的目标引导人们共同奋斗。只有保持自己独立的精神、思想和政策，才能在各种政治纷争和斗争中进退自如，游刃有余，不被一时一地一派的情况蒙住眼睛，从而不断地选择各种最有利的时机实施最佳方案。

林肯的才干、品德和主张深受当地民主党领袖的赏识，这位领袖向林肯表示：他和他的党将全力支持林肯参加州议员的竞选。林肯作为一名辉格党党员，没有立即答应，他将此事告诉本党的领导人并征询意见，辉格党领导人认为林肯应接受这个善意的帮助，于是林肯在民主党和辉格党两个相互对立的党的共同帮助下当选州议员。林肯光明磊落的行为保持了他与两党的友好关系和信任，而且不妨碍林肯继续坚持和发表自己的政见。这种和而不同的行为准则和政治态度使林肯很快成为一个中介性人物，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全局性人物。

林肯几乎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一直奉行这种和而不同的原则，这使他在各种政治势力中进退自如而不会受制于任何一种进步势力或反对势力，甚至连维护奴隶制的人也对林肯的温和态度抱有某种幻想。在对待奴隶制问题上，林肯和废奴主义者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废奴主义者的见解还要深刻，他想得更远。他与著名的废奴主义代表人物如欧文·拉夫焦伊、比尔·赫恩登、萨姆纳·蔡斯、黑人道格拉斯等都建立良好的信任和友谊。林肯与比尔·赫恩登合开律师事务所，林肯支持比尔的废奴主张，比尔同情和理解林肯的温和态度，两人以不同的主张从事共同的事业，当辉格党、一无所知党、民主党内反对奴隶制的激进派、人民党共同组织共和党时，林肯无法接受一无所知党的主张。但又不能公开反对这个新党，比尔十分理解林肯的两难处境，建议林肯到乡下避一避，使林肯摆脱了在说违心话与反对自己的党之间选择的尴尬境地，为以后成为共和党领袖留下了余地。比尔和林肯都不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对方。

林肯当选总统后，共和党内的两派力量水火不容，都向林肯施加压力。一派是反对奴隶制的极端分子，如萨姆纳·蔡斯、韦德和史蒂文斯；另一派是调和派，如西华德、查尔斯·弗·亚当斯，林肯将同哪一派联合？这不仅关系到两派的力量对比，而且是北部和南部都在探询的问题。激进派咄咄逼人，调和派胃口大张。林肯清楚他与激进派在对奴隶制问题上根本目标一致，他们是广大人民的代表，没有人民的支持，挫败分裂联邦的阴谋、平定叛乱、解放奴隶都不可能；调和派虽对奴隶解放不很关心，但维护联邦却是坚定不移的，而且暂时是各种联邦派的政治代表，没有他们，就会削弱联邦政府的

基础。于是林肯决定组成混合内阁，激进派四人，调和派三人，他把自己也当作调和派，使内阁形成四比四格局。虽然两派在内阁内开展斗争，但林肯却与他们每个派别找到共同点。他接受西华德的建议：把奴隶制问题低调处理，把维护联邦的旗帜高高举起，使整个北部团结一致对付反叛者，而拒绝了调和派一切维持现状的建议，他让激进派为最后解放奴隶做舆论、政策、经济、军事以至法律上的准备并创造条件，却不接受他们立即无条件解放奴隶的要求。林肯能够很好地在萨姆纳和西华德之间选择更加明智、实用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两派都密切合作，却不站在任何一派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他在平时和日常相处中充分尊重所有的人，真诚地对待所有的人，但白而公正，林肯成为两派都不可缺少的共同领袖。林肯就像足球场上的裁判，那一方都可能认为他袒护对方，却谁也离不开他。

即使过去的政敌，林肯也能在新的历史时期与他们找到新的合作基础。斯蒂文·阿·道格拉斯和林肯都是来自伊利诺斯州的政治人物。1849年道格拉斯任该州国会参议员，曾对那种要立即脱离联邦的威胁进行反击，但却鼓吹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共和国，终于使妥协案得以通过，曾力图制订一项自由宅地法，并在变化不定的事件中成为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公开反对黑人解放。1858年，林肯和道格拉斯同时竞选国会参议员。道格拉斯在竞选演讲中肆意攻击、抵毁林肯是辉格党恶棍中最能干的人，说林肯明目张胆地鼓吹北部反对南部、自由州反对蓄奴州的战争……。林肯写信向道格拉斯挑战，要求公开辩论，俩人在7个地区面对听众在讲台上对各种问题进行较量，他们先后面对近10万人讲演，吸引听众之多，情绪之热烈，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后来两人又竞选总统，前一次道格拉斯胜了，这一次道格拉斯却失败了。林肯当选总统来到华盛顿的当天下午，就会见了以道格拉斯为首的伊利诺斯州的参、众议员，从此道格拉斯和林肯一道投身到保卫国家的斗争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不难看出，两个相互对立和竞争的伟大人物的合作，首先取决于作为胜利者的态度和胸怀。

林肯这种和而不同的政治领导艺术，使他得到了一切进步阶层和全体美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得到了所有政治派别的认同和支持，这使得后人无法准确地说出林肯代表的是哪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实际上，他代表的是正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林肯才成为激励一切革命者同落后势力作斗争的精神榜样。

六、广泛交流达成共识

人民对领袖人物的衷心拥护，并不仅仅因为他是领袖，而且更重要的是领袖人物能够正确地了解人民的渴望和需求，并设法满足和实现这些要求。要正确地了解这些要求并提出适当的有效措施，决不是领袖人物仅凭自己的猜想或几个幕僚的判断所能完全解决的。领袖必须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士，与他们交流思想，从中发现问题，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才能使自己的政策符合国家民族利益，才能使自己的政策不失误而得到广泛的支持。广泛交流、达成共识正是林肯政治谋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林肯与公众交流的艺术多种多样，首先是面对面的交谈。林肯的交谈艺术造诣深厚，不论是才华横溢的科学家，老谋深算的政客，远道来访的外国元首，还是从穷乡僻壤来的纯朴农民，终日劳作的工人，他都能与之交谈，并从容而深入地交换意见。即使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在和林肯私人谈话时，也会受到林肯的影响，而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许多拜访白宫寻求某种照顾的人，发现他们身在大厅却弄不清楚林肯又是怎样把他们打发出来的。著名记者和政治组织家瑟洛·威德在一封致林肯的信中说：当我和您在一起的时候，我连自己想说的一半也没有说完，这是由于您的谈话改变了我的信念，消除了我的疑虑。卡尔·舒尔茨将军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林肯时的情形说：林肯的谈话使我感到我们仿佛从小就相识，早就是好朋友。林肯那深入浅出、朴实无华、风趣幽默、平易近人而又一针见血的交谈艺术，是他打开人们心扉之门的最有效的，最合适的一把钥匙。

林肯通过交谈结识了许多朋友，通过谈话使许多对手成为同志；通过谈话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了解了人们对形势的各种看法和建议；通过谈话使许多人了解自己；也通过谈话，化解了各方纷争。他几乎把百分之七十五的时间花在会见、交谈上。当选总统后，他通过与西华德、道格拉斯的交谈，使自己的竞选对于和自己一道奋斗。林肯与道格拉斯参议员讨论国家分裂的形势，得到了参议员全力的支持，斯格拉斯随即奔走于各州议会为林肯做战争动员；林肯与纽约的一些百万富翁共进早餐时向他们说明政府的政策，这些富翁及其追随者都成为主战派以支持林肯；通过与副总统哈姆林交谈，使哈姆林感到这是不同寻常的友谊，他保证一定作林肯的亲密伙伴并竭尽全力提出自己“肤浅的”建议，从而建立美国历史上总统和副总统融洽合作的少数典范。

内战爆发后，地处首都和叛乱州之间的马里兰州出现重大变化，该州中心城市巴尔的摩市议员候选人都是清一色的“州权论”的拥护者，所选的议员都是州议会中脱离派议员，使两派的意见直接对立，举州动荡不定，林肯立即召见州长，希克斯州长向议会报告和叙述了他同总统的私人会晤，转达了总统的坚定主张，使议会通过了有利于联邦派的决定，并派出委员会拜会林肯。该委员会报告说他们与总统虽对具体事情的看法有分歧，但在重大原则上没有分歧。通过谈话，林肯使动荡的马里兰州一天天稳定下来。

《最后解放奴隶宣言》发布后，黑人纷纷为自由而战，很快使战局发生了有利于联邦的转化，然而要在一切方面使黑人与白人完全平等，受到和白人一样的公正对待，这个在当今美国社会也没有根本解决的问题，在当时的确是很难一蹴而就的，林肯清楚地看到这种深深植根于民族心理和文化偏见的东西是无法立即改变的。他想通过把黑人移植到国外的方法减少这种可能

的矛盾和冲突，但要让黑人接受这一点却非常困难。一个杰出的逃亡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前来拜访林肯，林肯耐心而神情严肃地听着他的经历和观点。道格拉斯针对林肯的移植思想尖锐指出：“除非黑人在美国受到尊敬，否则他们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决不可能受到尊敬。”他们还详细地谈了有关的各种问题，道格拉斯后来说：从这些话里面，我看到的与其说是一个具有钢铁意志的战士和美国陆海军最高统帅，勿宁说是一个软心肠的人。虽然我并不同意他的见解，但我却不得不对他的高尚精神表示敬仰。我对总统的为人以及对这次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交锋感到极力满意，因此，我决定继续从事招兵工作。林肯要求他想办法把《这最后解放奴隶宣言》传播到南方，并把黑人带到北方来，道格拉斯由此看到林肯的坚定信念深刻地蕴藏在一切切实可行的实际措施之中，而不是挂在口头上、文字上。林肯顺便问道：“那个一直猛烈抨击我的菲力浦斯是个什么样的人？”道格拉斯正不知该怎么回答时，林肯补充道：“没什么关系，告诉他继续这么做吧。让他促使人民心甘情愿地为解放奴隶而奋斗，而我也一定会和这些人并肩前进的。”林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使解放奴隶的杰出人物感到林肯是在和他们一道奋斗，这比一场讲演，写一本书更能感动人。

1863年1月，波托马克军团新任司令官胡克向林肯总统和议员汇报了战况和他的战略考虑之后，林肯却找来一位中士，要参议员们在听了军团“头头”的话之后，再听听这位军团“尾巴”的看法，中士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全部看法。林肯神情忧虑地听完了中士的见解，因此他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显然中士说出了令人不安的真相。林肯正是通过这种广泛的交谈了解事实的真相，并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政策。只有这种建立在对现实的正确判断上的政策才能经受现实的考验，才能正确指导各项事业的稳步前进。

林肯广泛交流的第二个方式就是写信，林肯喜欢用写信的方式和人交流意见。因为通信不像谈话那样是有随意性而不容易让人深刻、透彻、全面地分析问题，因而林肯一生中，十分注重用通信的方式与人交流。通信的对象既有自己的论敌，也有自己的朋友；既有近在咫尺的阁员、议员，也有远在前线的将领、各州各地的代表人物；既有国内的各种上层代表，也有欧洲的国际工人协会。他觉得这样做，有很多好处：

第一，用书信的方式可以把自己的重要观点和想法告诉别人甚至引起传播和讨论，而不必一个人一个人去宣讲和阐述，这可避免谈话的不完善和随意性，以便准确、全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致国会和各种组织、团体的信件，正是表达这样一些重要思想，使人们按照他需要的方式接受、讨论和完善这些主张，同时又克服了正式文件的严肃性。这些信件很多都广泛传播，其中观点成为人们的共识。林肯也从人们反映中了解到人们的真实思想和主张，从而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这种方式的结果使他始终与人民保持密切的一致。

第二，林肯把书信当做一种给人提出忠告、建议的劝说手段。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国务卿西华德建议与南部秘密会谈，被林肯否决，西华德进一步提出应用发动一场对外战争使国家重新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林肯立刻写信予以回答，他坚定地指出“一次只能打赢一场战争”。书信不同于辩论，辩论双方很少考虑自己的缺点和对方的优点，往往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对方的缺点集中火力予以攻击，同时极力为自己的缺点辩解。书信清楚地摆出了人们的观点，不可能不断变换角度和立论，又不容易被情绪所支配，人们往往

更能认真思考对方的主张，冷静而全面地分析全部情况。在很短的时间里，西华德对林肯从怀疑、不信任转变为忠诚和崇拜。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执政魄力以及精力实为罕见的品质，总统是我们当中最杰出的。”

第三，写信比直接下命令让他人服从更为有效。林肯认为提出请求与发布命令相比自有其价值。他写给下属的书信和电文充满了建议、劝告和见解，却很少有命令。他更喜欢让将领们按照战略目标自作决定，只是希望他的建议能使事情办得更好。“这封信丝毫没有命令的意思”，“我希望您予以考虑”，“这只是给您的建议”，“请根据您的判断拟定命令，确定进行这件工作或那件工作的时间和地点”，“如果缺少什么我权力范围内可以给予的东西，请尽管告诉我”，……，等等，诸如此类的充满温情的言辞，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既使下属了解了总统的要求和见解，又让下属有充分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才干而下致束缚他们的手脚。

第四，总统亲自给下属写信，这本身就是一种友好、器重的表示，是对下属的一种信任和鼓励，能进一步激发下属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当格兰特将军攻下维克斯堡后，林肯给这位素未谋面的将军写了一封私人贺信，林肯在信中表示自己当初对将军的战略并没有信心，并承认自己错了，格兰特深感荣誉，他感到总统和政府真诚赞赏并支持他的行动，从而空前激发了这位将军的进取精神。1864年林肯致信谢尔曼：“这件大事成功了，荣誉全部归于您，因为谁也没有做更多的事情。下一步怎么办，如果我让格兰特和您本人来决定，可能更有把握。”谢尔曼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回信，他更加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更加乐于采取主动进击敌人去争取更大的胜利，而这正是林肯渴望的效果。

林肯善于广泛交流，目的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和自己的政策、主张和信念，从而与更多的人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同时协调各种意见分歧，把整个组织、政府团结成一个整体同共同的敌人作斗争。事实上，作为领导人必须善于发现这个共同基础和共同的追求，并使之成为全体成员的精神支柱和内在信念，也只有这样，才能使领导人走向成功，否则，即使偶然成功，摘取的也可能是变味的果子。林肯是那种善于通过广泛交流，共达共识的杰出领导人。林肯与人们达成一致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保持联邦的完整，自由和正义只有在维护联邦的斗争中才能实现。

七、唯才是举不拘一格

林肯成为伟大的人物，首先应归功于他不拘一格地纳才用才。任何人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不论多么杰出的天才人物，仅靠自己一个人的才能、智慧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使用其事业所需的各种人物，集众人之所长，共同从事其事业，才能取得成功。林肯这样一个出身西部地区的社会下层的政治家，成为美国总统，领导美国人民克服空前的国家危机，废除奴隶制这种有着强大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心理基础的落后制度，为美国民主制度开创一个新局面，除了依靠老朋友的支持外，必须使用无数素未谋面的或与自己长期对立和竞争的各种人物，并且要在工作中不断发现、提拔、培养新的人才。林肯当选总统赴华盛顿就职前后，心里比任何时候都清楚这点。

首先，林肯必须依靠自己的老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林肯当选总统后，南部的分离运动将如火山般爆发。林肯写信给特朗布、沃什伯恩等老朋友，指示他们一定坚持立场，决不能容许奴隶制度扩展一步，“在这一点上要像作钢链拉住一样坚定不移。一场恶斗必将来临，与其在今后某个时候出现，不如现在就来临为好。”约翰·乔·尼古拉是一个可以信任和依靠的、办事准确无误而又小心谨慎的、诚实可靠、守口如瓶的人，林肯让他作为随身秘书；约翰·海里是个头脑灵敏，富于奇思异想的小伙子，林肯说，我们不能把整个伊利诺斯州带到华盛顿去，但得让约翰·海里去，他让小伙子任第二秘书；林肯对拉蒙说，看来要打仗了，我要你和我在一起，我没有你不行；赫恩姆也是个不可缺少的人物。林肯把这些老朋友带去，作为自己必须依靠的力量，但并不是全部的老朋友，而是根据可能遇到的问题所需的人才而确定了其中的精英分子。

第二，在美国政坛上，林肯所熟识的人，除了自己的朋友，就是自己的对手。为了更好地履行总统职责，组成强有力的政府，他必须重用这些具有全国影响而又富有政治经验和才干的老对手。在竞争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中，西华德与林肯是对手，西华德是共和党的主要领袖，是调和派的代表，与全国商业财团关系密切，他赞同林肯的经济主张，对经济贸易素有研究，能准确地预见各种问题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林肯就任总统后首先拜访了他并争取他担任国务卿。第二个人是自己多次交锋的对手，总统选举的失败者——道格拉斯。林肯就用他的影响，让他从事保卫联邦的宣传工作。有“逃亡黑人的总检察长”之誉的蔡斯出任财政部长；人称“美国政治上最有手腕的幕后操纵人”和拥有钢铁和铁路控制权的宾州“沙皇”出任陆军部长；还有老牌政客韦尔斯，南北都能接受的人物贝茨，律师出身的政客史密斯，共和党温和派代表人物、反对奴隶制的布莱尔……等，林肯审慎地把一些政治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特别是对内战影响重大的集团的代表人物加以重用，把他们团结在保卫联邦的旗帜下。

第三，发现新秀加以任用。这一点在军队中更为重要和明显。内战爆发后，联邦军队总共 1108 名军官中，有 387 名辞职到南部，其中 288 名军官毕业于西点军校，北方军队中缺乏具有实战经验的将领，当谢尔曼来到白宫时，林肯准备委任他为准将，但他宁愿从上校于起，林肯高兴得开怀大笑，谢尔曼不负重望成为一名能干的将军。西点高材生，著有《战争艺术手册》的麦克累伦，曾在弗吉尼亚以 1.8 万人击败 1.2 万人而取得了北部唯一的一次胜利，林肯立即委任他为波托马克军团司令，统率 16.8 万人，以期望他能勇往

直前扭转战局。当林肯发现凯麦隆急躁、轻率，忽左忽右有可能扰乱整个战略部署时，就任用律师出身的强有力的铁腕人物斯但顿担任陆军部长。斯但顿曾称林肯为长颈鹿，对林肯成见根深，以至进入内阁仍没有改变这种看法，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林肯并不是小丑”。林肯对斯但顿信任有加。斯但顿逮捕了作战失利并有通敌嫌疑的斯通将军后向林肯报告，林肯回答，你完全有权利这么做。在长期的合作中，斯但顿逐渐认识到林肯是位极富有才干的行政首脑，从而尊敬和崇拜林肯。林肯遇害后，斯但顿自言自语道：“他将为世世代代所铭记”，在十多天内几乎每天去看望林肯的儿子，站在那儿一言不发，默默流泪。格兰特攻克唐纳尔逊堡垒后升任少将，攻克维克斯堡后，林肯任命他为西线最高指挥官，授予其战场决定权。格兰特 1864 年任陆军总司令，为第二年攻克里士满接受南方军队投降立下赫赫成功。

林肯用人范围广泛，唯才是举，没有任何成见，无数的杰出人才被林肯重用和提拔，这些人都成为巩固联邦平定叛乱的中坚力量。林肯的用人原则也极富特色。

第一，挑选那些渴望负责，甘冒风险的人当助手。不论是谁，不论他的才能多高，影响多大，如果没有负责精神、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只可以与人享受成果，只知道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去认真工作以争取最大成功，对事业往往漠不关心，那么他对国家、民族、事业必然也无所补益。60 多岁的司务脱将军，在军队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对林肯绝对忠诚，但在战争的危机时刻常常坐在办公室闭目养神，林肯就让他退休了。林肯选择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选择总统秘书，提拔将军和挑选部长，第一个标准就是负责精神和进取精神。林肯认为只有那些敢于担当、渴望有所作为的人，才能干一番大事业。

第二，林肯用人不仅看一个人怎么说，更重要的是看怎么做。他在任命麦克累伦为陆军部长时，对其寄予厚望，麦克累伦也表示他完全能做好这个工作，但当林肯发现其无所作为时，就免去了麦克累伦的职务；林肯任命胡克将军为总司令，胡克保证一定完成任务，林肯冷静地对他说：我从你前任那儿听到的也是这些话。林肯常说领导一个人的组织而卓有成效的人比领导一百个人的组织而无所作为的人要有用得多。战争期间，凡不能取胜或遭致失败的人都被免职，取得成功和胜利的人都得到提拔。在实践中把那些杰出的实干家逐步提拔出来，他们组成了林肯的领导集团，把那些只会空谈而没有实际工作能力和实效的人清除出去，使领导集团日益富有朝气和能力。

第三，林肯诚恳地帮助下，为他们的工作尽可能地创造一切条件，并将功劳和荣誉归于部下，而不是坐等他们工作成功，只摘桃子不浇水。林肯任命将领，为将领解决各种困难，尽可能地为将领们提供充足的物资供应，后勤保障，充足兵员；并从自己的角度为部下提供各种建议供其参考；甚至亲自深入兵士中鼓舞士气；协调各将领间的作战行动；在部下遇到麻烦时，他主动承担责任。本杰明·巴特勒成功地保全了马里兰州而声名大噪，调往弗吉尼亚时，数以百计的奴隶逃往他的兵营。根据逃亡奴隶法，逃亡奴隶应归还其主人，巴特勒以敌人曾把黑人强征去修工事为由将黑人当做禁运品加以没收，深受奴隶的欢迎，为各军区仿效，却受到许多人的责难。林肯对此保持沉默，反对者也只能空喊而已。卡德瓦拉德将通敌的人直接派兵扣押，违反了人身保护法，最高法院甚至向将军发出令状，林肯公开答复说：“我曾认为有责任授权指挥官在适当情况下可根据他个人的判断暂停人身保护法

所规定的权利，……难道为了一项法律不受侵犯，就应让该项法律以外的所有法律均遭破坏吗？”

第四，林肯任用下属，赋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以便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只有部下有充实的权力，才能要求他们取得成功或承担责任。但部下在发挥主动性时，必须要与总体目标一致，既不应作出扰乱总体部署的行动，也不应决定应由上级决定的全局性问题。如西部军区司令弗里芒特 1861 年发表文告宣布解放密苏里州叛乱分子的奴隶，引起边界州的不安和战争局势动荡，当时的人们是在保卫联邦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奴隶制问题会引起这个团体的分裂，林肯解除了这位冒失将军的职务。

第五，林肯考察下属既看事件的结果，也注意听取基层民众和士兵的意见，从不同角度了解他的下属。即使下属失败或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一般都给他（们）宽限期，让他（们）想法设法扭转局面；即使不得已解除其职务，他也不搞臭一个人，而是让他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继续发挥作用，避免因故意伤害人而为自己的事业和组织树立一个坚定的对立面。

八、洗浴民意描绘前景

林肯出身社会下层，十分了解社会现实。当总统后，敞开白宫大门，欢迎所有来访者，甚至对警卫人员的善意考虑提出批评。美国南北战争初期入伍的老兵，几乎都有可能见到林肯。林肯时常深入民众之中，他称之为洗“民意浴”，体察民情，了解社会现实和各种工作中的情况。有一个统计资料表明，林肯从1861年开始，到1865年4月几乎每月都要到基层实行游动式领导。1861年有8个月深入民众、基层和军队超过10天，1861年、1862年、1863年、1865年儿年中共有14个月平均低于5天。有一次尼古莱告诉来访者总统很忙，让他们以后再回来，而林肯将办公室门打开，不管多忙也要接见来访者。

林肯不愿意与民众拉开距离，他常说“让民众知道我不怕到他们当中去，这点是很重要的”。甚至连内阁会议也选择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举行，如海军造船厂。他不愿成为办公室的囚徒，当他无法从白宫脱身时，他会让人们“游逛”到他那儿去，政府官员、商人、市民常沿着总统官邸围墙排队，等候进去见他。他说：“我把这些接见叫做我的‘民意浴’，因为我很少有时间去读报纸，所以用这种方法搜集民意，虽然民意并不时时处处令人愉快，但总的来说，其效果还是有新意、令人鼓舞。”

对民众来说，不可接近的领导人只是令人敬畏，而无法赢得人民的爱戴。如果下属一般人知道他们真的容易接近他们的领导人，他们将会以更积极、更信赖、更负责的眼光看待领导，对待领导交给他的工作。如果一个人发现领导关注着自己的工作，他一定下决心努力把事情办好。可接近住、平易近人和对部下工作的重视是林肯的一条重要领导原则。

林肯所谓的“民意浴”的前提是：和蔼可亲、幽默风趣、愿意听真话、尊重他人，人们乐于见他并可无拘无束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不必思前想后。林肯和人谈话，从来不用严肃的说教，更多的是运用故事，准确无误而又轻松愉快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林肯的风趣、幽默闻名天下。林肯接见人往往是单独或几个人谈话，并不追求形式或虚名，而是要真正了解民意。

林肯深入民众，既能与民众、士兵广泛交换意见，也能与他们同甘共苦。有一次林肯视察部队时天降暴雨，士兵向他致意并感谢，他高声说：你们能坚持，我也能坚持。视察完毕后谢尔曼上校劝总统回营房，林肯坚持去看望伤兵，与伤兵交谈。林肯在士兵中受到的欢迎和爱戴是任何将军无法比拟的。

林肯每到一地都能给人以鼓舞，用他的谈话、演讲把人们的信心、情绪调动到高潮。其中重要的方法，就是他能在任何情况下给人们描绘出一个值得追求、又十分现实的前景和蓝图，让人们时时看到希望，看到前途。林肯了解民意，能准确地把握每一时刻美国人民的渴望和国家需要的东西。他能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说明国家前进的方向及目前改革的根据和意义，每到一处，都抓住一切机会一再阐述，维护和提醒每个人牢记美国建国的原则、未来的前景及实现未来的途径。这些前景既包含了爱国而充满正义和价值的崇高理想，也包含了每个人对未来幸福的理解和要求，从而打动了美国人民的心弦，成为林肯和普通民众联结的最强有力的纽带。“不仅是为了今天，而且是为了以后永远，为我们孩子的孩子，我们必须使我终生享有的这一伟大和自由的政府永远存在下去。”“我不过是暂时地占据着这个巨大的白宫，我是一个活着的见证。说明你们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希望来到白宫，就像

我爸爸的孩子一样。正是为使你们每个人都能通过我们享有的这一自由政府而拥有一个广阔的天地，都有发挥你们的勤苦、勇敢和智慧的公平机会，为了在生活的竞赛中你们可以有同等的权利，为了人类生活中所有值得追求的愿望，这场斗争应当坚持下去，这个国家值得为之战斗的……。”

林肯试图振兴那些传统而又崇高的价值观和人生信条，试图唤起人们对自由、民主制度的热情，激发那些支配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那种斗争热情。林肯通过“民意浴”正确地把握了民众的要求，因而更好地引导阐发这种要求，使这些渴望和要求与更为崇高的事业联系起来，既激发人们现实斗争的热情，又能使人们感到自身在这场现实斗争中的使命和历史责任，使人们的人生闪烁出时代和历史的的光芒。

林肯的前景描述和宣讲，使人们无论面临多么严峻的形势，存在多么巨大的困难，或取得多么伟大的胜利，都时刻感到未来总是十分美好，而且值得为之继续奋斗。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当人民和追随者取得辉煌胜利时，能及时提出更远的目标并引导人们去追求，当人们面对失望、困惑、甚至绝望时，能够指出希望所在，能提出走出困境的方法和途径，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满怀信心，并把时代的使命、领导者的政策当成人们自己的自觉行动。领导者不论是领导人们从失败走向胜利或从胜利走向胜利，都离不开对未来的美好前景的指引和追求。林肯成功地为人民描绘出一个个未来蓝图，最后他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落成典礼上，用两分钟表明他的全部理想的精华：“他们（指南北战争）中保卫国家的烈士，光荣地死去了，我们要更加献身于他们已为献出一切的事业，我们在此要下定决心，绝不让死去的人鲜血白流，这个国家将在自由中获得新生，而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也绝不会在地球上灭亡。”

林肯“洗浴民意，描绘前景”的领导方法是相辅相成的，运用它必须注意三个原则：首先，未来前景必须建立在对民众的要求、渴望和真实感受的基础上，任何与民众意愿不相关、距离甚远、甚至相背的前景，都没有丝毫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其次，这种前景必须建立在崇高而伟大的、人民尊重的价值观和正义的基础上，任何具体的、建立在较低层次上的前景，都缺乏激起人们持续奋斗的真正价值，而且有可能伤害人类久经考验的高尚目的。这个目标实现之后的社会无法或很难找到或重建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再次，这种前景必须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要求，必须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同时它又可以成为指导人们前进的指路明灯和制定各种近期目标的依据。

林肯作为一名不断前进，领导美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杰出领袖，虽然为自己的伟大事业献出了生命，但他的精神、领导艺术、远大追求从那时起一直激励着世界上所有积极进取、热爱和平、民主、自由的人的奋斗精神。

九、确定目标百折不挠

对于林肯来说，不论对人生的追求还是对政治的追求，任何事情做了一半都等于没做，只要他认定的目标，他就百折不挠地想方设法促成其实现。他怀有崇高的理想，但从不空谈，一切目标和理想都与他坚决的行动相联系。他在每个不同的时期，确定不同的切实可行的目标并努力实现它，直至达到目的为止，决不半途而废。

早年介入政治活动时，林肯认定只有改善航运才能促进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以此为目的，在一切可能场合和地方，宣传这种主张，对州议会内的任何有利于改进航运的大小措施他都坚决支持；当他决心成为一名律师时，他努力学习法律，走几十里路去听一场法庭辩论，读各种必要的书籍，向一切能帮助自己的人求教；当他决心成为一名演说家时，他无数次地面对田野里的庄稼、树林、河流演说，下放弃一切机会发表自己的演说，听取各方面的反应和意见，他发现演说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推理，他开始潜心学习和研究逻辑学。由于他的不懈努力，他终于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说家。他坚决反对奴隶制扩展，他不顾各种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后果，对自己的党支持奴隶制存在的议案提出尖锐的书面抗议，毅然与废奴主义者合作；坚决抗议内布拉斯加法案，并由此与道格拉斯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大辩论。大辩论使林肯不再仅仅是一个西部州的政治人物，而成为全国瞩目的反对奴隶制扩展的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坚持同维护奴隶制者进行斗争直至胜利。

林肯当选总统后，分裂迫在眉睫，维护联邦的完整和统一，成为他的主要责任和目标。他坚持抑制任何立即废除奴隶制的激进派主张和行为，果断打消了调和派妥协让步的要求和行动，把所有派别都团结在维护联邦的旗帜之下，对南部叛乱进行坚决的斗争。1858年，他竞选参议员输给道格拉斯后写道：“斗争必须继续进行，为了民众自由的事业绝不会因为一次甚至一百次失败而放弃。”作为总统他更不会由反叛者的威胁、恐吓和巨大的困难而退却。随着战火的临近，保存联邦和逐步废除奴隶制的目标变得更加坚定不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识到只能一步一步达到成功的最终胜利结局，他不断根据自己的主要目标提出各种短期目标。

冲突早期，南方军队包围了查尔斯港口萨姆特堡垒，堡垒的粮食储备只够维持四个星期，而南部同盟武装已准备夺取孤立的据点。林肯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坚守这个堡垒，迫使南部同盟暴露其反对政府、反对联邦的真实面目，让全国人民看清楚：不是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妥协就能平息分裂的危机，从而把萨姆特当作一个象征，供全国和全世界观察和思考对那个堡垒开火，就是挑起一场内战的序幕，就是走上反叛道路的第一步，就会揭开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内战。萨姆特成为一个从高山延伸到海洋的马蜂窝，是内战还是和平，林肯不作选择，林肯把决定和选择的权利交给南部同盟。尽管内阁七位成员中五位反对坚守，一位弃权，只有卡莱尔认为必须敢作敢为，给该堡垒补充给养将证明北部刚毅的勇气以及人民和他们的总统维护政府权威的决心。反对者从军事上考虑，弃权者从财政上考虑，支持者考虑的是尊严与信心，林肯却是出于战略，出于道义，出于民心向背，让南方承担其应承担的战争罪名和责任。果然，当萨姆特遭受攻击后，全国纷坛复杂的政治局势一下子变得泾渭分明，要么参加叛乱，要么保卫联邦。一切维护联邦的政治集团和人物立即放弃了他们的争论和分歧，投入到保卫联邦的主要目标里来。从此，

这一目标成为一切爱国人士的共同目标，在林肯的领导下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林肯进一步制订各种具体目标。为渊驱鱼是任何政治家的大忌。林肯首先必须把一切拥护联邦的人团结在星条旗帜之下。他首先制订了一个具体目标：即要把边界所有拥护联邦却要维护奴隶制的蓄奴州留在联邦内。为此，他暂时对奴隶制问题采取慎重和温和的态度，制止任何过激行为和作法，不允许任何人包括前线将领采取废除奴隶制的任何实质行为，但对把奴隶当作“禁运品”加以没收的巧妙作法给予默认。

其次是封锁南方重要港口，控制密西西比河以及重建和训练军事力量，保卫首都。封锁港口，控制河道，使南方种植园生产的大量农产品无法运出，南方也无法从外国取得武器和工业品等援助，使南方赖以发动内战的经济基础走向崩溃。重建和训练军队使北方在兵力和战斗力上超过南方，从而遏制叛军的进攻。即使不能取得迅速的胜利，也能有效地把敌人压制在一定区域内，保卫了首都安全，巩固了北方人民胜利的信心。

再次是争取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为此，林肯不断启用将领，让他们大胆地打击敌人以鼓舞部队的士气。林肯经常深入士兵之中，看望伤病员，与士兵和军官们同甘共苦。林肯甚至开始学习各种军队理论和战略战术，亲自制定计划，为将领们提供各种积极的建议；寻找、等待能够扭转战局的杰出将领和有利时机；并且为能取得内战的胜利，在外交上采取妥协政策争取各国人民，特别是工人的同情和支持，从而有效防止了欧洲列强承认南方同盟、干涉内战的图谋，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

林肯对待他的内阁成员与将领们的态度既能随机应变又强劲有力，在似乎是无法克服的障碍与人事冲突面前显示了他异乎寻常的不屈不挠精神。林肯不躲避冲突，相反，他及时地解决自己与下属之间的不和，不使这些事情延缓和妨碍事业的发展，当他对麦克累伦说服争取并不能克服其犹豫不决和胆怯时，就给麦克累伦下达了强制性命令，麦克累伦反而致信对于政府应该做什么的政策问题尽情发表了他的看法。麦克累伦的参谋长——伦·巴·马西告诉陆军部长，如果麦克累伦的军团被迫“投降”的话，他将不感到惊奇，总统严厉斥责了马西将军，但同时立即解除了麦克累伦的职务，林肯几乎先后任命四五个将军担任总司令，以期他们能迅速地击退敌人，扭转战局，可以说：林肯在固执地寻找一位“格兰特”式的人物。

最后，当奴隶制问题成为获取战争胜利的唯一希望时，他果断发表了解放奴隶宣言，征召黑人参军参战，广大黑人为争取自身的自由而战，最终成为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废除奴隶制的目标在保卫联邦的斗争中得以实现，从而使保卫联邦的爱国战争赋予了争取自由的进步性质并成为美国的第二次民主革命最终被载入史册。

林肯为实现确定的目标，一方面根据总的主要目标制订若干相互依存的具体目标逐一实现，一方面根据主要目标和具体目标制订各种实施策略，促使每个目标都圆满地完成。同时，有时将自己的目标大旗高高举起，永往直前的冲锋、奋斗；有时可以把目标大旗放下，修筑战壕，等到时机成熟，旗帜再次高高举起时，一切都已成为顺理成章、水道渠成而无法阻挡的事情。林肯像一只猛虎，他闭着眼睛却并不等于睡着，只要他认定的目标，他决不会轻易放弃。他常常说：“有时候绕过障碍去耕作比浪费时间通过障碍要好，退却只是要猛烈的进攻的前奏。”诚实的林肯作为政治家，既不是循规蹈矩

的人，也不是勇猛冲锋的猛将，而是位平静、高深莫测的谋略家。

温斯顿·丘吉尔谋略

温斯顿·丘吉尔是英国首相，保守党著名领袖。1874年11月30日出生在英格兰牛津郡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祖先马尔巴罗公爵约翰·丘吉尔是英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是英帝国争夺海上霸权的功臣；他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担任过英国财政大臣，而他的母亲珍妮特·查罗姆是美国一位百万富翁的女儿。可谓出身显赫。

他的一生是曲折复杂与传奇色彩的交织。从1905年步入政坛到1955年退休，丘吉尔一直活跃在英国及世界政治舞台，他既是一位雄心勃勃、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历史学家和画家，还以文笔优美颇著名声，给世人留下了许多宏篇巨著。他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担任过多种大臣职务，却又多次被排斥在内阁之外；他先投身保守党，后又追随自由党，而后再倒戈投靠保守党，被人称作政治变色龙；他极端仇视共产主义，反苏反共，却又在二战中率先与苏联结盟，并领导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被称为“二次大战三巨头”之一，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但未等到他品味胜利的喜悦，却遭到英国选民的抛弃，1955年心力交瘁的丘吉尔辞去首相职务，宣告退休。1965年1月24日，丘吉尔逝世，享年91岁。

丘吉尔的一生体现了英国现代史的缩影。他那高度勇敢的进取精神，无限的精力，深刻的洞察力，惊人的想象力和出众的记忆力，他的多才多艺和对国家的赤胆忠心，毫无疑问，是本世纪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之一。

一、“勇敢地向既定的目标进军”

丘吉尔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以及显赫的家庭背景，年轻的他逐渐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像父亲那样，步入政界出人头地。但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1895年是丘吉尔自立成人的开始。1月24日，他的父亲因病溘然去世，终年仅46岁；4月他的外祖母伦纳德·杰罗姆夫人病故；7月他依恋不舍的保姆爱维莉斯特太太也死了。这一连串的不幸，使丘吉尔悲痛万分，生活的严峻现实使他变得懂事多了。他觉得父亲这个大靠山倒了，今后的一切只有奋发图强，自己开创。于是，他定下自己的抱负，即仿效父亲在政治上所达到的辉煌业绩。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了这样一段话：“玩弄政治游戏是一种极好的把戏，一个高手在真正置身于其中之前，磨砺则是十分必要的。”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这段经历感慨万分：当我回顾这些岁月时，我不禁虔诚地感谢至高无上的神所赋予我们的生存才干。所有的岁月都是好的，无论起伏与兴衰，危险与坦途，永远是动的感觉与希望的幻景。青年们！全世界的青年们！让我们高举战旗，肩付起历史的责任，排除困难，勇敢地向既定的目标进军吧！凭借着这股热情，青年丘吉尔开始精心铺垫通往政坛之路。

从1895年到1900年，他以军官和战地记者的身份开始借笔扬名。这期间他先后参加了西班牙殖民者镇压古巴人民起义的战争，英国军队镇压印度西北边境人民和苏丹人民的战争，以及南非的英布战争，尤其是在印度的两年，对他后来的思想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在这段军旅记者生活期间，为了赢得受人瞩目的勇敢声誉，并达到最大限度的扩大知名度，丘吉尔千方百计，甘冒风险去亲眼目睹战场上血与火的抗衡。而这样做绝非是丘吉尔一时心血来潮，他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正如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所写的：“我骑上灰白色的小马，沿着散兵线行进，而敌人却匍伏隐蔽在那里，这或许是愚蠢的，但我下了巨额赌注，好让人们看到，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勇敢或更有气魄的行动了，倘若失去了观众，事情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丘吉尔急于成名的心态和他与众不同的个性。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年轻人需要冒险，新闻界需要广告，诚然这两种我都得到了。”

他曾经成功地以“一个年轻军官”的署名，在伦敦《每日电讯报》上发表了许多通讯报道，受到报社和读者的广泛注意。于是，丘吉尔热切希望能在“选民面前扬扬名”，故而他开始利用战时搜集到的材料，构思了一个将其编书出版的计划。1898年春天，朗曼公司出版了丘吉尔的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实》，尽管为了抢在与其他竞争的记者之前发表，他没有认真校订书中引用的各项例证，以至错误不少，但这对于一位学历不深，年龄只有23岁的尉级军官来讲，已经不容易了。因此，大多数评论家给予此书肯定的态度。《泰晤士报》评论道：“这位年轻作者所显示的直截了当的笔锋，毫不犹豫的坦率精神和幽默感，将被认为是一个家学渊源在起作用的明显例证。”《旁观者》杂志认为，作者显示出“军人所具有的丰富、敏锐的观察能力，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相当精辟的论述”。《三军联合杂志》是一家专供部队军官阅读的杂志，它评论该书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并向军队每一个军官推荐读这本书。毫无疑问，这本书使丘吉尔名气大振并从此跻身于新闻界。后来，他又参加了苏丹战争，丘吉尔参加了骑兵团战斗，这是英

国军事史上骑兵对步兵发动的最令人震惊、最残忍的一次战斗，也是丘吉尔从军以来参加的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战争。丘吉尔再次决定将他在这次战争中所写的通讯报道编辑成书出版。于是，他又一次潜心苦熬，埋头著书，1899年秋天，这部名为《尼罗河上的战争》出版了，它的售价是36先令，是《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实》售价的10倍。它的问世，立刻轰动了伦敦，它出色的描写技巧赢得了评论界又一次高度的赞扬。《三军联合杂志》认为“毫无疑问，这本书是迄今描写这一题材最好和内容最全面的书籍”。《展望》杂志甚至说，这本书里作者对苏丹极有研究，就像金累克对克里米亚有研究一样。将丘吉尔与历史学家并论。成功的喜悦使丘吉尔此时第一次体验到终生伴随着他的创作愉快感。正是这本书使丘吉尔得以跻身于英国名记者之列，并且作为作家，丘吉尔也已名闻遐尔，甚至他的政治评论，已引起国家上层领袖们的注意。因此，做为一名记者，凭借手中的妙笔，使丘吉尔出了名，而这一步是他认为能出人头地的一个捷径。这个目的，他实现了。

在写作的同时，丘吉尔深知，要想在读者中扩大自己的知名度，除了掌握翔实材料以外，必须具备丰富的社会知识和高超的写作技巧。只有这样才能站在更高的境界去观察、评论，而这些恰恰是丘吉尔的弱点。他虽然8岁开始上学，14岁进入专为贵族子弟开设的哈罗公学，但他生性好动，喜欢冒险，而读书“疏懒”且很不用功。他虽然记忆力超群，但是只对感兴趣的东西才学得快，记得牢，凡是他不喜欢的东西，他根本就不想学，尤其是讨厌数学和拉丁文。但他对历史和古典文学有兴趣，特别喜欢军事。在班上他的学习成绩是最差的，在学校他是全校倒数第3名。这些简历，丘吉尔是不会忘掉的。因此，他深知自己是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即使是基础教育，也是个不及格的学生。而现在要想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就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知识和能力。于是，他开始了书海遨游，请母亲给他寄来了大量的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方面的书。他每天阅读4小时或5小时的历史和哲学著作，熟读了吉本、麦考利、柏拉图、叔本华、马尔萨斯、达尔文等人的大量著述，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完全接受了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吉本那种富丽堂皇、华而不实、崇尚辞藻的风格对丘吉尔的文风影响也很深。由于丘吉尔的刻苦努力，专心致志，两年中，他读了成箱的书籍，尤其偏爱历史，后来他能够成为一个在很多问题上有深刻洞察力的政治家，同他丰富的历史知识是分不开的。读史使人明智，正是这些大量的精神养料，使丘吉尔不仅成为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而且成为举世闻名的著作家。书籍、知识奠定了丘吉尔成功的坚实基础。

辛勤的努力，带给了丘吉尔巨大的政治资本：他受到海军大将、陆军将军、市长的亲切接见，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封封贺电。年轻的丘吉尔春风得意，成了英国当时最红的明星。英国著名新闻记者斯蒂文斯认为，论年龄甚至论气质，温斯顿还是个孩子，但若论个人抱负、深思熟虑、运筹自如、有的放矢、手段高明等方面，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子汉了……。他具有老练的国务活动家那种灵活自如处理事务的本领，他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民领袖”、一个卓越的新闻记者。威望的急遽上升，更坚定了丘吉尔的信念，他要涉足政坛。为了应付官场上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为了蛊惑人心，打败竞争对手，丘吉尔决心掌握辩论技巧，练就一套过硬的演说本领。演说艺术是政治活动家青云直上的必要因素，大凡著名的政治家都是优秀的演说家。雄辩的口才是他获取权力成为伟人的阶梯，丘吉尔对此深信不疑。为了塑造

这方面的才能，他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他必须克服语言上发音不准，讲话结结巴巴，口齿不清等缺陷，要知道，这是演讲的大敌。为了增加感染力，丘吉尔一般要在每次演讲前做好精心准备工作，并倾注全力背诵讲稿，有时还要将讲稿内容写在手心上以防万一。这是对主题明确的演讲而言，除此，他还注意培养自己随机应变、临场不乱、敏捷的思维能力和迅速反应能力，以强化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现场辩论的本领。功夫不负有心人，丘吉尔终于以自己的勤奋和努力赢得“世纪之演说家”的美誉。他的巧言善辩有人曾神话似地比喻说，丘吉尔甚至能高明到这种地步，几乎能把树上的鸟说得从树上飞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描写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在太平洋就曾被他的演讲深深感动过，他的演讲对我感动之深甚至超过了罗斯福总统的演讲。我们知道，尼克松当时是美国海军军官，而丘吉尔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演讲竟能胜过美国总统对尼克松的吸引，可见其演讲艺术的精湛。丘吉尔在他一生中，在英国那阴暗的1940年，用他那充满激情的演讲不仅坚定了英国人民抗战到底的意志，而且说服了一个中立的美国向他们提供及时而且是决定性的援助。

初具名气的丘吉尔，为了形成一定的影响，他还注意联络“志同道合”的派别集团。这是个策略性极强的工作，像他父亲一样，丘吉尔相信在饭桌上容易调和矛盾，达成共识，便于进行政治活动，也可利用饭桌环境捕捉意想不到的信息。丘吉尔曾和保守党下院议员组成政治小组，经常组织各党著名的活动家会晤，讨论政治问题。一次，他们在午餐饭桌上同约瑟夫·张伯伦谈天说地，却意外获悉张伯伦将实行关税壁垒，而这项主张遭到英国多数人的反对，丘吉尔正确分析了形势，公开反对张伯伦，矛盾迅速激化，迫使张伯伦辞职。此时的丘吉尔已练就了一套明察秋毫的敏锐的判断力。但政治斗争错综复杂，丘吉尔这次并未获得重用，这促使他转向自由党。丘吉尔与杰出的自由党前首相罗斯伯里关系甚密，他很欣赏罗斯伯里的富有、慷慨而又博学。他是一位颇具诱惑力的演说家。受其影响，丘吉尔对社会问题的兴趣也增加起来。随着保守党的瘫痪，自由党再次统治英国，丘吉尔被任命为殖民地事务部副大臣，此时他又得到他的秘书、博学多才的智囊人物马什的倾力相助。丘吉尔正是这样善于与各种即使是政治观点相异但具真才实学的人交往，并极力网罗在自己身边，为自己谋事。他可以与政治上的对手来往，这表明丘吉尔并非特别看中党派制度，而在意的是哪个党派对自己有利。这正如英国一位社会学家所言：丘吉尔的组织能力比思维能力更强。

总之，年轻的丘吉尔从21岁失掉了父亲这座大靠山时，就开始了自我奋斗，为实现其远大的理想，凭借他非凡的勇气和智慧，精心铺垫着通往政坛之路。因为他认定英雄创造历史，而他的使命就是统治英国人民。他成功地利用军旅记者的职业，报道了大量生动、丰富的战场烽火，以其锋利的丈笔震醒了国民，也宣传了自己；他贪婪地吮吸着人类宝贵的精神养料，从成箱的书籍中奠定了自己丰厚的思想根底；他努力磨练出雄辩的口才，极富诱惑力；他善于培养交际能力，明察秋毫。这时的丘吉尔凭借自己的天赋和超人的胆识，为自己打开了一条不寻常的人生之路，奠定了他日后在英国叱咤风云的历史地位。

二、法西斯德国是英国最危险的敌人

三十年代，是世界现代史上风云突变、危机迭起的年代。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德国夺取政权后出任总理，欧洲形成了新的战争策源地。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反对犹太主义，并叫嚷要把日耳曼民族统一在德意志帝国周围。他煽动性的鼓吹，不把分散在奥地利等许多国家的具有德意志民族的领土统一起来，建立德意志大帝国，就谈不上民族幸福。因此德国不能不进行战斗。此年3月，希特勒侵略并吞并了当时还是独立国家的奥地利。这一事实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含有说德语的少数民族在内的斯拉夫国家，现在已处于纳粹领土的三面包围之中。同时，希特勒肆无忌惮地扩充军事力量，加紧备战，很快，在海陆空三方具有了明显的优势。德国的嚣张气焰也助长了意大利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邪恶念头。1936~1937年间，德意日法西斯组成了“柏林—罗马—东京”的反动轴心，加速战争准备，国际形势日趋严重。面对法西斯咄咄逼人的侵略扩张，在严峻的历史关头，英国“避战求和”的和平主义情绪十分严重，苟且偷安的思潮颇为泛滥。以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代表的对德绥靖派，对法西斯在欧洲的步步进逼胆怯心虚，认为英国缺乏足够的力量与德意正面对抗，武力制裁只会引起全面的欧洲战争，并导致英帝国大厦的倾覆。为了维护现状，保全既得利益，目光短浅的张伯伦主张对德意的侵略扩张采取绥靖政策。当时，首相的主张笼罩着英国上上下下，甚至在1933年，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学生竟通过一项决议，“本院绝不国土和祖国而战”。这不能不让世界进步人士痛心，英国已萎靡不振了。

丘吉尔这时对德意法西斯崛起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具有比较远大的战略头脑，勇敢的站出来反对政府这一主张。他坚决反对张伯伦推行的对侵略者一味妥协退让的软弱政策，主张对德意侵略者实行坚决遏制和抗击的强硬政策。丘吉尔是当时英国政界一致公认的对德强硬派的领袖。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初，丘吉尔就从德国毁约扩军、磨刀霍霍的种种迹象中意识到，德国是要控制欧洲、夺取世界霸权；英德矛盾无法调和。这无疑从本质上抓住了要害，也使我们看到丘吉尔比其他英国政治家看得更远。

丘吉尔在他的一系演讲中，特别是在1936年底保守党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报告中阐述了他的外交战略路线。这是他多年来，实际上也是他一生中所遵循的英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丘吉尔认为，英国400多年来的传统外交政策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反对和挫败欧洲大陆上的军事霸主”。现在法国陆军虽然是欧洲最强大的，但它并不构成对英国的致命威胁，而德国则不然，它正在以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扩充军备，它哪个国家都不怕，桀傲不驯，虎视眈眈。因此，“由一小撮洋洋得意的亡命之徒”领导的德军是最危险的敌人，它们准备发动一场要使欧洲“德意志化”的战争。其结果，英国厄运难逃。欧洲的结局便是在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

在这种情况下要拯救英国，丘吉尔认为应实行“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的政策。这就是在国内要迅速的大规模的把英国重新武装起来，在国际上则应“建立武装的国际联盟，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以英法两国为核心，反对潜在的侵略者”。要想英国立于不败之地，则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

对于一个当时只处在“后座议员”地位上的丘吉尔来讲，洞悉这一切，看清了德国是英国最危险的敌人，并形成了自己对时局的主张，（历史）证明丘吉尔走在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英国政治家的前列，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睿智的政治家正在成熟。

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丘吉尔主张放弃意识形态的制约，调整英国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关系，与苏联结成反纳粹的“大联盟”。这一主张反映出丘吉尔善于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去实现政治目的的现实主义风格。还在1934年7月，丘吉尔便对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表示：“现在我是德国的敌人，我要保护英帝国不受德国人的侵略，但是希特勒德国不仅威胁着我们英国人，而且也威胁着你们俄国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呢？我们为什么不以共同的努力去组成强大势力来粉碎它呢？”而这时的英国执政者普遍看好绥靖政策，另外，在英国很多人都确信英国无法与德国对抗。在这种情况下，绥靖派的主张占了上风，绥靖主义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绥靖分子在政府中占了优势。1937年5月28日，绥靖派头子张伯伦上台执政后，绥靖政策便正式成为英国外交的基本国策而加以全面推行。

丘吉尔同新首相的对外政策格格不入，双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丘吉尔当时曲寡难合，他的追随者不过三四人。丘吉尔自己也承认，他在那时的影响已降到零。但他不怕孤立，坚持同绥靖主义进行斗争。他在议会内外大声痛呼，敦促政府争取时间，加紧重整军备，充实国防，并一再痛斥并尖锐抨击张伯伦政府推行的绥靖政策。

张伯伦是个眼光近视的政治家。为了迎合希特勒奉行臭名昭著的绥靖主义，以求保全自己。他自认为这样可以祸水东引，一箭双雕，让德国与苏联交战，这样无论结果如何，都能让英国免遭打击。他的如意算盘是想让苏德自相残杀，彼此消耗，最终都无力同英国作战。

但丘吉尔不以为然，他清楚地看到德国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增强，不仅对苏联是个威胁，对英国和其它国家也是个威胁，而苏德开战，对英国来讲只是推迟了遭受打击的时间，实质上潜在的威胁更大。在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张伯伦对这一罪行表示出的卑屈立场使丘吉尔大不为满，他再次公开出面反对政府，在此以后，在议会进行较重要的表决时，丘吉尔不再投政府票而是弃权。他坚持用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观点，他说，如果坐等事态发展，不再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制止，那么，所有小国将会从日内瓦溜走，转而向日益壮大的纳粹制度致敬。他坚决要求英国政府响应3月18日苏联政府关于举行国际会议商讨共同对付希特勒的建议。曾经在30年代，苏联政府多次建议成立某种形式的国际阵线以制止德国对欧洲的扩张，但只有当时不掌大权的丘吉尔极力赞同，却无法实现这一战略企图。

1938年，在欧洲地区的突出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德国要求瓜分这个国家，并霸占它的大部分领土，而张伯伦打算满足德国这一贪欲。说起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上并没有这个国名，它是凡尔赛会议上人为制造出来的国家。墨索里尼之流甚至讲过，没有什么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有的只是“捷克、台德斯克、布拉格、鲁台诺、罗梅诺、斯洛伐克”。换句话说，这块土地乃是捷克人、日耳曼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卢西尼亚人、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的杂居地，这种说法虽属强盗逻辑，但也并非纯系子虚乌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由东向西，宛如牛舌一般地延伸着。牛舌尖部分就是苏台德地区，即山岳地带的波希米亚和西路西亚，

德国的国土就像张开的钳子那样，正好夹着捷克这个牛舌尖地区。当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传统尚未形成并固定下来的时候，邻国出了个希特勒这个野心家，他将邻近的日耳曼民族集中起来，为了制造所谓法西斯“一个民族、一个领袖、一个国家”的独裁统治，首先吞并奥地利，接着策划将苏台德地区并入德国版图。

面对德国无耻的贪欲，英政府为避免发生战争的危险，张伯伦打算说服英法内阁予以接受，并威胁捷克政府同意肢解他的国家。丘吉尔对事态的发展感到震惊，他很清楚，德国一旦得到，地位将会迅速提高，而英国及其盟国的地位则十分不利。因此，他坚决反对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向希特勒求和。9月21日，丘吉尔发表声明，声言英法两国的这些提议，意味着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在纳粹的军事威力下屈服，不仅不会给英法带来安全与和平，恰恰相反，会使这两国处境更危险。22日丘吉尔会晤了英国海军大臣，事后大臣妻子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丘吉尔情绪极为激动，猛烈地谴责首相，他在海军部笨重的家具中间来回跺脚，用他特有的方式对侵略者表示藐视。

9月29日，张伯伦去了慕尼黑。这一天丘吉尔出席了一次由著名政治活动家参加的午餐会，他再次敦促大家应该联名打电报给张伯伦，坚持不能在捷克问题上投降，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获得支持。当聚会者什么事情也没有解决离去的时候，丘吉尔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慕尼黑是纳粹党的发源地，在纳粹发动11月武装政变的纪念碑两旁，站着两名党卫军士兵，他们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给纳粹的圣地增添了威严的气氛。在这里英法意德四巨头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有关这次会面情况，随行前去参加会谈的法国驻罗马大使庞塞是这样记述的：会前彼此虽然都装出彬彬有礼却只是冷冷地握一下手。又矮又胖的墨索里尼穿着纳粹党制服，腰间扎着皮带，摆出罗马帝国凯撒尔的架子，傲慢地说，“这里就是我的家哟！”一副摇尾乞怜相。张伯伦头发斑白，有点水蛇腰，浓眉毛，大包牙，脸上像长了脓疮似的。因为患有风湿病，两手发红，浑身上下穿一身黑色服装，他是个死守着英国法律不放的老人的典型，此刻却显得很神秘。希特勒的讲话声音本来就粗憨，像个乡把佬，听起来倒也有些魅力，但今天却不冷静，脸拉得很长，而且一点也不随和。9月30日下午5时，慕尼黑协定全文发表，捷克首相西罗维噙着泪水说，“在暴力的威胁下，为了拯救人民和国家，只有接受协定，此外别无出路。”

对此，丘吉尔强烈谴责张伯伦，他对此作了出色的总结：“独裁者在手枪枪口威胁下勒索1英镑，如数给他后，又在枪口下索取2英镑，最后，这位独裁者同意拿1英镑17先令6便士，剩下的尾数留作保证将来采取善意的酬谢。”同时，丘吉尔严肃警告说：“不要以为这就是结局，这仅仅是算帐的开始，仅仅是呷第一杯酒，第一次尝到苦酒的滋味，除非我们竭尽全力重振士气和军威，再度崛起，一如往昔地坚持我们为自由而战的立场，否则，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一杯杯苦酒。”

果然，正如丘吉尔所料，希特勒欲壑难填。为换取暂时的和平，捷克野蛮地被宰割，正当英国上下有一股感到松了口气的巨大浪潮兴起的时候，1939年3月，希特勒撕毁了墨迹未干的慕尼黑协定，出兵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从此彻底破坏了中欧的政治稳定。完全应验了丘吉尔的话：慕尼黑协定是个骗局。

回顾这一时期的丘吉尔，确实是一位明察秋毫，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从希特勒执政时起，就看到了德国在一个特别残暴而冷酷的领导人统治下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从那一天起，他就竭力鼓吹英国政府应加强国防、积极防御，而不应消极躲避。显然，丘吉尔对战争的危险已预计到了，也找到了拯救国家的根本出路。

三、走投无路并非就是死期降临

有人讲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所谓走投无路也就并非一定死期降临，关键看你如何对待了。敦刻尔克，这个因二战而闻名的地方，曾使丘吉尔为她熬过了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他用自己超群的智慧、无所畏惧的勇气、坚定不移的决心和那极富感染力的演讲，给濒临灭亡的英国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请听他的声音：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和辛劳，眼泪和汗水都贡献给大家，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未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这就是丘吉尔。描写争霸欧洲战争的新西兰新闻界人士切斯特威尔莫特断言，德国的失败和欧洲的解放是从敦刻尔克开始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丘吉尔使历史在这里转了个弯。

1940年5月25日，希特勒试图在西部战线粉碎盟军的计划似乎就要大功告成：德军打通了从索姆河口到英吉利海峡这条长廊；占领了阿拉斯，又孤立加来，从而使这条长廊更加扩大。由于英法政府长期奉行绥靖政策，由于西欧盟军缺乏周密的配合和严格的训练，再加上战略战术上的保守、陈腐，面对德军的强大攻势，被从海峡各港湾逼到海岸线上的盟军，唯一的逃脱道路就剩下敦刻尔克和奥斯坦德了。盟军内部顷刻间分崩离析，英国准备登船撤退，法国则想停战谈判，比利时准备投降，而荷兰已经投降。盟军总司令韦刚将军曾力图从北侧向长廊的南侧进行反击，但没有成功。随后盟国又进行出击南方的准备，由于德军再次蜂涌杀来，不仅比利时军队会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敦刻尔克也将受到威胁，奥斯坦德更难守住，此时约有40万英法联军退缩到敦刻尔克一块很小的三角地带，陷入了重围，前面是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海，后面是得意忘形、如狼似虎的追兵，盟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这样下去，全军覆灭就是唯一的后果，因此，撤退，刻不容缓！5月28日拂晓，比利时国王投降，盟军的北侧就彻底暴露在德军打击之下，最后一线希望也丧失了，英军唯一的退路只剩下敦刻尔克港了。英国军队走到了生死关头。

精神是人生命的支柱。在这危急的、令人窒息的时刻，为了鼓舞士气，丘吉尔发布了令人振奋的紧急动员令：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如果政府中所有的同僚以及重要官员能站在国家利益上鼓舞他们周围的士气，首相将不胜感激；这不是说要缩小事态的严重性，而是要我们对我们的能力表示信心，我们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继续作战，直到把敌人企图统治整个欧洲的野心彻底粉碎为止。“不容许有法国单独媾和的想法，不过，无论大陆上发生了任何事情，我们也不能对我们应尽的职责有所怀疑，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保卫本岛、保卫帝国和我们的事业。”在援助敦刻尔克的紧张日子里，丘吉尔的战对内阁表现了坚强的团结。每个大臣都已下定决心，宁愿牺牲生命、家庭、财产也不愿屈膝投降，他们紧密围绕在首相身边，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巨大的凝聚力，似熊熊烈火点燃了整个英国国民战斗的决心。

丘吉尔随机又从海军调集船只，准备力量，积极为英国远征军和其他盟国军队可能撤出海峡上的各港口做好一切准备。一场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海军行动即将开始，为了避免英法之间在撤退中的任何误会，丘吉尔一再告诫英

法手拉着手撤走。撤退必须相互臂挽着臂合力进行。大战凝成了丘吉尔对法国的永久友谊。他熟悉法国的历史，敬仰法国的民族英雄，他对法国的军队充满信心，他把对法国的情感与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协调起来了，因为他知道，一个强大的法国对英国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在英国的军备力量远低于德国的那个时期，丘吉尔就看到了只有大大加强英法两国的合作，才能拯救英国。他曾用他杰出的辩才去说服他的同胞们：“英法两国是通过不同途径找到自由之路的，但是当它们决心投身于共同事业时，任何针对他们的挑衅都是危险的，想要打倒他们也将十分困难。”这个拥有纳尔逊舰队和拿破仑军队光荣传统的两国人民的联盟决不是好对付的。如果在这些军队品德之外，再加上两国在正义和自由方面的崇高思想，那么他们将所向无敌。丘吉尔要求非战斗人员立即开始渡过海峡前往英国，并下令让未受伤的士兵先于伤员撤走，以确保能尽快在英国组成新的部队。下这道令时，首相神情相当沮丧，战争是残酷无情的。

由于狂傲自大的希特勒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忽略了歼灭敌野战军，于是给了盟军一个意外但却至关重要的喘息机会。他们迅速加强了自己的防务，远征军戈特将军部署了三个步兵师，可以在重炮配合下抵抗德军进攻。他们一边抵御，一边开始跳进海里撤退，这些深请水性的英国士兵在没有任何设备辅佐的情况下，竟然绝处逢生。

5月26日，英国海军部根据丘吉尔的指示发出通知，开始执行大撤退计划。于是由800多艘各种类型、各种动力的船只编成了浩浩荡荡的运输大军，从巡洋舰、驱逐舰到小帆船都集中到了敦刻尔克。英国海军根据丘吉尔的命令放手发动群众，号召沿海船民积极参加营救行动，凡是有船的人，无论是汽船或帆船，都开往敦刻尔克，甚至海军部地图室主任海军上校皮姆和他的两三个同事也驾驶了一艘荷兰小船，4天内运送了800多人。6月2日夜，陆军大臣艾登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宣布，英军的五分之四已脱离虎口，撤回本国。这一宣布打破了柏林电台从5月23日起几乎每晚都吹嘘的已把英军围歼的神话。

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了，虽然代价是巨大的，但它毕竟挽救了英国军队，使濒临绝境的英国又找到了一丝新的生机，更坚定了丘吉尔抗战下去的决心，敦刻尔克的奇迹将载入英国史册。

四、坚固国防争取民心

1940年6月22日，法国政府同德国纳粹签订了停战协定，英国成了孤家寡人，处境险恶，只能是以斗争求生存。丘吉尔坚信，在法国被击败之后，英国凭借众多岛屿的有利地形，从失败的痛苦和致命的威胁中将产生出一种不亚于德国的民族果敢精神。他决心点燃人们心中的希望，他立志要带领英国人民继续坚持抗德斗争，鞠躬尽瘁，在所不惜。这是丘吉尔一生辉煌的开始。

严峻的现实，丘吉尔陷入了沉思。连续得胜的纳粹军队处于明显的战略优势：它们的装备充分而且完善，后方还有在战场上不断缴获的武器和兵工厂作后盾，正杀气腾腾准备毁灭英国。意大利已经向英国宣战，在西班牙、在法国都存在着随时与英国宣战的危险。显然，英国已处在法西斯势力围困之中。

英国人民虽然在精神上具备了坚定的斗争决心和高昂的战斗气势，但在战略上还需要渡过一段艰苦时期。丘吉尔深知，在武器装备方面，英伦三岛的陆军，除了步枪以外，其他武器一概没有；全国所有的各种类型的野炮还不足500门；中型、重型的坦克不到200辆；敦刻尔克大撤退，又使他们损失了很多武器。而这一切将意味着什么？英国如何将这些弱点转移？丘吉尔认为，英国是一个岛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着他独特的军事技术上的有利条件，那就是充实海防线。历史上，以炮舰政策开拓了殖民地的大英帝国，就是凭着它的船坚炮利一度占据了海上霸主的地位。现在，还必须利用海军来抵抗入侵者。虽然英国在陆军方面装备落后，但英国的海军实力是不容置疑的。德国虽然在陆军作战方面优于英国，但希特勒并未把海军建设放在优先地位，建造多艘大型军舰不是几个月就能办到的，至少要花费几年功夫。显然英德在军事方面相比，英国的优势在军舰。丘吉尔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找到了克敌致胜的法宝。这也是丘吉尔经历了多年在野风波之后，欣然同意重返海军部的原因所在。英国的海军就是英国的国防象征。

早在1939年9月，丘吉尔就提出了一份报告，说明了建立商船护航制度，武装商船以便自卫，以及实际击沉德国潜艇的情况。虽然到任不久，丘吉尔就亲自视察了英国沿海各基地，看到的军舰大多是在一战期间或在此之前建造的。但在这篇报告中丘吉尔使用了明确有力的措词，显示了充分的信心，他把反德国潜艇的这场斗争看成是一场残酷的、大规模的和艰苦的搜索与驱逐战、伏击与计谋战，以及科学与航海技术战。这篇报告赢得众多的赞誉，人们称它是一篇“坚定有力的声明”，一篇“罕见有力的演说”，是一位战斗大臣发表的一篇战斗演说。这对于战争时期这个国家和人民来说，是一剂强有力的和合平时宜的滋补药。很明显，报告让人民看到这场战争应如何打。丘吉尔重视海军要迅速建立一支能战胜德国舰队的英国舰队，这个想法早在1911年他出任海军大臣时，已经提出了。他始终不渝努力实现这一目的，在他的眼里，英国国民对海洋有着特殊的感情，那蓝色挚诚的大海是英国和平的防护网，关系着英国本身的生死存亡。

重视海军并不等于放弃陆军。丘吉尔这时期亲自带领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人员去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视察。他重点视察了太恩河和恒伯河以及敌人可能登陆的地区，检查了哈里奇和多佛尔的登陆防御工事，并写了几份备忘录，要求提供重炮，用以轰击法国沿海地区。他还视察了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第

三师和南方前沿指挥部，他敦促蒙哥马利允准征用公共汽车，以增加他的部队机动能力。丘吉尔特别担心德国坦克部队的登陆，因为这将击中英国的要害：英国几乎没有任何反坦克炮或反坦克弹药，甚至没有普通的野炮。一次，丘吉尔巡视靠近多佛尔的圣马加里特湾的海滩时，得到报告说：一个旅守卫着长达四五英里的危险极大的海岸线，依靠的武器只是三门反坦克炮，每门炮只有6发炮弹，也就是说依靠这18发炮弹固守。当旅长提出是否给士兵一次演习的机会时，丘吉尔面对窘迫的现实只能说，我们无法提供演习炮弹，即使真的打起仗来，也须等到最后一刻，在最近的射程内才可以开炮。

通过实地考察，丘吉尔再次亲身体会到英国的军备充实，迫在眉睫。他要求军需大臣莫里森排除困难，火速生产反坦克炮和其它各种常规武器，来尽快武装正规军和国民自卫军，以解前线弹药缺乏的燃眉之急；他要求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力争每月生产不少于1000架军用飞机，并尽快设计生产出自动轰炸瞄准器、低空无线电定向装置和空中截击机等新式武器，加强空中防务能力。他还要求海军部，至少把50名经过训练或经过部分训练的驾驶员暂时调到空战司令部。

除此之外，丘吉尔知道，战争除了常规武器和人力之外，获胜的另一关键因素在于秘密武器，这是杀敌获胜的一条捷径。因此，他决定亲自领导杰弗里少校在怀特丘奇建立新式武器实验场，专门研究最新战斗武器。杰弗里曾在1939年成功地研制了漂浮水雷，在实践中立下战功，如今，他们又在进行新的研究，制造一种可以向坦克车投掷的炸弹。当这种炸弹从窗口投出时，它会粘在坦克车上，特别是当爆炸性极强的炸药接触钢板爆炸时，特别厉害。丘吉尔对此很感兴趣，并建议在这一基础上再研究出能以来复枪射击坦克的投射弹（类似枪榴弹），或者用于坦克枪射击坦克的炸弹（类似迫击炮弹）等等，丘吉尔已显得迫不急待。6月25日，本土部队总司令艾恩赛德将他的作战计划送交总参谋部，该计划内容要点是：第一，在敌人可能进犯的沿海海滩上修筑“覆盖式”战壕，由定点兵力和机动兵力协同作战；第二，建立一条穿过英国东部中心的反坦克障碍线，由国民自卫军防守来确保伦敦和大工业中心不受敌装甲车侵犯；第三，在反坦克障碍线后是进行大反攻的主力后备军。从以上内容中不难看出当时英国的战略主要是防御思想。同时，丘吉尔认为一味的防御很可能会丢掉英国自己的优势，而使德国优势充分体现。这么一来，英国的被动性就大得多了。因此，“如果德国能不顾我们的海军力量，轻而易举地进犯英国，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办法对待他们呢？”丘吉尔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建造大批坦克登陆艇，组织若干分遣队，出敌不意去攻占敌人占领区，以摆脱英国在心理和精神上屈服于敌人的困境，争取主动权。

经过两个来月的紧张备战，工作有了成效。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进入战时内阁后，铁面无私地工作，并成功地增加了战斗机司令部手中掌握的飞机数量。“喷火式”、“旋风式”战斗机在敦刻尔克撤退后总共才331架，这时已增加到620架；后备飞机的数量从36架增加到289架，海军也将大部分驱逐舰从执行护航任务中抽调回来，以便组成突袭队对付德国入侵；在各个入海口都布置了水雷，并在有可能登陆的海滩设置了障碍；构筑坚固的防线，挖掘反坦克壕沟，修建混凝土掩体。所有这些再加上正规军的组建和整编以及上百万的国民自卫军的建立，丘吉尔的努力正在使英国的国防日益加强。丘吉尔本人的威信也得到了提高，正如《星期日泰晤士报》所描写的：

“丘吉尔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感到无比幸福。今天，温斯顿·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对他都无比信任！”

动员全民参战，使所有的英国人在危险的时候都能豁出自己的性命去决一死战，去用暴力回击暴力，才能保卫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因此，在英国本土防御问题上，丘吉尔除了加强正规国防力量之外，号召全民皆兵，保家卫国。在英国各党派各团体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下，全国很快组织了 150 万人的“国民自卫军”。在这神圣的时刻，所有的英国人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出现了一幕幕感人的生动场面：前方有正规军严阵以待，后方的人们紧张、忙碌的战斗在工厂里、机器旁，他们一直干到实在挺不住了，昏倒在地被迫离开，而他们的岗位则马上会被另外提前上班的人接替。人们拼命的工作，唯一的愿望是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全部，这时的英国从上至下，从战时内阁到政府，拧成一股绳，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局面，对战胜法西斯充满了信心。丘吉尔讲，没有别的事能使英国人这么团结一致了，因为 1000 多年来，英国从未遭受过侵略，因此面对敌人的入侵，广大人民下定决心要打赢这场战争，甚至不惜任何代价，包括自己宝贵的生命。丘吉尔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激励着英国人民广泛地投入到这场卫国战争中，到 1940 年 8 月 20 日，已经有 200 万人手中有了步枪和刺刀，其中四分之三的人被编入正规的军事组织。国民自卫军，有的持步枪，有的拿着棍棒全副武装。群众为了更及时的通报敌情，他们自动报名参加对空监视组织，用望远镜和步话机配合雷达监测敌情，人数竟达 5 万之众。

战争开始后，德国的飞机对英国狂轰滥炸。丘吉尔懂得，国家元首要在这个时刻与人民站在一起。为了全面了解战争的破坏，安抚国民，他这时期经常对某些受到伤亡的场合进行视察，体恤民情。有一次，他迅速赶到伦敦港船坞的一个出事现场，敌人的炸弹把这个地区炸出了大片空地，他看到伤亡的悲惨场面和当地群众对他发自内心的热情时，难以抑制自己，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当时与丘吉尔一起去的伊斯梅后来写道：“他们哭喊道：‘好心的老温尼，我们想你是会来看我们的，我们能够经受得住，给敌人狠狠的回击’。”丘吉尔听到了人民的心声，他失声痛哭。在人群中，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首相真关心我们，他哭了。”丘吉尔镇定了一下情绪说：“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

目睹了受灾的现场，丘吉尔和他的大臣们心情沉重：他们的人民将如何渡过这段艰苦岁月？在和财政大臣商量后，丘吉尔做出了一项原则性的决定：凡因敌人轰炸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政府承担，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这样一来，负担便不致于单独落在那些受害者身上了，而是由全体英国人民平均负担。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一周之后，政府出台了一个战争保险方案。这项方案对动员全民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此丘吉尔是这样解释的：当我在巡视战争的损失时，看到了一个英国人的凄惨景象，他的房屋和赖以生活的小店铺被敌人炸毁。看到我们没有竭力设法使这种负担由大家分摊，从而使我们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时候，我感到莫大的痛苦。由于敌人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损害，与其它任何种类的损失或损害都有所不同。因为国家负有保卫全国臣民和纳税人的生命财产使之不受外来侵袭的任务。如果我们能够进行这样一个计划，对每一个由于战争的炮火而遭受损失的人给予全部或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保险的话，这表明了我们有信心帮助人民渡过难关，而人

民也将齐心协力与政府打击入侵者。

丘吉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关键的时刻抓住了民心，他坚信只有取得民心，才能巩固政权，才能在非常时期经受住炮火的袭击和考验。

五、不遗余力说服美国尽相助

战争在继续，英国的处境越来越糟。正如丘吉尔所料，由于法国政府已陷入危险，法兰西之战，现已宣告结束。那么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因此，让我们勇敢地承担我们的责任以便在英帝国和它的联邦存在 1000 年之后，人们也可以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为了对付德国，拯救英国，丘吉尔认为对内要迅速地、大规模地把英国重新武装起来，对外则应建立国际联盟，尽力争取可能多的国家参加，以英法两国为核心，反对潜在的、现实的侵略者。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欧洲的军事霸主德国是一伙洋洋得意的亡命之徒，穷凶极恶，因此，首先争取的盟友必须要有足够的实力对德国抗衡甚至超过它的实力。当时具备这样条件的只有美国和苏联。在丘吉尔心目中，美国的重要性变得愈来愈明显了。他认为，没有美国的援助，英国即使能在入侵中生存下来，也无论如何难以打赢这场战争。丘吉尔决定劝说美国人，说服他们应意识到危险所在，并给予英国遇到的困难进行援助。这是件难度很大的事情，但丘吉尔很自信，唯有他有资格劝说美国人，如同唯有他才有资格与希特勒抗衡一样。

希特勒的炮火震毁了英国的建筑，也震撼出美国人丰富的感情波澜。虽然自实现了敦刻尔克撤退之后，英国加紧战备工作，海陆空立体战备部署也初具成效，但在对付德国空袭时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很严重的。这对于美国在感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丘吉尔在细心的观察着：美国罗斯福总统在 5 月间表示，假如英国一些有名的地区遭到轰炸，美国将要参战；6 月，罗斯福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意大利的参战意味着“在他的邻居的后背捅刀子”。这表明德国入侵英国能否成功，罗斯福已不能等闲视之。危险所在，总统一方面表示同情，支援盟国，一方面重整自己的军备，但此时美国尚未对德宣战。

丘吉尔决定先设法与罗斯福沟通。他以“前海军人员”的名义与罗斯福通信，开始个人联系，而且十分密切，努力奠定合作的感情基础。早在 5 月中旬，丘吉尔向罗斯福提出请求，让美国向英国提供 40 艘到 50 艘老式驱逐舰，以补充英国海军实力。意大利向英国宣战后，英国首相于 6 月 11 日再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借用 50 艘旧式老驱逐舰的问题，罗斯福一时还难以对此做出肯定答复。原因很简单，英国已元气大伤，抗战前途渺茫，这是美国政界当时的基本观点。为此，丘吉尔通过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勋爵，开始了不懈的说服工作。他把自己的观点用电报告知了洛西恩，电文中丘吉尔精辟的分析了形势，并指出这一问题的利害：……如果英国沦陷，一个亲德的政府交出英国舰队，就可从德国取得远为宽大的条件，而德国也因此壮大了实力和日本成为新世界的主人。英王陛下目前的顾问们决不会作这种怯懦的事，可是如果成立一个吉斯林式的傀儡政府，他们则会这样做，而已，或许他们也只能这么做。这等于告诉美国，别想坐收渔翁之利，幻想在英国失败后，再出来捡便宜。美国应看到他们所冒的危险是十分可怕的：那时他们的海军力量将被敌人的海军完全压倒，他们的海军基地、美国的岛屿也将被纳粹夺去。如果英国失败，美国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希特勒就可获得一个征服全世界的大好机会。这是丘吉尔通过他的驻美官贝向美国传达的主要思想，结果引起美国上层的注意。7 月末丘吉尔致电罗斯福，亲自再谈租借一事，电报说，自从我上次冒昧以个人名义给你拍发电报以来，已经有一些时候了，这中间曾发生过许多事情，现在已到了非常急迫的时候，请你答应我们的请求，我

们需要驱逐舰、汽艇、飞艇，法国海岸已全部沦陷，德国的飞机以此为基地轰炸我们的商船和运粮船；我们的海军还必须做好准备，迎战来自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还要应付从挪威向爱尔兰、冰岛等地的袭击；我们将尽全力控制地中海，从而制止战火向非洲蔓延。虽然我们正在建造大批驱逐舰和驱潜舰，不过单靠自己造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增援，否则战争便将由于次要的而且是容易弥补的因素而遭到失败。丘吉尔客观、坦率地将英国目前的处境和危险告诉了罗斯福，并着重指出：总统先生，我怀着崇高的敬意向您说明，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上，这是目前当务之急的一件事。我深信您将不会让我们因为缺乏这些驱逐舰而难以渡过战争难关。随后，为了促使罗斯福尽快下决心，丘吉尔又提出愿意将在西印度群岛、百慕大以及纽芬兰的海空基地，租借给美国，为期 99 年。这等于告诉美国，英国不是白要，而美国在现在和将来都会因此而受益匪浅。丘吉尔对此的解释是：把英国拥有的一些基地租让给美国，这将会使我们能够迅速获得驱逐舰和飞艇……要紧的是迅速解决，现在正是我们急需驱逐舰的时候，一到我们手里，不出十天，我们就能给它们装上潜艇探测器来对付德国潜艇，我们也应当预备一些潜艇探测器交给美国海军，帮助他们安装，教会他们操作。罗斯福终于决定用停泊在东部海岸各海军船坞中的 50 艘经过修理的旧驱逐舰交换英国在印申群岛的一系列基地。

这样，丘吉尔获得了战略武器，罗斯福得到了战略基地，但对英国来讲，这项协议最重要的意义并非是战场上的实际价值，而是它使美国在战争中所承诺的援助英国的义务，达到了在此之前所不能想象的程度。美国将武器移交给英国，这一事实标志着美国已从中立国转为非交战国。这一态度的转变，对于英国甚至整个战争的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丘吉尔说，这将意味着英语世界的两大民主国家，大英帝国和美国，为了相互的共同利益，在它们的某些事务中将彼此结合起来。我个人觉得，瞻望未来，这种措施没有什么可耽心的，即使我想制止也制止不了，没有人能够制止这么作，和密西西比河一样，它将滚滚奔流。让它奔流吧！这势不可挡的温暖的滚滚洪流奔腾向前，一直流到更广阔的原野和更美好的日子。

美国仅用了 50 艘既旧又低效的驱逐舰换取了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一片海军基地，并因此获得战略上的安全保障，这似乎是一笔不等价的交易，丘吉尔对此还十分满意，他是如何想的呢？

英国随着战争的继续，创伤累累，难以孤军奋战，争取援军是当务之急。而入侵的威胁以及在英吉利海峡对大量舰只的需要，使英国刻不容缓地、十万火急地需要美国的驱逐舰。为加速实现英国这一愿望，丘吉尔决定用租让海空基地的办法去换取驱逐舰，实践证明，这一非同凡响的举措，使美国准备并开始走近英国。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这一系列基地曾经是从欧洲或从英国进攻美洲的重要海上跳板，现在加上空军的威力，这些基地对美洲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作为美国来讲，能控制这里就等于加长了国境，而代价仅仅是用过了时的有毛病的旧军舰，何乐而不为？再说英国一旦失败于军舰不足，则这些基地只能拱手让敌，到不如用这些地方去换取英国的胜利，更何况这只是暂时的失去。基于此，丘吉尔对未来充满信心。

获取军舰援助远远不够，英国还急需扩建步兵师，新建装甲师，并且要生产大批的飞机、坦克、军舰以及各种轻重武器，用于武装新建的部队和数以百万计的国民自卫军，正所谓前线急需武器，人民急需武装。而这些仅靠

国内的日夜生产是远不够的，还必须仰赖于美国的慷慨援助。丘吉尔再次施展出他的外交才华。当时正值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开始，罗斯福能否连任，丘吉尔比美国人还焦急，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新上台的人能具有或在短期内取得罗斯福那样的知识和经验，谁也不会有他那样的指挥才能。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和他的关系，是经我极其小心谨慎地建立起来的，而且似已达到了推心置腹的亲密无间的程度，在我的全部思想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要结束这种慢慢建立起来的友谊，要中断我们正在进行的种种商谈，去同一个在思想状况和个性上都陌生的人从头开始交往，这对于我不是件快意的事，自从敦刻尔克之后，我还没有感到过这样的焦灼不安。结果，由于罗斯福的再次当选，丘吉尔欣喜若狂，这意味着他说服美国支援英国的工作难度大大降低了。他给罗斯福发了贺电：“我们正面临着—场旷日持久、日益扩大的战争的阴暗局面，我盼望能够本着我在战争爆发时供职于海军部时，就在我们两人之间建立起相互依赖和以诚相见的精神同你交换意见，事情正在发展，只要地球的任何—个角落还有说英语的人，都不会对此事置若罔闻。在我因美国人民再次把这付艰巨的重担托付给你而深感欣慰的时候，必须在此表示我这一坚定的信念：我们循着智慧的光芒的航行，必将平安地到达目的地。”这段贺电表明了丘吉尔当时的迫切心境，与其说它是丘吉尔对罗斯福再任的祝贺，不如确切地说它是丘吉尔发给罗斯福的合作倡议书。

战争使英国需要军事援助，也需要财政援助，英国在参战初期所拥有的45亿美元的资产损失殆尽，而仅靠南非的金矿开采和大量出口商品难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这使丘吉尔左右为难：—方面，迫切需要向美国订购军火；另—方面，又害怕因此而使英国美元储备消耗光。这处境如同置身于—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口粮不足，应尽量靠这有限的口粮多维持几天。权衡再三，丘吉尔认为削减军人订单将铸成大错，只能选择不惜—切代价，尽快结束战争这条路。为了战争，丘吉尔甚至想用“征收结婚戒指和其它金首饰”的办法去刺激、感化美国。他采取了—个比较简单但绝非轻易采取的政策，正如他所讲的，“我们尽可能地订购—切物资，而把未来的财政问题交给永生的上帝去解决”。大敌当前，生死存亡关键时刻，死抱着美元不放，是最愚蠢的。丘吉尔又给罗斯福写了—封言词恳切的长信，信中说明了他对战争形势的看法，请求对英国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其中包括财政援助。信中写道：“这个时刻临近了，这就是我们将不能再用现钱来购买舰船和其它军需品，当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减少不必要的亏空，以便通过交换来获得支付手段。我相信您会同意下述说法原则上是错误的，并在实际效果上对我们双方都是没有好处的，即在这场战争的高潮中，如果大英帝国所有可变卖的财产都被剥夺得—十二净，结果当我们目鲜血赢得胜利之后，文明得到了拯救，而同时又为美国进行充分的武装以对抗—切不测事件赢得了时间，而我们将会被剥得精光，赤条条地站着。”

罗斯福对此陷入了沉思。战争使美国舆论界起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已同英国的命运紧紧联在了一起，全美上下掀起了—个“同情和钦佩英国的巨大浪潮”。总统决定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他的观点，这就是要把那种“糊涂的、愚蠢的、古老的美元符号”撇在—边。罗斯福打了—个比喻说，如果我家邻居的房子着了火，而我在离他四五百英尺远的地方有—条水龙带，如果他能拿我这浇水用的水龙带接在他的水龙头上，那么，我就可以帮他把火扑灭，而不要讨价还价。在把火扑灭之后，我把水龙带拿回来就是了。英国无

需自己出资在美国建造船只，也无需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来达到这一目的，值此非常时期，我们没有理由不把造好的船只租借给他们使用。并谈到美国将充当“民主国兵工厂”的角色。美国终于提出了著名的“租借法案”，它在1941年3月由国会通过。对此，斯大林、丘吉尔和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领导人给予了高度评价。丘吉尔说，这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是最光明磊落的行为。法案一通过就马上改变了英国的整个局面，它使我们能够通过协定而无拘无束地为我们的一切需要制定包罗万象的长期计划。没有规定偿付的条款，甚至连以美元或英镑计算的正式帐目也没有，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全是借的或租借的。因为我们对希特勒暴政的继续抵抗，被认为是和伟大的共和国休戚相关的。按照罗斯福的说法，今后决定美国武器去向的，不是美元而是美国的国防。丘吉尔正是用自己不懈的努力，说服了中立的美国，为英国赢得极为重要的一臂之力。

六、联苏抗德化宿敌为盟友

并非所有的战争都是靠战场上炮火打赢的，战时外交策略也是至关重要的。丘吉尔这个坚定的反共分子，面对英国极端危险的境况，采取了化宿敌为盟友、联苏抗德的统战政策。纳粹头子希特勒闪电般强占英伦三岛的计划未能得逞，便决定改变进攻战略，树立一个共产党苏联作为靶子，把反苏力量聚集在德国一方，先吃掉这块硬骨头，再回头踏平欧洲大陆。于是，便有了轰动世界的鲁道夫·赫斯独身驾机“访问”英国的事件。赫斯作为德国纳粹党的副领袖，很受希特勒器重，是希特勒智囊团一要员。此人自信力极强，他幻想独自飞往英国去完成联英抗苏计划，即说服英国停止对德敌对，而是英德联手抗击苏联。然而，纳粹低估了不愿同法西斯同流的英国人的决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丘吉尔坚定的反纳粹立场。英国很清楚，赫斯的和平建议无非是以英国听命于德国为条件的。不难设想，稳住英国是德国战胜苏联的第一步，而一旦德国获胜，英国的处境要么继续对德称臣，要么和苏联结局一样，被消灭掉。因此，英国上层是不会接受赫斯的建议的。由于三十年代后期，希特勒曾不止一次地愚弄过英国当权者，视其为己掌中物，因此，丘吉尔这次要报复希特勒，玩一把政治游戏。于是，首相虽拒绝了赫斯的诱降，但冒着被世界误解的风险，保持了沉默。要知道，很多国家对赫斯之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担心丘吉尔与希特勒勾结在一起。而这肯定会给英国坚持抗战的形象罩上一层阴影，也会损害临危受命的丘吉尔形象。但丘吉尔又做何打算呢？英国的《劳工月刊》在1941年写道：“丘吉尔和美国当局在实际上已经拒绝了赫斯的建议之后，为什么还神秘莫测地保持沉默？关于这个问题官方没有正式说明。这种沉默是否包含一种微妙的含义，就是暗示希特勒可以指望将来的某种支持，从而推动他去冒险。希特勒一旦真去冒险，则给他以坚决回击。是不是英国外交界的一位智囊人物想把赫斯当作一种飞出去仍然能飞回的武器，利用希特勒的反苏诱饵使他自己上钩？希特勒过去常常是这样戏弄英国统治阶级。”很显然，英国政府的沉默是要让希特勒造成这样的印象，就是他若进攻苏联不会出现两条战线作战的情况。用这种模糊策略，给对方一个错觉，走进自己所布的陷阱，这就是狡猾的丘吉尔。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向苏联发动进攻。为了进攻苏维埃国家，希特勒调动了本国战争机器的强大力量及其盟国的武装力量，丘吉尔对此欣喜若狂。他急切地盼望着苏德开战，如同在黑暗中企盼光明。他知道，英国只有在苏德开战的情况下才能争取到强大盟友，才有希望在对德作战中取得胜利，才能在美国站到官方面来之前坚持下来。丘吉尔毫不怀疑，英国必须依靠苏联方面的援助，确切地讲是战场上的军事援助。事实上，德军在进攻苏联前夕，在苏德边境上集结了190个师，其中包括精锐的坦克兵团，拥有3500辆坦克，5万门火炮和迫击炮，3900多架作战飞机。因此，苏德开战的消息传到英国，统治阶级有了一种“很难理解的……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这是希特勒赐予丘吉尔的礼物，也是丘吉尔长期以来获得的最好消息。

当然，多数英国军事领导人认为，俄国将经受不住“闪电战”的打击，它将遭到与法国一样的命运。丘吉尔本人也同样认为苏联不可能长期抵抗法西斯德国。但是，即使如此，丘吉尔还是认为，如果红军能坚持到冬季到来

之前，就将给英国人提供极为宝贵的喘息时机和准备。考虑到苏联在战场中的决定作用，丘吉尔第一个在苏德开战后发表援助苏联声明。6月22日上午，丘吉尔指示外交大臣艾登会见苏联大使迈斯基时表示，英国政府准备给苏联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并声明，由于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英国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更加加强其对德斗争。苏德开战后，这是丘吉尔公开表示了德国对英国诱降的回应态度。6月22日晚，丘吉尔在英国发表广播演讲，坚决声明，虽然英国政府对共产主义持否定态度，但在苏德战争中它将站在苏联一边。他说：“在过去的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话，但是，这一切和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我眼前看到的是俄国的士兵站在祖国的边境上捍卫着他们的祖先自古以来耕种的土地。我看到的是纳粹的战争机器——大批经过训练、头脑迟钝、唯命是从的残暴的德国士兵，像一群饿狼似的向他们扑去。我看到在这些德国士兵的背后，有一小撮策划、组织这场威胁人类的大恐怖的恶棍。我们大英帝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坚决消灭希特勒和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首相说：“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根据以上理由，我们将要对俄国以及俄国人民进行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切援助。”同时，丘吉尔承认英国和美国的命运将取决于苏德战场事件的发展。他强调，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只不过是企图进攻不列颠诸岛的前奏。丘吉尔接着说，毫无疑问，希特勒希望这一切行动，可以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他可以在美国的海空军干涉之前击败大不列颠。首相最后说：“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正如俄国人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一样。让我们吸取通过残酷的经验得来的教训吧！让我们加倍努力，只要一息尚存，力量还在，就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

丘吉尔此时的政治方针，是建立在对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的了解，和在当时条件下为实现这一利益所宜采取的最佳方案的基础上的。它反映出丘吉尔作为一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的气质和风度，以及灵活的政治外交家的艺术风采。联苏抗德策略的提出，是顽固敌视苏联的英国政治和丘吉尔本人政治活动中巨大的转折。这种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作法，使他的政治手腕日臻成熟的真实表现，也由此加重了丘吉尔在国际舞台上的份量。

事实上，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确给英国政府带来了明显的轻松感。著名工党评论家迈克尔·富特断言：“1941年6月22日以前，英国的胜利是梦想，而在这一天之后，英国的胜利已在预计之中。”美国的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写道：“德俄开战给了英国人一线希望，西方的国务活动家认为，整个战争的命运将取决于俄国抵抗德国侵略的准备情况和实力。”“1941年6月27日，苏联驻英国大使馆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部报告说，英国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其中包括丘吉尔首相，之所以感到轻松，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在英国有了“拥有恰好是英国本身缺少的强大陆军”的盟友，这就为战胜希特勒德国开拓了新的前景。

作为极端仇视共产主义的丘吉尔，当被问及，你这个共产党人的死敌，在对德战争中支持苏联是否违背原则这一敏感问题时，作了如下回答，他说，我这样做一点也不违背原则，我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消灭希特勒，这个目标使我的生活更加单纯了，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至少也要在下院发表一

篇同情魔王的声明。甚至在苏德开战的当天，丘吉尔的令人激昂奋进的演讲中，也没有忘记声明“纳粹制度具备共产主义一样的最坏特征……我以前说过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每一句话，至今毫不反悔”。这一声明，等于向世界宣布，与苏联合作并没有改变丘吉尔的政治原则——极端的反共立场，用丘吉尔本人的话来讲，这样做不是一个右和左的问题，这是一个正确或错误的问题。人们不仅要问，足谋多智的丘吉尔为什么要在这关键时刻，一再声明这一敏感主题呢？或许，他是在用这种办法取得帝国主义阵营中反共分子的支持，毕竟他是英国掌权者。有人讲，让德苏两国在战争中两败俱伤，战争后英国将成为欧洲局势的主宰者。但无论内幕如何令人费解，丘吉尔在关键时刻能够“联苏抗德”，表现出一个伟大国务活动家的远见卓识，而成为他一生的光辉杰作之一。

康拉德·阿登纳谋略

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出生于科隆市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青年时代先后就读于弗赖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法学和国民经济学。1917年出任科隆市市长。1933年因反纳粹被希特勒政府撤职，后又两度被捕下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应美国占领区军政府之请出山，重任科隆市长。1945年，他参与创建基督教民主联盟，并担任该党主席至1966年。1948～1949年任美、英、法占领区议会委员会主席，是联邦德国基本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1949～1963年任德意志联邦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长（1951～1955）。执政期间，他摒弃德国传统的以武力谋求生存空间的地缘政治理论，制定了经济富国战略，重用艾哈德等一批经济专家，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战后崩溃的西德经济在五六十年代持续高速增长，跃居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被誉为“经济奇迹”。为恢复德国的主权国地位，取得美国的支持，他在国际上奉行亲西方政策，使西德在1955年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主张建立欧洲合众国，积极推动西欧联合，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和西欧经济共同体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努力消除德法民族隔阂，谋求两国修好，于1963年同法国签订友好条约。他连续14年担任西德总理，在战后复兴西德的事业上功绩显赫，被认为是自俾斯麦以来德国最伟大的总理，开创了德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阿登纳时代。

一、填饱肚皮政策

1949年8月，在美、英、法三国军事占领下的原德国西部，即将正式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举行首届联邦议会选举。这是战后一直活跃于西德政坛上的两大政治力量——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较量，实际上也是控制这两大政治力量的两位铁腕人物阿登纳和舒马赫之间的一场殊死斗争。这场斗争将决定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根本性质。

康拉德·阿登纳，1876年出生于科隆一个天主教家庭，先后在弗赖堡、慕尼黑和波恩大学攻读法学和国民经济学，1917年出任科隆市市长，他的从政生涯因纳粹的上台而被打断。1933年希特勒视察科隆时，由于他不准纳粹分子在该市的桥上悬挂卐字旗，被撤去市长职务，后又两度被捕下狱。战后，应美国政府之请出山，重任科隆市长。此时，一个新的政党——基民盟——出现了，他被选为该党主席。在美、英、法把三个占领区合并建立统一的西德联邦时，他就任制宪议会议长，领导制定了基本法。

在本国同胞的心目中，阿登纳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笃信天主教，生活简朴、严谨，无论是公职生活还是私生活都洁白无瑕。他两次结婚，又两次丧偶，但这并未影响他成为一个多子女家庭的慈父。在战后年代，他首先是一个效忠于本民族的人。尽管他同盟国占领当局有长期密切合作的关系，但在人民心目中从未留下同外国勾结的卑劣形象。他在同盟国的全部公务关系中保持了一种超然气派，不是拍他们的马屁，而是经常盯住他们，索取让步，或要他们改变管制措施，使德国人的生活好过一点。他使用悄悄的幕后进行的施加压力的手法，迫使占领当局做出一次又一次看来不大而又实实在在的让步。在感到有把握时，他甚至敢于拒绝服从军事长官的命令，至少是不理睬这些命令，他讲起话来，总是准确简明，虽然并不刻意寻求公众喝彩的漂亮夸张的语汇，却能打动听众的心。他做事总是一心一意，使追随他的人深信他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恰当的。

站在阿登纳对立面的是库特·舒马赫，他同样是战后西德声名显赫的政治家。这位比他的对手年轻近20岁的社会民主党人，年轻时也曾攻读法学和国民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志愿兵走上前线，战争使他失去了一只胳膊，身上还留下了17块弹片。在1918年的德国11月革命中，他成为柏林工兵苏维埃的代表。在1930~1933年任国会议员期间，他同纳粹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被捕，关押在达豪集中营。1945年他从集中营出来时，身体非常虚弱，不仅牙齿脱落，视力下降，而且不得不把一条坏疽的腿截掉。他的光荣的反法西斯经历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深受他的党员和德国人的崇敬。战后，他重建了已有80年历史的社会民主党，并当选为党的主席。由于舒马赫是一个正直、诚实、廉洁的人，他在社民党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

舒马赫虽是一个残疾人，但他的政治信念毫不动摇，他坚信，在德国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是清白地登上政治舞台的，只有社会民主党代表德国前途的最美好的希望——一个在国内实行计划经济和国有化的强有力的联邦国家，在国际奉行不屈服于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极权主义的独立政策。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舒马赫的勇气，也没有人怀疑过他的节操和他对社会民主党事业的忠诚。他讲起话来依然言词锋利，咄咄逼人，人们一直记得1932年5月国会会

议上他对戈培尔的抨击：“整个纳粹运动只是对人类的渣滓有持久的吸引力”。战后，当共产党人以共产党和社民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兄弟为由建议两党合并时，他的回答尖酸而刻薄，他说：“是的，他们是兄弟，就像该隐和亚伯一样”。当阿登纳私下表示对盟国占领政策不满时，舒马赫却公然蔑视占领当局，骂他们是“傻瓜和恶棍”，尤其是激烈地批评美国人满口仁义道德，鼓吹要对德国人实行民主改造的说教。他的一些言论无疑招徕美军占领当局的忌恨，也失去了本来可以得到的共产党人的支持。不过，在许多德国民众的心目中，舒马赫却成了民族主义的斗士。

战后西德的形势，要求一个睿智贤明、品行端正、也是公认反对纳粹的人出来带领德国人民走出失败和绝望的深渊，恢复正常安定的生活，阿登纳和舒马赫这两位政治家似乎都具备这种资格。而且从大选前的民意测验看，舒马赫似乎还稍胜一筹。然而选举的结果却是阿登纳的基民盟获胜，舒马赫的社民党被迫成为在野党。阿登纳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善解民意，提出了一个深得人心的竞选纲领——“填饱肚皮政策”。

早在 1947 年举行的关于萨尔区归属的公民投票中，精明的阿登纳就发现，萨尔人是按他们肚皮的命令投票的。位于法德边界的这个面积 780 平方英里的工业区，由于有富饶的煤矿和密集的钢厂，长期以来一直是德国人和法国人争夺之地。它的国籍随着战争命运的变化而变化，虽然它的 100 万人口从种族上说是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萨尔从德国分离出来，被置于法国控制之下，直到 1935 年国际联盟举行公民投票为止。在那次投票中，90% 的萨尔人投票决定再做德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又一次取得萨尔的行政管理权。为使这件政治战利品合法化，法国人安排在 1947 年 9 月举行另一次公民投票，以便让萨尔获得一部宪法，永久与德国分离，并同法国结成经济联盟。投票前，法国人没有向萨尔人发出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的号召，要他们投民主的票。相反，法国人告诉萨尔人，他们可期待有一天能拿看法国护照旅行，脱离战败的贫穷的德国，如果他们投票赞成同法国结成经济联盟，他们的主要商业街道“不久就会像巴黎的爱丽舍田园大街一样繁荣”，法国将给萨尔人提供更多的食物，他们还可以使用有实际购买力的法郎。总之是向萨尔人描绘了一幅人人都能得到生活保障的美好图画。投票结果，80% 以上的人同意同法国结成经济联盟，在政治上与德国分离。

法国人的胜利证明，在萨尔这个法德两国世代冲突的战场，支配选举结果的因素是“填饱肚皮政策”，而不是民族主义。阿登纳深信，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这一因素仍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据此，他确定了以德国人真正关心的问题为基础的竞选纲领，向选民许诺，如果基民盟执政，政府将增加食物供应，为居民提供足够的住房，实行就业保险，保证通货稳定。

为了使选民相信基民盟能够兑现诺言，颇有心计的阿登纳还劝说从不参加党派活动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加入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该党的经济班子。艾哈德是巴伐利亚著名经济学家，此前曾担任美英双占区的经济部长，他在 1948 年实行货币改革，结束定量配给和取消工资与物价控制，已经初见成效，在国民中享有很高声望。人们认为，艾哈德参加选举，说明如果基民盟掌管政府，西德人的日常生活就有希望进一步得到改善。

同阿登纳相比，舒马赫的竞选宣传显得十分空洞乏力，他不断地发表感情冲动的演说，要求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他鼓吹一旦实行重工业国有化和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社民党政府，德国就会进入美好的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他猛烈抨击马歇尔计划、同西欧的合作、建立美英双占区政府等做法，主张走介于东西方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些活动同鲁尔河流域钢铁工人或煤矿工人的日常问题和心事几乎没有直接关系。他的党虽然号称工人政党，但他却从来不理解工人的思想和感情。人们从来看不到舒马赫到当地的酒馆去同普通工人一起喝一两杯酒，了解一下他们希望从社会生活中得到什么和他们心里想些什么，相反，他扮演的的是一个“老子最高明”的角色，他领导的是一群驯顺的、唯命是从的同事，当然，他的十分衰弱的身体也妨碍了他深入工人群众去了解他们的要求和愿望。

舒马赫在竞选中注意到了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但他所强调的只是诸如计划经济、国有化等经济制度问题，而并没有表明他能像阿登纳、艾哈德一样令人信服地解决吃饭问题。他反反复复地告诉选民说，这第一次全国选举给德国人民提供了“一个使德国大企业集团的残余丧失权力的独一无二的机会”，但这句过分夸张的漂亮言词却令选民迷惑不解。他尖刻地攻击艾哈德是“私人企业的肥大的宣传气球，里面充满了腐烂的东西放出的臭气”，但艾哈德却可以泰然自若地举出具体事例说明，由于他的政策，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得到一定改善，德国经济“又运转起来了”，因而得到公众的信任。

舒马赫对马歇尔计划的猛烈攻击也是重大的策略失误。根据这项计划，美国将向西德提供近 40 亿美元的资金和物资以恢复西德经济。由于美国的这项援助计划通过报刊和其它手段大事宣传。德国人都知道他们将从这项计划中得到好处，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像舒马赫那样对这种礼物吹毛求疵。1949 年 1 月，在巴黎出版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了法兰克福一位读者简短的来信。这封信最清楚地说明了在马歇尔计划全面执行后西德民众的普遍心情。这位读者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先生：如果一个人非有一个主子不可，那最好是一个富翁，而不是一个穷鬼。”舒马赫这位脱离实际的空想政治家显然没有注意到普通老百姓的这种见识。反过来说，这封信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阿登纳的“填饱肚皮政策”是深得人心的。

选举在 8 月 14 日举行，结果虽有点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却在阿登纳的预料之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得到的选票占 31%，居第一位，社会民主党 29.2%，其余票数落入一些小党派手里。随后，基民盟与几个右翼政党组成联合政府，阿登纳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总理宝座。

二、“经济高于一切”

自近代以来，德国曾经采取种种手段谋求实现其称霸欧洲大陆乃至世界的狂妄野心。先是俾斯麦雷厉风行地推行“铁血”对外政策，接着是威廉二世皇帝要求取得“阳光地带”，最后是希特勒咄咄逼人的地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在这数十年疾风暴雨般的日子里，历届德国政府都把地缘政治理论奉为圭臬。这个理论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一个国家的基本政策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特征决定的。德国地处中欧，人口稠密而资源相对贫乏，又有法、俄两强的东西夹击，它只有通过军事征服或政治策略来制服两邻，夺取足够多的土地，才能确保经济上自给自足，从而富国强兵，称霸欧洲。1941年希特勒制定的“巴巴罗莎计划”，即分兵三路进攻苏联的侵略计划，就是这一理论的产物，其目的是夺取俄国的产粮地带、高加索地区的油田和顿涅茨盆地的矿藏。

然而靠发动战争来谋求生存空间，并没有给德国人带来好结果，他们在短短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打输了两场世界大战。如今，在他们的被战争摧毁的城镇里，尘土和垃圾漫天飞扬；在拥挤不堪的医院里，数十万缺少止痛药使用的伤残人员在痛苦地呻吟；身穿黑色服装的妇女排着长队，等待着领取一份配给品；人们缺少取暖用的煤来抵御严寒，千百万人不得不挤在临时搭起的窝棚或防空洞里，过不上不受干扰的平静生活；储蓄和养老金失去了，能得到的补偿只是恶性膨胀、不值钱的帝国马克；由于经济生活陷于瘫痪，身强力壮的人也失去了工作和收入；最后，人们不得不面对一种惨淡的前景，即这种困苦的生活将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这一切，把“德国高于一切”的神秘魅力一扫而光，德国人不得不考虑新的标准和价值观念。

对年幼的西德共和国来说，它的运气特别好，因为它的政府掌握在一位合适的人物手中，他为德国人找到了一条新的生存道路。阿登纳出任战后西德第一任总理时已是73岁高龄的老人，但这并未妨碍他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他发现，那时的德国人几乎个个都患上了一种“安全综合症”，即像狂热病患者一样一心谋求生活中的安全感。在他们的心目中，日常生活必需品——头上的房子，桌子上的食物，炉子里的火，稳定的工作，一笔有实在购买力的货币收入——是最重要的，他们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渴望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不再重演，生活保障是他们的最大要求，这个问题支配着他们的一切感情、思维、职业选择、婚姻，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一发现给阿登纳的启示是：“经济高于一切”！在他此后连续14年的总理生涯中，它一直指引和支配着他的政府的政策。

为了实施他的“经济高于一切”的宫国战略，阿登纳组织了一个由专家组成的经济领导班子。这个班子中有三个人物为战后西德的经济作出了卓越贡献，值得一提。

一个是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的路德维希·艾哈德，他和阿登纳具有同样的信念，认为德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最好办法是发展经济，而不是采取军事或政治手段。德国的长处在于它的优越的工业能力，保障它的前途的办法就是制造用以占领世界各地出口市场的生产资料、消费品和劳务，而不是制造用以征服更多的生存空间的武器。他通过具体的经济政策把德国人的注意力集中于他们的战败并破产的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中，把他们的精力引导到恢复他们的住宅、工厂、发电厂、运输系统、商店和餐馆的一砖一瓦的实际工

作上。他免除了他们的赋税，以鼓励他们实现个人的修复和重建计划。

艾哈德对德国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为德国设计了一种符合国情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种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它强调市场经济是基础，坚持自由竞争原则，人们只能要么工作，要么挨饿。但是为了保证相对的社会公正与社会安全，国家又不能让经济生活完全放任自流，而要给予适当的调节，并给它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在推行这一体制的过程中，艾哈德主要采取了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通过行政机构和法律规范，保证自由竞争正常进行；二是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维持各种为整个经济生活正常运行所必须的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三是通过各种行情政策、增长政策、稳定政策和结构政策等，校正经济运转过程，以免经济大起大落和结构失词；四是干预分配和劳资关系，例如 1952 年议会通过了“平均负担法”，对因战争遭受损失的人进行补偿，其资金来自那些没有受过损失的人，这使战后相当突出的贫富对立得到了暂时缓和。在分配问题上，政府注意使工人的实际收入能不断有所提高，以保障劳资关系长期相安无事。上述措施，为联邦德国创造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国内环境，保证了经济能以较高的速度发展。

另一个是财政部长弗里茨·舍费尔，他被认为是阿登纳内阁中能力最强、效率最高的部长。他把平衡预算、防止通货膨胀作为自己的目标，上任后曾许下诺言：“只要我有一口气，通货膨胀就休想来到德国”。他紧紧盯住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凡是涉及减少收入或增加联邦开支的措施，不管多么重要，都肯定要招致财政部的批评。当时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他的精打细算的正统做法使自己不断卷入与同僚甚至阿登纳的争吵。但他毫不让步，并以西德宪法第 110 条支持自己，该条说，预算“在岁入和支出方面必须保持平衡”。作为财政部长，舍费尔不仅把开支完全控制在他的预算之内，而且年年有结余。到 1956 年，他已筹起了 60 亿马克的一笔相当可观的储备金，这笔钱是为出现困难时预备的。

第三个是担任联邦中央银行行长的威廉·福克，他同样是一个“守财奴”。他虽然说活柔和，但在运用手中权力阻止通货膨胀和控制物价时却毫不客气。如果他认为经济形势需要，他会无所畏惧地作出同政府的政策方针背道而驰的决定。他的这种独立思考和独立执行政策的作风，在五十年代初清楚地显现出来。当时由于世界市场钢材紧缺，鲁尔各炼钢厂的定货从 100 万吨急剧上升到 800 万吨，因此需要得到建设资金用以修复和扩充鲁尔的钢厂。但福克作为中央银行行长认为，投资规模突然扩大会引起通货膨胀，他坚决地采取了两个非常不受欢迎的预防措施：一是把商业银行必须拥有的最低现金储备提高 50%，以限制投资贷款；二是把贴现率从 4% 增加到 6%，以鼓励储蓄。他受到政界和企业界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他的紧缩信贷政策严重妨碍正受到全世界对钢铁需求刺激下的工业恢复。然而，两年以后的事实证明福克的确有先见之明：当英、法等国物价飞涨时，联邦德国的物价水平却大大下降了。

由于艾哈德、舍费尔和福克这个经济班子的努力，联邦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并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出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到 1958 年，中央银行积聚的黄金和美元已达 73 亿美元，德国马克一举成为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从而成为同美元和瑞士法郎并列的世界最坚挺的通货之一。

阿登纳善于用人，也善于抓时机。战后，盟国对德国工业的发展加上了

种种限制，但阿登纳正确地预计到，总有一天，西方盟国会有求于联邦德国，因为它拥有战后欧洲最大的一批熟练的产业工人和生产多种产品的潜在能力，一旦时机到来，德国就会重新成为工业大国。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机会到了。当时美国政府正着手搞一项耗资数十亿美元的计划，为在朝鲜作战的所谓“联合国军队”购买军需品和装备，世界钢材供应立即告急，制造军备和进行战争所必需的机床、电器、发动机、卡车、挖土机等重工业产品也严重缺乏。阿登纳认为，他在这个重要关头担任总理，有点像当一个出色的牧羊人，负责把羊群带领出荒原，走向绿油油的草地。他不失时机地通过谈判，把盟国对德国工业所加的控制一个接一个去掉了；同时政府相应制定了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阿登纳的努力，在造船业方面取得的效果尤为突出。

1945年初，盟国的空袭几乎完全摧毁了德国的造船工业，最大的汉堡港百分之十的港口设施和造船厂变成废墟，不来梅、埃姆登、吕贝克、基尔和其他西德造船中心也悉遭破坏，此外，盟国还禁止德国人再建造大型商船和任何舰艇。而德国战前拥有的440万吨商船，战后只剩下3.5万吨，它再也不是一个海上强国。朝鲜战争爆发后，盟国当局取消对德国商船制造的限制，潮水般的定单随之涌进德国造船厂，要求建造的新油轮和新货轮达200多万吨。这极大鼓励了德国人加快修复被战争破坏的造船厂和港口的工作。战争期间被炸沉在汉堡港的2800多艘轮船的残骸现在成了一笔财产，有24艘货船被打捞上来修复后重新使用，另一些残骸被按照废铁价出售。到1953年，这个港口已基本修复，造船工业蓬勃发展起来。为了鼓励人们把更多的钱投入造船业，阿登纳政府制定了著名的第“七—D”税则，它规定，任何一个德人在船运和造船业投资的钱都可获得免税待遇。到1953年，这项税则已经吸引了在造船业投资的20亿马克中的15亿。到1958年，德国人在造船业方面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日本，而到六十年代，联邦德国已拥有一支由2700多艘轮船组成的商船队，总吨位达450万吨。

阿登纳的经济强国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经过战后一代人的努力，德国重新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国之一。在改弦易辙的情况下，这个国家有了供它扩张的无限的“生存空间”，依靠它的数以百万计的大众牌汽车、机床、机车、重型工业设备、机械、发动机等出口物资，它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企业桥头堡，这些桥头堡比希特勒的数百万军队在西欧、东欧和非洲进行的军事征服中建立的桥头堡更可靠、更持久。

三、双层政府

西德在战后很早就回到了世界舞台，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阿登纳创造的独特的政府体制，这种体制带来了普通内阁制所没有的行政高效率。实际上，这是一种双层政府体制：上层在年迈的总理、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首领阿登纳的掌管之下，主要负责国际和国内政治事务；下层在经济部长艾哈德的指挥下，依靠他的合作者财政部长弗里茨·舍费尔和联邦中央银行行长威廉福克的得力协助，负责处理西德的经济。

政治家不干涉经济事务，经济学家与财政专家们不参与政治事务，这就是设在寂静的大学城波恩的阿登纳政府的显著特色。不过，尽管有这种明显的分工，但是政府的两层对于重大的政策目标完全是一致的。它们各自的所有计划和活动都是致力于使这个战败和破产的国家重新在政治上受到尊敬，在经济上健康发展并拥有偿付能力。这种双重体制并非完全是阿登纳别出心裁，严格说来，他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波恩宪法第65条规定：一位部长在任时应奉行总理制定的“总政策方针”，但他同时应独立自主地处理本部的事务。阿登纳不过是在大权独揽的同时，给了他的部长们以较多的自主权利而已。

阿登纳牢牢抓住掌管和控制国内政治事务与西德外交的大权，仅仅是在经济工作影响到他的政府和他的基督教联盟的政治实力时，他才关心这方面的工作。作为一个被视为国际大家庭中弃儿的国家的总理，这位身材高大、表情严峻的莱茵兰人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向世界证明，一个新德国，一个同军国主义的、侵略成性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彻底决裂的德国是可以创建起来的。他确信，西德的经济事务掌握在艾哈德和他的同事这样一些可靠的人手里，他本人完全可以放手不管这方面的事情，而集中精力去处理德国的国际问题。同时，他心里也清楚，自己对多少有点深奥的经济学懂得不多，几乎是个门外汉，要是经济专家们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只能把事情弄糟，因此他对经济事务很少过问，而把管理经济的权力和责任完全文给了艾哈德。

73岁的阿登纳担任总理兼外长，挑起了繁重的工作重担。然而，凭着他的丰富的行政经验和资深履历，加上他那充沛的精力，这位政界元老却能游刃有余地驾驭他的新政府和政府中的相互冲突的思想和人物，他曾悄悄地对他的密友说：“我在本政府中掌管着百分之七十的事务”。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张，但波恩的上层人士不久就承认，他的确是一家之主，是政府这个家庭的公认家长。事实上，逐渐形成的制度被称为总理民主制，这显然是指在总理一人支配之下的民主政体。然而阿登纳能够、并且确实把权力和责任交给别人，但是只交给那几个参与经济管理的有才能和他信得过的人。

注意阿登纳的英国老资格观察家、《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特伦斯·普里蒂撰写了关于这位总理的详细传记《阿登纳——一个研究坚忍不拔精神的报告》，其中在有关他同他的内阁的关系部分这样写道：

这些关系的一个特点是，阿登纳完全愿意在有限的程度上分散权力。他在经济领域实际上授予路德维希·艾哈德以全权，艾哈德已经证明在这方面是极为成功的，而阿登纳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是外行，并且宁愿继续当外行。舍费尔在财政领域几乎同样握有全部权力。他还鼓励邮政部长、运输部长、住房部长、粮食部长、联邦议院事务部长、难民事务部长和马歇尔计划援助

部长继续干他们的工作，只给予最起码的指导。……把阿登纳描绘成一个样样事情都要插手的独断专行的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坦率地表示对许多政府职务不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去管。他非常信赖他的重要部长艾哈德、舍费尔和海涅曼（内政部长），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阿登纳放手让艾哈德等部长管理经济事务，并不是他与经济问题完全绝缘。事实上，他同西德企业界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联系，从而能够了解下层的真实情况。他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是科隆的罗伯特·普费尔德门格斯，此人是一个财大气粗的金融家，是萨尔·奥彭海姆银行的合股人，该银行同鲁尔区的重工业有密切的联系。普费尔德门格斯担任联邦议院的议员，在那里，他同总理保持着经常的接触，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和银行家，他对经济问题有比较独到的见解，他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看法，对阿登纳的观点可以起到补充作用。

阿登纳创造的双层政府体制使艾哈德的一个夙愿得以实现。这位胖乎乎乐呵呵的经济部长一直主张结束希特勒统治下实行的由政府指导和控制经济的做法，并为此做过许多努力，现在由于掌握了经济全权，可以大展宏图了。事实上，阿登纳还多走了几步，不仅他的政府不再控制经济生活，他自己也不干涉内阁部长对经济的管理。然而后来阿登纳开始对他失去对国家经济管理工作的控制表示不满。比如，1956年5月他在科隆的一次宴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那时他第一次对艾哈德、舍费尔和福克公开提出批评。他对福克的贴现政策、艾哈德的降低关税做法和舍费尔的复杂的所得税条款强烈表示不满，这些问题本应在秘密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提出讨论。这件事引起了一时的轰动，似乎他的双层体制就要结束。但是艾哈德毫不退让，他表示阿登纳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阿登纳在同这些专家的对抗中最终退却了。

阿登纳一方面加班加点处理政治和外交事务，另一方面对于国民经济实际上扮演一个在外地主的角色。他虽然不过问经济管理事务，不打扰他的“佃户”艾哈德、舍费尔和福克的具体工作，但却以政治红利的形式“收租”，这种红利随着西德的经济恢复的迅速加快而增加。在国内，无人能动摇他的政治地位，以致使他高踞总理宝座长达14年之久，成为德国历史上任职最长的一位总理，直到1963年才以87岁的高龄告老退休。在国际上，全世界的报纸对联邦德国令人惊异的经济恢复给予越来越多的注意，阿登纳个人的国际威望也日趋上升。1953年4月，他对华盛顿进行了他的第一次访问，在那里，他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欢迎，被当成一位朋友和潜在的盟友，这自然是美国出于对苏冷战的需要，但也反映出联邦德国国际地位的变化。1954年12月，阿登纳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当年的风云人物”。

五十年代末，德国报纸常常把阿登纳称为“俾斯麦以后最伟大的总理”。在德国人看来，这是至高无上的赞美了。但是这种赞美掩盖了这样一个简单事实：是艾哈德等人创造的欣欣向荣的经济，加上德国巨大的工业潜力，才使得阿登纳成为风云人物。如果说，阿登纳是站在联邦德国这艘航船的驾驶台的船长，自豪地把船开回国际舞台的港口，那么艾哈德就是甲板下面轮机舱中的火夫。他不断添煤，为产生蒸汽的熊熊炉火提供了足够的燃料，才使得这艘航船能够“全速前进”！

四、“欧洲是我的指路明星”

“欧洲是我的指路明星”，阿登纳常常对自己的知己这样说。这绝非仅仅是冠冕堂皇之词，事实上，正是由于高举欧洲的旗帜，这个自命为“欧洲色彩比德国色彩更浓的人”才把他的残缺不全、受人鄙视的国家领进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共同市场，成为今日欧洲联盟中重要的一员。

千百年来，生存在德意志这块土地上的日耳曼人一直梦想着“走出贫穷，夺取生存空间”，他们要成为欧洲的主人，要走向世界。1871年德国的统一又重新勾起德国人的这一古老梦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差不多所有的德国人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这场战争。然而4年之后，他们却尝到了战败的苦果，被带上了凡尔赛和约的沉重枷锁。德国人虽然感到难以忍受的屈辱，但也只能把仇恨深埋在心底。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民族复仇的种子开始萌发，德国这台可怕的战争机器又重新转动起来。它先是出兵莱茵非军事区，继而吞并奥地利和捷克，又悍然进攻波兰，终于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次德国又战败了，而且比上一次更惨，不仅被解除了武装，而且被四大国分区占领，以后又因冷战被分裂为东西两个德国。

历史不堪回首，但作为新西德的领导人又不得不回首、不反思。阿登纳深切感到，德国人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必须改弦易辙，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变——背离德国的历史和传统，摈弃民族主义，代之以新的欧洲主义。这个被遗弃的国家只有具有欧洲而不是德国色彩，才能在欧洲大家庭中获得一席之地。他明白，实现这个似乎远不可及的目标，将是一场艰难困苦的斗争，但朝其它方向走都是死胡同。

早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前，阿登纳就为他的国家的欧洲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在阿登纳担任双占区议长时，该议会为新的西德国家起草了一部宪法。在阿登纳的坚持下，新宪法包括了这样一项条款，明确授权联邦议会可“把最高权力移交给国际机构”，如拟议中的“欧洲合众国”。这是在波恩政府于1949年9月上任之前确定它的外交方向的基本决定之一。没有别的国家在法律上事先准备好在必要时把自己的一大部分最高权力交给超国家的机构和组织，联邦德国是唯一的一个，这表现了阿登纳的远见卓识。

但是，在民族国家存在的情况下，欧洲主义实行起来绝非易事。新政府刚刚成立，就遇到了一个现实的棘手问题——萨尔问题。众所周知，德法两国是世仇。二战后，为防止德国东山再起，法国一直奉行削弱德国的政策，这项政策取得的成果是，法国享有对萨尔的经济管理权和鲁尔煤钢的七国共管权。随着联邦德国的正式建立，美英决定放宽对德国的限制，这样一来，法国就要失去对萨尔的控制权和对鲁尔的部分控制权。为此，法国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与萨尔政府于1950年3月3日签订了使萨尔继续留在法国-萨尔经济联盟的协定。西德当然反对这个协定，为此，两国政府就萨尔问题多次谈判，均无结果，两国各执一词，情绪对立。法国指责西德复活民族主义，西德则指责法国时至今日仍不放弃肢解德国的打算。

为了打破僵局，1950年3月9日，阿登纳在和美国记者史密斯谈话时建议，作为解决两国分歧和走向欧洲统一的步骤，法国与德国之间应建立“一个完整的联盟”，即合并两国的经济，合并两国的议会，合并两个民族。这是一个大胆的构想，但也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幻想，以战胜国民族自居的法国人岂肯与令人憎恨的德国佬混在一起？他们甚至把建议看作是德国的阴谋，

法国《黎明报》就这样写道：这是“阿登纳想让欧洲围绕德国转”。

在两国全面联合建议被否定之后，阿登纳又提出了新的设想，在一次公开谈话中他说：“如果有那么一天，法国人和德国人能毫无争论地走进同一座大厦，坐到同一张桌前，一起工作，共同负责，那么事情就会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一切，将会在我们的思想中产生广泛的影响。法国有关安全方面的愿望将会得到满意，德国民族主义的梦想也将从此破灭”。这个想法得到了法国著名的欧洲联邦主义者、当时在法国政府中负责经济计划工作的让·莫内的衷心赞同。莫内认为，西德的复兴是不可避免的，鲁尔和萨尔问题之一定解决也是不可避免的，法国必须有万全之策；法国人担忧的是，德国一旦恢复了元气，就会进攻法国，反过来说，德国人也害怕法国坚持肢解德国；而“坐到同一张桌前”，“共同工作”，不失为解决矛盾的一个可行办法；只是这个设想太笼统，应进一步找到实现“共同工作”的具体途径。

经过莫内的精心筹划，在1950年5月9日的伦敦会议上，法国外长舒曼提出了一项建议，首先把法德两国的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共同的高级管理机构的领导之下，实行联合经营，以此作为走向欧洲统一的一个重大步骤。法国政府在提出这项计划时申明，首先由法德组成的煤钢联营，是向所有西欧国家开放的，它可能发展成为西欧大陆的经济共同体，也许会通向欧洲联邦。法国之所以提出法德在煤钢领域合作，是因为重整军备会首先在煤炭和钢铁生产中显露端倪的，如果建立起如舒曼计划提出的那种机构，那么两国中任何一国都能够及时觉察到重整军备的初步迹象，从而从政治上管束住德国，在经济上还能取得西德的煤和焦炭。

阿登纳当然明白法国的用心，但他看到借此西德就可同法国及其它参加煤钢联营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从而恢复自己的国际地位，同时也有利于西德产品打进欧洲市场，因而迅速做出反应，表示完全赞同舒曼计划。他对莫内说，“德国热情欢迎这项建议。如此的建议，本人已等了25年之久。”“我们知道，德国的命运是同西欧连在一起。”他甚至称赞舒曼计划是“法国及其外交部长舒曼对德国和欧洲问题所采取的一项宽宏大量的步骤”。

然而，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欢迎舒曼计划，社会民主党就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该党主席舒马赫宣传说：“德国人正在签订一项条约，使被占领的期限又延长了50年”。他攻击舒曼计划是“四K大拼盘”，并以此到处鼓动国民起来抵制。但阿登纳坚信西德广大人民群众是支持他同过去一刀两断的，因为过去的经历太痛苦了，他们会理解舒曼计划对于德国的重大政治意义的。他断言：“谁若是破坏、诽谤或中伤舒曼计划，谁就不是德国的好公民。”在阿登纳的有力反击下，社民党内部很快发生分化。该党一位年轻议员维利·勃兰特（他后来成为社民党主席，并担任了联邦德国总理）反问他们的领导人：“很久以来我们就竭力要求真正实现重工业欧洲化。难道我们今天还不应该为接近这一目标而感到高兴吗？因此，我们应该公正地对待法国的建议。”

在排除了国内阻力后，阿登纳开始选择德国的谈判代表。他多次征求莫内的意见，最后选定了法兰克福大学的一名教授。此人叫瓦尔特·哈尔斯坦，他有很高的文化教养，思路宽阔，理解力强，也是一个欧洲联邦主义者，法

“四K”即德语的 Kapitalism（资本主义）、Klerikalism（基督教主义）、Konservatism（保守主义）和 Kartels（卡特尔主义）的头一个子母。

国方面非常满意。阿登纳极善用人，对他来说，分析事物是次要的，确定欲达之目标是主要的，然后是决定为达到目标所应做的一切。他为哈尔斯坦确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成立一个西欧组织，至于怎样成立，通过什么途径，这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而是哈尔斯坦的工作。他对哈尔斯坦的充分信任，为法德两国共同创建西欧组织创造了良好条件。

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是外交家必备的基本素质，阿登纳在舒曼计划的谈判中充分展示了他这方面的才华。虽然他已表示西德欢迎舒曼计划，但对在未来的煤钢共同体中，西德是否会同其他国家享有同等权利仍不放心，为此他派经济部长艾哈德赴巴黎参加舒曼计划会议协定最后文本的讨论。艾哈德从他的自由主义经济观点出发，对协定文本中坚持继续使鲁尔工业非卡特化条款很不理解，认为这表明该计划的精神实质是要“把德国工业置于比其他竞争伙伴更不利的地位”，因此西德无法接受。但是，当莫内解释这是为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并不影响西德平等权利后，阿登纳当即表示同意接受盟国的反卡特计划，从而使悬而未决的协定文本得到最后解决。

1951年4月18日，参加煤钢共同体的法、德、意、荷、比、卢六国首脑在巴黎举行缔约签字仪式。法国政府对其他国家首脑的来临都给以隆重的外交礼遇，而当第一次出国访问的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走下飞机时，机场上却冷冷清清，甚至没有法国的一位部长在机场等候。但阿登纳并不计较这些细节，他充分理解法国政府的难处——国内依然存在强烈的反德情绪。他知道，作为战败国的首脑，要想使国家复兴，必须一步一步地走，必须忍辱负重，接受国际社会的冷眼和奚落。只要能为国家争回主权，他就满足了。

1952年，煤钢共同体条约正式生效，这份用荷兰纸张、德国墨水、法国印刷，由比、卢装订，饰有意大利飘带的文件，标志着西欧联合的开始。对德国来说，它还有一个特殊意义，那就是它意味着德国在经济上已取得了平等地位。阿登纳的欧洲主义外交政策终于迈开了第一步，以后他还要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现在，阿登纳作为联邦德国总理，“不仅是一个好德国人，而且是一个好欧洲人”，联邦德国则初步摆脱了战败国的屈辱，可以和共同体其他五国平起平坐了。1954年1月1日，阿登纳对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说了下面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当我作为一个被占领国的首脑同像艾登先生和皮杜尔先生这样的占领国领导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不禁露出一点儿微笑。尽管德国还没有充分的主权，但是人们完全感觉到它在世界事务中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五、借风行船重新武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军备受到了严格限制。为了取得军备平等地位，德国不惜同其它欧洲大国闹翻，最后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后退出了国际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同样是战败国，同样被剥夺了发展军备的权利。众所周知，对德国实行非军事化，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在二战期间就已确定的处理德国的主要原则之一，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第一次对德国人发表的宣言也表达了这一坚定不移的决心。然而不过 10 年，西德却堂而皇之地重新武装起来，并成为北约组织中的重要一员。这一鲜明对比，体现了阿登纳外交的特点，即善于借助外力达到自己的目的。

1947 年，国际风云剧变，随着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相继出笼，美国开始把对苏遏制放在它的外交战略的首位，东西冷战正式拉开了它的帷幕。不过此时美国的西欧盟国还没有跟上来，他们仍对德国怀有余悸，还在采取防范德国东山再起的措施。这年 5 月英法，两国签订的为期 50 年的敦刻尔克条约，就是一个完全针对德国的互助同盟条约。但几个月后，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西欧便和美国紧紧联系在一起，防止德国再起的问题在西欧主要国家逐渐退居次要地位。1948 年 3 月，英、法、荷、比、卢五国根据美国的要求，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该条约中虽仍有“防止德国侵略政策复活”之类的用语，但其主要矛头已指向了苏联，而不是德国。1949 年 4 月 4 日，布鲁塞尔条约又进一步扩大为北大西洋公约，西欧国家正式同美国结成了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

联邦德国成立后，西德重新武装问题便提上了日程。美国的反苏战略是以西欧为前哨基地的，而在西欧各国中，西德的地位尤其举足轻重。它有巨大的军事潜力，一旦重新武装起来，美国在欧洲就有了可靠的支柱。因此，美国非常希望西欧各国为西德重新武装开放绿灯。对于阿登纳来说，他当然希望他的国家能有发展军备的平等权利，因为这是国家主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他深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人们的头脑中记忆犹新，西德的重新武装必然会引起欧洲各国人民，尤其是法国人的强烈反对，如果急于实现这个目标，势必在欧洲成为众矢之的，因此他采取了极其审慎的态度。他表示：“我的国家血流得太多了，再也不愿意重新武装了。”直到 1949 年 12 月，他还说：“即便所有盟国都要求德国对西欧防务作出贡献，我也反对建立西德国防军。”可是他又立即补充道：“我所能考虑到的全部问题，仅仅是建立一支欧洲人统帅下的欧洲联邦范围内的德国自卫队。当然，这只能是作为一种特例”。后面这句话实际是放出了一个试探性气球。但是由于法国人的强烈反对，阿登纳的这些声明变得毫无意义。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法国意识到，重新武装西德势在必行，只是在具体方式和时间上有待商量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为了先发制人，提出了建立一支欧洲军的计划。它规定，西德在重新武装后，应将其所有军队分成很小的单位，全部交欧洲军统一调配，这样即使西德重新武装起来，也不会对法国造成任何威胁。

普利文计划提出后，阿登纳认为西德重新武装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该计划出自仇德情绪最厉害的法国之手，国际社会自然不会怪罪于西德。1951 年 1 月 7 日，阿登纳发表讲话，一方面对普利文计划表示欢迎，同时提出了

西德将来同西方进行军事合作的条件。他要求德国享有同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绝对平等的权利”，签署一项条约，保证一旦俄国人入侵，盟国就保卫西德，结束占领法规和盟国的监督管制，并在德国建立它的防御大量期间给予财政支持，最后，盟国不得采取一致行动阻止西德走向完全自主。

阿登纳之所以敢于提出这些条件，是因为他已经摸清了美国的底细。他同美国驻德国的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关系密切，几乎每天都保持着接触，后者经常向他说明五角大楼打算在北约联盟的范围内建立一支德国陆军的目标，并暗示美国政府准备为此付出代价。

阿登纳提出这些条件，也是要向他的同胞稍稍展示一下重新武装能够给西德带来的美好前景：早日结束盟国的军事占领，恢复德国主权，使德国人享有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但是这些设想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同一般老百姓每天不得不忍受的严峻现实相比，这些想法似乎是遥远的、无法实现的事情。每天早晨，当他们走出家门时，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片废墟和由此产生的灰心丧气情绪，这一切把他们对未来所抱的美好理想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时间的推移还不能使人们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景和它对幸存者的生活造成的破坏。德国人的心灵深处对这场战争和与战争有关的一切产生了普遍的恶感。民族主义失去了昔日的吸引力，连军国主义者也感到幻想破灭。提出重新武装，犹如在一个吊死者家中提到绳子一样，令他们恐惧和讨厌。人们清楚地记得，在战争的最后一时间里，原先在别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终于蔓延到了德国本土，炸弹和炮弹开始落在德国人的家园和工厂、发电厂、自来水管、下水道等设施上。希特勒和他的军队在鹿特丹、华沙、斯大林格勒、贝尔格莱德和整个欧洲进行的总体战得到恶报，德国的城镇乡村变成了一片瓦砾。战争结束时，人们没有像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那样欢迎这场战争之后幸存下来的 250 万德军士兵。军人地位一落千丈，他们和普通老百姓一道高喊“我不参加”的流行口号，普遍反对重新武装德国。

阿登纳讲话后，在国内立即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政治势力的夹击。社会民主党以及拥有 600 万之众的工会组织认为，组织欧洲军不过是要德国军队充当“法国用以镇守殖民地的外籍兵团”，主张西德在冷战中奉行类似瑞典人的中立政策。以勒尔为代表的右翼政治力量则抗议“把德意志民族当做雇佣军的材料”。德国的大企业，其中包括曾经向威廉二世皇帝和希特勒的武装部队提供过武器的鲁尔区的大公司也不希望恢复武器生产，因为鲁尔河同铁幕之间只有很短一段飞行距离，“对敌人轰炸机最有吸引力的目标莫过于军火工业了”。此外，逐渐恢复的德国工业虽然生产能力有限，但是正处于生产的高峰，正在为国外供不应求的市场生产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和资本货物，转而生产武器在经济上是划不来的，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一部分日益扩大的市场和失去重建与刷新遭到猛烈轰炸的德国工业体系的势头。

直到 1951 年 4 月煤钢共同体条约签订后，阿登纳终于能够拿出证据说服左右两翼同意西德参加西欧集体防务。这年 5 月 27 日，参加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巴黎签订了“建立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后，西德议会很快批准了条约。但是作为条约发起国的法国议会却对该条约的批准一拖再拖，尽管美国以不承担“保护”西欧的义务、减少对西欧的援助相威胁，1954 年 8 月 30 日的法国国民议会最终还是否决了条约，反复折腾了三四年之久的“欧洲防务集团”至此告吹。

法国议会的决定使阿登纳极度痛苦不安，他责问法国：“难道德国的威

胁比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还重要吗？”但作为一个精明的外交家，阿登纳很快恢复了理智，没有过多地指责法国议会，而依然同法国一起，维持着舒曼计划带来的欧洲统一的势头。他在等待时机。

法国态度的反复，对美国无疑是一盆冷水。但是，把西德武装起来，使之成为大西洋联盟的重要一员，是美国的一项战略考虑，是必定要坚持的。在法国国民议会否决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以后，艾森豪威尔即指示美国国务院“考虑用什么东西代替欧洲防务集团的问题”。国务卿杜勒斯经过数十天紧张的外交活动，由丘吉尔倡议的九国外长会议于1954年9月28日在伦敦召开，这九国是布鲁塞尔条约五国加上美、加、德、意四国。会议在以下几点达成一致：一是结束对德国的占领；二是邀请西德加入北约，并允许其提供12个师的陆军和一支拥有1000架飞机的空军部队，同时欧洲最高盟军司令官的权力将扩大到足以制止德国武装力量的独立部署；三是接纳西德、意大利为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成员国。紧接着在1954年10月3日，阿登纳又同美、英、法三国代表签署了巴黎协定，从而正式结束了盟国对西德的占领。这项协定承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伦敦会议和巴黎协定归还了阿登纳渴望已久的主权，向他敞开了北约组织的大门。作为报答，同时也是为了解除西欧国家对德国仍然存在的戒心，阿登纳很明智地主动宣布，他保证德国充分支持和参加西欧的并同防务，以对付苏联的侵略威胁，并保证德国将绝不生产原子武器和生化武器，如有必要，他还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把德国和法国这两个西欧国家结成联邦。

1955年4月，西德正式成为北约的第15个成员国。借重美国这个外力，阿登纳在政治上又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六、做一个“好邻居”

在阿登纳的外交战略中，实现法德和解，建立法德友好关系，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在他执政的14年中，每当两国之间出现不和时，他总是在维护西德基本利益的情况下，适时地作出灵活的妥协；他十分注意节制自己的合理要求，从不冒犯法国。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国际风云变幻，法德关系有时不免会受到影响，但总的来说，德国确实是法国的一个“好邻居”。

日耳曼民族和法兰西民族是欧洲大陆除俄罗斯之外最大的两个民族，双雄不并立，这两个民族几乎是世代冤家。为了争夺领土和欧洲霸权，两国屡屡兵戎相见。远的不说，仅近代以来，就发生过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战争过后，战胜的一方都力图把战败的对方置于死地，使之永不翻身，而战败的一方则卧薪尝胆，韬光俟奋。如此冤冤相报，未有穷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法关系又走到历史上一再重复出现的十字路口：战胜者如何处置战败者，战败者又将如何求得生存？最初法国打算肢解德国，以便一劳永逸地解除对它的威胁。在遭到英美盟国的强烈反对后，法国改而采取控制萨尔经济并监督管理鲁尔工业的方针，以剥夺德国发动战争的经济基础。德国自然反对法国的做法，但阿登纳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政府那样采取激烈的对抗政策，他决心同历史传统决裂，力图找到一种能使德法修好的方法，解决对鲁尔和萨尔煤钢的争夺问题。他先是提出两国全面联合的建议，没有得到法国方面的积极响应，继而又提出了前面已提到的让法国人和德国人“坐到同一张桌前”，“一起工作，共同负责”的设想，希望把两国相互争夺的局面改变成为一桩崇高事业而共同努力，并从物质方面把两国结合起来，消除彼此之间的矛盾。这一设想为舒曼计划提供了思想基础，使得西欧联合迈出了第一步——成立了六国煤钢共同体，以后在1958年又扩大为经济共同体，从而大大缓和了法德矛盾。在西德重新武装问题上，他小心谨慎，多次征询法国意见，尽量避免得罪法国，使得法国终于在美国压力之下咽下了这一苦果。由于阿登纳的精明外交，至1955年，德国完全摆脱了战败国的屈辱地位，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但此后不久，阿登纳就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1958年，法国政局变动，已在野12年之久的戴高乐复出，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戴高乐是一个怀有强烈反德情绪的政治家，在战争刚结束时，他力主肢解德国，下野后也一再为法德和解带来麻烦，正是由于他本人及其追随者的反对，国民议会否决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令阿登纳感到欣慰的是，复出后的戴高乐在对德方针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反德派变为亲德派，这无疑给阿登纳推行德法和解带来有利契机。然而这两位政治家的秉性、风格以及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的不同，也在两国关系中不时造成风波。

以恢复“法兰西光荣”为己任的戴高乐，其外交政策核心是使法国真正成为世界大国。他一上台就声称法国应和美英一样，承担起它在世界上的责任，不久即致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要求修改北约章程，改变美英操纵北约的局面。他建议在北约建立“三国指挥部”，否则法国就将“保留修改公约或退出该组织的权利”。这一建议被拒绝后，戴高乐断然采取行动，于1959年3月宣布法国地中海舰队不再受北约指挥，6月又拒绝美国在法国设置核武器，并迫使美国撤出在法国的核弹和战略轰炸机。

在推行对抗美国霸权政策的同时，戴高乐力图密切和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和西德之间的关系。他充分意识到，法国只是一个中等国家，要单独同美国抗衡显然力不从心，因此必须联合其它欧洲国家，共同行动。在萨尔问题解决（1955年通过公民投票重归德国）后，法国和西德已无利害冲突。随着西德在经济上的复兴，法国亟须和西德进行经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一改以往对德严厉态度，主动和西德接近。

1958年9月，戴高乐邀请阿登纳访法，就永远结束两国间敌对关系、欧洲联合以及其它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为了显示他个人对这位德国领导人的友谊和尊重，戴高乐选择他的庄园科龙贝作为会谈地点。这次会谈实际上等于双方声明愿在和解、互通有无和交流技术的基础上，揭开法德关系新的一页。两位政治家谈得非常投机，当阿登纳对戴高乐表示钦佩之意时，戴高乐说他已六十有七，“不能勇对命运的挑战了”，大有英雄迟暮之感。阿登纳则指出，他比戴高乐还要大14岁，并告诉戴高乐，人是可以跨越某一“年龄障碍”的，就如飞行员能够突破声障一样，一旦跨越了这个障碍，就可以无限度地活下去。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戴高乐高兴地逢人便说：“我已经越过了年龄障碍，可以无限度地活下去了”。高兴之余，戴高乐向阿登纳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迟早要让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为法国很快就拥有核武器。但是，他却只字未提到他那时即将决定建议成立一个把德国排斥在外的大西洋理事会。

这个建议是在科龙贝会谈仅两天之后的9月17日向英美两国政府提出的，其目的是通过在西方联盟内部设立一个由美、英、法三国组成的理事会的形式，使法国取得与美、英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直到9月24日，法国外交部才将一份有关建议的备忘录摘要交给西德大使。阿登纳在得知这一提案时，仿佛有一种被人戏弄的感觉，不由得大动肝火。据说这位总理的反应是“怨恨已极，像一个受骗的人似的灰心极了，憋着一肚子怒气”。麦克米伦首相在10月8日访问波恩时，还能听到阿登纳指责戴高乐的愤愤之声。阿登纳完全有理由大光其火，因为戴高乐口头上高唱法德友好，却并未对他推心置腹，他仍然把德国看作低人一等的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把德国看作是法国一个政治上的小伙计，而这个小伙计是可以不时奚落一番的。

然而，不管阿登纳多么感到窝火，他既然把德法和解作为西德外交政策的一项坚定原则，就不能与戴高乐争高论低，况且他心底里确实也钦佩这位不屈不挠的将军，这公私两方面的感情加在一起，终于消除了他的愤慨情绪。这年11月26日，戴高乐到巴特克罗伊茨纳赫进行了回访性会晤，阿登纳依然盛情接待了他。这是一次工作会议，目的在于具体反映出新的法德友谊。在科龙贝会谈时，戴高乐对英国提出自由贸易区建议一直保持沉默，现在却坦率地表示了他的坚决反对态度。其理由是，如果首先向英国，然后向西方其他国家打开大门，那就会削弱这个六国专有的俱乐部。双方一致同意，就欧洲经济共同体方面来说，应该停止这种谈判。作为报答，戴高乐向阿登纳保证，法国将反对对西柏林地位作任何改变。

戴高乐在离开巴特克罗伊茨纳赫时感到，他能说服阿登纳在实际上接受他可能会提出的有关欧洲和全世界的任何倡议。事实上，此次会晤后，将军和总理之间的关系，比他们俩人与其他外国任何政治家的关系都更密切。据戴高乐回忆录中提供的事实，从1958年到1962年上半年，他们两人共会见15次，谈话达100小时，交换函件40封。不过，据别的一些材料的说法，

他们这些交往，特别是两人之间的密谈，有时几乎像是聋子的对话，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阿登纳对自己不愿听的事情置若罔闻的能力。

正当德法关系步入蜜月时，戴高乐一篇似乎是“信口开河”的讲话，却使阿登纳大吃一惊。此事发生在1959年3月2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是这样说的：

将分裂的两部分统一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德国，这在我们看来，是德国人民的必然归宿，只要这样的德国对目前东、西、南、北边界问题不持异议，只要其目标在于有朝一日参加一个为了合作、自由与和平而组成的全欧的契约性的组织中去。

那时，波恩的官方态度是，德国的边界应该是1938年原有的边界，即应包括战后被波兰实际占有的奥德河—尼斯河以东的领土。不过，在私下谈话中，西德当局会欣然让步，表示不再恢复战前的边界，但他们不愿作出正式的让步，宁愿把它挂起来，以便将来在与莫斯科就德国统一问题谈判时讨价还价，而现在，戴高乐事先没有商议或预告，就使他的朋友阿登纳失去讨价还价的本钱。戴高乐这样做当然有他的用心，他是要向美英两国表明，法国在外交上是独立自主的，并不屈从于这两个以西方盟主自居的大国。然而，他牺牲阿登纳政府的利益，打消了德国对奥得河—尼斯河以东领土的要求，而且这个国家，正是他谋求与之建立特殊关系的国家。

这件事搞得阿登纳很难堪，但他并没有感情用事，而是理智地避免了两国关系的恶化。他给戴高乐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请他不要再提边界问题。戴高乐同意了，他在阿登纳的有生之年，没有再谈这个问题。

尽管戴高乐不时冷落德国，他还特别劝告德国人接受法国的核保护，以代替美国的核保护。但阿登纳有自己的外交方针，他不愿意以在美国核保护伞下获得的可靠的安全，去换取法国新研制的原子弹的不可靠的保护，于是婉转地拒绝了戴高乐的要求。阿登纳还违背戴高乐的意愿，接受了肯尼迪总统的邀请，参加美国所建议的多边核力量。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阿登纳还是愿意迎合戴高乐的。例如在常常发生激烈争论的六国部长会议上，德国通常总是支持法国的。当戴高乐否决英国申请参加欧洲共同体时，阿登纳对英国并没有给予支持。

1963年初，法德关系达到了最高潮。这年1月22日，两国签订了合作条约。这是阿登纳的理想，在他看来，合作条约是标志着这两个曾经交战的欧洲大国之间和解的一项成就。他对教育界和青年界之间的相互交流的条款特别感到满意，因为这种交流的结果将使德语在法国学校比英语更受欢迎，同时将使更多的青年有机会相互了解对方的国家。戴高乐也欢迎这个条约，然而他把条约主要看作建立自己影响的工具，并且期望有朝一日它也许会发展成为把德国外交权操在自己手中。条约中的某些条款在德国方面看来是反映了戴高乐的用心，例如条约规定：“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两国政府必须就所有关于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首先是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磋商，以便尽可能达成类似的决定”。而当时在北约组织问题、拟议中的多边核力量问题、与苏联关系问题以及共同市场发展的问题上，两国政府观点显然不一致。因此，尽管阿登纳为了两国长远睦邻关系，决定不考虑戴高乐所包藏的目的，德国联邦议院却坚持在批准这个条约时，必须在它的前面加一个序言，阐明这一条约必须“不影响”德国订立的“多边条约的权利和义务”，必须促进“欧美的特别密切的合作”和“北大西洋联盟组织的共同防务”，以及“沿

着欧洲共同体的创立所开辟的道路，实现包括大不列颠在内的欧洲统一”。由于序言详细阐明的都是戴高乐所反对的政策目标，因而在按条约规定每年召开两次最高级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前夕，戴高乐就把条约比作“消逝”了的“少女的青春”和“玫瑰花”，公开表示了他对条约的失望。

无论如何，在行将就木的阿登纳看来，他有生之年，终于实现了自己为之奋斗十几年的目标，德法这一对宿敌变成了两个友好邻邦。

约瑟夫·斯大林谋略

约瑟夫·斯大林，1879年12月21日出生于格鲁吉亚古老的城镇哥里。他原名叫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斯大林”这个名字是他参加革命后改的。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的个性即钢铁之人。斯大林的父亲维萨里昂是个鞋匠，母亲叶卡捷琳娜是农奴的女儿。为了改变贫穷的生活，母亲送斯大林进了神学院，他博览群书，成了旧时代的叛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2年，斯大林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这是他在党内获得权势的开始。列宁逝世后，他顺利地当上了苏联第一号人物。斯大林是个出类拔萃的政治斗争的天才。二战中，当希特勒肆无忌惮的横扫大半个欧洲时，是斯大林率领英勇的苏联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歼灭了德国法西斯的主力，为改变整个战争的进程，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他不仅是苏联军民的最高统帅，而且为促进和巩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卓越贡献。

二战结束后，面临着重建家园的现实问题。斯大林着手实施了苏联工业化计划，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共产主义原理。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病与世长辞。

一、“关于上帝的话全是胡说八道”

约瑟夫·斯大林 1879 年 12 月 21 日出生于格鲁吉亚古老的城镇哥里。他的父亲维萨里昂是个鞋匠，他的母亲叶卡捷琳娜是农奴的女儿。夫妇俩都是格鲁吉亚少数民族的下层劳动人民，家境贫寒、目不识丁。在斯大林的童年生活中，他的母亲给了他深刻的影响。她是个虔诚的教徒，正因为如此，她决定让约瑟夫长大了当传教士。农奴的解放，使有特殊才能的农民的孩子有机会进神学院读书。按规定，一个传教士可以结婚，掌管某个教区，进而可以在人世间步步高升，在替上帝效力的同时，可以享受未曾梦想过的安逸生活。这是母亲的朴素理想，为了这个目的，她终日辛勤的劳作。

在哥里教会学校读书时期，天资聪颖、有非凡记忆力的斯大林，遵照母亲的嘱咐，刻苦学习，加上他争胜好强的天性，是学校有名的优等生，后来被校方保送进入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年仅 14 岁的斯大林在神父们的眼里是一个有才能、有远大前程的孩第比利斯神学院，这是格鲁吉亚的最高学府。入学后，斯大林如饥似渴地在浩浩书海中漫游，他涉及的领域很广：政治、文学、历史、经济、生物学等等，丰富的知识启迪了他的大脑，他的思想逐渐产生了变化。作为一名神学院的学生，斯大林通过阅读达尔文等人的著作，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一次，有位同学提到了上帝，斯大林就打断他的话说：“你知道，他们在欺骗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上帝，我借一本书给你读一读，它会告诉你，这个世界和一切生物与你想象的有很大不同，关于上帝的话全是胡说八道。”

斯大林还对民间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格鲁吉亚历史上充满了传奇故事，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斯大林被格鲁吉亚传奇英雄们迷住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卡兹别吉写的绿林好汉柯巴的故事。他用“柯巴”作自己的绰号，后来这个绰号干脆成了他经常使用的名字，直到 1910 年前后，他开始自称柯巴·斯大林，最后才改为约瑟夫·斯大林。

十九世纪末叶俄国涌现出来一批出类拔萃、才华超群的革命青年。这些人勇敢、富于理想、事业心强，他们极端仇视旧社会，强烈主张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特别是其中的萨沙·楚鲁洁泽和拉多·凯茨霍维利，这两位年轻的革命者激发了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从而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1 年，斯大林在与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中说道：“我参加革命运动是从 15 岁起，当时我和居住在外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成立的一些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这些小组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引起了读马克思主义秘密刊物的兴趣。”

路德维希问道：“是什么力量把你推向了反抗的方面呢？”斯大林回答说：“是我当时在那里求学的那个神学院的反动校规和贫富不均、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使我成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正革命学说的拥护者。”

由于斯大林经常进行革命活动，1899 年 5 月 29 日，学院委员会把他开除了。离开神学院的时候，他的造反精神有所发展，产生了试向沙皇政权挑战并摧毁这个政权的强烈的欲念。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学说，如饥似渴地阅读他能弄到的各种革命材料，同具有革命精神的人广泛接触、交谈。1900 年 12 月，列宁筹办的《火星报》在莱比锡出版，后被偷运入境，立即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喉舌，影响很大。这也同样引起了斯大林极大的兴趣。他完全拥护列宁的主张，经过研究和比较，斯大林认为列宁是真正马克思主

义党的创始人，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

斯大林说：“当我知道列宁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特别是1901年以后，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时，我就深信列宁是个非凡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缔造者，……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

1903年秋，斯大林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同年12月，他收到了列宁的一封信。1924年1月28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军校学生晚会上，斯大林曾谈起这件事，他说：“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1903年，固然，这次认识还不是亲身晤面的认识，而是相隔两地，在通信上的认识，但这次认识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一个永生难忘的印象。我在党里工作的整个时期，这个印象始终都没有消失。那时，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他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一句寻常的话，而是一颗打中目标的子弹，只有列宁善于把最纷乱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明了、扼要、大胆。”

斯大林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会见列宁，是在1905年12月在芬兰坦默福斯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人，这个人不仅在政治上是高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高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身材匀称和仪表堂堂的巨人。当我看见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通常，‘大人物，开会总是要迟到，让会场上的人望眼欲穿地等着他的出现；而且在‘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会场上的人会彼此告诫‘嘘……静一点……他来了’。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来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会议的代表们进行最普通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

“后来我才明白，列宁这样质朴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的长处，正是他这种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

第一次见到列宁时，斯大林已经26岁了。他在探索救国之路的实践中，敏锐地寻到了一位伟人，一个航标。从此，这两位工人阶级的领袖便开始了私人间的亲密友谊，他们的合作对苏联现代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作为列宁的战友和学生，斯大林以他深邃的思想，透彻的观察力和干练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列宁的赞赏。1917年10月，在苏共中央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上，通过了列宁和斯大林制定的武装起义计划。会上确定斯大林为中央政治局领导武装起义的总指挥。1917年11月7日，“阿芙乐尔”巡洋舰以其向冬宫轰击的炮声，宣告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此诞生了。开始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列宁和斯大林密切合作领导布尔什维克和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由于俄国当时还处于交战状态，为避免苏维埃政权被帝国主义摧毁，列宁力主同德国谈判，签订和约，退出战争。斯大林坚决拥护列宁的政策。他说：“我们必须立刻接受这些条件，签订和约。和平将给我们以喘息时机。我们要利用这个喘息时机说服人民，积蓄力量，要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并建立一支忠于苏维埃的人民军队。否则，我们将来还会像现在这样遭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终于在1918年3月苏俄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为新生的苏维

埃政权赢得了短暂的喘息时机。这是一个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实行革命的妥协策略的范例。

斯大林由一个立志要超过别人的刻苦奋斗的学生，成为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后来又成了反对第比利斯神学院领导的叛逆，最后接受了大量革命书籍的熏陶，尤其是接受了列宁的革命理论，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在早期的革命实践中，斯大林以他非凡的才智，专心致志，坚韧不拔，初步掌握了政治斗争的策略和培养了自己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洞悉一切、坚强果敢的政治家素质。

二、“我必须有军事全权”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政权虽然在俄国中部及莫斯科、彼得格勒等主要城市，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面临的严峻现实令人担忧。沙皇将军与官吏、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仍拒绝承认工人阶级的胜利，并开始将革命力量较小而富农势力大的顿河地区、库班地区和乌克兰地区聚集并巩固反革命武装力量，继续和苏维埃革命政权进行残酷的较量，革命的成果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终于，一场暴力、仇恨和杀戮的狂潮席卷全国。这是俄国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战之一，它在俄罗斯广阔的平原上展开，成千上万的人卷了进去，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这场内战并非是突然爆发的，正如一场地震有预震一样，内战远在南方先开始了。与此同时，在彼得格勒地区破坏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形势岌岌可危。1918年3月，党中央仓促决定把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这是一条权宜之计。列宁说：“如果德国人把彼得格勒连同我们一举拿下，革命就完蛋了。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在莫斯科，那么彼得格勒的失陷只是严重的局部挫折。”这次迁都在苏俄历史上以及在斯大林个人生活中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

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这两座城市体现了俄罗斯民族不同的文化特征。莫斯科是一座古都，俄国就是在它周围诞生的。在那里，由亚洲和东正教传统混合而成的古老的俄罗斯沙皇帝国，被奉若神明，至高无上。几个世纪以来，俄国人一直将莫斯科视为圣地。克里姆林宫，这座神秘可怖的城堡，里面教堂那金黄色的圆屋顶更增添了它原始、古朴的美，它仍旧保留了作为沙皇宫殿的特色，受人尊敬、令人敬畏，具有绝对的权威。现如今，它又成了新生的苏俄革命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了。

彼得格勒是彼得大帝在十八世纪初建造的一座雄伟壮丽的城市。它是西方思想和技术输入俄国的大门，体现了俄国与西方的密切关系。在彼得格勒人的眼里，莫斯科是俄国生活中一切保守和落后东西的中心，而在莫斯科人看来，彼得格勒是危险的暴发户。莫斯科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西方，并为自己作为古老的、自给自足的和优越的莫斯科生活方式的卫士而感到自豪。而现在，作为革命诞生地彼得格勒的人民，更为他们把伟大的西方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引进俄国而感到骄傲。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多数领导人，在精神上属于彼得格勒。他们面向西方，期望着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斯大林则由于他青少年时期受到的教育和社会影响，更多地带有亚洲特性的莫斯科传统。

在这场保卫苏维埃的严酷斗争中，斯大林作为列宁的主要助手之一，担负着十分繁重的工作，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磨练了他在政治、军事工作方面的超人才智。这时的斯大林担任四种职务——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国家监察部人民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是列宁在组织和领导苏维埃国家国防事务上的主要支柱之一。这时期斯大林军事韬略初显锋芒。

内忧外患困扰着苏维埃共和国，尤其是在西伯利亚和更重要的乌克兰地区仍处于反苏维埃力量的控制之下。他们切断了察里津同莫斯科之间的铁路线，而北高加索是仅有的重要粮食来源地，该地区的失陷意味着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将面临最可怕的敌人——饥饿。很显然，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企图用战争的铁钳将共和国包围起来，搞封锁禁运，用饥饿的魔掌来最终

摧垮苏维埃政权。因此，争取粮食就成了当务之急。当时只有从伏尔加河下游和北高加索才能取得粮食来解首都缺粮之急，而察里津是沿着伏尔加河到那里去的必经之路。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察里津将成为这时期新军事斗争最剧烈的中心。

党中央根据列宁的提议，派斯大林前往察里津工作，任命他为南俄粮务总监，专门负责组织输送粮食，以解救威胁着首都的饥荒。斯大林这时的任务实质上是非军事的，原先打算不需要很长时间，然后他就更往南到巴库去。但是由于预想不到的情况，他在察里津的时间拖长了，而且开始了他的军事指挥生涯。因此，斯大林到伏尔加河这座城市的旅行就变成了他一生事业的里程碑。

1918年5月底，斯大林在他新婚的妻子、年轻的妇女社会活动家纳佳·阿利卢那娃的陪同下，由两辆装甲车和400名赤卫队护送，穿过敌人层层封锁线，于6月6日抵达察里津。6月7日，他向列宁报告了他的第一个行动。他发现了“一片混乱，投机盛行”，并当即采取了行动。他把那些腐化堕落和办事不力的官员撤了职，解散了一些不必要的革命委员会，任命了一些政治委员去整顿劳工和运输组织以确保对莫斯科的粮食供应。斯大林这时还采取了配给制和固定价格策略。由于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展开，斯大林的工作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他树立了巩固的革命秩序，无情地摧毁了富农的怠工和投机，调整了与农民的商品交换，保证、疏通了铁路和水路的运输。结果，5个月中约有500万普特粮食及其他食物运给了共和国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和红军。斯大林以他的果断和策略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措施，粉碎了敌人用饥饿来绞杀苏维埃国家的阴谋。

斯大林没有被眼前的成功所迷惑，他知道，察里津将是保卫苏维埃政权道路上的重要战略要点。察里津位于伏尔加河弯曲部分的两岸，城市沿河的18英里，是南俄的工业重镇，守卫着伏尔加河的门户。它也是反动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所抱的目的就是占领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心，以便使苏维埃共和国与粮食产地和巴库石油区隔绝开来，在这里把顿河一带的反革命势力与高尔察克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军队汇合起来，一同进攻莫斯科。鉴于上述分析，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认为，无论花多少代价都要保卫住察里津，粉碎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阴谋。由于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搞暴动一事，察里津受到了强大的压力，粮食运输和该市本身都受到了威胁。在察里津一个月之后，斯大林感到向莫斯科供应粮食主要已成为一种军事行动，于是他请求授予他南线的特别军事权力。斯大林从此开始了直接参与军事指挥。7月7日，斯大林写信给列宁，提出要求配备飞机、装甲车和大炮，他说没有这些武器“察里津战线就守不住”。最后，他要求“我必须拥有军事全权”。这封信虽然有些直率，但列宁同意了斯大林的请求。1918年7月19日，最高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斯大林被正式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为了完成保卫察里津的使命，斯大林以迅速果断的步骤整顿软弱无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从军事机构中将托洛茨基的代理人、怠工者和叛变者清除出去，展开建设察里津战役正规军的工作将以前零散的游击队伍和赤卫队编成正规的师、旅、团。斯大林迅速从顿巴斯调来了伏罗希洛夫的部队，以他们为核心，重新编成第10集团军，由英勇善战的工人出身的伏罗希洛夫担任察里津集团军司令。伏罗希洛夫原是顿巴斯的金属加工工人，1914年进了察里津兵工*

厂，后与斯大林共事，俩人成了密友。斯大林又将萨里斯克草原的骑兵游击队改编成正规的骑兵部队，由留着连鬓胡子、精神抖擞的原骑兵中士布琼尼负责指挥这支部队。这些队伍的组建，对保卫察里津，粉碎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伏罗希洛夫曾写道：“这一批老布尔什维克和革命工作者团结在斯大林同志周围，取代了无能的工作人员，一个红色的、布尔什维克的堡垒在南方耸立起来。”

1918年夏秋，察里津再次成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最重要的战区之一。斯大林决心采取一切措施，使察里津掌握在苏维埃政权手中。斯大林依靠军事委员会和市党委的配合，经过充分的思想动员和大量的组织工作，一场大规模的战备运动广泛开展起来，人们修大炮、造汽车、生产枪枝弹药、挖沟筑壕，所有这些都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斯大林又组建了用大炮和机枪装备起来的加强师，组建装甲纵队，更大的骑兵部队。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在实践中提出了新的、更高级的战略与战术的非凡范例。他们巧妙地采用了步兵、骑兵、炮兵、铁甲列车和伏尔加河军舰的协同作战，表明进攻是防御战最好的形式。

斯大林以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坚不可摧的精力与意志，完善了他独特的政治策略；他以非凡的军事谋略完成了保卫察里津这一重大使命。依照劳动人民的请求，这个光荣不朽的城市——察里津被命名为斯大林格勒，以此来纪念斯大林在保卫察里津战斗中的显赫功绩。

三、“在经济上也把资本主义战胜”

古往今来，“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警钟时时在鞭策着一代又一代救亡图存的伟人。经济是军事的基础，所谓“国泰民安，民安怀远，则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也就不无道理。斯大林在二十年代中期，以深邃的洞悉力看到苏俄正处在众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要改变这危险的处境，依靠目前国内的落后经济是根本办不到的。他太熟悉自己的祖国了，他曾说过，“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它所以挨打，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他敏锐地分析道：如果说1917年十月革命时，问题是要在政治上战胜资本主义。那么，现在，主要的任务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扩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期在经济上也把资本主义战胜”。斯大林决心推行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他向苏共和苏联人民提出了发展经济的宏谋大略：要把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

沙俄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工业方面十分落后，它所装备的近代生产机器只相当于英国的三分之一，德国的四分之一，美国的九分之一。列宁曾经这样写道：“就铁——现代工业主要产品之一，也可以说是文明的基石之一——来说，俄国的落后性和野蛮性是特别大的。”十月革命前，沙俄的农户共有800万具俄式犁，200万具木犁，1800万个木耙，只有400万具铁犁；到了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的农民还在用中世纪的方法，甚至是公元前的方法耕种。4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3年反武装干涉战争又使苏联经济雪上加霜，更加贫穷不堪，千疮百孔。虽然到了1925年，国家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所破坏的工业和农业都已经恢复起来了，农业接近了战前的发展规模，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七，大工业生产已经达到战前工业产量的四分之三左右，但苏联依旧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它的国民经济的全部产品有三分之二是农业方面生产的，只有三分之一是工业产品。这就是斯大林面临的俄国经济现状，它表明消灭俄国长期落后的经济状态，虽然困难颇大，但刻不容缓。斯大林决心以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钢铁意志，号召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英雄们的业绩去创造一个没有剥削的崭新社会。

斯大林在一次极能说明他的心情的讲话中以咄咄逼人的语调解释了赶上和超过西方的迫切性。这是在1931年2月的全苏社会主义产业工人第一次代表会议期间，当时大家都感觉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狂热性和压力，都希望喘口气，但斯大林不允许喘息。

他说：“人们有时间：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他要求立即行动，因为斯大林相信，执行他的政策对于党和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要生存就必须赶上和超过工业化的西方列强，而现在苏俄是软弱的，如果它不改造自己的经济并建立起工业力量，听凭西方国家的摆布，甚至遭受战争进攻的情况将依然如故。

斯大林说：“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

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要保卫它的独立。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么，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斯大林为俄国工业确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他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必须重新创立沙俄时代所未曾有过的许多工业部门必须建立新的机器制造厂、机床制造厂、汽车制造厂、化学工厂和冶金工厂，必须创立本国制造发动机和电站装备品的生产，必须增加金属和煤炭开采量，因为这是为保证苏联社会主义胜利而绝对必须的”。

这是苏联方式的工业化道路，即从发展重工业来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化。它与一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法不同，官们的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的。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斯大林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决不能走这一条路，因为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除此之外，在重工业的地理划分的新布局方面也作出了重大决策，其目标是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工业的分布更为平衡，在燃料和原料产地附近建立重工业，以减少运输方面的紧张；同时也认识到工业集中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容易遭到西方的打击。事实上，在乌拉尔以东建立重工业中心后来当真成为苏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免遭毁灭性失败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为了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使工业化顺利地发展，联共中央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斯大林强调“苏联共产党员应当掌握技术……成为专家”，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自己的知识分子。于是，国家和工厂兴办了许多高等和中等的技术学校，它们的大门都向来自工作台的工人开放。这类学校的发展速度相当快，到1933年，约有20万学生在高等技术院校攻读，90万学生在中等技术学校学习，同时工厂办的学校和专业训练班每年培训100万工人。所有这些措施，缓和了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短暂的矛盾。与此同时，全国还开展了一个扫盲运动。在这个文盲充斥的国度里，1929年，8~50岁的人当中，文盲人数下降到48.9%；1930年1月，建立了各个地方委员会来领导这项工作，到1939年，文盲的百分比下降到18.8%，人口素质大大提高。

1933年1月，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苏联由从前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工业国，他自豪地说，我们已有了钢铁工业、拖拉机工业、机床制造工业、汽车制造工业。苏联人民终于取得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方面的重大胜利。它表明强大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并且在工业生产速度方面超过了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产品的绝对数量方面居于欧洲第二位。

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必须现代化。当时，俄国农民的耕种方法古老而落后——从他们住的村子到田里要走很长的路；大约四分之一的农民还没有马匹，耕作也通常使用自制的没有金属铧的木犁，因此，翻耕次数既少又浅；播种是用手从围裙里把种子撒到地上，浪费很大；不讲究科学的播种日期，而是从宗教节日来确定下种时间。总之，愚昧落后的农业，已经阻碍了工业的发展。

1928年，农业总收获量虽已达到战前的水平，农民比过去吃得好了，但出售的谷物却少了。余粮常常落到富农手里，这些农村小资本家不仅从自己

的田里得到谷物，而且还通过拥有磨坊和以收成作抵押而放债来获取谷物。显然，他们在同国家争夺粮食的控制权和农民的支持。因此，实行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政策，就成为党中央的当务之急。

1929年，农业集体化运动加快了步伐，席卷全国，出现了整村整区加入集体农庄的情况。1930年1月5日，中央委员会宣布说，在五年计划期间，使绝大多数农民实现集体化的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它还进一步提到，要在1932年秋季之前，在所有的粮食生产地区完成集体化，这就使集体化运动达到了狂热的顶点。于是，强迫命令和一些过火的行动引起了农民的不满。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在这篇论文里，斯大林强调了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强调说，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是农业劳动组合，这种劳动组合只把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是粮食生产方面的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绝不是把农民的全部家产实行公有。斯大林指出了问题的要害，产生了极大的政治效果。

中央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从而把集体农庄的建设引向了健康的道路。到1933年底，“集体农庄已成为坚强而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当时，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苏联总农户的四分之三，集体化实现了。

斯大林这时期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改变了苏联经济的面貌，也奠定了坚实的国防基础，对日后战胜法西斯纳粹的疯狂进攻，具有深远的意义。

四、虚不露怯争取时间

三十年代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令人忧虑的年代。战败的德国虽然被严重地削弱了，但它还是一个拥有 6000 多万人口的欧洲大国，有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巨大的经济潜力，另外它还得到了英美垄断资本的扶植。由于大量的外国资本同德国巨大的工业潜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使德国很快又东山再起，回到争夺世界霸权的行列。1933 年 1 月，希特勒被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捧上了台，就任德国总理。希特勒上台是德国垄断资本主义重新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是德国成为欧洲战争策源地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此，德国立即实行法西斯的极权政治，血腥镇压德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对外疯狂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大力扩军备战，制造舆论，准备大规模发动武装侵略战争。毫无疑问，地处欧洲心脏地区的法西斯德国已成为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动者，是欧洲战争策源地。

意大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用武力向外实行侵略的欧洲国家，也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邦凶。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于 1936 年 10 月签订了共同协定，结成了“柏林-罗马轴心”。

日本军国帝国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在亚洲的走狗，它一直野心勃勃准备实现所谓的“大陆政策”吞并全世界。而侵占中国是它“大陆政策”的第一步。从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到 1937 年 7 月 7 日的“芦沟桥事变”日本挑起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就这样，日本逐步成为亚洲战争策源地。

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嚣张的气焰，不仅令人愤恨，也让人忧虑。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与日俱增，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军备竞赛。从 1934 年到 1936 年，日本的军费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从 43.4% 上升到 70%，而德国则从 21% 增加到 67%，意大利从 20% 上升到 52%。种种迹象表明，世界正处在灾难降临的前夜。

斯大林密切关注着世界的局势变化，而当时的苏联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军备上都处在恢复发展阶段，尤其是边境的局势更让斯大林担心，由北方从波罗的海进入苏联的道路是敞开着的；从中路穿过波兰入侵的路线，似乎也取决于波兰政府的暧昧态度；从南翼进攻苏联也是方便的，因为几个多瑙河国家持反苏的态度很明确。面对世界大气候和苏联的现状，斯大林压力越来越大。他相信战争已迫在眉睫。苏联将处在东西两面夹击的危险境地，而且很可能在它还未来得及积蓄力量之前，大战就已经爆发了。这对于苏联无疑是灭顶之灾。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斯大林从两个方面着手准备：在国内，他命令加快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尤其要大力发展重工业，加强国防建设；他一再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告诫全国人民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时间就是生命。凡尔赛条约只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停火协定。战争正在走近。在国际，他密切注意西方的动向，寻找即将来临的冲突的早期征兆。为此，斯大林在谋划新的外交策略。

他的基本出发点是力图扭转或至少推迟必将爆发的战争，为苏联赢得宝贵的时间和安全的环境。他希望战争将局限在资本主义阵营之内。因此，在这时期，斯大林的外交策略表现得极其谨慎、克制和现实。他坚持尽可能长时期地推迟战争爆发是目前压倒一切的需要。为此，他推行一项集体安全政策。三十年代初期，李维诺夫代表苏联同波兰和芬兰谈判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33 年 6 月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上，这位苏联外交官建议签订一

项多边互不侵犯条约，这导致苏联同它南面和两面的所有邻国都签订了条约。这无疑解决了斯大林一直担心的边境安全问题。这一举措非常及时，它对维护苏联的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尽管俄国和中国于1932年恢复了外交关系，但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在远东给苏联的利益与安全直接构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

斯大林决心不借一切代价避免战争。俄国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所蒙受的耻辱仍记忆犹新。尽管日本人多次挑衅，他们仍然“泰然自若，不动声色”，表现了“顽强的克制和极大的耐心”。因为斯大林最担心的危险是日本人会侵犯蒙古，这个人民共和国当时起着缓冲国的作用，而且实际上是苏联的保护国。如果日本人这样做，战争就无法避免。可见，对俄国来讲，直接的威胁在东方而下在西方。事实上，当时日俄关系非常紧张，两国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匆忙调兵遣将，并制订计划在远东发展工业以加强国防。作为官方，斯大林则继续严守中立，拒绝同英国和美国合作反对日本，甚至不参加国联的一个调查满洲局势的委员会。斯大林决不做任何有可能被用作发动战争的借口的事。

对日本是这样，对德国斯大林也是如此。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战争的阴云在欧洲上空集结。希特勒一再地表示敌视苏维埃政权，甚至宣布他对乌克兰和苏联其他领土的要求。他的侵略政策如此狂妄，但是在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的最初几年，斯大林采取不公开评论德国的策略。他希望德国人继续恪守原来的边界和条约。在1934年1月，斯大林在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谨慎地提到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弱点的一个症状”，甚至没有排除和德国结盟的可能性。斯大林在小心翼翼地安抚或至少避免惹怒纳粹德国的同时，也密切地关注着希特勒真实意图的迹象。德国和波兰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使斯大林心里有些嘀咕，不知道希特勒是否在玩弄波兰统治乌克兰的老把戏。当波兰同意延长它和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时，斯大林才稍稍松了口气，斯大林曾向柏林建议由苏德共同保证波罗的海各小国的边界和独立都遭到了希特勒的反对。1934年苏联政府分别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签订了条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苏联西南边界的安全。但斯大林明白，波兰人对俄国的几百年的宿怨使波兰成了他的最危险的邻国。

鉴于此，苏联必须要调整其大政方针，争取集体安全，加强国际间的合作。1934年9月，苏联参加了国联。在1935年1月28日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莫洛托夫谈到了“同国联合作的权宜之计”，表示苏联政府不会过高的轻易的估计这种组织的重要性。他接着谴责了德国的种族理论，引用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中针对苏联的“领土征服政策”。面对德国的扩张和高度发达的经济实力，苏联领导人非常焦虑。

1935年初，斯大林在谨慎地与法西斯国家周旋的同时，制订集体安全策略，这时他为了尽全力避免战争，开始谋划与西方资本主义结盟。1935年3月，英国的一位低级部长、未来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访问了莫斯科。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位英国的高级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在柏林访问了希特勒。但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热情接见了艾登，这个来自俄国的主要敌人的国家要员。这次访问的深远意义，是两个月后，斯大林接见了来访的赖伐尔和贝奈斯，结果缔结了苏法同盟和苏捷同盟。

1938年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下一个目标就是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紧迫，斯大林立即建议，英、法、苏俄三国携起手来，建立一个反德联

合阵线，但遭到英法绥靖思潮的反对。苏联建议在国联的主持下建立一个大规模联盟，但西方列强却根本没有对此建议作出反应。丘吉尔说，苏联的建议事实上未被重视。苏联的建议没有被放在对付希特勒的天平上，而是受到冷漠的（且不说蔑视的）待遇，这在斯大林心里留下了一道创伤。事态的发展似乎是苏联就根本不存在一样。为此，我们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斯大林对西方国家的傲慢态度感到愤怒和屈辱，但当时他没有作出公开评论。他深深关注的是俄国几乎完全孤立的处境，他不愿说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强这种孤立处境的话。他一点也不怀疑英法的绥靖动机，显然是由此获得希特勒在东方大干，而使西方平安无事，这正如斯大林后来所言：“人们可以这样认为，把捷克斯洛伐克几个区让给德国，是作为它保证向苏联发动战争的奖赏。”斯大林不能理解，除了换取西方和平的保障之外，英法两国竟会在外交上败于希特勒之手。他过高估计了这两国的斗志和备战实况，同时也过低估计了它们对苏联如此的恐惧和疑虑。因此，斯大林不再把它们看作是可靠的盟友。

1938年至1939年冬，局势更加险恶，斯大林知道，豺狼已经走近，战争就要开始，而俄国军队此时仍不能挡住德军的进攻，因“落后而挨打”将在苏俄重演。斯大林陷入了沉思。他整日苦思冥想防止战争的外交策略，考虑着每一种方案。他对过去的政策作了分析，争取盟友，美国态度冷淡，竭力避免作出任何承诺；英法两国一再拒绝他的建议；他危险的邻国波兰已经拜倒在希特勒的脚下，并派了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上校前往柏林，显然此举对苏联凶多吉少；德意日法西斯气焰越来越嚣张和好战，而苏联孤立的处境已成为现实。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决定直接与魔鬼打交道，启开与希特勒结盟的大门。这是一场深思熟虑的赌博，斯大林决心作最后的努力。

希特勒这时的战略思想是避免分散兵力，并把它集结起来，进攻西方或进攻东方。这正是斯大林试图去影响希特勒决定的大好时机。但是斯大林想到，任何主动的行动都有很大的危险性：如果希特勒拒绝，就会使苏联作为反法西斯联盟倡导者的声誉受到损害，而处于更加被动的地步，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还会使英法有了口实，让希特勒在东方自由行动。这使斯大林感到他将处理的这个任务需要很大的随机应变的灵活性。

他决定暂时跟着猎狗追兔子，但又要小心地不使兔子注意到他在猎狗之中。于是斯大林相当精明地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他本人在公开的场合作出含蓄的但却是容易看出意图的主动表示。他决定在1939年3月1日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起进攻。这次会议和上次会议间隔了4年。总书记回顾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肯定会被国外十分注意地听取，以防错过外交方面的重要暗示。另外，在总书记报告中仿佛是顺便地提出含蓄的主动表示，这肯定要比用其他办法提出显得不那么张扬。3月10日，斯大林以政治家的风度向大会作了报告，其中谈及国际形势的部分是含糊其词的稀有杰作。

他谈到正在到来的经济萧条和战争的关系，直接了当地把德、意、日称为“侵略国家”，它们想依靠战争来摆脱萧条。他强调了外交中的经济因素，谈到了英美的经济优势和潜在的军事优势。他蛮有把握地认为美国最终会参加战争。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他严厉抨击了西方的绥靖政策，精辟地分析道：这些国家搞绥靖的原因是它们害怕革命，有一种中立精神，为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让苏德“互相削弱，互相消耗，然后当它们相当疲惫时，自己就以充沛的力量出台活动，迫使那些精疲力尽的交战国接受它们

的条件。真是价廉物美呵！”他强调，虽然西方企图把俄国推出来与德国交战，但德俄之间打仗“无缘无故”，他辛辣地嘲讽了那些西方的纳粹友人，他们想引诱第三帝国去进攻苏联，但德国领导人根本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最后，他总结了苏联的目标，“我们主张同所有与苏联交界的邻国都保持和平和密切的睦邻关系”。他想继续敞开与英法美结盟的大门，却不排除和德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希特勒当时进攻波兰已是箭在弦上，他为了战略上的考虑，需要与苏联达成“君子协定”，但斯大林高超的谈判计谋，使希特勒的神经紧张到崩溃的状态，在双方斗智斗勇方面，斯大林占了上风。1939年8月23日夜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当时条约中有一句话是关于苏德两国形成友好关系的，斯大林对此表示反对。他说，苏联政府在被纳粹政府劈头盖脑地倾倒了6年大粪之后，不能突然之间把一项德苏友好宣言拿到群众面前。后来把这句话删去了。

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明白，这个有效期为10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但斯大林由此获得了时间。丘吉尔说：“斯大林同希特勒做交易一举，固然令人齿冷，然而在当时是高度现实主义的。斯大林的首要考虑和任何其他国家首脑考虑的一样，是他自己国家的安全。”斯大林后来告诉丘吉尔说，他在1939年夏天深信，希特勒要打仗了。他决定苏联不能被别人骗到单独对德作战的倒霉局面中去。如果和西方结成靠得住的同盟已不可能的话，那为什么不转而联合希特勒呢？况且，希特勒已经找上门了。斯大林正是运用了灵活的外交策略，寻找多种能实现自己意图的道路，以达到避免战争和拖延战争的目的，这对苏联是至关重要的。

五、聚积民心稳定大局

纵观古今中外，无论大事小情，决定其成败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在这当中人是最重要的。所谓人心所向，势不可挡。尤其是在国家生活遭到极度危难的时刻，一个民族将遭到外敌毁灭的时候，一个能抓住民心，激励所有的人朝着一个目标奋斗的策略更是必不可少，意义重大。

1941年6月21日夜，德国法西斯的魔爪已伸向了还在幻想避战的苏联。这天夜里，一名德军司务长越过了防线对苏军指挥员说，德国军队将在次日凌晨进攻苏联。斯大林获悉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召集全体政治局委员和苏联总参谋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人员商量对策，虽然最后向各军区发出了警报，但斯大林心中还存有一线希望：也许是德国将领把这个逃兵送过来，是为了挑起事端，再嫁祸于人，也许这是一场虚惊，然而，事实残酷地毁灭了斯大林的种种设想。希特勒在22日（星期天）凌晨3点半，动用190多个师的兵力，背信弃义，对苏联不宣而战。凌晨4点半，苏共中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集中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斯大林站在桌子旁边，脸色苍白，手里握着没有点燃的烟斗，显然他很震惊。这时莫洛托夫匆匆跑进来，他刚刚同德国大使会晤。他报告斯大林说，德国已经宣战。听罢此语，斯大林颓然坐下，讲不出一句话。这是他一生中受刺激最大的时刻之一。他知道苏联国内，武器正开始源源不断地从国防工业输送到武装部队，紧张的训练正使部队的纪律和效率日益提高，如果再给他半年时间，情况会和现在大下一样。他已经不惜一切用尽了所有可能的办法来避免这场战争，他曾尽力要使这次战争至少推迟到第二年春天。他以为成功了，但事实告诉他，他失败了。他知道自己已经犯了一个灾难性的估计错误。他错误地判断了希特勒的意图，被这个盗世奸雄骗了。虽然他曾和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苏联高级将领商讨过他的看法，他们都赞成斯大林的观点，但是，他们都被他所左右，意识到斯大林过人的智力和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这一结果使社会主义苏联正面临一场大浩劫，这场浩劫可能会严重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及其一切成就。斯大林认识到这完全是他的责任。

在德国疯狂入侵的初期，苏联损失惨重。这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的入侵使全国人民极度震惊和茫然，他们不知所措。在这严峻的时刻，斯大林首先决定要把人民团结起来，鼓舞他们的斗志，振奋民族精神，这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他忘不了1940年的法国，也是面临纳粹的凶猛进攻，但是软弱的政府丧失了民心，而涣散的民心最终对国家的败局无能为力。

7月3日，也就是德国入侵后第十二天，斯大林要召唤他的人民，振奋他们精神，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这是国难当头之时的一次历史性的演讲，没有华丽的词藻，斯大林呼唤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保卫祖国的顽强的俄罗斯天性。他以朋友和领袖的双重身份呼吁人民，这讲话正是人民所期待的信念。在各地收听广播的苏联人中，特别是在武装部队中，产生了“巨大的热情和振奋了爱国之心”。后来在几个方面军发挥杰出作用的费久宁斯基将军写道：“我们一下子感到强大了许多。”

请听斯大林庄严的声音：“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在向你们讲话！”这是他的开场白，同他平时讲话的形式截然不同，立即把听众与他紧紧团结在一起了。接着，他带着体帖人民心情和需要的强烈感情，描述了他们目前所处的困境，一字一句都表达

了斯大林要争取胜利的不可动摇的坚定决心。

他说：“希特勒德国从6月22日起开始向我们祖国发动的背信弃义的军事进攻，正在继续着。虽然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敌人的精锐师团和他们的精锐空军部队已被击溃，被埋葬在战场上，但是敌人还在继续向前进犯。……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对于人所共知的苏德条约，斯大林解释道，苏德条约本来是为了求得和平，或者至少推迟战争，但希特勒背信弃义地破坏了协议，发动突然袭击。虽然他现在占了优势，但是它在政治上、道义上失败了，失道寡助，他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自己是破坏人类和平的刽子手。

斯大林用简明的语言使人民深切地认识到战争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敌人是残酷无情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侵占我们用自己的汗水灌溉出来的土地，掠夺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粮食和石油。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地主政权，恢复沙皇制度，摧残苏联人民，把他们德意志化，把他们变成德国王公贵族的奴隶。因此，这是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斯大林直言不讳地告诉苏联人民，他们正在同一个丧心病狂的敌人进行生死搏斗，他们必须无情地、毫不留情地打击敌人。他们必须消除后方的混乱和恐惧。同时，他强调指出，在某些地方必须执行焦土政策，不给敌人留下一部机车、一节车厢、一公斤粮食、一公升燃料……要造成敌人及其走狗无法安身的条件，步步追击他们，消灭他们，破坏他们的一切活动。斯大林还对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关于帮助苏联的历史性的演说和美国政府关于准备帮助苏联的宣言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他号召全体苏联人民。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团结在苏联政府周围，齐心协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1941年夏季是苏联灾难深重的时刻。一个伟大的民族正遭受着严峻的考验。人民处在了纳粹的铁蹄之下。此刻，聆听斯大林的讲话，像一声洪亮的警钟，一篇战斗檄文，一支进军号角，使人们深切感受到“祖国在危急中”！它将激励着英雄的苏联人民为祖国而战，为和平而战。他们在斯大林“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战斗口号下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崇高的爱国主义目标——保卫自己神圣的国土——而坚强地站起来了。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使全苏联人民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战斗堡垒，全身心投入到了反法西斯的卫国解放战争中。斯大林聚积民心，抓住了克敌制胜的关键。

在整个卫国解放战争中，斯大林一直视民心、士气、军队为最宝贵的东西。在战争的头三个月，红军损失惨重，大规模的挫折和希特勒准备在冬季来临之前攻占莫斯科的计划，使斯大林再次感受到，要坚定人们战斗的决心，要鼓舞人们奋斗的勇气，必须把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防止四分五裂，这是当前头等大事。1941年10月，莫斯科处在万分危机之中。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国防委员会宣布莫斯科戒严，号召首都人民不惜一切，配合红军，誓死保卫莫斯科。《真理报》发表《阻止敌人向莫斯科前进》的社论，动员全市人民在敌人到达首都之前，用自己的鲜血把他们埋葬。莫斯科市委召开全市积极分子大会，号召全市人民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把首都变成攻不破的堡垒。

在莫斯科危机的日子里，全市人民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全市约有45万人参加修筑防御工事，他们不畏严寒，夜以继日。11月，在莫斯科附近修筑了320多公里长的防坦克障碍物，设置了250多公里长的防步兵障碍物。他们在冰冻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双手，挖土300多万方，有力地支援了苏联军队。

为鼓舞军队士气，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告军队士兵书：“同志们！在我国面临危险的严酷时刻，每一个军人的生命应该属于祖国。祖国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贡献出最大的力量，发扬英勇顽强、英雄主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祖国号召我们要成为无法摧毁的铜墙铁壁，堵住法西斯匪帮去莫斯科的道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警惕性、铁的纪律、组织性、坚决果断的行动、必胜的信心和随时准备自我牺牲的精神。”英雄的莫斯科军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临危不惧，誓死与德寇决一死战。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斯大林决定举行战时大阅兵。

1941年11月1日，斯大林在最高统帅部召见负责莫斯科外围地区防卫的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格奥尔基·朱可夫。斯大林对他说：“今年十月革命节，除了开庆祝大会外，我们还准备在莫斯科举行阅兵式，你觉得前线形势允许我们举行这些庆祝活动吗？”

朱可夫略加思索后答道，经过10月份的激战，敌人正在整编，看来目前不敢轻举妄动；不过敌人的空军也许要来捣乱。最后决定，无论如何要举行阅兵式。为了防备在庆祝活动中遭到空袭破坏，最高统帅部立即从附近地区调来大批战斗机部队，以加强莫斯科的空防。

当时的局势是非常严重的，德国侵略军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希特勒在10月2日下令执行所谓“台风”计划，妄图一举攻占莫斯科。希特勒在命令中骄横地扬言：“进行最后一次巨大打击的先决条件终于具备了。必须通过这次打击，在冬季到来之前将敌人消灭……今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决定性的战斗今天开始了”。

莫斯科当面之敌是德军元帅冯·包克所率领的中央集团军群，人数超过100万，是进犯的三支德寇中最强大的部队。斯大林把朱可夫从列宁格勒调来莫斯科，派他担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负责莫斯科外围地区的防卫战。

敌人逼近莫斯科，全市沉浸在恐惧之中。国防委员会已于10月12~13日下令把许多政府机关、科学和文化组织以及外交使团向东疏散。到月底，约有200万人撤离了莫斯科。在极其严重的形势下，11月6日在兵临城下、炮声隆隆、“敌军围困万千重”的莫斯科，苏联首都人民在地下铁道马雅可夫斯基车站隆重举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24周年庆祝大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广播讲话，宣布纳粹德国的闪电战在苏联已遭彻底失败。他满怀信心他说：“既然德国人想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苏联给予他们的）歼灭战！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侵入我们祖国领土的所有德国人——占领者一个不剩地歼灭掉。”

第二天，即11月7日上午，初冬的雾气笼罩着莫斯科，首都军民在飘着雪花的初冬雾霭中，在红场上举行了盛大的独具风格的阅兵式。革命歌曲响彻云霄，口号声、欢呼声连成一片，此起彼伏。由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特米耶夫中将指挥，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检阅了红军队伍。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以藐视和压倒一切敌人的大无畏精神，以战胜法西斯的必胜信心，威严地屹立在列宁墓前，向苏联军民发表了充满激情、鼓舞人心的演说。他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们，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的战争！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彻底粉碎德国侵略者，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

斯大林再一次向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呼吁。他的演说充满了激情和诚意。这是从他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声音。苏俄是神圣的俄国，他相信，建设

祖国的艰难岁月和当前残酷的战争必将使俄国人民赢得公正、自由和繁荣。

这两次演讲的文本迅速在军队和人民中散发，飞机向敌占区空投了讲话文本，每个俄国人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使军队和老百姓的士气大为振作。

在敌军的隆隆炮声中，全副武装的苏联红军，迈着雄健的步伐从红场列宁墓前走过，接受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检阅，随后从红场直接开赴战场，进入了战斗。

这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战时大阅兵，它集中地表现了苏联军民击败德国法西斯的坚强意志。斯大林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军民的士气。

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斯大林善于凝聚民心，争取人民，号召全民抗敌的策略，为最终打败希特勒，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六、用人之长补己之短

中国历史上刘邦得天下后，说了这样一番话：“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悲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这段话反映了一国之主要善于用人，充分利用集体智慧，才能创造奇迹。

在苏联整个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和他的最高统帅部一直在莫斯科，这对于苏联人民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反侵略战争，有着巨大的鼓舞作用。特别是斯大林善于运用人尽其才之道，汇集奇才良将，依靠众人智慧，使苏联终于从被动的绝境找到了最适合于当时情况的斗争方式和方法，终于从敌人手中夺取了主动权。这正是斯大林高明之处。

在战争最初阶段，红军损失惨重，斯大林敏锐地看到，恢复军队的自信心刻不容缓。而建立一支经过精心挑选和严格训练并能够担负起领导工作的军官队伍是斯大林心中常常优先考虑的问题。

在莫斯科战役时，他开始对一群新的军事杰出人物进行基本挑选，于是朱可夫、瓦西列夫斯基和沃罗诺夫就涌现出来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继续进行挑选，于是瓦图丁、叶廖缅科、马林诺夫斯基、崔可夫、罗特米斯特洛夫、罗第母采夫和其他人就从此为众人所知。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这种挑选接近完成了。这次战役成了年轻的切尔尼亚科夫斯基像彗星一样的一生中的转折点，他在3年之中，从少将升为大将。这些人差不多都是30多岁和40多岁，毫不墨守陈规，在战争这座严酷的学校中贪婪地学习，直到他们成为敌人势均力敌的对手，后来更胜敌一筹。斯大林用人不论资排辈，他可以把老资格人员的一切缺乏创见的主张都抛到一边，而注意在战斗中的实际表现。当战争爆发时，差不多他后来所重用的元帅和将军都还是下级军官或无名小辈。但斯大林唯才是用，这些入后来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切尔尼亚科夫斯基将军，在战争开始时他指挥一个坦克军，到1944年春，在他36岁时，他就被任命为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司令员。查波罗热茨是一位受信任的老布尔什维克，在第60集团军当政治委员，由于切尔尼亚科夫斯基感到无法与他继续相处，罗科索夫斯基就要求撤换查波罗热茨，这时，斯大林立即把查波罗热茨召回了。斯大林提拔的正是像切尔尼亚科夫斯基那种能够大胆行动，敢于负责的专业人才。一次，在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正在讨论任命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司令员入选问题，对大家提到的几位人选斯大林都不满意，沉默了好一会儿，人人都在考虑一名合适的人选。突然，副总参谋长瓦图金一个立正，“斯大林同志，任命我去指挥沃罗涅日方面军吧。”他说。这一勇敢的自荐行动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

“什么，你？”他惊奇他说，皱起思索的眉头。瓦图金是炮兵中将，1920年参加红军，除了在莫斯科战役中短期指挥过作战以外，没有担任过司令员。最后斯大林打破了沉默，转身问华西列夫斯基，“你认为如何？”华西列夫斯基赞成派瓦图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斯大林对瓦图金说：“既然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对你感到满意，我不反对。”瓦图金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方面军司令员。在这重大职位的人选问题上，斯大林再次表现出对人才的尊重。

斯大林还注意倾听与他不同的意见。只要这些意见是有根据的，而且提得线索清晰，斯大林会认真考虑。1943年7月，俄军准备对德军进行一次大

反攻。战争开始前几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召集了一次总参谋部、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的会议，会上安东诺夫明确他讲解了作战计划。斯大林问了几个问题，表示同意。当时指挥近卫第8集团军的巴格拉米扬想对计划提出点修改意见，因为原计划影响到他在左翼的作用，但在最高统帅面前，他又犹豫不决，欲言又止。大家卷起地图，会议似乎已经结束，斯大林突然问是否有人有不同意见。巴格拉米扬说他有。斯大林看着他，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叫他把意见说出来。巴格拉米扬紧张得不得了，他还是竭力控制住自己。在场的人又都摊开了他们的地图。他说明了在即将到来的攻势中他认为他的集团军应起什么作用，提出了他的修改建议。接着是沉默。巴格拉米扬以为，他的建议仅仅是一位集团军司令员的建议，一定会遭到他称之为“大三位一体”的最高统帅、总参谋部和方面军司令员的压制。然而，斯大林和其余的人研究了他们的地图，然后，斯大林对巴格拉米扬说，你的建议被接受了。

斯大林就是这样，他要让他的将领们有自由行动的感觉，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斯大林则通过试验和总结错误的方法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他力求消除将领们心里的畏惧感，而这正是希特勒所不及的。希特勒的将领们曾对斯大林和希特勒进行了一番比较，他们更为敏锐、客观地评价了斯大林的策略。他们认为，在苏联的上层指挥中，“充满了一些有能力的人，因此，他们被容许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而且可以平安无事地坚持按自己的方法去做”。

当然，斯大林作为苏联最高统帅，在每一个重大的和许多次要的军事问题上都要作最后的决定。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一方面是斯大林要作最后裁定，另一方面他的下级又有主动的自由，这二者究竟如何调和起来呢，原来，斯大林有他独特的作决定的方式，他不仅不限制将领们的想法，相反地还尽力诱导他们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不把战略上的教条强加给别人，他也不轻易地把自己的行动蓝图直接交给将领们。他根据对形势的一切方面，即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卓越知识，向他们提出一般的想法。但是仅此而已，接下去他就让他的将领们去形成自己的意见，制订自己的计划，然后他再根据这些作出决定。他的作用似乎就是在将领中作一个冷静的、超然的和有经验的仲裁者。在他的将领们发生争论时，他就收集有关人员的意见，权衡利弊得失，把局部性的观点同一般的考虑联系起来，最后谈出自己的看法。因此他的决定并不完全勾销将领们的想法，而经常是批准了将领们曾经一再考虑过的那些主意。

希特勒则不同。他一贯是在事前想好了主意——有时是漂亮的主意，有时就是胡思乱想——然后试图去强迫像布劳希契、哈德尔和龙德施台特那样的人去接受。他是一个半瓶醋的业余爱好者，经常在战略问题上放空炮，却不能容忍那些看不到他的特殊教条或计划有何优点的人。法西斯独裁的结果，使他最终战败于斯大林。

斯大林创造性的发挥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有一个精干的，极富谋略才华的最高统帅部，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天，斯大林就吸取了列宁在内战时期的做法，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战略领导制度，即向最关键、最重要的地区派去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的都是最有军事素养的军事首长。他们对情况了如指掌，而且通常都是制定当前重大战略计划的参与者。最高统帅部要求自己的代表对战役实行全面领导并负全部责任，并为此授予他们

全权。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充当统帅部的代表呢？首先是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其中包括伏罗希洛夫、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最高统帅部在部队的常驻代表则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其次，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还有负责组织不同兵种作战的军兵种代表。

战争期间，最早被以最高统帅部代表派去基辅的是朱可夫。后来，朱可夫曾以此身分去作战部工作不下 15 次。他在 1941 年 2 月 1 日就任总参谋长，他原是一名军士，农民出身。他在 1939 年曾指挥几个装甲师在远东的哈勒欣河一带作战，战绩显赫。他有天才、诚实、坚强的个性，实践中练就了卓越的指挥才能，成为俄国出色的野战军司令员，是斯大林得力的助手。他和斯大林的关系有时激烈紧张，但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从朱可夫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撰写的回忆录中所记载的许多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从未怀疑过斯大林的权威，他把斯大林看作是具有非凡智慧的领导人，精通各种事务。包括军事。

华西列夫斯基，也同样多次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被派往各个方面军。他和朱可夫不只一次地一同出征去指挥千军万马。凡是同华西列夫斯基一起工作过的人，总要谈到他渊博的知识和精确而清晰的思维能力。

华西列夫斯基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组织第一批红军正规军的经验，参加了国内战争。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已经显示出见识广阔、深思熟虑和有主动精神的指挥员的素质。1936 年，华西列夫斯基被送进总参军事学院深造。在这里，他研究战役问题的知识能力增强了，军事素养加深了。1939 年后他开始总参作战部工作，成了统帅部拟定最重要计划的领导人。卫国战争爆发后，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他曾不止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作战部工作。但是，他每次都能准时圆满地完成任务。他给最高统帅部的每一个报告，都是非常全面而又极其明确的。最高统帅很赏识他的这些素质，华西列夫斯基也很善于在最高统帅的面前坚持自己的观点。

原任外高加索方面军参谋长，后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和副总长的安东诺夫将军，也是最高统帅部中斯大林最宠爱的将领之一。安东诺夫具有很高的军事理论水平，卓越的组织能力，清楚的头脑，坚毅的精神，并具有突出的军事才干。他敢于直言反对错误意见，对斯大林也是如此。

斯大林用他杰出的管理组织能力，将朱可夫，华西列斯基和安东诺夫等一批谋士将才汇聚一堂，集众将帅之精华，谋克敌制胜之大略。朱可夫后来曾写道：“今天，在斯大林逝世之后，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他从来不听别人的劝告，所有的军事方针政策问题都是独断专行。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当他意识到作汇报的人熟悉自己所谈的情况时，他总是倾听，而且我知道他有几次重新考虑自己的意见和修改决定的事例。许多次作战行动中都有这样的事例。”

朱可夫元帅说：“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赋和智慧、政治领导经验、巨大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他善于从战略情况中找出主要环节，并抓住这个环节，采取对策，组织相应的进攻战役。毫无疑问，斯大林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

“斯大林的功绩就在于他迅速而正确地采纳军事专员的意见，加以充实和提高，然后以概括的形式——守则、指令、教令——立即推广到部队中去，指导实践。”

七、抓住大好时机展开灵活外交攻势

在 1943 年的夏季攻势中，苏联红军克复了曾经丢掉的苏联领土的近三分之二。这一形势使斯大林感到轻松了许多。他对于德国同西方国家单独媾和的担心，如果说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话，也必定是大大减退了。希特勒已经投入了地面部队的百分之八十或百分之九十来进攻苏联，而且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已无力增加在东线的力量来打败苏联。甚至还有这样的可能：由于各种有利条件的结合，其中包括相当重要的希特勒在战略上的错误，苏联能够在没有英美进攻欧洲大陆的情况下赢得战争的胜利。他虽然不会这样来进行赌博，但是他知道，他对盟国讨价还价的地位异常增强了。因为现在是它们更有理由害怕单独媾和，更加急迫地要保持这个联盟，他还清楚，它们也急于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这个前景此时还是相当模糊的，在当时所有政治家中，还没有谁像他这样拥有这么多的王牌。

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斯大林心头萦绕的许多事情又再次成为他考虑的焦点。他决定抓住大好时机，展开灵活的外交攻势，争取主动。他虽然对英美拖延第二战场表示不满，但他还是真诚地谋求同它们达成真正的谅解，因为在斯大林看来，战后和平和世界稳定将取决于三大强国的团结。他坚持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则联合存，以退让求联合则联合亡的外交原则，作为处理苏联与盟国关系的基础。与此同时，丘吉尔和罗斯福也迫于形势，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急切要求与斯大林会面，三方领导人需要讨论和协商如何进一步联合行动，以便更快地战胜共同的敌人，结束战争。这就是许多历史学家称之为反希特勒同盟的极盛阶段的标志——德黑兰会议的背景。

在德黑兰会议的准备阶段，斯大林颇费心机。他采取以退为进的方式尽可能地避免同他的伙伴们会晤。他拒绝参加他们在开罗举行的会议，理由是蒋介石参加了这个会议，他如果参加就可能过早地激怒日本，而苏联是极不愿意卷入同日本的纠纷中的；他也拒绝同罗斯福单独会面。他这一手果然吊起了对方的胃口，也为自己争取了主动。1943 年 10 月，科德尔·赫尔参加莫斯科外长会议，竭力劝说斯大林同意会晤。斯大林似乎让步了，但他又坚持会议必须在德黑兰进行，因为德黑兰当时在苏英军队的占领之下。他断然拒绝到离苏联太远的任何地方去，理由是苏德战场上正进行着激烈的战争，他作为一个最高统帅不能长久离开莫斯科。显然斯大林此举是带有其政治动机的。他同时也在向他们表示，斯大林对盟国迟迟不进攻西欧是感到愤怒的。他或许还希望诱使他的伙伴们到苏联来会晤他，这样就会对斯大林已经提高了的地位增加光彩。最终丘吉尔和罗斯福妥协了，同意在德黑兰举行三国首脑会议。

“三巨头”会议于 11 月 28 日在苏联大使馆开幕。人们可以想象，脾气、背景和利益如此相异的人，作为盟友坐在一起决定最重大和严重的问题，是很少有的场面，但一定很精彩。那时整个世界都密切注视着他们的每一个行动，倾听着他们的每一句话。不仅受蹂躏的欧洲各国期待着“三巨头”首次会晤时要作出的决定，轴心国也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三国会议的结果。斯大林在这件世人瞩目的事情上大获全胜。

斯大林特意邀请罗斯福同他住到苏联大使馆，说德黑兰有人正在搞一场阴谋。这样做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斯大林自己搬到大使馆内一间小屋子，

把地方腾出来给他的客人。尽管有这种关心的姿态，罗斯福依然改变不了对斯大林的评价：“端庄、僵硬、严肃、不苟言笑，没有一点人情味。”但罗斯福还是用他的方式表达到了对斯大林的好意的回报，那就是设法讽刺一下丘吉尔以取悦斯大林。事实上，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不和谐的任何迹象，哪怕十分微小，都会对斯大林产生抚慰效果。

会议上讨论的重点是军事问题。这对于斯大林来讲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军事上的争论十分有利于他。斯大林特别关心的是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作战计划。但是，丘吉尔建议盟国部队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地点登陆。斯大林指出，这些行动都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在地中海各处采取一系列行动来分散和削弱盟国的力量是错误的。相反，如果渡过海峡出兵法国，盟国会更有交通线最短和防备最好的优点，可以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他们解放了法国，就可以使德国的士气遭到无可挽救的打击；最后，他们就会有一条最短和最直接的路线，直捣德国工业中心鲁尔。斯大林直率而简洁地提出他的论点，而丘吉尔则离题侈谈在巴尔干采取种种行动的可能性。当斯大林明确询问丘吉尔：“我想对首相直接提出一个关于‘霸王’战役的问题。首相和英国官员是否真对‘霸王’战役抱有信心？”丘吉尔回答说：“假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具备了上述进行‘霸王’战役的各种条件，那么我们将竭尽全力横渡海峡去猛攻德国人，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便是一个绝妙的丘吉尔式的回答，以一个条件开头并充斥修饰的措词，而斯大林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是”，但他却避而不答。

在激烈的争论中，斯大林占了优势。美国三军参谋长同意斯大林的意见，甚至某些英国将领也反对丘吉尔的主张。罗斯福起初有些犹豫不定，后来也接受了斯大林的看法。罗斯福强调，尽量打赢这场战争，以最小的损失换回胜利。因此，出兵法国比地中海战役更有意义。另外，罗斯福考虑到了这一点，斯大林在会议开始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苏联一旦从欧洲战场解脱出来，就参加对日作战。无论怎样，斯大林获得了胜利。为了不使盟友难堪，斯大林积极帮助制订如何渡过海峡作战的计划，甚至还透露了他的某些战争诡计：他有5000辆假坦克，2000架假飞机和其他东西，用来引诱敌人的攻击。最重要的是，斯大林答应在西方军队登陆欧洲大陆时发动强大的支援攻势。斯大林有进有退，赢得第一个胜利。

11月29日全体会议开始之前，在苏联使馆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个简短而又令人难忘的赠授“斯大林格勒荣誉剑”的仪式。剑上用英文和俄文刻着：“赠给坚强的斯大林格勒市民。国王乔治六世代表不列颠人民敬赠。”这柄由英国技术娴熟的、祖传的铸剑能手锻制成的双把巨型宝剑象征着对斯大林格勒市给予法西斯致命一击的英雄们的尊重。

仪式开得很简短。指挥仪仗队的英国中尉把这把耀眼夺目的华丽的宝剑交给身穿三军统帅服的丘吉尔，丘吉尔转身面对斯大林说，他奉国王之命，将此荣誉之剑交给斯大林，托他转交给斯大林格勒市。

斯大林身穿佩带大元帅肩章的浅灰色军服，他身后站立着手持冲锋枪的苏联仪仗队。斯大林接过宝剑，将剑抽出镶嵌着贵重饰物的剑鞘，剑刃寒光逼人。他把剑捧到嘴边，吻了一下，然后把剑递给伏罗希洛夫。不幸的是伏罗希洛夫笨手笨脚地接过去差点失手掉在地上，但是他还是抓住了剑，把它交给了俄方指挥仪仗队的中尉。斯大林说，“我代表斯大林格勒市民，对国王乔治六世赠送礼品表示十分感谢。斯大林格勒市民高度评价这件礼品。我

请您，首相先生，向国王陛下转达斯大林格勒市民的谢意。”

罗斯福后来谈到这事时说，他看见斯大林以一种奇怪的骑士浪漫姿态俯身吻剑时，眼里充满了泪水。眼泪也许与斯大林的性格不相宜，但也许是他真的动了感情。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时刻。因为有谁会想到，英王陛下有一天会给予一个用格鲁吉亚农奴的儿子、巴库监狱的囚犯、西伯利亚的流放者、列宁的信徒的名字命名的苏联城市以这样的荣誉？

斯大林第二个胜利是在苏波边界问题上如愿以偿。丘吉尔和罗斯福感到，现在再向以前一样地建议把苏波之间的长期不和放到将来的和平会议上解决，已经没多大的意义了。苏联红军正在迅速地接近波兰以前的边境地区，肯定会要把它重新合并于苏联的。由于无法在事先防止这个重新合并的行动，丘吉尔显然宁愿由盟国来批准这一行动，来个顺手人情。于是，他提出一项建议，“三强”承认所谓的“寇松线”作为苏联和波兰的新边界。斯大林对此欣然同意。寇松线是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于1920年提出因而得名的。这个过去一直没有达成协议的问题，这次经过一些微小的修改后，把那些有争议的亡地划给了苏联。

11月30日是丘吉尔的69周岁的生日，用他后来的说话，这是一个非常忙碌而值得怀念的日子。这天晚上，斯大林、罗斯福和他们的代表的全体成员，都前往英国使馆祝贺。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去英国大使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警卫人员采取了精心的保安措施，彻底搜查了现场，询问了服务人员，在所有的门口以及房顶上都布置了武装警卫，戒备森严。尽管如此，晚宴仍然充满着轻松愉快的气氛。在为国王乔治六世、加里宁主席和罗斯福总统的正式祝酒结束后，丘吉尔提议为“圣人罗斯福”和“伟人斯大林”各干一杯。罗斯福、斯大林也向老寿星祝了酒。晚宴快结束时，斯大林为波斯服务员斟满了一杯香槟酒，祝他和他的伙伴们事事如意。斯大林此举给波斯人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祝酒时也曾发生过一次尴尬的事情。罗斯福总统提议为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将军干一杯，但他的话还未说完，斯大林站了起来，说他要接着致祝酒词。于是他便讲开了，言外之意是说布鲁克没有对红军表示真挚的友好感情，对红军的优秀品质缺少真正的了解，希望他以后对于红军的士兵表现出更深的战友情谊。

布鲁克听后很难堪。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对斯大林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知道如果我忍气吞声坐下来，那么，他可能对我有过的任何尊敬就会丧失殆尽，而且以后还会继续对我攻击。”布鲁克在致答词时，转身对斯大林说：“元帅，请允许我谈谈您的祝酒词，你认为有必要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这使我非常惊异，你会记得，今天早上我们讨论掩护计划时，丘吉尔先生说过：‘在战争期间，真理必须用谎言来护卫。’你也记得，你本人亲自告诉我们说，在你进行重大攻势时，你总是对外界隐瞒你的真实意图的。你的一切假坦克、假飞机，总是集中在人们直接感兴趣的战场上，而你的真正意图却总是讳莫如深的。那么，元帅，你被假坦克、假飞机蒙蔽了，你没有发现我对于红军的真诚友好的感情，也没有看出我对于红军所有将士的真诚的战友情谊。”这一番精彩的反驳，斯大林伸出自己热情的手与布鲁克握在了一起。斯大林说：“最好的友谊就是经过误会之后建立起来的友谊。”丘吉尔对斯大林有些敬畏。正如他的私人医生所说的那样，丘吉尔当着斯大林的面总有一股不自在感。他感到他面前的这个人思想敏捷，运筹帷幄，思考周全，这个人采用的俄罗斯—亚细亚式的思维方式，是他所理解不了的—

种谜，但更主要的是这个人拥有绝对而又无情的权力，这是他从未碰到过的。斯大林同丘吉尔开了不少玩笑，丘吉尔没有介意。但在会议第一天的晚宴上，丘吉尔在一个问题上就不知道斯大林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说正经话，致使丘吉尔反应过度。

晚宴当中，三人谈到战后如何惩处德国人时，斯大林说一定要消灭德国总参谋部，因为希特勒强大的军事威力就是这5万名左右的军官，所以要把他们统统都枪毙。这话听起来似乎是挺认真的，实际上是在开玩笑。因为在斯大林格勒和其他一些地方俘虏的保卢斯元帅和其他军官都受到了优待。

但丘吉尔一听便激动起来，他说，“英国议会和公众永远也不会容忍集体枪杀。”斯大林故作戏谑地重复说：“一定要枪毙5万人！”丘吉尔非常生气。艾登则赶忙暗示丘吉尔，这是句玩笑话，但丘吉尔根本不听。罗斯福力图重新用幽默来让大家一笑了之，他提出应该枪毙的不是5万人而是4.9万人。丘吉尔一听大声吼道：“我宁愿此时此地让人把我押到花园里去枪毙掉，也不愿让这样的可耻行为玷污我和我的国家的荣誉。”一气之下，丘吉尔离开餐桌，走进隔壁的一个房间。不一会儿，有人在拍他的肩头，他转身一看，原来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人都笑嘻嘻的，他们对丘吉尔解释说，那不过是个玩笑。后吉尔后来写道：“斯大林的风度是很有魅力的，如果他表现出这种风度的话。”

虽然“三巨头”在12月1日的离开德黑兰分手前，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那就是关于战后德国问题，但是，他们还是成功地达成开辟第二战场这一重要协议。最后他们三人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我们是怀着希望和决心到这里来的。我们离开这里时已成为事实上、精神上 and 目的上的朋友。”

斯大林则以高超的外交技巧，在这次会议上占据了主动。虽然西方政治家们在意识形态方面与斯大林不同，但他们都很赞赏斯大林独有的魅力。罗斯福说，他说话言简意赅，目的明确，为达到目的耐心而又坚韧不拔。布鲁克认为斯大林具有杰出的军事头脑，说他在每次发言中都以他那敏锐而准确的洞察力来弄清局势的含义，“在这方面他比罗斯福和丘吉尔突出”。美国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团长迪安将军说：“谁也不会看不到此人的伟大之处。”与这种本质上的伟大结合在一起的还有一种魅力，有时还有一种通情达理的热情，这种人情味似乎同他在为苏维埃国家利益时表现出来的那种令人生畏的无情不相吻合。

富兰克林·罗斯福谋略

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连任四届的美国总统。他曾任海军部助理部长，后因患小儿麻痹病下肢瘫痪，但他以惊人的毅力投身政治，出任纽约州州长，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时期，敢作敢为，成为全国瞩目的政治新星。在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时刻，在美国金融体系濒临崩溃，失业人数达1200万的关键时刻登上总统职位，入主白宫。

富兰克林·罗斯福任用革新人物，果断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大力推行“新政”，稳定了全国局势，显示出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才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美国参加反对德、意、日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丘吉尔、斯大林领导的英、苏密切合作，联合一切反侵略国家共同击败了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集团，成为二战时期的三巨头之一。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政治谋略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一、勇敢地抓住机会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中学时代，深受格罗顿公学校长卡博迪博士的影响，激发了极大的学习热情。但不甘寂寞的他，更崇拜自己家族的英雄人物——他的堂叔西奥多·罗斯福，热衷于政治活动。当他进入哈佛大学之后，众多的学术精英没有一个人能激发他的学习激情，他的学业成绩始终平平淡淡。年迈的父亲积一生的经验，要求他学习法律，而他却把适合于从政需要的历史学、政治学、新闻学当作主修课，讲演当作辅修课，仅历史课就选了 17 门之多；虽然坚持学了四年经济学，但直到晚年，他还尖刻地说，四年所学经济学，教给他的全部是错误。他的目光已投向政治，时刻注视着全国政治风云的变幻。西奥多作为一颗政治新星的崛起，更使富兰克林心潮澎湃，坐立不安，甚至在他还不足法定选举年龄时，他已参加到共和党人俱乐部里，为共和党的竞选奔走呼号。他用“狡黠”的目光注视全国的政治形势，观察分析政治动向，几乎成了他的习惯和嗜好，从中练就了一种观测政治风向的敏锐的洞察力。这使他能在纷坛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看准哪些属于自己的机会，见机而动，勇敢地抓住机会，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成功。这就是罗斯福步步高升最终获得成功的关键。

学习成绩平平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试图在哈佛最受人尊敬的体育活动中为自己赢得声望。他身材瘦高，尽管在足球场上摔得皮青面肿，还是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他试图在社团活动中出人头地，但哈佛有名望的社团却毫无理由地把他拒之门外，他只能去参加那令人不快的“苍蝇”社团。对于罗斯福来说，没有比这更伤害他那敏感的自尊心了，他一度消沉万分。他最后学当记者，成为《红色哈佛报》的成员。虽只是一个普通成员，这对他已是相当不容易了。这时西奥多已由参议员、海军助理部长当选为美国最有影响的纽约州州长，又成为共和党的政治新星和副总统候选人，是全国注目的人物。富兰克林·罗斯福趁机写了一篇《新阿姆斯特丹的罗斯福家族》的历史论文，为自己的家族涂脂抹粉，以提高自己的声望。他看到堂叔西奥多政绩显赫，共和党声望日益高涨，就萌发了邀请西奥多到哈佛讲演的念头。西奥多没有让堂侄失望，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到哈佛讲演，并接受了堂侄的采访，一时间，富兰克林·罗斯福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红色哈佛报》开始重用他，人们也开始把他与州长联系起来，这极大地满足了他那备受刺激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他意识到，自己的成功不仅要靠自己拼命地学习或工作，更多的是要看准机会，抓住机遇，使自己一举成名。他在这种信心的鼓舞下，更热切地把目光投向那富有全国意义的事件上。

1901 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推举麦金莱和西奥多·罗斯福为正副总统候选人与民主党角逐。两党竞争十分激烈，哈佛大学作为全国学术精英汇聚的地方，其政治倾向，政治态度尤受舆论界关注，而任校长达 30 年之久的查尔斯·埃利奥特的态度更为关键。由于校长治校严厉和他那不可仰望的威望，从来没有人能在投票前采访他。可年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决定冒险一试，果然不出所料，校长十分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并用冰冷严厉的目光审视着这个冒昧的学生记者。罗斯福窘迫异常，感到无地自容；恨不得躲到门背后去，但他还是硬着头皮，鼓足勇气，努力控制住自己，对校长说：“如果您的投票，代表您的信仰的话，您就应该乐意地把您的影响放到天平上去。”校长意外地被说服了，他告诉富兰克林·罗

斯福说，他准备投共和党人的票，赞成麦金莱和西奥多·罗斯福搭档。《红色哈佛报》登载了这条新闻，立即引起全国的关注，全国各大报刊均头版登出这条竞选消息，罗斯福又一次看准了机会，获得了一个学生记者最大的成功。这时，他已成为哈佛的名人了。

罗斯福宁愿去听西奥多的谈话，也不愿在哈佛上课。有一次他要去拜访西奥多时，西奥多这位新当选的副总统，让他不要来，西奥多告诉罗斯福，他将去哈佛演讲国际公法问题。演讲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就站在西奥多——他堂叔——副总统的身边，这使小罗斯福更加身价倍增。罗斯福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必须走西奥多的路，作一名美国总统，而自己事业的成功离不开这位堂叔的影响和支持。不久，总统麦金莱遇刺身亡，西奥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西奥多有个侄女，叫埃莉塔，父母双亡，她长得并不漂亮，但罗斯福在她身上发现许多他人并不具备的优点。他爱上这位孤独的堂妹，在“生死不渝”的保证下，埃莉塔答应嫁给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非常着重西奥多总统能光临他们的婚礼，就特意把婚礼订在西奥多总统方便的时间举行。总统带着他的百名卫士为小罗斯福主持了婚礼，作为新娘的保护人，总统亲手将侄女埃莉塔交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这天宾客如潮，冠盖云集，人们更多的是想目睹总统的风采。在无数羡慕的目光下，罗斯福感到了无上的荣耀，更坚定了他从政的决心。

富兰克林·罗斯福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想直接投入政治的激流中，只是苦于找不到机会。纽约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听说总统侄女婿有意寻找一个法律工作，立即招聘了他。罗斯福并没有全身心投入律师工作，而是在结识各种各样的人物，特别是社会名流，他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全国政治斗争的风向。1910年，美国的国内形势错综复杂，人心浮动，西奥多总统的改革已无法进行下去。为了继续推行改革，西奥多推举塔夫脱为共和党候选人，自己去非洲旅行。回国后，西奥多发现塔夫脱已落入政治庸人之手，政治毫无棱角，并放弃改革。塔夫脱成为共和党里保守分子的代表，西奥多仅取得共和党内进步分子的支持。共和党内分裂已无法挽回，民主党乘机而起，利用全国人民厌恶反动倒退的心理，对共和党进行猛烈的攻击，西奥多是民主党的主要威胁。民主党为了促使共和党进一步分裂，打击西奥多，夺取共和党在纽约州的多数优势地位，夺回共和党垄断了32年之久的代表达切斯县的州参议员职位，州民主党的领袖们看中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们要罗斯福改换门庭，以民主党的身份竞选参议员，并给以一定的支持。罗斯福对他们的用心一目了然，可他一直热衷于政治，始终站在远处观望着这激动人心的运动场面，而从未得到过一张入场券。机会终于向他招手，但却是以这样的难题出现，罗斯福没有立刻答应，但不得不认真思考，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富兰克林·罗斯福心里明白，问题的关键不是他个人的偏爱，也不是他人的理解，真正的法码是全国人的心理倾向和政治形势。只有形势对自己有利，他才能根据形势作出抉择。他眼看共和党分裂，执政的塔夫脱一切维持原状，全国人厌恶反动倒退，政府容忍邪恶冒头，许多人对美国的制度产生怀疑，甚至鼓吹通过革命来更新换代。罗斯福谨慎地分析了形势，特别是共和党的分裂，他确信这股普遍不满的情绪，会像飓风一样把共和党吹出政治舞台，把民主党吹上州长、总统的宝座，刮出一个参议员更是可能。不能出任参议员，那么他的政治生涯就无法正式开始，整个计划和志向就无法实现。

问题是现在必须设法安慰堂叔西奥多，这位前总统、著名国务活动家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罗斯福更是具有决定意义，只要他说一句话，就可以使罗斯福什么也得不到。当罗斯福把他将以民主党党员的身份竞选纽约州参议员的意思告诉西奥多时，西奥多震怒了，闷雷般地怒吼道：“你这个卑鄙的兔崽子”，“你这个叛徒”，“你不想想，这不是在开我的玩笑吗？这不是和我作对吗？”最后愤怒的叔叔还是答应对侄子有关问题的演说保持沉默。于是罗斯福接受提名，开始竞选。他依靠较为丰厚的竞选经费，破天荒地开着插着小旗的汽车，到农民中大骂城市中的共和党，攻击塔夫脱的高关税政策，使农民贱卖农产品，贵买进口的制成品，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经过奔走讲演，他终于迈出了政治生涯的第一步，以参议员身份进入纽约州议会。他的当选进一步引起轰动，他几乎还没有就任何议案进行辩论或表决，就已成为纽约州众目睽睽的人物了。反对他的人不安地感叹：“又一个罗斯福家族的人！”“如果趁现在他的羽毛未丰，将他拉下去还比较容易。”对他当选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充分说明，他的参议员生涯不会平静渡过，要么被对手搞垮，要么击败对手而成为更为重要的人物；他要么做一个顺从、认命、任人摆布的羔羊，要么作一个抗争、奋斗、无所畏惧的猛虎。他的性格注定他不会听从党魁的安排，尽管在很多时间没有找到出入头地的机会，但他不轻易发难。

1911年纽约州议会要选举一名国会参议员，党魁们看中了政治上有污点的希恩，遭到了北部地区参议员的反对。罗斯福看到在全国范围内，一个强大的运动早已兴起，正在朝着直接选举参议员的一项宪法修正案方面发展。人们普遍认为，间接选举参议员会违背选民意愿，但纽约州却无意批准这项修正案。罗斯福所在选区多数是共和党人，不受民主党党魁的控制，这又一次为他提供了机会，一场“反希恩”的战斗开始了。他不顾核心小组对成员拥有绝对约束力的党规，联合北部的反对派和中间派反对对希恩的提名。这时党魁们就对反对派施加压力，反对派中有人的贷款被催还，有人的企业受阻挠，有人受到威胁、暗算……，而罗斯福则四处奔走，为遭受压力的反对派筹款接济，鼓气壮胆。他的家成了反对派聚会的场所，罗斯福也自然成为反对派的领袖。斗争持续了10周，希恩终于落选，罗斯福虽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却推动州国会代表团投票赞成宪法修正案，罗斯福终于成为一种政治势力的代表。

罗斯福虽然成为纽约州议会有影响的人物，可以影响议会的选举结果，影响纽约州国会代表目的投票，但他毕竟只是纽约州议会稍占优势的一个党派内部的反对派，处在十分不利的地位上。罗斯福再次习惯性地把目光投向全国。此时，学者出身的新泽西州州长威尔逊正在崛起，成为民主党中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但却与纽约州的民主党党魁意见不合。罗斯福到新泽西州拜望威尔逊，初次见面，气氛并不热烈，但罗斯福为威尔逊的思想和主张折服，决心全力支持威尔逊的改革政纲，反对民主党的“老板制度”。他到全纽约州主要的民主党人士那里游说，并组织了纽约州威尔逊联合会，为威尔逊搜罗代表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争取提名威尔逊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他发表演说，阐述自己的政治、经济观点，但在1912年的总统候选人的预选上，威尔逊只得到少数州的支持，第一轮投票中比克拉克少将近120票，克拉克的票一直稳步上升。虽然只有得到三分之二的票才能当选，但历史上票数多的人从来没有失败过，特别是纽约州的90张选票

全部装在党魁墨菲的口袋里，一旦全投给克拉克，立即会使正式选举一边倒。

富兰克林·罗斯福力图打破墨菲对纽约州代表团的操纵却没有成功，他就组织了 150 名有名望的纽约州民主党人组成非正式代表团，在各州代表中串联，向他们游说，不管党魁怎么说，纽约州人民支持威尔逊。1912 年 7 月，决定总统候选人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在纽约州首府召开，克拉克雇来了 300 人的啦啦队和百人打手冲进会场，按约定的信号，高喊，“我们要克拉克”。罗斯福立即组织了一支由彪形大汉、声音宏亮的人组成的对抗力量，站在克拉克啦啦队的身后，只要啦啦队一喊要克拉克，他们就以更大的吼声回敬“我们要威尔逊”。双方先是对骂，接着打起来，会议主席只得宣布休会，会议改到下星期一再开。罗斯福挫败了克拉克分子的气焰，为威尔逊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罗斯福和威尔逊的支持者，加紧在大会内外游说，揭露纽约州党魁操纵代表团，待价而沽的罪恶勾当，激起了其他州代表对纽约州党魁的反感。家乡人们一封封黄纸信雪片般飞向代表们，敦促自己的代表提名威尔逊。罗斯福等人的工作有了奇效。到了星期一开会时间，会议一开始，一位代表立即跳上讲坛，用洪亮悦耳的声音说：“一个进步的候选人决不会受纽约州投票的糟蹋！既然纽约州的 90 票全投给克拉克，我们就不再投克拉克的票了，我要投威尔逊的票”。会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亚拉巴州首先转过来，其他各州纷纷转向，连墨菲也不得不见风使舵，结果，威尔逊以 990 票对 240 票的绝对优势取得胜利，取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在总统选举中，正如罗斯福估计的那样，共和党的分裂使西奥多功亏一篑，使威尔逊渔翁得利。威尔逊总统上任后，论功行赏，任命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海军部助理部长，罗斯福终于走出纽约州，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人物。

30 岁的罗斯福能够成功实现自己的抱负，一举成名，关键在于看准哪有利于他的机会。当他还是一名普通大学生时，堂叔西奥多就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这无疑为他提供了一种有利的政治资本和实现抱负的机会。他崇拜堂叔并听从他的教诲，积极参与共和党各种活动，特别是与西奥多亲上加亲，使他受到更多人的另眼相看，为他步入政界创造了条件；尤其当共和党分裂，民主党给他送来带刺的玫瑰，他果敢地毫不迟疑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当他处于反对派的艰难时刻，他看到威尔逊在全国影响的扩大，立即把自己的反对派与威尔逊的改革运动结合起来；在力争威尔逊成功的同时，也使自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事实上，一个人不论从事何种职业，人生经历多么不同，在自己的一生中总有那么几次机会向自己招手，但只有少数的人才能看准这些机会，并抓住它，使自己一举成功，处处成功。罗斯福正是这种见机而动，步步高升的成功者。见机而动可以说是罗斯福的人生谋略之一。

二、推行大海军主义争夺制海权

在西方列强殖民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海军的战略地位日益增强，几乎是任何国家海外扩张、侵略、占领、巩固殖民地的决定因素。英国海军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是英国成为头号殖民强国的前提，美国在美西战争中打败西班牙成为殖民强国依靠的也是海军。海军的战略地位日益被一些军事战略家关注，各西方列强都在扩充自己的海军，争夺制海权。美国海军出身的上将马汉写出了《制海权的影响》、《纳尔逊生平》等著作，提出大海军主义的思想，要求美国发展海军力量，争夺制海权，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受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影响，把海军的重点始终放在防御，海军和海军改革一直未得到充分发展。罗斯福中学时代就反复阅读马汉的著作和麦克莱的《美国海军史》，一心想当一名海军军官，立志发展海军，他收集海军和航海书籍达1万册以上。威尔逊总统任命罗斯福为海军助理部长后，海军部长丹尼尔斯把更多的海军事务委托给罗斯福。丹尼尔斯不懂海军，他是威尔逊内阁中的激进成员，却不是海军的激进改革者。罗斯福主持海军的日常事务和海军装备，他开始改革海军现状以适应全球性战争的需要，实现大海军主义。

富兰克林·罗斯福主张建立强大的海军。他认为美国的海军应当遍布整个西半球，防区应扩大到1000海里以外的公海上，包括菲律宾和美国商船常到的所有海域。为了保卫巴拿马运河、阿拉斯加、美属萨摩亚群岛、关岛、波多黎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和菲律宾群岛，他认为美国应当拥有主力舰。这“不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海岸线和属地，同时，也是为了在海上保卫我们的商船，不管他们在哪里”。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已大得惊人，在编人员已达6.5万名，每年需要花去纳税人1.44亿美元，连海军部长丹尼尔斯都认为海军过分庞大了。罗斯福为推行马汉的大海军主义，用他那雷雾风行的作风，对“死气沉沉，昏睡不醒”的海军官僚机构和作风进行了改革。

罗斯福上任不久，在他新管辖的领域里作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太平盛世的虚假安全感充斥着舰队，沉积了一层漠然置之、高枕无忧的淤泥。高级司令部里面充斥着废物；战斗人员的士气低得跟潜水艇的船底一样。军舰虽油漆一新，铜制器件在闪闪发亮，炮膛擦得一尘不染，但人的脑袋却在生锈。罗斯福激动他说：“过去对海军的估计远远超出了它的实际，我们号称已建造或正在建造的军舰有37艘，放在第一线的只有16艘，我们的海岸线长达2000英里，其中只有200英里海岸有炮兵防守。”经过详细的调查，海军缺额1.8万人，许多军舰因人员不足而搁置，所有经费都花在造船上，造船厂则多数技术陈旧，管理落后，产品老化，无法适应发展海军的需要；海军管理机构近70年未变，陈规旧习严重，官僚主义盛行，工作效率极低，公文旅行，事无巨细，都要由部长或助理部长审批，甚至为购买8枚毛毯钉，都要罗斯福签署一式四份的正式申请报上。

经过这一番调查，罗斯福掌握了海军的基本情况和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向各方面呼吁建立一支具有高效能战斗力的美国海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开始着手进行大规模的造舰计划，组建强大海军的最有影响的组织——美国海军联盟。他一面向部长、总统提出自己的主张，一面整顿造舰厂，同时把自己的计划透露给公众。他不仅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而且要取得大资本家的支持。罗斯福的计划无疑既代表了海军的利益，也代表了钢铁、造船

和金融巨头的利益，因为海军是这些巨头们的最大主顾。罗斯福立即得到了海军将领的拥护，这些将领常常趁部长不在，向助理部长要这要那，提出各种要求，罗斯福得到了职业军人的尊重。他所接近的许多年轻将领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指挥海军执行了他的战略计划。罗斯福同样也受到企业界巨头们的欢迎，他们几乎把罗斯福看成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罗斯福不仅为自己的大海军计划找到了现实的力量，而且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声望，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因为他的最终目标并非仅是领导海军，而且要挤身白宫、领导美国，而他设想他领导的美国要成为军事、政治强国，就必须要有强大的海军作后盾，牢固地掌握海上霸权。另一方面，他作为海军助理部长，必须作出一番不同凡响的贡献，才可能使初出茅庐的他得到美国各界的承认与支持。大海军主义既是他展示才华的最好方式，也是他实际的政治军事理想的最好反映。

罗斯福尽可能地推进海军的改革，他提出一套采购供给品的有效办法；把高级军官的提职晋级从论资排辈改为择优录取；废止烦琐的公事程序；给海军士兵教习游泳；保护海军汽油储备；同时他还撰文分析海军的发展趋势和国际形势，提高人们对海军的战略作用的认识。这些改革举措初见成效，提高了海军的工作效率。第一次世界大战剑拔弩张，协约国与同盟国加紧了军备竞赛，罗斯福四处游说要求扩张海军。大战爆发后，他向威尔逊建议建立国防委员会，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建议部长立即着手建立强大的海军。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急于参战，指望交战双方互相削弱，坐收渔利，在中立的幌子下大发战争横财。罗斯福一面四处游说他的大海军主义，一面支持人民中要求以战争维护美国海外霸权的各种活动。罗斯福建议把舰队调回，作好战争准备，但总统不愿做任何一件给战争火上加油的事情。罗斯福要求增加3万名海军现役人员，并建立一支12万人的海军后备队和民兵。当时德国鱼雷击沉英国客轮“露西塔尼亚”号，使1198人葬身大海，激起了美国人民的震惊，他们强烈要求美国发展海军，把力量和影响扩大到足以保护美国商船能够到达的任何地区。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威尔逊向国会提出扩军备战计划。国会通过了1916年的造船计划，规定3年内建造26艘各种军舰，总价5~6亿美元。国会批准了国防法，增加了常备兵和国民警卫队，美国逐步作好了战争的准备，罗斯福的大海军主义得到初步实现。

罗斯福推行的大海军主义，把可以大发横财的大批订单交给和他有交情或他们需要他们支持的承包商，使他得到工业和金融巨头这些海军主顾全力的支持和拥护，得到了海军军官们的信任，也赢得了主张参战和争夺世界霸权的美国舆论的支持。他的“参谋长”路易斯·豪不像罗斯福那样认为海军是确定美国国际地位的坚实后盾，豪更注重国内，注重使罗斯福一步步接近白宫。路易斯·豪十分重视工人运动，认为工人及工会是一支重要力量，罗斯福就让豪去作工人工作，以致在罗斯福任海军助理部长期间，海军下属企业从未发生劳资冲突。罗斯福不仅积累了同工人打交道的经验，而且赢得了工人的支持，罗斯福推行的大海军主义并不顺利，甚至步履艰难，阻碍重重，正是这些重重困难充分显示了罗斯福的才干和能力，更使各种阶层的人都相信，只要罗斯福切实拥有权力，就会成为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罗斯福十分清楚这一点，他刻意追求的也正是这种效果。罗斯福并不一定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但却必须让他们相信他会这样做。当罗斯福在助理部长的职位上，获得

了巨大成功之后，他的目光投向他更为热望的目标——像西奥多那样，由海军助理部长进而纽约州州长，走向那个跟总统只有一步之遥的职位，他甚至明白地要求威尔逊支持他。

罗斯福的政治生涯并不像他自己所渴望的那样顺利，后来在纽约州州长职位上没有海军问题要他处理，但在他作了总统后，特别是二战前夕，倭洲大战在即。罗斯福虽不积极参战，却立即向国会提交增加国防开支的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拨款 10.4 亿美元，其中很大的一部分用于加强海军，把海军当作美国的第一道防线。他提出美国必须准备西洋作战，建立两洋标准的海军，即建立等于德、意、日三国海军力量总和的两洋舰队。罗斯福的大海军主义政策充分增强了美国军队的力量，二战中德国海军设法切断大西洋的海上生命线时，美国海军立即就可披挂上阵执行护航任务。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进一步发展海军，要求 1942 年一年建造 600 万吨载重的船只，1943 年建造 1000 万吨船舶。正是强大的美国海军力量支持了大西洋、太平洋两洋作战，直接击溃了日本海空军，扭转了太平洋战局，瓦解了日本的海上帝国。

罗斯福主张大海军主义，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把海军当作美国的第一道防线，拒敌于国门之外，使战争不至于破坏美国人民的生活、生产，使美国在战争中有一个巩固的后方，这是一种现代国防思想；二是海军具有陆军所不具有的攻势作战的灵活性，他认为静候敌人进入我们的前院就等于自杀，等待敌人取得进攻的立足点是愚蠢的，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占据战略性军事要地，打击敌人军事生命线，实行攻势防御。两次世界大战都使美国坐收渔人之利，使战火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国家和海洋蔓延而丝毫没有影响美国领土，这些都与美国拥有强大的海军分不开，也是罗斯福大海军主义的巨大成功。

三、重用“智囊团” 集思广益

罗斯福依靠西奥多的支持和自己的机敏，成功迈出了走向政坛的第一步；通过支持威尔逊总统，摆脱了自己在纽约州议会中的不利地位，成为民主党内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尽管他肯定地相信支持威尔逊当选美国总统，会给他带来巨大的成功，然而当1912年这一切还是未知数的时候，自己的参议员任期已到，他必须稳妥地争取连任，否则他在纽约州和全国民主党中的政治影响会立即下降，甚至消失，自己所作的全部努力都会前功尽弃，正当这个人生的关键时刻，无情的伤寒病残酷地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他只能躺在家里，心急如焚，却毫无办法。这时，“上帝”让一个叫路易斯·豪的落魄文人来到他的身边，这位骨瘦如柴，其貌下扬的人认定罗斯福会成为未来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觉得在危难的时候应当依靠豪这样的人。正是路易斯·豪拯救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治生命。这个善于搞宣传的人为罗斯福制订了候选人不露面的竞选策略。路易斯·豪在波基普西的一家饭店建立了竞选总部，以农业问题作为竞选主题，在选区内大量散发罗斯福的“亲笔”信，在报上整版宣传罗斯福的政绩，作出各种许诺，攻击竞选对手，甚至用借小恩小惠的办法，给每个竞选工作人员发5美元，并得意地提出了一项旨在保护农场主不受纽约市代理商们诈骗的法案，将副本寄给农场主，附上罗斯福的信，征询他们的意见，保证当选后尽全力通过这项法案。这一绝招果然凑效，罗斯福重新当选州参议员，并被任命为农业委员会主席。从此，路易斯·豪成为罗斯福通向白宫之路上的忠实助手和顾问。罗斯福深切地感到任用那忠于自己的有专长的人，可以达到自己无法达到的目的。路易斯·豪被他带进海军部，作自己的智囊和“参谋长”，为他推行大海军主义创造了条件，同时保持和提高了他在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罗斯福竞选纽约州州长及在州长任期内开始建立自己的智囊团，以后他无论做州长还是当总统从来没有离开过“智囊团”。重用“智囊团”成为罗斯福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中重要的谋略措施，也成为现代科学领导的重要原则。

在这个“智囊团”里，路易斯·豪是罗斯福最信任的人，他自从1912年罗斯福竞选州参议员以来，一直忠心耿耿地为罗斯福工作。不论是罗斯福在伤寒病中，还是在罗斯福飞黄腾达的时候，或者是1921年罗斯福患倒楣的小儿麻痹症以后，路易斯·豪都死地塌地地为罗斯福工作，始终坚定地认为罗斯福必定成为美国总统，在任何重要时刻，路易斯·豪都能干人所不能干的事情，并且屡立奇功。他不仅仅是罗斯福的左膀右臂，简直是罗斯福的另一个自己，往往比罗斯福本人还清楚罗斯福需要什么，以及应该怎么样把这一切变成现实。史密斯在罗斯福竞选州长的关键时候，为罗斯福推荐了一名非凡的杰出助手——32岁的律师萨姆·罗森曼。当时正是美国历史最为繁荣的时期，一切都是那样蒸蒸日上，罗斯福和其他候选人一样，实在提不出什么令人振奋的主张了。好在人们不希望改变史密斯州长的政府政策，罗斯福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描绘成唯一能保证这种政策延续下去的人。史密斯竞选总统连战连败，但共和党在全国达到全盛时期，在纽约州参议院也占多数，因此，在罗斯福看来在竞选纲领宣传中，仅仅把自己作为史密斯的衣钵传人显然不够。萨姆·罗杰曼收集了有关州内所有问题的大量的文件，包括劳动立法、农业、财政等问题，罗斯福并没有想好从那儿下手，并作为自己讲演的突破口，他把难题交给萨姆·罗森曼，要罗森曼按自己的意思起草讲演稿，他

自己去看望一个政治伙伴。罗森曼用大量事实揭露共和党人在纽约州议会中践踏了劳动立法方面的庄严诺言，把罗斯福的政治对手推向公众的对立面，彻底动摇了选民对共和党代表的信任，罗斯福稍加润色，用他那天才的讲演才能宣讲出来，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从此，在整个竞选过程中，罗斯福坐着小汽车周游全州，记者和助手们坐着大轿车像尾巴一样跟着他。罗森曼不分昼夜地写稿，罗斯福匆匆阅读、修改，然后讲演，赢得了选民们的欢迎。罗斯福成功地驳斥了加在他头上的“社会主义者”、“急进派”的论调，又清楚地告诉选民这些人攻击他的真正原因——只不过他曾为社会和工人立法而斗争，主张改善司法机关和地方政府。帮助农民利用水力，缩短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时间，改善州医院和监狱，关心卫生保健和教育。“在社会现实中往往把任何一个勇往直前，坚持改革的人都叫做急进派。民主党在本州中坚持进步，坚持改革，所以它在这里和其他州中都赢得了急进派的名声。”罗斯福同时争取百万富翁巴克鲁和民主党著名活动家麦卡杜的支持，最后，罗斯福以 50.35% 的微弱多数取胜。

尽管连他自己也戏称自己是“百分之零点五的州长”，但他毕竟翻开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页。他用自己的毅力和才干向人们证明：不论多么凄惨的遭遇，都无法把他击倒，他会像战胜令常人难以忍受的病魔一样，战胜和克服政府的政治、经济危机。就像史密斯预言的那样：“一个州长不一定是一个杂技演员。我们选他不是因为他能作后滚翻或前空翻。州长于的是脑力劳动，是想方设法为人民造福。”事实上，他确实不能像其他健康人那样奔走。罗斯福当选后，前任州长史密斯甚至说，“他连一年也活不下去。”的确，这对一个健康的人也是一种有份量的挑战，罗斯福清楚这一点。他必须探索新的方法，组成一个新的班子共同作好州长工作。他的目标就是建立在改革之上的专家政府——成为自己的“智囊团”。他尽可能地把各种专家招进州政府，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针和目标，拿出切实可行的计划，然后贯彻执行。以路易斯·豪为中心形成一个政治顾问班子，包括埃德·弗林、汤姆·林奇、吉姆·法利等人；以萨姆·罗森姆为首、包括小亨利·摩根索、弗朗西斯·珀金斯小姐、弗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哈利·霍普金斯等组成的政府技术顾问班子，这两个班子构成了罗斯福的“智囊团”，为罗斯福设计、执行各种计划、策略，把罗斯福推向以总统职位为终点的政治竞赛场。

路易斯·豪是罗斯福智囊团的核心人物，罗斯福的每一策略都与他有关并得到他的全力支持。尤其是这位“参谋长”在每一关键时刻，都能像魔术师那样创造奇迹。比如，1931年，罗斯福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路易斯·豪在纽约麦迪大街331号7层楼上，设立了“罗斯福之友”总部，作为宣传鼓动中心。“罗斯福之友”俱乐部在全国很快发展为50多个，为了给他们经济上的支持，路易斯·豪设法让许多财团主动将钱送上门来，约·赫拉德、约·肯尼迪、赫·莱曼、老亨利·摩根索、L·斯坦哈特、佛·沃克和威·伍丁等都慷慨解囊；还争取到威尔逊政府成员的支持，他们的巨大影响招募了无数拥护者。助手法利几乎走遍全国，一面设法使罗斯福家喻户晓，一面给罗斯福打气。法利发了无数封信，路易斯·豪给党的代表大会每位代表寄去有罗斯福签名的照片和唱片，写上“州长向您致意”；法利甚至用美国地图标出何地何人支持罗斯福，但大会选举时却一波三折，罗斯福预选通过了第一轮，在第二轮中虽得票最多，却差100票不足三分之二，大会陷入僵局。“黑马”即将出现，罗斯福没有亲临大会，坐在州长办公室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罗森

曼作出最后一线努力，在讲演中异想天开地提出“我发誓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试图用“新政”最后一博，罗斯福也没有主意，只好对此赞不绝口。这个罗斯福一生中最有影响的发明和政策当时却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路易斯·豪和法利在芝加哥达成一笔政治交易，说服霍纳放弃竞选提名，支持罗斯福，以罗斯福提名霍纳做副总统候选人作为交换条件，使得克萨斯州等支持霍纳的州一致转向罗斯福。罗斯福终于在选举中以 845 票的绝对多数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第二天罗斯福就急不可耐地不顾候选人 60 天后等大会代表团通知的惯例，坐飞机到芝加哥，向大会答谢。讲演虽把罗森曼的许多珍珠般有价值的话压缩掉了，但“新政”的口号不胫而走，响遍美国。路易斯·豪和法利搞的政治交易，又一次拯救了罗斯福，把他推向全国；罗森曼的“新政”终于把罗斯福同他的竞选对手区别开来。约翰·法利取代腊斯克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把争取选票当作唯一工作，“智囊团”又增加了一位成员约翰逊将军。

政治顾问里还有一位埃·弗林的人，他是一个无耻政客。但正由于他的无耻，使许多罗斯福及其他人根本想不到，或想到了也不会去做的事，埃·弗林则能去想、去做。罗斯福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却不应当因此谴责罗斯福，或者弗林本人，应该诅咒的正是政治本身。罗斯福如果一开始就把政治的黑暗当作对手，以纯洁政治为目标，那他后来的那些影响美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巨大功绩永远无法实现。弗朗西斯·珀金斯小姐任工业委员会主席或劳工部长，是表明罗斯福认为妇女有平等权利的证明。

在政府技术顾问班里，罗森曼几乎成为他所有讲演稿的起草人。人们很难区分其中那些是罗斯福的主张，那些是顾问的主张。这些讲稿篇篇精彩，击中要害，比如罗斯福声明他并不反对共和党，只反对共和党的错误领导，得到了进步共和党的欢迎和支持。甚至为他进行竞选而活动。当时美国的退伍军人、工人、农民纷纷走上街头，富翁们胆颤心惊，支持罗斯福，为他解囊，希望他能拯救他们的财产，把他当作救命稻草。罗斯福在讲演中极力反对寡头统治和垄断，富人和穷人都寄希望于他，他赢得水火不容的对方的支持。顾问们还为他调查现实，提出建议，解决难题，使罗斯福在竞选活动中没有任何明显的失误。罗森曼的司法改革计划、弗兰克福特的公用事业计划和电力开发计划，尤其是哈里·霍普金斯的社会救济工作都为罗斯福创造巨大的“政绩”赢得了声誉。

罗斯福的成功得益于他在州长任上和竞选中，开创性地使用“智囊”和专家。他人主白宫后，他的内阁成员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竞选中的支持者，一部分是各种专家，一部分是原“智囊团”的成员。国务卿赫尔是以税务专家和坚决主张低关税政策闻名的南方国际派，在参议院中颇有影响，财长伍了对解决银行危机有一套切合实际的办法，继任财长摩根索、邮政总局局长法利、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大都来自于前“智囊团”，后三人为新政立下汗马功劳，他们为新政出谋划策，贯彻执行，几乎成了新政的化身。

内阁外还有一些职位不高，但影响和在制定政策方面作用更大的人，组成新的“智囊团”，包括原“智囊团”成员和新成员：法利、莫利、特格费尔、罗森曼、霍普金斯、D·艾奇逊、托·科科伦、威·伍丁、约·肯尼迪、弗兰克福特、伯利等人。以总统秘书路易斯·豪为核心，这些人力罗斯福提供各种建议和谋略，罗斯福能稳坐白宫第一把交椅与这些人是分不开的。

罗斯福越来越离不开这些专家，他随时注意把各种人物网罗到自己身边为他出谋划策，使他既能超脱一般性事务的应付，又能时刻注意那些一个人很难注意到的问题。他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决策和发号施令等重大事务上。尽管罗斯福甚至只信任那些过去帮助过他的人，但他却能做到让所有的人感到对“智囊团”的信任、亲近只是工作的需要。“智囊团”并没有包围他使他无法看到更多的东西，相反“智囊团”成为了他的眼睛、耳朵、头脑，使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当然这与罗斯福那敏锐的洞察力、决断力和驾驭亲信的能力是分不开的。路易斯·豪几乎为罗斯福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继路易斯·豪以后，霍普金斯成为核心“智囊”，在二战时期的内政、外交、军事上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霍普金斯作为参谋长，协助罗斯福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重用“智囊团”简直成为罗斯福最主要的谋略之一。

四、用长弃短从善如流

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政治家和成功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不是由于用对了人和采纳了正确的建议而获得成功的，因用错了人或采纳了错误的建议和谋略而成功的政治家从来也没有。罗斯福正是一位善于用人，善于博采众长、采纳下属建议的政治家。甚至完全可以这样说，罗斯福之所以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杰出的总统，其主要的的原因就在于他善于用人。罗斯福的用人谋略可谓精细绝妙，手段高明，既无微不至，又能放开手脚，尽其所长。罗斯福的用人之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用人，二是用言，三是用众。

所谓用人，即指罗斯福善于提拔任用各种人才为自己的事业服务。罗斯福的政治生涯部分时间或最重要的时期，都是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完成的。他在政治斗争中要克服一般健康人所不可能面临的所有问题，许多事情很难亲历亲躬，几乎每件事情都须依仗他人，因而他非常重视用人，对用人的各种技巧捉摸得十分透彻，运用得十分巧妙，既能用人之所长，又能弃人之所短，去人之害。常言道，打铁先得自身强。作为一个领导者要善于用人，自己必须识货，必须有鉴别人才与庸才的办法，对许多事情自己必须首先站得高看得远，必须洞察一切根本问题，并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否则，有眼无珠，人才满堂而不知用，咱叹无人；或者不能区别真假语言，不能透过别人的花言巧语，看到别人的真才实学；或者各种建议摆在自己面前，人家都说得头头是道，而自己不知好坏，不辨优劣，首鼠两端，优柔寡断而坐失良机；或者能识人用人而不能驾驭人才，最后自己被装进鼓里。罗斯福识人、任人、驾御人才自有一套办法。

首先是用人之长技。罗斯福自从踏上政治斗争航船，目光就注视着白宫，以西奥多·罗斯福为自己的榜样，沿着西奥多的老路踏入白宫。当罗斯福取得政治生涯的第一次胜利，路易斯·豪就致电祝贺，称他为未来的美国总统，明白他说出了罗斯福的心里话，给罗斯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罗斯福协助威尔逊竞选取得成功，他自己却被伤寒病击倒在床而无法为自己的竞选奔走。眼看自己的心身将付诸东流，自己的政治梦想将由此破灭，罗斯福心急如焚，这时他就把路易斯·豪找来，要他帮忙。路易斯·豪身高不足五英尺，骨瘦如柴，满脸皱纹，“活像一个中世纪的守护神”。40岁的路易斯·豪上不起大学，给报社当报投员，周薪只有10美元，生活无以为继，开始以赌博为生，负债累累，但他很善于挖掘新闻，笔锋犀利，讲话尖刻。形容萎琐的他来到罗斯福家中时，家中没有一个人喜欢他，但罗斯福看中了他善于搞宣传的才能，觉得这位遭遇不幸的文人丰富的人生阅历可以为自己了解社会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这样一个落魄文人只要给以重用，必然会死心踏地，忠心耿耿地为自己工作。路易斯·豪的确如罗斯福所料的那样，忠心耿耿为罗斯福工作，而且屡建奇功。他为罗斯福提出种种妙计高招，并且将其付诸实施，使罗斯福不仅渡过当时的难关当选了参议员，后来，路易斯·豪成为罗斯福总统“智囊团”的当然参谋长。在路易斯·豪病重住院期间，总统罗斯福把电话线从白宫直接拉到路易斯的病床前，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有人说如果路易斯·豪没有遇到罗斯福，将会终生落魄，他那丑陋的外貌和寒酸的举止，尖刻的语言，暴躁的性格将使他在社会上无以立足；但如果没有路易斯·豪的帮助，罗斯福的政治生涯，肯定将要改写，甚至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历史进程。但路易斯的这些所谓的缺陷的确使路易斯永远无

法走向前台，海军军官甚至认为他到军舰视察是对海军的侮辱。罗斯福用其智，用其长而不求全责备，要他做自己办不到和尴尬的事情。

二十年代美国人一般认为苏维埃政府不过是共产主义实验，在人类历史上必将昙花一现，立即就会垮台，只有布利特一个人断言苏联绝不是昙花一现。美苏建交后，罗斯福就请这个人任第一任驻苏大使；巴顿将军性格执拗，脾气暴躁，尤其没有政治头脑，经常说一些于国策、政策、战略不合，甚至对谁都没有好处的话，但善于打仗，屡战屡胜，罗斯福在二战中一直让他指挥主力部队作战，却从不让巴顿独当一面；艾森豪威尔军衔很低，但他沉着、稳健、勤奋，果断、善于与人相处，他到欧洲时，自己最大的愿望是指挥一个师作战，但罗斯福却要他将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组成一支几十万人的大军，并由他统帅，管辖 366 名将军，其中许多人的军衔都比他高，但艾森豪威尔出色地完成了取得欧洲战场胜利的任务；马歇尔长于谋略，是美军中最有政治远见卓识的将军，罗斯福任用他为二军参谋长，成为二战时期美国最高军事领导人，出色地为罗斯福制订了各种成功战略……。对于任何政治家和领导人来说，历史绝不会偏爱某一个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无数杰出的人杰，就看一个领导者能否发现、重用乃至培养他们；只有那些能够把自己时代的杰出人物团结在自己周围并使之成为共同目标奋斗的人，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罗斯福用人的事例的确枚不胜举，我们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是扬人之长。罗斯福不仅能发现那些身怀奇技的人并加以任用，而且能就人的某些潜在的长处加以发挥、培养和利用。比如著名的哈里·霍普金斯在罗斯福任纽约州州长时，成立了一个社会救济署，开展救济工作，该部门主要负责人因循无为，助手哈里却热情极高，而且雷厉风行，办事果敢卓有成效，罗斯福就让他成为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哈里工作果然出色，成为州长的主要政绩之一。罗斯福任总统后立即把哈里调入联邦政府，继续主持社会救济工作。哈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存一分钱，挥霍无度，善于花钱。罗斯福让国会拨钱给他主持的部门，哈里几乎不过夜就花得所剩无几，而这种花费，加速资金周转，大大促进了消费，对缓解经济危机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沃克作为阁员缺乏创见，但在全国声望颇高，罗斯福就让沃克监督花钱无度、备受责备的哈里，使哈里把钱花在正经地方，减少了人们对政府的批评。作为商务部长的哈里十分关注国际事务，甚至在以工代赈时就当把备战工作当作重点，修建机场、公路、改造船厂、主张与苏建交，罗斯福就把国际事务的重大决策权交给他，哈里成为继路易斯·豪以后罗斯福的主要“智囊”。罗斯福的安排和培养使哈里成为一个对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均有见地的政治全才。赫尔作为一个政治家，对新政并不热心，甚至缺乏远见，但他善于同国会打交道，和各方面的代表均有关系，罗斯福一直让他担任国务卿，使赫尔成为美国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国务卿。

罗斯福清楚哪些人是干才，哪些人是智才，哪些人虽然才不超群却具备起重要作用的时才。罗斯福并不只给有才能的人以高位厚禄，而更重要的是委以重任，让他们更多地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为他们创造发挥所长的环境和条件。罗斯福有一条重要的用人经验，即每当发现突出的人才和新兴的事业，他既不是把新人纳入旧系统中去工作，也不是让旧机构从事新事业，而是为新人才建立新机构去完成新的事业。这样既不触动旧机构和旧人物的利益，让新旧人在一起内耗，又能让新人放开手脚去大干一番，同时，还不触动现有体制。即使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或者失败，也不致影响全局，而一旦

成功，那么旧体制人员的变更就是水道渠成的事情，任何人也没有理由反对或怀疑。罗斯福善于赋予各种人才以挑战性工作，给他们创造奇迹的机会，而这种奇迹将大大推动政府的工作，因而罗斯福不仅任用现有人才，还大量提拔培养人才，使自己的周围始终人才济济。

第三是避人之短。任何人才都有其所长，用其所短，人才不如庸才，罗斯福用人很注重避人之短。比如他很少让路易斯·豪到前台表演，也不让巴顿统帅全军，华莱士长于农业问题，对政治外交缺乏远见，罗斯福就很少让华莱士处理这些自己不精通的事务，尽管华莱士自己很想做。罗斯福用人避人之短尤其表现在乔·肯尼迪的任职上。二战前夕，罗斯福十分关注英国政府的动向，他找到一位没有外交成见的企业家，有爱尔兰血统的乔·肯尼迪任驻英大使，希望既能消除爱尔兰血统的英国人对美英合作的抵触情绪，又能为他提供公正的报告。乔·肯尼迪原来是弓型腿，当他来到总统的办公室时，罗斯福就对他：“对不起，请把裤子脱下来好吗？”乔迷惑不解地脱下裤子，呆呆地站在总统面前，不知所措。罗斯福说：“你知道不知道驻英大使必须穿短裤就职，你这么严重的弓型腿，将成为一个笑料，不能担任这项职务。”后来直到英国政府同意大使穿燕尾服和条纹裤子就职，乔·肯尼迪才得到任命。罗斯福认为选派大使不仅从政治上考虑，而且要注意风度，因为他们出去代表的是国家。这可略微反映罗斯福用人避人之短的特点。

第四容人以度。世界上的人就像他们的面孔一样，人人都有他们独特的个性和行为思想方式，要求他们每件事情都做得合情合理是强人所难；作为用人者也往往有自己特殊的好恶，要自己所用的人才处处乖巧听话，隐忍屈从，那简直是缘木求鱼。没有个性、尊严、人格的人能成为一时济世安邦的有用人才，世间恐怕没有人能做到这点。用人者要得到真正的人才，必须同时要有容人的度量，罗斯福正是这样用人的。他在用人中特别能容人以度，他知道所有的人不是圣贤，每个人都有自己办到和无法办不到的事情。比如他派史迪威到中国战区作参谋长，负责分配对华租赁物资，指挥缅北作战，但缅甸的中英缅军队却首战受挫。为鼓舞人民士气，政府仍然声称作战胜利，而史迪威到印度后毫不客气地指责这是自欺欺人，但这并没有影响罗斯福对史迪威的信任。麦克阿瑟在国内激烈反对罗斯福新政，成为罗斯福政敌之中最有力的反对派，罗斯福依然将太平洋战区指挥权交给他，使麦克阿瑟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人物，即使菲律宾惨败也没有动摇他对老将军的重用。在对待法国贝当政权和戴高乐问题上，国务卿赫尔出言不慎，遭到国内舆论的激烈批评，罗斯福要改变策略，赫尔竟以辞职对抗，罗斯福自己先妥协，这并不是他离不开这位老政治家，而是尊重他。有一次竞选到了关键时刻，罗斯福紧张过度，就去游泳放松一下，路易斯·豪竟在窗口指着他破口大骂：天知道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想着游泳，上帝怎么不把你淹死！对于这样的下属，没有容人之度，那是很难再有后来的合作的。忠与好绝不放在脸上，挂在口上，写在纸上，而是体现在行动上，罗斯福的确能够超出一般人的好恶用人。这恐怕正是暴躁的路易斯·豪 40 岁以前一事无成，而后来为罗斯福屡建奇功的重要原因。霍普金斯曾一度反对罗斯福连任总统，想自己竞选，罗斯福没有感到这个背叛对自己是伤害，后来霍普金斯继续担任罗斯福左右手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第五制人之弊。每个人都会因环境和追求的不同有自己的看法主张，人

才与人才之间、人才与领导者之间也往往会有各种各样的分歧和矛盾。作为用人者必须要能够平衡下属之间的关系，也必须能够驾驭自己的下属。能用而不能驾驭人才，往往以善始，以恶终，罗斯福在用人方面很注重对部下的驾驭和平衡。霍普金斯在新政时期与同部门的伊克斯竞争得非常激烈，以至于互不相让。罗斯福立即成立了以和事佬沃克为首的委员会监督两人的工作，协调他们的矛盾，使两人的工作有力推动了新政事业的发展。麦克阿瑟是美军中的元老，地位高又十分傲慢，许多事常常自作主张，甚至拒绝美国中央情报局进入他的辖区和部队，自己宁愿另搞一套。罗斯福既对他作出让步，又通过太平洋舰队司令来制约他，使麦克阿瑟在整个战争时期始终按照罗斯福的战略行事，后来的杜鲁门却没有作到这一点。马歇尔作为参谋长具有远见卓识，他提出了“霸王行动”，即在西欧登陆的计划，罗斯福想派他去指挥欧洲战场，调艾森豪威尔代理参谋长，但考虑到艾森豪威尔是麦克阿瑟的部下，与老上司关系不好，如果这样，自己将与这位太平洋战区司令官更难相处，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尽管邱吉尔、斯大林、霍普金斯都支持对马歇尔的新任命，但他更重视对部下的驾驭和制衡，马歇尔是他这方面不可缺少的帮手。

第六纳人之言。任何领导者，都不必事事亲为，也不可能把每件事情都想得十分透彻，都能拿出正确的主张，”而只能在与部下商议中采纳或完善各项政策和谋略。在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关键时刻，罗斯福准备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演讲，他与罗森曼共同拟写讲演稿。罗斯福挖空心思，也想不出该如何写好这个稿子，就说：我还有个政治约会，你先写吧，明天咱们用稿。之后，他便溜之大吉。罗森曼挖空思想出“新政”这个名词，罗斯福立即采纳并在演讲时大加阐发。果然，“新政”一时间通过演讲传遍美国大地，成为罗斯福的政治口号。

1939年萨克斯给总统带来爱因斯坦的一封信及利奥·西拉德的一份备忘录，警告说德国在核裂变方面取得进展。罗斯福对此一无所知而漠不关心，萨克斯于是向罗斯福反复解释这件事的意义：这种现象可能导致制造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铀 235 的核裂变释放出来的能量可以达到 1~2 亿电子伏特。罗斯福无法想象，就问道，“你说到底有多大？”“1 公斤铀 235 的威力相当于 2 万吨梯恩梯（TNT）”罗斯福大吃一惊，立即招来军事助理沃森将军。不久，一个由军事家和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产生，开始研制原子弹，投资随之大幅度增加，为这种前途未卜的实验，罗斯福拨款达 20 亿美元。罗斯福虽始终没有弄懂原子核裂变的一般理论，但他却立即相信并采纳了萨克斯和爱因斯坦的建议，而且不惜代价的大力支持。

在进攻德国的战略重点应放在何处这个问题上，邱吉尔主张进攻欧洲的柔软的下腹部，罗斯福倾向于“超级体育家”行动，进军罗马，马歇尔则主张进攻法国海岸。经过权衡，罗斯福坚决支持马歇尔的建议，并想让马歇尔到欧洲指挥消灭德国的行动，让爱将艾森豪威尔代理参谋长。这项人事变动却遭到了参谋们的反对，罗斯福经过反复考虑还是接受了参谋们的意见。

但纳入之言并非对人言听计从，必须有领导者自己角度的全面考虑。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许多人建议罗斯福向日本宣战，同时向德、意宣战，罗斯福清楚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他却拒绝了这个建议，而是等待德、意先向自己宣战，这更能激发美国人民支持欧洲抗战的决心和激情。事实证明，罗斯福这一小小的计谋，果然发生了效力：人民不再认为是因总统好战而被送

上战场，而是美国无法避免战争不得不保卫国家，不得不为人民的利益而自卫。

五、标新立异实施新政

罗斯福自小热衷政治，喜欢学习历史，以法律作为自己大学时代和研究生学习的专业，但他从来不为传统和美国社会法律所禁锢，他对法律和宪法的发挥有时简直叫那些立法者哭笑不得，只要他需要或现实政治的需要，他从来不顾及那些传统和惯例。他不喜欢人们称他为“急进派”或者“社会主义者”，只是由于这样对他的竞选不利。他不是一个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他的标新立异不是他认真学习和思考的结果，而常常是凭直觉或听觉办事。他收藏了很多书，但却宁愿坐下来与人谈论而不去读书。他在政治上老练而灵活，对事物具有巨大的鉴析和概括能力，对经济事务具有相当强的吸收、掌握与归纳复杂材料的能力。他能一眼看穿事物的关键，能从美国人的眼睛中看出他们的渴望、嗜好以及他们爱听什么，容忍什么。他往往可以把伟大思想和十分重要的计划用通俗朴素而又振奋人心的话讲出来，但从不告诉人们细节，给自己的反悔、改变留下余地。只要现实确实需要，他可以把美国人民需要的东西全部许诺给他们，到了真正要做的时候，他却只从现实出发，甚至有意忘掉这些许诺。“新政”就是在1932年大选中作出的标新立异的许诺之一，而且是其中实现了的许诺。经过两个阶段的实施，“新政”给美国社会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新政”使美国渡过经济危机，经受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是把资本主义政治推向新阶段的重要的里程碑；它奠定了美国历史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的坚实基础，是罗斯福一生最重要的政治功绩。

罗斯福在他第一次进入政界，竞选参议员时使用汽车巡回竞选，反“希恩”时不按党魁意志办事，竞选总统时使用飞机，民主党代表大会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他直接亲自到大会答谢，这都不合惯例，在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当他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宣讲“新政”时，他心中并没有一个新政计划或蓝图，他只是按照美国人的希望构造了一个美好的目标。当他1933年3月4日就任总统时，美国经济已走到破产边缘，银行相继关闭，10天后全国银行全部关闭；就业率不及1923~1925年月平均的60%，大约有42%的工人失业，失业大军增加到1700万人左右，在业人员工资不及1923~1925年月平均工资的40%。贫困笼罩着美国，人们不能按照往常的方式生活下去，国家也不能按传统的方式统治下去，美国面临着一种艰难的选择，要么改弦更张，大力推行改革，要么等待革命的洗礼。罗斯福充分认识到这一危机的严重性，他在就职演说中庄严而郑重地为人们打气：“现在已到了说真话，说出全部真话的时刻，……我们唯一应当感到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他把危机的责任推给商界领袖，“我将要求国会准许我使用应付危机的唯一手段——就像同入侵之敌真正开战时应当授与我的那种大权，”罗斯福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他必须向人民证明他能领导美国渡过难关。

罗森曼感到纽约州时期的顾问们已无法应付这种局面，无法准确了解全国的问题的关键所在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劝罗斯福向大学教授求援，以英利为首的教授们为罗斯福提出了“新政”的理论轮廓，这些学者缅怀一战时的战时“社会主义”政策，欣赏苏俄的计划经济；他们虽不从根本上反对大公司，但反对大公司的无情倾轧，要求把这些经济寡头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国家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管理办法。可从何下手，专家们并没有设计出一套可行的行政纲领。危机日益严重，需要作的事情实在太多，罗斯福以他

特有的敏感抓住了关键，分清轻重缓急，立即着手实施。金融已经崩溃，但它是美国经济运行的血液，不能任其破产，不能让金融寡头们控制，只要危机一过，他们又会兴风作浪。罗斯福首先制订实施了《银行法》，下令全国银行关门，所有的资金储备都交联邦储备银行。经过整顿的银行逐步开业，金融崩溃的势头被扼制。对于人民来说，他们不必恐惧自己的存款；对于资本家来说，罗斯福为他们恢复了秩序，危机已渡过最危急的时刻。但罗斯福清楚，如果不能进一步用非常手段恢复生产，救济贫困和饥饿的人民，让失业者有事可干，这种治标的办法不会维持多久，但又怕新措施会遭到盲目乐观，自私自利的议会的阻挠。他准备解散议会，但后来在投票中成立了审查组织，检查每一个人的投票，议员们驯服地接受了，议会听命于他，罗斯福放弃了解散议会的极端念头。第二步采取了在平衡预算中显著缩减联邦开支的节约法，立即恢复了企业界的信心。“新政”初见成效，人民的信心开始恢复，货币开始向银行回流。接着，政府开始加强薄弱银行，取消不健全银行，国家提供资金帮助基本健全银行 6468 家，全国清理了 2352 家银行，银行最后交回私人手中，但彻底受公共控制。政府还逐步制止证券投机。《银行法》把巨大权力集中到金融中央委员会，政府直接管理贴现率、利息率、兑换率、储备金额及公开市场活动。政府还成立房主贷款公司，用 47.5 亿美元帮助将失去房产赎回权的房主；成立联邦住房管理局，发放建房修房抵押贷款，刺激和恢复了迫于停工的建筑业；既把巨大的贷款利息从私人手中夺到国家手中，同时使无数即将无家可归的人消除了恐惧，使国家经济逐步恢复，减缓了失业。

罗斯福的第二个“新政”措施是国家复兴计划和社会救济。国家设立了国家复兴管理局，经过商会、劳联和政府的合作达成了复兴计划法案。通过规定最低工资、限制工时、稳定物价、限制竞争、控制生产等措施，希望增加就业，恢复生产，复兴工业。但由于企业取得了自我管理的权力，大企业有力地压迫了小工商企业；全国复兴管理局推动复兴，却限制新投资与大规模增加生产，使复兴失去了前提；复兴管理局规划经济发展目标，却没有实现这些目标的支配权力，复兴计划失败。这只能说是走向发展合理经济计划的第一步，是一个折衷的实验。相比之下，由哈里·霍普金斯主持的联邦救济署工作却成效显著。罗斯福为不让人民饿死，作为复兴之前的权宜之计，着手解决千百万失业者和各市各州救济名册上的 600 万人的生存问题。社会救济在胡佛政府时期已开始，不同的是哈里·霍普金斯给被救济者发的是现金而不是食品券，这样不仅为穷人提供食物，而且提供衣服、住房和医疗。这些现金到了穷人手中，立即变成现实的购买力，直接推动消费的发展。同时哈里以他的远见，使政府和议会同意并采用了他的“以工代赈”计划。议会拨款 33 亿美元给为此成立的公共工程管理局，但救济名册上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扩大到 1000 多万。罗斯福接受哈里的建议成立国民工程管理局，以 4 亿美元开始工作，哈里局长 30 天内使国民工程局的事业成为 400 万人及其家属的谋生之道。接着取缔童工，确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废除以工人不加入工会为雇佣条件的“黄狗条约”，工人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实施农业调整法，由国家出面毁掉 1000 多英亩棉花，宰杀 622 万头猪，加上干旱，使农产品价格回升，使农场主的利益得到维护，同时却使大量的佃户失业。“新政”的第一阶段很难说是取得了成功，但的确缓和了危机，使人民感到政府正在努力克服困难，帮助人民渡过难关，而且政府正在积极而

有效地解决问题。这些措施使罗斯福得到了选民主体的工人、农民、失业者以压倒优势的支持。

1934年，经济危机最险恶的阶段刚刚过去，各阶级共渡难关的联盟立即破裂，中上层保守阶级代表的企业力量剧烈地反对“新政”，他们结成美国自由联盟，在大企业的支持下力图扭转进步主义潮流。在“新政”中未能得到切实利益和保护的中下层人民强烈地反对：“新政”的保守倾向，他们的代表人物，如汤森医生建议联邦每月付给所有60岁以上的失业者200美元。这个建议像烈火一样传播，立即有600万信徒支持。库格林神父提倡广泛而深远的工业与信用社会化计划，他的全国争取正义同盟有信徒900多万人，反对“新政”的保守倾向。休伊·P·朗以为下层的贫困阶级呼吁而闻名，他因罗斯福拒绝将银行国有化剥夺财富而激烈反对政府，他组织分享财富会，主张没收大家产作为济贫之资，授予每个家庭5000美元的宅地和2500美元的年收入。《幸福》杂志的调查表明，45.8%的人反对政府允许有100万美元以上投资的人只要按现行规定纳税就可保持他们的财产的政策，中西部有54.6%的人持此观点，太平洋沿岸54%的人持此观点，休伊·P·朗的主张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罗斯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他如果转向保守，他就不仅失去占选民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且和工人、农民支持下选举的国会发生冲突，企业主们未必会信任他，他要取得1936年的总统连任几乎就没有可能；他如果转向激进，就必须切实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和长期支持他的企业主对立。在霍普金斯的推动下，罗斯福决定向左转，进一步深化“新政”。霍普金斯制定更为广泛的以工代赈计划，政府起初提供50亿美元，将200~300万失业者安排到清理贫民窟、建筑农村住宅、电气化和各种公共工程项目中，后来扩展到修筑公路、飞机场等重大工程设施，把救济与基础建设结合起来，耗资达113.65亿美元，主办25万个项目，救济扩大到音乐工作者、演员、作家、艺术家、史学工作者和大学生。以工代赈消除了千百万失业者的不满，为以后的经济振兴创造了实质性条件，加强了进步力量对全国的控制，防止了更为激烈的甚至破坏性的社会动荡的发生。接着实施社会保障法，颁布保护工人和工会的瓦格纳法，这些措施切实得到下层的拥护，罗斯福由此得到更为广泛的支持。他不顾国会的反对，迫使最高法院改变其保守立场，确认各项“新政”原则，以法律手段巩固了“新政”成果，使罗斯福的竞选对手不得不表示他支持“新政”的各项原则和措施，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这无疑肯定罗斯福的政绩，使罗斯福轻而易举地连任总统。

罗斯福的“新政”使美国从经济危机中摆出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而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使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战略后勤基地。

六、“炉边谈话”

美国的大多数政治家都只在竞选的时候，把争取选民的支持当作头等大事，罗斯福却把争取选民的工作坚持到当选之后，利用人民的支持同反对自己或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任何人，包括议会作斗争。广大公众的支持，使议员们反对他的活动和主张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不得不投鼠忌器，不敢公开地、直接地、固执地反对罗斯福。罗斯福为此经常向人民发表“炉边谈话”，向公众说明自己决策和主张的根据、好处所在，把困难和责任推给对手，在亲切而愉快的“谈话”过程中，赢得了公众的好感和信任。这对反对者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从而从根本上挫败了那些反对派的任何企图。“炉边谈话”成为罗斯福的政治发明和重要的政治谋略之一。

1928年，罗斯福以微弱的多数当选纽约州州长，他奇迹般的胜利却使他遇到了一个其他州长很少遇到的问题：他个人取得了胜利，他的党——民主党——却在议会中失败了。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敌对的议会，不论“智囊”们为他起草多么美妙而雄辩的讲稿，不论罗斯福多么成功地发挥和演讲他的观点，却丝毫也打不动议员的心。议会决心要扼杀罗斯福的任何进步措施。罗斯福不能接受无所作为的安排。他决心把自己从议会无法得到的支持转向从选民中获取。在州长同议会间进行重大斗争时，他把斗争情况及时传达到本州所有的人，动用一切现代化的群众性的信息手段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在奥尔巴尼建立了新闻处，本州的所有报纸都能无偿地源源不断地得到关于州长工作情况的材料。最重要的是民主党向本州所有电台购买了每日1小时的广播时间，从1929年4月3日起，罗斯福开始对着麦克风亲自发表他经过仔细准备的“炉边谈话”。对于听众来说，不需要出门，吃过饭后，坐在家里的壁炉旁，烤着火，听着州长的讲话，还可以轻松地讨论州长所涉及的问题，在轻松愉快的生活中情感无比的亲切，因而无论罗斯福还是听众都不把它当作政治演说，而是当作平常的谈话。“炉边谈话”就成为这种情形的代名词。罗斯福肯定他说：“如果5年前，90%的选民是靠报纸得到消息的，那么现在，至少有一半选民是坐在壁炉旁收听两党政治家的演说，他们不是根据谈判的，而是根据听到的消息作出自己的判断的。”这种方法深受选民们欢迎，选民们不是被动地接受被他人渲染和加工过的消息和观点，而是自己也参与其中，他们不自觉地成为罗斯福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罗斯福的许多施政方案都是用这种渠道告诉选民的，使反对罗斯福的党派和议会再也无法利用宣传工具控制选民，选民更愿意听州长自己是怎么说的。

罗斯福在纽约的这些广播讲话——“炉边谈话”，成为罗斯福政治斗争中的一条重要经验和谋略，这也可以说是后来在白宫更熟练地运用这一手段的一次次演习。罗斯福在白宫主政期间，几乎每一重要问题都要通过“炉边谈话”与美国国民达成共识，使那些靠宣传、鼓动推销自己主张的政客们犹如离开水的鱼一样无计可施。

罗斯福在总统就职演说中，通过无线电广播告诉全国人民，由于商界领袖们的顽固与无能而使人民遭殃，他们自己却溜之大吉。他要求全国由退却转入进攻，得到了人民的热情欢迎。同时，他还警告国会：“如果不通过必要立法，危机再继续下去，人民会要求我建立纪律和运用一切手段应付危机。”罗斯福以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在“智囊”团和“新政”官员的支持下，立即通过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和“新政”立法，比如工业复兴法、社会保

障法、以工代赈等，使美国经济危机走出低谷，经济开始恢复。但在 1935 年 5 月 27 日，最高法院却断然宣布“新政”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反宪法，接着又通过判决宣布农业调整法违宪，命运马上要降到社会保障法和苏格纳法，一些下级法院也积极活动，准备向“新政”开刀，这对“新政”派来说无疑是“新政”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最高法院摧毁了“新政”的关键性事业，“新政”成败也列了最后存亡的时刻，罗斯福的“新”政陷入绝境，他一面要求国会继续通过“新政”法案，一面在 5 月 31 日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向美国人民说明真相：“最高法院有权维护宪法，但现在他们这么做，只是在阻止联邦政府谋求解决全国性经济危机的努力。阻止恢复人民正常生活的努力。”“最高法院不是以一个司法机构行事，而是以一个制定政策的机构行事，不适当地把自己变成国会第三院——超立法机构，把一些宪法所不包含的字眼和含义，硬塞进宪法，使行政、立法、司法三大部分之间的均衡遭到破坏。”“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恢复这种平衡，我们需要一个宪法之下公正行事的最高法院，而不是高居宪法之上；我们需要法院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罗斯福讲话时庄严就坐，总统夫人埃莉诺塔坐在一边，手中织着蓝色短袜，但每一个人都感到了形势的严峻。罗斯福的神态和语调，就像自己的美好思想遭到凌辱一样，他要让所有的人明白，最高法院判断使得援助所有人、其中包括援助企业界的国策无法贯彻，使联邦政策不再有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法律权力，那么国家状况就根本不可能好转。

人民终于明白，罗斯福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政策，尽管对罗斯福来说赞誉和攻击一样尖锐和旗帜鲜明，但使美国渡过经济危机的黑暗时期的正是联邦政府及总统推行的“新政”，最高法院试图推翻的也正是这些。罗斯福又一次通过“炉边谈话”争取了人民的支持，但罗斯福并没有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将争论文付人民公决，而是在人民支持下提出了司法改革法。此法授权他，只要一个现任法官年届 70 岁以后 6 个月还不退休，他就可任命一位新联邦法官，增加的法官不超过 50 人，进入最高法院的不能超过 6 人，理由是法院人员不足和体弱多病导致案件积压，审判拖延，法院需要新鲜血液和现代观点，如果实现这个改革，使改革派和“新政”派法官 6 个人进入最高法院，加上原有的少数进步派就可组成进步多数派，使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失去多数地位。尽管这个法案没有在国会得到他预想的普遍支持，但就 1937 年最高法院通过判决批准“新政”的各项法案和政策来看，罗斯福又一次利用“炉边谈话”扭转了局势并取得大部分胜利。

“炉边谈话”是罗斯福别开生面、具有无限鼓舞力量的政治领导艺术之一。按照传统，总统对人民的讲话总是称作演说，它不是严肃正经的，居高临下的训话，就是煞费苦心的辩白或严峻的说教，人民对此十分厌烦，而罗斯福的话简单随便，像亲友的促膝谈心，使你对他的诺言不致于产生任何怀疑，不自觉地接受他的观点和主张。那些听过“谈话”的人，无不被总统那娓娓动人的谈吐激起强烈的共鸣和与其产生共同的信念。“在胡佛咄咄逼人的指责和训斥之后，罗斯福的后更令人感到振奋。”甚至在看到他们所认同的诺言发生效力后，人民像“中了头奖一样”兴高采烈，这证明政府和总统不仅进步、主气勃勃，而且本质上生动活泼，在切实为人民办事。

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沟通了总统与人民的思想，使人民从那些议会政治家和各种党派报纸了解国家大事和政治形势的传统渠道失去了影响力，人民不愿去听那些各色政治家的争论和宣传，他们更愿亲自、直接地听取总统

的看法和主张，从而使那些政治家失去了他们煽动人心的市场和他们对舆论工具的垄断，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正是这种高超的政治艺术，使罗斯福在推行自己的“新政”和各项内外政策方面，能够顺利地、有利地取得人民的支持，从而挫败了各种反对派的阻挠和破坏，最终保证了罗斯福的巨大成功和打破常规连选连任美国总统达 12 年之久。

七、隔岸观火 坐收渔利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崛起，逐渐掌握了一些国家的政权，从而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战争策源地。日本军国主义奉行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蒙满的侵略方针，于 1931 年开始大举侵略中国东北和长城以北地区。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意大利和德国首先把侵略矛头指向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欧洲英法等国制造了“慕尼黑阴谋”和远东“绥靖政策”，以牺牲弱小国家为代价，纵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侵略苏联，扑灭共产主义运动，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先后分别与德国、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为反侵略斗争赢得准备时间。1937 年轴心国集团形成，1939 年 9 月德国大举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欧洲主要列强对德意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阵营开始形成。美国奉行中立主义原则，既不给反法西斯国家以有力的支援，也不给侵略国以有力制裁，继续向日本供应钢铁等战略物资。罗斯福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主张早日参战，反对威尔逊的中立主张，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却尽可能地学习威尔逊的外交方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政策。

美国人虽然反对德、意、日的侵略行径，但更不愿卷入任何对外战争。中立法案明确禁止给任何交战国提供军事援助和贷款，他们只是尽可能地利用战争解决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极力以现金交易方式把他们的剩余产品销售出去。美国普遍笼罩在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的气氛中。罗斯福却不是这种思想的信徒和支持者，但他不作任何努力向这种孤立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甚至让人感到他根本不重视对外政策，似乎他对法西斯的侵略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其实，这都不是罗斯福的真实面目，他这样做只是因为这样的现实对美国和他个人都有利。他不愿在战争双方未分出任何胜负或者还看不清它的发展趋势时盲目投入战争漩涡。他在对外问题上采取的做法是：一面密切注视战争进程和发展动向，一面积极做好参战的内政外交方面的准备，为参战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认真等待对美国最有利的时机。

他首先认真关注交战国及战争的发展状况。罗斯福亲自选派驻外使节，让他们直接向他汇报和负责，而不通过官方渠道，甚至不相信国务院，认为他们更容易泄露情报，宁愿自己花大量时间同有见识的各种来访者谈话。依靠伯纳德·巴鲁克、埃文斯·卡尔森上尉一伙人直接向他通风报信，他甚至不制订各种易于引起议论的政策，而只是把自己认为必须办的重要事务直接交给财政部或海军部或其他具体部门去执行。后来直接任命哈里·霍普金斯为他解决重大外交问题，只向他本人负责，他根据所掌握的第一手情报资料，判断国际形势，作出重要决策，而不去在思想上和政策上直接触及美国人的中立思想，他在中立主义的掩护下做自己的外交和参战准备。

罗斯福的内政方面的参战准备措施主要表现在恢复经济和逐渐加强海空军及战争物资生产和生产基地的建设上。罗斯福首先全力推行“新政”，使全国经济走上复兴轨道。他支持霍普金斯的社会救济工作和以工代赈政策，用 15 亿美元解决了将近 1700 万人的生计问题，特别把公共工程由扫枯叶、维修房屋引向基础设施建设。国民工程管理局三个半月兴建和扩建学校 4 万所，铺设污水管道 1200 万英尺，建造飞机场 469 个，扩建机场 529 个，修理和建造公路 25.5 万英里，兴建和扩建机场，公路都是直接为参战准备的，同

时还制造航空母舰“企业号”和“约克敦”号积极备战。后来美国国会通过文森扩充海军法，此后10年开支10亿美元，建立了一支强大到可以对付德、意、日联合舰队的海军。

罗斯福对外政策的特点是脚踏两只船，他一面逐渐增加对盟国的支持，又同时与德、意、日及法国贝当政府保持联系，甚至继续出口废钢铁给日本。中国政府多次要求美国对日本制裁，停止交易，罗斯福根本不予理睬，他不愿放弃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大客户，他不可能不清楚这种交易给日本帮了多大的忙，但他更看重的是自己的市场和利益而不是其它国家的生死存亡。他的外交有三个重点，一是与英国的关系，英国逐渐成为抵抗德国的唯一的国家，急切地需要美国全力的支持。罗斯福知道德国征服欧洲将对美国不利，但当时英国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大国，在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拥有霸权地位，支配着国际联盟，是美国心上一块石头，是美国走向世界霸权的重要障碍，因而罗斯福既不希望德国获胜，也不希望英国立即获胜。他不会在英国还比较强大的时候实质性地支援英国，他希望两国认真“切磋”，只要不伤及美国的利益，他看准了大英帝国的钱袋子。罗斯福对欧战的反应除了一个强硬的声明外，就是1939年9月5日，即英、法对德宣战后的第5天发布的正式中立声明。他实施中立法中的武器禁运条款，取消英、法价值7900万美元的战争订货，仅允许英、法等自由购买原料和粮食这些经济危机中极度过剩的东西，对所有在美国购买的物资实行现购自运的原则。11月4日签署新法案取消禁令，把现货自运原则扩大到武器，他要的是钱。直到1940年邱吉尔准备用自己的“血、辛劳、眼泪和汗水”争取胜利，请求罗斯福宣布非交战状态，供给英军40~50艘旧驱逐舰，供应英国数百架飞机和大量军人时，罗斯福以时机不成熟为由拒绝了邱吉尔。同时他却要求国会加速备战运动，计划到1941年陆军增加到55万人，1942年1月增加到100万人，7月增加到200万人，每年生产5万架飞机和大量的坦克大炮。他还请求增拨国防经费，实行义务兵役制。法国投降后，英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邱吉尔一再警告，美国若不立即支援，英伦三岛可能沦陷。罗斯福再次拒绝了邱吉尔的要求，却下令陆、海军部“翻箱倒柜地清查”，把所有“一战时贮存的和库中现有的可用的枪炮弹药修理并移交私营公司，转卖给英国”。从6月到10月约有97万支步枪、20余万支左轮手枪、8.75万支机枪、895门75毫米口径大炮、316门迫击炮和大量其他军人卖给了英国，其中没有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武器。直到邱吉尔表示英国再没有现款可购买美国的军火时，罗斯福才放开了英国的钱袋子，实行租借法，要英国战后用物资和劳务偿还租借物资。罗斯福作为一个政治家利用战争，隔岸观火，坐收渔利，但他更不愿引人烧身，一旦当火势大猛，危及他的国家利益时，才转而实质性地支援英国。他不是不得已，而是他不愿美国同德国一决雌雄。

罗斯福外交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在法西斯国家打着反共产国际的旗号推行侵略时，他意识到苏联将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席卷世界，而苏联似乎未受到影响，继续持续发展，市场广阔。罗斯福要真正作到隔岸观火，坐收渔利，又必须面对美国参战的可能性，这就必须寻找一种“力量的平衡性”，借助一种强大的力量来遏制德、意、日等国法西斯力量的膨胀。在英法等国极力纵容法西斯的扩张时，苏联呼吁各国共同对付侵略而采取一致步骤。苏联是法西斯的公开敌人，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1933年，罗斯福政府在日

本、德国侵略行为的压力下，在国内局势的压力下，表示愿与苏联建立关系，结束 16 年来对苏联的不承认政策而承认苏联。但罗斯福却没有表明自己的战略考虑，即“俄国可能在稳定局势方面提供巨大的帮助”，用苏联来对抗德国和日本，保卫民主和美国的利益。罗斯福告诉人民，承认苏联将能收回沙皇政府和克伦斯基政府所欠的 1.5 亿美元的债务，活跃两国贸易对美国各阶层的利益极有好处。美苏两个大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并未取得实质进展，罗斯福一面力图打开苏联市场，一面尽量回避贷款问题，同时参与“慕尼黑阴谋”和远东“绥靖政策”，试图让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决战。他与双方联系，真正坐收渔利。

罗斯福坐收渔利政策的另一重点就是巩固后院。自从走出经济危机的困难时期，美国多次召开美洲国家会议，反复重申门罗宣言，既要充当美洲的保护伞，又把美洲视作美国的囊中之物。他以睦邻政策为旗号，推行“互惠贸易”政策，与古巴等拉美七国签署了贸易互惠条约，巩固了与墨西哥的政治经济联盟，打破大英帝国各自治领地的贸易壁垒，同加拿大建立了贸易关系。美国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战争的机会，几乎垄断了整个美洲市场。

罗斯福隔岸观火、后发制人的政策，使美国在欧洲列强苦苦战争，反法西斯国家者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乘机巩固发展了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力争取世界霸权，甚至不惜乘人之危，他支持英、苏、中的抗战斗争，很明白地包含着让这些国家牵制法西斯侵略者，为他坐收渔利创造机会，使他在各种矛盾中游刃有余地扩张美国利益。罗斯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

八、租借法案救邻自救

在 1940 年大选来临之前,罗斯福是否连续竞选第三次连任总统似乎是一个谜。内阁中除伊克斯外几乎没有人支持罗斯福作为总统候选人提名,其它的阁员几乎都准备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罗斯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句话:“请免开尊口。”罗斯福未必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但如果英国很快投降德国,罗斯福竞选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只要英国还能坚持战斗,罗斯福竞选总统才有一线希望,才能有所作为,否则他宁愿光荣地见好就收,把困难留给继任者来处理。英国坚持战斗坚定了他的信心,罗斯福决心第三次竞选。他刚刚第三次连任总统,邱吉尔就发来一封长达 4000 字的长信,紧急信声称:“我们不能再用现款支付运费和购买其他供给品的时刻即将到来,英国经济和战争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紧急请求美国拨出几千架飞机,几百万吨船只,邱吉尔表示“只要给我们武器,我们会做好这件事,毋需美国一兵一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然而根据美国中立法和其他立法条款,交战国必须用现款购买武器,并且不准向没有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债务的国家提供贷款。但是,自从 11 月中旬以来,德国一直在对英国进行持续轰炸,对伦敦进行闪击战,希腊、北非战局恶化。

罗斯福对邱吉尔的问题,沉思默想了两天,他清楚地意识到,英国财政枯竭,不仅不能持久战斗,美国的货物和商品也无法进入英国,他已到了必须行动的时刻,而美国长期受孤立保守的中立主义影响,普遍反对参战。罗斯福的竞选对手攻击罗斯福是好战分子,并警告美国人民,选举罗斯福意味着“为他们的儿子,兄弟、爱人树立十字架”。罗斯福不能不告诉全国人民,他主张和平,并在 1940 年 10 月 23 日的费城演说中向选民保证,他并没有为了将美国卷入战争,或为了其他目的签订秘密协定,又在纽约麦迪逊广场演说中强调他加强国防的长期努力的原因是,只有使欧洲的侵略停止,才能使战火不致烧到美国的海岸,并保证“我从前说过,但我还得一而再,再而三他说,你们的孩子们不会被送去参加任何外国战争……我们防御的目的是防御”,而现在的他,在发表这些讲演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后,却不得不作出新的抉择。在 12 月 17 日,他向记者们说:“保卫美国的最后办法是英国人保卫自己”,主张贷款给英国使英国购买美国货或把钱赠给英国却是陈词滥调,表明他并不打算直接和中立法案冲突,然后讲了一个平淡无趣的寓言:“一个人邻居失业,而他的花园内有一个浇花的皮带管……”罗斯福用这种平淡的比喻来摆脱他的尴尬局面,从而提出了一条重要谋略——救邻自救,但并没有引起他所企望的反应。

1940 年 12 月 29 日罗斯福再次用“炉边谈话”将严重的战争局势及他的想法告诉美国人民。他把鼓吹姑息纳粹的人痛骂了一番:“我们不能用缩进被窝、蒙头大睡的办法去回避危险或对危险的害怕。”“一个国家要想同纳粹和平相处,决不是什么和平,它只能是又一次休战,会导致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军备竞赛,最富有破坏性的贸易战争。……我们南北美洲各国所有人,可能就要在纳粹的枪杆子威胁下过日子。”“想要通过谈判来取得和平的尝试是极其愚蠢的。我们必须成为民主的军火库”,但“也有一些美国公民,他们当中许多人身居要职,尤其是在国务院里,他们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地支持和怂恿第五纵队的间谍活动”,并断言轴心国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成为“民主的军火库”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美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尽

管德军用空袭伦敦来抵消“炉边谈话”的影响，但成为“民主军人库”已成为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不论反对派是如何攻击租赁法案，它还是被通过了。

救邻自救的租赁法案既克服直接投入战争派遣军队要遭受的巨大压力和反对，又使美国政府和人民逐步摆脱了孤立主义和中立法案的统治性影响而逐步走向战时体制，同时有力地支持了英国、苏联、中国等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使美国把战争危险降低到最小限度。这一法案的实施，有力地牵制了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使美国实际上也明显站在反法西斯战线一边。

1941年3月8日参议院通过租赁法案，正式“授权并提供足够资金增加军人和许多种作战物资，准备交给那些正与侵略国实际作战的国家。这些东西将在战争结束时用物资与劳务归还”。罗斯福总统立即签署并请求国会拨款70亿美元作为生产与输出租借物资之用。通过这个立法，尽力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合格的兵工厂，从而美国从中立国变成非交战国，而德国正在疯狂地进行潜水艇战，在大西洋上将各种运送军需物资到英国的船只摧毁，1941年3~5月有1691416吨的商船被摧毁，大西洋战斗成为决定战争进程的关键。罗斯福一面下令修理英国船只，一面将10艘警备队汽艇转让英国舰队，帮助反潜艇作战，一面扩大海上巡边范围，开始将大量物资运送英国并部分护航，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反对派认为英国的抗战毫无希望，美国应当用它的武器保卫自己，他们宣称罗斯福租赁法案是把钱扔向大海，一分也没有收回的希望，而且将毁掉四分之一的美国青年。史汀生部长建议罗斯福下令海军为英国与同盟军商船进行全程护航。罗斯福既没有向反对派妥协，也拒绝了史汀生的建议，面对希特勒的“海狮计划”，英国只留下700架战斗机和500架轰炸机，要保护数千里的海岸线十分困难。德军潜艇为切断英国大西洋上的生命线，击沉驶向英国港口的商船750艘，打坏1450艘，损失相当于英美两国造船厂补充能力的两倍，形势异常严峻。罗斯福清楚，对现代战争的突然打击力有一定了解的人，等待敌人取得立足点是愚蠢的，必须防止敌人取得立足点。严峻的战争现实正迫使各国从单纯自保出发，作出新的严峻选择。对罗斯福来说，对大西洋战斗不是采取不采取行动的问题，而是采取哪一种方式参加的问题。

罗斯福比任何美国人都清楚这场战争的后果，比任何美国人都清楚这场战争对美国的意义，清楚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处境，更清楚战争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他在“新政”时期就支持霍普金斯的以工代赈工作，致力于修筑全国的公路、飞机场、恢复船厂等军工生产。到了法国投降，他仍不急于投入战争。他不想仓促参战，甚至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也不急于向德国宣战。他要彻底等待美国人民放弃任何中立和和平的幻想。他为夺取战争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要使军工生产全面恢复并大力发展，使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工生产能力远远超过自己的对手，而租赁法案是最好的办法，既支持同法西斯作战的国家坚持抗击侵略军，又为美国赢得最多的备战时间。他首先支持英国等抗战国家；德军侵入苏联，罗斯福就把大量军用物资和粮食运往苏联；当蒋介石以对日谈判要挟他，他立即增加了对中国的租借物资的数量。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通过租赁法案援助同盟国家的物资达500亿美元，成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也成为各抗战国家的真正朋友，在国际事务中，自然地居于中心地位。从1941年1月开始罗

斯福建立生产管理局，从生产优先制帮助汽车制造商向生产坦克和飞机过渡，到当年春夏完成向战时经济转变，接着建立了战时生产局，使战争物资生产由 1941 年的产值 84 亿美元，增加到 1942 年的 302 亿美元，相当于德、意、日三国总产值之和，飞机从 1939 年生产 5865 架发展到 1944 年达 96369 架，商船 1941 年建造 100 万吨， 1943 年达 1900 万吨。

正是在这种坚实的经济实力之上，美国参战才具有真正决定性影响的意义，为美国军队取得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为盟国坚持战斗直至胜利提供了物资保证。而租借法案正是启动这种战时生产体制的关键步骤，从而真正实现了救邻自救的政治目的，使美国成为唯一在战争中保持经济发展的国家，为美国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奠定了基础。

九、先欧后亚各个击破

罗斯福执政时期，正是德、意、日三个国家走上法西斯扩张道路的时期，是亚欧两大战争策源地形成的时期。罗斯福几乎把全部注意力倾注在国内事务上，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的地位，推行“新政”，以渡过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在国际事务上，他跟随英法，在欧亚推行那种以牺牲弱小民族为代价的绥靖政策，纵容和助长了德、意、日的侵略野心。尽管如此，但他还是清醒地意识到：德、意、日的反共产国际轴心，迟早会把侵略矛头指向英、法、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他尽可能地了解各国动向，尽可能作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他选择了隔岸观火、坐收渔利的政策，并开始考虑美国参战的时机、地点，以获得最大的利益效应。最终他制订形成了一个先欧后亚、各个击破的战略决策。

在 1931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罗斯福正忙于他的竞选准备。1936 年轴心国集团形成，德、意侵略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罗斯福正忙于对付国内的工人运动，国内保守势力正以强大的压力使美国避免卷入欧洲冲突。1937 年 7 月，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罗斯福却于 8 月 17 日派遣 1200 名海军陆战队，增援在中国的 2200 名美国兵。作为仅次于日本的在华投资国家，10 月，罗斯福提出了“隔离”政策，号召并主张召开国际会议，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立即得到英国人的积极响应，英国更担心其远离本土的东方利益会被日本夺取。强有力的反侵略国际会议即将在布鲁塞尔召开，但美国民众反对与英国合作，把总统称为战争贩子。罗斯福看到英国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缅甸、太平洋各岛及新加坡、香港及其在巨大利益，态度立即从强硬变为消极，以至美国代表团不愿为会议提出一个行动方案。而日本对此的答复是炸沉了长江中美国炮舰“佩纳”号和三艘油轮，但美国也只是要求日本赔偿损失，甚至要撤退所有驻华美军及侨民。罗斯福觉得美国人还吞不下太厉害的政治药剂，他只好放弃原计划。因为他从不让群众意见跟自己距离太大，他悄悄地以另一种路线前进，表示如果加拿大遭受侵略，美国不能袖手旁观。美国商人继续向日本供应石油、废铁，而没有这些供应，日本是难以发动任何大规模的战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罗斯福这一时期确实关注日本的侵略超过了欧洲，他要求加强关岛防务，众议院怕东京认为美国挑衅而否决了它。捷克危在旦夕，英、法两国政府既无胆量又无办法应付危机。罗斯福要求拨 10 亿美元建立两洋海军得到同意，又派霍普金斯调查太平洋沿岸各州情况，了解普通飞机场改为军用机场要花多少时间，霍普金斯感到总统断定美国不免一战。罗斯福公开表示美国需要 8000 架军用飞机，相信有了空军就有胜利把握。罗斯福相信美国与德国难免一战，但他希望这种可能最好不要出现，或者通过支持和供应英国武器等待时机，坐收渔利，而亚洲战争对美国关系更为密切，他无法确定中国能支持多久，一旦中国失败，日本在德国进攻苏联前更可能把目标选择在太平洋，日本是把美国拖入战争漩涡的主要敌人。直到 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才对日宣战，但拒绝对德、意宣战，仍把重点放在亚太地区。

但大多数美国人更关心欧战，随着欧战的升级和纳粹的胜利，美国人日益认为德国是主要敌人，特别是希特勒的第五纵队加强在拉美国家，甚至在美国的活动和大西洋海战的严峻形势，使美国后院处于危机之中，罗斯福支持美洲议会警告欧洲交战国不得在这些国家的海域作战。特别是日本陆军主

力陷入中国战场无力自拔后，罗斯福感到亚大战场比欧洲战场危险性要小，而德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都远远超过了日本，使罗斯福真正意识到德国才是美国未来的主要敌人。在 1941 年 2 月美英参谋会谈中，双方一致认为德国是举足轻重的轴心国家，大西洋和欧洲才是决定性的战场，德国一经击败，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必然随之到来。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舆论一致要求美国对付日本，把德国交给英俄对付。罗斯福立即对日宣战，陆军部下令美国各港口已经装船的全部租赁物资暂停离港，冻结原来拨给中东和欧洲的重要物资，转拨给太平洋方面。当邱吉尔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马上从位子上跳起来，要外交部立刻办理对日宣战的手续，“连迟一分钟都不行！”英国人担心美国战略思想又可能有急剧变化，会把全部力量集中起来对付日本。哈里曼立即打电话给霍普金斯，要他帮忙，即影响罗斯福坚持优先对付德国；邱吉尔立即要求到美国与罗斯福举行会谈，外交大臣艾登直奔莫斯科。12 月 22 日，邱吉尔到美国后，用尽全身解数与美国阁员、军事参谋人员套近乎、拉关系，与罗斯福更是广泛交换意见，但罗斯福仍然没有完全确定他的战略意图。罗斯福在议会讲演时，首先向抗击法西斯的国家致敬时，当他先向英国，苏联致敬，会场几乎没有共鸣，但当他向单独抗击日本侵略者四年半的中国人民致敬时，议会掌声雷动达 10 分钟之久。罗斯福不会不考虑人心向背，然而当他犹豫不定，邱吉尔忙得不可开交时，德国人和日本人帮助了邱吉尔，替罗斯福下定了决心。德国首先向美国宣战，而日本几乎把太平洋上任何可供美国立足的基地全部扫荡一空。罗斯福经过审慎思考，终于与邱吉尔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确定了先欧后亚，各个击破的重大战略决策。

先欧后亚的战略决策，是罗斯福影响二战进程的最重要的决策。它直接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尾方式，直接影响到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它并不是罗斯福上了邱吉尔的当，而是当时世界大战进程中一项重要而明智的决策，因为当时作出这样的决策是必须有胆识和远见的，第一，是日本这个经济上远没有美国强大，军事上没有美国先进的国家首先打击美国的，它给美国的太平洋海军和太平洋利益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要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咽下这颗难以咽下的苦果，实在是历史上绝无前例的，若没有全局战争的总体战观念是难以承认这一失败、放弃这个当面之敌的。第二，美国当时社会舆论无不以日本为主要敌人。2323 名军人死于珍珠港，18 艘大型军舰和许多驱逐舰被击沉或击毁，美国人民愤怒之中忘掉一切党派之争，辩论起长期对立的外交政策，决心坚定不移地打赢这场由日本发动的战争。参议员惠勒恶狠狠他说：“现在只有狠狠地揍日本人，揍得他头破血流。”无数的美国人包围了日本大使馆，有的人甚至砍掉了华盛顿的樱花树；罗斯福愤怒得一天都吃不下饭，他和他的三军参谋长怎么也想不通这样大的一个海军基地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国务卿赫尔见到日本大使气得浑身发抖，把日本大使赶出自己的办公室；白宫的广场前聚集着密密麻麻的人群美国的群情激奋是针对日本的，罗斯福要把德国摆在首位必然要说服这些愤怒的人们和议员。第三，把战略重点放在德国发动的欧洲战场，就意味着太平洋战场必须继续忍受耻辱和失败，即使最终能战胜日本，但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罗斯福对这必须做出准确的判断。第四，日本下一步进攻方向在何处，战争期间有没有进攻美洲西海岸、进攻北美洲的可能性，连邱吉尔都相信美洲西海岸不时可能会遭“冒犯”，罗斯福也认为日本利用航空母舰袭击西海岸或巴

拿马运河的可能性很大。日本人若袭击西海岸，对美国人心和工业生产（包括军工生产）影响极大；袭击巴拿马运河，直接把美国海军隔在大西洋而无法控制太平洋局势。罗斯福一度反复强调：“只有在本半球以外的地方取得军事胜利，才能全盘实现国策。”罗斯福开始“疏散”西海岸的兵工厂，设法用 ABCD 战区将日本圈在一定范围，但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几乎不可能，一旦日本突出包围，占领澳大利亚切断太平洋与印度洋，或经印度洋进军中东与德、意会合，后果就不堪设想。

马歇尔在这个关键日子，提出了他的重要建议：“我们必须在这里决定一个行动方针，而不能指望在战场上去决定。我赞成由一个人当家，但要根据我们这里所发的指令行事。”“如果我们制定一个统一指挥的计划，我们的麻烦十有八九都可以解决了。”罗斯福接受了这个建议，统一指挥就必须从全世界的战争大局出发，罗斯福决策的基点不得不发生根本转移。罗斯福看到：用美、英、荷、澳战区包围日本，成功的可能性不大；用俄、英、非洲、土耳其包围德、意，堵住缺口把握更大；英国作为战略基地可立即使用，非洲广大的区域即将具有重要意义并投入使用，而中国、太平洋战区随着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毁灭，几乎无法使美国找到安全并可直接打击日本本土的基地；全世界只有苏俄战区不久可能转入反攻，苏、美、英合作力量远远超出德、意，而太平洋和亚洲地区美、中、英、荷的力量虽可超出日本，但英、荷战斗力极弱，中国立即反攻的条件还不成熟，美国面对宽广的太平洋，陆军几乎没有用武之地，海军、空军也没有把握尽快控制太平洋；从战后政治格局来看，英、荷、法在太平洋和亚洲的力量尽快会被日本摧毁殆尽，亚太地区迟早要成为美国支配的地区，但在非洲和欧洲，一旦德意失败，这些地区将被英、苏分割，若美国不投入主要精力，美国将失去这些地区，对美国的世界霸权不利，一旦德意胜利，美国将面临比日本强大得多的敌人。罗斯福思来想去，既不能让英国失败，也不能让英国独享胜利果实，不能重蹈威尔逊的覆辙，美、英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必须根本改变。罗斯福基于这些原因，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终于作出了决定，先欧后亚，各个击破，争夺世界霸权。他虽没有改变全国人的企望和目标，没有公开他这一决策，但已把绝大部分的作战规划工作集中于欧洲方面，主要目标就是从阿尔汉格爾到黑海，经过安纳托利亚、地中海北岸和欧洲大陆西海岸连接起来加强和紧缩对德国控制地区的包围圈，把缺口堵起来，支持苏联战场，武装和支持土耳其，增加中东力量，占领整个北非海岸。

历史证明，罗斯福先欧后亚的战略，不仅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而且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论在东半球，还是在西半球都居于重要的支配地位，罗斯福作为一名伟人，他知道什么时候和民众保持一致，什么时候必须审时度势，作出决断；他不但清楚什么是美国的尊严，什么是美国的利益，更了解什么是可能，什么是现实，知道部下的那些建议具有重要意义，而根据情况适时调整政策。

朱德谋略

朱德（1886～1976），字玉阶，四川仪陇人。他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并了辛亥革命活动和讨袁、护法战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4月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扩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0年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军委主席，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周恩来共同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重大胜利。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长征途中，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和叛党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八年抗战中，任八路军总司令，和毛泽东一起，指挥解放区战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不朽功绩。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职，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了巨大的努力。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一、立志“刷新旧国风”

综观朱德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首先在于他自幼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并且坚持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地为此而奋斗到底。特别是他在实践自己伟大抱负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弃旧图新，追求真理，最终懂得了必须把个人的抱负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依靠党的领导，和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进行人民革命和人民战争，这就为实现自己的抱负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可以战胜任何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

朱德生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的一个佃农家庭，幼年生长在清末民初统治者腐朽无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中。他亲身经历了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贪官污吏鱼肉人民、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军阀割据混战造成人民流离失所、缺衣少食、冻饿死亡的悲惨遭遇，从而激发了他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强烈愿望。他痛心疾首于国家的沦落、民族的危亡、人民的苦难，在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和书刊的影响下，自幼就立下宏大志愿，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誓为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而奋斗到底。

尽管朱德家境清贫，他父辈为了家庭日后“免受人欺侮”，能有个人“撑持门户”，几户人省吃俭用，东挪西借，凑钱供他上学。在学校，他在老师的启发下，懂得了“人不做事就没有什么用”、“要做事才能救世界”等道理，这也正是他上学所要寻求的道理。和一般少年上学是为了“出入头地”、“有事做”、“有出路”、“光宗耀祖”等不一样，他上学就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为拯救世界去干一番事业。当时，私塾和旧学堂所学的“子曰”、“诗云”那一套根本无法满足他的愿望，而西方的新学已开始传入我国。为了寻求新思想、新知识，掌握救国救民的本领，他毅然进入了设有各种新学科的顺庆府中学。在这里，他受到反清的进步教师张澜、刘寿川等人的影响，从一些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书刊中初步接触了西方民主、自由、科学等思想。后来，他又进入成都高等学校附设体育学堂，认为发展体育运动能增强人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也不失为施展自己抱负的一条途径。1907年他从成都体育学堂毕业后，返回故乡仪陇县，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到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推广新学。朱德任庶务主任兼体育教员，给学生开设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体育课，以实践自己教育救国和体育救国的理想。但是，办新学校、设新课程，特别是开设体育课，直接触犯了封建反动势力的禁律，他们咒骂、诬蔑“新学野蛮，有损国粹”，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各种事端，甚至不借雇用打手捣乱、破坏，企图搞垮新学，最后竟用卑鄙的嫁祸手段逼迫朱德辞职离开了仪陇县立高小。

仪陇县立高小事件，使朱德亲身体会到，在当时条件下，单凭教育并不能救中国。原先他到成都就想学军事，因家庭反对未能如愿。他离开仪陇高小后，即欣然应挚友之邀，决心同去昆明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在那“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年代，自然又遭到家庭的阻挠，但朱德决心已下，“就是非救国不可”。他坚决他说：“我已经选择了我的道路，义无反顾了！”在辞别友人的宴会上，他慷慨激昂地挥笔写下“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军去从戎，刷新旧国风”的壮烈诗篇，表达了他为救国救民一往无前的坚强决心和意志。1909年他在昆明考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时年23岁。从此，朱德便踏上了戎马注淑的军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了一生。

进入讲武堂不久，朱德秘密加入了革命组织同盟会，开始了一个民主革命者的斗争生涯，开始在军队中从事反对清王朝和军阀统治的革命活动。从这时起到1922年初的12年间，他在讲武堂和滇军中，一方面开展革命活动，一方面指挥自己的部队，参加了反清的云南起义以及讨袁、护法战争，并在云南边境清剿法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持的土匪。由于他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军纪严明，战功卓著，从排长逐步升到旅长、省宪兵司令、警察厅长，对于当时云南省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共和制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成为在全国颇负盛名的滇军名将。

作为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朱德在滇军中的所作所为，虽然部分地实践了他救国救民的愿望，但是，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果实却落入袁世凯等北洋军阀之手，帝国主义利用军阀继续在中国作威作福。由于国民党的软弱无力，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国内形成了新旧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大多数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被军阀及其代理人所篡夺，这些没有从根本上改造过来的军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救中国，许多都成了反人民的工具。滇军在蔡愕逝世后，也几经反复被军阀唐继尧所控制，刚刚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即将毁于一旦。因此，中国人民的苦难处境丝毫没有改变，民族的振兴毫无希望。西方的民主、自由那一套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这样的处境下，朱德对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已完全失望了。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继续坚持革命，才能切实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夙愿呢？他深深地进行了反思。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把中国的革命推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都对朱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同中国一切追求进步的人们一样，如饥似渴地阅读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革命的书刊文章，受到极大的启发和鼓舞，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于是他决心抛弃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摆脱旧的束缚，而去寻找新的真理和新的革命力量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并准备出国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寻求革命的真理；学习俄国革命的榜样，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从头进行革命”。

1922年上半年，朱德毅然辞去滇军的官职，拒绝了四川军阀杨森要他当师长的邀请，从上海赴德国。1922年6月，在柏林他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他的坚决要求下，周恩来欣然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从一个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转变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对他来说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在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决心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彻底解放而奋斗的人，只有追随中国共产党，依靠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进行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才能真正实现救国救民的愿望。朱德在回忆自己这一转变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那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

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

这段发自内心的自白，正是一个真正彻底革命者的情怀。从加入中国共

产党的那一天起，他就把自己的志愿和抱负，同党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给他施展才华、实现抱负创造了广阔天地和良好的条件，而他也能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和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为革命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他爱护自己的党，并为维护党的团结、正确和纯洁竭尽全力，使党能永葆青春活力，领导中国人民把革命坚持进行下去直到最后胜利。

做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得到彻底的解放。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革命的道路必然是漫长和曲折的。因为，敌人还相对强大，革命的力量在一定时期内还相对弱小，我们的党也还不成熟，难免走错路。因此，他下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不气馁、不随波逐流、不半途而废，沿着正确的道路，朝着既定的目标，坚持不懈地斗争下去。这一点，正是朱德的超人之处。他在中国共产党内，能够从实践中辨别正确和错误路线，为确立和维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而奋不顾身同“左”、右倾错误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维护了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在革命处于高潮和顺利时，他从不盲目乐观，冷静地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以长远战略眼光规划新的战斗，不骄不躁，谦虚谨慎，使革命免受不必要的损失；在革命遭到暂时失败处于低潮时，他却能以极其乐观的态度，充满信心地教育干部战士看到光明的未来和革命最后必然胜利的前途，从此振奋精神，继续战斗，这一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在南昌起义部队被迫撤出南昌，转战湘、赣、粤地区而遭到惨重失败，3万人的队伍只剩下不到900人，外有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内有不少人悲观、动摇的极其困难的处境下，他却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充满信心地对经过整编后的全体干部战士做动员：“我原来想，有两百个人，能同生共死，就能胜利的。现在有好几百人，我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也不能消灭我们”。他还曾对排以上干部分析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把这次暂时的失败比作1905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只是“暂时的黑暗”，让大家相信“中国也会有一个‘一九一七年’的”。起义战士在他热情的鼓舞下，增强了信心，振奋了精神，很快就稳定了下来并开始了新的战斗。井冈山会师以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途中，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党和红军多次处于危险和极其困难的境地，朱德都能充满信心、镇定自若地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按照正确的方针路线，指挥红军转危为安，走出困境，走向胜利。全国解放后，在国防建设、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他都能从实际出发，坚持正确的路线，同错误倾向做斗争。就在“文革”浩劫、林彪集团和“四人帮”肆虐、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而他的处境也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坚信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他为之奋斗并做出贡献的毛泽东思想最终必定会胜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一定要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到底。他尽自己的所能，利用各种机会，同林彪集团和“四人帮”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就在他逝世前一年多的1975年3月，他挥笔给有关同志写了“革命到底”四个发出金石之声的大字，既表达了他对革命同志的期望和要求，同时也表达了他本人终生的决心。

二、人民军队人民战争

建设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开展广泛的人民革命战争，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的革命军事路线的基本战略方针，是战胜强大敌人、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朱德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指挥者之一，对这一法宝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同时，他也是这一正确路线的最坚决、最有力的模范执行者。这正是他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朱德亲身体会到建设革命的武装对于革命的重要性。他看到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大多是没有经过彻底改造的旧军队，而国民党又根本不可能把这些军队改造过来，因而不仅无法依靠他们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相反，在紧要关头，多数往往被军阀控制，成了反人民反革命的工具。因此，他毅然离开了这种旧军队，探索建立新型的革命的人民军队的道路。1925年，他在德国柏林参观了德国共产党组织的一次有20万手持棍棒的工人参加的“红色前敌”军事检阅，颇有感触地联想到：这支队伍一旦拿起武器，就能变成工人阶级的军队，可以夺取政权。中国革命正需要建立这样有组织的武装队伍。此后，他从柏林到苏联，亲自考察了苏联红军的建设，研究了苏联内战时期的游击战争，并在一个军事训练班学习了几个月。1926年回国后，他即按照党的要求，以主要精力，投入革命军队的建设和武装斗争中去。当年冬天，他即按照党的指示，到南昌主办了军官教育团，为革命培养军事骨干。后来，军官教育团的绝大多数成员成了南昌起义的骨干。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镇压革命运动，由于陈独秀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抓革命的武装，不敢开展武装斗争，而使党和革命遭受严重损失。朱德在后来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指出：“如果当时好好搞军队，把军事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即使蒋介石反动，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赶跑，我们自己起来干。因为不知道要军队，不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所以蒋介石反动起来，不是我们赶跑蒋介石，而是蒋介石赶跑我们，屠杀我们。”因此，他十分赞成毛泽东所说“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一至理名言。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坚强的信念，1927年8月1日，他和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伟大的意义，因为它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它是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南昌起义的部队后来虽然保存下来的只有900多人，但它毕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武装。这支部队在朱德率领下，于1928年4月开赴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骨干和核心。这支新型的红军队伍，后来在战斗中发展壮大，成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接着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毛泽东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对于什么是人民军队，怎样建设人民军队，朱德不仅完全赞成并坚决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方针路线，而他自己也有许多创建性的见解和论述，在实际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提出“创造铁的红军是目前党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并指出阶级性（红军是劳苦群众的军队）、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的领导、重视政治训练、提高军事技术、自觉遵

守铁的纪律、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是“铁的红军必须具备”的六个基本条件。正是建立了这样一支以工农劳动者为主体的、以解救劳苦大众为目的的铁的红军队伍，因而能够战胜貌似强大的蒋介石反动军队，粉碎四次“围剿”，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同样，由红军发展的八路军、新四军，能够在八年抗战中坚持敌后抗战，收复大片国土，建立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并粉碎蒋介石的几次反共高潮。1945年4月，朱德在党的“七大”所做《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人民军队的性质、特点和特点，把人民军队的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他把人民军队和反动军队加以对比，指出：“过去和现在，都有两种军队。一种，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训练起来，保卫人民利益，替人民服务的军队。另一种，也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训练起来，但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大地主、大买办、大银行家极少数人的利益，来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奴役人民”。他接着从国家性质、军队内部制度等方面对比分析了两种不同的军队。指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就是属于前一种的军队，这种军队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共产党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军队，是足以自豪的。”他并且指出，八路军、新四军从其前身红军建军以来，“即具备了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点”，“这三大特点，事实上也即是建军三原则。而归根到底，一个总的原则，即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这样，就从根本的性质、任务、特点上把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阐述明确了。按照这样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军队，就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和支持，就是战无不胜的铁的队伍。此后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成就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军阀割据，互相矛盾，这就造成了大城市及其附近交通要道，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较强，而在各个军阀控制地区的边缘部分、交通不便的偏远农村山区，则反动统治的力量相对较弱。因此，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不能采取先在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然后全国响应的办法来取得胜利，而应当利用军阀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在反动统治力量较弱和经过农民运动锻炼的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发动农民运动，发展革命势力，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这一路线已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朱德在自己最初的武装斗争实践中，就切身体会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完全赞同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他说，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指出，要在农村建立我们的根据地。要搞根据地，就必须有军队，有政权，有党组织，有群众运动，还要有适当的地形条件”。他认为，有了稳固的根据地，军队就有了后方基地，就会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可以开展有组织的游击战争，开展广泛的人民战争，逐渐壮大自己的力量，粉碎敌人的镇压和围攻，取得不断的胜利。他在总结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到失败的教训时深刻地指出：“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互相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就在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遭到失败不久，朱德领导的那一部分起义军却发动了有名的湘南起义，在湘南先后解放了宜章、永兴、耒阳、资兴等县，并立即在这些县成立工农革命政权，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组织了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同时，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武装起义烽火熊熊燃烧，根据地迅速扩大，广大

群众踊跃参军，革命部队不断壮大。虽然这一欣欣向荣的革命根据地因当时湖南省委“左”倾路线的干扰而遭到失败，但这支革命部队的骨干终于在朱德的带领下保存了下来，不久就毅然奔赴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从此，新建立的工农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依托井冈山根据地，开展新的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他带领红军打到那里，就立即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红色区域，给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以沉重打击。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朱德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决定，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敌后开辟广大战场，收复大片国土，建立和不断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即创建了遍于华北、华中、华南19个省地区的解放区，共有人口9550万，形成了坚强的解放区战场，为抗日战争的大反攻取得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解放战争期间，他参与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这些根据地（解放区）为依托，取得了解放全中国的历史性胜利。

人民战争是人民军队的阶级性、人民性、正义性所决定的必然抉择。同时，人民军队也只有建立起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才能赖以发动和依靠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开展这种伟大的战争，并不断取得胜利。毛泽东、朱德在其长期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人民战争的理论 and 内容，使其成为无产阶级战无不胜的具有创造性的先进军事理论与战略方针。朱德做为中国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毕生都最忠实地执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从而保证了人民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早在湘南起义时，朱德就十分重视在新开辟地区发动农民，武装农民，支持农民暴动，使农民的武装斗争很快波及到根据地周围十几个县，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攻，根据地不断扩大，起义军部队也得到相应的人力物力补充。井冈山会师后，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发挥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的作用，在打仗的同时，以极大精力发动和武装工农群众，红军所到之处，根据地红色政权、地方武装、赤卫队等群众武装和各种群众组织迅速建立起来，有力配合红军主力打击敌人，粉碎蒋介石的多次“会剿”和大规模的“围剿”，红军不断扩大，根据地日益发展，红色政权得以巩固。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把人民战争发展到了新的更高阶段。以朱德为总司令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最大限度地把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都动员了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方面开展生产运动，积极支援前线；一方面，凡是能拿起武器的都武装起来同日寇战斗，地方武装、游击队、民兵、武工队、儿童团等，配合主力部队，以运动战、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等一切可以采用的战术和手段，同日寇做殊死的战斗，使日本侵略军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仅解放了大片国土，解救了在日寇铁蹄统治下的千千万万同胞；而且严重打击了日寇的气焰，牵制了日寇大量兵力，阻遏了其扩大侵略战的图谋。1943年，解放区战场即抵抗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即发展到近百万人，民兵达220万以上，成为抗日战争最后大反攻的中坚力量。朱德在总结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战争经验时说：“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这种群众战的特点，就是不但有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协力，而且有人民大众在军事作战上的协力。这种战争不是军队单独进行的，而是以人民大众共同作战的灵活配合来进行的。这种战争是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的配合作战，是

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和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作战”。这种“伟大的真正全面的人民战争”也正是他参与领导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指导方针。

三、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相当长时期里，是在敌强我弱的处境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使自己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原因是什么呢？由于中国革命除了前面所讲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它所进行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这两条根本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个军队的领导者能够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正确而有效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条，要战胜强大的敌人也是不可能的。正如朱德所说：“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战略战术，三者是一致的东西。”朱德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战争正确战略战术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是这一正确战略战术的最忠实的具有创造性的执行者。

朱德是著名的智勇双全的将领。他在指挥军队作战过程中，从不拘泥于军校所学到的或书本上的战略战术条令，而是能够把战争的普遍规律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每次战役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加以灵活运用，制定和采取克敌致胜的战略战术和战斗措施。这方面，朱德有很多精彩的论述。早在1933年，他就指出：“红军军人要以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我们的作战决心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来定下。”对这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用极其通俗易懂的话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他还提出了“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大兵团协同动作”和必要时的“机断专行”相结合等六项基本战术原则，他强调指出：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是迅速、秘密、坚决，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他再次强调迅速、秘密、坚决同样是抗日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他主张采用调动敌人、诱敌深入、不打无准备之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整套运动战的打法。这些原则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时间、不同条件和敌我双方的不同情况，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战役战斗。这些战略战术原则的根本目的在于保存和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削弱和消灭敌人的力量。它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朱德在其一生的军事斗争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原则，参与指挥人民军队打了无数漂亮的胜仗。

朱毛红军建军伊始，就特别重视正确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社会情况，从封建势力和军阀割据、内部矛盾重重，以及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红军应采取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正确方针开展军事斗争。亦即采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游击战的战法，同强大的敌军周旋，从而打破敌人的围攻，壮大自己的力量。

关于游击战，朱德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在滇军指挥对军阀作战和在云南边境“剿匪”战斗中，就运用了“流动游击战”的战术打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漂亮胜仗。1925年，他在苏联军事训练班学习期间，回答教官关于他回国后怎样打仗时，就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这时他已预见到中国革命战争采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必要性了。1927年“南昌起义”后，他带领一部分起义部队在赣、粤、湘边境开展了“山地游击战”，保存了这支队伍，后来发动了

著名的“湘南暴动”。

1928年5月，朱德根据自己的作战经验，并针对敌人的具体情况，提出“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十六字诀的作战原则，丰富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宝库。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和朱德率领工农红军用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打破了蒋介石多次“会剿”和大规模的第一、二、三次“围剿”，巩固和发展了红色根据地，壮大了红军队伍。1932年12月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排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受到一定损失。但作为总司令的朱德和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根据实际情况，没有按照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发出的错误指示办事，而是采取了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予以歼灭的方针，先后取得了根据地边沿地区伏击战和黄陂、东陂两大战役的胜利，歼敌三个主力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也不得不哀叹这次“围剿”的失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为此，蒋撤销了陈诚前敌总指挥的职务。1933年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朱德被剥夺了对红军的实际指挥权，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推行“左”倾盲动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不顾主、客观条件，搞消极防御，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用“两个拳头”同敌人硬打硬拼，结果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了长征。在长征246过程中，朱德参与指挥的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等著名战役，都是这一正确战术原则的生动体现，对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参与制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战争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他总结了红军时期的经验，对在抗日战争新的形势下，如何坚持持久战，如何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在抗日战争处于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我军在政治上、道义上处于优势：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有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有广阔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这是我们的长处所在，所以最后胜利是必然的。但是，在军事方面，我军仍然远远弱于日寇，经济上也比日本差，这是我们的不利因素。从这一形势出发，朱德认为：抗日战争必将是持久的，战线必然是很宽的。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他完全支持以运动战和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法，充分发挥机动灵活作战的优势，以保存和壮大自己的力量，消耗和消灭日寇的力量，使力量对比逐渐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1938年，他在《抗日的战略战术与新军问题》的演讲中指出：在战略中必须实行持久抗战，全面抗战，实行民族革命战争；在战术上则应实行指挥的机动性，实行秘密、迅速、坚决、积极防御等原则。1939年7月他在《八路军抗战二周年》一文中再次强调要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才能战胜日军，他说，抗日根据地机动战的原则“就是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候，转入外线”。“在全国机动的原则，应当是在敌军外线包围中寻求机动，在不利情况之下毫不恋战，由单纯防御转到攻势防御，由被动转到主动，由散漫的队伍转到正规化和机械化的队伍”。这是他根据长期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重要作战原则，也是他在军事上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他指挥八路军247在华北敌后开辟广大根据地，正是运用这些作战原则打了许多胜仗。其中最著名的有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的胜利正是运用这些原则的光辉战例。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朱德特别重视游击战在战争中的作用。1937年8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上发言中说：争取持久战是可能的，中心摆在支持华北，主要是发动群众，在军事上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同年10月他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话时说：“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消耗敌人的战斗力量和补给。在战术上，我们打的是速决战，因为我们在军事上比敌人弱，我们永远避免阵地战，而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他1938年发表的《论抗日游击战争》著作，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关问题做了系统、全面、深刻的阐述。他说：“抗日游击战争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这一历史条件之下产生出来的。它的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抗日游击战争的定义应当是：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我们指明它是抗日的，以与其他游击战争分别开来；我们指明它是大众战或民兵战，以与正规武装部队的战争分别开来。”但抗日游击战争与抗日正规军的战争“两者之间也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存在。一方面，抗日游击队当它长大起来，或者几个游击队集中在一起时，也能作较大规模的战斗”；“另一方面，正规军队，只要它与群众有着很好的联系，得到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它也可以分派出小的甚至相当巨大的部队，进行游击战争。”“抗日游击战争是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同时，他对抗日游击战的五个要素——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作了具体分析。这些重要论述就把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特点、重要性、作用、要素以及它同抗日的正规战争的关系清楚的阐明了。他还指出抗日游击队的战术应是：最热心地、积极地行动，争取主动地位，集中自己的主力，用一切办法向敌人进攻。正因为如此，在他指挥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的正规武装力量，在开赴敌后展开正规的运动战的同时，一方面在必要时，把一部分部队分散开来进行游击战争，一方面派出大批正规部队的人员，发动群众，广泛组织民兵、游击队、武工队等等民兵队伍，积极配合正规部队，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从山区扩展到平原，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偏远落后地区扩展到公路、铁路等交通要道，使日寇侵略者处于人民战争的包围之中，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而游击队在战争中不断充实壮大，有些升格为地方武装，有些就发展成了正规军，使八路军、新四军等正规军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毛泽东指出轰轰烈烈的游击战成了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最重要的战争方式，对于消耗日寇侵华军的力量，做好抗日战略大反攻的准备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开始后，面对蒋介石数百万装备精良的反动军队全面疯狂的进攻，朱德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正确战略方针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充满胜利信心地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革命武装，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激烈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战争第一阶段，敌强我弱，敌攻我守。朱德指挥解放军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互相配合，仍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为主，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为目的，采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打法，在头8个月内，即歼灭国民党部队71万余人，打破了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从1946年7月开始，到1947年6月1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在几个战场上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迫使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1947年7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即转入了全面的进攻阶段。

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敌强我弱的情况已从根本上改变过来。

军队转入反攻后，不仅要解放广大的农村，而且必须攻占敌人设防坚固的大城市和据点。这一新的形势要求战争的打法也必须有相应的发展和改变。毛泽东提出：在新的一年内，“必须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但同时必须极大地注重学习阵地攻击战术，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地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朱德亲自探索了把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游击战和必要的阵地战、攻坚战互相结合的方法。1947年6月，晋察冀野战军先后发起青（县）沧（县）战役和保（定）北战役，取得歼敌近2万人的战果，朱德帮助该部总结这两个战役的经验，打电报给中央军委，说，我军打堡垒和攻城的战术都有提高，步炮能协同作战，今后华北我军已转为主动，如准备充裕，也可攻下较坚固的城堡。1947年10月，朱德亲临华北前线，当时解放军已控制了晋冀察广大地区，蒋军只占有京、津、保三角地区及石家庄等几座孤城。他亲自召集步兵、炮兵、工兵的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做调查研究，并了解敌人部署情况，最后同当地野战军指挥员聂荣臻等共同研究，认为石家庄虽为敌人设防比较坚固的大城市，但敌人力量较弱，我军已具备了攻破这类大城市的条件。于是决定攻打石家庄，并拟定了周密的作战方案，以聂荣臻名义上报中央，经中央同意后，即部署执行。他在旅以上的干部会议上说：要把石家庄当作一所难得的学校，要从这个学校练习出一套能攻善守的本领来。此前，他们先用调兵佯攻保定的办法，形成对平津的威胁。一方面诱使敌人从北平派兵增援保定，另一方面调动驻石家庄之敌派兵北上夹击我军。我军一方面将北平派出的敌兵阻击在漕河以北，不能靠近保定；另一方面派优势兵力在保定南边之清风店地区将石家庄北上之敌包围全歼，这样就大大减弱了敌防守石家庄的兵力。接着，我军集结了超过敌人兵力3倍约6万余人将石家庄团团围住，采取步炮配合，重点突破，挖地道、交通壕，逼近敌人的工事，用炸药爆破敌人的火力点等方法，经过7天激战，全歼守敌，解放了石家庄。解放石家庄战役，开创了解放军运用运动战、阵地战和攻坚战相结合取得伟大胜利的范例，震惊中外。朱德总司令亲自指导了这一战役，事后并亲自与指战员共同总结了这一战役的经验，指出这次胜利“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同时，他还指出：“阵地攻坚战，这是我国革命征途上的一个里程碑”。

解放石家庄战役的经验，对于人民解放军在大反攻中采用运动战、攻坚战、阵地战相结合的战法，多兵种配合作战，以大兵团对付敌人的大兵团，攻破敌人设防坚固的大城市起了重大示范作用。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以磅礴的气概和摧枯拉朽之势，经过大小千百次战役，横扫全国，消灭了蒋介石800万反动军队，彻底打垮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新中国，使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四、自力更生保证供给

众所周知，任何军队，如果没有必要的武器装备，没有粮食、被服、医药等生活必需品，就无法进行训练和打仗，更谈不上打胜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长期处于强大敌人的包围之中，转战在贫困的山区和农村，既没有从政府得到军费的必要保证，而根据地人民生活也相当困苦，也不可能生产军队所必需的武器装备、医药等物资。而敌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经常对革命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置人民军队于死地。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为了人民军队的生存和发展，毛泽东、朱德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对策，解决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质需要的供给问题；其中不少是具有创造性的。

朱德作为人民军队的最高指挥者，历来把解决军队物资供应问题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上，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的兵是穿起军服的武装农民，军队即是穿军服带武装的人民集团。要吃、要穿、要喝、要休息、要工作，与普通老百姓无异。注意衣食住行的满足，这是物质营养。”他还说过：“供给上的保证，要搞好生产，过丰衣足食的生活。假如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身体顶不住，有的就会跑。”“要把兵带好，就要建立和管好自己的家务。这个家务有什么东西呢？有枪，有子弹，有手榴弹，现在又增加了一些马、猪、羊等等。”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极端困难条件下，他创造性地执行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制定的正确养兵方针和原则，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各种切实措施，解决了部队的供应问题，保证了革命军队的不断发展和战争的胜利。

身为人民军队总司令的朱德，在解决军队物资保证问题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人民的利益。处在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包围中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军队的物资供应无疑是困难的，但同时，根据地的人民同样生活十分困苦。人民的军队不能像反动军队那样，靠剥削人民、掠夺人民的财产来养活自己。尽管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热爱自己的子弟兵，竭尽全力支援军队，甚至宁肯自己吃不饱穿不暖也要挤出粮食和物资来供应军队。这种军民鱼水情无疑是革命军队战胜强大敌人的基本动力。但是朱德懂得，如果人民群众长期处于极端贫困饥饿之中，这既有悖于革命军队的宗旨，而革命军队和革命战争也无法长期支持下去。因此，在解决军队物资供应问题时，他提出的首要原则是：兼顾军民。他说，在解决军队物资营养方面，“第一，是在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的原则之下，去保养军队。因为不然，军民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因此，红军和八路军、新四新的物资供应只把人民群众的支援作为一部分来源，而且在扩军时，要照顾到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在一定条件下，还 252 要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不仅如此，军队所到之处，还利用战斗间隙，帮助老百姓进行生产，增加收入。实行了这样的军民兼顾原则，无疑对人民军队扎根于人民之中，并在人民支持下取得战争的胜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虽然采用各种方法，解决本身所需要的物资供应问题，但毕竟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措施，所得到的仍然是十分有限的。正像毛泽东非常生动地形容革命军队的供应和装备是“小米加步枪”，而反动军队（国民党和日本侵略军）则是飞机、大炮加大米、

白面。在装备上和生活待遇上，两者根本无法相比。在这种十分困难的物质条件下，革命军队要生存和发展，就必然地坚持了另一条极其重要的原则：官兵平等待遇。朱德强调指出，必须“在官兵平等待遇的原则之下，规定部队人员的待遇，军官以身作则，与士兵共甘苦。只有能代表士兵利益、能体贴士兵疾苦的军官，不脱离士兵群众的军官，才是一个好军官，这就是养兵的原则”。他在谈到抗日游击队的经济问题时，也特别强调这一原则，他说：“要节省，要过刻苦生活。……领导者更应以身作则，作模范。要反对一切贪污腐化浪费行为，实行官兵一律平等的生活，真正地与士卒同甘苦。这种刻苦生活的模范作用，在抗日游击队中特别重要，往往成为决定抗日游击队前途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一原则，既是对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的要求，也是对红军时期经验的总结。在艰苦奋斗的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朱德指挥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实现了官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同甘共苦中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所作《论解放区战场》报告中，朱德讲了这样一段话：“几年来在解放区战场，我们最困难的，是部队装备和各种军用器材问题。我们解决的方法：第一，夺取敌人武装来武装自己，几年来都依靠这个原则发展自己，维持战斗力；第二，就地取材，华北煤铁之丰富，铁道铁轨之破坏与利用，大大便利了我们自己去制造武器，能普遍使广大民兵发展地雷战术的缘故，就在这里；第三，自己从敌伪手中，夺取部分机械，拼凑起来，建设小型轻便军事工业；第四，这些军事工业，常为敌寇‘扫荡’的搜寻目标，必须分散隐蔽配置，加强必要的武装保护，达到不间断地制造以供应前线。医药方面，采取兼用中西的原则，主要依靠缴获与购买，自己也有部分制造。”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说明“取之于敌”和“就地取材”是中国革命军队依靠自己的牺牲精神和创造精神，解决自己所必需的武器装备和医药等物资是多么地正确和有效。在红军时期，红军和游击队的武器装备，主要靠打仗过程中缴获敌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在抗日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取之于敌”，但环境较红军时期有所改善，可以在根据地采取“就地取材”的办法，建立一些小型的军事工业，如步枪、炮弹、手榴弹、地雷的制造、维修和药品、被服的生产等，补充部分急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取之于敌”和“就地取材”仍然在人民解放军装备的供应上起主要作用，而其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了，无怪乎我们的战士和老百姓把蒋介石称作“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也最形象不过地说明了“取之于敌”在解决我军装备时的重要作用。而这两条原则，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和根据地人民才能做到，而且做得非常出色。朱德则是其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

1940年，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和封锁，国民党反动派同时对延安及其他解放区也实行了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革命根据地军民经济生活处于极其艰难困苦之中。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减轻人民的负担，把抗日战争坚持到胜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向根据地军民发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一个轰轰烈烈的大生产和节约运动在延安和许多根据地迅速开展了起来。朱德在繁忙的指挥对日作战过程中，仍毫不犹豫地带领部队，参加大生产运动。他自己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劳动。1940年春，在华北敌后根据地，他在八路军总部机关动员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的战士应该做到拿起枪是子弟兵，放下枪是老百姓。”他亲自带领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部队，在作

战间隙，开荒种地，生产自救。他在王家峪总部门前，亲自种植了一个小菜园，解决吃菜问题。总部机关和抗大分校，在武乡的砖壁小松山、蟠龙、王家峪一带，开荒达2万余亩，种植了大量的粮食和蔬菜。他还带领总部机关和抗大分校全体人员在王家峪一带植树2万多株。回到延安后，他又和总部工作人员在王家坪总部附近种了2亩菜地，每天他都利用休息时间，亲自到菜地去劳动，还教年轻战士学习劳动、种菜，做到了蔬菜基本自给，还支援别的单位。为进一步组织军队参加大生产运动，朱德亲自带人到南泥湾考察，同群众座谈，进行调查研究和勘察，提出在南泥湾开展大规模开荒生产的方案，经中央批准，由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部队，在朱德的指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开发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仅一年时间，就使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彻底改变了面貌，三五九旅不仅自己丰衣足食了，而且还向延安送上许多蔬菜。这一“陕北好江南”奇迹的出现，开创了革命军队大规模开荒生产的光辉范例，形成了中国人民军队参加生产劳动，开荒屯田的优良传统。全国解放后，朱德积极支持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农垦工作，在新疆、黑龙江及其他许多地方开垦荒地，形成大规模的国营军垦农场，不仅解决了这些部队本身的吃用问题，还给国家提供相当可观的粮、棉、油及其他工业原料。到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许多部队仍然坚持了参加生产劳动的优良传统，利用训练之余，在驻地开荒种地，种粮、种菜、养殖，改善自己生活，有的还供应市场，密切军民关系，减轻国家负担。这方面，朱德功不可没。正像他在《论解放区战场》中总结军队参加生产时所说：“我们在养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实行军队自己生产，解决军队自身的物质需要，来减轻人民的负担。这个新创造，对于我军有非常巨大的意义，根据边区军队生产的经验，在没有战争的环境下，第一年可以达到部分自给，第二年可以达到半自给，第三年可以达到全自给。在有战争的地区，部队自己生产，也可以做到部分自给或半自给。首长亲自动手，是发动军队生产的一个重要方法。军队生产之后，民众负担大为减轻，军民之间更加团结，军队生活更加改善，部队更加巩固，训练更加有效，战斗更加积极，并为养兵的经费开辟了无穷的源泉。”实践已经证明了他的这一论述的无比正确。

上述朱德所倡导、支持和执行的解决革命军队物质供给的原则和措施，即养兵的方法，“是中国军队史上空前的大改革。这种改革，正是人民军队内部生活、同时又是其外部生活（与人民关系）的特点。八路军、新四军全无外援而能养兵，且养得很好，其理由就在这里”。

五、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灵魂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来重视人民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建立了强有力的军队政治工作体制，创造了极其丰富多彩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方法和经验，有力地保证了军队的建设和革命的胜利。

中国革命军队创立伊始，朱德就十分重视军队政治工作的建设。他深知，任何军队都离不开政治工作。但他从自己亲身经历中深刻体会到反动军队和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其性质和作用是不同的。早在1931年，他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就深刻分析了两种不同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区别，指出“红军政治训练与资产阶级的军队的政治训练的根本不同之点，就是红军完全反对资产阶级把政治训练变成蒙蔽阶级意识的欺骗工具，变成超阶级的、完全不兑现的花言巧语。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做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他说，红军“在政治上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念，就是把握着不可抵抗的无形的武器，在精神上建立了铁的红军的基础，自然可以战胜革命过程中的任何困难，经得住任何剧烈的斗争，愈斗愈奋去取得最后的胜利”。此后在长期指挥革命军队的过程中，他都毫不动摇地反复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中，他把政治训练列为铁的红军必备的基本条件之一。抗日战争中，他强调“练兵首先是练智力。政治觉悟不高，不懂得为什么打仗，就没有积极性，兵也就练不好”。并把“政治战争”列为抗日游击战争五大要素之首，深刻地指出，抗日游击队如果舍弃或者忽略政治工作，“要想用粗劣的武器来战胜强敌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连自己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都没有可能”。“因此，把抗日游击战争要素的政治战争这一武器，提到最主要的地位”，是非常必要的。他在1934年2月举行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同王稼祥、周恩来一起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一极其重要的观点。1945年他在《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总结军队政治工作经验时指出：“八路军、新四军既把为人民服务、保卫祖国作为宗旨，则政治工作便成为这种军队的灵魂。”

为了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朱德在人民军队发展的过程中，能根据实际需要采取有力措施。红军建军之初，他积极赞成在军队中设立政治委员，建立政治工作机构，要求各级党组织选派阶级觉悟高、能执行党的方针路线的优秀共产党员到军队中担任政治委员、组建政治工作机构；要求军队中的党、团组织能积极开展政治工作，党、团员要在政治上起先锋模范作用。抗日战争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始由于国民党的非难而取消了政治委员等制度。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为此打电报给洛甫并告周恩来、邓小平，建议恢复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制度。洛甫、毛泽东复电，表示“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很快地就在八路军中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加强了部队各级的政治思想工作。他还经常告诫军队各级指挥员：“不仅政治机关、政治干部要做政治工作，军事机关、军事干部也要做政治工作。”因为“我们部队能打仗，就是靠党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军事指挥员要认识，只有政治领导加强了，有坚强的政治工作，部队才能巩固，士气才能提高，才能打胜仗”。他反复强调：“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即在部队中开展军事民主和政治

民主，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官教官”的群众性的军事和政治练兵运动。他号召革命军人；游击队员不懈怠地来进行政治工作，使每个人“都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都成为抱着牺牲自己为国家民族奋斗到底的民族英雄，更希望成为具有天才优秀的政治家”。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任务和内容是极其广泛和丰富的，也是极具远见卓识的。朱德在其指挥军队的工作中，既有创造性，又能认真总结群众中创造的经验加以推广，使部队的政治工作既丰富多彩，又颇具实效。从朱德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任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提高官兵的政治自觉性，发扬他们爱国爱人民和改造自己的热情。”就是要做好人民军队本身的政治思想工作。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和革命的游击队员，绝大部分都出身于贫苦农民，也有少数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反抗压迫剥削和追求政治、经济解放的愿望，响往革命。但在入伍之前大都没有经过基本的政治文化教育，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而其中相当多的是“解放兵”，即在战争中起义、投诚过来或被俘虏过来的原国民党兵、伪军，还有一些是被258“逼上梁山”、落草为寇的贫苦农民。他们初到革命军中，难免带有旧军队的落后习气或散漫作风，甚至带有“兵痞”、“流氓”作风。为了使这些人员很快成为有觉悟的自觉的革命战士，革命军队采用战斗间隙及时开展整顿、休整、整军等方式，进行军事和政治的整顿、教育和训练。中国革命军队中经常开展的诉苦、三查、评比、总结等群众性的整军运动，是群众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创举。通过这些作法，使广大战士很快提高阶级觉悟，懂得了为什么要革命，提高了战斗技术，增强了自觉的革命性。往往在战斗紧张的间隙，有些“解放兵”经过一次“诉苦会”很快就转变了思想，提高了阶级觉悟，成为勇敢坚强的革命战士，掉转枪口向原来自己所在的反动军队开火。有些部队在战斗过程中，把老红军战士、土改后新参军的战士和刚投降过来的解放兵组合在一个班内，开个诉苦会，各人从自己角度诉苦，互相了解，互相帮助，这样，解放区农民是怎样翻身得解放的，蒋管区人民是怎样受苦难的，蒋军是怎样的腐败反动，老红军、老八路有那些优良传统作风等等互相都了解了，大家团结得更好了，阶级觉悟都提高了，部队战斗力自然就大大增强了。对于指挥员和干部则一方面组织他们在职学习、定期轮流集训，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军事技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实行政治和军事民主，接受士兵的监督和批评。这样，军队指挥员和干部的理论水平、政治觉悟，政策水平和带兵的能力也能不断提高。

人民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不仅限于思想教育，朱德提出在智力训练方面，还包括文化学习、生产教育、文体活动等内容。在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极其艰苦条件下，朱德都想尽办法指导战士学文化，学生产劳动，组织部队开展文体活动，以提高部队素质，活跃部队生活，激发干部战士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增强战士的体质。战争年代，他经常以普通一兵身份在运动场上259和指战员一块打球，已传为佳话。另外，部队还十分重视组织战士学技术，提高其战斗技术水平。在军队中开展文化、体育、劳动、技术教育活动，既是当时提高部队战斗力所必需，同时也是颇具远见卓识之举。正像他所说的，这样做，就能“使我们的军人不会变成‘兵痞子’、‘二流

子’，即是将来战争结束，仍是社会上有用的人才”。这种对革命负责、对战士负责、对国家民族负责的精神，是任何剥削阶级军队的将领所无法比拟的。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军队内部，通过这样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不仅使军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而且成为战无不胜的、打不散；摧不垮的铁的队伍。这支有高度觉悟的军队，不仅在集中、强大时能打胜仗，而且在分散、弱小和困难的情况下，也同样能生存和发展，同样能打胜仗。不仅在有指挥员指挥、监督的情况下，坚持勇敢的作战，而且在没有指挥员监督、指挥的情况下，自觉地从具体情况出发，坚持战斗。

“团结军队与人民，提高人民保卫祖国和民主主义的觉悟，帮助人民的文化教育工作。”就是要处理好军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他把“以群众为堡垒，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作为抗日游击队政治战的第二个要点。他经常提醒部队：人民军队与群众的关系，好像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离开水就不能活。因此，军队必须把团结人民群众做为自已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这方面，他强调要发挥革命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军队每到一地，特别是新开辟的地区，首先广泛向群众宣传党和人民军队的方针政策，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其次，立即派出人员帮助建立人民政权，地方武装，成立群众组织，维持治安秩序，发动农民运动，进行减租反霸斗争，没收分配敌伪及豪绅财产，帮助开展生产运动，使人民得到民主权利，改善人民生活。再次是帮助地方政府在群众中开展文化教育活动，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从红军到解放军时期，朱德参与制定的革命军队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为广大指战员所熟知和认真执行了，而且也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了解和拥护，因而革命军队所到之处，人民群众夹道欢迎，送水送饭，支援前线，热情慰劳，踊跃参军，真正体现了鱼水情深，这就使人民军队能够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具有了战胜一切困难和一切敌人的坚强后盾。时至今日，这一优良传统仍然闪耀着熠熠光辉。军队和地方之间开展的“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的“双拥”运动日益深入人心，把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和千百万人民解放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筑成了坚固的长城。

“从政治上心理上瓦解敌伪，使之丧失战斗力。”朱德教导部队，要对敌、伪军队作具体的阶级分析，他们绝大部分都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受地主、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压迫，或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欺压，其中许人员被强迫拉壮丁或为生活所迫才到了反动军队中，他们有反抗压迫、争取民主、独立和过好日子的愿望。但许多人受反动派或日本侵略者的欺骗蒙蔽，不了解共产党和革命军队，盲目为反动派打仗，只要我们认真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他们是会自动脱离反动军队或起来反抗反动派的。因此，瓦解敌伪军就必须做为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以达到削弱敌军的力量，战胜敌人之目的。他指出：敌伪军的人员情况复杂，我们对敌伪的政策也不能简单化，对于死心塌地为敌作伥，屡次劝告无效的，应该干脆地加以消灭；对于具有反抗思想、民族意识，被国民党反动派蒙蔽的一部分敌伪军官兵，要宣传争取，把他们挽救过来，回到人民怀抱。其方法：“如散发传单到敌军之中，喊话（用他们懂得的言论），联络伪军里亲戚朋友等等，揭破敌人的政治宣传。”由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正义性，从红军创始起到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这种瓦解敌军的工作都是颇有成效的。不仅在战

场上，有分散的或成批的敌军 261 放下武器，拒绝与我军作战，或投奔我军，而且有成建制的团、旅、师、军在我军宣传启发教育下，拒绝执行反动派的命令，同我军休战、合作、乃至缴械向我军起义、投诚，大大加快了革命战争胜利的进程。

此外，还有团结本军和友军、声援和联络敌国及其殖民地的工农运动、反战运动等工作，朱德都有精辟的论述，并采取许多实际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上述几方面的政治工作是互相关联、互相一致、相辅相成的，是中国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特点和优点，也是世界上任何剥削阶级的军队无法做到的。正像朱德所总结的那样：“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能达到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我们所进行的战争之所以是人民的战争，所以能进行人民的战略战术，所以能打胜仗，都是和这种政治工作不能分开的。”

六、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

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中国革命的漫长道路上，在同革命的敌人作坚持不懈的斗争的同时，还必须不断同同盟者中的顽固势力及反动倾向作必要的斗争，以确保统一战线的巩固和一致，以共同对付主要敌人；不仅如此，还必须经常同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出现的错误路线、错误倾向斗争，以保持党和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团结统一，使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健康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了一系列指导这些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原则，任何一个革命的领导者，要执行好这些方针政策和原则，都必须具有高尚的品德、坚强的意志和灵活机动的斗争艺术。朱德正是这种具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和掌握高超斗争艺术的典范，在统一战线内部斗争和党 262 内路线斗争中，演出一幕幕精彩的戏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绩。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形成了北伐战争的高潮。在这一统一战线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主张既要扩大统一战线，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共产党要坚持原则，独立自主地发展革命力量，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则主张放弃独立自主原则，共产党不要搞武装，不要吓跑了资产阶级，要一切经过国民党，自己解除了武装，因而导致了在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后，残酷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由于没有准备，措手不及，使革命遭到极大的损失。朱德则坚持了正确的路线，积极在国民革命军中开展工作，并参加筹备南昌起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

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领的一支南昌起义部队，转战于湘、赣、粤边界山区，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和追击，部队损失惨重。为了保存这支革命部队，为日后革命发展打下基础，朱德决定率领部队，同曾经和我党有过统一战线关系的国民党驻湘南的范石生第十六军合作，朱德和范石生在云南讲武堂同过学，共同参加过辛亥革命，范当时同蒋介石有矛盾，也有同朱德部队联合一起进入广东之意。于是经过谈判达成了合作协议。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追剿，朱德部队用了范石生一个团的番号，朱德也化名王楷以便隐蔽，部队由范补充供应物资装备。但谈判时讲明：这支部队是共产党的队伍，一切行动按党的指示办，部队内部的组织训练工作、物资分配等均由自己自主决定和支配，范不得干涉。这样，这支革命部队以“国民革命军”范石生第十六军的名义，得到了休整机会和物资补充，继续开展群众工作，发动农民运动。部队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得到巩固和发展。不久，按 263 照党的指示，部队即脱离了范石生部，范石生不仅没有阻拦，还给朱德写了一封信，表示他的诚意。朱德率这支部队脱离范石生后不久，转入湘南，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这是一个在极其困难条件下执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光辉范例，从中可以看出朱德在这一斗争中既坚持原则，又机动灵活的策略和艺术。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反共灭共之心不死，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日寇诱降面前，向敌人妥协，却限制共产党的抗日斗争，派大军包围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屡次掀起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救国大业，真诚愿意同中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联合起来共

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朱德率领改编后的八路军奔赴华北敌后，坚持抗日斗争，一方面同日寇和投敌的大批伪军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一方面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了大量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朱德利用他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及东路军总指挥的身份，对他所指挥的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因而，在 1938 年日寇在山西发起大举进攻的时候，阎锡山直接指挥的西路军望风溃散或降敌，迅速瓦解，但朱德指挥的国民党东路军，绝大部分没有像西路军那样垮台，一部分还能同八路军并肩作战。此外，朱德还亲自对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等人及其部分部属做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动员他们抗战到底，他派八路军配合卫立煌部在晋北忻口地区同日寇作战，解除了日寇对卫立煌的包围，卫立煌表示感激。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前，朱德由周恩来陪同，亲自到武汉同蒋介石谈判，严正要求蒋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行民主改革。

朱德对于胆敢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经劝告不悔改，坚持向我军进犯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按照党和毛泽东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和“有理、有利、有节”的 264 策略，坚决予以回击和惩罚。1939 年 12 月，反击并消灭了袭击我冀中根据地、残杀抗日军民的国民党顽固派张荫梧部 3000 人；1940 年 1 月重创了阎锡山部第八旅、新编第二师和暂编第二师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坚持了敌后抗日斗争。

最典型的是对国民党朱怀冰部的打击，1939 年末到 1940 年春，盘据在冀南、豫北一带的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在蒋介石指使下，不仅不对日寇作战，还妄图进犯我太行根据地，吃掉驻在那里的八路军总部。朱德和八路军为了顾全大局，团结抗日，一再忍让，并说服朱怀冰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同八路军团结共同抗日。刘伯承师长亲自耐心地对朱怀冰说：“我们已经退避三舍了，实在无地可退，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地！”并警告他：“八路军一个师抵抗了十万日军，十余万伪军，并非怕你，不过为了团结，不忍自相残杀。要是逼人太甚，我们是有人民作后盾的。”这个死不悔改的顽固派，自恃有蒋介石作后盾，有几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坚持要实现其吞并我太行区的野心，于 1940 年春来到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亲自接见了，这个狂妄之徒竟口出狂言要八路军给他让地盘，交出根据地。朱德既针锋相对，又耐心地劝告他：“我们要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只有这样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搞磨擦、反共反人民，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并严肃地告诉他：“八路军的根据地是我们从日寇手里夺回来的，是我们为抗日救国创设的必要条件。你们要占领，人民不会同意。你们要地盘，有的是地方，你们去把日寇占领的广大沦陷区夺回来，不就行了吗！如果你们进攻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是要自卫的。”朱怀冰理屈辞穷，仍执迷不悟。回去后于同年 3 月率领 3 个师，在日寇配合下，向我太行根据地大举进犯。在朱德总司令领导下，由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亲自指挥我八路军以 13 个团的优势兵力，与进犯的朱怀冰部展开激战，仅 3 天时间就彻底干净地消灭了他的 3 个师，战 265 斗中朱怀冰负伤，本来可以活捉他，但朱德从大局考虑，为维护统一战线关系，有意让开一条生路，让朱怀冰逃命到洛阳去了。这一战役的胜利，打击了顽固派的气焰，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争取了中间分子和同情力量，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为避免继续磨擦、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

朱德自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以来，在长期的实践中，善于独立思考，具有辨别是非和正确与错误的敏锐洞察力，并能从革命的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择其善者而从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长期存在着不同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建党初期的多少年中，由于党的不成熟，多次被“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据统治地位，制定和执行了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错误路线，使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走了不少曲折的弯路。在长期共同战斗实践中，朱德亲身体会到毛泽东所提出和执行的路线最符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是指导中国革命最正确的路线。当然，这一正确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他自己、周恩来以及其他许多中共领导人的参与和贡献。因此，他在井冈山时期，同毛泽东密切合作，共同开创并发展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军，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在长征过程中，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更加认识和体会到毛泽东正确路线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树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并协助毛泽东制定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他和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红军的高级指挥员都坚信只有这条路线能够引导红军摆脱困境并走向抗日前线，发展革命力量，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但是，党的领导人中间，也有少数人，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和作法，同以毛泽东为代表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张国焘所执行的分裂主义路线就是其代表。在同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朱德首当其冲，力挽狂澜，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决定，把红军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为左、右路两军，分头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右路军在毛、周率领下，早已按原计划的路线北上了，而作为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却早就怀着不可告人的动机，反对北上。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就按兵不动，他依仗总政委的权力和红四军兵众枪多，拒不执行中央决定，并要朱德同他联名发电中央，反对北上抗日的方针，要左路军掉头南下，朱德拒绝签字。张国焘怀恨在心，把朱德看作他执行错误路线、分裂党、实现个人野心的主要障碍，千方百计必欲除之而后快。朱德为了坚持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坚决同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阿坝出发，途经黄河上游的噶曲河时，张国焘故意夸张河水涨大，不能通过。朱德派参谋人员实地察看并试探，证实河水不大，可以通过，再三要张国焘下令部队渡河，张置之不理，反而背着朱德下令部队全部退回阿坝。随后，张国焘秘密策划以川、康省委扩大会议的形式，在会上对朱德进行突然袭击，指示和蒙蔽一些人围攻朱德，逼迫朱德表态、写文章、发表声明公开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在这个会上，朱德坦然自若，坚定沉着，不论那些人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看书，像“不沉的航空母舰”（一位战友形容他当时的表现），巍然不动。等到这些人斗完、骂完后，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严辞予以批驳。他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红军的行动应该按党中央的决定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他还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那有朱反对毛的？”最后他表示：“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

我同毛泽东同志 267 的关系。”张国焘理屈词穷、恼羞成怒，竟威胁朱德：“你既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识破了张国焘想要逼他离开部队以便于为所欲为的阴谋，坚定地说：“我是党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他决心留在这里，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坚持北上抗日的路线，对部队进行坚韧不拔的说服教育和动员工作，同张国焘的阴谋斗争到底！1935 年 10 月，张国焘反党野心暴露，公然另立党中央，自封为“中央主席”，公开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给了朱德一个“中央委员”的头衔，朱德坚决予以拒绝：“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这‘中央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张国焘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采用特务手段，监视朱德的行为，对朱德和红一方面军进行造谣、诬蔑，挑起一、四方面军的矛盾和冲突，限制对朱德、康克清的生活供应，抢夺朱德乘坐的马匹等等卑鄙手段，妄图逼迫朱德就范，或逼走朱德。但朱德毫不计较个人得失荣辱，以团结北上抗日的大局为重，意志坚定，不为所动，坚持不懈地对四方面军广大的指战员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和动员工作，说明坚持团结，维护中央统一领导，坚持北上抗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四方面军大多数人逐渐认清了张国焘错误的危害性，支持张国焘的人越来越少了。1936 年 1 月，中央打电报给张国焘，转达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催促张尽快率军北上，张国焘开始感到孤立，被迫于 6 月取消非法的“中央”。后来朱德为了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同刘伯承商量，以张国焘名义，电邀在黔西南活动的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后改称红二方面军）前来与左路军会合。红二方面军及任、贺、关等人的到来，同朱德、刘伯承等团结一致，反对张国焘的错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对张国焘的做法表示不满，不愿支持他，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知道他南下西进的如意算盘已难以实现，只好被迫同意北上。在继续北上 268 的路上，张国焘仍不死心，屡次拒不执行中央指示，要自行其是，经朱德等人坚决斗争和中央严令催促，左路红军终于 1936 年 6 月在甘肃会宁同右路军会师，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彻底破产。在同张国焘分裂路线进行的斗争中，朱德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一斗争的胜利，既表现了他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也表现了他顾全大局的高尚情操；既说明他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又说明他掌握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因此，毛泽东赞誉他“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斗得有理有利有节，临大节而不辱”。新中国建立后，朱德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继续为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1949 年 11 月他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后，以极大的努力，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机构，制定关于加强党风党纪建设的制度和条例。1950 年和 1953 年他在中纪委举行的会议上作了《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的报告，严肃指出，在全国解放后和平建设条件下，党内一部分干部和党员产生和滋长着的“不执行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居功骄傲，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图享受甚至贪污腐化等倾向，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力，使党脱离群众，因此，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必须认真查处纠正这些不良倾向。由于全党的重视，他和中纪委的认真工作，使党在五十年代基本保持了良好的党纪党风。在“大跃进”年代，他多次指出要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1959 年至 1961 年期间，他多次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农民普遍对公共食堂有意见，认为既不方便农民生活，又造成很大的浪费。他亲自多

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建议尊重农民意愿，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中央经过研究，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解散了公共食堂。1962年，他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仗义执言，公开提出要纠正“左”的倾向，恢复和发展生产，批评了群众运动中“左”的作法给经济建设造成的损失。同时，针对269“反右倾”斗争中的扩大化，指出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坚持党内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吸取历史教训，反对扩大化，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单纯惩办主义等等，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文革”浩劫中，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夺权，严重破坏党，破坏军队，破坏国家经济建设，打击和迫害大批革命领导干部，他们对德高望重的朱德也疯狂加以诬蔑和陷害，一度剥夺了朱德在党、国家和军队中的一切权力。对此，朱德完全洞悉了林彪、江青一伙的狼子野心，坚决同林、江反党阴谋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所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命运问题，而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运用自己在党和军队中的威望和影响，耐心说服、教育干部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不动摇，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军队里虽然出现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部队来说，林彪、江青是不可能把他们拉走的；干部中，虽然也有少数人被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是不会跟他们跑的；至于广大人民，则更是反对这一伙人的倒行逆施，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由于党的健康力量的正确领导，由于他和广大忠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革命领导干部的坚决斗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林彪反党集团覆灭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接着也垮台了，党胜利了，人民胜利了。遗憾的是这一结果他老人家没有能够亲眼看见，但他生前坚持的斗争对于这一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见的正确性。

七、高尚的道德情操优良的品格作风

朱德所以能够在全国人民中享有极其崇高的威望，除了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外，与他本人具有 270 的高尚道德情操和优良品格作风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在朱德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形成的一切优良传统美德和作风。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无私无畏，克己奉公；他律己严，待人宽；他勤劳节俭，朴实无华；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平等待人，热情诚恳；他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他功高不自居，德高不自显……。正像周恩来在对他 60 寿辰的贺词中所说：“在我们相识的廿五年中，你是那样平易近人，但又永远坚定不移，这正是你的伟大。对人民，你是那样亲切关怀，对敌人，你又是那样憎恶仇恨，这更是你的伟大。”毛泽东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并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朱德正是这种一辈子坚持做好事的有益于人民的人的杰出代表。这正是他的伟大和魅力之所在。

热爱人民，关心部下是他高尚品德的重要表现之一。朱德在其一生中，干了许多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人民的公仆。他对人民有着执著的爱，每到一处，首先想到的是人民的利益，要为当地老百姓做好事。这在前边我们已经大量介绍，这里我们只从几个具体例子，从细微处看他对人民群众的真情。1936 年春天在长征路上，他率领红军到达藏族同胞聚居的西康炉霍小镇，由于藏族同胞深受反动军队的摧残之苦，对红军不了解，红军到达前全部躲到山上避难去了。这里经济落后，土地贫瘠，藏民生活十分困苦，全靠放牧的一些牛羊和每年一料的青稞麦维持生活。部队经过磨难，耗损严重，打算在这里做短期休整，本身粮草供应已十分困难，朱德看到藏民生活困苦情况和躲避红军的情况，心里非常难受，他首先向部队规定了几条严格的群众纪律：1. 尊重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2. 爱护藏胞一草一木；3. 在藏胞没有回家之前，未经允许不准进他们 271 的家屋；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同时部队全部在野外扎营安寨。随后即派人上山去宣传动员藏胞回家，由于受反动上司的反动宣传和胁迫，藏胞仍不敢回家。当时正值春耕时节，荒芜的土地急待开垦耕种。他想，如果藏胞长期不回来，耽误了春耕时机，他们赖以生活的青稞麦种不上，全年就要挨饿。于是他开会同大家商量，为了藏胞长期生活计，部队整训宁可放慢些，要抽出力量帮助藏胞播种青稞。然后动员、组织部队全力以赴，从部队原来筹集的粮食中调剂出一部分做为种子，以自己带的小铲子、木棍等做农具，总司令亲自带领并指导大家，展开了春耕生产运动。经过几天紧张的劳动，大部分土地都种上了青稞。一些胆子较大的藏胞下山看到这种情形，回到山上一宣传，藏胞们都解除了顾虑，纷纷下山回家了。当他们看到已种好的平展展的土地，自己家里丝毫未动的房屋、家产和牛羊，而红军却住在寒风料峭的野外，许多人都感动得哭了，不少人主动牵着奶羊，提着茶壶前来慰问红军。炉霍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笑和热烈气氛。当部队休整完，离开时，藏族同胞恋恋不舍地夹道欢送。红军战士看到自己亲手播种的青稞麦芽已出土吐绿的喜人景象，心里都无限欣慰地想到：朱总司令带领大家播在藏胞心中的种子，也已经发芽、生根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八路军总部，

每到一个驻地，他总是把好房子留给房东住，自己和机关人员住小的、差的房子，尽量少给老百姓添麻烦。他除了组织部队做发动群众工作外，还亲自帮助当地群众寻找水源，打井修池，解决群众吃水问题；帮助建立小学，亲自给小学生讲课。华北敌后根据地在日寇扫荡下最困难的时候，老百姓粮食不够吃，常以野菜树叶充饥。春天榆树结的榆钱成了充饥的好饭菜。有一个战士摘了一把榆钱，准备给总司令“改善”一下生活，他发现后，立即批评这个战士说：“榆钱现在是老乡们的粮食，你把它拿了老乡们吃什么？”并命令立即把榆钱送了回去。全国解放后，朱德在北京担任中央领导工作，但总怀念和关心着根据地的人民，他常说：我们八路军是太行山的小米养大的，我们应该为老区人民服务。凡是根据地有人来北京看望他，他总要详细询问根据地人民现在生产、生活的情况，叮咛他们要好好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1966年，他女儿朱敏去山西，他要她亲自到武乡他原来住过的几处房东家去看望老房东，看看总部留下的老八路。他把老区当做自己的故乡，把老区人民当做自己的亲人。

朱德爱兵如子，凡是跟随他工作过的部下，在所写的关于同朱德在一起的回忆录中，都深情地以大量事实描述朱德对他们和普通战士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他们都说：很少见朱总司令对他们发脾气、训斥，有了缺点和错误，总是耐心讲道理，说服教育。在生活上更是十分关心照顾，像慈父一样体贴入微。1928年6月在中央苏区一次战斗中，一个战士腿上负了伤，在行军中，被军长朱德发现了，亲自把这个战士扶在路旁，立即到山坡上拔了几株草药，放在嘴里嚼烂敷在战士伤口上。这个战士感动得哭了，紧握住朱德的手说：“你又当军长，又当‘医官’，当军长带领我们打胜仗，当医官为我们普通战士的一点伤操心，真是我们心贴心的亲人啊。”1935年5月，红军长征抢渡大渡河的战斗打响后，战士们给已被敌人拆掉桥板的铁索上重新铺上了木板。渡桥时，由于铁索晃动，桥板新铺上又不严密，往往一动就漏出空隙，过桥时一不小心就可能从缝隙中掉进湍急的河水中去。当时因为抢渡紧急，战士们谁也顾不上去调整这些桥板。朱德在过桥时却这里看看，那里踏一踏，发现有缝隙或不牢靠的桥板，就亲自弯下腰去调整好木板，保证战士渡桥安全。长征过雪山草地时，战士们仍穿着单衣，不能御寒，朱德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一天，部队缴获了敌人一批羊毛，他立即组织大家，搓毛线，织毛衣，他亲自教战士学着搓线织衣，会的教不会的，不多长时间，跟他一块的大多数战士身上都穿上了新织的毛衣，尽管十分粗糙，但战士273们身上和心内却都感到暖烘烘的。在几十年转战南北的征途中，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环境下，朱德经常把自己的粮食分给战士吃，把自己的衣服给战士穿，有点营养的食品（缴获敌人的肉、蛋、罐头、饼干或炊事员给准备的一点有营养的饭菜等）自己不吃，分发给体弱的战士或伤病员吃。在草地行军中遇到河流湖泊，他亲自带领战士打捞鱼虾，为战士改善伙食；他经常把自己骑的马让给体弱有病的战士骑，自己步行，甚至代战士扛枪，背背包；他有时还替战士站岗，让战士多休息一会。作为军队的总司令，如此爱护士兵的高尚行为，在其他军队中恐怕是难以见到的，即使在革命的军队中，也是最突出的了。正因为如此，战士们都从心底里尊敬他、爱戴他，自觉地听从他的指挥。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战士、干部，都感到无限的温暖，因工作需要调离时都恋恋不舍，不愿离开他。

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是他高尚品德的又一重要表现。朱德在讲到带兵之

道时，讲了十二条，第一条就是：干部以身作则。他说：“古人说：‘能身先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者为名将。’历史上带兵能够做到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的很少。红军里的干部个个都是名将，他们都能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朱德自己就是这种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的名将的表率。

早在滇军中同军阀作战的时候，朱德就能身先士卒，在危急时带领部队冲锋陷阵、以弱胜强，常打胜仗而闻名于世。在红军时期，已是军长、军团长和总司令的朱德，仍然不减当年之勇，在指挥战斗过程中，从来都是哪里战斗激烈，就能在那里看到他。在保卫井冈山的新老七溪岭战斗中，身为军长的朱德，除指挥全局战斗外，还亲自镇守一个重要阵地，当敌人向潮水般涌来，冲向我阵地时，朱德亲自手端冲锋枪，向敌人冲去，战士们跟着他个个如猛虎下山、压了过去，别的阵地上听到朱军长的“花机关枪”响了起来时，都振奋精神，奋勇冲杀。这一战，迅速消灭了274进犯之敌，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朱德在激烈战斗中，常常使用冲锋枪或驳壳枪，因此，战士们都称之为“朱军长的花机关枪”。在战斗中，只要朱军长的“花机关枪”一响，准能激励战士们勇敢杀敌，准能打大胜仗。在长征时的四渡赤水战斗中，哪里战斗激烈，作为总司令的朱德就出现在哪里进行指挥。敌人的子弹从他头上呼呼擦过，炮弹在他身边爆炸，浓烟滚滚，但他仍然镇定自若，从容指挥。他常说：指挥员在阵地上要非常镇定，那怕前线动摇了你也要镇定；如果指挥员动摇了，整个队伍就会动摇。在华北抗日前线，每战他都把指挥部设在离前线最近的地方。下面同志说这样太危险，劝他把指挥部设在后边比较安全的地方，他笑着说：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观察了解整个作战的实际情况，便于指挥决策。再说，敌人也想不到我们会把指挥部设在离前线这么近的危险地方，这样反倒安全些。他这种大无畏的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着千千万万的指战员战胜敌人的勇气和斗志，是人民军队打胜仗的重要力量源泉。

在日常生活中，他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带头遵守纪律和规章制度，和战士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化。在战争困难的年代，他和战士们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水平的伙食。在井冈山时期，红军的粮食常常由战士到山下仓库里去挑，每人挑100多斤，来回近200里，作为军长的朱德自己准备了一副扁担，每次都和战士们一道，挑同样份量的粮食，走同样多的山路。虽然那时他已经40多岁的人，身负指挥红军的重任，但他谢绝战士们好心的照顾要求，坚持和战士们一同挑粮。从此，“朱德的扁担”被传为佳话，成为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的象征。在抗日大生产运动中，朱德在繁忙的军务中，仍然挤时间同战士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领受同样的任务，开荒、种地、种菜、纺棉花。他再三叮咛下面，决不可因照顾他而不给他分配生产任务。他常说，自己是普通一兵，“在党内不能有特殊党员”。全国解放后，他作为党和275国家主要领导人，条件改善了，但他仍然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从来不允许家属和子孙乘坐公车办私事，孩子们上学，他就要求他们食宿在学校，不要住中央机关，不要在家吃饭，以免造成不良影响。他教育子孙和亲属：党员要由党来管，工作安排要由组织来决定，不得有半点特殊。他从来不为子孙和亲友说情，照顾安排工作，他有一个侄孙从四川老家参军到东北，复转时，到北京来找他，要求他帮助在北京或其他大城市安排工作。他告诉这个侄孙：回原参军地安置是国家的规定，谁也不能违反，你应该回家乡由当地政府安置。结果这个侄孙回到四川仪陇县由当地政府安排了工作。

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是他高尚品德的突出表现。朱德从小就养成勤劳节

俭的好习惯，他始终坚持了这一优良作风。他回忆童年艰辛生活对自己的影响时说：“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时，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过惯那种清苦生活，走遍世界就没有觉得苦。”关于他坚持参加生产劳动的事，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就是在1958年他已72岁高龄的时候，他还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参加了劳动。在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方面，他堪称全国人民的模范。在战争环境下，他同人民及战士同甘共苦；在建国后的和平环境中，他同样保持了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本色。他常教导干部和子女：工作上要向高标准要求，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55年他被授予元帅军衔，按规定，他可以领取较高的元帅军衔的工资，但他直到逝世，一直只拿比元帅工资低的行政职务工资。他的住处向来是十分简朴，解放后他较长时间住在中南海的永福堂。这是一座只有几十平方米的老式平房，东西两头两间房各20多平方米，是他和康克清同志的卧室和他的办公室、书房兼会客室；中276间一间只十几平方米，是储藏室兼饭厅，陈设很简单，他不让维修或装修。节假日儿孙们回家来，都在地上打铺睡觉。有一次一位老同志从苏联参观回来看望他，惊奇地说：“总司令，我以为你住的是好漂亮的房子，原来你住得并不怎样，苏联集体农庄主席住的房子比你的还漂亮呢！”他的被褥和衬衣都是补了又补，警卫员给他洗脸水倒得多了，他都要亲切指出“洗脸水不要多放，天旱缺雨，天津市人民吃的水都得由密云水库拨给，我们要注意节约用水”，他室内原来安装的澡盆太高，他年纪大了，上下不方便，机关几次提出要给他修理，他都拒绝了。他说：“国家用钱的地方很多，我这已经是很好的了。再修又要浪费国家的钱。”临终前，他叮嘱康克清，把他平生节衣缩食省下来的2万元钱全部交给党组织，不给子孙留下分文。他说过：我国人民向来是勤劳节俭的。“生活俭朴，与群众同甘共苦，成为每个革命者所追求的美德。”而这种美德正是在朱德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朱德不仅衣食朴素，而且作风极其平易近人。他始终把自己做为普通一兵，能平等待人，对人和霭亲切。士兵们都愿意和他亲近。战争年代，他经常深入到连队、厨房等基层单位和士兵、炊事员谈心，了解战士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在驻地经常到群众中去和农民谈心，了解情况。他到厨房，指导炊事员如何改善伙食，前来找他的战士把他当成“炊事班长”。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他同房东老人谈心、拉家常，同村民一道劳动，下棋，同士兵一起打球，几个月过去了，房东和老乡只把他当作一般干部，根本没有看出他是总司令。当听到有人向他报告时称他为总司令，才知道他是鼎鼎大名的领导八路军抗日的朱总司令。当他给抗大分校学员做报告时，路上和准备集合去听报告的学员同行，拉家常，了解情况，并和他们一样排队等候渡船过河，学员们都把他当做同路的战友，当坐在一起听他做报告时，才知道和他们同路的原来就是日思夜想盼着听其报告的朱总司令。朱德同群众谈话，从来没有277官腔和学生腔，做报告没有八股调，而是以极其通俗易懂的语言交谈，做报告也是十分通俗易懂的，所以毛泽东曾称赞他说：总司令讲话是老百姓的话，从前红军里对俘虏兵谈话的总是他。他这种极其平易近人的作风，使他能够同群众和战士水乳交融，从而了解他们的心理活动，更好动员和激励他们团结战斗，一位访问过朱德的外国记者感叹地写道：“他，举世闻名的

朱总司令，就像是一个中国的普通农民。”另一位外国记者则写道：“他一副慈祥的老祖父般的神态，脸色温和，经常带着笑容。朱德的特点是富于感情和一贯对人和气。”续范亭将军在1942年写的《赠朱总司令》一诗中，有“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之句，最生动不过地反映了朱德平易近人的品格。

他功高不自居，德高不自显，为全党树立了良好榜样。朱德如此之功高望重，但他始终谦虚谨慎，他对那些居功自傲的人深恶痛绝。这位指挥千军万马、驰骋九州大地、为中国人民立下赫赫战功的统帅，人民自然地要给予他应得的荣誉。但是，他却从不以功自居，相反却把功劳归于党，归于毛泽东，归于广大指战员和全国人民。他总是谆谆告诫干部：“切不可以居功。群众风起云涌，烈士牺牲生命，如果有功，功是他们的。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像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的代表中的一个而已。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功，功是党的，是群众的。”他还说：“比如解放军打了很大的胜仗，很多人说是我的功劳，我就知道这是他们把我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来说的。我个人应当认识，解放军的胜利是全体同志的功劳，我不应该夸大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我的能力有限，做的事情也很有限，怎能承受得起这样大的荣誉呢？人民把功劳归我，我就把功劳往下推。”“我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和士兵生活非常之少的一部分。”1951年，他65岁寿辰时，他的故乡四川仪陇县派了几位知名人士和他的亲278戚到北京来看望他，朱德在自己家里亲切接待了他们，当乡亲们恳地说道“总司令，我们是晚辈，感谢您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咱仪陇城”时，他却说：“那里话，首先应该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感谢英明领袖毛主席，感谢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土地改革的时候，中共四川仪陇县委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计划在朱德的家乡马鞍场修建一座朱德同志革命纪念馆，朱德知道后，立即致电给川北区党委，转告仪陇县委，不要修纪念馆，把那些土地分给农民种。1959年，仪陇县委将朱德先辈住过的几间房子修整后，建立起“朱德同志旧居陈列馆”，1960年他回乡看过这个陈列馆后即说：“不要搞这个了，在这里办所学校，节省开支，让娃娃们念书，现在就办好不好？”事后，他又多次打电话给四川省委和地委，催促尽快把陈列馆办成学校。1952年，仪陇县派代表对朱德说，应全县人民要求，建议把仪陇县名改为“朱德县”，并建议把县城迁至马鞍场，以纪念朱德为人民所做的贡献。他说：“不能改，革命是人民的，胜利是人民的，不是哪个人的，胜利前中央就决定，不能用个人名义改地名。特殊情况，由中央决定，可不能以个人喜恶而定。再说县址建设在哪，这是历史形成的，从唐朝到而今几百年了，我的意见，一不能迁县址，二不能改县名。”

在工作上，他从来不滥用个人权力，他非常尊重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从来不以党中央书记或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发号施令，处理重大事件，总是要先和下面或实际工作部门同志交谈，了解情况，征求意见，然后再提交中央集体讨论决定。在组织上，他从来不任用私人，不搞山头，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从来都由组织调派，任何人和他在一起工作，他都能诚恳相待，团结得很好。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始终保持“同志加战友”般的良好关系，事业上互相尊重，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关心。他对于个人地位、权力看得很淡漠。他说：“我只知道打仗，做工作，把革命事

业搞好，从来没有想到党和人民把我 279 摆在这么高的位置上。”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采访了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后得到深刻的印象，说朱德“是一位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于是打定主意撰写一部朱德的传记。

八、活到老学到老

朱德的一生，既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又是不断学习、勇于探索的一生。他十分重视学习。他常常告诫革命同志和子孙们，要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他语重心长地说：“人活着干什么？活着就要工作，要革命，要工作就要学习，要革命就要斗争。”如何学习呢？他说：“学习应由两方面进行。一是在实际斗争中学习，这种学习是很重要而且不可缺少的。如大家就是在战场上、工作中学会本领的。这是很实际的很好的学习，但必须提高。大家要把实际斗争的经验总结起来，提高一步，使之条理化。二是理论学习，这种学习和实际中学习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不注意或没有理论学习，那么我们的行动就会变成盲目的。”在学习方面，他也堪称典范。

他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朱德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特别重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每战他事先都要亲自察看地形，向群众和战士作调查研究，了解敌人的情况，征求指战员的意见，然后再作出战斗方案和部署。在战斗实施过程中，随时注意观察战局发展变化情况，针对变化了的情况，修正指挥战斗的方案。战斗结束后，即发动指战员共同总结经验教训，使之条理化，以便指导以后的战斗。对于一个具体的战役是这样，对于一个阶段的战局也是这样。像我们前边介绍过的解放战争中攻克石家庄战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石家庄战役后，他组织人力把这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写成一个小册子，经中央批准，下发全军学习参考，成为人民解放军由原来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过渡到大规模阵地战、防御战和攻坚战为主的转折点。他在战争的皮马倥偬中，写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论抗日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论解放区战场》等著作和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文章，都是他在不同阶段对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不仅对指导战争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从理论上极大地丰富了人民战争的宝库。全国解放后，他在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方面，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意见和措施。在现代化正规化的军事训练、空军、海军、装甲兵、军事教育、铁道兵、后勤工作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论述，提出了切实的指导性的意见，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他除了继续关注军队建设外，把极大的精力放在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这对长期从事军事工作的朱德来说，既是新的考验，但也不是陌生的。早在战争年代，他一方面指挥军队作战，一方面同时注重研究党的建设和经济工作，指导部队和地方政府，做好党和政权建设，重视发展经济。1947年石家庄战役前后，朱德亲自到部队基层和农村作调查研究。据跟随朱德一同下去的何其芳同志回忆，调查研究的内容除了军事方面的以外，还对当地的天主教堂情形以及火柴生产、皮毛加工、药材业、纺织业、工人工资、面粉工业、银行工作、财政经济、农业、小学教育、民兵等等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考察、研究。随后，他在当地干部大会上做报告，除讲国内外形势、战争形势外，还就发展经济讲了许多很有启发的意见。他关于国营商业、银行、贸易、财经等方面的一些深刻论述，充分说明朱德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造诣之深，令当地专门从事财经工作的干部深为叹服。解放以后，他日理万机，公务繁忙，但他仍然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每年都要安排几个月的时间到各地去视察，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帮助各地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

题，向中央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他辛勤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仅 1958 年 4 月到 1959 年 8 月，73 岁高龄的他，仍然走遍了全国六个大区、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深入工厂、矿山、农村、农民家庭、部队营房哨所，直接同基层干部和工农兵群众见面，亲切交谈，了解情况，总结基层工作的经验，帮助下面解决实际问题。每次回京后都要向中央和毛泽东写出报告，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正因为他能够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精神，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学习，因而，他就能比较得心应手地指导各方面的工作。解放以来，他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党纪建设方面、经济建设（包括农副业、水利、手工业、军事工业、财经、外贸等等）、政治工作、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包括工会、青年、妇女儿童）、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外事工作等方面都有建树。他无愧为颇具威望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

朱德一生部能刻苦学习理论，不断求索真理。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在各个时期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朱德都能够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不断求索，使自己的认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走在时代的前头，把革命进行到底。辛亥革命后，朱德在滇军中，就读了大量历史方面的书籍，并能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加以理解运用。如他阅读《三国志》，对曹操、孙策、袁绍、袁术、刘备等人的用兵方法部有所评论，对于他建立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有所启发。1919 年受五四运动影响，朱德在滇军部队中和同事孙炳文、戴与令、妻子陈玉贞、弟弟朱代炳、朱代均等人组成学习小组，学习俄国革命，了解世界各种新思潮，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杂志，接触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读了卢梭的《民约论》等传播西方新思想的读物。同时他和其他同事参加组织了各种诗社，赋诗言志。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朱德毅然抛弃高官厚禄，于 1922 年 10 月赴德国。在柏林，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联系实际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在德国参观了许多工厂、学校和名胜古迹，访问了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研究和了解德国的社会情况。1923 年入德国哥廷根大学进修社会科学和哲学，课余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系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唯物史观》、《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 ABC》等马列经典著作，还经常阅读各种进步报刊。他一面学习，一面和别的同学座谈讨论。这些学习，使他开始认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认识到革命不是一省一地的事情。此外他还请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军军官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役情况，从中汲取教益。不久，朱德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继续研究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参阅了许多文献，还到苏联各地参观。通过上述学习和参观，进一步坚定了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念。回国后在战争年代，他始终不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的著作，结合实际斗争，指导自己的工作，总结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他特别强调要重视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科学技术。他工作再繁忙，每天总要首先认真阅读文件，看报纸和理论刊物，并挤出时间读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直到他逝世前，一直坚持这样做。

1967 年，他在遭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诬陷的情况下，无所畏惧，坚持工作。这一年内，他又读了中央规定的高级干部必读的 32 本马列著作，写了很多笔记，更加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念和同林彪、江青一伙斗争到底的决

心。1976年5月，90高龄的他，在逝世前两个月，收到重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稿本后，一口气就看完了。实实在在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

朱德的一生，经历了清王朝的统治、辛亥革命、军阀混战、蒋介石专制独裁、新中国的建立几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参加过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阶段。他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为一个爱国主义的民主革命者，再到彻底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在漫长的道路上，他始终在不断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不断求索，不断前进，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全部。

他的一生经历，不愧为周恩来所说的“已成为廿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他的丰功伟绩，正像他60寿辰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所赞誉的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和毛泽东所称颂的“人民的光荣”。他革命意志之坚定、人格之伟大，已成为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将永远与日月同光辉。

贝纳德·蒙哥马利谋略

贝内德·蒙哥马利（1887～1976），英国陆军元帅，毕业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908年入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英军第3师在法国与德军作战，直至敦刻尔克撤退回国。1942～1943年率英国第8集团军去北非作战，在阿拉曼战役中转败为胜，重创隆美尔指挥的德、意联军，遂一举成名。1944年升元帅，同年6月以副司令身份协助艾森豪威尔指挥诺曼底登陆战，并指挥全部盟国陆军登陆部队。1945～1946年任驻德英国占领军司令与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英方代表，并被封为阿拉曼子爵。1946～1948年任英军总参谋长。1951～1958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部副司令。1958年退休。1976年病逝。

一、自信执著敬业勤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驻德白俄罗斯集团军群指挥官罗科索夫斯基元帅邀请蒙哥马利到他的总部去作客。为了给蒙哥马利留个好印象，罗科索夫斯基便派专人到英国部队去了解蒙哥马利喜欢什么样的娱乐，他有什么嗜好和习惯。这位军官先问蒙哥马利爱喝什么酒，人们告诉他，蒙哥马利不爱喝酒，他从不喝含酒精的饮料，只爱喝白开水。接着他又问：“那么，他爱抽雪茄吗？”人们又告诉他，蒙哥马利不抽烟。这时，他有点吃惊，但又提出建议说他们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女郎和舞女，打算以之招待蒙哥马利元帅，人们又告诉他，元帅不喜欢女人，这位军官大声说：“他不喝酒，不抽烟，又不喜欢女人。那他到底整天搞些什么？”

蒙哥马利不喝酒，不抽烟，不好女色，不爱交际，他一生中唯一的兴趣和爱好就是军事，他最关心的就是训练、作战、胜利。正是这种别人无法相比的敬业精神，使蒙哥马利能够在同辈人中出类拔萃，声名卓著。

蒙哥马利在14岁那年进入圣保罗学校之初，他自己作主，坚决地选择了陆军班。回家后遭到母亲的激烈反对，母子间进行了争吵，最终蒙哥马利赢得了胜利。在圣保罗学校，蒙哥马利在运动场上叱咤风云，被人戏称为“猴子”，圣保罗校刊上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要猎取这头动物是很危险的。他会疯狂地直向你冲来，从不犹豫”。但与此同时，他的学习成绩却每况愈下，不可收拾。1905年秋，他经常得到的评语是“庸劣”。1906年，他不得不面临人生的第一次考验，要么努力学习，通过考试，以优秀的成绩考进桑德赫斯特英国皇家军事学院，以为将来成为一名陆军军官作准备；要么任其自流，在板球场和足球场上尽情施展，成为一个学习上的落伍者，但也就永远难以成为陆军军官了！

圣保罗学校对蒙哥马利的评语并不高，校方认为：从年纪上看，该生是个落伍者。如果他想上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就必须努力加油才行。这份评语使蒙哥马利受到很大震动，他认识到只有刻苦用功，勤奋努力才能够迎头赶上。他开始认真学习，准备参加入学考试。1906年秋，蒙哥马利参加了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他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在被录取的177名考生中，他排名第72位。

入学的第一学期，他埋头于体育运动和学习，学习成绩令人满意，校长的评语是“成绩优异”。他还被提升为一等兵，这是一种很大的荣誉，因为经过这样选择出来的学生，一般被公认为是学生的优秀分子。但在第二学期，蒙哥马利因一次恶作剧险些被开除出校。

1908年9月19日，蒙哥马利被分到皇家沃里克郡团。在部队里，他没有别的兴趣和爱好，全副身心地投入到军事这一职业中来。为了争取到印度服役，蒙哥马利专门学了两门印度土著语言。在印度服役过程中，他开始形成这样的认识，即如果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他就必须精通他的本行业务。蒙哥马利刻苦学习印度的乌尔都语和普什土语，以便与印度士兵沟通联系。为了能使用和管理营里的运输工具，他把野战勤务条令背得滚瓜烂熟，并对有关骡马的知识也作了深入地了解。正是由于他这种热爱职业的敬业精神，使他崭露头角，被晋升为中尉。

1912年10月，蒙哥马利又报名参加陆军通信专业测验，该测验主要检查军官是否掌握了陆军的各种通信手段，要求十分苛刻。蒙哥马利全力以赴，

将 1912 年出版的陆军通信手册倒背如流，在为期五天的有关旗号、灯光信号等通信测验中，蒙哥马利名列前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哥马利参加了战斗。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奋不顾身，作战英勇，荣获优异服务勋章。他曾一度中弹负伤，伤愈回到部队后，他又将全部精力投入工作，潜心研究如何进行统一指挥，如何集中使用师的炮兵主力和进行空中侦察，如何才能迅速获得战斗进展的准确情报等问题。当时蒙哥马利所在的第 9 军隶属普卢默将军统帅的第 2 军团，普卢默将军的许多作战主张，对蒙哥马利产生了最深刻和最持久的影响。这些主张包括：对重要战术目标作浅近攻击；使用纵深炮兵火力为进攻部队创造条件；强调步炮协同；主张部队要根据特定的作战任务进行特殊的训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蒙哥马利开始对过去战争中的成败得失进行探索，反省和分析过去的经验，摒弃过时无用的东西，提出新的建设性的意见。蒙哥马利和当时的许多军官一样年轻、勇敢、能干，但是他对事业更执著。当时他的大多数同学或同事在胜利后逐渐将过去几年战争忘却，他们不再思考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也不去分析战争的来龙去脉，因果缘由，而安于现状，在和平时期担任着高级军官之职，身居高位，安逸享乐。

蒙哥马利则不然，他对一战中发生的事情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尽管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他在 1939 ~ 1945 年付诸实践的那套军事理论，是否源自他对 1914 ~ 1918 年战争的观察以及事后对经验教训的思考。但有一点可以充分肯定，即蒙哥马利在二战中付诸实践的那套军事理论的基础和主要前提，在他去参谋学院学习时，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而且以后并没有做大的修改。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的洗礼，蒙哥马利开始认识到军事是一门需要终生研究的学问。他认为自己当时虽然有 4 年的实战经验，但是毫无理论基础，要掌握军事的全部奥秘，就必须将它置于生活的首位，将军事作为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献身于军事。他决定首先应该到当时著名的坎伯利参谋学院进行深造。

坎伯利参谋学院于 1919 年重新开办。蒙哥马利第一次未获得提名，他寄希望于第二次。第二期学习的名单公布时，蒙哥马利因没有靠山和后台，又落选了。但蒙哥马利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在一次驻德英国占领军总司令威廉·罗伯逊爵士邀请他参加的网球聚会上，蒙哥马利抓住时机，在打球休息的间歇，他向总司令倾诉了自己的苦恼和愿望。总司令曾在 1915 ~ 1918 年任帝国参谋总长，是从普通士兵逐级升到元帅的第一人，他年轻时也经历了许多坎坷和挫折，所以对年轻人富有同情心。网球聚会不久，录取名单上便有了蒙哥马利，录取通知上要求他在 1920 年 1 月到坎伯利参谋学院报到。

在参谋学院，蒙哥马利决定对过去和现在的军事学进行一番彻底的研究。他并不热衷学院里的打猎和社交活动，而是对军事充满热情。他勤奋努力，十分健谈，从不放弃与同学讨论和切磋的大好时机。他曾对学院的教官抱以过高的期望，认为学院会让优秀的军官把他们的作战经验纳入战史资料，并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制定一套完成任务的方法。但是他发现现实情况并不是如此，对于他以及一些曾经到法国有过作战经验的年轻人来说，参谋学院的课程完全是过时的不现实的东西，“全是胡闹”。

参谋学院的训练期限为一年，蒙哥马利在与同学的互相揶揄、嘲笑和争论中，度过了一年的学习生活，顺利毕业，没有人告诉他成绩好坏，但他自

信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毕业后，他被派往当时英国陆军最好的几个旅之一——驻科克的第 17 步兵旅，担任旅参谋长，并直接投入镇压南爱尔兰的新芬党争取独立的活动中。1922 年 5 月，他又担任第 8 步兵旅参谋长，不到一年，又调任 49 师二级参谋，由于一级参谋职位悬缺无人，蒙哥马利实际上行使着一级参谋的职权。

蒙哥马利提出了对部队进行编组和训练的建议，得到顺利通过。他开始将第 49 师作为他自己的各种战术观点的试验基地，全力以赴地进行实践。当时英国陆军部已经颁发了各种训练教材和野战条令，但蒙哥马利认为这些教材和条令存在着缺陷，那就是它们仅订立作战的基本原则，却不提供为达成这些原则应如何训练部队的方法。1923 年 7 月，蒙哥马利毫不迟疑地颁布了他的第二本刊印小册子，题目为《供西区部队和第 49 师用的战术教材》。

针对当时部队裁员、士气低落的现状，蒙哥马利又以坎伯利参谋学院为启动枢纽，鼓励年轻军官跳出职务框框，憧憬未来，帮助他们准备参加参谋学院的入学考试。1923 年，他在德文郡港开办参谋学院预备班。他既要为参谋学院预备班讲课，又要拟订习题，修改考卷，整天忙个不停。当时他在编著教材时，对陆军的编组部署、运动和战术等方面都已经具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如土地之得失不是最重要的，自始至终认清军事上的战略目标，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观念后来成为他的军事哲学的主要原则之一。1929 年，蒙哥马利被陆军部从团里调出，担任步兵训练《教范》编写委员会的秘书。当时《教范》作者已几易其人，但蒙哥马利觉得，就编写训练《教范》而言，在英国陆军中没有任何军官比他的经验更为丰富，他决心将教范编写成一本供步兵军官阅读的内容广泛的作战论著。当蒙哥马利向委员会提出草案时，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委员会提出了无数修改意见。蒙哥马利认为那是纯属挑剔细节，不愿采纳意见，双方分歧很大，又互不相让。于是蒙哥马利建议解散委员会，由自己独立完成原稿的整理工作，他全部删除委员会的修改意见，结果该书出版后受到一致好评。

蒙哥马利在进行训练和指导参谋学院预备班期间，又开始在军事理论领域进行探索。1924 年夏季《陆军季刊》上刊登了他的一篇有关军事的文章。1925 年，他又在皇家沃里克郡团的杂志《羚羊》上连续发表了四篇研究战术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第一篇题为《现代步兵战术的演进》，内容涉及从 1611 年至 1924 年约 300 年间，现代步兵战术的演进和发展，表明蒙哥马利善于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供未来借鉴。

1926 年 1 月，蒙哥马利被派往坎伯利参谋学院担任教官，他具有作战经验，同时又具有高超的传授知识和激发学习热情的技能，他是一名优秀的教师。曾经听过他的课的人对他的教学方法体会根深，他们认为“蒙哥马利能够极其清晰他说明复杂的情况，并且能够不用一页草稿就总结出一次长时间的演习。他讲话时两眼注视着听众，他具有抓住问题实质的惊人本领，要误会他的意思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怕他的意思会令人不愉快。在争论中，他是难对付的，无情的”。无论是在坎伯利参谋学院，还是在奎达参谋学院任职，蒙哥马利都是最出色的战术演讲家。

蒙哥马利不仅重视理论的学习与研究，运用丰富的经验教育和培养年轻的军官，而且他还重视实战演习，重视对部队的训练，将军事理论运用到具体战略实践中去。1919 年 5 月 5 日，蒙哥马利担任皇家燧发枪团第 17 营营长，他亲自负责全部训练工作，将训练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卓有成效。

1925年3月，蒙哥马利任皇家沃里克郡团第1营A连连长，到任时，他已拟定出一份步兵连训练计划，其中包括3月18日至8月初的每日训练课目。演练的内容包括利用地形地物、战地通讯、射击命令、战斗队形、排战术、巡逻侦察、夜间战斗、进攻、退却、防御、陆空协同、野战筑城、坦克支援。他力图在训练结束后，使每一个军官和士兵在战斗中对每一种作战所应采取的行动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这套训练计划目标很高，在沃里克郡团里前所未有。他的与众不同的训练方式，使他的声誉与日俱增，1925年7月26日，蒙哥马利晋升为少校。

在驻守埃及期间，蒙哥马利决定将他的研究成果用以训练部队，以创造一种新型的正规的陆军营。他要求部队在训练前必须制订好作战计划，计划经过批准必须付诸实施，他经常不定期地检查连队的训练工作，或者在白天，或者在半夜，使连队根本不敢掺假。他特别强调在夜间进行训练，要求训练士兵在黑暗中的作战技巧和能力，每次训练不得少于48小时。连训练以后，又接着搞营训练，蒙哥马利特意拟定了对抗演习计划，部队在演习中，不是攻击敌村庄，就是防守某一要地。蒙哥马利则担任裁判。演习完毕后部队要举行康乐竞赛，每个连表演一套节目，表演最精彩者可以在亚历山大休假两天。这种新颖的训练方式使部队训练热情不断高涨，也使蒙哥马利积累了训练部队的丰富经验。以后他每到一个新的部队，都要对部队进行各种训练，使部队士气旺盛，战斗力增强。

蒙哥马利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志向，希望成为一名陆军军官。尽管早期他曾因贪玩而耽误功课，在学习上成为落伍者，但是他自信执著，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始终充满自信，锲而不舍地追求自己的最终目标。自从进入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后，他开始刻苦学习，勤奋进取。在每一个岗位上，无论是官小职微，还是声名显赫，他都努力作好本职工作，使其雄心壮志在既定的任务范围内发挥作用，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在一战和二战间的和平年代，他面对现实，认清环境，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军事这一职业，在军事上既注意军事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又注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勤于训练，狠下苦功，不断地充实和发展自己。正是这种对军事的自信执著，敬业勤练的精神，为蒙哥马利的晋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他一步步地成为少校、上校，以至元帅，成为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

二、临危不惧力挽败局

在战场上著敌强我弱，己方处于劣势时，必须要求指挥官沉着冷静，临危不惧。如果指挥官临阵慌乱，很容易出现兵败如山倒的局面，或手足无措，束手待毙，或慌不择路，争先逃命，造成大溃败的惨状，使敌方坐收渔利。

蒙哥马利临危不惧的品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有所体现。在一次战斗中，他高举着指挥刀，率领全排前进，当他一步冲进德军战壕时，发现一名德军正在举枪向他瞄准。蒙哥马利曾受过不少训练，知道与敌人怎样拼刺刀，而且还在单人对刺中获过优胜奖。但当时他既无步枪，又无刺刀。面对向他瞄准的德国兵，蒙哥马利只有一把锋利的佩剑。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蒙哥马利来不及多想，便纵身向那个德国兵猛扑过去，用尽全身力气猛踢他的下腹部，正好踢中其要害部位，德国兵痛倒在地，成为蒙哥马利的第一个战俘。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蒙哥马利任第3师师长。当时，德国已经入侵波兰，英国已正式向德国宣战，并进行了战争动员，组织远征军入法。第3师接到命令前往法国。在赴法前，蒙哥马利召集全师营以上的军官进行训话，提出了他的攻防策略和对机动作战的想法，又使预备人员进行实弹射击的训练，耗去10万发步枪子弹。他还坚持全师在启航前，每人至少应投3枚手榴弹。

进入法国后，蒙哥马利又了解到英国陆军的许多缺陷，如野战军的通讯系统不完全；没有后勤支援；没有设立高级指挥机构；运输能力很差。但他又认识到尽管精锐部队与精良武器在战争中是必要的，但是劣势装备的部队并非无所作为，只要经过高标准的训练，又配备很有能力的指挥官和控制机构，劣势装备的部队是能够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第3师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蒙哥马利亲自计划和指导了5次大规模的师演习和许多小规模演习。第一次演习称为“进入防御阵地演习”，历时4天，演习内容包括夜间汽车输送、昼间行军、封锁交通要道、实战状况下各级指挥部的报告和命令传送以及营旅间的电话通讯。

第二次演习的内容为以汽车运输进行快速运动，夺取并固守一河川线，等待援军到达；准备并发起步、炮及空军协同的反冲击，将敌人逐退至一地障后，如敌人超越此地障，则可成功地建立桥头堡。第三次演习为连续48小时的作战行动。1940年4月1日，盟军部队全部处于一级战备状态，第5次大规模的演习计划被迫取消。但蒙哥马利为了保持部队的战斗力，规定步兵部队每人每周至少行军20英里。

经过严格的训练，蒙哥马利对自己和自己的士兵充满信心。这一时期，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鹿特丹遭到轰炸；荷兰要求停战；比利时军队撤到了阿尔贝运河；英国军队右侧的法国集团军垮了。在这令人焦虑不安的时期，蒙哥马利却镇定自若，他白天外出，视察前线，会见下级指挥官，听取汇报并给予口头命令。回到师指挥部后，会见参谋班子，发布当晚和第二天的命令，然后进餐、就寝。除紧急情况外，他不允许别人打扰他的睡觉。有一天晚上，一位参谋军官将他从梦中叫醒并报告说德军已进入卢万。蒙哥马利勃然大怒，嚷道：“走开，别打扰我，叫驻卢万的旅长把他们赶回去。”说完后他接着睡觉。由于第3师训练有素，蒙哥马利镇定冷静，在与德军的交锋中，第3师奋勇反击，将德军赶出了卢万城。在当时盟军战场越来越令人不

安的形势下，第3师巍然不动，宛如一块屹立在汹涌急流中的磐石。

1940年5月，希特勒组织强大的军队对西欧发动全面“闪击战”，德国军队依靠机械化部队，迅速突破法军防线，不到半个月时间，便占领了大半个法国，并且将几十万英法军队包围在敦刻尔克一带。兽贝—阿吕安—伊佩里—科明运河一线，是盟军唯一有防御工事的战线，如果这条战线被突破，在当时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指挥官布鲁克在视察防区时，发现在这条防线上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缺口。在当时，要填补这个缺口，几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

部队必须首先从靠近阵地右端的阵地撤出，穿过另外3个师的后方，向北面北移25英里，然后潜回防线左翼。这项任务实际上是要求1.3万人在夜间沿着偏僻小径和陌生公路进行大幅度的跨越，而这些小道与公路常常离敌军或盟军不足4000码的距离，所有这一切行动都必须在黎明前完成。

蒙哥马利在整个静坐战期间，率领第3师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演习，并且进行了多次夜间行军演习，他们反复训练，认真考虑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直到练习得每个细节都丝毫不差，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都做到心中有数为止。

受领任务时，蒙哥马利镇定自若，他拿起笔，在地图上标注了行军路线，在阿尔芒蒂那尔正东渡过利斯河，穿过普洛斯德特丛林，踏上公路北进。

在天黑后，蒙哥马利命令机枪手和装甲车作为一支轻装先头部队开路前进，然后头戴红帽的宪兵出发，他们的任务是标划道路，保持车辆的适当间距。晚上9时许，主力部队——1.3万多人外加600辆篷车、卡车、小型轻便汽车、指挥车和运兵车出发。车辆的后轴被统一漆成白色，在车辆尾部的后栏板下有一只隐藏的小灯，发出微弱的光，驾驶员注视着前面车辆的微弱灯光，依靠它的指引来辨别道路。在行军途中，右方不断闪烁着德军大炮发射的火光，左方，英国炮兵从康默尔山上发射着猛烈的炮火。驻扎在公路旁的一个英国炮兵中队，正好在蒙哥马利经过时发炮，几乎将指挥车震离了公路。蒙哥马利意味深长地说：“如果第3师这次机动能成功的话，那么任何事都难不倒我们。”5月28日黎明，蒙哥马利率领第3师顺利地进入阵地，成功地守住了这个缺口。从纯军事学的观点来看，蒙哥马利取得的成功，可与他所取得的任何一项重大成就相媲美。这次成功，与他临危不惧的心理素质密切相关。

由于蒙哥马利的出色表现，他升任第2军军长。他以军长身份参加了戈特在敦刻尔克前线总司令部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戈特宣读了英国政府发来的有关最后阶段撤退的指示电报，主要内容为：第1军将最后撤离，第1军军长巴克将接替戈特，负责最后阶段的撤退工作。戈特还告诉巴克，在最后不得已时，可率部队向德军投降。巴克在听到指示后两眼失神，满脸沮丧。

会议结束后，蒙哥马利不顾职小身微，要求留下来与戈特单独谈话，他直截了当地向戈特指出，巴克不适合这种最后指挥的职务，担任殿后部队指挥官的人，必须是一个头脑镇静而清醒的人，第1军第1师师长亚历山大正是具有这种品质的人，他才是适合担任这种职务的人。戈特没有责备蒙哥马利的傲慢无礼，而是马上接受了他的建议，任命亚历山大接任第1军军长。

蒙哥马利的建议被采纳后，他与亚历山大一致行动，协调步骤，最大限度地稳住战场，在乱中求稳，稳中求快。他立即召集第2军师级指挥官会议，

发布第二天从海滩一带撤回英国军队的命令，任何来不及从海滩上乘船撤退的人，必须沿海岸迅速奔向敦刻尔克，在港内上船撤退。6月1日凌晨，第2军最后一批环形防御部队撤退，进入敦刻尔克的环形防御之内，蒙哥马利一直站在沙丘上指挥部队进入敦刻尔克港，然后最终撤离敦刻尔克。

在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的共同努力下，英军以迅捷的动作在预期的时间内，顺利地渡过了英吉利海峡，英国政府原只指望撤退4.5万人，但是经过努力，英军竟全部撤出，共计22.4万人，另有法军和其它盟军11.4万人也相继撤出。这一成功的大撤退被称为“敦刻尔克奇迹”。蒙哥马利的沉着冷静、临危不惧是创造这次奇迹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三、抓住时机大胆行动

在战场上，战机是不少的，而要赢得胜利，就必须把握战机，大胆行动。瞬息万变的战场，要求指挥官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和战争的具体进程，作出准确的判断，并且迅速地抓住时机，赢得胜利。机不可失，对不再来。蒙哥马利就是这样一位善于进行准确判断，并迅速抓住时机，以果敢手段和钢铁般意志将之充分利用的伟人。

1942年8月，蒙哥马利受命前往开罗，于8月15日开始接任英国中东集团军第8集团军司令。当时英国军队在北非战场上节节溃退，人员伤亡较大，士气不振。

蒙哥马利赴任前，前第8集团军司令奥金莱克告诉蒙哥马利一个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提出，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存第8集团军，使它在战场上免遭歼灭性的打击。如果隆美尔很快发动进攻，第8集团军将退到尼罗河三角洲。如果开罗和尼罗河三角洲不保，那么第8集团军将向南退至尼罗河，甚至可能撤退到巴勒斯坦。奥金莱克制订的将第8集团军撤至尼罗河的计划，实际上就是把北非拱手让给德国，这种作战计划和作战方针势必对整个战局产生不良的影响。蒙哥马利对奥金莱克计划撤退的打算感到十分惊讶，他当即提出了一两个问题，但奥金莱克对蒙哥马利立即修改他的既定方针的想法表示不满，于是，蒙哥马利保持沉默。

在行动上，蒙哥马利并不沉默。他迅速找到即将接任中东司令部总司令之职的亚历山大将军，提出为第8集团军建立一支后备军的计划。同时他认为第8集团军应该同隆美尔的部队一样，拥有比较完善的装甲武器。亚历山大表示同意。接着他又找到他在坎伯利参谋学院的学生，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哈丁，向他说明了他的计划，请求他将分散在埃及的零星力量组建成一个装甲军。哈丁答应想想办法。经过努力，哈丁说他可以组建一个装甲军，这个装甲军将是第10军，它包括第1、第8、第10装甲师和新西兰师，每一个装甲师都包括一个装甲旅、一个步兵旅和师直属队，新西兰师则包括两个步兵旅和一个装甲旅。

在开罗，蒙哥马利还找到一位随从副官约翰·波斯顿。约翰·波斯顿追随蒙哥马利转战了10个国家，从阿拉曼到易北河，他深受蒙哥马利的器重，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星期不幸在德国牺牲。

蒙哥马利准备就绪后，就前往第8集团军驻扎地。在亚历山大港附近，他碰到了如约前来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作战情报处处长德·甘冈。德·甘冈向蒙哥马利介绍了当时的作战形势、最新敌情、各个战区的指挥官、部队士气、前任指挥官奥金莱克关于今后的行动命令，以及他自己对这一切的看法。在到达第8集团军司令部以前，蒙哥马利已决定让德·甘冈任他的参谋长。

到达司令部后，蒙哥马利对苍蝇乱舞、脏乱不堪的工作环境感到厌恶，他发现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整个气氛是沉闷忧郁的。前任指挥官曾经发过一些较为含糊的撤退命令，战线上的一切似乎都捉摸不定，情况十分危险。

当此之机，蒙哥马利决定迅速采取行动。按照命令，他要在8月15日才能接管第8集团军，但他决心承担全部责任，提前接管第8集团军。8月13日，他解除了代理第8集团军总司令拉姆斯登的职务，让他回他的第30军继续任军长。就这样，蒙哥马利在8月13日，即在授权之日的前两天，接任了第8集团军司令的职务。随后，他向总司令部发去一份电报，说明了他提前

接任的情况。接着他取消了所有以前有关撤退的命令。他发出命令：“一旦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决不后退，我们将就地据守，与阵地共存亡。”

接管第8集团军后，蒙哥马利决定迅速暂离司令部，他在前线会见了南翼第13军代理军长弗赖伯格和澳大利亚第9师师长莫斯黑德。在晚上，他回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开始向第8集团军参谋人员讲话。蒙哥马利先进行了自我介绍，接着他阐述了自己的作战方针。他提出必须营造一种新的气氛。因为当时笼罩着第8集团军的气氛是疑虑，是回头选择下次退却的目标，这样只会使第8集团军丧失打败隆美尔的信心。蒙哥马利慷慨激昂地讲道：“所有关于退却的计划和指令都要烧掉，而且是立刻烧掉。我们要立足在这里战斗。如果我们不能在这里生存，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死去。”蒙哥马利提出如果要就地作战，那么防御阵地必须要有纵深。所有的运输工具必须撤回后方。弹药、水、口粮等必须贮藏在前方地域。

蒙哥马利还任命德·甘冈作为第8集团军参谋长，授权他管理整个司令部，他所发出的命令应该被看作是由蒙哥马利发布的，必须立即贯彻执行。

接管第8集团军后，蒙哥马利马上着手处理他认为必须立即予以注意的四项任务，即在集团军内树立他的形象并恢复全体官兵对集团军本身及其高级军官的信任；审查指挥机构并砍掉他诊断为“朽木”的军官；建立一个与他性格和作战理论相适应的指挥系统；必须打一次胜仗。

在接任第8集团军的当天晚上，他就任命德·甘冈为参谋长，并且阐述了他的作战方针，使参谋们明白将要采取什么方针，以便正确地处理具体的参谋工作。蒙哥马利又迅速而公正地撤换了一些人，补充了一些人。科贝特、多尔曼·史密斯和拉姆斯登先后被解职。被誉为“沙漠之鼠”的伦顿也被解职。伦顿从利比亚战役开始，就指挥着一个让敌人闻风破胆的装甲师。在蒙哥马利视察前线时，伦顿与他在如何对付隆美尔的军队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蒙哥马利在争论中发现伦顿头脑僵化，又刚愎自用，于是决定由约翰·哈丁接替伦顿。

在清除“朽木”的同时，蒙哥马利通过晋升或从英国引进的手段引进了一些年富力强的军官。他从英国调来奥利夫·利斯接管第30军，霍罗克斯接管第13军，调柯克曼准将任炮兵指挥官，调休斯任第8集团军高级牧师，调英王龙骑兵禁卫军的威廉斯少校任情报参谋处处长。通过撤换与调任，对第8集团军的调整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弗拉基米尔·佩尼亚科夫中校在其自传中写道：“我认为一个有勇气把一些准将从集团军的参谋机构里解职的将军，一个知道怎样在军士长的心中激发起热烈的献身精神的将军，是不难打败隆美尔的。或者说，是不难赢得胜利的。”

蒙哥马利的作战方针和他的乐观情绪，稳定了第8集团军全体官兵的情绪。丘吉尔在8月份视察了第8集团军，第8集团军司令部和部队所表现出的气氛使他惊喜不已。他在拍回国内的电文中指出：“在前任司令的指挥下，我非常确定地认为，我们正在走上灾难之路，但现在的气氛已完全改变。”

为了使全体官兵恢复对高级指挥官的信心，使部队以高昂的士气投入未来的严峻战斗，蒙哥马利决定在英军发动攻势以前，按自己的想法打一次仗，而且必须战果辉煌。他准确地判断隆美尔一定会发动进攻，并从情报人员处得知敌人进攻方向肯定在南侧，然后向左迂回，调动装甲部队攻向阿拉姆哈勒法和鲁瓦伊萨特山地。他以这个预测为基础制定了作战计划，为非洲军团设置了一个陷阱，使隆美尔的进攻只落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结局。阿拉

姆哈勒法山之战英军取得了胜利，对英国来说，这是北非沙漠传回的第一个捷报。它使第8集团军司令部充满了兴奋与喜悦的气氛，士气得到提高，消除了疑虑不安的情绪，官兵的信心也与日俱增。阿拉姆哈勒法山战役的胜利，也预示着第8集团军将从一个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蒙哥马利初到第8集团军时，士气低落，整个司令部笼罩着焦虑不安的气氛。他针对当时情况，当机立断，甚至甘冒一定风险，提前两天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之职，迅速地采取了果断而有力的措施。他断然停止所有的撤退命令，号召全体官兵严守阵地，调整参谋机构，裁撤或引进军官，及时终止了英军的撤退计划，并且经过在前线实地考察，以获取的情报为基础，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在阿拉姆哈勒法山地区严阵以待，布防坚守，终于取得了胜利。抓住时机，大胆行动是使蒙哥马利取得阿拉姆哈勒法山战役胜利的重要因素，以这次胜利为起点，蒙哥马利率领第8集团军在北非战场取得了辉煌成就。

四、巧布“迷魂阵”

在现代战争中，非常重视真假结合、虚实相兼的战略手段，即采取迷惑的手段，使对手摸不清自己突然袭击的确切地点和时间，实行战术奇袭，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取得胜利。这种谋略实际上是“虚实在我，贵我能误敌”。蒙哥马利在战场上，多次采用这种诈敌谋略。在战争前，他经常制定详细的诈敌计划，使对手无法得知他的真实意图。他认为诈敌计划的目的一是不使敌人了解我们发动攻势的意图，隐瞒得愈久愈好；二是如果隐瞒不住，要使敌人对我们的进攻日期和主攻地带摸不清楚。

根据这些原则，在阿拉曼战役前，为使德军摸不清第8集团军发动进攻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蒙哥马利制定并实施了代号为“伯特伦”的欺骗计划。这个计划在1942年8~9月间制定，是迄今为止沙漠战中最精巧的欺骗计划。

“伯特伦”计划的总体规划是，在北方，不暴露第8集团军的真正意图和实际行动；在南方，则要有意识地显示第8集团军活动的假象，使敌人摸不清第8集团军的主攻地带和进攻日期。

当时，为夺取北非战役的胜利，第8集团军计划在阿拉曼沿线发动反攻。阿拉曼战线绵延40英里，从地中海沿岸延伸到广阔的内陆沙漠地带。进攻阿拉曼沿线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北部地域实施正面突击，但隆美尔在整条战线上都布置了步兵进行强守，并且构筑了坚固的工事。要保证迅速反攻成功，并尽量减少损失，就必须隐瞒英军将在北方进攻的真实意图。为此，英军进行了大量的以假乱真，迷惑敌人的行动。

在北方，为准备进攻，设立了几个补给品堆集所，以储备将来用于发动进攻的大批的汽油、弹药、轻重武器等物资。他们在阿拉曼附近发现了一年前修建的纵横交错的石砌掩壕，通过观察，发现如果将油桶堆放在里面，不会有光线或阴影方面的变化，于是他们将2000吨汽油完全地藏藏在掩壕里。他们还把4000吨作战物资堆积成10吨卡车的样子，并且修了顶盖，使其看上去好像兵营。为了迷惑德军，减少德国飞机对补给品堆集所的轰炸，英军在空旷的大沙漠中建立了一个大型的铁路终点站，并在该站前方不远的地方秘密设立了一个假基地，在终点站和假基地之间，按正常的筑路速度，铺设了一段假铁路，假铁路上设有一辆辆机车、煤水车、棚车和油槽车，这些车辆经常重新编组，造成一种运输繁忙的景象。假基地的空地上，整齐地停放着大批卡车、装甲车、坦克和其它补给品，作战物资经常更换位置，给人造成货物搬运频繁、旧去新来的印象。其实，基地上所有的车辆和作战物资都是假的，机车只是一个模型，上面生了一个火炉，昼夜冒火。通过用假车辆扮演坦克和其它车辆的运动，使敌人对大量部队在作战阵地上集结逐渐习以为常，在进攻的前一天夜间，将全部假卡车换成真的作战用车。通过这种魔术般的伪装隐蔽，15万人和1万辆车顺利通过寸草不生的旷野而未被察觉，德国人很难知道英军会在短时间内在北方发动进攻。

同时，在南方，英军制造假象以表明主要突击可能来自南面。他们在南方铺设了假输油管。假输油管的铺设从9月下旬开始，长约20英里。油管槽沟按正常的方式挖掘，以旧油桶为模拟管道。入夜后，将壕沟填平，模拟管道继续向前移动，以便第二天开挖新的壕沟。按当时施工进度来看，要到11月初才能竣工。在铺设假油管的同时，还在三个地方建立了假油泵房，在其中两个假油泵房附近建立了给水站与储油罐。为使欺骗计划更加逼真，又在

管道南端选择了一个9平方英里的地段作为“军需品堆集所”，在这个堆集所里，共放置了700堆物资，造成运进9000吨弹药、汽车、食品和工兵器材的假象。此外，英军还传播了假情报，用通信分队模拟将在南面发动主攻的无线电通讯。

为了把伪装搞得天衣无缝，整个欺骗敌人的活动以集团军为基础进行，自始至终小心行事，不放过任何细节。他们制定了详细周密的计划，而且只向下层军官传达将要发生什么事，在9月28日至10月21日间按军衔高低分批传达。在最后一天，传达到了普通士兵，并且停止了一切休假和进城活动。

所有这一切努力与真假难辨的情报，使隆美尔产生了错觉，虽然他深知北段最有可能是英军的主攻方向，但他不能不考虑英军在南方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他将装甲部队分散开来，将装甲部队的一半用来抵抗可能来自南方的威胁。

1942年10月23日夜，英军在阿拉曼战线北段突然发动猛攻，1000多门大炮同时向德国炮兵阵地轰击。与此同时，霍罗克斯的第13军在南部发起佯攻。在地中海沿岸，英军又制造假象，使指挥德军战斗的施图姆将军搞不清英军的主攻方向。

阿拉曼战役开始后，施图姆接到海岸巡逻队的报告。报告称，在强大的轰炸机群的支援下，英国军舰正在炮击德军的第90轻装甲师，猛烈的英军炮火已向德军阵地开火，鱼雷快艇正沿海岸施放烟幕，透过烟幕传来了似乎在进行大规模两栖进攻的声音：马达声响和汽油味，抛锚索链的格格声，扩音器里发布的命令声，还有一连串的照明弹照亮了海滩，施图姆立即行动，命令轰炸机和战斗机马上起飞，投入战斗，并指示第90轻装甲师的后备团进入作战地域，以粉碎英军在德防线后方登陆的企图，大炮和坦克开始扫射海面。

烟幕消散后，德军发现，在海面只有几只木筏在飘动，引擎发动的气味系木筏上的霰弹所致，照明弹为自动发射升空。此外，在海滩上还发现了一台带有扩音器的录音机。在地中海的诈敌行动，使施图姆判断失误，大上其当，将一部分最精良的重要部队调出了主要战场，减弱了德军在英军主攻方向上的防御力量。

通过欺骗敌人的计划，使德军不能确切掌握英军的主攻方向和主攻时间，分散了德军的兵力，使英军能够达到突袭的目的，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突破隆美尔的坚固的阿拉曼防线，取得阿拉曼战役的胜利。

众所周知，蒙哥马利在战争中是以稳扎稳打见长的，但是在具体作战实践中，蒙哥马利也经常根据战争态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采取机动灵活的手段，巧布迷魂阵，借以迷惑对手，出奇制胜。他不仅在阿拉曼战役中实施了著名的“伯特伦”欺骗计划，而且在与盟军配合的诺曼底登陆战役中，也巧设烟幕，使德军受骗上当。

1944年6月，以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的盟军远征军经过长期准备，决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即以英国为基地，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欧洲西部登陆，直接对德军作战。当时要横渡英吉利海峡，实际上只存在两种选择，或从诺曼底登陆，或从加来海峡登陆。从加来海峡登陆具有许多优点，如海上航程短，登陆艇能迅速周转，可以得到战斗机的掩护等等。德国人一直将加来海峡作为盟军最可能进攻的地点，他们在加来海岸上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并将15集团军驻扎于此。

为使希特勒及其指挥官继续将加来海峡当作主要的危险地点，蒙哥马利

设计了一个代号为“保镖”的欺骗计划。这个欺骗计划的目的是使德军对盟军的登陆地点与登陆产生错觉，使他们深信盟军的主要进攻将发生在7月份的第三个星期，而且在发动主要进攻前，盟军将从苏格兰进入挪威。更为重要的是，它要德军确信盟军对诺曼底的任何进攻，仅仅是一种佯攻。

“保镖”计划首先在英格兰东南部制造假象，以使德军相信在英格兰驻扎着一个完整的集团军以及辅助的空军部队。借助以往各种设施的残余和少量部队，蒙哥马利模拟了集团军司令部、兵营以及进攻用的装置。同时又将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无线电通讯增加到与一个集团军相称的程度。尽管蒙哥马利的前线指挥所已在4月底迁至朴次茅斯，但为了使欺骗计划显得更加逼真，蒙哥马利将无线电信号通过陆上线路从朴次茅斯传送至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再从那里将信号播出。这一行动迅速奏效，使德国人误认为英军的主要战斗序列在英格兰东南部。

在“保镖”计划中，还运用航空部队的活动来加强欺骗计划。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除了打击战略目标，还打击靠近“海王星”附近的桥梁、铁路、雷达站、机场和海岸炮兵阵地。“海王星”行动从空军的活动中得到了无可估量的好处，作为欺骗计划的一部分，空军的打击活动是按一定的程式进行的：每打击“海王星”区域的一个目标，必须打击加来海峡的两个目标。被打击的铁路目标，大多在“海王星”区域之外。

同时，英国还煞有介事地派人员前往中立国去收集加来海岸的详细地图。英国电影制片厂的布景师制造了不少假登陆艇，并将假登陆艇运往东南沿海。他们还用帆布制造了许多假弹药库、假医院、假兵营、假飞机。他们用充气的橡胶制造了一个装甲旅的坦克，并将其十分醒目地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英国建筑师则在多佛尔海岸显眼的地方，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假油船码头，并配备了防波堤、贮油罐、输油管道、发电厂和高射炮等。

“保镖”欺骗计划采取的种种手段，使德国受骗上当。希特勒误认为盟军已在英国东南部集结了主要兵力，准备在7月份进攻加来。他将德军最精锐的第15集团军集中在加来地区，而在诺曼底，只部署了一个装甲师。1944年6月5日，盟军进攻诺曼底，使德军措手不及，隆美尔精心构筑的“大西洋堡垒”被迅速突破。盟军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了第二战场，促进了德国法西斯集团的早日覆灭。

声东击西，巧布疑兵，迷惑对手，使对手不了解进攻的确切时间和具体地点，以求奇中取胜，这种诈敌之计是一个重要的用兵原则，古今中外依靠巧布疑阵的谋略而取胜的战例不胜枚举。蒙哥马利将这种谋略灵活纯熟地加以运用，巧布迷魂阵，诱敌生疑，声东击西，终于取得了赫赫战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涌现出来的一个著名战将。

五、稳扎稳打确保成功

稳扎稳打，即在战前作好充分的准备，制定详细缜密的作战计划，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作战演习，不打无准备之仗。不轻易冒险，取得胜利后迅速结束战斗，不在规定地点以外迎击敌人。蒙哥马利的作战谋略以稳扎稳打见长，稳扎稳打是他的作战特色。依靠稳扎稳打，他赢得了一系列确实的胜利，保证了他从未打过一次败仗，确立了他在部队中的威望。但同时，他的稳扎稳打的战略，也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和攻击。

蒙哥马利的稳扎稳打战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审慎严密地制定作战计划，认真考虑每一个作战细节，尽可能准确地判断战场上即将出现的一切事件，并加以利用或防范，决不打没有很好计划的仗。

在阿拉姆哈勒法战役前，蒙哥马利根据准确的情报，制定了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充分体现了蒙哥马利稳扎稳打的特色。蒙哥马利以新西兰师箱形阵地的南翼侧为基础，在箱形阵地与阿拉姆哈勒法山之间的缺口内部署了第 22 装甲旅，将从尼罗河三角洲调来的第 44 师的两个旅配置在阿拉姆哈勒法山脊上，第 23 装甲旅作为预备队配置在第 22 装甲旅后面，第 8 装甲旅配置在哈勒法山脊以南一个靠后的阵地上，第 7 装甲师则配置在哈勒法山脊南面。这样，不管隆美尔采取什么样的进攻方法，不管他向那个方向运动，他都将被困住。如果他朝正东方向进攻，那么他将被第 8 装甲旅堵住。而第 22 装甲旅和两个师的炮兵将从其左侧向德军猛击。如果他突破地雷场后向左侧出击，那他将对配置在隐蔽阵地上的第 22 装甲旅，而在他的右侧是严阵以待的第 8 装甲旅。当隆美尔被困时，英国空军的飞机将对其轮番攻击，实施“地毯式轰炸”。这个作战计划，为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设置了一个陷阱，使隆美尔只落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蒙哥马利在制定作战计划时，特别重视部队的后方勤务问题，他经常以后方勤务准备就绪的时间作为确定发动进攻的依据，在北非战场，蒙哥马利深知，突破隆美尔的布埃拉特防线需要速度，而进军的黎波里，关键则在于后方勤务。从班加西到的黎波里为 675 英里，从布埃拉特到的黎波里为 230 英里，必须集结足够的供应物资，以保障部队进军的黎波里的需要。蒙哥马利下令尽快备足供 10 天战斗用的汽油、弹药和供应物资。参谋人员报告说，必需的军需品可望在 1 月 14 日前准备就绪。在制定作战计划时，蒙哥马利充分考虑了这个因素，决定于 1 月 15 日凌晨发动攻势。1 月 4 日，地中海狂风大作，给班加西港带来了严重破坏，港口吞吐量迅速下降，从每天 3000 吨下降到 1000 吨，到 1 月 12 日，吞吐量减少到每天 400 吨。蒙哥马利调集各方面因素，将第 10 军的所有运输工具都抽调来运送作战物资，终于如期运送了作战所需的物资，保证了 1 月 15 日进攻的成功。

蒙哥马利在制定计划时相当慎重，出于需要他甚至屡次推翻上级制定的不切实际的作战计划。北非战役结束后，蒙哥马利开始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制定西西里战役的作战计划。在 1942 年 11 月，英国的参谋长委员会就提出一个进攻西西里的概要计划，该计划可以称作“港口-机场计划”，它要求美军夺取巴勒莫，要求蒙哥马利夺取锡拉库萨。这个计划有一个缺陷，就是不是集中使用兵力，而是十分分散地使用兵力。当时盟军总指挥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原则上同意了这个计划，但是蒙哥马利却不予批准，他认为伦敦制定

的这个作战计划完全是理论性的，背离了实际作战的一切常识性原则，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必须重新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在“港口-机场计划”以后，又先后出台了7个作战计划，蒙哥马利对一个计划也没有感到满意，他全部否决了这些计划，并与第8集团军参谋人员重新考虑了当时的情况，制定了第9号计划——“复活节计划”，蒙哥马利在这个计划中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而且在最高级会议上他拒绝对这个计划作出任何修改，结果他的计划成为最后被采纳的进攻西西里的作战计划。

蒙哥马利在制定作战计划后，决不轻易提前或推迟发动战斗。在阿拉曼占役前，蒙哥马利制定了代号为“轻步”的作战计划，准备在10月下旬对德军发起进攻。9月17日，首相丘吉尔指示蒙哥马利的上司亚历山大，要求进攻必须在9月发起，以配合俄国人的某些攻势以及盟军于11月初在北非海岸的“火炬”登陆计划。亚历山大将白厅的命令通知给蒙哥马利，与他商量如何答复。蒙哥马利认为在9月份发动进攻简直是发疯，因为各项准备都来不及进行，即使进攻也会失败。如果延至10月份发动进攻，他可以保证大获全胜。蒙哥马利还声称，如果白厅执意要在9月份进攻，那么他将辞职。蒙哥马利坚决挫败了首相的干扰，按原定计划发动进攻，从而获得了必要的时间来使部队加强训练和解决重新编组的问题。

在阿拉曼战役中，蒙哥马利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推迟了“增压”作战计划的实施。当时“增压”作战工作已全部准备就绪，但蒙哥马利考虑到：步兵已感到疲乏，侦察需要时间，把不同的参战部队与其支援兵器结合在一起尚有困难。基于这些因素，他将“增压”作战计划的发起时间由10月31日6时30分推迟到11月2日1时5分。由于推迟时间，使部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战斗开始后，步兵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51旅和152旅在规定的时间内夺占了目标。

第二，蒙哥马利的稳扎稳打的战略还表现在：在战前进行严格的训练和演习，使各级指战员了解进攻的方向和意图。

蒙哥马利十分重视对部队的训练，重视实战演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任第3师师长。在整个静坐战期间，他组织第3师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且多次进行夜间行军演习。在训练过程中，他们尽量考虑可能发生的一切意外事件，以便在应付偶发事件时作到心中有数。

在领导第8集团军取得阿拉姆哈勒法山战役的胜利后，蒙哥马利迅速地总结出10条作战的经验教训。同时，他又向整个集团军发布训练指示——第8集团军第1号训练备忘录，并亲自监督所辖3个军进行训练。

隆美尔估计到英军的主要攻击目标将是连绵的德军布雷区战线，他在那里布下了50万颗地雷，这些地雷的威力很大，足以炸断坦克的履带或摧毁一辆卡车，部分地雷还具有毁灭性的杀伤力，或通过电线引爆，或一触即发，接着这些地雷就会像天女散花般的飞向空中爆炸，无数的风球向四面八方飞溅。

针对德军防御工事的特点，蒙哥马利在训练大纲中将扫雷训练作为最重要的训练项目。训练在第8集团军工程指挥官基希准将的监督下进行，英国陆军工兵第3连连长彼得·穆尔少校具体负责训练工作。他们成立了扫雷学校，并制定了一套训练办法。在10月23日以前训练出56组扫雷人员。

鉴于当时部队的训练水平，特别是装甲部队训练水平不高，不能够在战斗中干净利落地实施突破，并在坦克大决战中处于优势地位，蒙哥马利重新

考虑了他的作战计划，提出了一个完全基于不同原则的新计划，即改变先消灭敌人的装甲部队，再消灭敌人的非装甲部队的原则。决定先消灭敌人的非装甲部队，至于敌人的装甲部队，则留待以后消灭。

经过充分的训练，以及根据具体训练情况改变实际作战原则，蒙哥马利在阿拉曼战役中大获全胜。他的对手在回顾阿拉曼战役时，特别指出了英国地雷工兵在布雷区开辟道路的技能，以及坦克与步兵紧跟着推进的技能。他认为第8集团军能够在夜间成功地进行这种机动，表明他们掌握了某种特种技能。他肯定地认为在这次进攻以前，他们一定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训练。

第三，蒙哥马利的稳扎稳打还表现在：只在自己选定的地点迎敌，拒绝在既定的地点以外迎敌。

在阿拉姆哈勒法山战役中，蒙哥马利未令第8集团军乘胜追击。他当时认为，第8集团军中没有一支部队受到充分的进攻作战训练，在进攻作战前，第8集团军需要进行大量的改编和新的训练，也就是说蒙哥马利认为第8集团军还没有进攻隆美尔军队并赢得胜利的能力。他及时结束了战斗，以便部署阿拉曼战役。蒙哥马利的不盲目追击受到一些人的指责，但当时的历史现实证明了蒙哥马利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英军不追击使隆美尔大伤脑筋，因为他既缺乏汽油，又无制空权，只有诱使英军离开阵地，他才能进行有效的反击。蒙哥马利的不追击方针，使隆美尔的反击计划落空，他大骂英军是“猪仔”。

在阿拉曼战役后期，蒙哥马利的下级盖特豪斯报告说，第10装甲师是埃及最强大的师，它拥有完整的B梯队，并已做好准备向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冲击。他请蒙哥马利允许该师向萨卢姆和图卜鲁格推进。但蒙哥马利觉得隆美尔可能会作困兽斗，他不愿冒猛冲之险，也不愿冒被隆美尔踢回之险，他否决了这个建议。针对当时的情况，他写道：“正像一位军官对我说的那样，‘我们过去常到班加西度圣诞节，然后回埃及过新年’，我决心不让这种事情再发生。”

尽管蒙哥马利由于重视稳扎稳打，有时用兵过于谨慎，甚至错过最佳追击时间，但是他指挥的战役几乎全部赢得了胜利，在阿拉曼战役中，他在自己所规定的期限内决定性地赢得了一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而人员伤亡的代价只相当黑格的部队在一战的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所付出的代价的四分之一。阿拉曼战役的辉煌胜利，扭转了盟国反法西斯战争在北非战场的危急局势，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蒙哥马利也以自己的赫赫战功和稳扎稳打的作战风格而彪炳史册。

六、灵活机动超越常规

战场上形势复杂多变，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件。一个指挥官的成功，并不在于按规则或典范来照搬照抄，也不在于对作战原则的因袭套用，而在于根据具体的情况来采取新的作战方针。蒙哥马利在作战中，认为在战场上每种情况都必须被看作一个全新的问题来研究，并做出相应的新对策。要不受常规或传统的约束和限制，突破条条框框，制定出合乎实际的合理而有效的战略方针。

在就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之初，蒙哥马利为鼓舞士气，成功地指挥了阿拉姆哈勒法山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他在三个方面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手段，突破了常规。首先，他摆脱了英军沙漠作战的传统，在战役前对坦克进行了正确的部署，并在战役中对坦克实施了严格的控制；第二，他认识到制空权的重要性，改变了陆空军互不联系的传统，主动与空军合作，使陆军与空军为同一计划同心协力，紧密配合，在整个战役中牢牢掌握制空权；第三，他大量使用火炮，给敌人造成较大伤亡。

就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前，蒙哥马利就了解到隆美尔的精锐部队为装甲部队，要击败隆美尔，第8集团军必须拥有一支装备完善、训练有素的装甲军。蒙哥马利深知当时的第8集团军还远远不具备这个条件，他在作战计划中给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设置了一个陷阱，使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进攻方法，第8集团军都能将他堵住。他严格地控制坦克的使用，并将不同意这种作战方针的第7装甲师师长伦顿撤换。因为在蒙哥马利视察南翼阵地时，与伦顿就隆美尔即将发动的攻击交换了看法，伦顿执意坚持要解决的唯一问题是：由准率领装甲部队向隆美尔发起攻势，他认为自己可以充担此任。但蒙哥马利不准备利用坦克发起攻击，而要让隆美尔的装甲部队撞上来。两人争执良久，蒙哥马利认为伦顿头脑僵化，不能理解他的作战原则，于是决定将伦顿撤职。

蒙哥马利的前任忽视陆军和空军的相互配合，各级指挥官也未认识到空军在战斗中的重大作用，陆军与空军似乎互不相干，相互联系也比较少。蒙哥马利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注意到空军的重要作用，并使陆空军联合作战，紧密配合。在全面计划中，他将空军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战斗中，当隆美尔被困时，英国空军的飞机以密集的队形对其轮番攻击，实施“地毯式轰炸”。大编队的轰炸机对德军的装甲纵队进行无休无止的空袭，卡车、运兵车和坦克都成为空袭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特德派遣他的惠灵顿式轰炸机轰炸了隆美尔用以发动攻击的后方基地托布鲁克，使隆美尔得到补给的最后希望破灭，不得不决定停止攻击。隆美尔不得不感慨道：“谁要是被迫同完全掌握了制空权的敌人作战，即使他拥有最新式的武器，也将像原始人同现代欧洲军队对阵一样，处境十分艰难而绝无胜利的可能。”

同时，蒙哥马利还以空前集中的方式使用炮兵。集中火力从各方面对敌人进行射击，使敌装甲车和各种非装甲车辆损失惨重。在英格兰，蒙哥马利曾用无线电同时指挥大量火炮射击的实验。在这次战役中，他将试验付诸实践，集中火力炮击隆美尔的军队。

在阿拉曼战役中，蒙哥马利又一次超越常规，制定并实施了超越平常作战原则的计划。当时一般公认的作战原则是：在战役计划中应首先着眼于消灭敌人的装甲部队，一旦敌人的装甲部队被消灭了，敌人的非装甲部队就很

容易对付。

蒙哥马利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第8集团军的装甲部队的训练水平还不高，还不能够保证干净利落地迅速突破，并在“轻步”计划所要求的坦克大决战中居于优势地位。因此，他提出了一个不同的作战原则：先消灭敌人的非装甲部队，暂不打他的装甲师，留待以后再收拾他们。他根据这个原则改变了原来的“轻步”计划。

蒙哥马利这个反常规的原则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首相丘吉尔深为阿拉曼战役担忧。他发来电报指出：“发明坦克的本意是为了在敌人机枪火力的威胁下，替步兵开辟道路。现在却要步兵来为坦克开辟道路。在我看来，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火力已经大大加强了。”一些部属军官也对这种改变固有原则的举动能否赢得成功感到怀疑。蒙哥马利全然不理睬这些抱怨，果断而坚决地将作战计划付诸实施，终于赢得了胜利。

蒙哥马利在强渡莱茵河的战役中也采用了超越常规的办法，并取得了圆满的结果。1945年3月，在南起瑞士北迄北海的漫长战线上，盟军逼近莱茵河。蒙哥马利将强渡莱茵河的战役作为最终打败德国人的开端来设计，为第21集团军群强渡莱茵河进行了精心的筹划。按常规，要发动地面进攻，必须首先使用空降部队作先导，蒙哥马利根据当时具体实际，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将常规颠倒，首行使用两栖坦克支持步兵发动袭击，而后出动空降部队。

为了使这个反常规的计划得到顺利实施，蒙哥马利进行了一系列准备。

首先，他将渡河地段选择在莱茵河下游威塞尔附近。为确保强渡莱茵河万无一失，他运用诈敌术，在伪装的掩护下，将大量的人员、装备秘密运送到沿河一线。当时秘密屯集了11.8万吨的各种各样的供应物资，13.8万吨的弹药。发动进攻前的一周内，662辆坦克、4000辆装甲运输车 and 3.2万辆的其他车辆的大部分都在夜间进入了阵地。皇家海军的36艘登陆艇也通过欧洲大陆的公路运到了前线。所有这一切都经过精心伪装，使敌人无法察觉。

同时，蒙哥马利检查了部队的后勤状况，发现情况良好，汽油、武器和粮秣供应均极充裕，部队健康状况极佳，发病率平均每周每千人不到6.75人。战前，蒙哥马利发布了致第21集团军群全体官兵的信，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敌人自以为莱茵河天险难渡，能保其安全，我们也承认这是条天险，但我们要让敌人看到，这决不能保障他们的安全”，我们这支由陆空军组成的强大的盟军战斗部队，将毫不犹豫地攻克这一天险。

3月23日，蒙哥马利以美第9集团军为右翼，英国第2集团军为左翼，准备突破30英里的河防，当晚10点半，3500门大炮向莱茵河对岸轰击，200多架轰炸机轮番投掷了1000吨炸弹，然后4个师开始强渡莱茵河。24日凌晨，空降作战行动开始，运载空降部队的有飞机1500多架，滑翔机1300多架，还有889架战斗机护航。在空降目标地区的上空，另有2000多架战斗机组成一道防御屏障，阻挡德国空军的偷袭，近万名伞兵按照指示，有条不紊地陆续降落，占领威塞尔附近的重要据点，并迅速会合已经渡河的地面突击队，扫荡残敌，德军防线迅速崩溃，盟军从此开始向德国本土挺进。

强渡莱茵河，是蒙哥马利作为一个统帅的光辉杰作，也是在他指挥下忠诚战斗的部队的壮举。这次战役，充分体现了蒙哥马利的谋略，欺骗计划与稳扎稳打水乳交融，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不囿于常规，不受过去作战方略的束缚，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机动灵活的谋略，确立相应的合乎实际的战术手段，以赢得胜利作为最终的目标。

七、大处着眼，总体布局

在戎马生涯中，蒙哥马利不断地寻求简单明了的办事方法，他总是从大局出发，使自己的头脑摆脱一大堆琐碎事务的纠缠，从一大堆与作战相关的因素中抓住主要问题，至于一切具体工作，则交给参谋人员去办。

蒙哥马利认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必须首先为自己设想的战役制定了个总体的计划，并且必须预先考虑和计划两次战役。他务必头脑清楚，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保持冷静。在制定计划时，他必须将战略需要同战术可能和归他指挥的兵力联系起来加以综合考虑。军事行动计划必须由指挥官亲自制订，参谋人员不能把想法强加给他。制定好总体计划后，指挥官必须退居一边，抽出时间来思考主要问题，他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如何才能保证总体计划的基本原则与基础不因大量具体事务的耽搁而遭到破坏。

指挥官制定的作战计划，必须十分细致彻底，要考虑到各种偶发事件。计划一经制定，就得毅然决然地付诸实施，以取得成功。

在战斗打响以前，指挥官必须决定仗应该怎样打，并且必须决定如何使用自己所拥有的兵力，使战斗按自己的意愿进行。

在战斗打响前，必须将中校以上的各级指挥官召集起来，讲清主要问题、作战意图以及作战计划，并大致讲一讲准备怎样打，应该怎样按他的要求去打，使整个集团军都明白作战要求，以及怎样投入战斗。

一在战斗中，指挥官必须亲自指挥。指挥方式可以是实地视察下属司令部，并给以口头命令。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传达不同的口头命令，使指挥官与下级之间充满信任。

蒙哥马利善于抓住主要问题来加以考虑，他能够敏捷地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对于一个高级指挥官而言，最严峻的考验是看他能否迅速掌握一个军事问题的要领，敏捷地作出判断，使一切有关人员都能够明白无误地知道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

蒙哥马利沉着稳重，头脑清晰，他总是善于把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几个要点，然后逐步进行分析。为使自己保持头脑清醒，以迅速地作出准确判断，蒙哥马利只看很少的文件和书信，他从不为处理他的军队的事务而熬夜，他吃完晚饭后，就开始就寝。蒙哥马利有一个著名的习惯：他白天在外巡视前线，随时发布命令，晚上回他的指挥部会见他的参谋班子并发布命令，然后进餐、就寝。他指示部下，除非情况紧急或有非常重要的理由，一般不容许别人打扰他的睡觉。他的这种习惯招致了不少非议，但却使他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准确地作出判断。

为使自己摆脱具体事务的纠缠，以集中精力处理重要问题，蒙哥马利建立了富有效率的参谋部，将一切具体工作都交给参谋人员去办。他在亲自制定好作战计划后，将有关战斗的具体事务交给参谋人员去处理，并由一个优秀的参谋长来负责协调各方面的工作。蒙哥马利一再强调，在现代最高统帅部中，要赢得胜利，司令官必须有个优秀的参谋班子，而且还需要有一名第一流的参谋长来协调其工作。

蒙哥马利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之初，就开始着手建立一个优秀的参谋班子。当时陆军里不设参谋长这一职务，司令部配备若干高级参谋，由总司令负责协调参谋们的工作。蒙哥马利认为不设参谋长，使统帅头脑全部被用来考虑琐事，以致看不清主要问题，不利于使统帅总揽全局，从整体上把握情

况。在与德·甘冈接触中，蒙哥马利了解到德·甘冈具有第一流的头脑，并且工作效率极高，而且他对蒙哥马利的工作方式与作战方针都十分了解。如果让这位头脑敏捷而清醒的人来处理有关参谋业务方面的细致而复杂的问题，那么蒙哥马利就可以集中精力指挥作战。

上任伊始，他就发表讲话，决定任命德·甘冈为第8集团军参谋长，并授权德·甘冈管理整个司令部，德·甘冈发出的命令应该被看作是由蒙哥马利发布的，应该立即执行。

蒙哥马利还采取果断措施清除那些被他诊断为“朽木”的军官，晋升或引进年富力强的新人，使他的参谋机构充满效率。历史记录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何一个集团军的参谋机构恐怕都无法与蒙哥马利的参谋机构相媲美。

蒙哥马利不仅使参谋机构的工作富有效率，而且力主使高级参谋人员与部队保持接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高级参谋人员一般不同团部军官和部队士兵接触，他们生活舒适，但是与部队缺乏联系，对士兵缺少同情心。蒙哥马利身经一战，对这种前线与指挥部间缺乏联系而造成触目惊心的伤亡的状况记忆犹新，战争的经验使他确信，参谋部必须为部队服务。他的参谋人员经常到前线去了解情况，为部队服务。

蒙哥马利为了选拔优秀的参谋人员和军官，将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用于人员的考虑上。他知人善任，经常对下属进行全面考察，并且亲自掌握着营团级在内的指挥官的任免权。每到一个新的机构，他都要对人员进行调整，将他诊断为“朽木”的军官果断裁撤，并换上一些年富力强、有事业心和责任心，能够理解他的作战意图的军官。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期间，他裁撤了科贝特、多尔曼、史密斯、拉姆斯登、伦顿等军官，从英国调来了霍罗斯、柯克曼、休斯、威廉斯等人。

任第21集团军军长时，蒙哥马利发现第21集团军司令部尽管已建立4年，但从未见过世面，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司令部的许多高级参谋墨守成规、因循保守。面对多少有点死板的参谋气氛，蒙哥马利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在旧有的机构里注入新鲜血液，即补充富有战斗经验的参谋人员。蒙哥马利把从意大利带来的高级军官，分别安置在一些部门的领导岗位，由参谋长德·甘冈领导展开工作。这些更换招致来流言蜚语，伦敦各俱乐部均称“绅士们被撵了出来，选手们进去打球了”。蒙哥马利全然不顾这些流言，依旧我行我素，终于建立起一个高效的、为他所用的参谋部。

蒙哥马利精于选拔部属，他的选人标准绝不是随心所欲的，也不是单凭个人的好恶来决定人的优劣的。他选择军官的标准是：过去的成绩、领导才能和工作能力。他在视察部队的过程中，尽可能多方面地了解所有的指挥官，坚持依据高标准来选拔军官。在选拔军官时，蒙哥马利具有一种宽容的精神，他能够容忍优秀军官的一些缺点。蒙哥马利不抽烟，不喝酒，不好女色，是一个纯正的加尔文派教徒。但他的参谋长德·甘冈却是一个喜欢吃喝玩乐的人。蒙哥马利并不因德·甘冈的吃喝玩乐而排斥他，而是十分赏识他的才能，给他以充分的信任。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欧洲，他们两个都配合得相当默契。

蒙哥马利通过严格标准选定了优秀的指挥官以后，就给他们以绝对的信赖和最大限度的支持。他认为任何指挥官都应该得到他的直接上司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新军官在新的岗位上特别需要帮助和指导，上司有责任对他们

加以关心，正是由于蒙哥马利知人善任，他手下的许多参谋人员和军官追随他南征北战，取得了赫赫战功。

八、建立“武装的兄弟大家庭”

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时，蒙哥马利得知一个士兵称第8集团军为“武装的兄弟大家庭”，他十分喜欢这个称呼，他把自己比作这个大家庭的头头，说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穿我们爱穿的衣，做我们爱做的事，而我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胜利，即以最小的伤亡赢得胜利”。蒙哥马利总是在军营中努力营造一种环境和气氛，使士兵们感觉到他确实被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他在部队里起着一个人的作用，从而激发他的斗志。

蒙哥马利认为，打胜仗的关键，不仅仅是要提供坦克、大炮和其它装备。优良的坦克和大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坦克里面和大炮后面的人。打胜仗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人的因素。他确信，假如指挥官所指挥的士兵机警灵活、坚韧不拔、刻苦耐劳、训练有素，加上身体健康、积极乐观、渴望杀敌，再给以适当的武器装备，这样，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

如何激发士兵的战斗激情，方式多种多样。蒙哥马利指出，军队的基本成分是人，要把部队带好的首要前提是必须懂得人的本性，必须了解每个人的内心都蕴藏着巨大的情感力量，要发挥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必须采取切实的深入人心的方式，使每一个士兵都感到温暖，以激发他们的热情。“如果对于人的因素保持冷漠无情的态度，就将一事无成。”

无论是在一个排，还是在一个连，在一个集团军，蒙哥马利都注意关心士兵的生活，爱护士兵的生命，激发他们的战斗热情。

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期间，他改变了高级司令部人员不与前线士兵接触的状况，尽可能多地视察阵地，让部队官兵看到他，并给他们以胜利的信心，消除了以前前线和司令部之间出现的令人痛心的信任鸿沟，将第8集团军改造成成为所有盟军军队中最明达、最自信和最朝气蓬勃的一支部队。

蒙哥马利首先从关心军营里士兵的生活着手，来赢得士兵的信任。

驻军埃及时，作为一名上校，蒙哥马利努力使全营官兵在于热枯燥的环境中能够快乐和满足，他鼓励各种嗜好，其中一项就是放养鸽子，他认为对于一个士兵的真正考验不在于他能否很好地站岗放哨或逛不逛窑子，而重在他在战场上如何行动。因此他甚至鼓励士兵去玩女人解闷。

驻军朴次茅斯期间，为改善已婚军人的家庭福利，蒙哥马利差点断送了自己军中的前程。当时，已婚军人的家庭福利急需改善，但缺乏资金。为解决资金来源，蒙哥马利决定将座落在南海公地的克拉伦斯足球场出租给准备在8月份银行休假周举办展销会的发起人，此人开始愿出1000磅，最后双方以1500磅成交。朴次茅斯市政当局风闻这个计划后，拒绝批准在南海公地上举办展销会。蒙哥马利亲自去见朴次茅斯市市长，提出只要市长在市政府里批准举办展销会，他愿出资500磅，以支援市长推行的一个小型计划。市长在市政府里批准举办展销会，蒙哥马利得到1000磅资金，他将所得的1000磅用于改善已婚军人的家庭福利。陆军部得知这一事件后，指出蒙哥马利出租陆军部土地的行为违反了陆军条例，并声称若蒙哥马利将1500磅立即全部上缴，将免于追究责任。蒙哥马利已将1500磅资金全部用掉，他出示了所有收据。陆军部决心要处分蒙哥马利，但当时的南方军区总司令韦维尔，对于蒙哥马利敢于冲破陆军部的常规，采取措施积极改善驻军福利的行为十分赏识。他坚决支持蒙哥马利，陆军部与南方军区间的公文往来的卷宗越来越厚，但蒙哥马利最终还得到提升。

任第2师师长时，蒙哥马利十分关心士兵的生活，尤其是关心他们的伙食。当时整个英国远征军只能获得一半的食品定量，为不使士兵饿肚子，蒙哥马利命令军需官向当地村长征用粮食和菜牛。他的师拥有随军牛群，并设有屠宰房，因而有“活的配给牛肉”，从来不缺肉吃。

任第5军军长时，蒙哥马利不准军人家属随军，但同时又规定，军官可通过正常方式请假，回家探亲。同时，他十分注意改善士兵的生活条件，使他们经过紧张严格的训练后，能够住上舒适的营房，享用可口的食品，并能够用热水洗澡。

蒙哥马利到达第8集团军总指挥部后，他深为当时指挥部的简陋和苍蝇乱飞的状况所震惊，当天晚上他就提出搬迁指挥部和改善官兵生活的具体措施。

北非战役中，正逢1942年的圣诞节，蒙哥马利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准备在圣诞节以后再发动攻势。为使官兵们过好圣诞节，部队订购了大量的火鸡、葡萄干、布丁、啤酒等物品。蒙哥马利还特意发布了充满温馨的祝福和富有人情味的圣诞文告。在圣诞文告中，他说：“值此圣诞佳节，我们每人都思念国内的亲友，谨向你们致以最好的祝福，并预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生活十分愉快。”在圣诞文告中，他全文引用了约克郡一个名叫赫尔的姑娘寄给他的圣诞贺卡的内容，并且说，我愿告诉她，我们大家将竭尽所能地再接再厉。

蒙哥马利朴素简洁的圣诞文告，在军队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圣诞节过后不久，蒙哥马利收到一位二等兵的来信，这封信中说，在部队里过去从未宣读过这种对部队充满信任和信心的文告。这种充满人情味的个人文告比任何每日命令的收效都大。因为圣诞文告表达了亲人般的友情和温暖。这种平易近人与朴实无华的圣诞文告，使第8集团军官兵感受到这个“武装的兄弟大家庭”的温暖，并为成为其中的一员感到骄傲。

蒙哥马利不仅关心士兵的生活，而且力求对士兵讲真话，他认为这两点是赢得士兵支持的关键。他指出，领导要树立威信，就必须对下属讲真话。假如他不讲真话，他的下属就会很快发觉，对他的信任也就会随之动摇。战争年代，出于保密的需要，不能将全部真相告诉士兵，但蒙哥马利力求将士兵必须知道的真相全都告诉他们，并且做到准确无误。这样既取得了士兵的信任，又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完成任务。

在战争中，经常会出现伤亡，蒙哥马利珍惜士兵的生命，尽量将伤亡数减到最低程度。在制定作战计划时，蒙哥马利严密审慎，在战斗中力求稳扎稳打，从不侥幸冒险。在1939年至1945年间，蒙哥马利在与官兵的接触中，深知在拯救士兵的生命的过程中，有四件事关系巨大，他采取措施在部队中加以实施。这四件事一是输血。二是在前线做好外科手术，使重伤员立即得到医治，不必经公路送往医院。三是把伤病员直接空运到数百里以外的后方基地医院，以免公路和铁路的颠簸。四是派遣女护士到前线工作。有女护士在场，可以使很多伤病员得到安慰，并使紧张的神神经安定下来，因为他们知道将会受到恰当的护理。

蒙哥马利认为一个优秀的将军应该将上述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牢记心间。1942年，他接管第8集团军时，有不准女护士上前线的禁令。蒙哥马利取消了这个禁令。

关心士兵生命的行为在蒙哥马利的稳扎稳打的谋略中也得到体现。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哥马利以稳扎稳打见长，在未做好精确计算和周密准备，不能确保胜利的情况下，他绝不轻易发起战斗。在他的部队里，士兵们都下意识地感到，他们绝不会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多次出现的那样，被派去进行无望的、准备得很差的冲锋。

蒙哥马利还经常不避风险，亲自到前线视察，他极端蔑视高级司令部人员不与前线士兵接触的现象。在一战中，“将军和士兵们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我从未见过英军总司令，不论是弗伦奇还是黑格，而集团军总司令也仅见过两次”。蒙哥马利认为这种不接触是十分有害的。从提高士气的角度出发，蒙哥马利尽可能多地到士兵中去，使部队的官兵能够常常看到他。他经常戴一顶富有特色的帽子，使士兵能够一眼就认识他。初到第8集团军时，他戴一顶澳大利亚军帽，后来又戴上坦克部队的黑色贝雷帽，帽上的两个帽徽最初是坦克团开玩笑送给他的。从此，双徽贝雷帽成为蒙哥马利的标志，他便由于这不同寻常的双徽贝雷帽而被所有的士兵认识。蒙哥马利不仅亲自到前线去与士兵交谈，而且也促使他的军官们亲临前线。第8集团军的前线部队常常能够看到配置红带的军官。

蒙哥马利不仅重视改善士兵的生活，珍惜士兵的生命，而且他还十分注意对士兵进行严格训练。他认为，人不仅仅是为了面包而生活，当要求士兵们大胆克服艰苦的条件时，他们的士气最高。

战前严格训练在别处已谈过，这里略提几句。蒙哥马利在战前总是要到部队中去了解士气是否高涨。他每次视察部队时，总是叫士兵们脱下他们的钢盔，这并非要检查他们是否理过发没有，蒙哥马利是要在他们眼神里，看是否闪烁着战斗意志的光辉。他认为，在战斗中，士兵必须具有旺盛的战斗意志和乐观情绪，而这一切都来自健全的体魄，健全的体魄则得之于严格的训练。

蒙哥马利在重视严格训练的同时，特别注意采用各种方式鼓舞士气，使不论喜欢或不喜欢战争的人，不论是职业军人，还是非职业军人，只要在他的领导下，都乐意投入战斗，并具有赢得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在盟军准备进攻欧陆前，蒙哥马利受命担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他参与制定了“霸王”行动计划。登陆前，为了使即将参战的官兵对未来的登陆充满信心，蒙哥马利不拘形式，视察了即将参加“霸王”行动的每支部队。他每天检阅部队两三次，每次视察万把人或者更多的人。检阅前，他先同各部队的指挥官个别谈话，把即将开始的规模巨大的作战行动的主要问题，逐个交给中校以上的全体军官，使他们心中有数。

在视察部队时，受阅部队排成方阵，蒙哥马利缓步通过行列。以使每个人都能够看到他。最后，他站在吉普车头上，发表十分简单平实的讲话，告诉部队要同心协力地完成面临的任務，并告诉他们德军是如何打仗的，怎样才能击败德军。他还向士兵保证，只要对作战计划有信心，官兵相互信任，就一定能够胜利完成任务。

通过上述方式，蒙哥马利视察了在英国即将参战的部队。几乎所有即将参加诺曼底登陆的官兵都见到了他，并且听到过他的讲话。被他检阅的人不仅包括英国人，还包括美国人、加拿大人、比利时人、波兰人、自由法国人和荷兰人，被检阅部队的人数超过了100万。这种不辞劳苦的视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官兵们对他的信任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即将投入战斗的士兵都将蒙哥马利当作英雄来崇拜。他们一致认为，他的友好、真挚的感情和朴实

的作风吸引了全体官兵，尤其令他们感动的是“将军看望了部队的每个战士，告诉他们说他比谁都急干早日结束战争，让大家回家团聚”。

蒙哥马利还通过在战前发布文告的形式来鼓舞士气。他认为士气在战争中是件大事，战前必须将士气鼓足，使官兵们情绪高昂，精神振奋，怀着胜利的信心投入战斗。在领导第8集团军进行阿拉姆哈勒法山战役前，蒙哥马利发布了《第8集团军司令告全军官兵书》。在这个文告中，他鼓励士兵说：“现在我们准备好了，我们马上要打的仗将是历史上的决定性战役之一！它将是战争的转折点。”他又向士兵说明了当时的装备情况，使他们树立起必胜的信念。他说：“我们拥有第一流的装备、高质量的坦克，强大的反坦克炮、为数众多的大炮和弹药，并且还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空中部队的支援。”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能“早日打胜这场战争转折点的仗，我们就能早日回家团聚”。

蒙哥马利熟练地掌握了“上下同心，其利断金”的谋略，努力建立一个温馨的富有人情味的“武装的兄弟大家庭”，他将每一个士兵都当作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从各个方面来关心士兵的生活、珍惜士兵的生命、鼓励他们的斗志，使他们感到作为人的尊严，充分发挥作用，积极参与战斗。蒙哥马利以独特的关心士兵的谋略使他赢得士兵的信任和爱戴，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夏尔·戴高乐谋略

夏尔·戴高乐这位在法国历史上曾两度出任总统的传奇式人物，不仅在反对法西斯侵略和光复法国、重振法兰西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令人敬佩，而且还具有令人敬畏的风采，从身材、智力到记忆力都超群出众，他是许多人敬慕的英雄。

1890年11月20日，戴高乐出生在法国西北部边境城市里尔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这个世代殷实的贵族之家，具有恪尽职守、为国效忠的传统，他的父亲是耶稣会学校的教师，珍视正义、公道，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对童年的戴高乐影响极大。他酷爱军人职业，1912年从圣西尔军校毕业后，便开始了他的军事、政治生涯。三十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军事理论著述，可惜这些建设性的战略思想没有被法国军事统帅部重视和采纳，而历史却证明了戴高乐的远见卓识。

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贝当卖国政府投降前，戴高乐毅然离法赴英，在6月18日的伦敦发表了他著名的广播演讲，勇敢地举起了反法西斯战旗，从此成长为一名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战后他在11年的两届总统任职期间，奉行独立、自立的外交政策，反对强权政治，反对美国控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反对美帝称霸世界，尤其是圆满地和平地完成了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地化，这是戴高乐一生的英明壮举。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因心脏病猝然去世。毛泽东主席致电戴高乐夫人表示哀悼。蓬皮杜总统高度概括了戴高乐光辉的一生：“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戴高乐那无畏无惧、顽强不屈的奋发精神，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品格，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坚定信念，俭朴无私的作风，为法国人民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在世界上树立了法兰西的崇高形象，他被公认为法国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一、“军队是座堡垒”

法国在被普鲁士打败后的 25 年间，整个国家热爱军队，把它比作一切希望所在的“圣约柜”。著名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当时曾大声疾呼：“如果人类社会里有人人都赞赏的神圣东西，那就是军队。”热血青年以从军为荣。在复仇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驱使下，生性好斗的戴高乐向往成为军人。

1909 年他考入圣西尔军校，他认为“军队是座堡垒，它将决定一切，如果堡垒倒塌，只有依靠它本身才能把漏洞补上，在动荡分裂的国度里，如果有复兴的希望，这个希望必将通过军队并且首先在军队里产生”。按国防部的规定，新生入校前必须先当一年兵，戴高乐的这一年是在驻阿拉斯的 33 步兵团 9 连度过的。在圣西尔军校他的勤奋好学，惊人的记忆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他则以维克托·雨果的一段话“风格简洁、思想精确、遇事果断”为座右铭严格要求自己。1912 年戴高乐以少尉军衔毕业，按校方规定，学生毕业后可在一个团供职，戴高乐决定回到当年见习士兵生活一年的 33 步兵团。这时的新任团长是后来当了元帅的菲利普·贝当上校，戴高乐幸运地受到贝当的青睐。这是他出人头地、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外因。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由于立场、态度完全对立，而最终分道扬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血洒疆场，三次负伤，最后一次是 1916 年 3 月 2 日，在图奥蒙前线，他率领连队与敌拼刺刀，受了重伤。在法国，人们以为他已经牺牲了。贝当将军甚至为他颁发了死后的荣誉勋位勋章，并表彰戴高乐，“实为各方面均无与伦比的军官楷模”。但他没有死，而是被德国人俘虏了，并在德国战俘营一直呆到战争结束。1918 年，戴高乐重获自由。这期间，他并没有松懈自己，而是以极大的专心关注着战争的演变情况，开始了军事思想的积淀。

战后，戴高乐去了波兰。正是在这段时期，他第一次提出了在空军的紧密配合下使用步兵和坦克联合作战的论点。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军事理论，该思想得到了波军军界上层人物的重视。而后不久，法国陆军部长决定召回戴高乐。1921 年，31 岁的戴高乐在圣西尔士官学校教授军事史，看到自己从 14 岁立志从军到今天还没有干出一番大事，他内心是不平静的。历史上在他这般年岁，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已征服了半个古代世界；拿破仑已经当了好多年将军，驰骋天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奥什已经有四年大元帅的称号，相形之下，他觉得让自己发挥军事才干的机会太少了。但他却感到时运正在向他走来，他决心潜心钻研军事科学，在这方面发展自己。

1922 年，戴高乐进入法国高等军事学校。这时期他的超前的军事思想和演说家的才华已初露端倪。当时学校使用的教材几乎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编写的，它重点强调作战必须在事先准备好的阵地上，在炮兵强大火力的支持下进行，战略思想以单纯防御为主。戴高乐毫不掩饰地提出异议，于是，首先与军校校长穆瓦朗上校冲突。这位校长的战术思想基本上是静止的，形式主义的。他认为一个司令官职责就是订出最详尽的计划，并且一旦执行就坚决贯彻到底。这种机械、呆板的阵地战显然是落后了。戴高乐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下一场战争将是坦克战，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意味着将来的战争必定是以运动战为主。然而，这在当时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戴高乐在众教官面前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但他还是坚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1924 年 6 月 17 日，戴高乐在军校最后一次演习中受命指挥“蓝

军”，他率领高度灵活机动的地面部队进行了闪电式的进攻，打得“敌人”狼狈不堪，用事实推翻了穆瓦朗校长的消极防御理论。更让校长恼怒的是戴高乐拒不回答校长向他的提问，而居然让战术演习中的一名下属去回答。穆瓦朗怒不可遏，大声斥责道：“可我问的是你——戴高乐！”

戴高乐泰然自若地回答：“上校，你已经将指挥一个军的任务交给我了，如果除此之外我还得承担属于我下属的任务，那我就顾不上考虑怎样完成我的使命了。杀鸡何以用牛刀。”说完，戴高乐又对下属夏托伊厄命令道：“请你回答上校的问题。”

戴高乐性格刚强，与人不好相处的个性正是在军校生活期间定型的。当1924年戴高乐上尉从这所学校毕业时，考试委员会的委员们尽管都认为，戴高乐是一位天赋极高的军官，他那非凡的记忆力，渊博的知识，果断的作风和迅速判断形势的能力，无不令人赞叹。但是，多数委员认为他难以共事，自命不凡，不听批评，甚至不愿与人商讨问题，从而使他的优点大为减色，最终以“良好”成绩毕业，并被派往远离巴黎的莱茵军参谋部工作。如果戴高乐能以“优秀”成绩毕业，他就会被调到向往已久的总参谋部第3局（计划局），把他的战术和战略思想付诸实践。没有去成第3局，戴高乐闷闷不乐，这是继他在德国遭受监禁而蹉跎岁月之后，在他军人生涯中所遭受的第二次挫折。

虽然军校的裁决有伤戴高乐的自尊心。但是这件事都从两个方面得到了补偿——使他有机会在自由的条件下重新研究德国人民；同时也使他有机会根据机械化战争的观点创建机动装甲部队。机械化战争的观点最初是法国将军埃斯蒂安提出的，但是戴高乐本人在被俘期间又独立地发展了这个观点。几个月来，戴高乐一直利用余暇核对和改写他的狱中笔记，其成果就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此书在1924年出版。这是戴高乐第一次值得纪念的成就。这是一部思想严谨、分析深刻的军事著作。戴高乐以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亲身体验和经验，特别是身系囹圄在德国战俘营的遭遇，对德国的国情、军情、民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这是戴高乐成长为一名目光敏锐、切中时弊的军事思想家的开始。《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的出版，大大提高了戴高乐上尉的声誉。

1925年秋，戴高乐终于被调到美国因兹最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办公室任职。委员会的副主席就是贝当元帅。这位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自1913年以来，对戴高乐的杰出才能一直十分欣赏，戴高乐对高等军事学校的陈旧理论所持的鲜明态度，使贝当回想起自己单枪匹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流行的错误理论进行长期斗争的情景。

此时的戴高乐更加有机会接近最高军事决策机构。1927年戴高乐被提为少校，受命指挥第19轻步兵营，驻防特莱夫，这是他自1915年被提升上尉以后的12年来，一直枯坐冷宫的一个转折。总司令部的步兵总监马泰将军在谈到对戴高乐的新任命时说：“我给他们派去的那个人是法国军队未来的大元帅。”而对戴高乐的任命本身是打破常规的做法，因为按照惯例，只有当过轻步兵的人才资格指挥阿尔卑斯山地的一个轻步兵营。由此可见，马泰将军是十分赏识戴高乐的。

严格他讲，戴高乐也许此时尚未作出成就，但他决意凭借他指挥的那一营人马干出一番事业，果然，不出几天，戴高乐就成了他属下721名官兵崇拜的偶像，被戴上了“荣誉轻步兵”的桂冠。他严于治军，一丝不苟。士兵

们不是进行演习，就是处于警戒状态，再不就是搞队列训练、打靶，或各种竞技活动，目的是营造一种严格的军纪作风。在不搞强行军或其他紧张的军事训练时，戴高乐就要求他们开展各种体育比赛，参加戏剧表演或者组织联欢活动，把紧张、枯燥的军旅生活安排得有张有弛，丰富多彩。与此同时，这位哲学家营长也没有忽视他的士兵在智育方面的素质培养。士兵们常常可以听到戴高乐少校精彩的演讲。

按照轻步兵条例，并没有规定要戴白手套，但戴高乐自从圣西尔毕业后，就养成了戴白手套的习惯，这已成为他服饰的一个特点。为此，伊冯娜·戴高乐在家里为丈夫准备好一大摞雪白的手套。戴高乐还经常标新立异。按照传统，轻步兵戴的贝雷帽一律往左偏，而他却偏偏喜欢让他的帽子朝右歪，这样一来，他的700多名下属也只好依样画葫芦。

青年戴高乐酷爱军人职业，他不惧怕权威，敢于用自己的智慧向传统挑战；他坚韧不拔、果断的个性，善于思考勤于钻研的学者精神，和对未来的充满信心，正如他后来自己写道：“总之，我毫不怀疑法国将经受巨大考验，生命的意义在于有朝一日能为她作出自己的重大贡献。我相信我会有这个机会的”。

二、“向职业军队迈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虽然因为战败而受到严重削弱，但它毕竟是一个欧洲大国，有 6000 多万人口，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巨大的经济潜力，英美垄断资本的扶持，大量的外国资本，巨大的工业潜力，加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德国的工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经济实力日益增长的同时，德国还采取种种手段，重整军备，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面对德国军国主义的重新崛起和法国的现状，戴高乐运用他敏锐的眼光，看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情况，不得不忧心忡忡。他看到，法国政府几乎完全瘫痪；政治经济日益恶化；军队的陈旧、官僚、僵化；军事理论、训练和装备自从 1870 年以来就很少发生变化，自 1918 年以来变化更少；最后还有一个盲目坚持防御战略和坚固设防信条的参谋部。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阿道夫·希特勒正进行大规模重新武装，怀有明显意图准备将凡尔赛和约踩到脚下去的时刻。显然，法国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措施恢复有利于自己力量的平衡，她将在新时期面临致命的危险。戴高乐决心和一些与自己见识相同的人努力唤起法国公众舆论警惕日益增长的外来危险，居安思危。除此之外，经过长期的思考和观察之后，戴高乐再次坚持坦克将对未来的战争产生重大的作用，竭力主张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便抵御即将临头的、来自莱茵河彼岸的进攻。但这并非是一个受大家支持的建议。

1934 年 5 月，戴高乐出版了一本题为《向职业军队迈进》的书。这是一本各方面都很杰出的书，倾注了戴高乐忧国忧民的一片赤诚之心，集中体现了他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这本书一开头就描绘了法国的地形，令人信服的指出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是个明显的薄弱环节。正如他所分析的，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为屏障；而意大利则受到阿尔卑斯山的保护，相比之下，法国的“心脏”巴黎却对任何来犯之敌敞开着大门，因为巴黎周围的平原开阔平坦，不易防守。

从地理角度，戴高乐全面论证了法国东北部边界的极易受攻击性。多少年来这条边界线一直是入侵者得以直捣法国心脏的一条最近便和最直接通道。

“篱笆上的这个大漏洞是祖国千百年来弱点所在。……在这条致命的大道上，我们刚刚埋下了祖国三分之一青年人的忠骨。……这个防卫如此不严的国家，至少应该有所警戒了吧？然而 20 个世纪以来的回答是，否！”

现在法国仍然想依靠单纯防御来保卫自己。在危急时刻，大规模募兵的制度已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服役期一再缩短。国家机构的软弱与法国人内部明显的分裂倾向，使这幢已经不稳的大厦更加摇摇欲坠。那么，法国的出路在哪里？

戴高乐认为，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可靠的防御措施不是构筑要塞，而是建立一支由 10 万人组成、分编成 6 个机动装甲师的精悍的职业军。这 10 万名年轻、忠实、可靠的人组成的军队，将足以使法国恢复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中失去的机动性和战斗力。

具体的战略方针是由 6 个新型的、装甲化、履带化和完全机械化的师，组成法军的尖刀部队。每个师又由 3 个旅组成：第一旅配备 500 辆装甲坦克，以攻占敌阵地为目标；第二旅是机械化步兵旅，任务是占领阵地；第三旅是

炮兵旅，目的是掩护其他两个旅。全师还有一个侦察团、若干个工兵营、通信营和伪装营的辅佐支持。总之，这是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具有强大的机动性、杀伤力和突破任何防线能力的精英部队。它是能够在危险时刻，保卫我们脆弱祖国的一把利剑！法国必须毫不迟疑地获得它。然而，6年之后，德国军队用事实说明他们懂得并且乐于接受戴高乐的建议，而法国最高统帅部却对此熟视无睹，置之不理。

戴高乐传记作者国际问题评论家布赖恩说，戴高乐之所以值得大加赞扬，并不是因为他发明了前人已经开创的一种战术，而是因为他具有远见卓识，能够抛弃旧观念，接受新思想。顶见到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拥有最精锐的装甲部队的一方将取得胜利，并不顾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敌意，以非凡的勇气坚持建立机械化部队的主张。他不遗余力地为此奋斗，他的事业得到了一些忠实朋友的支持，却遭到了当时陆军部队——不是别人——正是贝当元帅的反对。1934年已经是87岁的老人贝当，尽管身体还很健壮，但思想早已僵化，很难再接受新思想。他与戴高乐的关系也慢慢变坏甚至恶化。

实施职业军队计划的最大障碍在参谋部。参谋部主要是由一些老将所组成，他们唯一的信条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术：在炮兵的大力支持下，步兵在漫长的战线上，泥泞的战壕里，缓慢推进。这些人不需要戴高乐的计划，认为这个计划会在军队内部造成分裂，损害步兵的士气，削弱稳定的防卫，而最严重的也许是将危及他们自身的职位。至于坦克，他们认为法国目前的数量已经足够，也就是说，像1918年那样足够配合步兵使用的。贝当、魏刚、甘末林，这几位法国军界首脑都持此观点。贝当曾写信给军事委员会：如果我有200架战斗机来防御敌人进攻，有200架强大的轰炸机进行报复，每架载两吨炸药，航程1000公里，到了那一天，和平就有保证了。

这些陈旧的军事理论，僵化的思想体系的具体实现便是耗资25亿法郎建造的马奇诺防线，而事实上，这条花费巨额的防线受尽嘲讽，因为它并没有起到真正的军事屏障的作用。正如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威廉·夏伊勒所指出的：“马奇诺防线的麻烦在于设立的地点不对。……德国人从最早的部落时代起；就采取的入侵法国的标准路线……是穿过比利时。这条路线最短、最好走，因为它的沿途平坦，没有需要渡过的河流。德国人在1914年又采取了这条路线。已故英国将军、军事著作家富勒说，马奇诺防线是“一面盾牌，它缺乏一把利剑，而法国野战军是一把扫帚柄”，空军就更不值一提。这就是法国军界权威思想的现实体现，这就是法国当时的国防实力。

当1935年末，德国建立了第一支装甲师，并准备再建立几个师。翌年初，希特勒重新又占领莱茵河地区的时候，法国竟没有任何反应。不久，德国已拥有3个装甲师，德国的空军、陆军也以疯狂的速度在发展。1938年春，奥地利被吞并后，捷克受到直接威胁。但在法国，人们却始终拒绝军队现代化，而满足于守卫在虚幻的和不完美的盾牌——马奇诺防线之后。

法国的当权者曾经历了一场基本上是在法国国土上进行的世界大战。战争的残酷和巨大的灾难，使他们痛苦地意识到法德之间是不能再战了。法国无法与德国抗衡。那么，戴高乐的进攻性计划则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在道义上是错误的，相反，尽管法比边界上的空档极易招致侵略者的进攻。构筑纵深绵巨的要塞工事在道义上则是无懈可击的。这种消极的、软弱的落后观念，给法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戴高乐面对国内强大的政治、舆论反对的压力，虽然既无权，又无势，

但他还是四处奔走，到处游说。他竭力为自己的思想辩解，并不断吁请他的同胞们提高警惕。议会、报纸、电台、政党都被他利用起来，以唤醒民众，说服当局不要延误时机。眼看着德国采取的措施正是他准备在法国实现的东西，却被他的同胞们以无谓的借口拒绝，戴高乐心急如焚。

1937年末，他晋升为上校，之后被任命为驻梅斯的第507坦克团上校团长。与其说是提升了，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流放。因为戴高乐不屈不挠的据理力争，似乎让陆军部的一些人厌烦了。有人就讲：“你用纸上的坦克把我们搅乱了，这一回倒看看你用钢铁坦克能搞出点什么名堂来。”不管怎样，戴高乐终于有机会在实践中去检验他的理论了。因此，他感到如鱼得水，干劲十足。与其整日与那些顽固的政客辩论，不如找个机会作出来给他们看看。看见他一改过去整日闷闷不乐的愁容，人们半开玩笑、半怀敬意的给他起了外号“摩托上校”。他还是喜欢戴白手套，尽管跟坦克打交道到处是油污。这一装束特点使人们又想起他当年的英姿。

1938年7月14日，在庆祝国庆的演习中，戴着白手套的上校指挥他的坦克，以别开生面的阵势大显神威。而他此刻听到的却是梅斯军事长官吉罗尖刻的奉告：只要我还活着，亲爱的戴高乐，你就别想在我的防区看到你的理论付诸实践。

即使是老谋深算的丘吉尔，此时也无法与戴高乐同行。1938年丘吉尔与雷诺见面，雷诺向他提到装甲师的威力问题，试图说服他。这是丘吉尔第一次听人向他提及戴高乐和他的运用装甲师作战的理论。但丘吉尔并未对此产生兴趣，他料想未来的战争仍和上次一样。他说：别忘了，“欧战一旦爆发，壕堑战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的装甲部队越过波兰边界。此时无论是戴高乐、雷诺还是达拉第、丘吉尔、张伯伦都成了无能为力的消极旁观者。而戴高乐远见卓识的军事预言，法国是用惨痛的代价证实的。

三、“我就是法国”

1940年6月第一周刚刚过去，失败的阴影已经弥漫整个法国北部盟军战场的上空。尽管敦刻尔克撤退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但代价也是惨痛的，法国此时已溃不成军。这是士无斗志、将无远虑的法国对现代战争在技术方面提出的新的挑战熟视无睹的必然结果。

法国首脑这时已公然准备停战求和，戴高乐将军对此痛心疾首。他打算脱离这个软弱无能的腐败政府，准备辞职。但是内政部长芒代尔却竭力说服他道：“现在还只是世界大战的开端。将军，您还有许多伟大的任务要去完成！我们中间，只有您是白璧无瑕的完人。我劝您还是想想应该为法国做点什么吧！一旦需要，您现在的职务可能对您有用。”戴高乐深受感动，他被说服了。

6月14日，德国人进入巴黎，法国政府迁往波尔多。戴高乐在被逃亡者的车辆阻塞的公路上，经过了一段惨淡的旅行之后，于傍晚时分到达那里。他立即去见雷诺，并毫无保留地对他说：“三天来，我一直在估算我们离投降还有多久，但是我为您效劳是为了战争，而不是为了停战。您如果留在此间，必将被失败主义的浪潮所淹没，您必须尽快赴往阿尔及尔，您能当机立断吗？”雷诺答应了。戴高乐马上紧逼：我立即前往伦敦，与英国人商量解决运输问题，明天就走，回来后，我到哪里再见您？总理回答：“阿尔及尔”。当晚，戴高乐离开波尔多前往布列塔尼，准备做最后努力。可就在这个时候，雷诺由于受内阁中失败主义者的影响，已经向丘吉尔发电要求英国政府同意法国向德国征询投降条件，并扬言，如果英国拒绝他的要求，他将辞职。当戴高乐费尽口舌与丘吉尔达成协议，决定联手抗德之时，刚下飞机回到波尔多，他的助手告诉了他刚刚结束的内阁会议结果：雷诺已经辞职，贝当元帅被邀请组织新政府。这意味着法国将要停战，一切都完了。

虽然戴高乐对雷诺的决心并未抱太大的幻想，然而，他确实期待雷诺能最终战胜投降派，现在的结果固然对戴高乐是个沉重打击，但将军对此也并非毫无戒备。

6月13日，他对他的朋友奥贝尔廷说：“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即撤回北非……，仰仗大海作屏障，我们可以在英美的援助下重建丰富的物质基础，……在一二年时间里，我们即可在物质上占压倒优势。……这样我们就可以帝国为基地重新征服本土。……总之，我是决不同意签署停战协定的，这有背于法国的荣誉和利益。”这段话反映出此时的戴高乐已经为法国谋划了一条救亡之路，也奠定了他以后为之奋斗的基础。

再说，还在伦敦的时候，身为国防与陆军部次长的戴高乐，就超出职权范围电令一艘装载着来自美国的大炮和机枪的开往波尔多的法国“巴斯德”号货船，改道驶往英国一个海港。这样，这批重要的军火没有落到德国人手中，而重新装备了从敦刻尔克撤回的英国远征军。这是戴高乐一个富有远见的举措，表明他继续坚持战斗的决心已经下定。

戴高乐面对投降已定的局势，毅然决定离开法国。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曲折道路，但他终生不悔。在飞离祖国的前夜，戴高乐感慨万千，他恨执政者，恨他们软弱无能，视他们为法国的千古罪人，同时也立下大志，甘洒热血，精忠报国。他还去看望了那位曾经共同奋斗，但现在已各奔东西的雷诺总理。由于绝望和失眠，总理显得萎靡不振，无精打采，这位富有才

智的总理大臣，当初相当坚决，但此时已毫无斗志。最近一连串事变的巨大压力，加上那些怯懦成性的同僚对他的背弃，使他的意志丧失殆尽。虽然现在再也不能对他寄予任何希望了，但戴高乐还是告诉了雷诺，他将返回英国。深夜时，内阁总理从秘密款项中提取了 10 万法郎交给了戴高乐，这是雷诺当时对戴高乐的最后一次支持行动。

随后，戴高乐来到英国大使纳德·坎贝尔爵士的住地，将自己要去伦敦的意思告诉了他。在场的斯皮尔斯将军决定陪同戴高乐前往伦敦。第二天，6 月 17 日上午 9 点，戴高乐飞往英国，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为了证明法国没有战败，他依靠的只是他的信念和决心。戴高乐体现了一个不屈服的法国形象。这一年，他已经 49 岁，年近半百。戴高乐感到这是一次走向未知和个人的戏剧性行动。这是自国土沦丧以来，第一位只有临时准将头衔的军官起来向法国元帅的权威挑战的人，他感到自己被命运彻底抛到了一个冒险世界，绝无后退之路，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继续战斗下去。戴高乐只有破釜沉舟了。决心虽然已定，但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呢？许多人认为，在那些日子里渡过海峡的一小群法国人，想的只是组成一支辅助部队来帮助正在坚持战斗的不列颠帝国。但戴高乐却怀有崇高的目的，法兰西山河已经破碎，民族存亡未卜，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精忠报国，救亡图存。大国之中如果最终只有法国放下武器径自退出世界大战，这对他来讲是无法接受的。一想到战败的法国最后竟要靠外国的军队来拯救，他就感到心如刀搅。因此，他认为只有一些法国人继续战斗是远不够的，要让这一些法国人去动员所有的法国人重新投入战斗，挽救法兰西。

戴高乐虽然信心十足，目光远大，富有胆略，但他很清楚他将从事的是一项艰巨的事业，任重而道远。他面对的敌人势盛力强，而且很快就可以利用业已沦陷的法国的官方机构，使它俯首听臣，为其效劳，法国人民已经四分五裂，许多人毫无斗志，戴高乐此时还是无名之辈，实际上孑然一身，既无部下，又无组织，更无威信可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既没有钱，也没有军队，我也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人们得从零开始。”说实在的，除了他本人的意志和品格而外，戴高乐唯一可利用的条件，就是他有一位强大的盟友，这就是丘吉尔，他愿意给戴高乐所代表的法国提供继续战斗的机会。

在泰晤士畔的斯蒂芬斯大厅 4 楼的一间小套房里，戴高乐着手缔造一个百战不败的法国。他首先要宣布奋斗目标，号召人民起来战斗。6 月 18 日下午 18 时，戴高乐来到了布什大厦的播音室，坐在麦克风前开始了他对法国的首次广播。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戴高乐向法国发出了他的号召，这是一篇号召人民拿起武器的呼吁书，也是一篇谴责法国新领导人在败局未定前就与敌人谈判妥协的讨伐书，更是一篇表示叛离的决裂书。对于这后一点，戴高乐比谁都更清楚。他说，“随着这无可挽回的言词被电波传送出去，我觉得自己结束了一种生活，即在坚固团结的法国和不可分割的军队中的生活。在 49 岁这样的年纪，我像一个被命运彻底抛出来的人，开始了一种新的冒险生活。”事实上，从那时起，戴高乐就成了法国的战斗旗手，他点燃了法国人民心中希望的火种，他成了举世闻名的反法西斯英雄。请听他慷慨激昂的声音：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

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这令人鼓舞的声音曾使过去一代的听众和读者热血沸腾，情绪激昂。但却得到了波尔多无情的答复：命令戴高乐马上回国。6月30日，所谓“法国大使馆”又转来了一项命令，叫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投降，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最后，戴高乐因“临阵拒不服从命令并唆使其他军人不服从命令罪”，受到法国军事法庭的传讯，后来又被缺席判处了“死刑”。

尽管如此，戴高乐将军仍坚持他的事业，因为他坚信他是在为祖国的利益而战，他认为只有获得人民的支持，将人民发动起来，这就有了无穷的力量去获得最后的胜利。他又一次代表法国在广播中发出呼吁：“一切仍有武器在手的法国人，继续抗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放下武器、撤离军事阵地，或同意把属于法国的任何一片领土交给敌人控制，都是对祖国的犯罪。”

经过艰辛的努力，戴高乐和他的伙伴们终于募集到了许多从挪威和敦刻尔克撤退下来的老战士、外籍军团第13联队中的大部分士兵、200名高山轻装队、一个坦克连和若干特种部队兵，后来又很快从一些战斗队、商船队、在外国的法侨和从法国逃亡出来的零散志愿人员中，征集到了好几十名飞行员和几百名水兵。7月末，又有7000人来投奔自由法国，其中一些很有名望的军人，如蒂西埃上尉、玛格冷-韦尔内雷中校、柯尼格上尉、德朗古尔上尉、比若少校、达尔让柳海军少校、缪塞里埃海军少将，他们以后都成了自由法国部队的主要组织者。由于缺乏更有名望的法国政治家的来归，戴高乐成了他的拒绝停战运动和拒绝失败的法国的孤单独一的领袖。这一现实，使他成了既是政治领袖又是军事领袖，后来他的法律顾问卡森教授向他征询如何制订这个运动的规章时，他干脆回答说：“我就是法国”。考虑到波尔多政府已处于完全从属于敌人的地位，已丧失了代表法国人民的任何权利，因此，这个政府已不能算作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戴高乐决定建立一个法国民族委员会，丘吉尔力排众异，竭尽全力支持他，说戴高乐是组建这个委员会最合适的人选。随后，英国BBC电台公布了一份公报宣布承认该委员会。丘吉尔对戴高乐讲“既然只有您自己，我就只承认您”。不久，英国政府又散发了一份公报：“陛下政府承认戴高乐将军是全体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不管这些人哪里，只要他们愿意与他共同为保卫盟国事业而奋斗。”这一承认尽管力量有限，但它对戴高乐将军今后与英国政府建立关系，缔结盟国间的双边协议，提供了合法基础。对丘吉尔来讲，这一承认是对一个孤单独一的人和一个人被称之为“自由法国”的抽象实体表示信任的具体体现。

戴高乐在祖国沦陷、当局可耻地与敌求和之时，表现出不屈不挠、坚持战斗的大无畏精神，他置个人生命于不顾，毅然在年近半百的时候重新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极其艰辛、充满风险但却又最具辉煌的人生道路。他流亡英国，“寄人篱下”，靠着顽强奋斗终于有了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军队，并取得了丘吉尔对这个初具雏形的政权的承认。戴高乐以他不同凡响的个性和智谋，为自己今后的事业奠定了成功的基石。戴高乐将改写法国历史。

四、着眼大局丢卒保车

戴高乐将军对于自己客居异乡、“寄人篱下”的处境，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丘吉尔虽然也是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进行战斗的，陆军已是残兵败将，飞机数量也不多，主要盟国已屈膝投降，他已准备迎接德国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来保卫他的岛国，但他的资本要比戴高乐雄厚得多——英国的领土完整无损，人民的斗志依然旺盛，丘吉尔可以支配全部国家机器和力量——而戴高乐则一无所有。丘吉尔临危受命被认为是英国最有资格带领人民抵抗法西斯的国家首相，而戴高乐则是被人们怀疑、误解甚至敌视的法国叛逆。这种显明的差别使丘吉尔与戴高乐的关系十分微妙。在戴高乐看来，英国的一举一动往往盛气凌人；而在丘吉尔眼中，戴高乐暴躁易怒，目空一切，刚愎自用并且有时脱离现实常常达到荒唐的地步。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丘吉尔有指挥大权，而戴高乐无权。为了弥补无权的不足，戴高乐有时摆出一副寸步不让的高傲态度，以此来体现他心中法兰西的尊严。为此丘吉尔常常被逼无奈，甘拜下风。

但毕竟这是两位伟人在谋事，他们能以高超的处事艺术来解脱现实的束缚，并各得其所。丘吉尔无论处于什么心态，他还是看到了戴高乐所具有的潜在价值。他认为戴高乐是个应运而生的人。他很欣赏戴高乐从法国脱险的经过：戴高乐假装为返回英国的斯皮尔斯将军送行，在关键的一霎那，他一步跨上了那架飞机，砰的一声关上了机舱的门，飞机腾空而起。在场的送行人员都惊呆了，戴高乐在这架小小的飞机里载着法国的光荣离去了。

飞抵英国的戴高乐获得了丘吉尔极大的信任、理解和大力支持。尤其是丘吉尔的英国政府发表了两个公告：一个是拒绝承认波尔多的法国政府是独立政府，另一个是承认戴高乐的法国民族委员会，这等于承认了戴高乐就是法国这一重要事实。从此戴高乐与丘吉尔的关系发展到最高峰。

戴高乐对英国人民给予他和他的运动的同情、尊敬和钦佩，也绝非无动于衷。他后来写道：“英国人民处处对我们表现出来的慷慨热情，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他们举办了各种各样的事业来援助我们的志愿人员。为我们提供劳动、时间、金钱的人，不计其数。

每当我在公众场合出现时，群众都把我国在中间作出最热情的表示。当维希的报纸发表了我被判处死和没收我的财产的消息时，许多不具名的人把大量的珠宝放到了卡尔登花园里，几十位素不相识的寡妇把她们结婚时的金戒指，都奉献给了戴高乐的事业”。

丘吉尔曾在下院发表过一篇令人难忘的演说：“我们对法国人民怀有最深切的同情，我们与法国的传统情谊从未中断过。这种情谊依靠了戴高乐将军和他英勇的伙伴们而得到充分体现和永久化了。这些自由法国战士被维希政府判处了死刑，但是，当法国在解放了的欧洲土地上恢复了她以前的自由和荣耀时，他们的英名将受到颂扬，将被铭刻在村村巷巷的石碑上。这一天，就像明天太阳必将升起一样，定将到来无疑”。

丘吉尔的英明之处在于他看到扶植戴高乐本身就是对英国自己最大的安慰。正如丘吉尔向战时内阁宣布的那样：“自从波尔多政府背叛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在尽可能远的法帝国内建立一个亲英抗德的法国行政机构。目前在英国的戴高乐将军和自由法国部队也在为同样的目标而努力，因此，我们必须用各种手段来协助他们完成这一任务。”丘吉尔的动机一目了然。

正当双方合作顺利进行的时候，戴高乐遇到了一件棘手的问题，英国海军击沉了法国舰队。这一事件是大战期间英法冲突中比较严重的一次。这对于身在英国的法国统帅该如何表态呢？从民族主义情感出发，戴高乐必然要谴责丘吉尔，但关系搞僵了，戴高乐的未尽事业将受到很大的威胁，甚至从此离开政治舞台，这意味着他前面的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从大局着眼，冷静客观的看待这一事实，理解英国的作法，但这又会招致法国国内人民的反感，甚至误解。戴高乐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

法国沦陷后，丘吉尔最操心的是法国舰队的命运。这样的一支舰队一旦落入希特勒之手，大不列颠和她的海上补给将极易受到攻击。诚然，海军上将达尔朗、保罗·博杜安，甚至贝当元帅都曾向英国保证，舰队不会落入德国之手。但是，法国政府不是也向英国人保证过决不签署单独停战协定，保证过将400名俘获的德国驾驶员送往英国，保证过将停战文本事先通知盟国的吗？然而没有一项承诺得到兑现的。再说，法国政府已不再是个自由政府，法德停战协定第8条规定：法国舰队将在德国或意大利的监督下拆除武器。当然，德国人也许诺在整个战争期间将不使用这支舰队，但是在现阶段，谁还能相信法国政府的话，更不用说希特勒的话了。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毅然决定必须摧毁或夺取法国舰队，或者使之失去战斗力。他在后来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作出的最痛苦和最残酷的一项可怕的决定。然而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当时，这支强大的作战力量正散泊在英国、地中海、非洲和马提尼克等地的港湾内。7月3日清晨，英国以占压倒优势的兵力突然袭击停泊在茨茅斯和普利茅斯的法国舰艇，俘获战列舰两艘、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8艘、潜艇若干，以及大约200艘小型舰支。唯有大型潜艇“苏尔古夫号”进行了抵抗，双方各死一人，三名英军受伤。当天，在米尔斯克比尔海军基地附近的奥兰，法国海军上将让苏尔拒绝了英国的最后通牒。在随后发生的战斗中，从“皇家方舟号”上起飞的飞机炸毁了战列舰“布列塔尼号”。“敦刻尔克号”搁浅了，战列舰“普罗旺斯号”冲上了沙滩。“斯特拉斯堡号”被击伤，但同从阿尔及尔开来的几艘巡洋舰逃到了土伦。在这次事件中，许多法国水兵丧失了生命。

当戴高乐从报纸和广播上获悉这一消息时，好像突然被人打了一闷棍似的。他愤怒到了极点。他觉得这并不完全是出于正当的保障安全的动机，而且还由于“多年海上竞争的积怨、法西斯战役开始后日益加深的不满以及因维希政权缔结停战协定而爆发出来的愤恨”所致，但是，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当斯皮尔斯将军前去拜访戴高乐时，他的怒气已经平息下来了。斯皮尔斯后来写道：这位自由法国领袖的客观态度令人惊诧，显然他是经过许多考虑的。他对我说，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他来说，他不得不考虑是继续与我们合作呢？还是从此离开政治舞台，隐居到加拿大去当一名普通公民。经过一夜的辗转翻侧，第二天，戴高乐选择了前者。

丘吉尔对贝当元帅的反应不太在乎，但对戴高乐的反应十分关心，当他从斯皮尔斯将军的汇报中得知了戴高乐的态度时，深受感动。但更让丘吉尔感动的是，5天之后，戴高乐向法国人民发表的广播演说，明智的表达了他的看法。他在演说中谴责了这个“可悲的，可恶的”行动，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他要取得和法国公众的一致看法。同时，他吁请法国人，请他们从事物的根本上。即从我们的胜利和解放上，去看问题。这才是唯一正确的观点。

与其说有朝一日德国人用这些法国军舰来打击英国和法兰西帝国，不如干脆把它们毁了。特别是戴高乐在演讲中强调：“波尔多政府出于被奴役的地位，必然会把这场炮火说成是兄弟阋墙，并设法把法国人的愤怒转移到被出卖的盟国身上。敌人作为征服者也会利用这次事件来挑唆英法两国人民之间的不满。但我相信，两国人民中的有识之士和爱国者也必然会看到：尽管这是个不幸和可憎的悲惨事件，但决不能因此而造成英法两国人民之间在精神上的对抗。……至于完全按照法国的荣誉和利益而自由行事的法国人，谨以他们的名义宣布：他们已经永远地下定决心，要继续战斗下去。”

戴高乐这篇演讲深深打动了丘吉尔，也证明了戴高乐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着眼于大局，巧妙的将这个已经发生了、用任何方式也无法弥补的战场上的损失，用来唤起丘吉尔今后对自由法国的更大的关心，并增加了今后自由法国在英国的上层人物心目中的份量。

五、寄人篱下也要保持强者的形象

在英国的艰辛岁月里，戴高乐从一个职业军人逐渐成长为一名融军人的果断和政治家的谋略于一身的政界要人。他用自己的策略赢得了丘吉尔的鼎力相助，最终获得一席之地。以至英国上层不断接到丘吉尔的告诫：“请务必将我们今后散发的有关法国或法国殖民地的传单事先都征询戴高乐的意思。”“如法属印度要与我们发展商业关系，她必须先归顺戴高乐将军，否则不行。像这样的事情，不能随便马虎，一定转告印度事务大臣。”难怪有人说，戴高乐是首相和英国的朋友，不能得罪他。

戴高乐很清楚，要想在英国人面前伸直腰杆，自己必须要有实力。虽然，自由法国已初具规模，但在军事方面的贡献小得可怜，与英国方面相比似乎逊色多了。这是戴高乐心中的一块石头，他苦思冥想，决定在敏感的情报工作方面拿英国一手。

无论是政治外交还是军事战争，都少不了情报，而在搞情报方面，英国人当时又离不开戴高乐。法国的沦陷和英国远征军的撤离，都来得很突然，因此，英国的秘密情报局在法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情报人员。后来凡是到英国来投奔戴高乐将军的法国人都要首先受到英国人的盘问，不久，在伦敦郊区还建立了一个称作“爱国学校”的特别机构。英国人用各种办法说服新来的法国人直接在英国人的领导下做情报工作。显然，英国迫切需要情报人才。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戴高乐不失时机的决定任命德瓦弗兰，这位得过法学士学位、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的年轻人，为他参谋部的第二局和第三局局长，并负责搞情报工作。德瓦弗兰最后在被占的法国建立起一个情报网，它对英国和盟国事业的贡献与日俱增。无疑，戴高乐巧妙的这一作法，使自由法国在低人一等的情况下与英国进行交涉时，手中有了一张王牌。

当丘吉尔对戴高乐的权力膨胀深感不安，想用法国人来“冲淡”戴高乐的极权思想时，遭到了戴高乐坚决机智的回击。

当时，在伦敦的法国人中，有一些是反对戴高乐的，德斯蒙德·莫顿在致首相函中就这样说道：“据我了解，自由法国总部的成员们，也和我们一样，开始对他的领袖的难以相处和不冷静的性格感到厌倦。……相当数量的自由法国人和运动外的某些好心的法国人也都在郑重地考虑如何建立一个能控制将军政治行为的委员会的方法。况且有一个叫缪塞利埃的海军上校曾经说过，戴高乐染有狂妄症。……领袖的这个脾气得改一改，否则就得改变领袖。丘吉尔决定利用这个人，去挟迫戴高乐的权力。由于丘吉尔还不想彻底与戴高乐闹翻，所以他命令无处不去的德斯蒙德·莫顿“混入缪塞利埃集团”随时将情报报告首相。丘吉尔的如意算盘是建议戴高乐建立一个完全正规的委员会，用委员会的形式实现自由法国的民主，即瓦解戴高乐。

有丘吉尔的撑腰，缪塞利埃起草了一份要求在最短期间建立一个“行政委员会”的通知交给了戴高乐，并声称，今后未经该委员会同意，不得再作出任何决定和发表任何声明。海军上将当然成为该委员会主席，……而戴高乐将成为该委员会名誉主席。事后，这位海军上将还表示：如果戴高乐不接受这个方案，他将通知英国当局，他和“他的”舰队将一起交由英方指挥，不再隶属戴高乐将军，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分裂威胁。

戴高乐此刻很冷静，他对来访的缪塞利埃直言相告，委员会的新主人不能是别人，只能是戴高乐将军本人。当海军上将拒绝加入该委员时，戴高乐

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廖塞利埃勃然大怒，声称，海军“将独立地进行战争”。戴高乐闻讯后，立即给这位海军上将发了一份正式的最后通牒：“当您作出脱离自由法国并将我委托您指挥的海军从自由法国分离出去的决定时，您已经超越了您的职权范围。……自由法国部队的官兵都应同自由法国人一样，按照应募合约，信守诺言和受我的权力的约束。……鉴于您过去的功绩和某些非战流亡分子对您的恶劣影响，我给您 24 小时的考虑时间，过了这个时间，我将采取必要措施以排除损害，并将您的行为公诸于众由舆论谴责。我一定能得到我们所在的土地上的盟国的支持，因为他们承认我是自由法国人的领袖。”

在这份软硬兼施的最后通牒中，特别是最后一句，让丘吉尔也深感不安。戴高乐将了他一军。他只好出面调停，结果，此时已被置于英海军部保护之下的廖塞利埃，向戴高乐写了一封求和信。当天下午，戴高乐召见了海军上将。但他表示，廖塞利埃对他不忠，他们不能合作共事。无奈，英国调停工作重新开始。戴高乐和廖塞利埃双方被“请”到了英外交部。戴高乐与艾登一起会谈了好几个小时，廖塞利埃则在隔壁房间与英海军大臣会谈，副大臣卡多根则在两室之间进行穿梭。闹剧收场了，戴高乐大获全胜。他这种惩一儆百的作法，即稳定了他在自由法国内部的地位，也使丘吉尔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算。

在一件关系到自由法国前途的重大事件中，戴高乐再次用自己杰出的才智，为法国赢得了声誉。

那是在承认戴高乐将军为全体自由法国人民的领袖之后，英法开始进行关于缔结一项在英国的法国志愿人员的征集、组织和服役条件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十分困难，因为戴高乐的外交地位是没有先例的，他的需要又很高，他认为自己就代表法国的意见，这使英国外交部感到很为难。斯皮尔斯将军是这次谈判的最好见证人，他后来回忆道：“陛下政府与戴高乐将军之间签订协定的谈判，是由戴高乐将军的法律顾问卡森负责进行的，其激烈艰巨的程度使外交部里最随和的人也对我们客人的表现感到厌烦。”

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双方对主要各点达成协议：“为了对付共同敌人，将组建一支包括海陆空军部队和科学技术特种部队在内的法国志愿部队。……这支部队将尽可能在人员，特别是纪律、语言、晋升、配属方面，保持法国部队的特点。……陛下政府将在条件许可时向法国部队提供与英国同类部队相等的必要的物质补给。”戴高乐将军则表示：“接受英军司令部的总的指挥，但仍保持对法国部队的最高指挥权。”这再次体现了戴高乐的现实主义思想。他还希望确定一种方式以便保证这支力量的民族特性，并限制英国人使用这支力量去进行他所不同意的战斗。

这个由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威廉·斯特兰同最早投靠戴高乐将军的著名法学家卡森教授进行的会谈，还因一项巨大困难使协定迟迟不能签字，这就是在法国失败后，英国曾在法国的三军人员中征募了许多法国军官、士兵和技术人员。英国的有关部长对这种做法都非常满意。他们试图拒绝戴高乐对这些已经征募和今后还要征募的人行使任何权力。双方经过多次讨论，仍相持不下，最后丘吉尔只能作出了有利于戴高乐的裁决，并通知部长们“这些人最好还是让他们回到本国的部队去”。之后双方达成了正式协议，并于 1940 年 8 月 7 日发表。

这一协议通常被称为丘吉尔-戴高乐协议，它是戴高乐努力建立的那个大

厦的基石。但戴高乐对这个协议并不完全满意。他曾试图说服英国不仅对恢复法国本土的疆界，而且对恢复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作出保证，这等于是要从法律上使英国人打消他们可能怀有的任何攫取法属领土以扩大不列颠帝国的冒险想法。这反映了戴高乐将军对英国政府抱有的戒备防范心理。他以高度的外交策略，先发制人，使丘吉尔不得不保证，今后“对全部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地位，……当尽与为之”。

这一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戴高乐和丘吉尔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们对1940年6月以来共同经历的惨淡日子，刻骨铭心。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这两位热爱祖国，深知理想对人类意志的作用的伟大人物紧紧靠在一起了。

戴高乐这时期在外交活动方面，获得了满意的结果。他用灵活善变的超然态度，不畏强权、不卑不亢，在对外关系，在涉及帝国利益的问题上，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个“高大的强硬者的形象”。

六、另辟蹊径开拓非洲

大凡伟人的事业都不是依靠流亡生活筑造的。当然，一旦形势于己不利，自己不能与对方取得绝对竞争优势时，不防转移阵地寻求相对竞争优势于其对抗。这时的流亡是曲折中的前进，但只能是权宜之计，等待时机成熟后，必须为自己建立稳定的战略后方，而不能搞流寇主义。

戴高乐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坚韧不拔的果敢精神，在丘吉尔的鼎力相助下，终于建立起一支 7000 人的武装部队，将流落在国外的散兵游勇集合并组织了起来，有了自己的武装和一个新法国的雏形。随后，戴高乐就一直在设想使之能尽早进入战争，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肩上那沉甸甸的份量。此刻，他已将注意力转向了非洲，他觉得非洲是个最好行动的场所。在那里，法国有了广阔的土地，必须保卫这些土地免受德国和维希的侵占，甚至还必须保卫这些土地免受英国和美国的染指，因为英美正想利用这些土地来为他们自己的战争和利益服务，而且这些非洲土地对自由法国来讲，是最好的根据地。有了它，自由法国不再是个流亡运动，而成了在自己国土上的独立主权政府。从这点上来看，戴高乐把非洲看成是今后重新征服欧洲的理想跳板。

戴高乐开始曾寄希望于法兰西帝国会爆发一场反德大起义，好以此为契机，反攻回去。但这种希望很渺茫，最后成了泡影。因此，他决定从法属非洲殖民地开始主动行动。这中间的情况很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北非，诺盖将军抵制媾和达三天之久，但却最终接受了停战。在印度支那，卡特鲁将军坚持反对投降，但却同意让维希政府委派的总督来接替他。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皮奥总督和密特奥塞将军最终也接受了停战。密特奥塞将军的参谋长德拉米纳上校则非常坚决，他设法使科潘斯克将军指挥的波兰旅越过边境进入英国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德拉米纳打算更进一步组建一支法国义勇军，但遭到英国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的拒绝。结果，驻扎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 7 万维希部队中，投靠自由法国的只有数百人。至于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由海军上将戈德弗鲁瓦指挥的舰队，只有 6 名军官、二三十名准尉和水兵投靠戴高乐。

相反在赤道非洲形势更为有利。在喀麦隆和乍得，掀起了最强烈的反投降浪潮。在法国委任统治地喀麦隆，人们意识到，要是德国获胜，这块殖民地就会重新落入德国人的手中。尽管布津诺总督不愿表态，但在公共工程局长莫菜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宣布支持戴高乐。在乍得，被戴高乐称作“热情的法国黑人”的弗利克斯·埃布埃总督有许多理由反对希特勒，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反对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对此深恶痛绝。埃布埃表示他随时准备公开声明支持戴高乐。

除此之外法属非洲其他地区的反应不是模棱两可，就是令人泄气。法属刚果总督布瓦松起初反对投降，但当他从布拉柴维尔调往达喀尔，升任更为重要的法属西非各领地的高级专员时，态度转了 180 度，倒向了维希那边。在乌维吉（现称中非共和国），人们是赞成抗战的，但是需经过布拉柴维尔方面的同意，这看起来不大可能采取什么大胆行动。加蓬的态度令人捉摸不透，但沉默中很可能怀有敌意。

鉴于上述种种迹象，戴高乐权衡再三，决定因势利导，先找准突破口，深入进去之后，再扩大战果。他准备首先将乍得、喀麦隆和刚果联合起来。这一计划得到了英国殖民大臣劳埃德勋爵的帮助。他看到戴高乐这项计划对

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和冈比亚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交给戴高乐将军一架飞机，让他把自由法国的几个“说客”从伦敦送往拉各斯。原计划去三个人：普利文，帕朗少校和戴高乐的内阁总管埃蒂埃·德布瓦兰贝尔。具体行程是，第一步先到乍得的拉密堡。在那里，他们将会见埃布埃总督，设法说服他，争取使乍得归附自由法国。第二步，到杜阿拉去帮助莫克莱尔和他的行动委员会，发动计划中的“政变”，使喀麦隆倒向戴高乐。就在他们准备启程时，又增加了一个“说客”，此人就是勒克莱尔。

以上这两步，戴高乐把握很大。现在困难的是如何争取刚果。戴高乐认为最适宜派去的人是德拉米纳上校。此人刚从地中海东部脱险，正在开罗。给他的任务是拿下这个行政区的首府布拉柴维尔，那里的政权机构不仅控制着法属刚果、而且也控制着刚果，乌班吉、加蓬等几个毗邻的殖民地。戴高乐派出的这五位坚决果断的年轻人都非常出色的完成了任务，而且没有流一滴血。到8月底，计划得到了实现，乍得、喀麦隆、刚果和乌班吉都站了过来。这是戴高乐自由法国的反法西斯战士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戴高乐下一个目标是争取达喀尔。他在斯皮尔斯将军和莫顿少校的帮助下，制订了一项和平联合西非集团及其海军基地的计划。戴高乐后来写道：“我的最初打算是避免直接攻击。我想在距达喀尔较远的地方，让一支坚强的纵队登陆，然后逐步向目标挺进，沿途将有关的国家和部队联合起来。如此以来，自由法国的部队可望在不断扩大影响中发展壮大，并通过陆地到达达喀尔。我原先考虑的登陆地点是科纳克里。从那里，我们可以利用铁路和连续不断的公路，直达西非首都。但是为了防止达喀尔舰队消灭远征军，必须有海上掩护。为此我不得不求助于英国舰队。我将此计划告知了丘吉尔。”

丘吉尔深知达喀尔对英国的极端重要性。如果这个基地一旦落入德国之手，英国前往中东、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全部海上交通将处于德国舰队的控制之下，并将直接威胁英国在西非的殖民地。反之，如果英国能控制住达喀尔，大西洋战役将会大大改观。因此，英国决定派一支庞大的舰队进行远征。但他不同意戴高乐缓慢前进的计划，因为英国不可能将重要的舰队在这个时刻长期闲置在赤道附近。经过慎重思考，戴高乐决定听从英国的意见，采取快捷行动。因为，戴高乐认为，这个行动如果有我们参加，就很可能成为一次归顺自由法国的行动，相反，如果我们不参加，英国人为了他们的利益，迟早也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与其让达喀尔向英国人投降，使法国主权受损，不如现在双方联手，争取我们自由法国做达喀尔的主人。

丘吉尔还用他生动的口才描绘了如下一幅图景：忧郁而迟疑的达喀尔在晨曦中醒来。居民们在晨曦的照耀下，突然发现远处海面上布满了舰艇。多庞大的舰队！上百艘战船和货船！货船慢慢驶向岸边，用无线电向全城、向海军、向当地驻军，送去友好的信息。一部舰只升起了三色旗，其余的打着英、荷、波、比国旗从盟国的舰队中放下一只小船，议员们打着的旗进入港口，把戴高乐的代表送上岸去。代表们来到总督府告诉总督，如果允许我们登陆，盟国的军队就立即撤走，相反，选择战争将被彻底粉碎。看得出，这时无论是丘吉尔还是戴高乐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未来充满信心。但由于种种原因，戴高乐的达喀尔计划失败了。这虽然是一次不小的挫折，但戴高乐并没有灰心，仍然在顽强斗争。他甚至计划在乍得和利比里亚边境荒凉偏僻的沙漠里建立一个撒哈拉作战基地，以期有朝一日法国部队能攻取费赞，

并从那里打到地中海去。他还打算派一支自由法国远征军到中东去和英国人配合作战。这些行动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法属北非。

戴高乐决心成为法兰西民族利益的保护人，自由法国必须在已解放的领土上行使一个主权政府的职责。于是，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法属赤道非洲的首都——当时也是进行抵抗的法国首都，发表了庄严的宣言。在宣言中他一面谴责维希政府违反宪法，对侵略者唯命是从；一面向人民庄严保证，一旦法国人民能自由地选出自己的代表，他的一切行动将向代表们负责。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威，他在宣言发表的同一天还颁布了两项法令。第一项法令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第二项法令，任命卡特鲁将军、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德拉米纳将军、埃布埃总督、索托总督等一批军政要人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由戴高乐本人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为了让全体法国人认识到布拉柴维尔宣言和同时发表的两项法令的重要性，戴高乐在离开布拉柴维尔之前，于12月16日又郑重地发表了一个“组织宣言”，宣布他掌权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放整个法国。

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奋斗，戴高乐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再也不是寄人篱下的流浪汉。在非洲他建立了一个辽阔的作战基地和一个精干的行政机构，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表明一个以戴高乐为当然领袖的自由法国人的国家业已建立起来了。

七、软硬兼施联美挟英

戴高乐在整个二战期间，念念不忘的是作为一个法国的历史地位，再加上他那十分顽固而倔强的性格，他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每一次的争执都使双方心理蒙上一层阴影，也加重了戴高乐的思想负担。他尽力争取所有海外领地和属地都投入战争，以免被人说成是英国的雇佣军。他要将自由法国的士兵派往所有的战场，以迫使盟国承认自由法国的伙伴国和共同参战国的地位。这些任务的完成是在不理解、不支持、不合作、甚至积极或消极的反对声中实现的。与此同时，他还要在暗地里与英国的海军部、陆军部、空军部、殖民部、情报处、外交部、英国首相、美国总统和美国国务院进行战斗。

1942年冬季将要来临的时候，自由法国在世界各国的心目中不再是最初人们用讥讽、怜悯和眼泪接待的那个使人“惊奇的逃亡者”了。人们通过它的政治、军事、领土和戴高乐越来越高的威信看到了一个正在恢复、建立的新法国。这对于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来讲，意味着今后他可利用的国际良机将越来越多。虽然他免不了还得依赖英国的善意，但他认为应在外交上寻找新的方式，设法寻找其他盟友并与其发展友好关系，以尽可能减少对英国的依赖，争取主动。只有在盟国中取得它应有的位置，利用各自的利害冲突，相互制约，才能使自由法国以一个交战国和主权国的姿态出现成为可能。

戴高乐决定与美国和苏联接触。最让他头痛的是与华盛顿关系的开展。戴高乐与罗斯福在出身、性格和经历上迥然不同。富兰克林·罗斯福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他在格罗通中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很早就接受了“自由民主”思想。他所接触的作家、思想家和理论家都具有“新的民众思想”，他成为“新政”的总统，震撼了美国，并在经济和外交方面进行了改革。他是一位资产阶级杰出的政治家，精明强干，身残志坚；又是一位出色的谈判能手，善于施展他的魅力。战争使美国在军事和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优势，使罗斯福总统成为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物。戴高乐将军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出身于一个严厉的、爱国的、信奉天主教的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他已经懂得了责任感和为祖国献身的精神，直到战争爆发前，他一直从事军事艺术和作战行动的研究。他的著作，表明他在军事理论方面的独到见解，很久之后，他才同政界接触。战争开始后，他被任命为副国务秘书和国防部副部长。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勇敢、朝气蓬勃的军人气质。1940年贝当政府投降后，他在近一年的时间，客居英国，致力于重整法国的艰苦奋斗。随着法兰西帝国的众多领地宣布归顺自由法国，戴高乐“身不由己地卷进了政治舞台”。他把军人采取攻势和切断敌人退路的品质融进了他的政治活动中，他与盟友的关系不是处于谈判的地位，而是挑战和对抗。

两人存在着很大政治分歧，不能不说与其各自的性格有关。他们都过分地以我为中心，谁也不承认对方的优势。罗斯福把戴高乐看成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心胸狭窄的人和沙文主义分子，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夺取、保持绝对的权力；在戴高乐的眼中，罗斯福则是一个倨傲的人，有着强烈的大国优越感，希望主宰世界，当然包括主宰法国的命运。

因此，当戴高乐的事业在美国舆论界获得广泛热烈的反应时，美国官方却坚持以一种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它。在罗斯福看来，戴高乐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法国将军”，特别是自从1940年6月以来，他对一般的法国人

尤其是法国的将军，已不怀多大的敬意。在华盛顿的眼中，这位戴高乐将军似乎还是英国人的制造物，他在达喀尔行动中遭到的惨败，还被有些人说成是具有法西斯倾向。凡此种种，足以使戴高乐不能成为“美国人心中的捍卫法兰西荣誉的勇士”，当然也不能成为美国的对话人，排斥戴高乐。美国政府一直和维希保持着关系，自1940年秋以来，罗斯福总统、科德尔·赫尔国务卿和萨姆纳·韦尔斯副国务卿一直在努力保持着与贝当政府的良好关系。其目的是尽量让法国脱离德国影响，以免把海军舰队移交给德国；和魏刚、诺盖和布伊松保持接触，希望说服他们有朝一日能为罗斯福打开非洲大门。

总之，戴高乐与罗斯福的政见分歧造成了自由法国与华盛顿之间矛盾重重。尽管如此，戴高乐坚持认为，争取美国，取得它的援助，可以作为对英国抗衡的一张牌。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主动措施。1941年5月，戴高乐派出他的得力干将普利文前往美国，去完成这样一个使命：“解决同美国国务院建立永久、直接的关系，自由法属非洲和大洋洲同美国的经济关系，以及我们直接购买战争所需的物资问题：在美国建立我们的情报和宣传机构；在美国成立我们的委员会，把同情我们的美国人给我们的帮助组织起来。”戴高乐还告诉普利文，完成这些任务，在美国需要呆多久就呆多久。另外戴高乐还指示，自由法国可以将喀麦隆、乍得、刚果以及在太平洋的一些岛屿提供给美国，用于建立空军基地。当年丘吉尔用此法获取了美国的军舰，而今戴高乐用同样的方法是为争取美国的承认和支持。戴高乐曾对《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乔治·韦勒说：“我曾向美国建议利用法国在非洲的海湾作为与希特勒作战的海军基地。我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是长期租借——大体上相当于英国人向美国提供他们的大西洋基地时所作出的安排。但我没有要求对方提供驱逐舰作为交换，我只是要求美国利用这些基地来与达喀尔相抗衡以阻止希特勒更加深入非洲。希特勒一旦能从俄国战线撤出他的部队，就必然会这样做。”戴高乐这一举措对美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因此北非在维希的控制之下，美国人将来有可能需要在非洲建立这样的基地，以便在欧洲采取战争行动。另外，日本人在太平洋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威胁看来也十分明显。事实上，美国政府不久就要求利用在非洲以及新赫布里底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岛的便利条件。

为了与美国关系能发展下去，戴高乐曾多次派代表团去华盛顿，并几次表示愿与国务院合作。尽管他很想得到美国实际上而不是形式上的支持和承认，但戴高乐并不准备低三下四，更不准备在原则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例如，在“戴高乐代表整个法国”这一问题上，他始终对此坚定不移。当普利文告诉戴高乐，美国国务院邀请他以“专家身份而不是以任何代表身份”参加会谈时，戴高乐叫他坚持原则。在8月9日，戴高乐给普利文发了一封电报，重申了他的不可动摇的立场：“一般说来，你很清楚，我们所要求的是美国提供作战物资，而不是什么救济品。我知道，国务院目前准备提供医疗用品，而不愿提供武器。如果他们不提供武器，我们就拒绝接受医疗用品。遵循老一套方针行事的幻想在华盛顿显然还很流行。他们偏袒维希，也就是说，偏袒一手培植了维希的希特勒。你是代表法国的，我不同意你仅仅以专家身份参加美、英、法三方会议。要出席，就得同其他与会者享有同等权利，否则就干脆不出席。”

戴高乐在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主动给予和原则问题不让步的两手策略，有时让罗斯福和丘吉尔也奈何不了。对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

岛事件的解决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圣反埃尔岛和密克隆岛是两个位于纽芬兰洋面上的并非多么重要的法属小岛。事件在开始时本来是件小事，却突然爆发成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戴高乐将军早在1940年9月前往达喀尔途中就曾设想：存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以及法属奎亚那，组织一次“自发改变其行政领导”的行动。事实上，在这两个小岛上的5000居民中，绝大部分都对维希不表同情。但维希派高级专员罗贝尔海军上将却牢牢控制着他们。为此，戴高乐在1941年2月写信给一位英国外交官说，只要有“英国舰队的合作和华盛顿的默许”，这两个岛的解放是“易如反掌”的。英国当局认为这样一次行动并没有什么坏处，因为在圣皮埃尔岛上设有一座强大的无线电发射台，这是维希派进行亲德宣传的工具，经常向美国为维希作广播宣传，并把盟国运输队在大西洋上的位置报告给德国潜艇。为此，英国当然希望这些岛屿能尽早置于盟国的管辖之下，但考虑到它的地理位置，取得加拿大政府的同意是必要的——当然又要取得美国当局的许可。所以，当1941年秋戴高乐向艾登表示要收复这两个岛屿时，艾登就是这样回答他的。加拿大政府很快就同意了，剩下是华盛顿的问题。

戴高乐本人认为，美国人如果同意，那固然是好，但也不是非得得到他们的同意不可，因为在他看来，占领这些岛屿完全是法国的内部事务。当时的戴高乐已完全下定决心要将美洲地区的法属领地重新收回。

美国虽然此时已经对德日宣战。但奇怪的是，甚至珍珠港事件也未改变美国对维希的政策。罗斯福在12月7日后不久，还与维希驻安的列斯、奎亚那和圣皮埃尔的高级专员海军上将罗伯尔，缔结了一项保持法国在西半球的所有领地的现状的协议。另外，罗斯福还以个人名义通知贝当元帅，美国仍遵守哈瓦那协议。至于在圣皮埃尔的发射台，美国正与加拿大进行谈判，双方同意由加拿大派无线电操作人员去圣皮埃尔岛，以便监视发射不损害盟国事业；如该岛拒绝，可对其实施经济制裁。……正当谈判在顺利进行时，国务院于12月16日接到了英外交部的消息，通知它自由法国人准备收复该岛的计划。英外交部还表示陛下政府对该计划的实施并无异议，但它想知道该计划的实施“对美国政府有无妨碍”。

此举并非多余。果然，罗斯福表示坚决反对这一行动。而且戴高乐也得到这样一条消息：“听说美国与加拿大政府已经研究了一项由加拿大派人接管发射台的计划，并得到美国政府同意。”对此他想了很多：加拿大人真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吗？他们只是为了谋取情报？还是为谋取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找一个借口？不管怎样，他后来写道：当我一听说外国要对法国的领土采取行动时，我觉得已不容许我再有丝毫犹豫了。我当即命令海军上将缪塞利埃立刻收复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

戴高乐认为此事毋须通知英国人和美国人。曾在1941年12月7日，战争终于敲开美国大门时，戴高乐讲了一句预言性很强的话：“从今往后，英国人要是没有罗斯福的同意，将什么也不能干了”。在圣诞节前夕，海军上将缪塞利埃率领自由法国的海军陆战队登上了圣皮埃尔岛。他们受到了岛上居民的极为热情的欢迎，根本不用使用武力。在随后举行的公民投票中，90%以上的人同意回归自由法国。年青人立即报名参加自由法国的军队，年纪较大的则着手组织地方自卫队。戴高乐任命他的特使萨瓦里接替维希派的高级专员担任当地的行政长官。

人们很可能认为，这只是件小事，干得很漂亮，各方都很满意。其实，

罗斯福与丘吉尔开始也都未给予重视，但美国务卿赫尔深感自己受到侮辱。他后来写道：“尽管这些岛屿并不重要，但自由法国人用武力占领它，将可能严重损害我们与贝当元帅的政府的关系。”随即国务卿发表了如下一份公报，以表示他的愤懑：

我们得到的最初报告证明；由“所谓的自由法国人”的战舰在圣皮埃尔采取的行动，纯属一项专横行动。

它违背了有关各方的协议，并未经通知和取得美国政府的事先同意。美国政府已要求加拿大政府研究采取何种措施以恢复这些岛屿的原状。

面对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戴高乐泰然自若，但毫不让步。相反，局势于美国不利。加拿大首相说：他不准备恢复维希在圣皮埃尔岛上的权力，因为“加拿大公众舆论对戴高乐将军行动的反应是既宽慰又兴奋”。美国的公众舆论对这一行动的反应也是兴高采烈的，因为这毕竟是由美国的一个盟友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而采取的行动。因此，美国的公众舆论和报界都对国务卿的“所谓的自由法国人”的说法，反应强烈，引起人们普遍愤慨。不走运的赫尔在随后几周中，收到了来自美国四面八方的大量咒骂信，信上都写着：致“所谓的国务院”和“所谓的国务卿”收。赫尔把事情估计错了，但他仍然坚持他的政策，力图说服丘吉尔，迫使自由法国人从圣皮埃尔和密克隆撤走。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迫于美国压力拜访了戴高乐，试图劝说戴高乐同意让这些岛屿保持中立，脱离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而独立，并接受盟国的共同管理，戴高乐坚决给予回绝。艾登威胁说，如果美国派军队去呢？戴高乐讲，那将会是一场可怕的战争。

戴高乐终于获胜了。他用灵活的软硬兼施手段，成功地捍卫了国家主权。他可以主动租让领地，以求获得美国支持而胁迫英国对自己减少干预；他也可以坚决夺回属于自己国家的领土，而决不让别国染指，从而赢得国际舆论的普遍支持。

八、不卑不亢灵活外交

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历尽千辛，终于凯旋巴黎。当他来到凯旋门时，欢迎的人们挤满了星形广场和爱丽舍田园大街。他不时举起手臂向含泪欢呼的巴黎人民致意。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今天是一个曾经沦为亡国奴、受尽压迫和摧残的民族，在欢欣鼓舞的景象和自由的气氛中重见天日的幸福时刻。人们选择了戴高乐作为自己灾难中的救星和希望的象征。人们没有忘记，在法兰西民族处于最黑暗的年代，在贝当元帅将神圣的国土和人民拱手让敌的时刻，是戴高乐向海内外发出了庄严的抗战号召，是戴高乐领导法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人们忘不了他。

戴高乐先后在凯旋门广场，在园点广场，在协和广场，在市府大厦前，在圣母院大教堂的门前，走到无数的法国同胞中间。面黄饥瘦的儿童手舞足蹈向他大声欢呼！经受了无数苦难的妇女们笑逐颜开，向他高呼万岁！老年人流着热泪向他致敬！此情此景，深深感动了戴高乐。望着这些患难与共的人们，他想，“至于我，在这种激动欢腾之中，深深感到应该完成一个远远超过自己能力的任务——担当国家命运的舵手……我应当总结一下已经完成的事业，筹划一下我的将来。今天统一大业完成了。这个统一奠基于布拉柴维尔，成长于阿尔及尔，而完成于巴黎。这个曾经饱受灾难、悲痛和分裂的法兰西，现在又能勇敢地把目前的这出戏唱到底，胜利地收复全国的领土，恢复它的地位和尊严”。这段内心独白，让我们看清了在胜利的狂欢面前，戴高乐清醒的大脑。他不会沉湎于此，他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也将更难走。但戴高乐充满信心。

几多风雨之后，1958年6月1日，戴高乐就任总理，12月21日被选为法国总统，新宪法授予总统更多的权力，法国从此进入了第五共和国时期。当时，法国军队陷入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中，这是个棘手的殖民地问题。它曾让第四共和国难以对付，并最终导致它倒台的历史，终于被戴高乐用他那坚强斗争的毅力和智谋改写了。

面对当时的现状，戴高乐权衡利弊之后，决心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果断甩掉这个包袱，使法国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死胡同中脱身出来。他认为，这条死胡同妨碍了法国的经济和外交的恢复以及军事技术的现代化。他清楚地知道，阻力将相当大，无论在政界和军界都有极大的反对势力，他们顽固地坚持和维护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他如果过早地暴露自己的最终意图，可能会丧失不久前才取得的权力，所以他采取了隐蔽意图的秘而不宣的策略。他采取全民表决的形式，让法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决定是否赋予阿尔及利亚以自决权，结果，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选民投了赞成票。这表明戴高乐的政策受到了拥护，终于使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随后，戴高乐制服了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军高级将领的叛乱，避免了法国的内战；和平地完成了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地化。他还决定，让每一个领地都可以自行决定，或是保持现状，作为部分自治的国家加入共同体，或是与法国合并，作为法国的一个海外省份，甚至完全退出法国共同体自行独立。作为先例，在1958年6月，戴高乐与摩洛哥和突尼斯签订了法国从这两个领地上撤军的协议。

戴高乐对待殖民地的政策，引起了国内军、政界殖民势力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眼中，戴高乐是恶魔、是反基督的，是卖国贼。这些极端分子不能饶恕戴高乐这种“抛弃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兄弟”的出卖行为，转入暴力和恐怖

行动。1961年9月至1962年8月，曾发生了多起叛乱和谋杀戴高乐的事件。仅谋杀事件就发生了四起，其中两次已经付诸行动，但都失败了。一次是1961年9月8日晚上，当戴高乐乘车从巴黎返回科龙贝时，突然被一片火力网包围，幸好阴谋者埋设的90磅炸药没有爆炸，戴高乐的防弹车冲了过去。这一次由于技术故障，戴高乐幸免于难，另一次则是出于奇迹。1962年8月22日，发生在戴高乐乘车前往库布莱镇军用机场的路上，路旁的两辆汽车里突然射出数百发子弹，其中十几发子弹击中了戴高乐的那辆坚固的铁雪龙防弹车，一颗子弹击破后窗，在离他头部几英寸的地方掠过。另外两颗击中了防弹车轮胎，但没有打穿。事后戴高乐回忆道：“令人难以置信的侥幸，我们谁都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戴高乐的大无畏气概可见一斑。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法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据统计，因为战争，法兰西的财富已经有三分之一化为乌有——先后有50万座房屋完全被毁，150万座房屋遭到严重破坏；铁路、桥梁也大部分遭到破坏；有100万公顷土地已不能耕种，另有1500万公顷由于5年没有经心耕种已濒于荒芜；到处都缺乏种子、肥料、农具；家畜减少了一半。总之，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使法兰西并损失2万亿1938年的法郎，相当于解放后的80万亿法。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法国经济失掉了大部分生产资料，在财政方面国债如山，在预算方面必须长期地为重建而拨出巨款。法国就是这样一个满目疮痍而又潜伏着四分五裂危机的国家。戴高乐不由得哀叹道：“光明大道已经打通，但法兰西却成了一个破烂摊子！”

战后法国重整国力除了国内人民艰苦创业、辛勤努力之外，经济的恢复还受益于美国援助，但同时也形成了受制于人的局面。随着国家的复兴，法国人民重塑自己完整独立形象的愿望趋于强烈。1950年1月戴高乐当选总统后，顺应民意，提出并执着推行以摆脱美国控制、维护民族独立和谋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为核心的“戴高乐主义”。他不失时机地提出法国要分享世界领导权的要求。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打破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霸权地位。这个目的奠定了1958年9月17日他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那份著名的、却是失败的备忘录的基础。他在备忘录中提议，在联盟中建立一个三大国理事会。这个备忘录表露了戴高乐的如意算盘：如果它被接纳的话，他就可以一举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遭到拒绝，他将不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

在美国人看来，接受戴高乐将军的要求，就等于给予一个尚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超级大国的地位。戴高乐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曾透露法国很愿意购买这类武器，但有一个条件，即这类武器一旦为法国所有，就必须置于法国的绝对控制之下。否则，不管得到得不到援助和指导，法国都有权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核大国。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个原子装置在雷冈沙漠中心地带试验成功，这意味着从此法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第三个国家。这是戴高乐与美国抗衡的一个果敢行动。

在西欧问题上，戴高乐反对美国把西欧引向建立超国家实体的主张，推行用“欧洲人的欧洲”来代替“大西洋的欧洲”的方针，同美国提出的西欧联合模式大唱反调。因此，为了打破雅尔培会议确定的欧洲“两极分治”格局，摆脱美国政治军事控制，戴高乐决然领导法国发展独立核力量。

对戴高乐来说，雅尔塔会议如骨鲠在喉，使他难以忍受。法国即戴高乐

将军竟被排斥在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会议之外，这件事他一直耿耿于怀。因为会议牵涉到法国利益，而这位毕生“对法国有一定之见”的人竟没有出场。这造成了戴高乐将军的对外政策——一贯反美，反得十分离奇古怪。1964年3月，戴高乐准备对墨西哥进行正式访问。行前，医生发现他身上长了一个瘤，排尿受阻，但他不愿推迟这次访问，决定由泌尿专家阿布尔克在他的膀胱中安装一根导管，待到访问结束，再进行手术。当阿布尔克安置导管的时候，戴高乐对他说，希望会见制造导管的医生，以便表示他个人的祝贺。阿布尔克答道，这大概不容易，因为导管的制作者是个美国人，还不知住在美国什么地方。听他这么一说，戴高乐马上面红耳赤地叫嚷起来：“上帝，难道没有法国的吗？”随后，他又叹了一口气，轻声地说，“博士，我不愿让人知道，是你为我安装了根美国导管。您得把这个视为国家机密。”戴高乐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由于长期积累的对美不满因素，使他一直颇为愤懑。所以，对他自己身上安装的一根美国导管也感到极端厌恶，才这么“小题大做”。

同时，为了广泛联络，戴高乐还冲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孤立中国政策的阻挠，首先在1964年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63年底，戴高乐派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前往北京，作半官方的了解情况的旅行。富尔对新中国的成就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次旅行的真正目的是探索中国方面是否同意互派大使。1964年1月27日，面对美国和其它的大多数盟国只承认台湾的国民党这一状况，法国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月30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他与中国建交的理由。他说，法国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在国际舞台上，戴高乐注重根据法国自己的利益塑造独立的政治形象，在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势力范围划分等广阔领域内，敢于同美国分庭抗礼，自行其是。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重大行动。同中国建交，再次表明了戴高乐不畏强权，傲视美国的独立自主精神。

四十年代后期，以苏联和美国为盟主的东西方阵营先后形成，法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随着东西方冷战逐步升级，苏联对东欧、美国对西欧的控制也不断加深。戴高乐认为，法国要赢得完整的独立单凭其自身的力量不行，必须以法德合作为核心，推动实现西欧的政治联合，使之逐渐发展为介于苏美之间举足轻重的“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格局的出现不仅可以阻止苏美在欧洲的扩张，而且能使法国获得政治大国地位。

谋求西欧联合，法德合作是关键环节。戴高乐一改法国100多年来提防遏制德国的外交传统，不再把德国看成是威胁法国安全的力量，主张摒弃历史积怨，大力推进法德和解与亲善政策。他当政后立即谋划同联邦德国领导人阿登纳进行会晤，双方于1958年9月14日和15日在科龙贝教堂举行第一次会议。戴高乐之所以不在巴黎选择一些更为正式的场所，而选中这个地方，为的是表示他个人对这位德国领导人的友谊和尊重。这次会议实际上等于双方声明愿在和解、互通有无和交流技术的基础上，揭开法德关系史上新的一页。经过长期顽强的努力，法德两国于1963年1月签订了“没有第三者干预”的友好合作条约，从而把法德关系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并使之成为促成西欧联合的重要支柱。1961年上半年，经戴高乐倡导和斡旋“欧洲共同体”六国首脑在没有美国人的参与下，先后在法国和德国举行了数次高级会议，商讨西欧联合的方案，从而将西欧联合的实践推向新的高潮。

由于实力不足和各方认识上的分歧，戴高乐在任期内实现西欧联合的设想未能如愿以偿。但他不向超级大国屈服，百折不挠为维护国家独立而斗争的精神和积极推进西欧联合的基本构想，符合时代的潮流，为国际反霸斗争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戴高乐主义”仍在西欧流行，并成为那里反霸和独立自主的同义词。

总之，二战后戴高乐在重新执政的 11 年间，使法国社会深深地印上了他的烙印。他的外交政策旗帜鲜明，充满了对霸权的藐视，并始终强调尊严和独立。它的总方针就是重新选择盟友，寻求法国与盟友间的新平衡。它在保持与西方盟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开始寻求同苏联缓和紧张的局势，进而达成谅解，最后进行合作。同西方盟国保持着一定距离的法国，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了本国的核“打击力量”，并拒绝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要求。该共同体历经曲折，最终还是按法国总统一人的意愿进行了改组。在该组织内，六个参加国都保持了各自的全部主权。法德和解、法中建交等等，戴高乐的外交路线表达了他在争夺势力范围的微妙角逐中顽强地促进法国强大的愿望，同时也显示了戴高乐是掌握力量与和解之间分寸的巨匠。

约瑟夫·布罗兹·铁托谋略

约瑟夫·布罗兹·铁托（1892~1980），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军事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缔造者。

1892年5月，铁托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克罗地亚库姆罗维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是克罗地亚人，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铁托是家庭的第7个儿子，由于家境十分贫寒，12岁便离开家庭走上独立谋生的道路，去工厂当学徒工，开始接触政治活动，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1910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14年，铁托在第一次大战中被俘来到俄国，经历了十月革命，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参加南斯拉夫共产党。1934年12月被选为南共中央委员。1937年，担任南共中央总书记。二战中，南共领导全国人民同法西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5年，南斯拉夫解放，成立了联邦人民共和国，铁托任总理兼国防部长。1953年任共和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1956年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倡导不结盟运动，成为最具影响的第三世界政治力量。1966年10月当选南共联盟主席兼南斯拉夫社会主人联邦主席，创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自治制度。1980年5月4日在卢布尔雅那病逝，享年88岁。

一、困境中铸造出坚毅的性格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铁托说：“铁托是块铁。”铁托家境十分贫寒，从小非常艰苦，历尽了磨难。艰苦的生活磨练出来了铁托坚毅的性格，而这种富有韧性的坚毅性格，成为铁托一生不屈不挠、百折不回、愈挫愈奋的坚实基础。

十九世纪末铁托童年时代的南斯拉夫，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呢？

当时的南斯拉夫，大约有 1100 万人，分别处于 5 个国家的统治之下，隶属于 11 个不同的省政府，所遵守的是 13 种不同的立法制度。克罗地亚则是属于奥匈帝国匈牙利自治省所控制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奥匈帝国的“三等公民”，受到奥匈帝国和匈牙利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政治上不独立，经济上就难以发展，克罗地亚整个经济非常落后，广大农村还处于远离现代社会的中世纪，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铁托从小生活在外祖父家，7 岁回到家里，便开始承担家庭的责任。他整日独自去野外放牲口、推石磨、割草耕地，沉重的体力劳动使铁托从小就倍尝了生活的艰辛。

铁托家境非常贫困，每当青黄不接之时，他的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只能靠借贷过日子。这个时候，铁托就拿着父亲托人写好的借条，硬着头皮到村子里那些较富裕的家庭去借债，默默的忍受着人们的嘲笑和无端咒骂，看着别人难看的脸色，一声也无法争辩。这对一个 7 岁的孩子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压力啊。铁托开始逐渐在他幼小的心里，埋下了反抗的火种，并且认识到越是嘲笑、咒骂，越要坚强，越要努力。铁托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改变这一切。

铁托 8 岁的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天气格外寒冷，家里既缺米又缺柴，而且已经是借贷无门了。父亲万般无奈，为了活下去，只好把家里唯一值钱的财产——孩子们最喜爱的牧羊狗“波拉克”卖出去。铁托心里非常难过。从小，当大人们去地里干活，就是波拉克细心的看护着他。他睡觉时，波拉克依偎在他的身边，使他获得温暖。再大一点，他抓着波拉克的尾巴慢慢站起，扶着波拉克学会了走路。他独自去野外放牧时，又是波拉克陪伴他，替他驱赶和看护着牲口。现在波拉克被人牵走了，但小小的铁托还是理解了父亲。他第一次懂得了，为了活下去，必须舍弃心爱的东西的道理。他拼命强忍着满眼的泪水，坚决不让官流下来。嘴唇咬出了血，泪水终于没有流下来，小铁托经历了精神上的一次拼搏，变得更坚强了。

祸不单行，对小铁托的考验接踵而至，他患了白喉。那时的白喉，虽不能说是不治之症，但在这样缺医少药、贫穷落后的农村，常常是凶多吉少。铁托 7 个兄妹之中，有 4 个因患此病和腥红热而夭折，高烧折磨着铁托，几天的功夫，使他变得枯瘦面黄，两眼无神。他成天难受地把身子蜷缩在一起，蹲在灶旁取暖。村里的牧师看到后，摸了摸他的头，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已经不行了，赶快准备后事吧。牧师走后，母亲走过来，先是把手放在铁托的额头上，然后把他紧紧的搂在怀里，既像是对他说话，又像是自言自语：“坚强起来，什么也不能把我的孩子带走，病也不行”。铁托也坚强的抬起头，望着母亲，母子相互鼓励。最终小铁托躲过了死神的追逐，奇迹般的康复了，这一幕给铁托的刺激是极深的。

如果说上述的几件事使铁托性格逐渐变得坚强的活，那么克罗地亚流传

的英雄、传奇般的马蒂亚·古贝奇的故事则为铁托的性格又注入了新的内容，使它逐渐走向成熟。

马蒂亚·古贝奇是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地区农民起义的领袖，为反抗统治者和农奴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头插野鸡毛，率领广大农奴冲进当地大贵族塔希的城堡，杀死了农奴主，攻占了大片地区，并与伊利·格雷戈利奇等其它义军联合作战，率大军渡过苏特拉河，打到了斯洛文尼亚，直捣统治者的的心脏地区。克罗地亚总督气急败坏，恨透了古贝奇等率领的农奴起义军。他亲自统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骑兵，与农民起义军决战。由于寡不敌众，加之作战战术的失误，激战数日后，义军大部战死，其余被俘，被统治者残酷杀害。克罗地亚血流成河，仅在扎果烈一地，被处死的农奴沿路旁树上悬挂，长达上百里，达 6000 多人。古贝奇受伤被俘，被押入囚车，游街示众，受尽了折磨。最后，统治者和刽子手们惨无人道地将一顶烧得通红的铁冠扣在他的头上，当众把他活活烧死。铁托每听到这里，心总是最猛烈地收缩，犹如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抓了一把。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英雄古贝奇的传奇故事在克罗地亚代代流传，激励着人们反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英雄与豪迈之情也深深地扎根于铁托幼小的心灵之中。

由于艰苦生活的磨练和过早承担家庭责任，铁托变得吃苦耐劳，性格坚毅而深受人们的喜爱与赞赏。10 岁时，他被乡里教堂中的牧师看中，被列为牧师的跟班。这在当时是一种巨大的荣耀。赢来了许多孩子羡慕的目光，他的父母也为之而自豪。但铁托对牧师却没有任何一点好感，他看见牧师，就想起每年圣诞节和勒诺节时牧师进村的情景。

每逢这个时候，神父就来到村子里，身穿黑色的祭袍，手拿十字架，外表十分庄严，身后则跟着教堂的司铎。司铎手里拖着一个布口袋，神父在村里每家门前，口中念念有词地进行祷告，然后在门上用粉笔写上“耶稣纪元 × × 年”，表示对住户的新年祝贺，而被祝贺者的报答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给神父拿出准备好的几磅玉米，一捆金黄色的麻，或着交出相当于两天工资的银币。这点东西或钱，对于富有的人家当然不算什么，但对于铁托这样自己还吃不饱的家庭，那又是多么沉重的一种负担啊。铁托时常想，为什么年年向上帝祷告，年年依然如此困苦，为什么还要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东西向这些不干活的人奉献呢？

有一次，逢铁托跟班，做完弥撒之后，牧师有事要急着离开，他让铁托尽快脱掉他身上的祭袍。可是牧师长得实在是太胖了，祭袍紧紧地绷在身上，小铁托力气又小，他怎么拉也拉不下来，累得满头大汗。牧师急了，一反平时的慈祥与庄严，恶狠狠的回手就是一巴掌。铁托跌倒在地，嘴角渗出了血丝，他擦也不擦，猛地站起来，眼里充满了愤怒的火焰，牧师被吓得倒退了一步，惊呆了。铁托解下身上系着的跟班小牌，摔到牧师的面前，头也不回地走了。从此，任凭信教的父母如何苦苦劝说，小铁托再也没有进过教堂。

艰苦生活的磨练，英雄故事的潜移默化，终于锻炼出了铁托坚毅的性格，钢铁就是这样炼成了。

二、“为了自己的理想，我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

艰苦的生活迫使铁托 12 岁便开始独立生活，15 岁离开家庭，成为锡萨克市卡拉斯制锁厂的学徒工，开始为期 3 年的学徒生涯。在学徒后期，当时工厂里有一名工匠叫施米特，是铁托政治生涯的第一个引路人。施米特是从萨格勒布来到卡拉斯工厂的。他年龄不大，但知识丰富，见多识广。他性格随和，总是围着一条惹人注目的红围巾，很讨人们喜欢。在做工休息和下班后，施米特总是滔滔不绝地向铁托和其它学徒们讲世界上各种各样新奇的事，每当夜空里划过一道星光，他便会讲起人类是如何发现慧星的，近年来，又有什么样的慧星被发现。由此，又讲到人类飞向天空的梦想是怎样实现的，讲飞机的制造和试飞的过程及原理，飞行家法曼一次次试飞一次次失败，最后终于飞向天空的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

最令铁托激动不已、热血沸腾的是施米特讲述工人自己斗争的故事，巴黎工人的英勇无畏，里昂工人的前赴后继，席卷欧洲的工人运动。铁托幻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他们的一员，为这个队伍干点什么。

机会终于来了，1909 年 5 月 1 日前夕，施米特找到了铁托。他对铁托说，“五一节就要到了，那可是我们自己的节日。”铁托忙问：“那我们可以干些什么呢？”“我们可以用鲜花和树枝把工厂装饰一番。”铁托等学徒们在施米特的指导下，把工厂装饰起来。施米特成为铁托第一位启蒙老师。

第二位政治启蒙者是格斯派列奇。

格斯派列奇比施米特更富活力，他身体强健，性格好斗，铁托就是跟着他学会了摔跤和拳击。最为重要的是，他实地进行着政治活动，并与一些进步工人成立了秘密工会。在学徒工中，铁托对格斯派列奇布置的工作最认真，因此，也受到格斯派列奇的特别注意。格斯派列奇不仅派他替社会党出版的报纸《自由之言》募捐，推销工人火柴，而且指导他读进步作家爱德华·贝拉米所著的《向后看》以及《自由之言》等著作，并结合当时克罗地亚的实际政治状况，开始有意识地启发铁托的政治觉悟。

有一次，格斯派列奇问铁托道：“约瑟夫，你的家乡库姆维罗茨有多少成年人？”“几百个。”铁托回答。“那你知道不知道有多少人选举权？”“3 个。”“几百对 3，在咱们整个克罗地亚，这个比例是 200 比 3，也就是说 200 万克罗地亚人中，有选举权的只有 3 万人，你知道，有选举权的都是些什么人吗？”“有钱人。”铁托毫不犹豫的回答，“这不公平，我要想法改变这一切”。

1910 年，18 岁的铁托只身来到了萨格勒布，他加入了工会组织，参加了五一节工人游行示威活动。同年，他加入了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

1913 年，按奥匈帝国的兵役法，铁托进入帝国军队中服役。腐败的军队制度使他更加痛恨这个制度和帝国。一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铁托来到东部前线，与同胞兄弟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自相残杀，这使他认清了这次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他向士兵发表了反战演说：“作为一个革命者，我反对一切民族迫害，为什么我们要残杀兄弟民族塞尔维亚人呢？我们应该反战，调转枪口，推翻压迫我们的可憎的统治者。”8 月，他作战负伤，被俄军俘虏，关押到喀山附近名叫斯维亚斯克的小镇。这是铁托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这里，他经历了俄国的二月革命和伟大的十月革命，第一次读到了布

尔什维克的报纸和列宁的伟大著作《四月提纲》，逐渐由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加入了当时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共产党。

1920年，铁托历经艰辛，冒着生命危险，越过苏南边境，回到了已经独立的南斯拉夫，并与南斯拉夫共产党接上了关系，以共产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萨格勒布市议会的竞选。共产党在此次选举中，共获得59席，成为议会中的第三大党。共产党的胜利，引起了反动政府的极度恐慌和极端仇视。1921年，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铁托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1927年和1928年，铁托两度被捕。在法庭上，铁托与反动政府进行了坚决斗争，把法庭变成向人们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好场所。

1928年11月6日，萨格勒布法庭公开审讯了铁托，当时的《新闻报》是这样进行报道的，“昨天，萨格勒布法厅的小厅内挤满了人，青年工人和学生对这次审讯格外关心，他们挤进法庭，搞得大庭水泄不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案件是从不理会的，而专门关注这种带有煽动性的、战斗的国际救世主的案件。”“约瑟夫·布罗兹被带上法庭，毫无疑问，他是这次审讯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他的面孔，使人联想到钢铁。他目光炯炯，透过眼镜冷冷地观察着四周地……人数众多的旁听者无疑都被他的顽强态度所感染，大家全神贯注的倾听着他的反问，鸦雀无声。”

公诉人起诉后，首席法官托米奇问铁托是否知罪，铁托答道：“尽管我承认公诉人对我的指控，但我并不承认自己有罪。因为我认为这个法庭无权对我进行审理，只有党的法庭才有这种权利。”法庭听众出现了轰动，法官不得不大声呼喊安静。铁托继续发言：“我承认，我是你们认为非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党员。我承认散布过共产主义思想和宣传共产主义，并一再指出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是多么的不公正。所有这一切，我都是在各种会议和同人谈话中做的，我说不清楚所有这些会议都是在那里举行的。1921年，共产党被解散，从合法变为非法，自那时起，我就一直这么做。”

“我知道，在（我）那里找到了共产主义书籍，这些书籍是我的同志们带到那里去的。这些同志的名字我同样不想告诉你们。”“我是共产党人，因此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我宣传这样一种道理：如果资产阶级继续掠夺人民，那么就要用武力来夺取政权，只有武力才能粉碎武力，为了自己的理想，我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法庭又骚动起来，人们开始交头接耳，大家意味深长地彼此交换着眼色，法官连忙宣布审判结束，并判决铁托服苦役5年。在判决后，铁托高声呼喊：共产党万岁！共产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由于铁托在法庭上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狱中，他受到了残酷迫害。牢房里只有一张折叠床，床上仅有一条薄薄的褥子、两条毯子，均又脏又破。房子里没火，非常寒冷。吃的则更糟，早饭是一小片面包，晚饭则全是稀汤。独自一人，不许看书，不许写作。为了改善狱中的条件，铁托领导全体囚犯进行了艰苦的绝食斗争，要求狱方停止对犯人的非人道做法，并取得了胜利。监狱改善了伙食，并允许政治犯们集中住在一起，免受单人牢房之苦。铁托与被关入监狱的南共领导人皮雅杰等其他35名政治犯，建立了狱中党组织——地方委员会，委员会由三人组成，铁托是成员之一。

委员会的任务是组织犯人进行学习，把监狱变成一所大学校。学习条件虽然很差，但铁托既当老师，又当学生，极充分的利用了这次学习的机会。

他先学习了世界语，接着又学习了英语，而更多的时间，是与皮雅杰一起切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时，皮雅杰正在翻译资本论。1933年11月，铁托服刑期满离开了监狱。

1935年初，铁托被派往莫斯科，被分到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主管南斯拉夫事务。他利用工作之余，大量阅读了在南斯拉夫看不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重要原著，阅读了苏联伏龙芝元帅的军事论著和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大大拓宽了他在军事问题上的视野和知识，为后来回到南斯拉夫组织武装斗争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

此时的约瑟夫·布罗兹·铁托经过实践斗争的锻炼——法庭的斗争，狱中的艰苦磨炼和充实丰富的马列理论知识，已由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少年成为一个成熟、坚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扎根国内积极建党

铁托刑满出狱之后，很快摆脱当局的监视，抵达萨格勒布，与南斯拉夫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在法庭的演讲和狱中的斗争声名远扬，得到了组织的赞赏和肯定，被选为萨格勒布省省委委员。当时共产党依然处于“非法”状态，遭到反动政府的严厉镇压，白色恐怖遍及全国，但共产党人不怕牺牲，积极展开活动，党的各地方委员会相继建立。

但是，此时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与其它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共产党一样，还处于幼稚时期，党的领导人，大多是在俄国留学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味听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安排，脱离本国斗争实际，不了解国内斗争的实际情况。

在南斯拉夫国内，各地方委员会之间互相缺乏联络，各自为政，形不成整体的政治力量。中央领导人面对白色恐怖，自己不敢回国，又想改变现状，只好派遣联络员返回国内与地方委员会进行联系。由于中央下达的指示，都必须首先经过共产国际审核批准，加之联络员回国联络也需要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原本正确的指示，三转两传，下达时也早已时过境迁，不再适合国内斗争的需要，更何况许多指示本来就是他们在国外凭空想象、闭门造车、脱离国内斗争实际的东西。

更为可怕的是中央派出的这些联络员，长期生活于国外，回国后，举止习惯不同，很难逃脱警察的魔爪。面对各种酷刑折磨。这些人大多又生了一副软骨头，被捕后就变节叛变。他们不仅出卖个人，而且出卖组织，国内党组织因此遭到极大破坏。长此以往，党员们便失去了对中央的信任，许多人甚至提出要中断与中央的联系。

萨格勒布省委是南斯拉夫最强大的地方党组织，在铁托的坚持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处理非常谨慎，认为既要坚持与中央保持联系，又要向他们反映地方的意见和要求。省委决定这个任务由铁托来完成。铁托来到当时的中央所在地——维也纳，见到了中央总书记米兰·高尔基奇和其它中央委员们。铁托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南斯拉夫国内的政治局势，以及党的各地方委员会的活动状况，并坦率的提出了普通党员对中央设在国外而派遣的联络员不断遭到逮捕变节，使国内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尖锐意见。铁托与中央书记及委员们讨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最后，铁托被选为中央委员，并成为中央与南斯拉夫国内各地方委员会总联络人，受命组织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党的代表大会。铁托在政治生涯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由地方进入了南斯拉夫中央。同时，中央的活动也由国外开始正式进入了南斯拉夫国内。这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铁托回国后，在各条战线上进行了艰苦的组织、宣传和协调工作，他会见了各地地方委员会书记、省委委员和青年团书记，协调各省省委与中央的关系，并直接参与基层组织的建设工作。

一天晚上，铁托与一位工作十分出色的萨格勒布工会代表促膝长谈，不知不觉到了凌晨3点钟。在这里，铁托了解到了很多在上面无法知道的情况，他们谈到了基层工会的活动情况。这位工会代表告诉铁托，工人罢工取得胜利的同时，也就是工会活动日趋艰难的开始。铁托感到非常诧异，忙问为什么，这位工会代表回答，工人得到一定经济实惠后便对工会抱消极态度，许多工人干脆还脱离了工会组织。因为在南斯拉夫城市中存在大批失业工人，

而失业大军则威胁着企业里的工人，这部分工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就不想再惹恼工厂主，甚至不惜以脱离工会组织为代价。铁托听完之后，陷入了沉思，因为这不仅仅是反映了工会工作的弱点。

他们还谈到了基层工作的另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在五金工会萨格勒布分会选举中的问题。这个工会的一名代表工作能力很强，而且在工人中威望很高，被大会一致选举为工会主席，但贝尔格莱德工会中央却宣布这次选举无效，取消了选出的分会领导，并任命了另外一个委员会，还将新当选的工会主席开除出了工会，引起了工人群众的极大愤慨。人们分裂了，对工会失望了，更多的工人脱离了工会组织。听到这个消息，铁托愤怒了，他立即召见了贝尔格莱德工会中央的领导人，尖锐的批评了他们在这件事上为谋私利安插自己的人而粗暴的违犯工会规则，践踏工会会员的权利，置会员的意见与愿望于不顾的错误做法，要求他们立即改正，向萨格勒布分会道歉。针对这件事，铁托向全南斯拉夫工会散发了传单，特别强调，绝对不要限制工人反对工会官僚的斗争情绪，而且要强化这种情绪。

另一件对铁托刺激很深的事是铁托回到家乡扎果烈发现，在南斯拉夫这样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国家里，共产党在农村几乎是空白，没有什么活动。农民的反抗情绪不减当年，但他们缺少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遍布农村的教会组织趁虚而入，他们在农民中大肆宣传，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和民族英雄，农民尤其是广大农村青年，大都加入了教会组织的“十字军”。所有这一切，使铁托感到了把中央搬回南斯拉夫国内，统一领导全国斗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935年，铁托奉中央之命来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在巴尔干书记处分管南斯拉夫工作。铁托离开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突然出现了危机。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锡萨克的党组织组织了一次工人集会，党中央组织书记奥吉那·米特洛维奇也参加了，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群众情绪愈发高涨，结果集会失控，出现了亲苏示威。示威者提出了建立苏维埃克罗地亚的要求，当局立即派出大量警察、宪兵镇压，早已被盯上的米特洛维奇措手不及，遭到立即逮捕，他身上带的党的积极分子名单落入了当局之手。反动政府喜出望外，当夜即进行了大规模搜捕，结果全国各地有960余名党的领导和积极分子被捕，大量组织与活动情报被政府掌握。这样，全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一下子被彻底摧垮了，党陷入了危机之中。

这一情况应该由谁负责？党员的不满情绪集中到了总书记高尔基奇身上。高尔基奇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尖锐批评，经铁托努力已经大大缓解了的对中央的不信任情绪重新出现。为协调中央工作，在共产国际指示下，1936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召开会议，重新选举了党的领导人，总书记仍由高尔基奇担任，而工作十分出色、在国内党组织中具有崇高威望的铁托则被任命为组织书记，成为党的第二把手。高尔基奇依然在国外，而铁托则又回到了南斯拉夫国内，全面负责南斯拉夫党的工作。

铁托回国后最迫切的任务是重新建立党的组织系统，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上次发生的大逮捕表明，警方已经打进了共产党的组织甚至打进了最高层，他们不断利用得到的情报，一次又一次将共产党刚刚建立起来的党组织聚而歼之，一网打尽。

面对这种情况，铁托并没有急于恢复党的组织。他以萨格勒布为中心，秘密奔走于斯普利特、斯洛文尼亚、内地门哥罗各地，恢复旧有关系，考察

每一位党员，寻找新的可靠的领导人才，以防止那些在警察局挂了号的老党员担任领导后再次被捕而使组织遭到破坏的情景重现，而且新一代领导人富有朝气，积极进取，没有宗派思想，少有地域观念。当时一些突出的年轻领导人如吉拉斯、卡德尔、里巴尔、兰科维奇、泰波等都集合到了铁托麾下。实际上，这些人形成了未来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这时，最强大的南斯拉夫地方党组织——萨格勒布省委已被彻底摧垮了，为防止被再次一网打尽，铁托采取了秘密工作手段，新建立的省委领导班子各部门领导单独工作，单线联系，由他本人统一指挥协调。经过长时间严格的考查和考验，确信警方的线索已被全部切断时，才重新建立起了新型的、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新省委。其它省委也按照这种方式逐步建立起来，并接受中央和铁托的直接领导。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又开始重新充满了活力。

1937年，苏联的肃反终于波及到了南斯拉夫，党的总书记高尔基奇成为“托洛茨基分子”被召回莫斯科而“失踪”。经过激烈斗争，铁托被共产国际任命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从此，南斯拉夫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

铁托担任南共总书记后，立即把中央由国外迁回国内，投入整顿和健全党组织的工作。

首先，铁托将不愿或不敢回国面对残酷斗争现实与人民在一起的人全部清除出中央委员会，以铁托为核心的国内领导班子逐步形成。

其次，铁托开除了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严重的个别领导人，加强全党的统一和团结，使共产党真正成为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先进组织。

第三，停止接受共产国际经济上的资助，保持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完全由国内自筹经费，根据国内实际，独立指挥南斯拉夫革命。

第四，提高全体党员的素质，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一方面，铁托恢复了停刊多年的党的喉舌《无产者报》的出版，他亲自撰写文章，结合时局特点，有针对性地向党员及党外积极分子进行形势教育。另一方面，则加快组织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秘密发送到各地供党员阅读学习，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卓有成效的，铁托所渴望建立的扎根国内的领导核心已经完成了。这些人人都比铁托年轻10岁到20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与铁托的关系与其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倒不如说是朋友之间的私人关系，他们对铁托都有一种神秘的依恋之情。这种感情是在非法斗争环境中逐渐培育起来的。英雄崇拜在南斯拉夫人中流传已久，犹如古贝奇对童年的铁托的影响一般。铁托富有魅力，有组织才能，在斗争中赢得了胜利，领导着一个坚强的、其成败将对南斯拉夫的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党，而他们自己对党、对党的事业同样负有一份责任。这一切，使铁托成为这一群年轻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理所当然的受到他们的爱戴，他们发自内心地对铁托表现出忠诚。这种强烈的友情，也只有在同患难、共生死之中才能激发出来。另外，南斯拉夫的民族传统也决定了朋友之间的感情，尤其是不同年龄层次的友人之情，往往会转化为家族概念中的父权主义。铁托的拥护者中的年轻人，不时地把铁托视为父亲般的人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而言之，当时铁托建立起的领导核心，已经成为与以往党的领导机关截然不同的战斗集体，已经成为极易集中、迅速形成统一的意志，而这种意志一旦形成便立即变为现实行动的指挥中枢。在铁托的精心领导下，南斯拉

夫共产党已经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为领导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法西斯入侵、解放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出生入死何止是好运相伴

艰苦的生活和丰富的阅历使铁托变得愈加机智灵活，依靠这一点，他一次又一次战胜困难，逃脱险境，躲过死神的多次追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铁托负伤被俄军俘虏，关进了战俘营。在这里，他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当时，战俘营的主要任务是修筑铁路，生活非常艰苦，他们仅仅依靠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维持生存。但战俘营的俄国工头偷窃红十字会发来的包裹，导致每天都有体弱多病的战俘不幸死去。铁托愤怒了，他向前来巡视的红十字会代表揭发了工头的可耻行为，红十字会对此进行了干预，工头受到了应有的处罚，但铁托遭到了可怕的报复。当天晚上，三个大胡子哥萨克人把他关进了监狱，在黑暗中用牛皮鞭子劈头盖脑的猛抽了他，整整打了30皮鞭，并准备在黎明前再下毒手，杀死铁托。牢房的动静引起了一个老狱卒的注意，铁托向他讲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老狱卒虽然表示十分同情他，但却无能为力。铁托灵机一动，恳请允许被打死前再吃一顿饱饭。他就用那把餐刀在墙上挖了一个洞，逃了出去，悄悄躲到了附近的村中。几天后，俄国二月革命暴发，沙皇被人们推翻了，铁托回到了俘虏营，憧憬着南斯拉夫的美好未来。然而，情况骤变，二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政府对工人阶级下了毒手，铁托得到要再次被捕的消息，决定逃往彼得堡。但彼得堡也一样，无法安身，他只好再次逃亡，目标是芬兰，但不幸的是，在边境上被俄国警察逮捕，并被判放逐到孔库尔。在火车上，铁托一直在寻找逃跑的机会。车到叶卡特琳堡后，机会终于来了，他对押送的看守说要离开车厢去取水煮茶，被允许后，他迅速走出车站。不巧，刚出站就碰见了从站外赶回来的另一名看守。情况危机，铁托急中生智，先发制人，向着守大喊一声：“你好！”趁看守发愣之机，飞快地跑入人群。等看守反应过来，举枪之时，为时已晚了。

铁托返回月台，极其敏捷地跳上一辆已经启动的列车。上车后，他立即脱掉外套，将服装整好，找了一个位子坐了下来，表面上镇静自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他不时用流利的俄语与周围人搭话、闲聊，绝没有人会想到他会是一位奥地利战俘，是一名在逃犯。

但叶卡特琳堡站已经把一名战俘逃走的消息通报了沿途各站，要求各站宪兵注意察访。车到图门站后，一名宪兵上车，检查旅客，径直走向铁托。铁托内心十分紧张，但丝毫不露声色，继续用熟练的俄语与周围人交谈，宪兵看了一会，就离开了。接着查票员开始查票，当查到铁托时，他决定摊开双手，什么也不说。这一招还挺灵，查票员向他笑了笑，就去盘问下一个人了。

当火车抵达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时，十月革命暴发了，铁托向工人赤卫队如实讲了自己的情况，工人们则让他赶回俘虏营。俘虏营已经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组成了红色国际纵队。铁托参加了由捷克人、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波兰人等组成的红色纵队。但还未来得及上前线，便发生了突变，捷克军团发动了叛乱，联合白军打跨了红色纵队，铁托不得不再次逃走。他躲到了离鄂木斯克几十英里的吉尔吉斯人居住的村子里。但由于语言不通，很快就被白军的“讨伐队”所捕获。此时的白军已节节败退，但也变得更加疯狂。他们认为铁托是布尔什维克的间谍，对他进行了严格审问，企图获得所需要

的情报。在没有结果后，白军便把他押到高尔察克部队一个师的司令部里。一个白匪军官假装给“前线”打电话：“那就是说我军在前进，拔掉了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好极了！那就是说，我们明天将转入总攻？”他一边打电话，一边观察铁托的神情，铁托明白他想干什么，便坐在那里毫无表示。于是，审问又开始了，铁托不再沉默，他一边不着边际的回答以拖延时间，一边苦思脱身之计。这被拖延的宝贵时间又一次挽救了他的生命。当恼羞成怒的白匪军官命令将铁托拖出去枪毙时，外面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红军攻了上来，铁托终于幸免于难。

1937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这期间，共产国际交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重要任务是组织南斯拉夫志愿人员赴西班牙，直接支援西班牙工人阶级反对佛朗哥的武装斗争。

铁托的任务是开拓一条由萨格勒布到维也纳再到巴黎的通道，以便将志愿人员安全送抵西班牙。

铁托前往巴黎的护照是一个捷克工程师的护照，他精心打扮得与工程师身份相符，举止文雅，衣冠楚楚，花起钱来也颇为大方，但铁托心里依然惴惴不安。由于时间非常仓促，护照做工不太精细，如仔细察验，就会露出伪造的蛛丝蚂迹。火车抵达南斯拉夫与维也纳边境后，南斯拉夫警察开始检查护照，铁托看到旁边有一位奥地利妇女，怀里抱着一个正在睡觉的不到一岁的小孩子，从皮包里找护照很不方便。他灵机一动，立即从妇女手中接过小孩，把自己的护照递给警察，同时，在小孩的屁股上用手轻轻的拧了一下。警察刚打开护照，小孩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警察吓了一跳，而且恰在这时，小孩又足足的撒了一泡尿，铁托自己也吃了一惊，抱起孩子，尿还在撒，细流落在他整洁的裤子上。周围的旅客轰堂大笑，警察也被逗得笑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对护照没有检查，盖上章，交给铁托走开了。

铁托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连续奔波的疲劳一下涌了上来，他昏昏沉沉的睡着了。傍晚，火车抵达德法边境，希特勒的边防人员进入车厢，开始检查护照。铁托被叫醒后，便把护照递了过去。警察用德语问铁托的名字，过度的疲劳使他无论如何也记不清护照上的名字。“你的名字”，德国人开始愤怒了，他又一次问道，铁托还是想不起来，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时间，铁托迫切需要时间，他突然想起了拖延时间的办法，他假装不懂德语，于是用捷克语问身边的人，“警察需要我做什么？”“他问你的名字。”拖延起了作用，护照上的捷克名字终于出现在他的脑际。“哦，我叫马尔多洛夫。”他说出了那个名字。警察信以为真，以为铁托真的不懂德语，便怒气冲冲的冲他嘟囔了几句，在护照上加盖了章，把护照还给了铁托。

铁托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还表现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内部的斗争上。前文所述，高尔基奇“失踪”后，南共总书记出现了空缺，谁将担任此职，坐上党的第一把交椅，成为斗争的焦点。

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特殊情况，党内派系林立，既有各地方的派别之分，又有国内与国外党员之分，还有民族之分等等。在共产国际，流传着对南共的这样一种评价：两个南斯拉夫人——三个派别。

本来，铁托作为组织书记，党的第二把手，在总书记的职位出现空缺时，依次填补这个空位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进行艰苦地斗争，对于党内的这种形势。铁托的内心非常清楚。

在巴黎，铁托立即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中央委员中，以及在中央

委员会之外都有铁托的反对派。这时，弗拉基米尔·乔皮奇也在巴黎，过去，他曾因反对高尔基奇而被共产国际和南共中央撤销了中央委员职务，现在，他成了反对高尔基奇的英雄，高尔基奇下台了，是不是总书记的交椅该轮到铁托坐一坐了。他的支持者中，有扬科·纳瓦诺维奇等一批人，他们在共产国际中也是暗中有人支持的。

在中央委员中，反对铁托的有拉市德·库索瓦茨和伊沃·马里奇二人。铁托发现，这两个人是采取两面派手段的，他们表面上一切工作均听从铁托的安排，但在背地里却干着反对铁托的勾当。一方面，他们从西班牙归来的志愿人员中寻求支持，另外则与狱中的彼得科·米莱蒂奇暗中联系。米莱蒂奇很年轻，但是一名演讲家，具有很强的煽动力，在南国内、党内有一大批追随者，也深得共产国际某些要人的赏识，铁托早就听说他是一个危险人物。

为了对付这些人，铁托也在寻找支持。在西班牙志愿人员中，铁托找到了密友博罗斯·基德里奇和马斯拉里奇。他们两人秘密联络志愿人员，通过各种方式，宣传铁托的主张以及党内斗争的状况，获得了广泛支持。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为南斯拉夫的文武官员，其中有24人成为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将军，是铁托忠实的革命伙伴和部下。

铁托掌握了马里奇和库索瓦茨的活动证据之后，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当众公布了两人幕后活动的大量证据。由于消息封锁得十分严密，这两人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马里奇和库索瓦茨毫无心理准备，惊慌失措，无力辩解，遭到了其它中央委员的批判和指责，最后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对于米莱蒂奇的活动，铁托通过狱中的关系，了解得十分清楚。他取得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委任老友莫萨·皮雅杰为中央委员，要他负责狱中党的工作，并在狱中党员里揭露米莱蒂奇的阴谋。“这种斗争持续不断进行了两个半月，只是在莫萨同志得到中委的委任后，才得以将米莱蒂奇和他的一小撮拥护者在党组织里孤立起来，……莫萨肩负起了主要担子，他好几个月没有脱衣服，白天要进行讨论和辩论，晚上，他又要用暗语给中委写报告”。狱中党委所写的《狱中报告》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斗争情况。

这两次斗争胜利后，铁托在国内已经建立了自己牢固的根基，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核心。于是斗争的重点由国内转往共产国际。

铁托心里非常明白，虽然南斯拉夫革命的前途不在巴黎，也不在莫斯科，而在南斯拉夫国内，但是，在当时的形势和环境下，要想真正成为南共的领导人，就必须处理好与莫斯科的关系，取得共产国际的信任。于是他不断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写信汇报国内的工作，党内的斗争情况，介绍国内党的各级组织的建立情况，以及他领导南斯拉夫党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向西班牙派出大批志愿人员支持西班牙革命的艰苦过程。这一切，都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和首肯。取得了季米特洛夫的信任后，他又写信报告了马里奇和库索瓦茨的阴谋活动，并说他已经采取了断然措施，撤去了他们党内的职务，以挽救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在信的最后，铁托写道：“季米特洛夫同志，你愿意亲自设法解决我们的问题吗？如果对我不信任，就必须任命另一个人，并给予他道义上的支持，但决不能任命流亡国外的腐败集团中的任何人。我感到我对国内的党员负有巨大的责任，就这一点来说，我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依据国内的干部并将国内的领导责任置于党的控制之下。”

由于共产国际看到铁托在国内受到的广泛支持，享有崇高的威望，加之他对共产国际的谦逊态度，赢得了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共产国际的欣赏，他们决定全力支持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共产党。米莱蒂奇等人在莫斯科被逮捕，铁托则被正式任命为南共总书记。铁托经过机智灵活的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使南斯拉夫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反法西斯战场上，铁托同样面临了生与死的考验。1944年，德国在欧洲战场屡遭失败，处境不妙。希特勒为了稳住南翼，彻底打垮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精心策划了一次代号为“跳马”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偷袭南人民军总司令部，活捉铁托。5月25日凌晨，大批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群对设在达德瓦尔的铁托司令部实施狂轰滥炸，并投下500多名伞兵，人人手持铁托照片，迅速推进，很快打到了铁托办公的岩洞里，并用机枪封锁了洞口，而司令部的周围，并没有驻扎多少南斯拉夫人民军战斗部队。铁托立刻意识到情况严重，但他并没有惊慌失措，他异常沉着冷静，一面指挥人员抵抗，一面考虑突围的办法，他望着岩洞不断向下的流水，立即想到，水既然能流下去，那下面肯定是空的。于是他立即下令扩大水流孔。果不其然，洞口扩大后，立即看到了下面的河床，他们抓住绳子，攀缘而下，到达河床，然后快速涉河，从小路突出了包围圈。由于铁托的机智、沉着，使岩洞里所有的领导人全部脱险。希特勒精心策划的“跳马”行动，就这样失败了。

五、大打人民战争

1941年4月5日，法西斯德国对南斯拉夫发动了闪电式袭击，希特勒的军队出其不意地占领了南斯拉夫境内被称为“铁门”的多瑙河咽喉杰尔达普。第二天，德国出动了450架飞机，对贝尔格莱德进行了长时间的狂轰滥炸。7日，轴心国军队占领斯科普里。10日，萨格勒布失守。14日，南斯拉夫最高指挥部决定交出军队，南军33万多名士兵和6900多名军官成了德国俘虏。15日，南斯拉夫政府与佩塔尔国王逃往希腊。南斯拉夫大部地区被划归邻国，其余地区则处于军事占领之下。戈雷尼斯和什塔耶尔被德国吞并，剩下的斯洛文尼亚地区则划归了意大利，匈牙利得到了普雷科穆尔那、梅久穆尔耶、巴奇卡和巴拉尼亚。保加利亚则得到了它老早就垂涎三尺的马其顿奥赫里德以北的地段以及科索沃的一部分和塞尔维亚东部地区。黑山被意大利接管，塞尔维亚剩余地区受德国军事长官直接管辖，克罗地亚则被宣布为独立国家。

在希特勒军队进攻萨格勒布的当天，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体南斯拉夫人民发出了号召：“你们正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并为它而死去，……不要沮丧，团结起来，不要在你们所遭受的沉重打击面前低下头来。”

6月27日，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会，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成立反对侵略者的武装斗争总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在全国各地建立民族解放游击分遣队。7月，正当几乎整个欧洲都处于法西斯铁蹄之下，法西斯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领导下，举行了震撼巴尔干半岛的武装起义。一时间，武装起义席卷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和马其顿地区，数以万计的人民加入了游击队的行列。

行动最迅速的是黑山地区。黑山地区是意大利占领区，这里的起义，从7月13日开始，很快形成燎原之势。几个月的功夫，黑山全境被解放，解放区的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意大利军队遭到重大损失，仅梅西纳师伤亡人员即达5000人。

起义发展最稳健的是斯洛文尼亚。在这里，德国占领者妄图推行德意志化，占领者不承认此地斯拉夫人的民族特性，对敢于反抗的斯洛文尼亚人采取残酷镇压的政策。1941年底，德国占领者把斯洛文尼亚全境内608名斯洛文尼亚族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中的478名抛进了集中营。

这样，在斯洛文尼亚全境，很快出现了400多个“解放阵线”地方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领导斯洛文尼亚人采取各种方式，与占领者展开斗争。有些斗争形式别出新裁，而且颇具实效。如“解放阵线”在卢布尔雅那组织了全民性大规模抗议活动，使人们在规定时间内离开街头和公共场所。这样，卢布尔雅那在1941年被占领后曾两度出现全市性“万籁俱寂”的景象：一次在1941年10月29日，即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共同摆脱奥匈桎梏23周年纪念日；另一次是1941年12月1日，即南斯拉夫国庆日。

塞尔维亚一直是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基地。在西塞尔维亚，10支游击队很快组成，发展成有8000名武装战士的大军。解放区也日益扩大。1941年秋，从贝尔格莱德市郊一直到乌日策，解放区连成一片。这期间，德军伤亡达6000余人，约有400名官兵成为游击队的俘虏。

1941年底，南斯拉夫全国建立了60支游击队，9个独立营和12个独立

连，总人数达 60 万人。南斯拉夫游击队积极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法西斯占领军，建立了人民政权，取得了巨大胜利。事实证明，德国的战术极不适宜对付游击队。他们在向游击队据点发动进攻时，总是排好阵式，像在阅兵场上一样，整齐地向前推进。一个士兵倒下去，后面的一个士兵立刻上前补缺，这当然吃了大亏。在塞尔维亚任军政府首脑的前党卫军旅长特纳在向占领军司令部的报告中提到：“游击队在森林里的那种阵地干脆无法正面进攻。目前虽然加紧宣传，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作战不利，但这种宣传对游击队不起什么作用。我们获得的印象是：甚至传说苏联投降也不能使这帮匪徒屈服，他们善于魔鬼似地恢复元气。此外，他们的组织是出色的，一个秘密组织应是什么样，他们足以为楷模。”

在游击队日益猛烈的打击下，德军被迫撤离了恰恰克和乌日策。德军撤离后，游击队的总部从克鲁帕尼迁到了乌日策。这样，乌日策成为南斯拉夫第一块被解放的土地的象征，它周围的解放区，被人们称之为“乌日策共和国”。解放区内有 100 多英里长的铁路，而且普遍建立了邮政系统。学校也办了起来，出版了报纸，《战斗报》每周出版三次。在解放区，人民委员会代替了各级旧政府。而在塞尔维亚农村，德军对三分之二的地区也失去了控制。

南斯拉夫游击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并取得辉煌胜利，使德意法西斯非常惊恐。法西斯占领军为了巩固在南斯拉夫的统治，力图消灭铁托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整个占领期间，先后发动了多次疯狂的进攻，其中规模最大的有 7 次。每次进攻，德意法西斯军队都集中了优势兵力，使用各种手段，向人民解放游击队总部所在地发动进攻。游击队则在铁托总司令的指挥下，先进行防御，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与敌人作战，然后，寻找有利时机转入反攻，解放更多的地区。每一次战役，铁托都身先士卒，同前线战士们一起英勇杀敌。

1942 年 9 月 28 日，德军集中 4 个师的兵力向塞尔维亚西部和舒马迪亚解放区大举进攻，发动了第一次攻势。当时游击队总司令部设在乌日策。11 月 2 日，正当游击队主力同德军作战时，切待尼克伪军偷袭了乌日策。铁托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决定一方面阻击敌人，一方面向波斯尼亚作战略转移。当时负责阻击任务的是只有 300 多人的工人营，他们在卡迪尼察山顶住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全部壮烈牺牲，铁托则指挥其它游击队迅速转移。这次战斗，游击队消灭敌人 1600 余人，并实现了保存实力的主要目标。

德军不甘心失败，决心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当年冬天，趁游击队活动困难之机，调集大批军队，以 3.5 万意大利军队和南斯拉夫伪军实行大拉网式作战，包围了东波斯尼亚和黑山解放区，连续发动两次大规模进攻，企图彻底消灭游击队主力。时值严冬，皑皑白雪封住了大小山林和乡间道路，铁托依靠当地人民的帮助，声东击西，左穿右插，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周旋，使德军疲于奔命，而游击队则突破了敌人数次包围和堵截，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顺利转移到了卡利诺维克新解放区，同那里的游击军胜利会师。12 月，铁托将游击队改编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1943 年 1 月，德意法西斯集中 6 个德国师和 3 个意大利师会同南斯拉夫伪军，发动了第四次进攻，企图消灭波斯尼亚东南部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铁托指挥若定，以小股部队迷惑敌人，主力则向黑塞哥维纳转移。经过艰苦战斗，铁托率领队伍来到奈雷特瓦河边。这是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在这里，铁

托巧妙的使用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为了迷惑和调动敌人，他下令炸毁河上的五座桥梁，并发了一封假电报说：“我们已胜利向北方突围”，铁托还派出小股部队大张旗鼓北上。德军果然上了大当，急忙将主力调往北方的雅伊策附近进行堵截。这时，铁托抓住战机，抢架浮桥，强渡奈雷特瓦河，终于突破了敌人封锁线，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43年5月初，德、意、保加利亚13个师连同伪军部队共13万人又发动了第五次进攻。当时，铁托指挥的解放军部队只有2万人，连续作战，粮食、弹药及其缺乏，但战士们以高昂的斗志与数倍的敌人在苏捷斯卡河谷展开决战。战斗异常惨烈，打死打伤敌伪军3万余人，而解放军也有800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铁托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左臂负伤，仍坚持战斗，大大鼓舞了解放军战士的士气，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苏捷斯卡战役是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标志着南斯拉夫人民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到1944年初，人民军粉碎了敌人的第6次进攻，解放了一半以上的国土。5月，80万南人民军在全国范围内向法西斯占领军发动强大攻势。经过一年血战，终于于1945年解放了全部国土。

铁托在领导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争中，多谋善变，成功的指挥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战役，形成了一整套适合南斯拉夫实际状况的军事战略，显示出了他卓越的指挥才能。

第一，自力更生，进行人民战争。这是铁托整个军事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铁托和南共领导成员经常明确指出，解放不能等待盟军，也不能依赖苏联红军，“我们依靠了自己的力量，不接受任何人要我们沉默和等待的指示，我们确定了自己的战略，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行动和反攻之中”。依靠人民的力量，无限信任人民的伟大才智和力量，是铁托的一贯指导思想。

第二，以各种方式，联合各种爱国力量，使用一切可能的有利手段，在城市、农村展开各种各样的斗争，进行本国的民族解放战争。铁托指出：“因为我国军事战略的最终目的是驱逐一切占领者并战胜吉斯林（伪政府首脑），这就决定了我们作战的范围必然包括整个南斯拉夫全境。要用迅猛的军事行动出其不意的打击敌人的最薄弱环节。”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军事力量，动员最广泛的民众参加，这是战胜敌人的强有力的保证。

第三，建立革命军队的根据地。在军事作战的同时，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是军事战略和战役取得胜利的物质基础，对扩大武装斗争，粉碎法西斯军事围剿，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四，防御与进攻相结合。以攻为守，利用熟悉本国地理环境的优势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实行战略转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自己，拖垮敌人，是铁托军事战略思想的精髓。“必须让斗争精神完全深入我国人民军。不但进攻时候，防御时候也应如此。进攻精神与战略主动权是革命战略与战术的规律。这一特征应贯穿于解放斗争的一切战役。”

铁托的军事战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深受南斯拉夫人民的崇敬和爱戴。1945年11月，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铁托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并被授予元帅军衔。他也赢得了其它反法西斯国家的尊重。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他的书中写道：“全世界都在谈论着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铁托元帅的名声已远播五洲。他不仅解放了自己的国土，而且在战后的欧洲取得了光荣的地位。”

铁托的军事战略思想对南斯拉夫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不仅是东欧仅有的两个没有依靠苏联红军而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国土的国家之一（另一个国家是阿尔巴尼亚），而且为南斯拉夫战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和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纵横捭阖 自尊自强

1945年，南斯拉夫全国解放，但年轻的联邦人民共和国与西方盟国的关系迅速恶化了。

南斯拉夫与意大利在边境上的里雅斯特、萨拉、阜姆、伊斯底里亚等地存在着主权争议。1945年4月底，南斯拉夫人民军和盟军兵分两路向的里雅斯特发起攻击，双方都想抢先攻占这个有主权争议的地区，以便在该地区将来的归属上获得主动。结果，人民军率先攻占的里雅斯特，并以强大的兵力站住了脚。对此，盟军做出了反应，英国和美国政府给南斯拉夫政府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南斯拉夫军队在48小时内撤出这一地区，英、美撤出了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和军事使团成员，形势顿时紧张起来。与此同时，南斯拉夫第4集团军与英军发生了武装冲突，美国则不顾南斯拉夫的抗议，飞机不断侵入南斯拉夫领空。南军被迫反击，致使一架飞机迫降，另一架机飞被击落，战争一触即发。但苏联对此保持沉默，铁托孤立无援，被迫于6月9日与英美等国签署协议，南军撤出的里雅斯特。“人数不多的斯洛文尼亚人民在欧洲第一次放弃成为自己土地上的主人。”

在的里雅斯特事件上，由于没有得到苏联哪怕是道义上的支持，不仅被迫让步，丢了脸，而且南斯拉夫与西方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由于铁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世界特别是东欧地区威信明显提高，影响显著增强，成为巴尔干和东欧独立行使国家权力的象征。而此时，东西方冷战刚刚开始，斯大林绝不允许这种倾向抬头，他必须牢牢控制东欧和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巴尔干国家，以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处于有利地位。1946~1948年，斯大林不断把南斯拉夫领导人召到莫斯科，企图磨平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不驯服的棱角，以儆示其它国家。但铁托软硬不吃，坚决保持独立。于是，压而不服，不服则再压，这样，南苏关系便越来越紧张。同时，苏联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援助，口惠而实不至，并附带有许多政治条件。南斯拉夫人发现，在经济上自己与苏联实际上处于不平等地位，出口到苏联的物品价格被极力压低，而从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则价格昂贵，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同时，在各个工作领域中，苏联专家以“恩人”、“权威”自居，有的甚至当上了太上皇，出现了数不尽的矛盾和磨擦。

在政治上，苏联在南斯拉夫建立起情报网，雇佣南斯拉夫人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不断向南共高层渗透，大量收集南斯拉夫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并借此来干涉南斯拉夫的内政，干预南斯拉夫党政干部的安排，这更引起了视独立为生命的南斯拉夫人民的不满和反感，南苏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1948年3月，苏联命令从南斯拉夫撤出一切专家，理由是他们“在南斯拉夫陷入了不友好的境地，受到了敌对待遇”。这使南斯拉夫经济建设遭到了巨大损失。加之南苏两国两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和战后的一系列恩恩怨怨，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最后完全破裂。

在苏联的支持下，东欧各国也加入了反南斯拉夫的行列。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在南共缺席的情况下，发表宣言，开除南共。1949年，苏联及东欧各国相继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苏联在北部大兵压境，武装挑衅不断，南斯拉夫再一次被围，陷入了困境。

铁托和南共中央对形势进行了冷静分析，认为，对南斯拉夫来说，主要

危险来自苏联及其东欧盟国。西方是仇视共产主义的，但在冷战开始，东西方对抗加剧时，凭借南斯拉夫优越的地理位置，凭借南苏之间已破裂的微妙关系，可以争取到西方某种程度的支持，借以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这就是说，以对西方关系为突破口，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绝不动摇的情况下，做出心要的牺牲和让步，利用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使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化，从而牵制苏联不能轻举妄动。

西方也很快发现了南斯拉夫对西方的潜在价值，他们抓住这一千载难逢之机，对铁托支持，“使铁托免遭灭顶之灾”。于是，英美马上向苏联发出了警告，要求苏联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关系准则，不得干涉南斯拉夫内政，尤其不得以武力相威胁，并给予南斯拉夫大量经济援助。

于是，铁托的外交突围战役打响了。

第一战役，是联合国的战斗。南斯拉夫决定，从国家关系基本准则出发，对苏联的威胁进行公开揭露，从而取得一箭双雕之效。既粉碎苏联的外交图谋，又争取世界舆论特别是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与支持。并决定，在当年联合国大会上竞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扩大自己的影响，并通过竞选活动，争取友谊和支持。南斯拉夫得到了英美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如愿以偿，第一战役胜利结束。

第二战役是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

铁托在与西方进行谈判时，明确指出，西方的援助必须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否则，他宁可不接受任何援助。英美代表对此做出了承诺。

从1949年到1959年，10年期间，南斯拉夫获得价值约2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贷款、进出口信贷等，从西方购置了大量重工业设备，及肥料、种子等农业用品和军事装备等，增强了自力更生的能力。

随着经济往来的增多，政治坚冰也被打破，南斯拉夫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关系也发展起来。1953年，铁托实现了对英国的访问，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与铁托共进了午餐。在访英期间，铁托以平和的语调回答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孰优孰劣的问题。他说：“你们认为你们的制度好些，我们则认为我们的制度好些。但是，这必须留待未来作出判断，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那种制度在实践中更好；我们至今还没有机会来加以证明。”铁托坚持了自己的原则。

第三战役，是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1949年开始，铁托决定停止对希腊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支持，从而改善了与希腊的关系。随后，又与土耳其政府商讨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措施。于是三十个国家签署了巴尔干公约，使南斯拉夫的东南部边境获得了安全。

北部边界面临东欧，压力巨大，是南斯拉夫最危险的地段。这样，与奥地利改善关系已刻不容缓。铁托被迫丢卒保车，做出了牺牲，放弃了与奥地利有边境争端的卡林西亚地区的主权，两国关系迅速发展，成为亲密的经贸伙伴。

南斯拉夫与意大利也存有领土争端。为此，南斯拉夫与西方关系而恶化，双方差点大动干戈。不解决这个问题，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

的里雅斯特地区的领土，自上次冲突发生后，曾被分成A、B地区，A区拟定归意大利，B区拟定归南斯拉夫，但因南拒绝接受而实际搁置。南意两国关系微妙。1952年，盟国军管政府单方面开始将A区的军事和民政事务移

交意大利当局，企图借南当时的困难处境压南屈服。如南默认，就会失去进一步谈判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铁托绝不示弱，他以南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公开发表声明：南斯拉夫虽然弱小，但为了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不惜动员全体人民决心死战。南斯拉夫的强硬态度迫使意大利方面作出让步，同意双方谈判解决领土争端。

铁托取得主动之后，在随后进行的谈判中，为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铁托又作出了一些让步。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南斯拉夫放弃了对的里雅斯特及其腹地的要求，但得以将 B 区的界限向 A 区推移了相当距离。另外，还得到了它所要求的哥利西亚的部分土地。这样南斯拉夫与西方特别是意大利的关系获得了根本改善，不但使西部边界成了安全的边界，而且还与意大利成了重要的贸易伙伴。

铁托又一次获得了成功——与西方的关系全面恢复了。

第四大战役，向东方突破。

1953 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两年后，赫鲁晓夫率团抵达贝尔格莱德，对南斯拉夫进行访问。在双方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代表苏联向铁托道了歉，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贝尔格莱德宣言》。双方一致同意“国内改革或社会制度差别的问题，采取不同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完全属于各国自己的事情”。

铁托坚持两国的宣言是国家政府之间的事，南苏发展的两国之间的平等关系而并非党与党之间关系的恢复。

赫鲁晓夫的来访，是铁托的巨大胜利，它标志着南斯拉夫已渡过了困境，包围已全被打破。随着苏南关系的改善，南斯拉夫与东欧的关系也全部打开。

同时，这次访问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里程碑。苏联第一次承认各国共产党有权按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其意义巨大而深远。

第五大战役，不结盟运动。

南斯拉夫在发展东西方关系的艰难曲折，使铁托备尝了酸甜苦辣。在全球两个军事集团对峙日益加剧，集团政治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像南斯拉夫这样既不想加入东方集团，又不想加入西方集团的中小国家的作用，是铁托一直思考、探索的问题。他最终找到了出路，这就是不结盟概念的提出与实践。

1956 年，铁托邀请非洲国家独立运动的先驱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对亚洲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南斯拉夫，他们三人促膝长谈，探讨了中小国家在世界中如何发挥作用及各国之间和平共处的可能性。1961 年，南斯拉夫、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加纳等 23 个不参加任何集团的国家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首次不结盟首脑会议。会议确定了不结盟运动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到 1986 年，不结盟运动成员已发展到了 101 个。

为推动不结盟运动的发展，1956~1968 年，铁托先后出访了 30 余个国家，足迹遍及五大洲，受到被访国家的隆重接待。

随着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和铁托的国际声望得到了极大提高——1970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相继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正式访问。次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也访问了贝尔格莱德。

作为一个中小国家的南斯拉夫通过铁托的外交努力，能够赢得东西方集团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尊重，能够将这些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召到贝尔格莱

德，这不能不说不结盟运动的伟大创举和铁托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和策略的巨大成功。

七、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它没有多少先例可循。因此，南斯拉夫解放后，也像战后其它新兴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以苏联的发展为样板，学习苏联的榜样，进行国有化和土地改革。这两项工作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进行得都很顺利。

按照苏联的模式，南斯拉夫很快制订出了自己的五年计划。这个计划，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制订了宏伟的蓝图：在社会主义苏联的帮助下，充分挖掘本国工业的潜力，迅速消除战争的创伤，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南斯拉夫。

这个计划公布后，得到了南斯拉夫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正如铁托后来所说的，人民是好样的，个个都在拼命劳动。

在具体做法上，五年计划与苏联非常相似，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计划。五年计划被分解为年度计划、月计划、周计划，甚至日计划，中央为每个共和国、每个工厂、每个部门规定任务，工厂被告知生产什么产品，其原料、能源由国家统一供应，其产品则由国家统购统销。仅南斯拉夫年度计划一项，用纸重量即达 3300 多磅。联邦和各共和国的 270 名部长向企业负责人下达命令，而企业负责人每年也要向政府部门发回 600~800 份报告，详细报告企业的生产、原料、产品、设备、能耗等具体情况。这样的计划经济把南斯拉夫有限的资金用到了经济建设最需要的地方，为战后全国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

但这种计划的缺陷和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能切合南斯拉夫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无法调动各地方的积极性。计划从理论上看起来完美无缺，包罗万象，但在实际生活中却造成了许多问题，产品品种不对路，供需矛盾加剧，一部分产品严重积压，无人问津，而另一部分产品则严重短缺，供不应求，黑市价格暴涨。

更为严重的是，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之后，国内经济生活出现了巨大困难，国内经济情况危急万分。五年计划已经制定，许多工厂刚刚开始建设，还有一部分则建了一半，等待着从波兰、捷克以及苏联运来机器，但苏联与东欧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各种专家全部撤走，所有经济合作条约全被撕毁，已经建立的工厂，将有相当一部分会毁于一旦。与苏联和东欧的贸易迅速衰减，工业生产急需的原材料被迫停止进口，许多工厂停工待料。与西方国家进行的贸易谈判也因政治问题而毫无进展。国内物资极度匮乏，粮食实行配给制，工业品则凭票定量供应。

在农村，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农业合作社与集体农庄，不仅没有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农民怨声载道。农村矛盾越来越多，农民与政府的矛盾也变得尖锐起来，不少地方出现了“抗粮”事件。面对现实，铁托采取了最大胆、最彻底的做法，解散农业合作社，把所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部分给农民，让农民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上。这是铁托自力更生、独立发展南斯拉夫经济迈出的第一步。结果，获得了成功，农村经济开始稳定，农业产量逐年稳定提高，围绕南斯拉夫人民的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了。

工厂中的情况也不妙。但工厂怎么办呢？工厂不像农业可以分散依靠手工劳动。它是工人赖以生存的场所。工厂，尤其是国营工业，是全民所有制

企业，是社会主义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农业合作社可以解散，把土地分回给农民，但工厂却不能解体：把厂房和工具分给工人。

铁托和南共中央领导人经过仔细讨论和研究，最后，提出了“工人自治”的概念，并将它付诸实践。

说来有趣，“工人自治”的概念，竟源于南苏之间有名的大论战。

1948年春到1949年初，南苏两国共产党就政治、经济、军事、国与国的关系、党与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论战，双方来往的函电多达几十份。为了引经据典。双方都开始重新学习和阅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以便以革命导师的语录为武器，反驳对方的观点，证明自己的正确。在这场紧张的“学习”战中，南共中央的吉拉斯和吉德里奇意外地得到了“副产品”。他们从马列原著中发现了导师提出的“工人联合生产”的概念，并认为，它符合南斯拉夫当时国内的实际。于是，扩大党内民主、扩大生产单位自主权，既保证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绝对领导权，又能给下层和地方以更大的民主和权力，调动地方和广大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这一概念成为南共领导人议论的主要话题。“工人自治”制度应运而生。

“工人自治”制度的具体内容是：通过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的选举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成为工厂的最高权力机构。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直接对工厂进行管理，负责工厂里从生产计划到利润分配的一切重大问题的决策，工厂委员会定期改选，以真正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

“自治制”由局部到整体，由浅到深，逐步在南斯拉夫全国推广开来。1950年，“自治”出现于困难重重、国家无力投资解决的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仅半年，就取得了良好效果，依靠广大工人的投资，这两个部门迅速恢复了活力。于是，6月，南斯拉夫政府颁布《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和最高经济联合基本法》，彻底改革南斯拉夫的全民所有制形式，把工矿和交通运输企业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由直接生产者进行管理。形式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这种管理机构来进行管理，1952年，南斯拉夫又颁布《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彻底废除了计划经济模式，改变了国家计划体制，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从此，国家不再对企业下达统一的计划，而是提出计划比例和国家指标，供企业参考。企业的发展计划自主制定，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向国家纳税后，不再向国家交纳利润，由企业自行决定税后利润的分配。取消了固定工资，收益与效益相挂钩，企业人员多劳多得。

1953年，南斯拉夫政府又颁布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 and 政治组织的基础与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基础的根本法》，把自治原则扩大到了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社会活动领域和政治生活之中，企业自治发展成为全面的社会自治。1964年，南斯拉夫取消了国家投资基金，改由银行贷款。这样，取消了国家对扩大再生产的控制权，而把这一权利完全下放到了企业。七十年代，铁托又把“联合劳动”的原则纳入了自治制，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这一制度。

这一制度，符合南斯拉夫当时的国情，极大地调动了各个地方政府和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加快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到七十年代，南斯拉夫已由欧洲最落后的中世纪农业国家一跃而成为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中等发达国家，其国防和军事实力更跃居欧洲前列，当然，自治制度也给南斯拉夫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是民族主义

倾向抬头和地方主义的出现。虽然铁托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多年来树立起来的个人权威，牢牢的控制着局势，但他去逝后，这一隐患，终于成为南斯拉夫内战爆发的根源。

铁托对南斯拉夫自治制度极为看重，他指出：“工厂属于工人，土地属于农民，这不是一句抽象的宣传口号，而是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体现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所有制、工人的权利与义务方面的整个纲领。因此，只要我们真心诚意要建设社会主义，它是能够而且必须在实践中实现的。”

在一个时期，自治制度曾被看作南斯拉夫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南斯拉夫式社会主义的一大象征，为世人所瞩目。

毛泽东谋略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里。1913年在长沙进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早期即开始革命活动，接受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办《湘江评论》，建立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等革命组织。1921年7月，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创始人之一。1923年6月，到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组织部长。1924年初，协同李大钊等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代理部长。1926年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曾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在湘赣边界发动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接着，率领部队进入井冈山地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30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1931年11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江西瑞金建立，任主席。1933年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负责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又被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担任此职务直至逝世。抗日战争中，于1943年3月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主席，以后在历届中央委员会上都连续当选，直到逝世。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年12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1976年9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一、重视多数注意联合

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一直都非常强调重视多数，联合多数。这是他博大精深的谋略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

1936年，在陕北延安，毛泽东向采访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幽默地说，在他少年时代，为了在家中反对处于“执政党”的父亲，就和母亲、弟弟，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组成“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后来，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毛泽东很喜欢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他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他联系，并指明要结交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二十八划生招友启示”，这也反映了毛泽东寄望多数，主张联合的思想。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这一思想更为明显，他把民众的大联合，看作是解救和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他在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

但是，中国革命复杂得很，社会也十分复杂，怎样才能做到联合多数，达到解救和改造社会的目的呢？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系统地提出了争取多数、联合多数的办法。这就是首先要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从的拥护，而人民群众的主体则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很高，作用很大，因此必须要首先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用毛泽东话说，就是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要十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从而了解革命，拥护革命。毛泽东一贯强调纪律性，对群众利益要秋毫不犯，他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我党我军的发展史上，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争取多数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要争取中间力量。但要做到这一点，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完成。毛泽东有三条争取中间势力的原则：一是实力原则。中间势力是一个动摇的势力，左右游移不定。其动摇的方向和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进步势力有无力量，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势力如果没有相当的力量，没有坚强的组织和强大的武装，中间势力就会小瞧你，不听你的，那就谈不上争取他们到你这一边。二是胜利原则。这其中包括对敌对势力的胜利，也包括和中间势力的共同胜利。三是物质利益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要尊重中间势力的利益，使他们得到实惠，至少不损坏他们的利益，同时对其进行适当的政治教育。

毛泽东争取多数的谋略思想，还包含着对敌对势力的某些方面、某些范围、某种程度上的争取，尽可能地使敌人的某些部分或某些方面保持中立或不反革命，减少他们危害革命的程度，以便集中力量于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例如，地主买办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死敌，但也不是铁板一块。在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就预言说，在日本大举侵略中国面前，“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毛泽东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作英美派和亲日派。他说：“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

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按照这种分析，毛泽东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包括蒋介石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毛泽东也很清楚，蒋介石集团虽然有尚能抗日的一面，也有坚持反共的一面，因此对他们也不能搞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必须是既联合又斗争。对其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中国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毛泽东这种办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对敌对势力的斗争要留有余地，不要使他们横下心来与革命力敌到底。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尽可能地减少、限制其对革命和社会破坏的程度。譬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地主采取了“也分配给地主一份和农民同样的土地，使他们从事

耕种，以免流高夫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的政策，土地革命和历史实践也证明这种办法是对的。与此相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却诬蔑毛泽东是错误的，给毛泽东扣上了“富农路线”的大帽子，硬要求搞所谓“地主下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火政策，在肉体上消灭地主，在经济上消灭富农。结果把不少地主逼到绝路上，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反对共产党苏区政府和红军，给苏区的生产发展和社会安定造成了严重地破坏。

二、“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

毛泽东来自农村，崛起于农村，农村与农民问题是他一生最为关心和耗尽心血的大问题。三十年代毛泽东曾对美国进步作家斯诺如是说：“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这是一句充满高度哲理性的结论，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之间的辩证关系。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总结自己几十年革命经验时又说：“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农民有着一种十指连心的情感。正是在农民问题上，他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成为他一生中最富有创造性的伟大贡献之一。

为什么毛泽东对农民如此看重，抱有这样高的期望和热情呢？这是因为他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感受到，革命的坚实基础在农村，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主力军。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中国中南部湖南省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农民家庭。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青年时期因负债过多，被迫卖掉家中土地，外出当兵。几年后，毛顺生回到村里，继续务农并开始兼做小生意，很快买回并增加了土地，上升为中农。随后，他继续务农经商，终年勤劳力作，生意越做越红火，成了韶山冲的“小财东”。毛顺生对家人和孩子要求十分严格，他虽粗暴而行家长专制，但却是一个生财有道的典型中国农民。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家庭中度过的。他从小就从事艰苦的田间劳动，了解农民的疾苦。他深受烧香吃斋，颇富同情心的母亲的影响，厌恶父亲的家长制作风和吝啬，常与母亲背着父亲接济穷人。长沙饥民与彭铁匠惨死的消息，韶山冲贫苦农民“吃大户”的运动，都在青少年的毛泽东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进入青年时代，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在这里，他接受了新思想，吸吮了新的知识，开始知道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军阀的横行，“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在俄国革命的感召下，毛泽东立志投身反帝反封建革命，“改造中国与世界”。不久，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决心为共产党人的近期和最终目标奋斗终生。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毛泽东，这时似乎超越了土地，全力投身于城市的工人运动。但是，革命的实践使他很快明白，革命坚实的基础仍在农村，他的眼光又回到了他曾熟悉的地方，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的1925年2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韶山，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工作，“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他就组织了20多个农会。毛泽东吸收一些先进分子在农村建党，成立了韶山党支部。韶山党支部领导农民开展对地主豪绅的斗争。这次湖南之行对毛泽东影响很大，虽然他的活动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他抓起来，迫于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回到国共合作的中心区域广州，但是，经过这次组织湖南省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已感受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他开始改变以前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阶级斗争程度的作法。

到广州后不久，毛泽东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还负责训

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他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 21 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古来的学生。在这段时期中，毛泽东根据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愈加感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写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他以自己组织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及研究为基础，于 1926 年 3 月写了篇名叫《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通过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分析，指出中国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和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各阶层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受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毛泽东这一正确看法遭到当时中共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反对。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 1927 年才达到高潮。”

毛泽东是个对自己的信念坚定如一的人。当他认为自己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有益于革命发展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全力去进行。1926 年下半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全国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湖南成了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长期身受封建势力压迫的农民，很快投入国民革命的洪流。湖南、湖北的农民纷纷组织起来，建立农民武装，成立农民协会，向不法地主、土豪劣绅发动猛烈地进攻。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农会成了农村中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对于农民力量的崛起和农村出现的大变动，毛泽东兴奋不已，他在 1926 年 9 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强调“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1926 年 11 月，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主持制订了《目前农运计划》，强调全国的农民运动除广东外，应以湘、鄂、赣、豫 4 省为重点，同时在陕、川、桂、闽、皖、苏、浙 7 省全面展开。1926 年 12 月，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又强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大会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湖南省农会会员由 1927 年 1 月的 200 多万人到 4 月就猛增为 500 多万人。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到 1927 年 3 月，农民协会组织已遍及全国 18 个省，有组织的农民达 800 多万人。

对于农村革命高潮的兴起，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右派极端恐惧和仇恨。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是什么“痞于运动”、“情农运动”。为了驳斥他们的攻击和诬蔑，1927 年 1 月至 2 月，毛泽东深入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做了 32 天的考察，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指出农民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因素，无产阶级只有取得农民这一最可靠的同盟军，革命领导权才有保证，中国革命才能胜利；在文章中，毛泽东总结了农民运动的经验，强调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的重要性，指出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分析了农民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提出了党在领导农村斗争中，应实行的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阐述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热情地歌颂了在农村中出现的革命群众运动，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同时，

还有力地驳斥了诬蔑农民运动“糟得很”、“痞子运动”、“情农运动”等反动论调，指出农民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但是，在陈独秀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拒绝采纳毛泽东关于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的建议。陈独秀根本不懂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甚至陈独秀还把毛泽东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是毛泽东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在1927年春夏之际，当大革命处于最危机的关头，由于陈独秀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因而在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大肆屠杀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国民革命遭到重大失败。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谈起1927年春夏之际国民革命的情形时这样说：“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事实上，大革命的失败，已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来看待的观点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很显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度里，无产阶级只有放手发动和依靠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领导权才有切实的保证，才能取得革命胜利。通过对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更加坚定了他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因而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他率先带领起义部队转入农村，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新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最终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

毛泽东不仅在革命的实践中较早地认识到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善于充分发挥农民的力量，用正确的政策去赢得农民。

还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通过实地考察，访贫问苦，潜心研究，将农民们遭受的痛苦归纳为六大类，即重租剥削；高利贷剥削；征收重捐；剥削剩余劳动；军阀与贪官污吏相勾结，包缴和预征田赋对农民肆行掠夺；受商人剥削。毛泽东认为，上述诸种剥削相结合，使绝大多数农民被迫失去土地，而大量的土地却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广大贫困农民陷于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惨境。因此，毛泽东的结论是，所谓农民问题，其内容就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27年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就开始了土地革命斗争。1928年10月，毛泽东总结了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红四军开辟赣南根据地以后，1929年4月，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将原来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在土地分配的方法上，毛泽东还总结了闽西、赣南地区土地革命的经验，坚持了按人口而不是按耕作能力和劳动力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同时又肯定了不再打乱平分，而根据耕地数量和质量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1930年毛泽东又集中精力在江西寻邬和兴国等

地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坚持以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的同时，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问题，指出农民过去“只有使用权”，因而不安心耕种，各级政府应宣布农民过去分好的田，即算分定，“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由”。这样，经过毛泽东及其他各革命根据地领导人的努力，到 1930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其基本内容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和最终结果上看，这条土地革命路线在实践中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积极性，对壮大革命队伍，巩固革命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以及最终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方面，在进行社会革命时，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只能依据本国家本民族特定的社会条件来确定。这一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很自然，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过程中，这曾经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是经过反复争论、探索和付出代价后才获得解决的问题。

现在，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是探索中国社会特定条件和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先驱者。但是，当年毛泽东是怎样找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条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呢？

1927年，随着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在蒋介石国民党的疯狂屠杀政策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运动，遭到严重损失。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反革命气焰所吓倒，没有保持沉默，而是进行英勇的反击。1927年8月：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接着，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全国各地相继发动。

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根据中央的决定，到湖南领导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当时，毛泽东还没有认识到首先要夺取农村，所以，起义计划不仅要求夺取湘赣边界地区的大部县城，而且计划进攻长沙。9月9日起义开始后，部队曾攻占了浏阳、醴陵等县城，但终因敌强我弱等因素的影响，部队严重受挫，损失过半。

毛泽东从部队受挫的实际教训中，思考了如何保存革命力量和如何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事情很明白，如果不改弦更张，硬着头皮打下去，只是死路一条。9月17日，毛泽东命令各部队快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中，讨论和确定下一步行动方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把自己对形势的分析和新的行动的考虑全盘托出。他说：第一，敌人的主要力量在城市，而且在占了几次便宜之后，气焰更加嚣张；第二，部队因严重受挫，指战员中失败情绪盛行，已无斗志再战；第三，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地区和湘东各县的工农群众，因遭敌人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已无力继续支援和配合部队的行动。根据以上情况，毛泽东的结论是，目前要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必须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同意，从而决定改变“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第二天，起义部队便在毛泽东率领下，从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南下。此后，几经转战，走遍了整个罗霄山脉，10月下旬，部队终于进至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在这样一个远离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敌人统治力量又比较薄弱的地方，毛泽东如渔得水，有了用武之地。

进入井冈山地区后，毛泽东便抓紧党组织建设，加强党的领导，班排设党小组，连队设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的组织；改编了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扩大了工农革命；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扩大红色区域，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工农兵政府，初创了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

部队和湘南年关暴动的农民武装在宁冈砦市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并成立了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第四军委员会和湘赣边区特别委员会。在特委和军委的正确领导下，第四军在屡败敌人“会剿”的同时，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和武装，推进土地革命，推广政权组织，使割据地区波浪式扩展，发展到宁冈、永新、莲花3个县和吉安、安福、遂川、邓县各一部，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但是，当时的党中央并不认为毛泽东的做法是对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又由于第一师遭受了一些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的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似乎是注定要失败的。”加之毛泽东当时在根据地推行的是一种民主的纲领和稳妥的政策，“这样一来，井冈山就遭到党内盲动主义者的斥责，他们要求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来使他们丧胆”。毛泽东和前委拒绝采用这种政策，又被污蔑为“改良主义者”，受到党中央委员会的指责，毛泽东还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敌书记的职务。但是，毛泽东不屈服于这些压力，他坚信自己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在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实践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论证了中央红色政权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够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农村根据地建设。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统一，缺一不可。土地革命是它的中心内容，武装斗争是它的主要斗争形式，农村根据地是它的战略阵地。

1930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了井冈山、赣东北等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规律出发，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论证了只有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才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

按照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必要的。

首先，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其次，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是长期的。强大的敌人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心城市，而广大农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革命的胜利总是从反革命势力较薄弱的地方先开始，先发展。为了避免在力量不足时与敌决战，无产阶级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阵地，在那里蓄积力量，作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最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无产阶级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这是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

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认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认为是可能的。

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非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地方性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使农村可以不完全依赖城市而相对独立。众多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和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和战争，使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得以发生和发展。中国幅员辽阔，“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革命力量大有回旋余地。

第二，大革命时期，在广大的革命运动高涨区域的工农兵群众深受革命影响，保留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三，由于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而且日益激化，全国革命形势在继续向前发展。

第四，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支持。

第五，领导红色政权的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毛泽东在实践中不但是一位勇敢的探索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集中全党智慧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新道路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指导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四、支部建在连上

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军队的主体是以农民（主要是贫农和下中农）为主要成份，这是由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但是，怎样才能使这样的队伍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克服一些因农民自身局限而产生的一些不良倾向呢？怎样才能使这样的队伍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远大的革命目标，并且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把革命进行到底呢？

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但毛泽东在这方面却有一个十分成功并具有深远意义的创造，即把共产党的“支部建在连上”。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党的“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派出一批优秀干部分赴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等省，领导发动秋收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于当年9月9日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但由于敌强我弱，某些指挥员缺乏经验和指挥失当，起义部队先后受挫。在此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把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中去，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当时，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一部分来自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一部分来自矿工，一部分来自农民，成份比较复杂。当毛泽东率领受挫后的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和长途跋涉，于1927年9月29日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部队减员严重，思想混乱，5000人的起义部队已剩下不足千人，组织也很不健全，官多兵少。不少人，甚至是重要骨干也经不起战斗失利和艰苦环境的考验，如当时任师长的余洒渡，就散布向农村去是错误的，这条路走不通等错误言论，并最后脱离了部队。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的那样，部队“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遭受很多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政治水平很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

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下决心改变这种局面。否则，既使不被国民党打垮，部队也会自己毁掉。

毛泽东决定召开前敌委员会，对部队进行整编。具体做法是：首先整编组织，把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两个营、七个连。整编中，根据自愿的原则，原留则留，要走的发给路费，并对不纯分子作了清理。这样，人员虽然少了，部队却精干了。其次，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毛泽东根据中共在北伐军中建立党组织的经验，决定将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党的小组，营、团建立党委，并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党代表。最后，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废除烦琐礼节，开会时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并在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

这次改编，在后来的史书中被称为“三湾改编”。它是毛泽东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保证了部队的一切行动听从党的指挥。10月，部队胜利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后来，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实行的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共产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办法是无比正确的。

五、一支军队要当三支用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宗旨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毛泽东看来，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人民军队本质的表现，也是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把军队的命运同人民群众的命运直接联系起来，把军队的发展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呢？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逐渐总结出一套办法，他为人民军队规定了三大任务。这就是：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一支军队担负三项重任，这在世界军队发展史上是少见的。

人民军队首先是一支战斗队，是为人民群众利益而英勇奋斗的武装集团。这一点是不容有任何动摇和偏差的，也是它的根本任务。早在1927年，毛泽东曾向秋收起义的部队指出，我们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我们有湘鄂赣粤已经过组织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同我们一道，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第二年，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废除了雇佣制，红军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正是由于人民军队首先是一支战斗队，为人民利益而冲锋陷阵，才使得这样一支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无敌于天下。因此，在新中国即将胜利之时，毛泽东强调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

但是，毛泽东从不认为人民军队只担负战斗队这样一个任务。在不妨碍执行作战任务的前提下，它可以同时是工作队或者是生产队。

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一部攻克茶陵县城，部队开始没有做群众工作，不去发动群众打土豪，经费主要靠商会摊派。毛泽东知道后，很不满意，即着手纠正这种做法，要求部队开展群众工作，开展打土豪的斗争，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政权，部队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开展工作，很快就使茶陵的革命形势出现了新局面，创建了井冈山地区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并成立了县工会、县农会和县赤卫队。这一年的年底，毛泽东总结茶陵的经验，明确提出了工农革命军要执行三大任务，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后，即分兵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建立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与赤卫队，成立了遂川县委和苏维埃政府。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在实践中又一次得到成功的检验。到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把三大任务又作了高度概括。他在决议中这样说：“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决议规定对新兵及俘虏兵都要讲述红军三大任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伪残酷“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包围

封锁，使抗日根据地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同时，由于生产受到破坏，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增加了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毛泽东在讲到当时的困难情况时说：“我们曾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饭，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无被盖。”为了支持长期抗战，打破封锁，度过难关，毛泽东发出了“积极生产，克服困难，亲自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要求军队一面打仗，一面生产。他说，学会打仗、生产“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这样，红军打土豪筹款子的任务，就发展为生产队的任务。边区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的经济困难情况得到了缓解，许多部队粮、油、肉和生活用品实现自给或半自给，部队生活得到了改善，减轻了人民负担，极大地振奋了根据地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解放战争时期，当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在长江以北已被消灭，人民解放军准备打过长江，挺进江南的时候，仅靠随军南下的5.3万名干部，已远远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了。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及时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他说：“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这样，我军历来做群众工作的传统，就发展成为工作队的任务。各部队派出大批干部战士，接管城市，恢复生产，稳定秩序，建设政权。如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的战斗刚结束，解放军便立即建立起军管会，负责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军管会在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在各方群众的支持下，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很快就使得京沪铁路全线通车，半数以上的工厂开工生产，并保证了物价稳定和市民的正常供应。由于军队执行了工作队的任务，广大新解放区的革命与生产得到全面展开，有力地推动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六、先从军事路线解决其他问题暂不争论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召开过许多次重要的会议，但 1935 年 1 月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更具色彩和特殊意义。这次会议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说的那样：“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和毛泽东采取的抓住主要矛盾，讨论和解决当时生死攸关的军事路线的是非问题，其他问题，特别是政治路线问题暂不争论的办法是分不开的。

本来，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都是错误的。正是在这种错误路线指导下，党在白区的组织和力量几乎搞完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因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而丢失了，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到 1935 年初，红军已由长征开始时的 8.6 万多人锐减到 3 万余人，处境十分危险。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无论在军事路线上，还是政治路线上，都是错误的。

对于这些错误及其造成的恶果，毛泽东心里很清楚。但毛泽东也同样清楚地知道，要通过一次会议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是不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因为从当时实际情况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了根据地，在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之下行军作战，随时都有可能全军覆没，如果不首先纠正军事上的错误指挥，红军和党中央的命运是难以设想的。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情况下，只有全力以赴，解决已为广大指战员所不满的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改换领导，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敌人的“围剿”之后，其他如政治路线的是非问题，才具备可能解决的条件。否则，如果不顾当时紧迫的战争形势，不考虑问题的主次，提出整个路线错了，就会有一些同志想不通，反而阻碍党和红军的前进，不利于实现团结对敌。

基于这种思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实际执行者，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认为他们应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红军所遭受的损失承担责任。毛泽东批评他们先是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而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却中又实行逃跑主义，搞大搬家式的转移。毛泽东的发言，通篇讲的是军事问题，不提政治问题，重点尤为突出。在毛泽东发言之后，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推举毛泽东为党和红军的领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胜利。周恩来的倡议，得到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刘少奇、陈云、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聂荣臻、邓小平等人的积极支持。尽管博古、李德对他们军事路线的错误不能完全承认，对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也不肯接受，但毕竟已是少数人，政治局的多数委员及扩大参加会议的各军团领导人是表示一致拥护的。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

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后不久，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3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全军的最高统帅部，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3人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3人军事指挥小组并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这表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正是在遵义会议上集中全力首先解决了军事问题，才使得尔后红军长征的胜利有了确切的保证。

1972年6月，周恩来在当时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采取的办法是“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很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周恩来还说：“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

另一位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重要人物张闻天在1943年12月也指出：“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七、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列宁曾把帝国主义称作“空架子”，把“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视作是“泥塑巨人”。这是一种豪迈的革命领袖气概。与列宁一样，毛泽东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作是纸老虎，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因此，他总是对胜利充满信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那怕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也是这样。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敢以主宰大地沉浮的书生意气，有力地抨击那些官僚、军阀、达官显贵，视他们连粪土都不如。在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建立之初的1930年，毛泽东就写文章说：“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烧成烈火。……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问地是不远了。”面对国民党实行的白色恐怖政策，毛泽东坚决他说：“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抗战爆发之初，在半壁河山落入敌手、日本帝国主义气焰不可一世、国内统一战线和党内思想极度混乱的情况下，毛泽东又高瞻远瞩地说：日本侵略者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他向那些视敌人为神物，视自己为草芥的亡国论者回答道：中国会亡吗？不会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凭借他在军事上、经济上的优势，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毛泽东并没有被蒋介石的汹汹气势所吓倒，他于1946年8月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人民的“小米加步枪”，将会比他们的飞机和坦克还要强。“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毛泽东如此镇定自若和充满必胜的态度与口气，让这位美国进步作家激动不已。当她听到“纸老虎”这个词时，简直高兴得要跳起来。仅仅隔了三年多的时间，毛泽东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是和他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的，两者构成了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时，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也指出：“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肯推翻他们，不肯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打仗要有认真的准备，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战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务求全歼敌人；做一切工作都要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作到心中有数，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要树敌太多；要善于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各个击破；不要四面出击；斗争口号的提出，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采取，

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要估计到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要争最好的可能，同时迎接最坏的可能，使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

八、得心应手调动指挥敌人

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几十年的征战生涯中，非常善于审时度势、运筹谋划，调动指挥敌人。敌人不来时能设法让它出来，敌人来了就能让它围着我军转，敌人想走时则能“热情留客”，让它走不了。毛泽东曾以胡宗南为例风趣他说过，胡宗甫是个没本事的人，他的本事就是按我们的计划行动，我们那样想，他就那样办。其实何止胡宗南一人，蒋介石和他的许多“名将”差不多都乖乖地听过毛泽东的调遣。叶剑英曾说：“毛主席用兵如神，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但得心应手地指挥我千军万马，而且迫使敌人不得不听从调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把握主动，在危急关头都能化险为夷。”此话极是。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自如地调动敌人，迫其就范，关键就在于他巧妙地运用了超乎于一般军事家的战略战术。

办法之一是诱敌深入，相机歼敌。

毛泽东说：诱敌深入“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是我军历次革命战争中的传统战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如何诱敌深入，诱到何处，何种时机才最有利于歼敌等问题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在谈到如何诱敌时，毛泽东曾以两个拳师敌对，和一些古代著名战役为例说明弱者要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道理，着重阐述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策略。当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正向我发动进攻时，我避其锋芒，先让一步，有计划地实施战略退却，将敌人诱到根据地内部，依靠人杰地灵有利条件，迟滞、消耗、疲饿敌人，主力则隐蔽集结，待敌人困马乏，饥疲沮丧，出现可乘之机时，我则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在运动中各个歼敌，打退敌人的进攻。

1931年3月，蒋介石对第一次围剿的失败很不甘心，又调集重兵20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围剿。敌人分兵4路，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在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的800里战线上，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分进合击，企图包围红军主力而歼之。这时，赣南、闽西根据地的红军只有3万人。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实际情况，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指挥部队向根据地中部退却，让敌放手前进。红军主力持重待机达25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诱敌就我的目的。在待敌人寻找红军主力扑空，疲惫饥饿，士气低落之时，红军主力以风扫残云之势，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15天内五战五捷，歼敌5个师共3万余人，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诱敌深入，不仅要待敌人露出破绽，相击出击，而且要利用敌人急于求战的心理，顺势利导，使敌听我摆布，作到利而诱之。1947年3月，23万蒋军在胡宗南指挥下，开始向延安进犯，企图占领延安和陕甘宁解放区，把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逐出西北。当时，西北野战军只有2万余人，兵力有限。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放弃延安，尔后以“蘑菇”战术牵制敌人，利用胡宗南狂妄骄横和急于寻我西北野战军主力作战的心理，以少数兵力置于明处，佯装主力，与敌巧妙周旋。主力则隐蔽集结，寻机歼敌。在撤离延安后的40多天里，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战役的胜利，歼敌1.5万多人，活捉了敌3个旅长，打击了蒋军的器

张气焰。8月，西北野战军又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扭转了陕北战局，打退了蒋军的重点进攻。

办法之二是示形佯动，声东击西。

示形佯动、声东击西，是以假象造成敌人的错觉，使敌人听我调遣就范的一种有效的谋略。毛泽东常以灵活机动的军事行动，忽东忽西，即打即离，作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走而示之不走，下动而示之以动，“形似必然而不然，似形不然而必然”，以达到出其不意夺取胜利的目的。四渡赤水之战，就是毛泽东用声东击西以调遣敌人的成功例子。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敌情极为严重，斗争十分复杂。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对红军合围，妄图消灭中央红军。就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指挥红军在贵州、四川交界的土城、元厚场一带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尔后西进到云南东北部扎西地区集结。敌得悉后，便调集主力于扎西地区，实行分进合击。当敌人接近扎西时，毛泽东出其不意地挥师向东，重入贵州，二渡赤水，使敌人堵击合围企图落空。红军乘敌兵力薄弱之际发动遵义战役，一举歼敌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遵义大捷后，蒋介石亲飞重庆“督剿”，调兵遣将向红军进逼，妄图压迫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而歼灭之。毛泽东将计就计，在该地区狙击敌人，以进一步调动各路敌军。当敌大军云集时，毛泽东突然率军北上，经茅台三渡赤水，并故作北渡长江的姿态，把敌人主力又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当敌人再度向川南奔集时，毛泽东又立即指挥红军折向东进，经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在数十万敌军的空隙间穿插急进，迅速南下，渡乌江进至贵阳附近，把敌人全部甩在后面。为了实现从长江上游北渡这一目标，毛泽东令红军一部佯攻贵阳，一部向瓮安、黄平方向作战，作东进湖南的姿态。这时从重庆赶到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眼看贵阳空虚，湖南危急，急令湖南部队布防堵截，调云南龙云部队驰援贵阳。毛泽东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正当敌军向贵阳驰援之际，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乘虚南下，威逼昆明。这时，龙云又急调援黔之滇军回救，其时敌军已距红军3日以上的路程了。于是红军调头北上，乘金沙江敌防空虚之际，在皎平渡胜利渡江，到达川南会理地区。至此，中央红军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的计划，为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办法之三是攻其必救，围点打援。

毛泽东说：“采取围城打援办法，围城之目的不在得城，而在打援。”围点打援是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歼灭的一种重要战法。这种战法，是以一部兵力围敌薄弱而又要害之一点，诱敌来援，以主力集结于援敌来路两侧便于歼灭的地区，待敌进入我既设阵地时，突然发起进攻，打敌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

在毛泽东指挥的许多战役中，多次运用围城打援办法，调敌出笼，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有时围而不打；有时围城打援，分工协作；有时先攻城后打援敌；有时则歼灭援敌而后攻城。1947年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宜川、瓦子街战役，就是调敌胡宗南部出援而聚歼的。宜川城位于延安东南，我军攻打宜川，即是插入敌人心脏，威胁西安。当时我军确定了对宜川实行“围城打援”的方针，以一部兵力包围宜川城，主力埋伏于宜川西南的瓦子街地区，准备歼灭援敌。胡宗南得知宜川被围，即命4个旅又8个团轻装驰援宜川。当敌进至瓦子街地区后，被我军一举全歼，接着又顺势攻克宜川，全歼守敌，取得

了围城打援的全面胜利。

战争中围城打援的意图必须十分隐蔽，不然尽管所围之点是敌之要害，但如被其发现我真实意图，敌人必不会轻举妄动，或是在出援时会加倍小心，使我不易分割围歼。因此必须摆出真正攻点的架势，又使敌造成不致被歼的错觉，才能达到预定目的。1948年9月济南战役时，毛泽东提出：“攻城打援分工协作”的方针，“以达既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毛泽东又说：“不真攻济南，则援敌必不来。”强调必须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以达调敌出援的战略意图。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指示既攻克济南全歼了守敌，又调动了敌人3个兵团出动增援，创造了“攻济打援”的作战范例。

办法之四是抑留敌人，关门打狗。

毛泽东不仅能绝妙地调敌出动，而且还能如意地指挥敌人不动。敌人想出援时让它出不来，想逃跑时又叫它跑不掉。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解放西南战役，都成功地达到了抑留敌人就地全歼的目的。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战役，始于1948年9月12日，止于同年的11月2日。由于事前已经了解到，在敌统帅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曾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北，坚持沈阳至10月底以观时局发展的作战方针，暴露了敌人撤守不定的惶惶心理。毛泽东据此确定了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方针，决定先克锦州，截断东北、华北敌军的联系，封闭东北的大门。同时又电令我军抢占营口，断敌海上退路，基本上实现了关门打狗的目的。此役歼敌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

辽沈战役后，华北敌人已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蒋介石恐重蹈辽沈战役之覆辙，欲令傅作义撤守江淮，巩固京沪，妄图凭借长江天险，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因傅作义非蒋介石嫡系，怕南撤受蒋排挤无地容身，不撤又恐遭我围歼，全军覆没。因此，是撤是守，向南向西，举棋不定，便把60万大军分散配置于张家口至唐山的狭长地带，摆开了一字长蛇阵，待观时变。就在此时，毛泽东当机立断，确定抑留并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的作战方针。为此，我军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务求把该部几十万军队留歼于华北地区。由于方针正确，措施得力，达到了抓住傅系，拖住蒋系，使其完全入我网罗，陷于欲收不能、欲守无力、欲逃无路的境地，终于被我歼灭。

西南战役，是迫歼西南敌军，解放云、贵、川、康诸省的一次大规模战略行动。在西南战役中，毛泽东出敌意外地摆出了大迂回大包围抑留敌人的策略，将西南之敌就地全歼。当时我各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顺利渡江，解放了南京。蒋介石剩下的主力就只有广西白崇禧和西南胡宗南集团了。他们在我军威逼下，惊恐不定，妄图凭西南防线负隅顽抗，在万不得已时逃亡国外，以图保存实力，东山再起。据此，毛泽东提出：应取大迂回动作，先插至敌后，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敌军的方针。我参战各部队按照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千里大跃进，历时5个多月，成功地完成了解放大西南，将敌90余万人就地全歼的任务，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集团企图盘踞西南，伺机卷土重来的迷梦。

九、“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

中外历史上的许多经验告诉人们，几天下能成大事者，必是能伸能屈，慧眼相机行事之人。有时为了更好的前进，就得做出必要的后退。就如同用拳头打人，为了打得稳、准、狠，就要先收缩，运足力气，然后再打出去。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有所不为”，但实际上是为了“而后可以有为”。

毛泽东很善于实行革命的妥协，有争有让，争有原则，让有限度。但毛泽东认为让步应该是积极的，不应该是消极的。他在1938年11月一次党的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他还说：“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毛泽东举例说，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与蒋介石的交涉中，曾有过几次大的妥协，都体现了积极让步的精神。

1937年，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决定自动取消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种让步“是必须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才有利于国内团结，有利于共同抗日。但是，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有限度的，是由当时“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决定的，以不破坏这一原则为限度的。毛泽东说，在根据地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

解放战争初期，在重庆谈判中，为了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毛泽东决定对国民党作出一些让步，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8个解放区，并同意把中共的军队缩编到20至24个师，占全国军队的七分之一。从当时情况看，毛泽东这种让步不但很有必要，而且也很高明，因为不作这种让步，就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也不能换得中共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这种让步也是有原则和限度的。原则就是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让步以不能破坏这个原则为限度，“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这就是限度。实行这种让步，既没有损坏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武装的根本利益，又使国民党散布的“共产党要地盘，争枪杆子”的谣言全部破产，极大地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同情。

十、以谈对谈以打对打

毛泽东常说，中国革命斗争是极其复杂的，原因就在于敌人往往采取武装进攻和和平欺骗两手来对付革命，而敌人的和平手法，较之他们的赤裸裸的武装手法更具有欺骗作用。所以，毛泽东很看重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办法。这叫做以其入之道还治其之身。

对待谈判，毛泽东从来不简单地加以拒绝。因为同敌人进行谈判，可以揭露敌人的欺骗，可以用事实教育人民，特别是可以唤起中间阶层的觉悟，有利于争取大多数。但同时，在谈判中不放弃任何人民的武装力量，不取消任何必要的武装斗争，要使谈判建立在强大的武装后盾之上。

毛泽东的这一谋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运用，达到了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地步。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一手依靠美国，利用伪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加紧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内战，另一手则玩弄“和谈”阴谋，向中国共产党发动“和平”攻势。1945年8月14日至23日，他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共商国是”。蒋介石的机关妙算是，如果毛泽东去了，他就利用谈判争取时间加紧准备反革命内战；如果毛泽东不去，他就说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把破坏和平的罪名加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并以此作为发动内战的借口。毛泽东一眼看穿了蒋介石的阴谋，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毅然偕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毫无和谈诚意的蒋介石对毛泽东亲赴重庆，甚感意外，他没有作任何准备，拿不出任何方案，手忙脚乱，非常被动；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却已准备了一系列的和谈方案。经过43天曲折、复杂的斗争，到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团结合作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这就使中共在同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主动。

在与国民党谈判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深知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在谈判以前，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同志：“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蒋反我也反，蒋停我也停，照他的办法办理。”“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毛泽东还说：“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并要求我解放区军民，“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

毛泽东的估计一点都不错，真可谓料事如神。8月29日，即毛泽东等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下令各战区大量印发蒋介石在10年内战期间编写的“剿匪手本”。在谈判期间及其后，国民党军队沿平绥、津浦、同浦、平汉4条铁路线向解放区进攻。解放区军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理直气壮地进行自卫反击。沿平绥和津浦线进犯的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区军民阻止；沿同浦和平汉线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在9月至10月的上党战役和10月至11月的邯郸战役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仅这两次战役，国民党军队被歼达10万余人，有力支援了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的谈判斗争，促进了谈判达成协议。

但是，蒋介石并不想真正地遵守和实施与中共达成的协议，反而是变本

加厉地对其加以破坏。1946年6月，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一意孤行，发起了对中共领导下的中原解放区的围攻，挑起全面内战的战火。蒋介石的得意想法是，凭借国民党占有明显优势的军事力量以及控制了大多数工业较发达的城市和绝大部分交通干线的实力，迅速摧毁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然而，他的这种梦想很快就化成了泡影。经过两年多的作战，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壮大，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相反，国民党部队的实力在不断削弱，特别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主力几乎丧失殆尽。蒋介石反动统治面临着崩溃的局面。

在此形势下，为了保存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蒋介石一面组织残余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另一方面又玩弄新的“和平”阴谋，作为缓兵之计。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谈的具体办法”。条件是要保存国民党的宪法、法统和军队。他说：“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实际上，蒋的真正目的是要保住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

针对蒋介石新的“和平攻势”，毛泽东以为这不过是老调重弹，必须向全国人民揭露蒋的求和声明的虚伪性。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在揭露和批判蒋介石“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和反动性的同时，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它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八项谈判条件是：第一，惩办战争罪犯；第二，废除伪宪法；第三，废除伪法统；第四，依据民主原则改变一切反动军队；第五，没收官僚资本；第六，改革土地制度；第七，废除卖国条约；第八，召开没有反革命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一切权力。在声明中，毛泽东还告诫全军，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与和平之前，丝毫也不应当松懈自己的战斗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毛泽东在声明中所提出的八项谈判条件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既表明了共产党对待和平的真诚意愿，又坚决否定了蒋介石的所谓“和平”条件，使党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给蒋介石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蒋介石深感走投无路，迫不得已已在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告“引退”，由南京飞往浙江奉化溪口老家。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上台后，声称愿以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其实质是要阻止解放军渡江，达到“划江而治”，与共产党“平分天下”的目的。

对李宗仁的和谈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采取了宽容与争取的态度，以求减少人民遭受战争的苦痛。4月1日，中共派出周恩来、林伯渠等人为代表，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等在北平进行谈判。经过半个月的努力，拟定了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是这个协定到预定4月20日签字的时候，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这样，国民党的“和谈”骗局完全被揭穿了。

就在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的第二天，即4月21日，毛泽东和朱

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解放军坚决、彻底地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随即，解放军发动渡江作战，突破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被国民党统治达22年之久的南京城获得解放，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十一、“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创建于1955年初，经过10年的艰辛努力，到1964年10月便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核潜艇顺利下水。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核武器和较为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和毛泽东在此问题上的深谋远虑是分不开的。

在世界历史上，美国是最早使用原子弹的国家。早在1940年夏，美国就开始研制原子弹，1945年试验成功。同年7月，杜鲁门下令把刚制成的两颗原子弹用于对日作战。8月6日和9日，美军向日本广岛、长崎各投掷一枚原子弹。两次轰炸，共杀伤约有45万日本居民。虽然美国原子弹大轰炸，对加速日本法西斯投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美国以此举来贬低苏联参战在迫使日本投降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夺取最后战胜日本的胜利果实，并用原子弹恐吓世界人民，作为战后夺取世界霸权的资本。从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中，美国的当权人物和“冷战”的决策者们，便一味地发展原子武器，竭力垄断原子武器，一再挥舞它手中的原子武器，向全世界人们进行威胁。1945年10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毫不掩饰地宣称：“原子弹这一新的破坏力量保持在我们手中是一种神圣的托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说：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一直在积极考虑”之中。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建议在适当时机使用原子弹。西对美国这种原子武器的讹诈和威胁，毛泽东认为尽快创建与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是刻不容缓的大事。这将对保卫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发展原子能，重要的必须拥有铀矿资源。1954年，地质部在综合找矿中，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的苗头。毛泽东得知情况后，高兴地说：“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1955年1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问题。遵照周恩来的嘱托，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到会汇报，并携带铀矿石、探测器进行操作表演。听完汇报后，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他强调说：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后吃饭时，毛泽东又端起酒杯向李四光、钱三强祝酒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从此，中国原子能事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郑重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指原子弹）。”毫无疑问，毛泽东是把在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与保卫新生的国家政权和打破美国惯用的原子武器的讹诈和威胁联系在一起看待的。

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在发展之初，曾得到过苏联在一定程度上的帮助。当时，中苏关系还比较正常，赫鲁晓夫在外交上遭到困难，在政治上也有求于中国，对于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表示愿意给予一定的帮助。1956年2月，赫

鲁晓夫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对中国原子能事业援助的意见。毛泽东当即复信，表示感谢，并提出实施建议。之后，两国政府签订了有关协定，苏联提供了一些设备，派来了一批专家。

苏联专家到中国后，开始也还是热心努力的。中国科技人员在同苏联专家的合作中，一方面虚心向他们学习，另一方面又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努力使他们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好地帮助指导工作。对此，毛泽东还是满意的。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他说，就共产主义者队伍来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他强调，要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因为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1960年初，中国出现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高潮。当时，在原子能事业方面，有些同志头脑发热，还没有学会和掌握尖端技术，就跃跃欲试地想搞革新。对此，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像小孩子学写字，要先学楷书，后学草书。

中国原子能方面的科技人员，由于贯彻了毛泽东的正确指示，所以在向苏联专家学习中，能够一方面刻苦、虚心、认真研究苏联专家建议，干什么学什么；另一方面又能够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学习和独创相结合，在实践中有所发展、有所发明、有所创新，从而使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一开始就发展得比较健康。

但是，正当中国原子能事业起步向前发展之时，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了协定，中苏关系恶化了。

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

很显然，赫鲁晓夫是想在关键时刻卡中国人的脖子。他曾扬言说要把已经向中国提供的设备，变成一堆废铜烂铁，并不怀好意地攻击中国说：有些人不愿意参加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看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连裤子都穿不上。

苏联政府不守信义的背叛，当然给中国正在发展的原子能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和困难，但是，赫氏的预言能成为现实吗？

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就这么容易被吓倒吗？

事实恰恰相反。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

8月9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向下属单位发出“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而斗争”的电报指示，强调说：“苏联专家撤走，自然会给我们造成若干困难，并且势必延长一段建设的时间。但是，这也是一件大好事，它逼着我们非学会自力更生的本领不可”。电报还说：“只要我们充分自觉地组织好这样一个转变，我们就一定能够有效地克服各种困难，就一定能够缩短这个由不能独立掌握到完全独立掌握的过程。”

为了克服苏联专家撤走后的困难，经中央批准，二机部从中央各部门、各地区、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调集了一大批专家，加强原子能的研制力

量、并从理论物理、爆炸物理、中子物理、固体物理和弹体导弹几个方面，就原子弹的基本理论进行协作科研攻关。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并在必要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毛泽东同意在中央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1962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这样写道：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毛泽东的亲切关心指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长远计划汇报时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随后，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门机构会议上，确定二机都要一年试验一种核武器，力争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爆炸试验。

在导弹和原子弹试制成功后，把两者结合起来，组成有实战价值的导弹核武器，或许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原子能事业遵从这种发展规律，努力使原子弹小型化，到1966年10月，便实现了“两弹”的结合，成功地进行了我国首次导弹核武器试验。毛泽东以激动的心情在关于试验导弹核武器问题的批示中指出：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呢？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在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后不到一年，即1967年6月，中国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从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到首次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又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又7个月，法国用了8年又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又8个月的时间，并且赶到了法国氢弹爆炸之前。在短暂的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充分表明了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军训会议代表时这样说：新式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两年零八个月出氢弹，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是世界上第四位。他还说：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助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在中国发展原子能，研制原子弹，氢弹问题上，毛泽东一方面认为必须要搞，“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否则要受人家欺负；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明确表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与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不同，不是为了吓唬人，而是为了和平。

1963年12月，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前夕，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防御战略方针，原子弹、导弹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别人搞得多。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经毛泽东审定的我国政府声明，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时，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1965年，当中国掌握了原子弹以后，毛泽东同样反对把原子弹说得神乎其神。他说：美国人说原子弹毁灭性严重，赫鲁晓夫也说得神气，他们都超过我，我比他们落后了。是不是这样？相当落后。由此不难看出，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发展原子能，研制原子弹、氢弹，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不是进行核垄断、核讹诈。事实上，毛泽东这一思

想长期以来已成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十二、“三个世界”的理论

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说：“我们都叫做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中国家。”第二年的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又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众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

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也是他在晚年关于中国对外政策方面一个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谋略思想。

毛泽东这一谋略思想的提出，是基于对当时世界政治基本格局和国际斗争战略态势的分析。进入七十年代后，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经过分化、改组，形成了三种政治势力。第一种势力是美苏两国，它们是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的对手，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压迫、剥削和控制政策，不仅广大亚非拉国家是它们掠夺和压迫的对象，它们还把其它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中，美苏之争的争霸是危害世界和平的根源。

第二种势力是仅次于美苏的其它发达国家。如日本、加拿大、西欧诸国等，这类国家在世界事务中有两面性，既有对广大亚非拉国家进行剥削，掠夺的一面，也有要求摆脱超级大国控制，维护国家独立的一面。

第三种势力是全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非拉比较贫穷的国家。这类国家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它们地域辽阔，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二；人口众多，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它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曾经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附属国，现在虽然独立了，但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力量，巩固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任务。这些共同点决定了它们有着强烈的反帝、反霸的要求，而且它们一旦联合起来，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中将会发挥出最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对这种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很深刻的了解，也有着深思熟虑的分析。他把他一贯坚持和强调的重视多数，注意联合的思想应用到发展变化的世界形势中。在毛泽东看来，对世界上存在的三种势力，要区别对待，要联合多数，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也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苏美两霸。

因此，在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谋略思想中，突出了美苏两个推行霸权主义国家同世界反霸力量的矛盾；强调在世界反霸斗争中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作用，以及联合第二世界国家和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的重要意义；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打败超级大国的侵略、控制和压迫，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发言中，全面阐述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感到耳目一新，为这种划分所折服。从当时及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这一深刻的谋略思想，在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它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为我国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作了一定的准备。

周恩来谋略

周恩来（1898～1976），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字翔宇。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投身五四运动，成为天津学界领导人，并参与组建“觉悟社”。1920～1924年先后赴法国、德国勤工俭学。1922年夏，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回国，先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1926年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于1927年8月1日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事委员会书记。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并任中央3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任中共全权代表赴西安与蒋介石谈判，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从事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8月和毛泽东一起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驻重庆和南京，继续谈判工作。国共关系破裂后，于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参加组织指挥解放战争。

建国后，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在1954年后，任国务院总理，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主席。

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创造性地执行了重大外交决策，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工作的具体政策和基本原理。曾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2年患癌症后，仍坚持工作。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一、“为了中华之崛起”

自古成就伟业之人，鲜有少无大志者。周恩来之所以能成就盖世勋业，是和他具有崇高的理想、宏大的志向分不开的。这种抱负，在他少年时代就已萌发、酝酿，闪射出夺目的光华。

1910年，周恩来随伯父到东北读小学。一次，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们有说是帮父母记帐的，有说是为谋个人前途的，周恩来却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1912年，周恩来写了一篇《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的作文。其中写道：“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当时的国文老师看后十分高兴，并批有“心长语重，机畅神流”，“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之语。这是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最早的一篇文章。那时，他才只有14岁。

到南开中学读书后，他对自己的远大志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认为人们“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划其全局，预计其将来，抱无穷之希望。然后按此希望之路径以前进，则其结果不致与此希望相径庭。希望者何？志是也。”“然则志固尚己，而弊亦随之生焉。彼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

中学毕业后，为寻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真理，周恩来决定东渡日本求学。临行时，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充分表达他救国图存的伟大理想和英雄气概。

周恩来不仅少有壮志，以天下为己任，而且为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无时不在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地奋斗。他学习顽强刻苦，生活艰苦朴素，待人诚挚温和。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虽才华出众，品学兼优，却从不骄傲自满，锋芒毕露、盛气凌人。他尊重他人，更自重自爱。在一篇《论名誉》的作文中，他写道：一个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作“人生的第二生命”，但决不能存那种“邀名之心”，而应当用正义来衡量它的轻重。“若夫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日推名誉之是谋，不遑计及实事，虚声盗世，眩世眩俗，以淆乱风气者，是又名誉之罪人也。”所以，他认为刻苦学习、砥砺品行，是成就一生事业的必然途径，反对那种汲汲于私利和好高骛远之徒。

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生平最厌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子人总是心里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然是不足论事，然而当着他活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

但是，作为周恩来一生奋斗目标的共产主义信仰，并不是经过一朝一夕而是长时间的探索、比较才最后确定的。

在日本留学时，他就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日本宣传社会主义

的著名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所办的《社会问题研究》。这本杂志从第一册起，连载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里面说：“总之，唯物史观和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是涉及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这三大原理是根本贯穿着一条金线，就是所谓阶级斗争学说。”周恩来是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

留日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周恩来思想却经历过许多艰难和曲折。一个又一个的救国方案先后提出来，但没有一个是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他痛苦过，也彷徨过。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有如“一线阳光穿云出”，尽管他当时还不能深刻理解它，但在他面前已燃起了新的希望，使他感到格外欣喜，就如他在京都写的《雨中岚山》表达的那样：

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五四时期的中国，各种新思潮汹涌而入，马克思主义是其中一种。虽然周恩来归国前在日本已经了解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又积极地投身到这一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终身的信仰并没有在此时确定下来。

从1920年1月29日到7月17日，周恩来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他利用这段被押羈的时间，重新考虑了许多问题。出狱后一年多，他在一封讲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的信中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的。入狱前，他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造、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学生；出狱后，他就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说，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出狱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到欧洲后，在他的全部活动中，仍将“研究主义”放在第一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到欧洲，便“对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

战后欧洲的思想界异常活跃，除马克思主义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思潮杂然纷陈，相互间展开激烈的争论。这是很能启发人思考的。周恩来对种种不同的思潮曾经广泛地涉猎，经过冷静的观察和剖析、学习和思索，他选择了共产主义。作出这样的决定对他来说决不是轻易的。他从在日本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经过五四运动风暴的洗礼，又到在欧洲进行实际考察并对各种思潮比较推求，前后经过3年左右时间的深思熟虑。

正因为得之不易，在下定自己的决心后，他的心情格外喜悦，并且再没有任何游移和反复。在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他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共产主义）也就够了”。“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自此，周恩来对他选定的信仰再没有过片刻的犹疑，经邦济世的宏愿终于找到了最理想的表达方式，为之，他艰苦卓绝，整整奋斗了一生。

二、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

周恩来不仅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袖之一，也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在长达 26 年中，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但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总是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意识形态的地位。正如他回答一个外国记者的问题时所说，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更多地是一个中国人。是否对国家民族有利是他考虑问题的基本前提，并不因为其它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一致，便盲目慷慨大方，也不因为其它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不一致，便与其分庭抗礼或分道扬镳。对于属于同一意识形态的国家以后在意识形态上的变化，他也主张慎重对待，避免轻率地与其反目为仇。他提出的著名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求同存异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方法，正是这一思想在实践中成功运用的结果。

周恩来曾这样说：“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为了在地球上一起生存，就“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去“找共同点”。在一次纪念周恩来的发言中，钱其琛评价道，正是周恩来同志找到了这个共同点，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可说是求同存异的战略意义。至于在具体的外交谈判中，为了达成协议，观点上的必要妥协、利益上的互谅互让，都要求同存异的愿望和艺术。周恩来善于在尖锐的矛盾中求同，善于在适当的条件下存异，他以这种高超的外交艺术被誉为“处理外交难题的能手”。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 1953 年 12 月中印两国开始就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为建立中印这两个亚洲最大国家的友好关系，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首先提出的。这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上述五项原则在以后的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及中缅处理边界谈判中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1954 年 4 月 26 日至 7 月 21 日，苏联、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以及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其它交战国各方在日内瓦举行了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停战解决和印度支那的停战问题。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周恩来以总理兼外长的身份参加，任代表团团长。

在日内瓦谈判中，老挝和柬埔寨的王国政府是属于西方阵营的，但他们追求的目标与美国不同。美国所追求的是把老、柬纳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以便把这两个国家变成它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一个环节。为此，美国需要战争的继续来使老、柬感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而老、柬两个王国政府关心的并不是“全球遏制共产主义”，他们所希望的不过是不受威胁地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柬埔寨的代表在 6 月 16 日的会议上说：“如果今天人们拒绝承认柬埔寨，并通过一切手段使它无法中立、自由、和平地生活在自己家园，那么，明天人们就不要指责它采用任何手段来保卫自己。”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和平中立的愿望。在美国正在竭力把东南亚国家纳入反共军事条约的时候，这种中立倾向不能不说是对美国企图的一种打击。如果中国和越南不考虑这种实际情况，在会议上一味追求不现实的印支联邦或印支革命化的目标，致使谈判破裂，战争扩大，那实际是打击了老、柬的中立倾向，迫使它们倒向美国。反之，如果能采取现实主义的态

度使战争停下来，就能加强老、柬的中立倾向，使它们摆脱美国，同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平共处。这不仅有利于中越两国的安全和东南亚和平，也向该地区其它国家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愿意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诚意。恰如周恩来所说：“是用战争能够团结老挝、柬埔寨呢？还是用和平可以团结它们？是用战争能团结东南亚呢？还是用和平可以团结它们？答案是和平可以团结它们，用军事则只有使它们投向美国。”

所以，当谈判在老、柬问题上陷于僵局时，周恩来在6月16日上午会见艾登时表示：“我们愿意看到老、柬成为东南亚型的国家，像印度、缅甸、印尼那样的国家。”这样，“首先，我们在东南亚就可以和平共处。另一方面，我们不愿意看到老、柬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因为那样将构成东南亚不能和平的因素。这不仅对越南不利，而且也威胁中国的安全。”

中国的这种和平共处诚意果然加强了老、柬的中立倾向。在6月18日的会议上，当美国代表罗伯逊表示“不能接受周恩来6月16日建议，因为它在柬埔寨与老挝集结区的组成问题上留下疑问”时，老挝代表萨纳尼空当即发言，认为“中国的建议可以作为工作基础，因为它包含了有益的因素，老挝方面没有任何根据反对”。

由于周恩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提出的解决方案尊重老、柬两个国家的民族权利，因而他们接受了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在本国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这就从法律上排除了美国势力进入印支、扩大战争的可能，为这一地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创造了基本条件。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致电周恩来，邀请中国参加即将在印尼首都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周恩来极其敏锐地看到，这次会议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中国出席这次会议，正是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一个好机会。

4月18日上午，亚非会议在万隆隆重开幕。开幕式后，各国代表相继发言，会议充满着友好与和睦。但是，从下午最后一个发言起到19日，会议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有些代表或因偏见或因受挑唆，或因不明真相，偏离会议议程。有的攻击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有的提出中国在边境省份设置自治区意味着共产主义对邻国的颠覆，并提出华侨双重国籍问题。菲律宾代表卡洛斯·罗慕罗诅咒共产帝国主义比资本帝国主义还要坏，甚至把中国贬为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傀儡。会场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听周恩来的应答。

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将原来的发言改为书面报告散发，而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稿。当轮到中国代表发言时，他从容地走上讲台，在作了简短的说明之后转入正题，第一句话就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我们“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因此，我们“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不同的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接着说道：

“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针对会上对中国的攻击，他说：“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不同的信仰“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阿訇”。

中国人民“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难困苦，最后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内政”？“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但是新中国“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至于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便是“威胁了别人”，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如何能说成威胁邻邦呢”？

周恩来宣布：为了不使会议争论，中国决定不在会上提出“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尽管中国的要求完全是正义的。

最后，他用诚恳而亲切的语言说：“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周恩来的讲话赢得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主持会议的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还有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各国代表纷纷离座，去同周恩来握手。与会代表包括最初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的代表都称赞周恩来的“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一个美国记者这样评论道：“周恩来的发言是对中国和解态度的绝好说明，其外交技巧已登峰造极，它是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

但是，会议进展并不由此一帆风顺。从20日傍晚开始，再次出现波澜。当有的代表提出提案要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时，有的代表则以种种理由反对，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提案。两种意见争论激烈至使会议出现近乎破裂的僵局。

23日上午，周恩来再次发表了被某些代表所说的“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他说：与会各国代表都是“一致呼吁和平”的，既然谈和平合作，亚非29国就应该首先“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等问题，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集团，增加战争的危机”。

他又说：“我们应该确定一些原则，让我们大家来遵守，不进行扩张，也不去颠覆别的国家”。现在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但是考虑到“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方面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同意的”。至于“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这些话，对消除障碍起了关键作用。

接着，周恩来提出了中国代表团起草的议案。这个议案将连日来各国代表发言中能为大家共同接受的意见归纳成七项，实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另一种体现形式。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制定并通过了包括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有人赞叹说：

周恩来在会议“几乎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外交政策的巨大成功，使我国在亚非地区的影响显著扩大。但由于中缅边界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东南亚某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仍然存在。加上敌对国家的挑拨宣传，使这些国家不明真相的人士有些惶恐不安。

周恩来深知事实胜于雄辩，只有抓住当时为多方所关注的中缅边界问题，及时加以解决，才能消除疑虑，使有关邻国安定下来。

在1957年8月7日的史学家座谈会上，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扩张，但人家不信。一些亚洲国家很担心，认为大国必然扩张，所以要用实际行动使他们慢慢相信，争取和平共处。在10年内要努力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先从缅甸开始，陆续解决，解决后他们就放心了。在稍早一些的全人大会议上，他还指出：“我国政府在与缅甸谈中缅边界问题过程中，一向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这样，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不仅会使中缅两国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而且还有利于亚非国家的团结。我国政府解决中缅边界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

鉴于中缅边界存在不少争议，周恩来决定先从统一彼此的见解入手，为总的解决开拓通道。他提出：要以“互谅互让”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对有争议的问题自应弄清事实的由来，但更重要的是抱现实的态度，通过友好协商，在尊重主权原则的基础上，照顾双方的实际困难和正当权益，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这一实事求是的方针颇受缅方舆论赞扬，特别是互谅互让的口号，被认为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解决边界问题中的具体运用。

中缅边界由于双方能够互谅互让，两国对有争议的三段边界达成了彼此都满意的一揽子解决办法。

对中缅条约的写法，他还指出：新条约是个划时代的产物，序言要写得鲜明，中心思想是谴责帝国主义在历史上对中缅边界所造成的纠纷。而今中缅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已将帝国主义长期遗留下的问题一扫而光，对原来某些不合理的界线找到了合理的解决办法，双方贯彻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周恩来之所以强调把这段意思写进去，是为了努力推广国际关系新准则，使之发扬光大，体现了新中国外交既要认识客观世界，更要改造客观世界的气魄。当时缅方有的外交官曾提出，条约序言应遵循固有的体例，不宜发挥新论。但此说未被奈温将军采纳，他认为中方的写法符合历史的事实和发展，应当受到尊重。

1960年10月1日，中缅两国正式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这是中国同邻国成功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例。正如周恩来所指出：长达2000公里的中缅边界问题得到了全面彻底的解决，是中缅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亚洲各国间解决边界问题和其它争端的范例。

三、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

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周恩来执行外交政策中的又一重要原则，而且已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特点贯穿在他整个外交活动中，尤其是在对外建交、中美谈判、中日谈判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经周恩来参与制定的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凡愿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国民党当局断绝关系，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实现建交。在 1952 年第一次使节会议上，周恩来把我国和平外交的内容高度概括为：“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六条方针。

在对外建交方面，周恩来在实践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高度地结合起来，创造了多层次的外交形式。

首先是“完全建交”与“半建交”。

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和社会主义各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同时按上述建交原则，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谈判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如瑞典、挪威、丹麦、瑞士等国。有的西方国家如英国、荷兰，它们一方面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又同意国民党的代表继续非法占据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这就实际上形成了“两个中国”。考虑到它们与美国的态度有所不同，接受了中国建交原则的一半，周恩来主张与他们建立“半外交关系”，即相互设立代办处，不建立大使馆。

其次是先设相互的商务代表处作为过渡。

有些过去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亚非国家，它们愿意同新中国友好，不参与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但又怕跟美国闹翻，一时难于同台湾当局断交。周恩来谅解官们的难处，在这些国家还没有把国民党代表赶走前，新中国就和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了联系，如苏伊士运河事件后，中国在反对“两个中国”的前提下，先同埃及发展经济、文化关系，互设商务代表处，等到埃及政府撤回对台湾当局的承认，中埃便正式建交了。

还有一种是对法国的变通作法。

当时法国虽未同蒋介石集团断交，但长期以来关系一直比较冷淡，法方在台“使馆”仅维持在代办级。1959 年联大讨论“西藏问题”提案时，法国投了弃权票，其基本立场与美英两国截然不同。在中印边境问题冲突上，法国的态度亦同美英相异，并未公开攻击中国。

1963 年 10 月，戴高乐选派富有外交经验的政治家、前总理富尔以私人身份来我国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其使命便是转达戴高乐打算同我国建交的意图，并就此相关的重大问题同我国进行商谈。富尔明确表示：14 年来法国一直未承认中国是个错误，现在应由法国方面迈出第一步。

周恩来同富尔进行了多次实质性谈判。会谈中，他主动地、有针对性地同富尔介绍了中国对美、对苏关系状态和政策，对联合国问题的态度，特别是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使法方对我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对推动双方建交谈判起了重要作用。

在谈判过程中，富尔一方面表示，如果法国承认中国，那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在联合国中支持中国的席位将是合乎逻辑的，并声称不学拖泥带水的作法，但同时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个“微妙问题”，法国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甚至说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而戴高乐将

军“没有忘记他在二战时曾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不愿意突然切断一切关系”等等。

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蒋集团之所以能留在台湾，完全是由于美国的保护和对我们内政的干涉。其之所以还留在联合国，还作为安理会成员，也是由于美国的操纵。这是现实的，也将是历史的笑话。他强调，不能把个人关系掺到国家中来。他还以法国本身作比喻：皮杜尔是反对戴高乐的，设想他在国外势力扶植下成立流亡政府，我们中国是否能因为一度与他有过交往而不承认法国政府而承认他，或者两个都承认呢？法国是一个有自尊心的民族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中国也是这样的国家，何况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势力侵略 100 多年的国家，现在美国还占领着台湾，欺负和干涉着我们。他严正指出，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不会改变的。台湾同大陆的关系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一点不能动摇，希望不会有什么误解。他态度明确地告诉富尔，不解决对台湾的关系问题，便不能建立互换大使的关系，只能建立非正式关系，如设立贸易代表机构等。

富尔曾在会谈中试探可否允许中法建交后法国在台湾保留一人，降低级别。对此，周恩来断然回答：“不可能。”并指出，英国就是因为在台湾有领事，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所以造成目前的半建交关系。如果法国也采取同样办法，对中法双方都不会愉快。

周恩来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法国必须同蒋集团断交，不能搞“两个中国”的大原则，同时在程序问题上又作了恰当的让步。主要有：

第一，鉴于富尔一再要求允许法国先同中国建交，而后再同蒋断交，中方根据法台关系的实际情况和戴高乐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承诺，在双方达成了内部协议的基础上满足了法方的要求。

第二，在法方确认其下支持“两个中国”的条件下，中方不再坚持法方要以书面形式声明它的这一立场，而是由中国单方面声明，法方予以默认的方式加以肯定。

第三，在后来双方代表进行建交谈判时，中方又同意了法方的要求，把确认双方建交的方式由原定的互换照会（法方照会我方，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议中法建交。中方复照法方表示欢迎和同意）改为发表联合公报。这样可以避免给人以法方在建交问题上有求于中国的印象，达到了双方都满意的效果。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周恩来认为，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一直同新中国敌对，尽管中国对美国侵犯我领土主权的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不能因为这样就不与它接触和改善关系。他曾反复说明，敌对双方也可以进行谈判，问题是不能丧失原则。

中美双方从 1955 年开始大使级会谈，直到 1970 年，断断续续谈了 15 年。我方始终坚持必须先解决两个原则问题，才能谈其它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应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相互间的问题；美国要承诺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在此原则下，经过双方的努力，中美双方终于握手言和。尼克松 1972 年访华获巨大成功，中美双方发表了《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本身即是一个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结合的产物。

在商谈联合公报时，周恩来提出，除双方达成协议的内容外，分歧也应该列入公报。这就使全世界都认识到，中国同美国谈判没有丧失原则。这种

各说各的原则的公报，是过去双边联合公报中没有出现过的，是周恩来外交艺术的又一创举。

周恩来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向美方表示，同意五项原则和解决台湾问题也有个时间过程。就是说，中方不是要美国马上退出台湾，而是要美国同意最后撤兵。这样做，中方并未丧失任何原则，但却由于显示了灵活性而达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公报，推进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如何处理同东邻日本的关系，这是新中国外交的又一重要课题。周恩来根据中日关系的历史特点和战后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在对日关系问题上提出了“瞻前顾后、日积月累、水到渠成”的方针。大力提倡人民外交，积极推进民间友好。就是先从文化、体育、贸易做起，开辟和扩大各种民间渠道，广交朋友，走民间先行、以民带官、官民并举的道路，使细流汇集为江河，一旦瓜熟蒂落，争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达到建交的目的。

周恩来指出：尽管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正常关系，而且按照国际法存在着战争状态，但是这些并没有妨碍两国人民的友好活动和签订民间协议。他说：“照国民外交方式搞下去，日本团体来的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就只剩下两国总理外长签字喝香槟酒了。”针对人民友好运动中的一些认识问题，他反复强调“两个区分”的思想，即要把帝国主义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要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以此增强我国干部和广大群众从事人民外交的自觉性，消除日本人士中的某些疑虑。

在大力开展人民外交的同时，周恩来也十分重视与日本官方的联系及对他们的争取工作。他曾相当明确地提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各国政府和当权者。从人类进步的前途看，我们当然要着眼于各国人民，但外交工作只能通过发展国家关系影响人民。外交关系可以有官方、民间等多种形式，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靠官方。

在争取官方的过程中，周恩来坚持对日本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及行为进行针锋相对而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认为这是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手段。1958年，中方一赴日展览会展厅的国旗被日本暴徒撕毁，中国尊严遭到损害，这就是后来所说的“长崎国旗事件”。日本官方仅以“毁坏器物罪”对暴徒进行了轻描淡写的处理，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为此，陈毅外长迅即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岸信介内阁的错误态度，并宣布一系列必要的反击措施。

中国方面的坚定立场和有力措施在日本朝野引起了极大震动，一些有远见的贸易界人士和政治家挺身而出，为扭转两国关系的险恶状况而奔走呼号。在此情况下，我方因势利导，提出了打开僵局的“政治三原则”，要求日方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其后，周恩来在会见贸易界人士铃木一雄等日本朋友时又提出“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思想，强调贸易三原则必须与政治三原则相联系。与此同时，他还亲自邀请自民党的有识之士石桥湛三、松村谦三等元老访华。经过坦诚而深入地讨论，双方同意按上述原则和精神，以渐进积累的方式努力改善两国关系。

在周恩来长期积累的设想下，经过20年辛勤灌溉，中日关系正常化终于在1972年开花结果。

周恩来处理中日关系问题时，不仅能把握大局，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展

开灵活的策略斗争，而且在一些牵涉原则问题的细节上，也是立场鲜明，从不含糊其辞。

1972年，日本田中首相为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而访华。他在周恩来的欢迎宴会上致辞时就日本侵华的历史说道：“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周恩来在会谈中针对这段话坦诚地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用“添了很多麻烦”来表达，“不过是在街上弄脏女人裙子时的道歉话，只是对小过失的道歉”，这在中国人民是通不过的。

田中解释道，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他表示，“如果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最后，中日联合声明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表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四、谈判桌上的特殊较量

1946年，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恩来举行向文化界人士的话别茶会。由于东北问题的谈判正处在僵持中，他心情沉重地说：“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谈判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这一年，周恩来48岁。

谈判是周恩来政治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

早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同孙中山派到法国筹建国民党驻欧支部的王京岐谈判，协议国共在欧合作事宜。1924年回国后在黄埔军校时期，也同蒋介石有过一些谈判，但这不是代表中共中央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是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主要代表，参加了谈判的全过程。从筹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到西安事变同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谈判，以后又有1937年2月至8月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的五次谈判和抗战开始后在南京、武汉、重庆的多次谈判。抗战胜利后，又有双十协定、政协和停战谈判。建国前夕还有一次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谈判。建国后周恩来主要进行外交谈判，但也为第三次国共合作做了不少准备工作。这样算起来，周恩来的谈判生涯不仅是10年，而是几十年。

在这特殊的较量中，周恩来表现出超人的智慧。他那机敏的语言、严密的思维、灵活的策略、坚定的原则以及善于求同存异的斗争艺术，就连美国著名的五星上将马歇尔也不得不惊叹：“周恩来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对手。”

周恩来之所以能在错综复杂，变幻无常的谈判天地里得心应手、应付裕如，归结起来，大约有如下因素在起经常性的作用。

其一，审时度势，抓住机遇，为谈判创造条件。

谈判是对等的，不是一方收编另一方或向另一方投降。因此，谈判要选择时机，在有可能时，才能提出谈判的条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首先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在与东北军的谈判中。

东北军是当时“围剿”陕甘根据地的主力，但自九·一八事变后，广大将士身受家乡沦陷的痛苦，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其他将领也产生了影响。加上在剿共战争中屡受重创，蒋介石对其又存剪灭异己之心，这些都促使张学良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因此，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东北军的工作。

但工作从何入手？这时，出现了一个机会。1935年10月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红军中生活了两个多月，思想起了变化。一天，他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提出：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周恩来听了李克农的汇报后，立刻同意了这个要求，并指示，要高福源多住几天，多看看，多听听，回去以后多讲红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高福源回去后和张学良的谈话，直接促成了双方的接触。之后，有李克农和张学良的两次会谈，最后，周恩来和张学良直接会面，做了一次长谈。谈判非常成功，张学良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认为蒋有抗日的可能，希望共产党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劝。

周恩来根据同张学良的谈判情况，在1936年8月政治局会议提出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得到了会议的同意。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逼

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经过这次会议讨论，党在苏维埃、红军、土地政策等方面有了重要变动，这都为以后的国共谈判做了重要准备。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再次显示了周恩来高超的谈判艺术。

当时，尽管中共中央对事变的具体情况很不清楚，但周恩来马上意识到一个扭转时局的时机已实现出来。在事变的第二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作了长篇发言，着重分析了南京政府内部各派系和地方军阀对事变采取的态度，也分析了国际上各种力量的动向，认为对当前的紧急问题，在军事上应该准备迎击南京方面的夹击，“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应该尽力争取蒋之大部，孤立何应钦，要深入群众运动，巩固我们的力量。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已获得初步的成功，我们的党应准备走上政治舞台。”接着，他便受命率代表团奔赴西安。

周恩来应张学良之邀到西安的当晚，俩人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张学良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他的意见是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作全国抗日的领袖。

对张学良的看法周恩来立刻表示同意。他说：西安事变是一次震动世界的大事，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实力原封不动地保存在那里。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他的广大官兵的抗日思想日渐增长，从各方面考虑，对蒋的处置，极需慎重。接着，他分析了对蒋的不同处置方法可能导致的西安事变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一是一致抗日，免于亡国；一是内战扩大，给日本造成侵略中国的条件，我们应该争取好的前途。

周恩来提出这样明确的建议，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事变的和平解决，又促成了国共间更高级形式的谈判，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形成。

其二，知彼知己，尊重对手；坦诚相见，不卑不亢。

谈判是一种特殊而复杂的斗争，这个斗争是通过谈判者在谈判桌上的活动体现出来的。因此，对谈判对象的思想、立场、政治主张、行动策略以至风格作风，都必须有深刻的了解，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采取相应的对策。周恩来对他的主要谈判对象的各方面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特别是对蒋介石，则了解得更为透彻。

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他就充分估计到了蒋介石有联共抗日的可能性。西安事变后，蒋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其指挥，但“联红抗日”并不是简单地国共携起手来打日本。周恩来分析蒋的“联红”思想时认为：西安事变前，蒋认为共产党已处于困难地位，急于妥协，想军政双管齐下，一面增兵围剿，一面联系谈判，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但蒋不愿承认国共合作。他说不要说国共合作，是同我个人合作。蒋的“合作”就是要把中共溶化到国民党中去，实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关系趋于紧张，如何客观认识蒋介石的态度是中共制定统一战线政策至关重要的一环。

1939年，周恩来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于政治局势的大幅度逆转，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动，需要对统一战线问题再一次做出总体性估计，以便采取正确的对策。在会上，周恩来作了长篇报告，分析道：

“蒋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不承认统一战线，实际政策也在那里限共防共，破坏统一战线，存在着妥协投降的危险；但目前的方针上及形式上还讲团结，还主张抗战，还不愿造成全面破裂的局面，这是蒋之思想与政策的最矛盾处，也就是他的政治特点。”蒋介石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承认现实。只要现实对他有利，也能影响他改变一些办法，但阶级的根本思想是不会变的。“幻想蒋放弃其阶级立场，特别是对敌妥协、对英美依赖性、对内反共性，是绝对不可能的。”蒋集团原则上不承认统一战线合法的存在。然而它又是怯懦的，只要事实的发展不危害到它的基本利益，同时，事实的存在已成为不可变性，它也只好承认事实，迁就事实，以保存它未来的利益。但是它又是自大的，即使事实已经存在，只要它有权力否认，有可能拖延，仍然是不愿公开承认的，仍然企图设法取消。

因此，周恩来建议，对待蒋的政策应是：在他困难时援助他，在他蛮横时拒绝他；诚恳的批评，具体的建议，影响他左右的进步分子，反对那些落后分子，经过抗战将领及有正义感的元老造成进步的集团来影响他。

总之，对蒋不要过存奢望，但也不是一成不变。

对参加谈判的有诚意的对手，周恩来对他们总是坦诚相见，做到既是对手，又是朋友。典型的事例就是与张冲的关系。

抗战时期，国民党委派张冲同共产党联络。此人是国民党骨干，是皮共的。1932年他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伪造了一份“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并在上海《申报》、《新闻报》等报纸上广为宣传，企图在共产党内部制造混乱。但是，他在合作抗日的问题上是诚心诚意的。他认真地把共产党的意见向蒋介石反映，有时也挨蒋介石的骂。对蒋的一些不合理要求也和周恩来一同商量解决的办法，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以支持和帮助，尤其是极力弥合国共皖南事变后的裂痕，成为中共的同情者。张冲病逝后，周恩来送去挽联，上书“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并在纪念文章里说：“我与淮南先生（张冲字淮南）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以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其三，让于所当让，止于所当止。

周恩来在谈判中得心应手，不仅因为他有正确的立场，明确的方针，而且在于他始终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谈判的问题的历史和现状都非常熟悉，做到胸有成竹。谈判前，他能主动提出方案，谈判遇到困难时他也能提出多种解决的办法，并善于以适当的让步和通融打破僵局，争取主动，但绝不放弃原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建立时，周恩来于1937年1月24日致电党中央，提出谈判的五项原则，其中包括：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则共产党可以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这个方案既包括了主动的让步，如服从三民主义、苏维埃、红军、土地政策的改变，也包括必须坚持的，如党、军队、边区等。在谈判中，蒋介石坚持消灭共产党的态度一直未变。他说：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此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也心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为此，他曾提出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要求在共产党军队中派遣军政人员，邀请共产党支前军队去国民党政府中作官等。这些要求均为周恩来严辞拒绝。

周恩来说：共产党信仰三民主义，不仅因为它是抗战出路，而且为达到社会主义必由之路。但国民党都并不这样认识，这说明国民党共产党终究是两党。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于国民党也有害无益。至于少数人到国民党中去作官而交出军队，这个交易太廉价。共产党不希罕充任几个无足轻重的官职，相反，人民必须牢牢掌握自己的军队。交出军队等于捆住了手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还有什么权力可言？

但是，为了争得根本利益的实现，适度的妥协是必要的。1946年，国共之间达成了整军方案，确定双方的军队数量为50：10，即国民党军队整编为50个师，共产党军队编为10个师。对这一让步，共产党内部有人表示不理解，周恩来解释说：整军方案是使中国人民的武装受束缚的，但也受保障的，还有它的两面性。在数目上，50：10对我们是个束缚，但也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经过美国武装，我们的10个师也包括在内。整军方案还有个好的方面就是地方自治。“人民的武装是地方自治的东西。60个师只是用在国防上的。地方自治要依靠人民的武装的自卫，我们这里已经自治了，不再需要国家的军队来防匪了，这样就保障我们解放区人民自己的武装不受国家军队的干涉。这样一看人民并不吃亏”。此外，“在整军方案中，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与蒋平等的地位，抗战八年，蒋以他的统帅地位来压我们，但在谈判过程中，马歇尔来后，为了套我们，在地位上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蒋军的平等地位。结果蒋成了一方面的统帅，而不是两方面的统帅。”

其四，客观看待谈判，尽量争取实际结果。

谈判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因此，谈判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有大有小，对大问题，周恩来尽量找出共同点，使之能达成协议，有分歧的，一时解决不了的，就暂时放一放，留待条件成熟时再来解决，决不在原则上迁就。对比较具体的问题，能定的就马上定下来使之有结果，不企图通盘解决或完全依照我方的愿望来解决。周恩来说：有利的应立即商定，不要希望将来会有更好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经过谈判解决的问题还是不少的。如军队问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是达成协议的。但蒋介石要控制共产党的军队，在改编后的编制、人数、设不设总指挥部等问题上与我方要求相去甚远，在苏区的地位、行政长官的人选、两党合作的形式及纲领也颇有分歧，对共产党公开的时间问题上也是拖而又拖。后来，抗日战争打响了，这些问题也基本按对我方有利的原则得到解决。此外，关于释放政治犯、黄河堵口、中原撤退等，都通过谈判及时解决了一些问题。

中原解放区是1945年10月24日由三支解放军在豫西的桐柏山区会师形成的，以新四军第五师为主体组建了中原军区，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委。

在蒋介石看来，中原军区的建立似乎威胁着蒋军出川的大门，于是纠集大量兵力，向这个地区进逼。为避免冲突，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原军区机关和主力部队从12月下旬起，主动撤出这一地区，向新四军主力靠拢，中途值“停战令”颁发，遂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这块地区就地待命。这个地区在鄂豫两省交界处，东西长200余里，南北宽约50里，在这个狭长的地区内，

密集着 9 个旅 6 万余人，在态势和地形上都处于十分不利地位。蒋介石利用停战期间，调大军围困，先后挑衅进攻达 240 多次。

周恩来一直焦灼地关注着中原军区的严重处境。他一面加紧谈判，揭露国民党当局“中原无战事”的谎言，迫使美方和国民党方面接受他的建议，组成三人小组去宣化店视察，争取协商解决，同时，告诉我方军区同志说：你们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幻想国民党会发善心，他是不会发善心的。你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你们的脑子必须复杂一点，一定要设法用枪杆子突围出去”，并帮助军区同志选择撤退路线，制定作战方案。

经过努力，国、共、美三方签订了停止中原内战协议。这个协议的重要成果，是国民党方面同意将 2000 多伤病员和非战斗人员以及部分被国民党蚕食地区的地方干部遣送到河南安阳，这就精简了部队，便于做好突围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为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原解放军的胜利突围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五、炉火纯青的政治艺术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这样评价：“周恩来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又是一位儒雅的人物；他既是致力于意识形态的人，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既是政治上的斗士，又是最大的调和者。在扮演如此错综复杂的角色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像周恩来一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应付裕如。而周恩来却可以扮演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或是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角色揉合在一起。对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在适当的时机逢场作戏，而且说明这位内心世界十分丰富复杂但又敏锐聪颖的人物具有不同的几个侧面。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在政治生涯中有漫长而又丰富的经历。”

的确，从1927年直到1976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周恩来一直生存在中国党政高层权力空间，比列宁、斯大林、或毛泽东都要长。而且，他还是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班子中唯一的地位曾经高于毛泽东的人物。周恩来之所以能历经险恶的政治风浪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无疑地主要得益于他炉火纯青的政治艺术。

第一，韬光晦略，曲中求伸。

周恩来在与毛泽东的长期合作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与毛泽东相处，首先避免与毛泽东发生公开冲突，特别是建国以后。

其实，1957年以前，周恩来对毛泽东发表意见还是比较坦率的。1956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发展经济思路分歧公开化。毛泽东主张大干快上，力反“右倾”保守，而周恩来则主张稳中求进，不时给冒进泼冷水。二人争执很大。当时，毛泽东似乎作了让步。但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在历次会上痛斥“反冒进”，在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批评“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还拿出柯庆施写的《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一文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样的文章你不写得出来！”对如此咄咄逼人的发问，周恩来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惊，他意识到某种危险的征兆，于是，马上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文革期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思想有许多不同看法，实在不能忍受了，也只是私下去提，如果毛泽东固执己见，周恩来也只得听其自然，力求在实际执行中抵制错误，弥补损失。

自我裁抑，竭力给人以次要地位的印象，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相处的又一特点。他曾谦虚地说：毛泽东是搞战略的，我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好，还没有把握。

对此，尼克松看得很清楚，他说：周恩来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个人。就是在说明某一问题时，也喜欢引用毛泽东语录和诗词。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甚至比喻，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

事实上，周恩来不仅能搞战术，而且也是既能看到树木，又能看到森林的战略家。他深深懂得成功的战略首先是生存战略。

第二，高瞻远瞩，放眼未来。

周恩来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往往有准确的预见性。

抗战时期，周恩来对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就作了正确的预见。

1940年皖南事变前夕，周恩来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充分估计到了蒋集团反共倾向增长的可能性。他认为：三国协定后（指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的协定），英积极拉蒋，蒋喜；现

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故蒋于日军退出南宁、斯大林复电之后，立往成都，此行决非偶然，蒋自己躲在成都，让其他人参与各方活动，以便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

12月25日，周恩来应邀往见蒋介石，第二天，他向中共中央报告时说：蒋的许多承诺是靠不住的，其实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张冲回去，认为出意外的满意。我倒认为是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果然，之后不到10天，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此后，国际形势接连出现了异常激烈的动荡和变化。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和同年12月7日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几乎都在一天之内改变了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并对中国战场产生了巨大影响。

处在如此风云变幻的历史时刻，要准确把握世界局势的发展，及时地作出正确的判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周恩来凭着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犀利的识别能力，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每一步发展。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10多篇评论文章。这些文章论据充分，说理透彻，对当时局势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对人们清醒的认识时局和中共制定方针政策都有重要作用。

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作为德意盟国的日本将大量兵力从国内运往中国东北。国民党当局判断日本将会在一个月之内北进，认为那时他们就可以乘机将中共力量压到黄河以北。周恩来在6月28日的文章中指出，北进的危险固然存在，但日本对北进也不是没有顾虑的。第一，中国问题将因此更陷于不能解决之境。第二，西伯利亚并没有像南洋那样多的国防资源。第三，时间上不很易于侥幸成功，万一拖长，他们的另一只泥足又要陷于冰天雪地之中。第四，万一英国在他们攻苏之后实行太平洋上的封锁，岂不陷于前后绝境。在7月20日的另一篇文章中，周恩来又指出：不管其是在积极准备北进、或者南进、或者南北并进，但其灭华之方针决不会有任何变更，而且还会先来一个西进。“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总应准备敌人西进，这才是万全之策。”“等待胜利，总是一种最有害的心理，尤其是专门希望日寇打别人，最是一种没出息的想头，而且对于联合友邦，争取外援，也颇不合乎情理。”

10月16日，日本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陆相东条英机奉命组阁。这是不是普通的内阁改组？许多人一时迷惑不解。周恩来立刻作出敏锐的判断，认为这是日本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动的危险信号，是太平洋战争的先声。他在三天后发表的《太平洋的新危机》一文中，毫不含糊地发出警告：“其人其事其时，都说明日本法西斯军人再也不能忍耐目前沉闷拖延的局面，而必须自己出马，采取冒险的行动了。”

那么，日本大冒险行动的矛头首先是向北还是向南？周恩来很快断定：会向南。在日美之间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当时在香港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形势，认为日本不会打美国，并在《华商报》写社论时也用这种观点分析战局，产生了不小影响。周恩来立刻去电，指出日美有开战的可能，要他们做好应战的准备。

“文革”中的周恩来虽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但他仍无时无刻不在筹划着中国的未来。特别是“文革”后期，周恩来感到自己身体每况愈下，将不久于人世时，他把解放被打倒的干部，准备后继力量当作刻不容缓的使命，尤其是尽一切努力促成邓小平复出。尽管邓小平在1976年春天再次被打倒，但他的正确主张和政治才干已得到党内和社会的普遍承认，这就为他再一次

复出准备了最根本、最扎实的条件。可以说，周恩来在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过渡中起了重要的铺垫和桥梁作用。

第三，实事求是，不走极端。

一位外国朋友曾说过，在周恩来身上，从来没有那种狂想主义和极端主义色彩。

周恩来是一个重实际的人，他总是强调：衡量一件事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他强烈反对那种只从主观想象出发，不顾客观存在的做法。

1945年10月8日，即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回延安前三天，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那天晚上，周恩来、毛泽东到军事委员会礼堂，参加张治中为欢送毛泽东回延安而举行的鸡尾酒会。酒会后，在礼堂看戏。正在这时，周恩来接到报告，第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共产党员，廖仲恺的女婿）在乘车外出途中遭到国民党士兵枪击。当周恩来赶到医院后，李少石已因伤势过重而逝世。

由于当时情况复杂，实际情况又未查清楚，当晚在办事处开会研究时，气氛异常紧张。参加会议的人感情激动，义愤填膺，作了种种猜测，都把它和毛泽东的安全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是国民党下的手。周恩来态度十分冷静，一面加紧对毛泽东安全的保护工作，一面下令进行调查。事情很快弄清楚了。原来，当汽车回城时，司机开快车，撞伤了路边的一个国民党士兵，班长见汽车肇事后没有停车，就朝汽车开枪。在安葬了李少石之后，周恩来亲往医院看望那个被撞伤的士兵，并重申愿承担一切医疗费用。以后，周恩来多次说过：人不要有主观主义，不要有成见，李少石一事就是生动的例子。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周恩来的一贯作风，贯穿于他生活和各种工作的各个方面。1956年他和陈云等反冒进，就是在经济工作中尊重客观实际的典型。周恩来在这一年的中央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我们要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这一年，毛泽东要追加20个亿的预算，周恩来坚持不同意，说自己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接受。

第四，重事业，远宗派，相忍为党。

中共历史上，大致从1928年“六大”开始，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得以产生并渐次酿成风气，造成危害，以至于延安整风时期，不得不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毛泽东曾这样感叹：党内有派，党外有党；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一直身居高位的周恩来却从未形成过属于自己的宗派，尽管他在党内有许多留法时期的同学，在军队中有许多黄埔军校的学生，在知识分子中有大批追随者。他与这些人的关系依靠友谊和道义来维系，在形式上也是松散的，正大光明的。邓小平很钦佩这种精神，认为周恩来从来不搞小圈圈、摊摊，光明磊落，照顾大局，值得各级干部学习和效法。

周恩来也是一个有极大耐心的人。他认为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

的侮辱，要学会忍耐。忍辱负重，忍中求进，是他做为一个政治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所受委曲多有所在，但他总是恢宏大度，不以逞个人意气为先，把事业、大局放在首位。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瞿秋白因为对李立三犯了所谓“调和主义”错误，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国际支持的王明宗派的攻讦。米夫甚至挖苦地说：“周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面对许多纠纷和责难，周恩来在发言时，对三中全会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同时，仍坦率地针对当时党面临的分裂危机和派别分歧谈了他的忧虑，强调要维护党内团结。对自己，他什么辩解也没说，并印发了自己在三中全会上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注明：“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错误，实可以拿它做一个标本式的文件。我发表了它，也正是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

四中全会后，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实有大分裂的现实威胁。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一旦出现分裂，将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周恩来的心情极其痛苦，尽管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又不为一些同志理解，但他还是恳切他说服许多同志不要意气用事，要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下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大的分裂，渡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

周恩来在此会后依然忍辱负重地担负着中央的繁重的日常工作。王明公然说，这只是“为的实际工作便利和给他们以改正错误机会”。由于米夫仍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留在中国，支持王明，周恩来的处境十分困难，但他仍然拼命工作，并努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消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后来周恩来说过，这时支配他的想法是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第四，果敢刚毅、大智大勇。

周恩来是个智慧过人的天才，他善于应用各种灵活的手段达到斗争的目标。一位外国记者说他是“难于抗拒的……机智的、有魅力的、讲究策略的人”。但是，周恩来决不是那种见风使舵，独善其身的人，为维护真理、正义，关键时刻他总是挺身而出。

1936年，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时，在四方面军中，一些反对张国焘的干部和战士仍然遭到张的残酷迫害。廖承志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开除党籍后关押着，周恩来在赶往迎接二、四方面军的路上，一直在打听他们的消息。他深知张国焘是个心狠手辣的人，把中央派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杀了不少，还把四川省委派进川陕苏区的干部几乎杀尽，目的是消除异己，巩固个人地位。由于他在四方面军中根基甚深，又重兵在握，中央对他不能有效地控制。因此，周恩来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不能不格外小心谨慎。

一天，他在往豫旺堡的路上，刚好迎面碰上被押的廖承志。廖承志思想上没有准备，不知如何是好。正踌躇时，周恩来走过来，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说话，但同他紧紧握了手。

当天晚上，周恩来派通讯员把廖承志找到司令部。张国焘也在场。他明明知道周恩来认识廖，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却转而厉声问廖：“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改不改？”廖一一作了回答。之后，周恩来留廖吃饭。吃饭时也只和张国焘说话。

廖承志后来回忆说：“周恩来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

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自从周恩来把我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我就被释放了。”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从某种程度讲，也许是周恩来在当权岁月里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中这样写道：“毛泽东的红卫兵含混不清的使命，就是要摧毁现有的政治秩序和官僚机构。作为总理的周恩来正好处于这一机构的顶端。”但是，在这党和国家的危难关头，他没有远避祸事，洁身自好，而是勇挑重担，苦撑危局。1966年12月间，他对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李富春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在“文革”中，他在给人以和“左”派分子站在一边的印象的同时，又在他政治状况允许的范围内，殚精竭虑地想出各种办法，乱中求治，减少损失。在关键问题上，他针锋相对，决不让步；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则妥协让步，以小换大，舍卒保车；在重大问题上，尽量争取毛泽东的支持，利用毛泽东的权威震慑“左”派。在讨论和制定具有法律效力和权威效应的文件时，冲淡和限制一些过火的内容和提法，有时还借风使船，利用一些国际上有影响的外籍科学家、作家等文化名人的言论，抵制科学文化领域的极“左”思潮。

周恩来这些办法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大局，但对极“左”思潮起了重要遏制和中和作用。没有周恩来，“文革”的局面可能不堪设想。他以对党和人民的全部忠诚、智慧和勇气，挑着这副重担，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做到他自己所说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六、争取多数反对少数

周恩来是中共党内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时间最长、结交面最广、始终处在第一线的一位领袖，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共产共产党推进统一战线的一面光辉旗帜。他对党的统一战线事业有着多方面的建树，而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风建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则是超群非凡，无与伦比的。

周恩来统战作风的风格是随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变化而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它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显示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襟怀博大，团结多数。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分化和孤立反对派，以完成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使命，这是周恩来统战风格的思想理论基础。他认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不同，决定要打击的主要敌人也不同，因而，团结的范围在时空上和内涵上是变化的，但斗争的原则总是团结多数，反对少数，这一点是肯定的。他警示共产党人，“争取多数，反对少数”，“这在任何时候任何斗争场合都是坚定不移的原则，要了解那个多数一直要包含到敌人营垒中的少数开明分子（即封建买办阶级中的开明绅士、爱国分子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济深、陈铭枢和国民党 19 路军将领于 1933 年 11 月 20 日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主张抗日。周恩来派人与福建人民政府秘密联络，力主与之联合反蒋，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遗憾的是当时的党中央推行“左”倾关门主义政策，以致坐失良机。

1934 年 10 月红军长征前夕，周恩来派何长工与“南大王”陈济棠的代表密谈，达成了互通情报、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从而使红军长征时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地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绍兴动员抗战，对一友人说：现在民族矛盾是第一位，国内的分歧应该尽力缩小，有些矛盾可以放到打退了民族敌人以后再说。为了取得抗战胜利，一定要把抗战的阵营努力扩至“大无外”，把反对抗战的敌人阵营缩至“小无内”。并说：“要打倒一切，就一切都打不倒。”他在国统区先后 10 年，创造性地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统战工作成就卓著。一是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之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二是参加庐山会谈，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并努力制止反共逆流，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直到抗战胜利，三是广泛团结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和国际友人。

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周恩来要求全党同志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他说：“我们先划一个最大圈子，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最反动的地主阶级和官僚集团，孤立他们，反对他们，打倒他们”，并强调共产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决不能只依靠少数先锋队办事。因为当时党团员合起来的总数还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少数人自己划个小圈子把自己圈起来，用中国的古语来说，这叫‘画地为牢’”。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被压迫的党变为执政党，但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多数的风格不仅没有变，而且更加发扬光大，发展为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致力于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这体现在健全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关心、爱护、依靠知识分子；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

周恩来尤其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团结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反对那种孤芳自赏、唯我独尊的作法和态度。他认为朋友间有不同意见是好事而绝不是坏事。他说：“有不同意见的人跟我们来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圣人都喜欢辩论，何况咱们后生小子乎！”“要善于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一切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扩大矛盾的作法，都是错误的。”

不仅如此，对历史上曾经起过一些好作用的人物，即使他们可能现在属于敌对营垒，周恩来也总是客观地评价其地位和作用，做到不计前嫌，不忘旧功。他曾多次提到，将来台湾解放了，不要忘了张镇的功劳。因为重庆谈判期间李少石事件发生后，当时任国民党宪兵司令的张镇，按照我方的要求在当晚亲自陪送毛泽东回红岩，保护了毛泽东的安全，并很快调查清楚了事件的真相。在他生命垂危时，还专门嘱咐有关同志在《辞海》上介绍杨度这一人物时，要说明此人晚年立场的转变和对共产党的贡献并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消息透露后，所有具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无不为之耳目一新，叹服周恩来的宏伟气魄。因为杨度曾是“洪宪余孽”，高居鼓吹袁世凯作皇帝的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之榜首。

正是由于具有这种博大的胸襟，使得周恩来团结多数的统战思想的运用在党内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二，推诚相见，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说，统战和外交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广交朋友。世界上很少有人像周恩来那样，在不属于自己的党派中有那么多朋友。

周恩来在朋友中受到极大的尊重和爱戴，首先是因为他对朋友以诚相待，平等相待。他说：“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因此，朋友对他有着无限的信任。著名工商界领袖胡子昂是周恩来在抗战时结交的一位朋友。胡子昂说：“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服他……他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

在与朋友交往中，周恩来从不以领导自居，他多次批评某些党员干部常有的那种剑拔弩张的态度，强调要和和气气，平等待人，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他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正是这种平等、诚恳的态度，感动、影响了众多的朋友，使他们许多人从对周恩来个人的折服发展到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周恩来对朋友以诚相待，不只表现在政治上引导他们不断进步，而且十分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常常为之排忧解难，雪中送炭。

1946年7月，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随后，民盟常委陶行知因受刺激和劳累过度病逝。周恩来在含泪送别了陶行知的当晚，就给中央打电报说：“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已告上海潘汉年和伍云甫，在救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上亦须时时关照。”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抗战初因抨击官僚资本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周恩来为营救积极奔走，后马寅初虽被释放，但被国民党方面限定三不准：不准任公职，不准教书，不准讲演和发表文章，因此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全文刊登马寅初的《中国工业化与民主》，并致送最高稿酬。因国民党方面检查限制而不能发表的其它马寅初的文章，也同样对待。

第三，不卑不亢，存异求同。

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阶层、党派集团，以至个人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在一定的条件下，为实现共同利益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上自愿结成的政治联盟。共同的利益、自愿结成联盟，规定了“同”，各自的利益规定了“异”，各自的利益对共同的利益来说是从属的，这是统一战线的要求和特点，不然，统一战线不是建立不起就是破裂。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统战工作是一门求同艺术。周恩来最善于发现共同点，也最善于求同。在周恩来看来，矛盾双方的共同点可以从历史的联系中去寻找，可以从现实交往中彼此的利害关系中去寻找，还可以从未来历史的联系中去寻找。但他并不把“求同”推到极端，搞求同而非异，而是在存异立异的前提下讲求同，在承认区别的前提下讲统一性。一句话，就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不卑不亢，联合同盟者。至于求同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依不同的具体情况呈不同的特点。比如，有协商求同、逼追求同、抑异求同、妥协求同、亲善求同、等待求同。

协商求同一般适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根本利益不相冲突。如在国家大政方针、重大决策和重大人事变动方面，周恩来主张通过广泛征求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的意见，求得一个为全国人民满意的解决。他每次召开政务会，都邀请一些民主人士参加。他称赞这样的会很好，可以听到各方面的意见，能够促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逼追求同适用于矛盾尖锐对立的双方，当矛盾的双方面临共同利害关系，而矛盾一方又缺乏主动自觉，尚在迟疑徘徊时，只有借助外力推动，才可能使共同点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如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即属此列。

抑异求同是矛盾双方达成共识、结成统一战线后，内部仍然存在分歧，如果不能有效地抑制这些分歧，就可能使统一战线破裂。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身在重庆的周恩来便通过新闻媒介、谈判斗争等各种手段，揭露蒋介石的反共限共政策，使统一战线得以维持至抗战胜利。

妥协求同是指矛盾双方就某一问题争执不下，一方或几方面就得作出一定让步和通融，以缩小分歧，达成共识。如1946年1月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原属民盟的青年党提出要独立出来参加会议，一下子给代表名额的分配造成困难。为了确保会议能够召开和民主力量占优势，周恩来果断提出一个方案：民盟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各9名维持不变，共产党从9个名额中让出2个，国民党让出1个，另增加2个共5个名额给青年党。这个方案为各方所接受，保证了政协会议的召开。

亲善求同比较运用于政治上的中间派和敌对阵营中比较开明的分子。

等待求同是当有些矛盾当时无法调和，但到一定时期就会出现转机，找到相同处。

总之，周恩来的统战风格是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坚定的信念、超人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崇高的品德，组成了他高尚的精神境界，也是形成他统战风格的内在因素。

七、多方面加强党的建设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在党的建设事业中，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周恩来最早提出改造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强调尤其要坚决地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

1928年底，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在致力于恢复党组织的同时，特别注重从思想上改造党、建设党。他认为：中共从与国民党合作以来，党内成分严重不纯，这正是国共合作破裂后一些党员动摇、消极、公然叛敌的根源。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红军的兴起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农民成为党员的主要成份。在党员的构成上，“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因此，“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有大大发展的可能”。

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表现为左倾冒险、右倾悲观、家长制、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小组织倾向、个人意气之争、雇佣观念、脱离群众等。能否克服这些错误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但是，如何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当时的共产国际和党内都有不少错误倾向。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二是片面强调吸收工人入党和充实党的领导机关。

前者即在检讨失误时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一旦某人犯有机会主义错误，则群起而攻之，必欲将其打倒而后快，以为不这样就不足以肃清机会主义，结果造成党内人人自危。

针对这种错误作法，周恩来指出：“机会主义的根源根深，决不是排除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诚然，党对那些系统的执迷不悟的机会主义分子，只有尽情驱逐，才能坚固本身壁垒，但是主要的还在批判一切机会主义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确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道路。”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来肃清机会主义，这本身就是机会主义。

片面强调吸收工人入党和实行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是从1927年“八七”会议后开始的。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工人出身的人才最具有无产阶级纯洁性和革命性，而排斥知识分子。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1928年6月中共六大前派遣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工人占了75个代表中的41个，但在后来的革命中叛变的16个代表中，竟有14个是工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很多也是不能胜任的工人，党内真正有威信的人没有选入。

这种错误思想的另一表现就是反知识分子。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就有这种严重倾向。六大期间，张国焘和瞿秋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布哈林在大会上责备两人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再吵就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结果，工人出身的上海船工领袖向忠发当选为总书记，他在后来被捕后不到一天就叛变了。布哈林这个讲话在当时和以后都造成了恶劣影响。

对此，周恩来认为，扩大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是也应看到，中国的工人阶级只是少数，在农村更有限，而且也不能说工人就一定有无产阶级意识。所以，那种把工人与农民、工人与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绝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但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

上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人丧失了无产阶级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他说：“许多同志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而造成了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了党内纠纷，这种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

他还强调，引进工农分子改造党要避免形式主义错误，单纯机械地招些工农分子加入而不加以积极的引导教育，或机械地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分的比例，结果还是造成由原来那些人——知识分子包办，甚至闹成秘书长专政的笑话。所以，重要的不在成份来源，而在于是否有无产阶级意识。出身再一致，如果思想不一致，党内的分歧仍然无法减少，党内团结依然无法加强。在领导机关人员的配备上，尤其要防止机械引进的办法。因为当领导不仅仅是个阶级出身问题，更重要的是是否有坚强的党性和必要的能力。

在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上，周恩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在1929年给红四军的中央“九月来信”中已明确地体现出来。

当时，红四军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有所分歧，毛泽东与朱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1928年5月间，刚从苏联回来的刘安恭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后，对红四军领导内部党和军队的争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问题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境地。那时，中共中央还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听了陈毅关于红四军的汇报后，让陈毅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经周恩来亲自审定后带回红四军。信中强调了党应加强对红军领导的问题。其中写道：“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红军来源主要是破产的农民，必然存在“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可以说，“九月来信”在确立“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周恩来是较早阐述党的民主集中制思想的人。

早在旅欧期间，他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说：“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实时时监督其行动。”“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这其实包含了如何正确处理党的领袖和党员、党的集体之间的关系的思想。

他认为，党员是党内生活的主体和党内事务的主人，服从纪律和顾全大局是必要的，但是，自觉行使自己的权力，敢于发表意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也是必要的。他既反对那种无组织无纪律、个人意气用事的极端民主化，也反对那种只知道服从、请示的“奴隶主义”。

四十年代，他和所在党组织成员在重庆讨论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是否上演的问题。当问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张颖时，张颖说：“没有意见，同意您说的。”周恩来生气地对她说：“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没有意见呢？遇到问题你不思考吗？不懂的应该先学习嘛，我不喜欢你们一来就同意我的意见，那还要讨论做什么？你们要学会提出不同意见，甚至相反的意见。”

对待党的领袖，他反对盲目服从。在延安时期，他已开始意识到有人盲目抬高毛泽东的地位，有把领袖个人置于党的组织之上的危险。1949年，周恩来给青年作了一次题为《学习毛泽东》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着重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在斗争中不断成长起来的领袖，不能只看他今天的伟大成

就，而不看历史的发展。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否则，“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孤立的神了吗？”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周恩来更加强调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他在 1949 年 12 月的一个讲话中指出：要取得建设事业的胜利，就必须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正确处理上下关系。并多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坚持党的领导，但党的领导是指党委的领导，不是个别党员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就是党委，也主要是抓方针政策，而不应包揽一切，不要干涉具体事务。他还提醒说，我们的党已经是执政党，党的干部要防止失掉满腔热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而堕落到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中。

在 1962 年 2 月的一个讲话中，周恩来呼吁：“我们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尽快恢复起来。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要恢复起来，现在被搁在一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通都要恢复起来。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党章办事。”不难看出，周恩来当时已明确感到了党内极不正常的民主生活将会造成巨大的危险。

重览周恩来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思想，我们不仅感到它在我党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八、把经济建设工作放在首位

尼克松曾评价：周恩来“不是光能管理废墟的人，而是能够进行建设，这在革命领导人中是罕见的。他既能维护过去留下的最美好的东西，又能为未来建设一个新社会”。

诚如此说，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是在他终其一生的总理职位上，为我国的建设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首先，他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以经济的改造和建设为限，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造和建设在内的，就是说，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在建设中、改造中。之所以着重提出经济改造，是因为经济是基础，其它都是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得不到改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立不住。

1959年12月他在接见首批特赦战犯溥仪等11人时说：“一个人、一个社会，都要不断革命。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

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各方面工作并不是齐头并进，等量齐观，而应突出重点，那就是必须以四个现代化为核心，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摆在全国工作的首位。

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居于首要地位”。同时又说：于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他多次指出实现四化是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直到1975年1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在向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还重申1964年12月遵照毛主席指示向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分两步走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号召全国人民向这个目标前进。

第二，在经济工作中，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积极又稳步地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1956年2月间，周恩来提出：“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9月，他在向八大所作经济报告中又说：“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当时，周恩来意识到最易犯的错误是突出有利条件，忽视不利条件，故时时不忘反冒进，提出宁可慢一点，也不要急于求成，以致事倍功半。

针对冒进的两种主要表现即不顾条件到处铺摊子、上项目和片面加强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周恩来指出，经济建设要处理好重点建设和全面建设的关系。如果不顾条件到处铺摊子、上项目，就会挤占重点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和原材料，妨碍重点建设，且造成财政上的紧张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社会主义改造应与工业化相适应，“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行工业化才行，如果

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 “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

1956年9月中共八大期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取得一致意见，把既反保守主义，也反对急躁冒进作为八大政治报告的基调。

八大后，他坚持把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压下来，并在审议二五计划建议草案中，把“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掉。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1957年我国经济搞得相当出色，是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年份。

反保守反冒进的另一面，就是力求经济在综合平衡中积极地稳步地发展。

综合平衡的关键是要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三者的关系。

周恩来在党内最早提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领导的思想。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中心，也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1949年12月，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因为农业的发展，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他认为，衣食住行，首先是吃，“工业人口其他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粮食、油类和其它副食品都依靠农业”。因此，“没有饭吃，其它一切就都没有办法”。农业的发展，又直接影响整个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许多行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原料、输出的产品，现在绝大部分要依靠农业”。同时，“工业所需要进口的机器大部分需要用出口农产品去交换，许多工业品的主要市场是农村”。

在强调农业基础重要性的同时，周恩来认为，农业的发展必须依赖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领导。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意味着与强调农业是基础相矛盾，但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强调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的，它必须有各个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二是不能忽视人民的当前利益，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三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关系失调的情况下，我们在一定时期内“必须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有些重工业部门的生产指标，必须大幅度地下降”。这样做，“正是为了使整个国民经济在长远时期内能够更好地前进，使现有的生产能力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第三，坚持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在如何处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手段问题上随即出现分歧，实际上牵涉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问题。

毛泽东对“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和物质刺激都不太满意。在他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方式要以最大限度地缩小劳动者收入的差别为原则。劳动者的收入差别愈小，就愈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

周恩来则认为，要以承认一定差别为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把最终消除社会差别寄托在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上。

1962年秋，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外交官乌尔科姆·麦克唐纳时说，一些人对在中国建立一个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要花费的时间一度持过分乐观的态度。这些乐观主义者期待人们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应毫不抱怨地接受同等报酬，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因此，这些一厢情愿的思想家取消了农民在合作化早期被允许保留的自留地。但实践证明他们的这种

作法是错误的。他们是一些错误地判断了人类本性的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是一步一步地走，首先要教育群众，使他们达到一个公平社会的道德水平所要求的高度。在过渡时期，必须认识到群众仍是一些普通的人。他们中间有些人先进，有些人落后。因此，“物质刺激”是必要的。

林彪事件发生后，极“左”思潮受到怀疑，周恩来乘势有计划地整顿生产秩序，重建合理的规章制度，重申“按劳分配”的原则。那时，有人把中国分配领域的状况概括为四句话：“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与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周恩来认为这概括得很好，并且还加上一句：“干难与干易一个样”。他强调，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有利于控制工人人数的增加。

此外，周恩来还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要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以个体所有制为补充；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使之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等一系列与经济建设相关的理论和思想，并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在建设中的作用。

作为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真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苦心经营了26年，他当之无愧地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奠基人。

九、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周恩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一贯给予知识分子高度重视的人。他不仅从生活上关心照顾、事业上帮助鼓励他们，而且在政治上积极地对他们进行引导、教育，使他们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成为一股不可缺少的巨大力量。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就存在一种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中共六大会议上，这种错误倾向已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对此，周恩来力排众议，提出了不同看法，并在所作组织问题报告中特别提出：党在组织问题上的错误倾向之一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我们对知识分子应用无产阶级的方法去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以后，他又多次强调在党内机械引进工人是形式主义的作法，肯定许多知识分子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奋斗的。反对那种只反小资产阶级出身，而不反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作法。

抗战时期，党的统一战线中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周恩来和他们广交朋友，并利用一切合法的形式团结他们一道战斗。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个部。政治部下设四个厅，第三厅是管宣传的。蒋介石请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作第三厅厅长，意在有周恩来、郭沫若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又有郭老延揽大批文化、学术、文学艺术各界著名人士，同时将第三厅掌握在自己控制下，让周、郭二人作空头官，既装璜门面，又羁縻人才。

郭沫若和文化界进步人士最初不愿到这个机构去工作。郭沫若说：“在国民党支配下作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

周恩来作了许多耐心的说服工作，阐明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这个公开机构对民主力量宣传的重要性，因为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机构，也可以利用它为全面抗战作许多事情。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第三厅团结了众多的文化界进步人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对唤起全民族的抗战意识，发动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突破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各项建设的开展，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时时处处都碰到建设人才缺乏，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参与这一无法回避的问题，并且须不断地及时提出适宜的解决知识分子有关问题的办法。周恩来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首先，周恩来旗帜鲜明地宣布，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56年1月1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隆重开幕。担任中共中央书记的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明确指出，经过解放后六年多党在旧社会遗留下的知识分子中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中间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周恩来说：“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他把低估知识界的巨大进步、否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看法，看作是党内的一种宗派主义倾向，严肃地进行了批评。

周恩来这一论断，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震动。长期被看成“灰色”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和最革命的工人阶级一样的“红色”，使他们不禁喜出望外，倍感光荣，增加了他们为国家、人民服务的自信心。

其二，指出知识分子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要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

面对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周恩来多次要求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国家有益的专长。他批评在使用和安排知识分子方面的种种缺点，并要求坚决加以改正。他认为使知识分子“闲得发慌”或学非所用都是“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富”。

为了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使他们愉快而自信地工作，周恩来认为，需要对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他在1955年11月就曾指出：“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些知识分子。”所谓尊重，“是要尊重他们那个知识”，“尤其是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其知识，哪怕是一技之长。这样做，对于国家的各项建设，对于国家的今天和明天，“都是有用的”。对他们的使用应做到“用而不疑”。他批评那种对知识分子采取的敬而远之的作法，认为“这样，既缺乏了解，也容易形成隔膜”。他一向把向知识分子学习，同他们交朋友，作为信任和支持知识分子的一项基本内容，并身体力行。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

他批评那种对待知识分子工资问题上所犯的等级制度和平均主义错误，认为知识分子的工资要合理调整，其中有特殊贡献者的工资可以超过国家主席，应遵循按劳取酬的原则。提高工资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他们业务上的上进心，加强新生力量的培养，刺激科学文化的进步，同时还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

周恩来历来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他强调：如果他们“为了日常生活琐事，往往不必要地费去大多的时间，这应该看作是国家劳动力的损失”。解决知识分子生活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各有关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从思想上重视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特别是要打破那种只注意行政负责人的生活，而对知识分子就觉得“你有什么值得照顾，我为什么要侍候你”一类的错误观点。他说：“只要这样，问题就可以差不多解决一半。”

此外，周恩来还十分重视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推广其劳动成果等问题。

长期以来，在知识分子工作条件方面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许多知识分子用在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太多。周恩来指出：“这是我国文化战线上一个严重现象。”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六分之五”的原则，即每周保证专业人员至少有40小时用在业务上。他还指出：为发展科学研究，“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它工作条件”，保证知识分子有必要的图书资料和工作设备，配备适当的助手，都不是什么“小事情”。

对知识分子的劳动成果，周恩来特别重视对它们的推广应用，这也是周恩来在知识分子中深得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的办公室里，存放着一张全国食管癌高发区分布图，周恩来依靠它指挥全国的防治工作。1969年的第三号台风，强度之大，影响范围之广，在历史上是少见的。气象人员测出后，在台风袭击我国的前两天，周恩来就让把台风的强度、移动速度、可能登陆的时间、地点及时详细电告有关省、市，要他们领导群众做好各项准备

工作，使这次台风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其三，阐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只是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把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全部“包下来”，并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这一工作如何进行，在党内和社会上都存在许多不正确观念。

周恩来指出，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实践、自己的业务实践和一般的理论学习三条途径，前二条强调自觉，符合知识分子的特点。因为知识分子比较有头脑，比较有分析和综合的能力，也比较有独立的人格，让他们自己去体会，比灌输更有效。谈到一般的理论学习，周恩来也认为要遵循自愿和联系业务的原则。同时，指导人、学习的内容、计划和方法要适应知识分子的要求，不能程度太低。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必须通过本人自觉，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也不应写什么“检查”、“检讨”、“声明”之类的东西。

他特别提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解放后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任务，这以后，知识分子虽然要向更高的进步目标前进，但是那是同其他人一样的一种经常性质的任务了。

其四，纠正在知识分子中很少吸收党员的倾向。

早在1956年，周恩来就批评过很少在知识分子中间吸收党员的关门主义倾向，要求纠正。他说，现在很多的进步的知识分子要求入党，其中合乎党员条件的是不少的。单就高级知识分子而言，估计到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力量的增大，估计到新生力量不断地加入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周恩来认为：在1962年党员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三分之一左右，是适当的。

周恩来不仅号召全党关心知识分子的入党问题，而且亲自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就是在他直接关怀下入党的。

那是1957年3月，李四光因患肾脏病在杭州疗养。一天，周恩来陪完外宾去看望他。谈话间，周恩来问起李四光对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何看法。看着总理亲切、热情、信任的目光，李四光终于说出了自己埋藏已久的话。原来，他很早就想入党，但又深深地感到自己条件不够。他想，在共产党领导的艰苦的革命斗争过程中，自己没有投身到革命队伍内，感到十分惭愧。现在，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自己又无论从阶级觉悟、世界观的改造及对党的事业的贡献来讲，都还没有达到党员的标准，再加上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入了党怕不能起一个党员的作用。因此，对是不是提出入党要求，一直犹豫不决，心情矛盾。听完了李四光的话，周恩来恳切他说：“很需要知识分子为党工作。入党后，可以更直接地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又说：入党是自愿的，要他好好地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和地质部、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同志再谈谈自己的想法。

以后，周恩来又多次看望李四光，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的病情与生活，并又一次提及他入党的事。1958年12月，在周恩来的多次关怀下，李四光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总之，周恩来在我党对知识分子工作方面所倾注的心血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他是党内最懂得知识分子，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为广大知识分子所爱戴的一位领袖，是我党团结知识分子的典范。

刘少奇谋略

刘少奇（1898～1969），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1898年11月24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1920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期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受党中央的派遣，大部分时间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1932年，刘少奇调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和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中，作为党中央代表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期间，他正确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保存和积蓄了革命有生力量，发展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他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等著作，对党员修养和党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全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的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一贯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勇于探索，坚持真理。他一生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严于律己。他的伟大功绩和高尚品质，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一、寻求真理救国救民

每一个伟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每一个伟人又都是他自己适应和把握那个时代的要求而努力不已的结果。在人民革命的运动中自然要产生出自己的领袖来，但领袖决不是自封的。作为一代历史伟人的刘少奇，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关切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孜孜不倦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刘少奇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于冲一个世代农民家庭里。他6岁便开始帮助家里干农活，从小养成了热爱劳动，同情劳动人民的美德。8岁进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在私塾老师的耐心诱导下，他初步懂得了做人的基本道理。刘少奇的人生之初，正处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风云突变的年代里。1911年10月，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革命声浪迅速席卷全国，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深入人心，中国黑暗的天空出现了一线光明。少年刘少奇从在长沙新军中当兵的二哥刘云庭那里了解到许多有关辛亥革命的情况，明白了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他无不为之而振奋。

但是，中国人民建立独立、民主、自由国家的热情和愿望却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了。袁世凯盗名欺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重披龙袍，恢复帝制，上演了一出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可耻的复辟丑剧。中国人民没有得到所希望的东西，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并未扫除，中国的积弱仍未振兴，政治不见清明，人民依旧无权，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刘少奇的深思，他开始为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而焦虑，开始思考救国救民的大问题。他在自己的床头刻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

1916年夏，刘少奇从家乡玉潭学校毕业，考入设在长沙的宁乡驻省中学。这时的刘少奇人渐长成，英气勃勃。他崇尚西汉苏武、东汉班超、马援等爱国志士，钦慕南宋岳飞“精忠报国”壮举，萌发了好男儿投笔从戎、以身许国志向。这年秋，刘少奇转而报考原为谭延闿在长沙创办的陆军讲武堂，赫然以头名被录取。讲武堂的学制为一年半，半年补习文化，一年学习军事。但是讲武堂不仅由于校舍不足拖延了开学时间，而且不久即因1917年发生的“护法战争”而解散。刘少奇未能如愿学完军事课程，他的从军救国计划也因此而受挫，但他并没有悲观，也没有失望。

刘少奇失学回家后，整日读书思考，探求救国救民的良策。家里人对他的我行我素，既气恼又不放心，于是想用包办婚姻、强制成亲的封建桎梏来锁住他。但是他们完全想错了，这时的刘少奇哪是轻易动摇的人，他早已下定决心要同封建主义的东西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只要抱定了宗旨，要为大事业去奋斗，年轻人的作为是从不计较别的后果的。刘少奇离家出走了，不辞而别。

1911年初，刘少奇插入长沙私立育才高等中学毕业班学习。嗣后，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大潮吸引，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一爱国运动。北京爆发的学生运动波及长沙后，湖南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情绪激昂，纷纷响应，声援北京学生斗争。在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统一指挥下，刘少奇和长沙各校学生一起参加了罢课游行，开展爱国宣传活动和抵制日货的斗争。为了把热火朝天的学生运动持续下去，各校都提前考试。刘少奇在参加毕业考试后，不等毕业证发到手，就急如星火地北上全国爱国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

中心北京，与京、津等地学生一道，参加了这场已接近尾声、但还没有停息的声势浩大的斗争。刘少奇通过在长沙和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的实践，受到了一次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伟大革命斗争的洗礼，使他进一步看清了帝国主义、北洋政府和盘踞在各地的封建军阀的反动性，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得到新的升华，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五四运动”后，刘少奇滞留北京，他先后报考了北京大学等学校，均被录取。但由于缴不起学费等原因，他都一一放弃了。当时国内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正掀起一股到西方去学科学、学技术、学革命理论的热潮，在这股热潮的影响下，刘少奇又萌动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在此之前，他曾梦想过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因此，他当机立断，拜访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著名发起人李石曾和范静生。李、范热情地接待了这位素不相识的瘦高个子的南方青年。在他们的鼓励和推荐下，刘少奇进了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

育德中学是一所素有进步传统的学校。辛亥革命时，曾是同盟会在河北地区的秘密集会场所。“五四运动”中，师生们大都投入爱国狂澜。校长王国光和机械制图教师刘仙洲都具有比较进步的思想。在这里，《新青年》、《每周评论》、《东方》等进步刊物，陈之书架，传于手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刘少奇就是在这里读到的，并从中初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育德中学的师生们还自办刊物，激扬文字，谈说纵横，慷慨陈义，介绍国内外形势、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等。

在这种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生动环境里，刘少奇前所未有地受到了各种思想的冲激，包括最初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的影响。同师生中一些社会主义派人物的接近，使他的思想不断地向激进的方向演变。虽然他后来由于囊内空涩，以及留法预备班在1920年就停办等原因，未能踏上去法国留学的征程，但他的眼界已大为开阔，具有了放眼世界的企求。任何牢笼再也不能锁住他，一切困难只会更增加他追求真理的动力，他对红色苏俄无限神往。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920年刘少奇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在北京稍作逗留后，即返回湖南，很快与长沙俄罗斯研究会的负责人何叔衡取得联系。当时俄罗斯研究会正按照在上海刚建立的共产党发起组织的号召，组织革命青年到俄国勤工俭学。刘少奇通过何叔衡又认识了船山学校的校长贺民范。贺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望，与陈独秀也有交往。刘少奇便通过这样一些联系，进入陈独秀等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主攻俄文，作赴苏留学准备。

在上海，刘少奇一面攻读俄文，同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并开始到工人中去，给劳动补习班讲课。他发奋学习，努力工作，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和实践的机会。1920年冬，刘少奇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了由民主主义革命者向共产主义战士的初步转变。

1921年春，当祖国江南正是茸飞草长时节，刘少奇作为组长，和任弼时、萧劲光等几位同学悄然离开上海，踏上了前往红色首都莫斯科的漫长路程。当时他们的共同信念就是到俄国去，寻求革命真理，学习革命经验，回来搞中国革命，改变落后黑暗的旧中国。就是在这样的信念驱使下，他们机智勇

敢地闯过了中国军阀政府驻海参崴总领事馆的严格盘查，一路上饱尝艰辛，备受磨难。在从黑河乘火车到莫斯科的近三个月漫长旅途中，火车没有煤，要烧木柴，走走停停。刘少奇和同行的战友们一起冒着严寒，给火车搬运木柴，有时还不得不停下来帮助修铁路，并且还要不断地和白匪的破坏作斗争。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刘少奇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并不时地鼓励大家，坚持到底。

当刘少奇一行抵达莫斯科时，莫斯科河畔已是鲜花初放，绿草如茵，寒冷的冬天已经过去。在莫斯科他们受到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并有幸被邀请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亲耳聆听了革命导师列宁的报告。刘少奇第一次参加这样隆重的世界性大会，真实地体验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一个游荡于欧洲的幽灵”，在怎样地变成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的伟大理想，在怎样地鼓舞着全世界的无产者作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刘少奇和其他中国同志被安排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这里他全面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俄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如饥似渴地研究如何将马列主义的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打翻旧世界，建立新神州。1921年冬，刘少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来为之奋斗的夙愿。

寻求真理的道路虽然十分漫长，且充满艰辛和曲折，但刘少奇的人生谋略就是认准的事一定要坚持完成。他在列宁的故乡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要用这真理之火，去照亮黑暗势力统治下的中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抱定社会主义思想，从黑暗的家庭奋斗出来，到中国这样沉寂的社会里面，干这种改造社会的事业。”

二、齐心奋斗机动灵活

刘少奇对工人运动情有独钟。早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他就专门研究了苏俄工人运动的现状和历史，分析了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特点，深入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重要著作，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临毕业前的一次填表中，在愿意做何种工作的一栏里，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愿意做工人运动的志向。他从苏联回国后，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去，先后成功地参与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充分显示了他领导工人运动的卓越才能和非凡谋略。

1922年9月，刘少奇由中共党的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派去安源，同李立三等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是当时南方最大的产业之一，有职工1.3万余人，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封建势力的几重压迫下，安源路矿工人受尽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过着极其悲惨的贫困生活。这里是中共湘区委员会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9月份，正当安源工人酝酿罢工的时候，刘少奇到达安源。他和李立三一起，认真估计了这次罢工的形势，领导工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充分的酝酿、准备。罢工开始后，军阀政府从赣西镇守使置调来大批军队，宣布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立戒严司令部，企图镇压这次罢工。当时，李立三受到敌人的威胁，不能经常公开出面活动，刘少奇担任工人俱乐部的全权代表，负责前台指挥，以及与各方面的联系、谈判。他把全体罢工工人组织起来，并且组织了工人监察队和侦探队，严密监视军阀部队的动向，维护罢工纪律和社会秩序。他注意利用合法形式，利用军阀和路矿当局的内部矛盾，同时注意保护各界人民的正常生活，广泛争取社会各方面的同情，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这次斗争的主要对象——路矿两局的负责人。他曾只身前往军阀政府的戒严司令部谈判，在敌人扬言要将他就地“正法”的威胁面前，大义凛然，毫不畏惧。由于刘少奇、李立三等人的正确领导，万余罢工工人团结一致进行有组织、有纪律的斗争，迫使路矿当局不得不在罢工的第五天，就和工人俱乐部签订了13条协定，几乎答应了罢工工人的全部要求。在军阀重兵把守的矿区，领导万余工人的罢工，没有一个人伤亡，就迅速取得完全胜利，这在中国初期工运历史上是一个少有的范例。刘少奇在后来总结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经验时指出：“齐心、奋斗、看清环境”是成功的关键。这也可以说是他得以制胜的重要谋略。

如果说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胜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实际中来的初步尝试，那么1925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则是这种尝试的进一步升华。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各界罢工、罢课、罢市，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这次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觉悟。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是与众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者和组织者的卓越领导、英勇奋斗分不开的，而作为“五卅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在运动中全面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认真策划和运用灵活机动的斗争谋略，则对“五卅运动”的最终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1925年5月15日，日商内外棉七厂发生日本人枪杀顾正红惨案，接着

又连续发生了工部局巡捕房逮捕学生和工人的多起事件，上海工人和学生的反帝情绪日益高涨。与此同时，上海各阶级特别是上海资产阶级，正在反对公共租界工部局强行通过的所谓“三提案”。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领导和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

刘少奇是“五卅运动”爆发前夕来到上海的，他刚到就马上参加和领导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他利用一切方法去动员群众，拿被打伤者的血衣及被打死的工人照片，到一些学校去做鼓动工作。单在闸北区，刘少奇就组织了30多个讲演队，他还亲自到北站附近的广场上向集合的学生分配任务。

5月30日，3000多工人、学生在南京路上示威游行，高呼“反对枪杀人！”“反对逮捕工人学生！”“反对工部局‘三提案’”“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使帝国主义者胆颤心惊。英帝国主义者丧心病狂，公然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十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血案”。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决定动员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店员和商人罢市，以各界人民的“三罢”斗争抗议帝国主义的屠杀暴行。刘少奇与李立三一起，积极投入了组织全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的斗争。在刘少奇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6月2日，实现了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同时，学生和商人也罢课罢市了。罢工人数达20多万人。“三罢”斗争的实现，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正如刘少奇后来所说的那样：“此时上海工人无人作工，商店罢市，轮渡不通，车马断绝，交通为之梗阻。此时的上海，真的入于荒凉恐怖之境况。”

6月18日，六国委员和北京段祺瑞政府的代表就“五卅事件”在上海举行的中外谈判，由于英、日帝国主义者的蛮横无理，宣告破裂。这时部分商业资本家眼看运动将旷日持久，罢市损失巨大，滋长了一种妥协情绪，希望早日结束罢市。被买办资产阶级控制的总商会，立即利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妥协态度，擅自决定6月21日开市。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实际经济利益，为了维护反帝统一战线，使反帝爱国运动能长期坚持下去，同意了资产阶级有条件开市。因此，如何教育工人不受影响，继续坚持罢工斗争，就成了将“五卅运动”进行下去的关键。

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立即主持召开了上海总工会代表大会，向工人代表详细阐述了当前运动形势和工人阶级在运动中所负的历史使命，鼓励工会代表“不当因商界开市而灰心”，号召大家严密组织，继续罢工，坚持斗争。由于刘少奇的正确引导，到会的100多位代表统一了思想，并在会后“派员分头向工人演讲，解释罢工的目的，应抱坚决毅力，坚持到底”，所以商界开市后，20多万罢工工人仍继续坚持并进一步扩大了罢工斗争。工人阶级的这种反帝意志和力量，鼓舞了广大中小商人，壮大了他们的胆量，在他们退出“三罢”斗争之后，仍能继续参加反帝统一战线，进行反帝斗争，同时使总商会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使紧急的形势化险为夷，把“五卅”反帝运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到了7、8月间，“五卅运动”又处在一个新的转折关头。7月6日，工部局停止对华商纱厂供电，华商纱厂被迫停产；7月23日，帝国主义指使奉系军阀，封闭了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工业民族资本家和商业民族资本家，在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压迫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诱拉拢下，先后退出了“五卅”反帝统一战线。工人阶级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境地。

上述形势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相应的策略转变，组织有步骤、有秩序的退却，以便巩固运动成果，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及时看清形势，下定组织退却的决心的。甚至“当时上海有一部分共产党员与先进的工人确有这样一种意见，想以武力暴动来挽救此种危机”。刘少奇这时十分冷静，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在闸北香山路工人部机关召开的商议罢工问题的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做了长篇发言。他在精辟地分析了当前运动形势后，举出许多理由说明，党的策略应有一个转变，“不能继续罢工，只好复工”。由于刘少奇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建议，中共中央于8月10日发表了告工人士兵学生的文告，正式提出改变罢工斗争策略，以工人的经济要求和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作为复工的条件。“至于全国的总要求和工商学界所提出的条件，工人当以全力赞助南北政府，使一致的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而奋斗。”刘少奇和李立三立刻根据党中央文告精神，发表总工会宣言，正式提出9条复工条件，并宣布“所有前次工商学界提出之条件，以及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领事裁判权等要求，当力促南北政府共同严重交涉，工人愿为后盾”。

由于刘少奇和上海总工会其他领导人在关键时刻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及时引导工人复工，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组织退却减少了损失，从而较好地保存了“五卅运动”的成果和“五卅运动”中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使五卅运动最终以胜利而告结束。

1926年3月，刘少奇来到广州，代替已经卧病数日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林伟民的职务。他在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期间的一项重大任务，便是立即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及广州和各地的工人运动。

省港大罢工是为支援上海的工人运动，为争取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而举行的反帝大罢工。刘少奇来到广州的时候，如火如荼的省港大罢工正处在重要关键时刻。但是由于当时广州、香港的一些工会领导人对组织统一的工会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同一地区同种工作性质的工人群众，没有能组织在统一的工会里。广州、香港各工会之间存在着组织涣散、派系林立、各自为政、行动不统一等现象。为进一步开展广州、香港的工人运动，夺取省港大罢工的胜利，刘少奇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加强内部团结，有计划、有步骤实现统一香港、广州各工会组织，齐心协力、共同对敌的策略。

刘少奇深入细致地调查和研究了广州、香港两地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出现各工会组织不统一的复杂原因，提出了促进工会联合的具体措施和相应办法。他不仅与各派工会的领导人真诚地亲切谈话，同他们讨论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做工作，说明工会组织大联合的重大意义，帮助他们消除狭隘的甚至封建的门户之见和行帮思想，以及各工会组织之间长期积存的误会和隔阂；而且主持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工人座谈会，互相交流思想，听取各方面的反映，引导工人群众加强团结，共同战斗。在刘少奇的启发、引导、教育和帮助下，广州、香港各行业各系统的工人很快行动起来，重新组织，加紧联合。香港运输业联合会，香港金属业总工会、街市业工人联合会等相继成立。广州的各派手工工会组织也逐步按行业、按系统归于统一。随后，香港和广州工会总领导机关也相继成立。广州、香港各工会组织的联合统一，壮大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力量和声势，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主力军作用。

正是在刘少奇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省港大罢工得以坚持一年零四个月

之久，直到 1926 年 10 月才宣告结束。它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齐心奋斗取得成功的典范。

1926 年冬，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刘少奇又赶到武汉，为全总机关北迁进行准备，同时参加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担任了湖北全省总工会的组织部长。他在武汉期间，领导工人群众进行了许多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斗争。特别是 1927 年 1 月，刘少奇利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有利形势，坚决果断地领导武汉工人收回了汉口英租界，取得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最卓越、伟大的一次胜利，再次证明了他领导和开展工人运动的能力和谋略。

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刘少奇以他非凡的勇气和才智，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写下了不朽篇章。

三、防御为主积蓄力量

白区工作是民主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受党的派遣，大部分时间在白区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为在白区点燃革命的星星火种，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后，开始建立了白区的秘密工作。但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还不能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制定正确的策略，组织必要的进攻和有序退却，以便保存阵地和聚集力量。而且自“八七会议”以来在党内滋长起来的强烈的复仇情绪和“左”倾革命急性病，又继续发展了。党内一些具有“左”倾情绪的干部，对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缺乏正确的估计，不切实际地要求在广大区域组织农民总暴动，特别是强迫城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倾向，加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左”倾指导，使“左”倾错误在中国共产党内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苏区工作遭到损失，党的白区工作几乎丧失殆尽。据统计，当时仅上海一地就有800多名共产党员在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中被捕，3600多名赤色工会会员只剩下700多人，许多会员被捕入狱。

刘少奇对发生这种情况的背景进行了认真分析，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作了高度的概括，认为“中心城市与大的产业中心，是反革命的支撑点，是反革命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反革命在这些地方对于革命的防护最为严密，同时，我党在这些地方的工作基础与组织基础，是十分薄弱的”。他认为“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情况下，应当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争”，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与决斗”。因此，他明确提出党在白区的工作应当以防御为主，同时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聚积力量的斗争谋略。

1931年秋，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他上任后，针对当时工会工作中的“左”的倾向，对国民党工厂法，秘密工会和工会执行民主集中制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在中央职工部会议上讨论工人斗争的形势和策略等问题时，发生了意见分歧。1931年10月初，刘少奇给临时中央写了题为《关于工运意见》的信。他在信中着重分析了当时全国工人的斗争形势，指出，随着全国经济危机的加深，工人阶级的斗争在各地不断爆发，在工人中普遍地酝酿了极端的不满和斗争的要求。但总的来说，低潮的形势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还属于防御的性质。这主要表现在：（1）中外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联合一致向工人阶级进攻的情况仍很严重。（2）工人斗争次数减少、规模缩小，多是反对资本家减少工资、增加工时、取消待遇、解雇工人和反对国民党当局封闭工会的防御性斗争。（3）工人斗争大多数是失败的或无结果的，取得完全胜利的只占少数。（4）革命工会数量大幅度减少，工人组织程度较低。根据以上事实，刘少奇认为，那种认为中国工人斗争“绝不是防卫的，而是反攻的与进攻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但是临时中央否定了刘少奇的意见，并且对他作了一个“总的批评”，批评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刘少奇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个人看法，他再次给临时中央写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表现了共产党人襟怀坦白、忠实积极的高贵品质。

1931年1月，临时中央通过了《中央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奶坚持认定当时中国工人斗争的发展“带着很多进攻的性质”，“带着浓厚的政治性质”，要求组织每一产业同盟罢工，并使“罢工政治化”。这个决议案，实际上对党内关于工人斗争形势问题的争论作了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遵照组织原则表示服从中央的决议，同时仍然保留自己的意见。此后，在他起草的文件或文章中虽然沿用了临时中央决议的一些提法，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继续以防御为主的正确策略思想指导中央职工部的工作，为中国革命的更大发展保存了实力，积蓄了力量。

1936年春，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张闻天的委派，奔赴华北国民党统治区，主持北方局工作。他刚到北方局工作不久，就发生了北平学生抬棺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残酷镇压的事件。

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令，明文规定当局可以解散抗日救亡团体，可以逮捕甚至枪杀爱国分子。接着，又饬令华北军政当局对北平等地爱国学生“勿稍宽贷，以遏乱萌”。之后，军警捕人的消息不断传来。仅北平一地，就有200多名爱国青年被捕入狱。3月9日，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学生郭清，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捕，受到严刑拷打，惨死在狱中。郭清惨死的消息传到北平各学校，广大学生十分悲愤。由于对国民党当局的疯狂镇压的仇恨，学生运动中“左”的急躁情绪有所抬头。

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党团决定在北京大学举行追悼郭清大会。中共北平市委主要负责人对白色恐怖下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同意了这个行动。3月31日追悼大会结束后，悲愤的学生抬着棺材，涌上街头游行。当游行队伍正在行进时，突然遭到大批军警的袭击，40多名学生被捕，100多名学生被打伤。

这次抬棺游行虽然是一次壮烈的行动，爱国学生的表现英勇顽强，但是，这次斗争又是一次失策的行动。它过早暴露了革命的骨干力量，使一些敌人费尽心机拿着黑名单也抓不到的学生干部被捕了，其中有北平市学联和北大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北平市学联的组织力量被大大削弱了，活动也因此受到了限制。

当时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决定抓住这个典型事件，对党员和干部进行一次革命策略和群众工作方法的教育。他在给北平市有关同志的信中指出，正当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来进攻爱国人民的时候，处于防御地位的爱国阵线，应当暂时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鼓动少数先进分子，向敌人做冒险的进攻，结果就会招致敌人更残酷与更野蛮的进攻，使自己陷于更加孤立的地位，使建立统一战线的事业受到损害，这是明显的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为此，刘少奇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以后再不要重复这种错误”。

根据北方局和刘少奇的指示，中共北平市委做了许多善后工作。为了使广大群众成为有组织的力量，平津学联改组为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北平市学联改名为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由上述组织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并鲜明地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标志着全国学生运动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刘少奇以正确的理论和谋略指导白区的革命工作，使中共党的组织隐蔽在广大群众当中，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实力，当时仅华北地区的党员就迅速发展至5000多人，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四、求同存异广交盟友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刘少奇在其革命生涯中对统战工作始终十分重视。在他看来，中国革命势力从小到大的发展是离不开统战工作的。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共同对付强大的敌人，是革命赖以成功的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讲，统战工作是一门“求同”的艺术，就是从寻找共同点，发现共同点到协调矛盾、达成共识的过程。刘少奇善于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运用“求同存异，广交盟友”的统战谋略，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早在 1922 年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运动中，刘少奇就非常重视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他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在大罢工中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使工人的罢工斗争获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当时的安源，帮会很多，其中以洪帮势力最大，其头目大都是矿上的工头，他们在镇上开有赌场、鸦片烟馆和妓院。洪帮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幸福”等口号欺骗工人，在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前，不少工人为寻求保护而加入了洪帮。刘少奇认为，帮会有两面性，有野蛮、愚昧的落后一面，又有讲义气的积极一面，我们可以争取他们，利用他们积极的一面。为此，他多次派人做洪帮头目的工作，争取他们不做破坏罢工的事情，收到了明显成效，保证了安源大罢工的顺利进行。

黄色工会，是指为资产阶级所收买、控制的工会，它的出现，是一个国际性现象。1887 年，法国蒙索明市工人罢工，资本家收买工贼组织了一个假工会，来破坏工人罢工。当时，罢工工人打碎了这个工会会址的玻璃窗，资方改用黄纸糊窗户，从此，由资本家操纵的工会被称为黄色工会。

中国的黄色工会和西欧各国的情况不同。在西欧，黄色工会一般是在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成员基本上是反对革命工会的；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则没有产生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也不存在与西欧一样的工人贵族阶层。中国的黄色工会是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工会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产生的。当时以上海等南方各大城市为中心，相继成立了许多黄色工会。到 1929 年底，全国黄色工会共有 1000 多个，会员号称有 170 多万人。如何对待大量出现的黄色工会，就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然而，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由于缺乏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经验，也由于受“左”的错误的影 响，总是强调赤色工会和黄色工会的对立，不论对有群众的黄色工会还是没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一概笼统地机械地提出“打倒”的口号。针对这种情况，作为临时中央职工部和全国总工会负责人的刘少奇，连续写了一系列文章和报告，严肃指出：大革命失败后，由于敌人的破坏和残酷镇压，以及“左”倾盲动主义危害，白区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力量大大削弱了。“黄色工会在群众中还保存着其固有地位，在工人中表现的作用还有些增加”。他主张把黄色工会的领袖和群众分开，在斗争中既要严厉对待黄色工会领袖的破坏，又要与他们的群众建立统一战线，在黄色工会中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他强调：“如果有人主张革命反对派要退出那些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实际上就是要使我们脱离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让这部分群众去受黄色工会领导的欺骗和愚弄，结果也就维持了黄色工会的存在”。由于刘少奇在对待黄色工会问题上所坚持的正确立场和原

则，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赤色工会能够和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壮大了革命阵营，增强了同国民党资本家斗争的力度。

1936年，刘少奇在主持北方局工作期间，为了全面贯彻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提出的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他一方面努力消除“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给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另一方面则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与地方实力派“并组北方联合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宋哲元是当时华北的头号实力派，任国民党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两项要职，掌握着北平、天津及河北、察哈尔的军政大权。刘少奇领导北方局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认真的研究后，认为宋哲元虽然有向日本侵略者妥协的一面，“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据此，北方局决定争取宋哲元，使之转向抗日的道路。

争取宋哲元的工作，是从改变有关的策略口号开始的。在“一二九”运动中，宋哲元曾动用军警镇压爱国学生，与北平学生处于对立状态。因此，当时学生在游行示威中，总是愤怒地呼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随着宋哲元态度的转变，刘少奇及时地引导学生改换“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口号。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在华北的具体运用和体现。这些口号的变化，使群众的救国活动有了取得进一步合法地位的可能性。

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北平地下党和学联通过多种形式向国民党第29军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北平学联首先组织各校学生代表到南苑29军兵营请愿，并郑重指出：“人民一致拥护二十九军继续以往的抗日精神，抗战到底。”在学生的爱国热情感召下，29军的官兵表示，“我们真愿与爱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和学生们站在一条战线上齐心用力的干一下。”各校学生还积极参加29军在西苑的军事集训，同中下层官兵交朋友，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1936年9月18日，正当各校学生沉痛纪念“九一八事变”5周年的时候，驻丰台的29军的一个连士兵与日军发生冲突。9月20日，宋哲元在日军的压力下，命令29军撤离丰台。这时，学生动员了数万群众，向穿过北平城的29军官兵夹道欢呼，称颂其抗日举动。学生派代表去见宋哲元，宋表示“决不作汉奸”。

在开展群众性公开争取宋哲元工作的同时，刘少奇还指示党的地下组织在29军内部进行秘密联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由于刘少奇巧妙地运用了求同存异、广交盟友的统战谋略，使我党在华北地区开展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当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第29军全体官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界民众联合一致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不甘屈服于外侮的伟大精神。

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刘少奇在其革命生涯中，虽然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向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和理论家著称，但他对军事作战指挥也具有非凡才能。他曾先后担任过红 8 军团党代表、第 3 军团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等军队要职，参与策划和领导过许多重大军事行动。既具有前线作战的实际经验，又具有高层领导的指挥才能。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充分体现出他的敏捷思维和远见卓识。

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刘少奇的领导下，立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率先在华北地区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刘少奇与周恩来一道，对华北地区的斗争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把华北划分为开展游击战争的若干区域，并派出大批干部到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开展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先后组织了几百支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敌人后方频繁袭击搔扰，紧紧拖住日军的后腿，使其南进计划难以立刻实施，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刘少奇在分析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时指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日本是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弱国，日本是一个小国，又是一个强国。这就决定了在战争的战略进攻阶段，广大中国领土的沦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军队驱逐日寇出境也决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办到的；同时也决定了敌人兵力不足和分散，他们无法控制敌后广大的沦陷区。而我们则到处得到人民的帮助，风土习惯、地形都很熟悉，“有广大山地以及敌军不能经常驻扎的广大乡村，作为游击队活动的根据地”。刘少奇的科学分析，说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意义，不是任何人的随意设想，而是这场特定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客观规律的必然反映。

在刘少奇、毛泽东等一批中央领导人的正确指挥下，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华北抗日游击战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它为全国的抗战树立了榜样。

1941 年 1 月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是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已久的反共活动，也是他们在抗日战争期间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中最大的一次反共事件。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使江南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为了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刘少奇、陈毅临危受命，对新四军重新进行了整编，并在江苏盐城召开了重建新四军军部大会，鼓舞官兵士气。

1941 年 7 月，盘踞苏中东台、兴化和淮海边境扈云、淮阴一带的日伪军 2 万多人，出动装甲汽艇 100 余艘，在飞机的掩护下，分四路台击新四军军部及华中局驻地盐城，妄图将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消灭在萌芽之中。这次大扫荡是南京、徐州沦陷后日寇对华中的一次最大的作战行动。面对日伪军的夹击，刘少奇、陈毅指挥部队主动撤出盐城、阜宁县城和东沟、益林等一部分城镇，采取游击战的战术方针，在广大地区和日伪军展开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当时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就在一个四面布满敌军的小村庄里指挥战斗，他们谈笑风生、镇定自若，组织新四军各部队同日伪军进行了大小 130 多次战斗。经过 30 多天的较量，歼敌 2000 多人，粉碎了日伪军夹击扫荡的阴谋，巩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这次作战是刘少奇灵活运用游击战

战术，以少胜多取得成功的一个典型。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是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阶段。大决战初期，中共中央决定将我军的发展方向由“向南”转为“向北”，确立力争东北的指导方针；随后又决定将东北我军从沿长春铁路的大城市转到铁路两侧较深远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两次重大的军事战略转变，决定了人民解放军立足东北、争取全国胜利的局面。而在确立和实施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刘少奇发挥了重要决策者的作用。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朱德总司令立刻命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路抗日武装向日伪军发起进攻，其中包括我东北军和冀热辽武装部队立即向东北进军，以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尽快收复失地，但全军重点仍是向南发展。

这时刘少奇对迅速发展的国内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进军东北、大力争取东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得以在全国站稳脚跟的关键。他指出，东北是战略要地，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面是我们自己的抗日根据地冀热辽地区。这里有山区、有平原，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另外东北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工业发达，是我军理想的战略基地。

1945年8月29日，国共双方开始在重庆举行谈判。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主持中央工作。这期间他对我军抢先进入东北进行了具体决策。他强调我军先进东北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能为我党在重庆谈判创造有利条件；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

经过慎重考虑和毛泽东的同意，刘少奇正式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并于9月9日向全党发出指示电，正式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方针的实施，使我军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地位。我军比国民党军提前3个月进入东北，赢得了发展的大好时机。至1945年底，我东北人民军已发展到30万人，为全面控制热、察两省和争取东北打下了基础。在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过程中，我军又及时将原分散在江南的兵力集中起来，撤至江北，避免了内战爆发后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完全证明了在刘少奇主持下党中央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的及时、正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进入东北后，先后进入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长春铁路沿线的大城市。然而，我军在东北究竟应该在哪里立脚？怎样站住脚跟？怎样争取控制整个东北？这是我军进入东北后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刘少奇认为，为了在东北实现我们的战略意图，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到战略上对我们有利的地方去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945年11月1日，由美国海军帮助运至秦皇岛的国民党军队，以14万之众对我8万人的绝对优势，强攻我东北解放区的大门山海关，16日攻陷。19日，苏军通知我东北局，要求我军退出长春铁路若干里以外，长春路及沿线大城市全部交给国民党政府；凡有苏军的地方，不准我军和国民党军队交战。

随着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东北和苏军对我态度的变化，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新的战略思想。他把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形象生动地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新的战略思想不是要我军去与敌人硬拼，而是要暂时避敌锋芒；不是去

同敌人硬争主要铁路及沿线大城市，而是迅速将部分主力去占领两侧的次要铁路、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不是光靠我们军队与敌人拼，而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先壮大自己；不是马上与敌人决战，而是先在可靠的地方建立好根据地，站住脚，同敌人长期斗争：不是消极避战，而是积极准备；积蓄力量，以备反攻，最后夺取大城市。

在刘少奇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我东北人民军在东、北、西满建立了根据地，同时在南满坚持斗争，对国民党实行南拉北打、南打北拉，不断消耗敌人，壮大自己，这就为转入反攻逐步创造了条件。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长春路沿线大城市，却从山海关伸到松花江，战线拉长，兵力分散，陷入被动挨打的泥潭。同时，国民党的大批精锐部队被牵制在东北战场上，使其在战争全局上也陷入被动，计穷力绌，顾此失彼。连他的美国盟友也不得不承认，这“无异开辟了一条道路，使共军最后得以粉碎政府军队”。

六、面向未来从严治党

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崇高的奋斗目标，没有铁一般的纪律，没有严格的组织原则，那么它就不可能取得事业的成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之一，刘少奇深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他以毕生的精力和智慧，致力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事业，他的党建思想理论，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做出了特殊贡献。刘少奇的党建谋略，就是始终坚持面向未来，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由于经验不足和各种机会主义的不断干扰，造成党内组织分散，个人独断专行，民主集中不够，工作出现了一系列失误。中国共产党内的正确路线代表对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努力纠正党内出现的各种机会主义错误路线。1938年11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经验，针对抗日战争以来王明等人闹分散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危害，他和毛泽东一起提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原则的提出和施行，消除了党内分散主义的干扰，对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严格党内纪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刘少奇密切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实际，对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作了长期的富有成效的研究和探索。1939年他先后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对党性修养的必要性，主要内容和基本途径等问题作了全面、精辟的论述。刘少奇认为，共产党人在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同时，必须加强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他强调，共产党员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先锋战士，“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共产党员要肩负起改造社会和改造世界的重任，就必须在无产阶级和一切群众的长期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进行各方面的修养。这是因为共产党员刚开始参加革命时，还是一个幼稚的革命者，没有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还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敌人，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性。要改变这种情形，就必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学习和修养。否则，“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就预见到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他说，在全国胜利之后，“有些党员受不起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他提出，“党内这种现象的存在，应该引起我们党员严重的警惕”。

1948年，革命胜利前夕，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征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业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否则，

堕落的人会很多，会使革命失败。”全国解放以后，他更具体地着手解决这个问题。1951年3月28日，刘少奇在主持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对党的一般情况、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关于发展党员、关于干部的管理、加强党的机构等问题作了阐述。他亲自起草了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作为对党员的明确要求和教育内容。4月9日，他又作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重要报告，详细阐述和论证了执政党必须提高党员条件、严格入党手续、加强共产主义教育、纯洁党的组织等思想。他还主持制定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为克服执政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不纯，规定了明确的原则和具体的办法。刘少奇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提出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党建思想和理论，对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和革命成功后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起了重大作用。

刘少奇坚持面向未来，从严治党的思想，在他处理女儿刘爱琴的入党问题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刘爱琴是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工作时被吸收入党的，不久她就读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1951年2月，党支部讨论她的转正问题，并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认为：“女儿的思想作风并不那么艰苦朴素，遇事还不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只看到自己的小天地，思想上天真，政治上幼稚。脱离了国内长期革命斗争环境的锻炼，没有经过风雨。学习上不行，思想方面也不行。”他明确地表示，“严格要求”。党支部最后通过决议，不得转正，并取消刘爱琴的预备党员资格。校党委批准了支部的决定，还通报了全校的各个基层支部。

这件事引起了刘爱琴对自己生活道路的深思，由此产生了一个大转弯。于是，她到钢厂、炼油厂去实习，参加劳动。在计委综合局工作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国情。1958年刘爱琴报名支边，到内蒙古巴彦高勒等非常贫困艰苦的地方参加边疆建设。她住的是潮湿的土坯房，吃的是高粱面、糜子面窝头，和人民同甘苦。刘少奇还经常言传身教，要求女儿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刘爱琴艰苦锻炼经受考验整整15年，1965年2月，她工作的机关党支部一致通过，重新接受她入党。

刘少奇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不仅从现实，而且更多的是从长远考虑问题，在他看来，面向未来，从严治党不仅是为了中国共产党能打下江山，更重要的是能坐稳江山。

七、实事求是勇于探索

刘少奇历来重视国家的经济建设问题。新中国刚一成立，他就会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全国人民投入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中去，并取得了初步成效。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刘少奇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借鉴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和可贵探索，提出了许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在指导国家经济建设工作中所运用的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谋略，使他获得了许多成功，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那么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并有所发展呢？刘少奇认为，搞经济建设，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从具体的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实事求是。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一文中，就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即当时的经济状况。他说：“我国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比东北要落后得多。”这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正确判断。

众所周知，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备受“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在中国的长期统治。他们无限制地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欺侮和压迫中国人民，并造成长期的战争和大量的土匪，阻碍中国工业的发展，压制毁坏已经是很低的中国的生产力。这样，就不能不使中国的劳动人民更加陷于穷困和饥寒生活的深渊”。据统计，1949年，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煤产量3200万吨，石油12.2万吨；大约90%的经济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分散落后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当时粮食产量只有2162亿斤，棉花产量889万担，生猪存栏数5800万头。现代工业，又几乎全部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半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造成了广大的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十分落后；幅员辽阔的农村，“小商品经济与半自然经济占着绝对的优势”。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极不发达，可谓国弱民穷、民下聊生。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极端的失衡。所有这些，就是当时中国一幅活生生的经济图画，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蚕食中国的严酷史实。刘少奇认为，如实地认识和正确地判断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乃是我们制订各种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是进行经济建设的出发点。

刘少奇正确分析了建国初期的基本国情，指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特点。即（1）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经济，（2）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这种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长得多。（3）在广大的农村，“拟普遍地组织消费合作社、农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及劳动互助组”。“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4）“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有可能在颇大的范围采用，也很需要。其形式是租让、加工、定货等”。

(5)在经济建设的步骤上，“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已有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巩固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械化”。(6)“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相应地逐渐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避免失业、饥饿和破产的痛苦，并且不需要去侵略其他的民族和国家，更不需要进行战争”。(7)“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采取了逐步赎买政策”。基于以上特点，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引导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大规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铺平了道路。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刘少奇领导经济工作的一贯作风。他不仅主张先调查研究，后决定政策，而且身体力行。面对1958年开始出现的国民经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的事实，他于1961年4、5月间，率领中央调查组到湖南的湘潭、长沙、宁乡等地视察工作和蹲点调查。他在农村住了32天，看到了农民深受“左”倾冒进、急燥浮夸、刮共产风之害，及时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调查报告，明确地提出了要关心农民疾苦，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意见。刘少奇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对国民经济困难的形势和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迫切性有了正确的认识。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有7000多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进行了初步总结，并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作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在具体作法上，既提出了我国从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的10年规划，又提出了1962年在经济建设方面必须做好的几项工作。应该说，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决策是正确的，确定的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方针和措施也是可行的。事实上，由于国民经济发展按照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的方针贯彻执行，1963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1965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国民经济全面好转，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是刘少奇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调查研究，集中全党同志的正确意见和智慧，确定并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和措施，在实际工作中取得的重大成果。

作为国家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刘少奇在工作中并没有墨守成规，按步就班，也没有一味地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而是坚持不断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早在1957年，刘少奇就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计划只能计划那么几类，而社会经济生活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如果只强调计划性，就把灵活多样挤掉，搞得简单、呆板。“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如何做到灵活性和多样性，他提出：一是增加地方与企业的自治权，并允许个人有一定的经济活动自由，也就是在国家计划之外，各个省、市、县、乡以至每个企业、合作社、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订出各自的计划。二是要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在国家市场为主体的情况下，学习利用自由市场灵活、多样的特点，作为国家市场的补

充，这样，可以使社会主义经济在竞争中取得自己的优势。

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在主客观条件都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促地实现的。由于时间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曾留下了一系列后遗症。1957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农村工作时指出：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他对一些地区发生的急于从互助组过渡到合作社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各地农村大办人民公社，全力推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大幅度萎缩，面对农业生产出现的危机，六十年代初农村极少数地区推行了“包产到户”和“责任田”的改革，刘少奇对于这种改革尝试给予了积极支持，并反对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提法。1962年7月，刘少奇明确表示：“我看实行责任制，一户包一块，或者一个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如何使责任制和产量联系起来。”这些见解当时对缓解农村困难局面、恢复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试办托拉斯，按经济管理的原则组织国民经济，是刘少奇在六十年代对我国经济建设体制改革的一次大胆的和比较成功的尝试。建国以后，我国工业采取行政方法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使企业分别隶属于部门和地方管理，形成条块分割、多头领导、闭关封锁的局面。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管理体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用经济组织和组织手段将各个企业有机地、合理地组织起来。刘少奇在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管理的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管理的情况之后，主张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提出按照经济的客观规律，用联合公司（托拉斯）这种经济组织来代替行政组织管理经济。根据刘少奇多次提议，1964年8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报告。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全国试办了烟草、铝业、橡胶、长江航运等12个各种类型的托拉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按专业协作原则实行工业改组，组织托拉斯的方向是正确的，它的优点是产、供、销协调，企业只有一个“婆婆”，办事快，效率高，推诿扯皮现象少，产品质量有保障。尽管当时在部门和地方关系的处理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总的效果是理想的。如当时的中国烟草工业公司，实行产供销统一管理的体制，具体管理生产、基本建设、财务计划、劳动、代销、干部以及上缴税收和企业利润等业务，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据1964年11月的统计，全国烟草厂由104个减为61个，减少41%；职工减少30%，卷烟的生产能力提高了17%，劳动生产率提高35%，卷烟加工费用降低21%，卷烟的质量也有显著提高。

刘少奇在经济建设领域中进行的一系列有益和成功的探索，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经验。

八、相信人民依靠人民

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人民，如果脱离了人民，中国共产党也就下会存在了。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实践中始终坚持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和人民大众同甘共苦，把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和从事革命工作的重要谋略，可以说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是刘少奇得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条件下战胜困难。取得成功的关键。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燃起了抗日烽火。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刘少奇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不失时机地把斗争形式由“七七事变”前的非武装斗争迅速转变为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斗争。他们把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在华北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下，我党领导的华北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几百支游击队在各地组织起来了，八路军很快地扩大到拥有几十万人枪的集团军，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华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蓬勃开展，充分证明了刘少奇一贯坚持的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斗争策略的正确性。

在华北人民抗日战争迅猛发展的同时，华中人民抗日战争却未能很好地组织起来，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华中，右项机会主义者王明；拒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指示，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人民战争，仅仅以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为满足，他们甚至连国民党军队从上海、南京、徐州、武汉溃退时抛下的几十万支枪，也不敢捡起来武装自己，丧失了发展人民革命武装的大好时机。针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刘少奇到华中地区帮助开展工作。刘少奇到华中以后，认真调查研究，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的教训，作了系统总结，并借以教育干部，要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刘少奇亲自参予军事部署，调配干部到各地开展工作，派遣李先念、彭雪枫等到湖北、豫皖苏、大别山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他全面主持华中局工作，并和陈毅同志一起，临危受命，担负起重建新四军军部的重任。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和斗争。改变了新四军的困境，发展了新四军，扩大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刘少奇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指出，华中局新四军军部认真执行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主张抗战的人士，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开辟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展了新四军和地方武装；胜利地进行了反磨擦斗争，加强了团结抗战的力量；坚持了敌后抗战，严重地打击了敌伪。人民看清了新四军真正是自己的子弟兵，纷纷把儿女送来参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支援。我们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取得了胜利。

刘少奇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总是反复教导全党同志，必须信任群众，依靠群众，遇事同群众商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48年10月，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刘少奇在会见华北记者团时讲到，“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像安泰一样被人扼死。共产党也会被人扼死的哩！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安泰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他的力量来自抚育他成长的母亲——“地神”，当他接触地面时力大无穷，而脱离地面时力量就消失了。有一次，敌人利用这个弱点设法把他诱到半空中，

使他脱离了地面，终于把他勒死了。刘少奇引用这样的神话故事，寓意是何等的深刻。

全国解放后，刘少奇在参加制订和执行政策时，总是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无论到哪里，他总是向那里的群众请教，作调查研究。即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也从不轻率做出决定，总是反复推敲，权衡利弊，与群众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1957年，有些地方出现“闹事”。刘少奇得知消息后，立即到各地视察，找省、地、县干部谈，找普通工、农、兵、学和知识分子等各方面的群众谈，在河南新乡，有家国营大工厂，因任务缩减，调了100多名工人到五金生产合作社去做钳子。厂领导工作草率，未征得工人的同意，采取了压服的办法，引起工人闹事，还定为“反革命事件”。刘少奇听取汇报时一言未发，到新乡后，他找了有关于部、群众和闹事代表，仔细询问了事情的原委，认真分析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他认为这不是反革命事件，决定推翻原结论。他找到当地处理这件事的干部，耐心做说服工作，搞通思想，让他们主动去平反；并告诉他们，能勇于改正错误的干部，只会赢得群众更大的信任，将来可以更好地工作。他说：“群众是自己人，应向群众讲真话，不能骗人。共产党人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也应该相信群众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

1961年，国家正处于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为了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特殊化作风、强迫命令风）给农村带来的破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共中央正在拟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做出决策，刘少奇为此深入到湖南农村，就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房屋、山林、社员家庭副业、自留地、商业、集市贸易等问题，找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反复讨论，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他在长沙县天华大队先后召开了11次调查会，和农民交流思想，充分了解他们的疾苦。农村办公共食堂有没有优越性，是他在天华调查时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在调查会上少数干部的看法和社员的想法不一样。刘少奇引导大家畅所欲言，摆事实，算细帐，展开讨论，弄清了真实情况。后来他在一次会上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担水，专人砍柴，专人整米，一个食堂占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事实说明食堂没有优越性。这样的食堂要散。”刘少奇在他的家乡——宁乡县炭子冲大队调查时，大队干部汇报说，上年减产的主要原因是遭了旱灾，然而当他亲自到田间向社员了解情况后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生产上不去主要是大队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没搞好造成的。他语重心长地教育大队基层干部办事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他说：“要规定几条，什么问题必须由社员大会决定，像密植、插双季稻、种棉花、修公路等，这些大事情不能由少数人定。特别是要经过年纪大的人讨论，他们有经验。过去要是经过社员讨论，食堂也下会办，房子也不会拆。要记住，多数社员认为不能办的事，就不要办。”

刘少奇还要求领导干部采用各种办法与人民群众保持经常的联系，听到群众的呼声。他家乡有的群众常写信向他反映情况，有的干部认为这是“告状”，不高兴，找写信人谈话。刘少奇在回家乡调查时对干部讲：“群众给我通信并不是要捣你们公社、大队的乱，我是想帮你们的忙。我这个人也可能犯错误，帮个倒忙，那我再向你们承认错误作检讨。我还想和他们常通信，

要求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请公社、大队不要扣我的信。”刘少奇就是这样把自己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67年初，刘少奇被林彪、江青一伙诬陷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受到残酷打击迫害，他的子女亲属也横遭株连，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仍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的胸怀，亲切地教导子女说：“人民现在认为我没有把他们交给的工作做好，他们生气，对你们也有过人行。你们要千方百计地理解群众决不能有任何对立情绪，要经得住委屈。”“年轻人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你们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只要你们在人民中好好学习，好好劳动，他们会了解你们，爱护你们的。人民最终会信任你们，人民会做你们的父母！”刘少奇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儿子，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即使在晚年受到如此残酷的打击迫害，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崇高信念。

刘少奇虽然含冤离开人世，但他作为一代历史巨人，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任何人也抹刹不掉的。正如他生前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证明，刘少奇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者和胜利者。

邓小平谋略

邓小平，1904年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1920年远涉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底回国，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宣传工作。1927年底至1929年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1930年，在广西领导和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右江、左江根据地。1934~1935年参加了长征，并出席了遵义会议。1938年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师政委，同刘伯承率部以太行山为依托建立抗日根据地。1947年，刘邓率部强渡黄河，挺进中原，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1948年，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和刘伯承、陈毅等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了东南数省。1949年，刘邓率部挺进大西南，直至1951年实现西藏和平解放。邓小平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连任10年之久。“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遭到错误批判，被剥夺了一切职务。1973年，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特别是1975年初全面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后，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短时间内使国家形势明显好转。但在1976年4月又因受诬陷而被剥夺一切职务。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7月邓小平重新恢复了原有的二切职务。同年8月，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在同年12月举行的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邓小平成了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的领导下，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邓小平领导下，我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一、柔中有刚 绵里藏针

1958年，毛泽东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谈及自己接班人时，指出第一个是刘少奇，接着说：“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这既是对邓小平个性的准确揭示，也是对邓小平政治风格的高度概括。

大凡伟人，均有多侧面的性格。如果说，毛泽东是英勇无畏的“虎气”和机敏善变的“猴气”的完美结合，周恩来体现了坚定勇敢的革命斗士的“鹰性”和温和有礼、文质彬彬调和者的“鸽性”的高度统一，那么邓小平的个性则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这种个性在政治上表现为具体行事风格，换言之，就是政治谋略。

邓小平是一个只有一米五多一点的小个子，可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具有十足的阳刚之气。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书中这样描述1977年他会见邓小平时邓给他留下的印象：“他简直如橡皮球一般充沛有劲”，“邓的精力像永远使不完似的。他若走来，一室的空气顿时改观，如遭电击”，“他强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浑身震动。他跟我握手，那股劲儿一直达到我的肩膀”。

其实，邓小平的刚性更多地表现在他的个性和行事风格中。早在二十年代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时，邓小平即以作风泼辣、能言善辩的“小钢炮”著称。

三十年代，邓小平在中共苏区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路线，被说成是江西的“罗明路线”，遭到打击。

五十年代后期，邓小平一次与苏联著名理论家、苏联首席大辩士苏斯洛夫（此人身材高瘦）邂逅，双方争辩起苏联式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优劣。事后，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你们的小个子难倒了我们的大个子。”六十年代，邓小平两次率团到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毛泽东多次称赞邓小平没有屈服于苏修就缘于此。

六十年代，当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邓小平明知犯忌，但依然公开声明：“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期间，邓小平对毛泽东的错误作了一些消极抵抗，以致毛泽东抱怨说，邓小平耳朵不好，但开会总是远离他而坐。1959年后的6年从来未向他汇报过一次工作。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作为第二号大走资派被打倒。

1973年，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他向复出的邓小平建议：“说话和气一点，内部开钢铁公司。”邓小平锋芒不减当年，随即大刀阔斧地开展整顿工作，提出“要敢摸老虎屁股”，很快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状态有了很大的改观。邓小平还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一伙向邓小平发起攻击，邓小平据理反驳，毫不退让，并拂袖而出，退出会议。几天后，邓小平和毛泽东在长沙见面，毛泽东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赞成说：“这个好。”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四人帮”受到严厉批评，气焰有所收敛。但由于毛泽东无法容忍邓小平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又一次下台。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又一次复出。在复出之初，他不管自己处境

微妙，毅然以巨大的勇气，支持了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重新恢复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了道路。在邓小平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战略决策。此后，邓小平以超人的勇气和过人的胆略，打破了旧的条条框框，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邓小平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立场坚定；毫不让步，给人以壁立于们，持重如山的感觉。1982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时，严正地表达了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强硬立场，给“铁女人”撒切尔夫人以强有力的震撼，以致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走下台阶时，一脚踏空，跪倒在地。其后，英国被迫接受了“一国两制”的解决方案。在当时的中苏关系上，邓小平立场强硬，提出苏联必须首先消除“三大障碍”，终于如愿以偿。在中美关系上，邓小平同样持强硬立场。1986年美国向台湾出售大量武器，中国作出强烈反应，迫使美国签订《八·一七公报》，允诺逐渐减少直至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

但是，邓小平的刚性并不是一味刚强僵硬，而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也就是说，邓小平具有刚性的同时，又具备了必要的柔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非常注意方法。邓小平魄力非凡，敢作敢为，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刚勇气概，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突破和作出了许多惊人的决断。但他在具体实施时，又小心谨慎，务实稳健，非常注意方法。这是邓小平柔性的表现之一。邓小平一贯坚决实行改革开放，强调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闯出一条新路。但他同时强调改革开放“步于要稳”，并非一味大胆冒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改革事业先从经济领域入手，再逐渐进入政治领域和其他领域，这样做，既能使人民容易从经济上感受改革的好处，实行起来阻力也小得多。经济体制的改革又先从最迫切需要改革又相对比较容易进行改革的农村开始，在取得明显成效后，再进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复杂而艰难的领域。在改革的具体步骤上，是先局部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次推进，全面展开，而不是一哄而上，齐头并进。在对外开放方面，所采取的步骤也是一样。1979年首先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在取得巨大成就后，又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市，开放沿海经济开发区，进而实行全方位开放。邓小平的这种谨慎稳健的“柔性”对于我国这个12亿人口大国实行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事业，非常有必要。它和邓小平敢作敢为，勇往直前的“刚性”结合起来，使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得以迅速而稳定地进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5年邓小平向世界宣布中国裁军100万的惊人决定。他立场非常坚定，敢作敢为，决不怕因这种大动作而得罪人。他说，“得罪就得罪这一次”，但这一次非要搞好不可。但在具体实施百万大裁军时，邓小平又采取了公正稳妥的办法：一是裁军从解放军总部裁起；二是裁撤大军区从昆明军区做起。正是由于采取这种方法，我国大裁军工作才得以顺利而圆满地完成了。

第二，具有阔大的包容性。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但又能容忍不同的意见，具有阔大的包容性。这也是邓小平柔性的重要表现。邓小平一贯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又允许思想理论研究领域内的不同意见的存在，实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

打棍子”的“三不主义”。邓小平历来坚决实行改革开放，但对党内因对改革开放的具体步骤和做法有不同意见的人，不是采取过激政策，一味压制打击，而是“允许看”，一时想不通，让实践来说话，在实践中统一认识。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制，党内存在不同意见时，邓小平是这样做的；在建立经济特区，出现不同看法时，邓小平也是这样做的。邓小平这种包容不同意见的柔性，给其坚持正确立场的“刚性”增添了强大的适应性和弹性，并能最广泛地团结人。

第三，求同存异找出路。邓小平历来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立场坚定，毫不退让，同时又能从实际出发，提出解决争议问题的新办法。南沙群岛自古以来，无可争议地是中国领土，我国政府一贯坚持拥有南沙群岛的主权。可是，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也声称对其全部或部分拥有主权。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坚持原则，就进了死胡同，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邓小平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提出了“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实行经济开发”的主张，受到有关各方的欢迎，从死胡同里走出了一条新路来。在收回香港问题上，邓小平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同时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从现实出发，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从死胡同里找出了一条路，使英国接受了中方主张，从而顺利地解决了香港问题。

纵观邓小平一生，他把刚性和柔性有机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刚柔相济的谋略大师。在他身上，既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立场、顽强斗志和果断作风，又具有杰出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务实稳健的作风和高度灵活的现实主义精神。

二、解放思想：斩开左倾思想的“戈尔迪之结”

在希腊神话传说中，有一个国王戈尔迪曾用乱结把轭系在马车辕上，牢固难解。万能的宙斯宣称能解开此结者，可以统治整个亚洲。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以过人的胆略和独到的见解，用利剑斩开此结，后其果然建立起地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

如果我们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比作一辆马车的话，那么这辆马车曾被各种左倾思想组成的“戈尔迪之结”严重地束缚着，因而步履维艰，进展甚缓，甚至一度陷于停滞不前乃至崩溃的境地。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以大刀阔斧的作风，高擎实事求是之剑，斩开左倾思想的“戈尔迪之结”，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马车顺利而快速地奔跑起来。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一举粉碎，标志着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人们无不欢欣鼓舞。但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以“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为借口，提出了两个“凡是”理论。他说：“凡是毛泽东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可是两个“凡是”理论又从根本上继承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思想。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马车依然被左倾错误思想的“戈尔迪之结”牢牢束缚着，在两年之内，一直处于徘徊不前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时间，“砍旗”的质问不绝于耳。邓小平深知这是一个触及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思想路线的问题，他也看到了“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还很深。应以此为契机，开展一次广泛的讨论，对广大干部群众重新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因此，邓小平不顾当时自己处境微妙，毅然以巨大的勇气，积极支持并领导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恢复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到了并磨快了实事求是这个解放思想的利剑，基本上斩开了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戈尔迪之结”，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马车前进扫除了主要障碍。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马车终于踏上顺利而快速前进的征途。

此后，邓小平高擎实事求是之剑，不断清除阻碍社会主义建设马车前进的残余的“戈尔迪之结”，实行了改革开放，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是他，斩开了脱离生产力水平、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戈尔迪之结”，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原理，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使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今天，农村经济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我国经济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是他，斩开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戈尔迪之结”，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再是人们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的对象，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乐此不疲的话题。十多年来，我国商品经济取得巨大的发展，也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

是他，斩开了我国过去闭关自守的“戈尔迪之结”，大胆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现在，我国经济特区的建设已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正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着。外商来华投资的“三资企业”遍地开花，发展迅猛，对外贸易增长迅速，现已成为排名世界第十一的贸易大国。

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邓小平高擎实事求是之剑，大刀阔斧地斩开左倾思想的“戈尔迪之结”，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马车就无法顺利而快速地奔跑起来，我们就不可能完全从过去左倾错误思想路线中摆脱出来，开创今天这种改革开放、繁荣兴旺的新局面。对此，我们不能不深深叹服邓小平超人的战略眼光与非凡胆略和敢作敢为的作风。

大凡帅才，都能高瞻远瞩，敢于突破前人或别人的局限，对全局性问题独立作出自己的战略判断和决策。毛泽东当然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帅才，邓小平也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能不为毛泽东的思维所束缚，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提出与毛泽东大相径庭的思想和主张。粉碎“四人帮”后，他进一步突破毛泽东晚年的左倾思想的限制，并以过人的眼光，从我党思想武装库中找到了实事求是之剑，为解开左倾思想的“戈尔迪之结”提供了强大而锐利的思想武器。可以说，正是邓小平有着帅才所具有的超人的战略眼光，使他能认清左倾思想的“戈尔迪之结”的症结所在，并能找到解开它的办法。就一般人而言，也许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意识到左倾思想“戈尔迪之结”的存在，但不可能认识到左倾思想“戈尔迪之结”的根本性错误，更谈不上找到解开它的办法了。

邓小平的非凡胆略和敢作敢为的作风，也是他能够解开左倾思想“戈尔迪之结”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具有非凡的胆略和宏大的气魄，常能想人所不敢想，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敢为。面对错误思想和做法，他从不犹豫退缩，总是大刀阔斧地去加以纠正。他一旦认准目标，就能不顾一切困难和阻力，勇往直前。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毛泽东的威望和影响正处于登峰造极之时，邓小平也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以致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而被打倒。1973年，复出的邓小平，不怕再次被打倒，毅然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以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果再次下台。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又一次复出，更进一步展现了其非凡的胆略和敢作敢为的作风。从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到城市改革的承包经营、股份制、租赁制，从“三资企业”的出现，到经济特区的建立，无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是邓小平的这种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从根本上粉碎了左倾思想的“戈尔迪之结”。同时，邓小平还敢于打破理论“禁区”，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更是彻底地清除了左倾思想的“戈尔迪之结”的影响。

如果说，亚历山大以超人眼光和过人胆略斩开“戈尔迪之结”，得以终于建立起庞大的帝国，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邓小平高擎实事求是之剑，斩开左倾思想“戈尔迪之结”后，我们必将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三、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希腊神话中英雄忒修斯，在阿里阿德涅公主的帮助下，靠着一团红线的指引，从纷繁复杂、迷离莫辨的弥诺斯迷宫中走了出来。

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自其诞生以来，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由于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缺乏足够的经验，加之受到具体历史环境的限制，特别是受到现代迷信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所以，虽然人们搞了许多年的社会主义，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依然存在不少严重的误解和曲解，结果走进了社会主义的“弥诺斯迷宫”。一些国家在这个迷宫中苦苦挣扎，未能走出，以致整个社会主义制度陷于崩溃，如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就是如此。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也深陷于社会主义的“弥诺斯迷宫”之中。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领导下，我国才艰难地走出迷宫，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邓小平之所以能引导中国从社会主义的“弥诺斯迷宫”中走出来，一方面是由于他具有大胆探索，勇于打破旧的条条框框的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有着超人的智慧，紧紧抓住发展生产力这根唯一能走出迷宫的红线。

早在六十年代，邓小平已大体触及了发展生产力这根红线，这具体表现为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

说来有趣，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少饶有趣味的话题。在五十年代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毛泽东曾大发异想，问怎样才能让猫吃下辣椒。刘少奇说，把猫抓住，撬开嘴，再用筷子把辣椒捅下去。周恩来说：先让猫饿上三天，再用肉把辣椒包起来，让猫吃下去。毛泽东认为这些方法都不好，他的办法是把辣椒研成粉末涂在猫的屁股上，猫就会主动用舌头去舔屁股，并为能这样做而兴奋不已。从这件小事中，反映毛、周、刘三人不同的工作作风：刘主要是实行强制，周主张经济诱导，毛则强调运动刺激。

相比较而言，六十年代，邓小平的“猫论”更是广为人知。当时，在一次农村问题工作会议上，大家对农村的生产关系是实行大集体还是包产到户，争议很大。邓小平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的这些言论后来被概括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邓小平的“罪证”之一，被当作“唯生产力论”的代表性言论批判了多年，弄得国人皆知，甚至闻名海外。

当时人们之所以认真批判“白猫黑猫论”，是因为陷入社会主义的“弥诺斯迷宫”而不自知。那时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和标准时，往往只是注重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主义民主等方面，而忽视或忘记了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具备的生产力标准，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与贫困是可以相容的。“四人帮”更是把这种错误推向极端，极力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我们当时在实践上，总是脱

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进行生产关系的过渡，一味追求“一大二公”。1958年“大跃进”中更是刮起了一阵“共产风”，实行“吃饭不要钱，干活不记工”，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已经不是很遥远的事了。有的地方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搞“穷过渡”、“割尾巴”。事实证明，这种严重忽视生产力的做法，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一度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今天看来，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是完全正确的。它用一个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俚语，说明了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只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才是好政策，只有促进生产力发展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说，“白猫黑猫论”是邓小平关于发展生产力理论的最初表述。它表明邓小平已基本触及发展生产力这根红线了。这在当时人们陷于社会主义“弥诺斯迷宫”而不自知，左倾思想笼罩一切的情况下，尤显难得可贵。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邓小平又一次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他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理论。

针对我国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严重忽视生产力的历史教训，邓小平紧紧抓住发展生产力这根红线，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本质。他说：“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搞社会主义，要建设比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时，更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上述基础上，邓小平认为，必须把是否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他同时指出，只有改革才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改革不仅是发展生产力，而且也是解放生产力。

这样，邓小平关于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已形成一根鲜明而具体的红线。可以说，正是靠着这根红线的指引，邓小平才能领导中国从社会主义的纷繁复杂、迷离莫辨的“弥诺斯迷宫”中走出来，成功地探索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正是在发展生产力这根红线指引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合时宜的口号，实现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重大战略转移。

正是在发展生产力这根红线指引下，邓小平才能理直气壮地在全国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因为农村生产力水平落后，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在发展生产力这根红线指引下，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大力提倡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九十年代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胆地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禁区。

正是在发展生产力这根红线指引下，邓小平打破我国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局面，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因为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在发展生产力这根红线的指引下，邓小平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因为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决定我们必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言以蔽之，邓小平正是紧紧抓住发展生产力这根红线，才能把我国从社会主义的“弥诺斯迷宫”中引出来，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面

对今天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的大好形势，我们在赞叹邓小平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的精神同时，也不禁为邓小平紧紧抓住发展生产力这根红线的超人智慧而深感钦佩。

四、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建设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开放，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拓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邓小平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他采取了正确的谋略——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而且是不可动摇的，就是要“过河”——远期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近期目标是实现邓小平提出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三步曲”的总体构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这说明，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宏观指导下进行的，并不是毫无目标的乱闯。那么怎样才能“过河”呢？邓小平的答案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更多地从实际中寻找答案，寻找改革开放的具体办法。

首先是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当前，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一场规模广泛、意义深远、大胆而有风险的第二次革命。这在马克思的“本本”上、列宁的“本本”上、毛泽东的“本本”上，没有现成答案可抄，也没有其他完整经验可循。只有向实践学习，边干边总结，“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必须大胆打破传统理论条条框框的束缚，勇敢地投入改革开放的潮水中，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摸着石头，探明水情，才有可能找到“过河”的办法。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靠的就是这种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的精神，在实践中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走出了一条新路。1978年，安徽凤阳农民在实践中首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伟大的创举，邓小平及时加以肯定，随后几年内“家庭联产承包制”风行全国，为我国农村改革闯出了一条新路。八十年代，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我国经济中一支强大的生力军，这是我国农民在实践中的又一创举。1980年，邓小平决定开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短短几年间，特区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正是这一大胆实践，为我国对外开放事业打开了新局面。邓小平历来一贯鼓励和提倡勇于实践，大胆创新。1992年他在南巡讲话中更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于不出新的事业。”

其次是先试点，后推广，逐次推进。如果说，“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一层意思，是如上所述那样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在实践中闯出一条新路，那么，“摸着石头过河”另一层意思，就是摸着了石头，探明了水情，才能全面过河。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不敢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就无法走出一条新路。但是，中国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多样，如果不经过试点，摸着了石头，探明水情，就盲目过河，在全国推广某项政策，不仅会带来严重后果，而且实施起来也困难重重。因此，邓小平在改革的步骤上采取先试点，后推广，逐次推进的策略。他说：“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次推开。”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正是如此开展的。农村联产承包制，首先在凤阳进行，实践证明其正确后，才向全国各地推广。对外开放，开始局限于四个经济特区，逐步扩展到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最后实行全方位开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最初于1979年在四川省六个企业试点，继而扩展至全国6000个企业，最后才全

面展开。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很英明的。它可以保证改革开放的稳定性，不致出现较大的失误。某项政策可以先在局部地区进行试点，积累经验，然后再向全国推广。同时，也可减少改革开放的阻力。对于某项政策，当其在局部地区试点时，即使有人想不通，阻力也不会太大。当实践证明这种政策正确后，再向其他地区推广，就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必须指出的是，邓小平这种“摸着石头过河”，先试点，再推广，逐次推进的作法并不是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而是建立在科学的整体设计的基础之上。邓小平认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相配套的改革，不仅在农村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在城市也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邓小平认为，改革心须从经济体制改革人手，再逐渐进入政治体制及其他领域。1979年当农村联产承包制刚刚推行不久，邓小平即已在考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并在四川首先进行了试点。这证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大思路是建立在整体而有层次的科学设计基础之上。至于具体改革开放如何进行，则是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

第三是厌恶空谈，不搞争论，既然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一场前无古人的革命，是一场试验，要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对改革开放的具体步骤和做法存在不同意见就在所难免了。如何对待这种现象呢？邓小平的做法是厌恶空谈，不搞争论。空谈也罢，争论也罢，只是徒自浪费时间，不可能“谈”出和“争”出改革开放的具体办法，而且还会造成严重恶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十年中，中国一直在“谁左谁右”之类的争论中折腾，一再“翻烧饼”。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不仅没有解决任何矛盾，而且在人民内部形成严重恶性，影响人民内部团结。正是鉴于这种沉重教训，邓小平主张不搞争论。他说：“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于。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邓小平不搞争论的目的就是争取时间干，“允许试”，鼓励在实践中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从实践中闯出一条新路。

邓小平不搞争论另一层意思则是允许看，不搞强迫。他认为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对于不同意见，他不是采取过激政策，进行批判指责，一味压制打击，而是采取“允许看”，一时想不通，让实践来说话，在实践中统一认识。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制时，对于不同意见，邓小平是这样做的；在建立经济特区时，实行股份制时，对不同意见，邓小平还是这样做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中，由于王安石对于不同意见采取过激政策，一味打击排斥，结果把许多温和渐进的变法人士如苏轼、苏辙兄弟等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致使变法遭到了强大的阻力。相比之下，邓小平的做法，能最广泛地团结人，显然要高明得多。

可以说，正是由于邓小平采取了正确的谋略——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才能在实践中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五、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方面人们对毛泽东犯的错误认识不清，有的人仍未摆脱个人崇拜的影响，不愿接受毛泽东犯有错误的事实，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特别是给刘少奇平反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有的人尤其是历次运动的受害者出于对左倾错误的造成后果的愤恨，偏激地否定毛泽东同志，主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这样，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成了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从1980年到1981年间经过反复讨论，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顺利地解决了这一历史课题。在这过程中，突出地反映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宏大深远的战略眼光。

首先，邓小平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过。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一生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永不磨灭的历史贡献。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邓小平还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建国后所作的贡献，“应当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性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邓小平甚至还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和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泽东当然也犯有错误，特别是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的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此，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同时，邓小平提出“一定要实事求是”，“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要集体负责”。邓小平还分析了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不仅有毛泽东本人的主观原因，最主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那个时候制度就是那样”，“因为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

在全面分析毛泽东的功过后，邓小平指出，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毛泽东的功过相比较，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应当说，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

准确地评价前人的历史功过并非易事。盲目地拜倒在前人的权威之下，固步自封，走不出前人的阴影，固然不足为训，而一味苛求前人，简单轻率地否定前人功绩又岂可称道。唐朝大诗人杜甫有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意思是说，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初唐“四杰”开创一代新风，虽然在他们诗文中尚有六朝浮靡艳丽的遗风，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文学这个历史长河中占有永不磨灭的一席之地。可是，与杜甫同时的一些轻薄文人，对“四杰”的缺陷

总是喋喋不休，批评指责个没完。对这些自不量力、目光狭窄的文人，杜甫毫不留情地断言“尔曹身与名俱裂”，在历史的长河中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

相比之下，邓小平既不是盲目崇拜前人的权威，也不是作简单轻率的全面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这确实是颇具眼光，难能可贵的。

其次，邓小平以宏大的战略目光，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为《决议》确定了“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题。为了突出这一主题，在着手起草《决议》过程中，邓小平同意陈云关于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建议（要知道，《决议》本是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的决议），这样，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全面些，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依据；

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有利于当时在全国形成一个团结稳定的局面。邓小平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翻身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更重要的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未来命运和前途的大事。不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犯历史性的重大错误。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认为，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传家宝，是战无不胜的旗帜。我们不能丢掉这面旗帜，相反，还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丢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今天，回过头看，我们不禁为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深谋远虑感到由衷地钦佩。应当说，当时主张否定毛泽东，不提毛泽东思想的人，主要是历次运动的受害者，特别是部分老干部，他们丝毫没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思。但是，他们偏激而轻率的做法，实际上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开辟道路。其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之所以顽固坚持要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就是因为他们想以此为突破口，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开辟道路。如果不是邓小平深谋远虑，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筑起了一道坚实和稳固的大堤，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现在就不堪设想了。

在国际上，因未能正确评价前领导人而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教训是深刻的。苏共二十大时，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不仅在国内引起严重的思想混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业的发生。九十年代，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们全盘否定以前的领导人，夸大了他们的错误，无形中给自己的党抹了黑，丧失了和人民中间的信誉，结果是共产党下台，社会主义变色。反观我国，不仅度过了“六四风波”这样严峻的难关，而且在九十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雪崩”中保持稳定，“风景这边独好”，这不能不令人深深叹服邓小平

当时“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宏大的战略远见。

六、小窗口 大功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领导中国突破封闭锁国的囹圄，以勃勃生机投入世界经济大潮之中。

邓小平洞察当今世界形势，把握时代脉搏和顺应历史潮流，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实行对外开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闭关自守只能更加落后于世界，落后于时代，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那么，怎样实现中国的对外开放呢？邓小平以惊人的勇气和过人的胆略，从创办经济特区这个窗口开始，打通了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通道，进而形成了中国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

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同意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关于发展广东、福建两省优势，兴办特区的建议，提出了创办经济特区问题。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经过一番实际调查和研究后，于1980年5月发出文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地区试办经济特区。

社会主义国家创办经济特区是一个大胆的创举，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邓小平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怕冒风险，毅然作出如此重大的决策，这在我国刚刚从左倾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的1979年，尤显难能可贵。邓小平认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老祖宗没有给我们现成的答案，前人没有实践过，我们自己也没有经验，因此必须进行大胆试验。在邓小平看来，我国地域广大，各地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区自然条件优越，但由于缺乏资金，且受到许多无形羁绊束缚，其天然优势无法发挥。创办经济特区，在特区内采取灵活的经济政策就是要进行这样一次试验，即给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其天然优势，通过对外开放的途径，在经济发展中先行一步，然后再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事实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短短几年间，特区经济突飞猛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深圳表现得更为突出。它由一个几年前荒凉的渔村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交通发达、市场繁荣的现代化大城市。可是，这期间，有人认为，搞经济特区是搞资本主义，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一时间，特区的上空笼罩一层浓厚的阴云，特区建设面临严峻的考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1984年初来到深圳等地视察，充分肯定了特区的建设道路。他为深圳经济特区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犹如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将特区上空的阴云驱散了。从此，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深圳等特区建设成功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拓宽对外联系的通道。1984年国家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开辟为经济开发区。1990年4月，政府宣布开发和开放浦东。1992年初，国家决定进一步开放芜湖、九江等5个长江沿岸中心城市，东北、西北13个边境市县，6月宣布开放广西、云南边境市县，8月宣布开放11个内地省会城市。至此，我国形成了由南到北，由东向西，由沿海沿边到内地的全方位开放的格局。

回顾我国对外开放的历程，可以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当年打开对外的窗

口——创办经济特区，我们就无法想象出今天这种全方位开放的大好形势。

不要小瞧了经济特区，它虽只是一个小小的窗口，却有着大大的功能。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高度地概括了特区的功能。具体地说来，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特区具有对外引进和对内示范辐射两方面的功能。

对外引进功能表现在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科学知识以及资金等方面。

我们的时代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力量，而这恰恰是我们的不足之处。长期以来，我国的企业中生产设备非常陈旧，技术落后，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打不开销路。通过经济特区这个窗口，我们可以更好地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现代化的大生产，不仅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管理方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这对我们建设现代化非常有帮助。我们通过特区这个窗口，可以更好地吸引外资投资，举办合资企业，或开设独资企业，从中学到先进的管理方法。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知识发展更新越来越快，知识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我们通过特区这个窗口，可以及时把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动态、文化教育动态和经济生产信息。此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建设资金十分缺乏。通过经济特区这个窗口，可以更好地吸引外国资金进入中国市场，缓解我们建设资金不足的困难。

正是由于具有上述引进功能，经济特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引进了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和科学知识，吸收了巨额的外来资本，并与世界经济联成一体。因此，特区经济得以突飞猛进，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着。

对内示范辐射功能表现在探索对外开放的途径、带动和影响周围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上。

作为对外开放窗口的经济特区，自从创办以来，就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国家的前进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它作为改革和开放的试验场所，先行一步，探索一条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道路，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同时，经济特区对周围地区具有一种强大的辐射功能，能带动和影响周围地区迅速发展。目前我国东南沿一带经济蓬勃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经济特区的强大辐射效应所致。这方面尤以广东表现最为明显。拥有三个经济特区的广东省，十几年来，经济发展一直在全国保持最强劲的增长势头。照此发展下去，有望在 20 年内赶上和超过亚洲“四小龙”。

邓小平非常重视开发浦东，1992 年他视察上海时表示：“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显然，邓小平之所以重视开发浦东，主要原因在于他从开发浦东的辐射效应出发。认为浦东开发必将影响和推动上海经济进而至于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和腾飞。

可以说，经济特区对外引进功能和对内示范辐射功能，在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经济特区的

巨大功能必将进一步发挥，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七、百万大裁军

邓小平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而且也十分精通军事。他在新中国的创立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军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叶剑英元帅誉为“元帅领班”的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他作为中国四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世界形势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科学判断，确立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我军建设总任务，实现了我军建设思想的战略性转移，并为此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其中一个重大举措就是裁军一百万。

1985年6月14日，出席军委扩大会议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裁军一百万。

为什么要裁军一百万呢？首先，这是由于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了全新的估计。他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样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是一个全新的判断，它突破了我们过去一直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结论。基于这种对世界战争发生可能性的分析，邓小平提出裁军100万，“它表明拥有10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其次，这是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需要。我国的中心任务，是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邓小平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还要在这个大局下行动。裁军100万，可以减少军费，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

再次，这也是我军自身建设的需要。经过十年动乱后，我军竟然发展得“臃肿不堪”，极大地削弱了战斗力。邓小平认为，要提高部队战斗力，非“消肿”不行，要下决心大力“消肿”，精简整编军队。裁军百万正是为此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此外，裁军百万，可把省下的钱用于更新装备，提高我军装备现代化水平，以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战争需要。

裁军一百万，这是一个惊人的大动作！历史上，不少国家（包括中国）军队在急剧变动大量整编的过程中，往往发生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我国宣布裁军百万后，不少外国军事专家对我国能否顺利实施感到关注，甚至表示怀疑。

然而，我国的大裁军进行非常顺利。这主要是邓小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态度十分坚决。他强调这次精简整编是一场革命，明确表示：“不管怎样，对这场革命要坚定不移。下了决心，就要顽强，不动摇，出点乱子不要紧，吓不住我们”，“得罪就得罪这一次”，非把这一次搞好不可。正是因为不怕出乱子，反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乱子。另一方面，邓小平又采取了十分明智稳妥的做法。其一，裁军从总司令部裁起。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的原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机关人员精简一半。中央机关大刀阔斧地“消肿”，为全军作出了表率，全军官兵无不心悦诚服。其二，合并大军区先从昆明军区做起。这次大裁军包括整缩编制，原先的十一大军区精简合并为七大军区。精简合并从哪里开始呢？海外华人杨鹏翔所

著《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一书这样描述道：

在军事指挥艺术上，指挥员对自己熟悉的部队情况是了如指掌的，军队与地方的协作也是融洽的，因此，在大整编之前，许多人都以为昆明军区司令部不会撤销。更何况，昆明军区司令部与以前的二野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而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是早先二野的政委。

然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公布，是撤销昆明军区，机关人员及部队，与成都军区合并。这个决定引起全军的很大震动和深思。这个决定更引起全世界军事专家的好评。

因为邓小平是胸襟广阔的人物，是世界有名的军事政治家，他想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完全没有想到私人利益和历史渊源。百万大裁军是个历史事件，正因为昆明军区过去是二野的辖区，动大手术就从自己的子弟兵、旧僚属做起，以示大公无私，无私才能无畏，才能获得全国的拥戴和全军的景从。这个行动，在世界军事史上是个创举。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的军队曾经实行过“整编”。但是，蒋介石先生私心太重，被整编的是非嫡系部队，而属于他自己的嫡系部队不仅不裁员，而且增员。这样，就闹出大乱子。被裁者心中不服，将军们到南京中山陵去哭陵，军官们去各地进行骚扰，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这是导致蒋家王朝崩溃的因素之一。

看来，仅凭我国百万大裁军能够顺利实施这一点，就令全世界军界对邓小平钦佩不已。

我国百万大裁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百万大裁军的实施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政府维持世界和平的诚意，赢得了世界舆论的好评。当时的联邦德国《波恩评论报》说：“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巴基斯坦《黎明报》评论道，中国裁军 100 万的决定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百万大裁军对我军更是影响巨大而且深远。经过几年努力，精简后，我军总兵力约 330 万人，这种规模适应当前的国际形势，也符合我国国力的水平。

通过百万大裁军，我军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在兵种构成了上实现了我军建设上的一个历史性转变。陆军以步兵为主的时代已告结束，特种兵数量已超过步兵，其中炮兵已升为陆军第一大兵种；装甲兵已由一个支援兵种变成一个主要突击力量；还出现了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兵和气象兵等新型兵种。海军增加了核潜艇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空军已成为以航空兵为主体，包括高射炮兵、地空导弹兵、空降兵、雷达兵和通信兵等在内的合成军种。我军兵种构成的重大变化，使部队的火力、防护力、突击力、机动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都有了较大的提高，表明我军在实现机械化、装甲化和高度合成化方面正在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尝试。

同时，我军体制改革有了重大突破。陆军军整编成合成集团军，提高了整体威力，增强了独立作战的能力；大军区合并后，缩小了总部的指挥幅度，同时增大了有关军区的战略纵深，提高了战区的战争潜力；实行士官制度和文职官员制度，为调整官兵比例、稳定技术骨干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述重要变化表明，百万大裁军后，我军数量大为减少，非但没有削弱我军实力，反而使之有了很大的提高。对此，1986 年，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生存》杂志，发表文章评论，认为自 1978 年以来，人民解放

军所取得进展超过新中国成立后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9月，比利时《北约十六国》杂志发表军事评论文章，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精简整编后，已变成一支可信赖的威慑力量。

八、新奇的构想：一国两制

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实现了全中国的统一。但由于历史原因，在祖国的东南角上，香港和澳门分别由英国和葡萄牙统治，台湾仍由从大陆败退的国民党势力控制着。金瓯不全，国人难安！人们在企盼统一，人们在谋求统一的方法，探索祖国统一的途径。邓小平，是这千万个探索者中的最杰出的代表。他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从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个新奇的构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简称“一国两制”。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了他关于“一国两制”的言论。他说，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案解决。次年6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明确表示“一国两制”也适用于台湾，并指出对台湾条件会更宽，允许台湾保留有自己的军队。此后，邓小平还多次对“一国两制”作了进一步论述。

“一国两制”具体地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大陆十多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它是实现祖国统一的现实可能的最佳设计。一方面，“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满足了全国人民统一祖国的共同心愿。另一方面，“两制”则是尊重在30多年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现实，分别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因而能为全国人民所接受。

“一国两制”在世界上尚无先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从未论述过。它是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为我国和平统一大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并有力地推动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

198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是“一国两制”设想在实践中首获成功。中英联合声明完全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国两制”的第一个产物。根据联合声明，我国于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时，保持香港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并非一帆风顺，它是邓小平以坚定的立场和灵活的态度与英国政府进行严正交涉，迫使英国完全接受了“一国两制”构想的结果。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即酝酿收回香港，英国对此很不情愿，总想在主权问题上再纠缠一番。在主权问题上，邓小平表现出他一贯坚定的立场，声称“主权问题不容讨论”，中国政府不作“李鸿章第二”。1982年9月，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与邓小平会晤讨论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作风强硬，素有“铁女人”之称，历来顽强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当时，她领导英国在与阿根廷就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夺战中大获全胜。此次访华，欲借马岛之战的余威，再展“铁女人”风采。出发前，她声明：“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和《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依然有效。”

然而，“铁女人”遇到了强劲的对手——邓小平。在会谈中，邓小平先郑重宣布：“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的。”接着坦陈了中国政府的立场。第一，主权问题不容讨论，香港本来是我们的地方，但从现实出

发，“香港问题”可以谈，而主权不能讨论。第二，希望一二年内解决香港问题，否则到时间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这样，邓小平不仅表达了主权问题不容讨论的坚定立场，而且为中英就香港问题的谈判规定了期限。

当时西方记者对于这次会晤作了这样有趣的评述：

众所周知，邓小平在法国接受科学的思维方法，并研究资本主义。他参加已闻名于世界的北伐革命。后辅佐著名军事家刘伯承率领千军万马，屡建战功。而且担任过拥有 1100 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22 年枪林弹雨的洗礼，25 年党务国务的锻炼，在十年动乱中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七年赋闲，两上三下，久经风霜。

更何况，他脚踏着 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身后有 10 亿人民。他否定的是以武力强加给软弱无力的清王朝，而且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的不平等条约。他当然坚定不移。

人们注意到，当撒切尔夫人结束同邓小平会晤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时钟的指针比原定时间多转了 50 分钟。

而且，一向重仪表，举手投足皆有分寸的撒切尔夫人在大会堂门口下来的台阶上一脚踏空，跪倒在地，幸有香港总督尤德和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急忙上前将她扶起。——看来，她有点紧张。她没有料到中国态度那么坚定，在主权问题上连一点调和的余地也没有。而且限定了时间，她没有这种准备，尽管表面上态度强硬，多方辩解，但大英帝国的威风在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义代表面前已经没有作用了，回去如何向议会交待？撒切尔显然心神不宁，因紧张而摔倒了。这件事立刻被反映到一系列国外报纸的报道上。

看来，在此次会谈的较量中，邓小平占了上风，“铁女人”撒切尔夫人败下阵来。邓小平以坚定的立场，给撒切尔夫人以强烈的震撼，有力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

邓小平在坚持国家主权不容谈判的同时，又采取灵活的态度，努力使中英双方从死胡同里找出一条路来。在此后的谈判中，起初英方坚持以三个条约为依据，后来立场有了松动，提出不反对中国以自己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入谈判，于是邓小平提出“让英国人下台阶”，即谈判可以不从主权开始，先谈“九七”以后怎么办。邓小平所设计的这种“谈判可以不从主权开始”的灵活性程序。实际上暗含了“主权问题不可谈”，但又给英国人下了台阶。这就找到了一条出路，使谈判转向英方和中方就主权的交接方式。1997 年后的安排、过渡时期的安排等议程，并逐一达成协议。

正是由于邓小平采取坚定的立场和灵活的态度，中英双方经过激烈紧张的谈判，终于在 1984 年 9 月 22 日即邓小平规定的最后期限前四天，草签了联合声明。

随着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澳门问题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经过谈判协商，中葡两国于 1987 年 3 月 26 日达成协议，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这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现在，按照“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已是人心所向，和平统一台湾也将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尽管台湾问题解决远比香港、澳门问题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也许还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但我们相信，只要台湾方面明智、现实，海峡两岸同胞是不难在“一国两制”的构想上，实现中华民

族的统一大业的。

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邓小平是深通辩证法的谋略大师。早在抗战时期，他和刘伯承一起战斗在太行山地区时，就向部队讲了“照辩证法办事”的名言。为此，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根据辩证法抓主要矛盾的“重点论”，推动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重大战略决策。此后，邓小平多次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指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同时，他要求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

但邓小平深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干。因为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周围，还有许多与此相联系的工程，忽视了哪一项都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实现。因此，邓小平根据辩证法的“两点论”，多次提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谋略。

两点论、两手抓是辩证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通俗表达。其实质就是要求人们全面地观察、全面地分析和全面地处理问题，不能搞片面性、绝对化，不能顾此失彼，搞单打一。然而，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决不是没有重点的。“平分兵力，四面出击”，而是在“重点论”基础上，全面地分析和处理问题。

邓小平先后多次提出过“两手抓”，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作过不同的解释和要求。分析起来，有以下紧密相联的三层涵义和内容：

第一，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这是“两手抓”最广泛的涵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还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为精神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因此，必须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在粉碎“四人帮”以前，我们曾经犯有夸大精神因素作用的错误，“精神可以代替物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阶级斗争抓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上去”等精神万能论曾在我国产生不良影响。但此后，社会上又有些人陷入精神无用论，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也造成了不良后果。邓小平在乎息“六四风波”后说：“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政治思想教育，指的就是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有鉴于此，邓小平认为有必要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他在南巡讲话中在明确指出：“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超过他们。”

第二，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是第一层涵义的具体化。改革开放就是建设物质文明，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是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处在这个时期的国家或地区，由于旧的道德、制度等社会约束机制的调控作用减弱，因而社会中出现某些“失范”现象，腐败、犯罪、不道德行为大量增

加，甚至十分猖獗。我国当然也不例外。针对这种情况，1982年邓小平在广东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其后，他又严肃地告诫全党：“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这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989年邓小平又指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第三，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这是对第二层涵义的进一步展开。面对当今社会严重的腐败现象、猖獗的犯罪活动，可以有两种不同途径加以解决：一是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方式，一是通过法制建设的方式。中国有过长期靠政治运动解决问题，搞“群众运动”的历史，法制观念淡薄。因此，在改革开放中遇见不良社会现象时，不少人就想到群众运动，认为搞群众运动能够对腐败犯罪来一次扫荡，对犯罪分子具有震慑力，搞起来过瘾。但邓小平认为，搞群众运动，容易引起社会大的震荡，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且运动风一过，腐败犯罪又会卷土重来。所以，他在1986年就强调：“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1992年，面对社会上日益高涨的要求搞群众运动以扫荡腐败犯罪的声浪，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坚定地表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总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谋略大师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辩证法的具体应用和新的的发展，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十多年来，我们抓经济建设这一手比较硬，抓得比较紧，经济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抓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政治思想教育）、打击犯罪和惩治腐败这一手比较软，抓得时紧时松，因而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今天，我们要学习和掌握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坚决避免一手软一手硬，一手强一手弱，一手紧一手松的现象，全面抓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十、抓住时机力争经济上台阶

九十年代，邓小平以敏锐的机遇意识和大胆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抓住时机，力争经济上台阶的新思想。

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说过，每一个人，往往会有这种情况：他很走运，但幸福就打他身边溜过，成功者和失败者的不同点，就在于前者能够及时抓住从他身边飞过的命运女神的衣襟，而后者则必定忽略和错过这种时机。

确实如此，能否有敏锐的机遇意识，能否抓住有利时机，是决定一个人、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别的且不说，仅从近代以来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情况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十九世纪晚期以前，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初到东方，尚未能对东方形成全面控制。这给亚洲国家提供了一个借鉴西方先进制度，迎头赶上的有机时机。日本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实行“明治维新”，全力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和科学技术，很快就摆脱了殖民地的地位，一跃而为当时世界五强之一。与之相反，中国则丧失这种有利时机。当时，中国的清政府顽固保守，未能实施全面而彻底的变革，就连半心半意、不彻底的洋务运动也进行得步履维艰，困难重重，结果是中国沦陷于半殖民地的深渊。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经济正在从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和发展起来，这对亚洲国家又是一个有利的发展时机。日本抓住了这个时机，迅速从二次大战的战争废墟上崛起，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亚洲的新加坡、南朝鲜、香港、台湾也抓住了这个时机，经济发展发生了质的飞跃，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与此同时，我国则错过了这个有利时机。应当说，1957年以前，我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是相当迅速的，当时的经济状况远远好于新加坡、南朝鲜、台湾、香港。但是，令人痛心的是，由于此，后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先是搞劳民伤财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大灾难，继而进行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陷于十年内乱之中，经济非但没有发展，甚至一度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样一来，我国经济发展又大大落后了。

上述历史明白地告诉我们，抓住了有利时机，国家就能迅速发展，丧失了时机，国家就会落后。

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现在我们正面临世界发生大转折的时期，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将由大西洋地区转向太平洋地区，人们普遍认为未来二十一世纪将成为太平洋世纪。这对亚洲国家来说，又是一次有利时机。目前，除了亚洲的“四小龙”在继续发展，泰国、印尼等“五小虎”也在迅速崛起。中国应当怎么办呢？邓小平认为，我们如不抓住有利时机使经济上一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后了。邓小平以敏锐而急迫的心情说，“机会难得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是的，我们已经丧失了几次有利时机，现在再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了。我们必须抓住有利时机，乘着太平洋时代之风，走向二十一世纪。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呢？邓小平提出要力争经济上台阶。“上台阶”是对经济高速发展的一种形象表述。邓小平认为，强调经济稳定发展是对的，但强调的过分就会丧失时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

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但稳定协调也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他严肃指出，如果我们不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就会“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邓小平的“上台阶”的思想首先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后提出的。我们改革开放真正干起来的是1980年。1981~1983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1988年。这五年，农作物大幅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可以说，这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从1989年开始进行治理整顿，对“过热”的经济进行降温，解决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正是根据这种经验，邓小平指出三“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

其次，邓小平的“台阶论”也是借鉴国际经验而形成的，一些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度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比如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在整个六十年代，除1962年增长率为7%外，都在两位数以上，其中1965年高达17%。而南朝鲜存在1968~1970年、1976~1978年、1986~1988年三个高速发展阶段。新加坡、香港、台湾的情况与此基本相似。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高速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经济很快就跳上去了。所以，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办到的。”

邓小平的“台阶论”是一个大胆的理论创新。它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波浪式前进的规律。以往人们讳言社会主义经济的“波动性”，一谈便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挂上钩，因而往往幻想直线上升式的增长。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规律是波浪式前进，其具体模式可概括为“高速增长——稳定协调——高速增长”。因为，我国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与世界市场相联系，而经济发展波动性是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

必须指出的是，邓小平的“上台阶”和毛泽东的“大跃进”，都反对“像小脚女人”一样缓慢地发展，而主张高速发展，但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毛泽东的“大跃进”是在对外封闭的经济框架中，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单凭主观愿望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结束使整个国民经济陷于灾难性的停滞。邓小平的“台阶论”则在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根据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规律而提出的，符合经济发展现实，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抓住有利时机，乘着太平洋时代之风，不断争取经济上台阶，那么，在未来的二十一世纪即太平洋世纪，中国必将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届时，中国这条东方巨龙，必将活跃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历史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安瓦尔·萨达特谋略

安瓦尔·萨达特（1918~1981），生于尼罗河下游一贫寒的军人家庭。1936~1938年在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入伍。因参加反英活动，两次被捕，直至1948年才获释。1950年加入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并参加了1952年七月革命，任革命指导委员会委员。1953~1970年，曾任《共和报》主编、国务部长、副议长、议长、副总统等要职。1970年10月继任埃及总统。1973年发动十月战争。1974年起，对外加强埃美关系，对内实行经济自由化和门户开放政策。1974年和1975年两次与以色列达成军队脱离接触协议。1977年出奇不意地出访耶路撒冷。1978年9月与贝京、卡特举行戴维营三方首脑会晤，次年3月签订《埃以和约》，埃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81年10月6日，在阅兵式上遇刺身亡。著有《革命历史》、《尼罗河上的起义》及回忆录等书。

一、出奇制胜

用兵贵在奇，这是兵法的基本谋略之一。奇，关键就是要敢于突破常规，做众人以为不可做之事。只有奇，才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古今中外，这一谋略已广泛用于军事领域。仅就二战时期来说，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主攻阿登山区，盟军诺曼底登陆，日本突袭珍珠港等都成为出奇制胜的范例。而将此作为政治谋略运用者，也绝不乏人。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萨达特也将此招发挥得淋漓尽致。

1977年11月9日，萨达特在埃及人民议会发表讲话时，突然向议员们宣布，他将于近期访问耶路撒冷。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是出自萨达特之口，因为人们都知道，经过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和1967年六·五战争，圣城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占领，阿以誓不两立，一直处于战争状态。阿拉伯国家早有协约，不承认以色列，不和以色列直接谈判，更不要说和以色列单独谈判。因此，萨达特的决定令世界舆论大为震惊。阿拉伯国家反应强烈，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表示强烈反对，叙利亚、巴解组织尤为激烈。叙利亚社会复兴党、巴勒斯坦闪电游击队甚至想惩罚萨达特。埃及国内也激起滔天大波，萨达特的心腹、副总统兼外交部长法赫米递上了辞呈，他新任命的部长里亚德也拒不到任。一时间，萨达特陷入一片抗议声中。

但是，萨达特并没有退却，毅然接受以色列总理贝京的邀请，最终踏上了飞往耶路撒冷的旅途。出人意外，萨达特并没有成为反对派的牺牲品，他获得了惊人的成功。耶路撒冷万人空巷，迎接萨达特的来访，美、埃、以三国舆论对此高度赞扬。

萨达特耶路撒冷之行的成功，首要的是萨达特谋略过人。他充分运用了出奇制胜的这一兵法谋略。在绝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还坚持以战争作为解决阿以争端的唯一途径的时候，萨达特已清醒地认识到阿拉伯人已无法在军事上打败以色列。作为埃及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萨达特直接参与了历次阿以战争，他还亲手导演了1973年十月战争。这些战争给萨达特留下了深刻印象。每次战争，阿拉伯人都企图消灭以色列，夺回失去的阿拉伯领土，却屡受挫折，不仅未能收复失地，却接连丢失大片土地。从1948年到1967年，阿拉伯国家全部丢失了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划给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而且西奈半岛、戈兰高地也被以色列占领。面对战争给阿拉伯人带来的耻辱，面对战争对阿拉伯领头羊埃及带来的巨大损失，萨达特认为，必须寻求战争之外解决阿以冲突的途径。他说：“如果阿拉伯一致的话，那意味着问题将无法解决，也就意味着埃及永远不能收复领土。”萨达特决心突破现状，摆脱阿拉伯国家的束缚，到敌人的老窝去谈和平。

萨达特认为，以色列不能够拒绝和平。历次阿以战争，同样给以色列带来严重损失。军费支出一直居高不下，国内经济恶化，大批的人员伤亡，对这个人口仅有口百万的小国是件揪心的事。以色列也逐步认识到，它无法以武力使阿拉伯人驯服。特别是十月战争初期的一幕，使以色列绝对不敢对阿拉伯人再掉以轻心。萨达特清楚地看到以色列所处的环境。他认为以色列同样需要和平。如果他采取主动行动，将把以色列置于被动地位。他说：“我们不会放弃阿拉伯人民的权力。我们这样做可以在全世界面前置以色列于困境，他们决不能回避和平。”

萨达特认为他的主动和平行动能为埃及争取到主动权。萨达特不仅认识到埃及迫切需要和平，而且也认识到埃及必须争得主动权。经过美国的斡旋，埃及与以色列达成两次军事脱离接触协定，但埃及摆脱战争，实现和平的愿望迟迟不能实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自恃有美国的支持而态度异常强硬。1977年，美苏倡议举行日内瓦中东和会，却因以色列节外生枝、叙利亚出尔反尔，一直处于僵持状态。萨达特对此感到失望，他认为自己必须采取主动行动，以掌握主动权。他说：“美国人和苏联人都不相信阿拉伯人会迈出第一步，我们一定要改变他们的这种偏见。”他感慨地说，“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谋求第三者出面调停我们之间的争端，其结果怎么样？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我们当事者才有切肤之痛！”由此，萨达特产生了与以色列领导人直接会谈的计划。他对法赫米说：“我以为或许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动摇眼前的局面，我准备直入虎穴，到耶路撒冷去面对以色列人宣布和平条件。”他对民族委员会的委员说：“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直接对话解决埃以间的问题呢？我已经准备同他们在任何地点会谈，哪怕去耶路撒冷！”

在萨达特看来，他的大胆行动会有助于加强埃美关系。七十年代，萨达特在对外政策方面作了重大调整，逐步摆脱了苏联的控制，转而依靠美国。特别是1974年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以后，埃美关系迅速改善，埃及成为美国中东战略中的重要一环，美国为埃及提供了大量贷款。鉴于美国长期坚定地支持以色列，能够对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影响，萨达特认为美国在解决中东问题中有尤为重要的作用。他曾说：“我认为解决中东问题的牌99%掌握在华盛顿手中。”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提出了“全面解决方案”，竭力促使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对话，特别是把埃及和解看作是打破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的突破口。萨达特认为，埃及迫切需要美国在经济、军事上的支持，也需要美国对以色列保持压力，他能够依赖美国促使以色列回到谈判桌上来。因此，他接受了卡特政府让他和贝京直接对话的建议。当然，萨达特的主动行动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美国的高度肯定，埃美在经济、军事、外交领域合作大大增强。

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突破了近30年以来阿以相互隔绝的局面，成为国际外交舞台上一篇绝妙佳作。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奇，他突破了阿拉伯领导人的传统做法。此外，萨达特之所以取得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还在于他使这次行动奇上加奇。一是他宣布这一决定的时机。该决定是在阿拉伯外长将在突尼斯举行会议前两天宣布的。本来这次会议要讨论阿拉伯国家要采取的政治策略。阿拉伯国家早有约定，关系到阿拉伯民族整体利益的任何政策都要事先通知其它阿拉伯国家，并征得其它国家的认可。萨达特既没有通知其他阿拉伯领导人，也没有等到突尼斯会议之后，就宣布了他的决定，这使阿拉伯国家惊愕不已。二是萨达特在宣布他的决定时，坚持把阿拉法特请至开罗。阿拉法特一听完他的决定，立即冲出了人民议会大厅。他气愤地说：“萨达特给我蒙上了头巾。”萨达特的这一举动，给外界造成阿拉法特支持其决定的假象，这更使阿拉伯世界迷惑不解。

二、“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者，善善者也。”其意思是说，能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来取得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所有计谋中的上上策。与战争相对的手段就是和平，实现和平的手段就是谈判。这一谋略是所有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最高追求。但真正成功者寥若晨星，萨达特可谓是成功者中杰出的一位。

萨达特通过对历次阿以战争的分析总结，认为战争不能解决阿以之间的民族矛盾，继续战争也对埃及极为不利。近 30 年的阿以冲突，阿拉伯人不仅未能将以色列赶入大海，未能收复阿拉伯领土，而且还损兵折将，丢失大片土地。在萨达特的内心里，他早已承认阿拉伯人不能够战胜以色列，必须面对现实，即承认以色列事实上的存在。对埃及来说，历次战争埃及都是主力军，不仅未能够战胜以色列，而且屡屡惨败，资源丰富的西奈半岛被以色列占领。长期的战争环境，给埃及带来巨大损失。四次战争，埃及耗资 400 多亿美元，10 万人血洒疆场。军费开支连年增长，1967~1973 年每年平均约 20 亿美元，1975 年已增长到 61 亿美元。庞大的军费开支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致使埃及财政拮据，债台高筑。财政状况恶化，通货膨胀，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人民的不满使国内政局日趋动荡。此外，战争使埃及人民蒙受了巨大耻辱，大多数埃及人都不愿再打仗，人心思和已成为大势所趋。面对这一局势，萨达特认识到，埃及再也经不起一次战争了。如著不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尽快收复失地，树立起埃及人民的民族自信心，重塑他在人民中的威望，他的统治将岌岌可危。

对于和平解决阿以争端，萨达特早在他上任之初就发出了著名的“和平倡议”，但遭以色列的拒绝。十月战争后期，埃及第 3 军团被以军围困。萨达特认为，为了营救第 3 军团，必须与以色列直接接触。在美国的斡旋下，埃以双方军事代表终于达成协议，埃及第 3 军团获救。这是双方第一次面对面的谈判。由于当时美国对中东和平进程的极力推动，萨达特认为，美国能够也愿意对以色列施压，因此有必要做出一定让步，这既可以减缓埃以对抗的局面，也可以改善与美的关系。1973 年 12 月 26 日，埃以双方就两军脱离接触问题开始谈判。萨达特起初坚持以军应撤至阿什拉、穆罕默德角一线（从西奈半岛中部通过），后又提出以军撤至米特拉山口、基迪山口以东，均遭以方拒绝。在基辛格的调解下，萨达特终于同意以方提出的撤至苏伊士运河以东约 20 公里处。萨达特让步的理由是他认为“有美国的担保，以色列人大概不会再玩弄诡计了”。他说：“谈判成功了。第 3 军得救了，我们不但保住了东岸的所有阵地，并且在一些地方还向前推进了至少 20 公里。”此后，在基辛格的调停下，埃以双方又达成第二次军事脱离接触协议（1975 年 8 月）。这次谈判遭叙利亚的拒绝，最终导致埃叙关系公开破裂，埃及与巴解组织关系恶化。但是萨达特却认为，如果保持阿拉伯国家一致的立场，那将意味着永远无法和以色列达成协议，埃及将永远被战争所束缚。他认为，通过达成这一协议，埃及收复了百分之十五的西奈领土和一些油田，这是埃及的一个胜利。

通过两次军事脱离接触协议的谈判，萨达特认识到，和以色列谈判，乃至实现和平，虽远比打一场战争要艰难得多，但也不是空想，而且能够实现战争所不能达到的目标。从此，在萨达特的内心中，实现和平已成为其思想的主流。为了给自己的行动造舆论，萨达特开始不失时机地透露与以色列和

谈的想法。他对助手们说：“如果埃以会谈结果能避免一场新的战争，那我们还犹豫什么？我不能计划个人得失，必须考虑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危。”在出访耶路撒冷前夕，他对叙利亚总统说：“一旦会谈成功，将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因为阿拉伯民族的正当权利是我要谈的一个主要内容。”

1977年，萨达特将其定为“决定性的一年”，他决心要打破目前中东格局。他认为以色列同样需求和平。长期的战争，长期处于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以色列面临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以色列工党提出了“以土地换和平”的设想。萨达特敏锐地捕捉到工党的意图，认为他实现其和平设想的时机已降临。在1977年以色列大选前，萨达特和工党要员秘密接触，准备在工党新政府成立后正式开始和谈。虽然贝京的获胜令萨达特失望，但他很快就坚定了信念，因为贝京要和埃及对话的信息不断从各方传来。萨达特认为，虽然贝京是个非常强硬的人，但他不能脱离以色列的实际，仍然需要突破阿拉伯国家长期对以的封锁。他决定和贝京政府开始和谈。1977年11月19日，萨达特飞抵耶路撒冷，在全世界一片惊异声和在阿拉伯国家一片抗议声中，开始了他实现和平的第一步。萨达特在以色列国会发出了和平倡议：“有些时候，一个国家的人民必须忘记过去，朝着新的未来迈出勇敢的步伐。”他说：“我向你们和全世界宣告，我向你们提出的是全面的和平。我不希望我们的人民和你们的人民处于导弹的包围之中。”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虽然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但它受到埃、以、美等国舆论的高度赞扬。从当今中东国际形势的发展来看，萨达特的行动，开创了中东历史的新时期。

耶路撒冷之行，使萨达特更加坚定了和平信念。他认为，虽然阿拉伯国家强烈反对与以谈判，但和谈对埃及有利。叙利亚已无法经受一场新的战争，其它远离战场的阿拉伯国家一味鼓动埃及与以色列作战，而这只能给埃及带来更大的损失。对埃及来说，最迫切的任务是要恢复满目疮痍的经济。为此，萨达特于1974年宣布实行开放政策，目的是吸引外资。但是，由于埃以处于战争状态，西方国家对埃及政局深表担忧，对在埃及投资也犹豫不定，致使开放政策收益不大，外资投资也步履缓慢。此外，西奈半岛石油资源丰富，且扼亚非咽喉，却被以色列占领。萨达特深切地认识到，埃及必须改善投资环境，收复领土。他认为，和以色列谈判，实现和平，是这一切问题的关键。

耶路撒冷之行以后，埃以双方举行了多次谈判，但由于以色列态度强硬，要价太高，致使谈判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根据从美国方面传来的信息，萨达特认为，贝京政府虽然态度强硬，但仍然需要和埃及的和谈取得突破。事实上，贝京政府企图通过埃以和平，来打破阿拉伯世界的统一战线，迫使其它阿拉伯前线国家走上与以直接谈判的轨道。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极力斡旋下，萨达特决定与贝京直接举行最高级谈判。1978年9月5日，萨达特赴美与贝京、卡特举行三国首脑会谈。会谈之前，三方都带有很大程度的冒险。如若会谈失败，将意味着中东和平进程的天折。三方举行了长达13天的封闭式会谈。会谈中，埃以双方分歧严重。萨达特认为，以色列不仅应归还西奈领土，还必须规定撤出其它被占领土，必须将埃以谈判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贝京则主张以撤出西奈来换取同埃及单独媾和，反对在加沙、西岸成立巴勒斯坦国、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权。双方坚持不让步，致使会谈异常艰辛。卡特总统对双方又拉又压，终于达成了《戴维营协议》。

《协议》规定，埃以就两国和平问题举行谈判，以签订一项和平条约，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萨达特认为，收复西奈是埃及最主要的问题，能达此目的

就是埃及的胜利。此后，双方经过一系列谈判，终于在1979年3月26日签订了《埃以和平条约》。

《埃以和平条约》的签订，引起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阿拉伯联盟决定取消埃及的成员资格，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同埃及断交，对埃及实行经济和政治制裁，埃及陷入孤立状态。但是，对萨达特来讲，依旧是一个重大胜利。他以不战，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了埃以长期战争所未解决的难题。埃及收复了西奈领土，实现了埃以和平，埃及最终摆脱了战争的束缚。埃及的国际地位也得到显著提高，国内投资环境改善，埃及吸引了大批外资，美国和西方盟国对埃及提供了巨额援助。萨达特本人也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卡特称其为勇敢的人，国际社会一致认为他是“和平的缔造者”。鉴于他在中东和平方面的重大贡献，诺贝尔和平奖评议委员会和国际外交记者协会于1978年12月和1979年11月先后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和“哈马舍尔德和平奖”。从中东国际政治发展来看，萨达特的行动顺应了中东历史发展的趋势，那就是和平。

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对阿拉伯国家发动出其不意的战争，是以色列惯用的战略。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和1967年的“六·五战争”，以色列突然向阿拉伯前线国家发动攻击，打得阿拉伯军队措手不及，以色列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胜利。以色列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是，阿拉伯国家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这一行动的主导演就是萨达特。萨达特于1973年10月发动了十月战争（也称斋月战争、赎罪日战争）。

谈及十月战争，萨达特说那是他从纳赛尔那里继承下来的，他别无选择。面对他上任之初险恶的国内外环境，萨达特深深地认识到，他必须对以色列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必须狠狠地教训一下以色列，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先发制人。萨达特还认为，他必须通过这一场战争来为阿拉伯人雪耻。从1948年到1967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打了三次大规模战争，阿拉伯接连惨败。特别是“六·五战争”，给阿拉伯人带来了深远影响，这次战争给阿拉伯人造成巨大损失。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国在战争中伤亡人员达10417人（其中亡4296人），损失坦克965辆，飞机444架，这些数字都是以色列受损的好几倍。阿拉伯国家还丧失了大片领土。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都被以色列占领；战争造成了大批难民无家可归。巴勒斯坦人达40多万再次流落他乡。尤为重要的是，这次战争给阿拉伯人蒙上了失败的阴影。通过战争，阿拉伯人被迫认识到，他们无法在军事上战胜以色列，这使阿拉伯人蒙受了巨大羞辱。无论从兵力、人口，还是从资源、国力上来讲，阿拉伯国家都远在以色列之上，可却接连败在以军麾下，这是任何一个阿拉伯人都无法接受的现实。经过战后的恢复，阿拉伯国家军事力量大增，阿拉伯人同仇敌忾，决心和以色列再对一阵，以恢复阿拉伯人的自尊、自信。作为阿拉伯世界领头羊的领导人，萨达特认识到，他必须承担起这一阿拉伯民族的历史责任。

萨达特认为，只有通过发动一场对以色列的成功战争，才能打破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六·五”战争的胜利，使以色列认为它能够以武力解决阿以冲突，加之有美国的坚强支持，在阿以和平问题上态度强硬。雅林使命、罗杰斯计划的失败，都与以色列的节外生枝有关。如1968年2月底，以色列坚持阿以会谈地点应放在联合国中东代表团总部（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致使雅林使命陷入僵局。此后，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进攻卡拉玛，袭击贝鲁特机场，使雅林使命中断。雅林使命恢复后，以色列又在会谈地点、谈判级别等细节问题上拒不让步，甚至故意拖延，拒不开会，使雅林使命不了了之。这样，中东形成了“不战不和”的局面。

与此同时，美苏为了各自的利益，竭力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自以色列国成立以来，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予以巨大支持。尼克松总统说：“我虽说主张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然而我们能强迫以色列所做的是极为有限的。”他对基辛格说：“你知道，我坚定地同以色列站在一起的立场，一直是以比以色列的生存更为广泛的问题为基础的。我们现在是以色列在世界上唯一的重要朋友。”可见，美国不愿意对以色列施压，使其回到谈判桌上来。苏联也是如此。萨达特坚定地认为，苏联故意拖延埃苏已商议好的武器供应，是为了限制埃及的军事武器，使它不能与以色列进行一场决战，这样可以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萨达特说，苏联对“不战不和”存有巨大的

既得利益，因为一旦这一局面被突破，“他（苏联）就会认为我们不再需要他了”。“不战不和”的局面，使萨达特尤为担心。他认为他再不能无所作为了。埃及经济不可能无限期地负担军费，埃及的社会结构亦摇摇欲坠，如果他不做出抉择，就可能垮台。面对这一局面，萨达特对外交努力已失去信心，决定以战争来打破这一局面。

1972年下半年，萨达特走上了备战的征途。他果断地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苏联为保住埃及这一非常桥头堡，很快运送来了大批军事武器，埃及军力基本恢复。萨达特在阿拉伯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取得了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特别是与叙利亚、约旦结成了战争同盟。埃、叙、约三国决定成立联合司令部，协同作战。三国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决定将于1973年10月6日发动对以战争。经过埃及的努力，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决定在对以战争爆发后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为保证战术的成功，萨达特与叙利亚领导人决定对以发动突然袭击。为此，阿拉伯军队进行了一系列实弹联合演习。到1973年9月6日阿拉伯方面一切战争准备工作已就绪。

对于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积极备战，美国、苏联、以色列都有察觉。可他们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阿拉伯国家绝不可能发动一场战争。特别是以色列，压根儿就没把阿拉伯人放在心上。“六·五”战争表明，以色列有摧毁阿拉伯国家的绝对优势军力，这使他们产生了骄横麻痹、目空一切的自傲情绪，加之“六·五”战争后，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东岸修筑了自称牢不可破的巴列夫防线，这使以色列的自信心再增。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以色列领导人及情报机构都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以总理梅厄夫人1973年3月访美时说：“我认为以色列在军事上坚不可摧。”开战前10天，以色列高级人士强调，他们认为“阿拉伯首脑并没有准备好战争”。有一个人这样说，阿拉伯也许会“估计错误”而发动战争，但毫无疑问，他们将必然失败。就在开战的前一天，梅厄夫人召集内阁会议，会议并没有意识到战争的迫切性，而是认为虽然战争的危险性是存在的，但埃叙部队可能是要进行军事演习，不可能发动进攻。会议没有决定征召预备役。在10月6日凌晨的紧急内阁会议上，梅厄夫人拒绝先下手对埃叙军队进行袭击，只同意采取包括局部动员在内的必要措施。

萨达特充分利用了以色列骄傲轻敌的弱点，决定执行战斗计划，对以色列发动一场出乎其意外的战争。他认为，以色列及西方国家越是认为战争不可能爆发，就越有利于埃及及阿拉伯国家执行其作战计划，才能取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最佳效果。为了迷惑敌人，萨达特于1973年5月发布战争动员令，造成战争一触即发的假象。以色列发布局部动员令，可什么也未发生，给以色列造成11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这一假象更使以色列领导人坚信阿拉伯人不会发动攻击。在战争前夕，以色列由此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1973年10月6日下午二时，萨达特下令向以发动进攻，战争爆发了。萨达特为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将战争的开始定在10月6日。这一天正是犹太人的赎罪日，也是穆斯林的斋月。按照犹太教教规，赎罪日实行斋戒，从日出至日落不进食，不喝水。以色列全国处于一片祥和的宗教气氛中。埃及发动突然进攻，打得以色列全国上下手忙脚乱。

十月战争初期，由于萨达特谋略成功，备战充分，埃及取得了重大胜利。开战20分钟之内，埃及飞机便摧毁了以色列在西奈的指挥部、空军指挥部、防空和雷达干扰中心、导弹营、炮台等，为抢渡运河的陆军部队创造了条件。

被称为以色列坚不可摧的巴列夫防线顷刻间被埃军攻破。到10月7日8时，渡河战斗已告捷，防守巴列夫防线的以军3个装甲旅和1个步兵旅几乎全部就歼。10月8日，埃军收复西奈第二大城东坎塔腊。与此同时，叙利亚军队也突破了以军防线，收复了戈兰高地东部大片土地，阿拉伯军队取得了初战胜利。

由于埃及在战略和部署上的失误，以色列很快夺回了战争主动权，并且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初期阿拉伯军队的胜利，已基本实现了萨达特的预期目的。军事上，它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洗刷了“六·五”战争蒙在阿拉伯人心头的耻辱。政治上，打破了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迫使美苏等大国正视阿拉伯各国的要求。对于萨达特本人来说，他赢得了政治上的巨大胜利，他成了阿拉伯人心目中的英雄，被称为当今的“萨拉丁”（萨拉丁是中世纪时阿拉伯人抵抗十字军东征的英雄）。萨达特由此成为国际政坛一颗耀眼的明星，达到了他本人政治生涯的顶峰。

四、打美国牌

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对评价萨达特的外交政策来说，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萨达特执政后，对埃及的外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其中最主要的一是埃以由战争走向和平，二是埃苏关系的恶化，埃美关系的恢复与加强。特别是埃美关系的发展，对埃及内外政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打美国牌，是萨达特经过深谋远虑后作出的重大决策。

“萨达特大打美国牌，首先是他认为美国需要埃及。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在中东有巨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中东扼亚、非、欧之咽喉，是美苏“冷战”的重要场所。中东资源，尤其是石油，为世界主要产油区及石油出口地区。美国每年消耗的石油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来自中东。埃及对于美国来讲，意义更为重大。埃及地处亚非两大洲接壤地带，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苏伊士运河通航以来，埃及扼东西方交通要道，控制着称为西方“生命线”的石油运输的咽喉。此外，埃及传统上是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盟首。七月革命以来，埃及成为向拉伯团结的核心，阿拉伯联盟至七十年代末一直将其总部设在开罗，特别是埃及一直是历次阿以战争的领头羊。最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国家在埃及的带领下，成功地发动了1973年的十月战争，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令西方国家为之一惊。对于埃及的重要地位，美国政府当然看得很清楚。美国政府还有其更深的考虑，即他希望将埃及拉入其阵营，成为与苏在中东争夺的一桥头堡。此外，美希望埃及能和以色列和解，将埃及作为解决中东问题的突破口，以减轻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压力，力图将中东问题的解决纳入其战略轨道。萨达特对埃及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判断得异常准确。他认为埃及可以充分利用其优越的地理、政治及军事地位，利用美国对埃及的需求，大做文章，以解决埃及日益尖锐的国内外难题。

萨达特不仅认为美国在埃及有巨大利益，而且认为美国有能力解决中东问题，尤其是埃以问题。为维护其在中东的利益，为和苏联在中东争夺，美国除大力支持以色列外，也力图实现其战略轨道中的“和平”。七十年代始，美国就提出了罗杰斯计划。十月战争中和战后，美国更是对中东和平乐此不疲。正是由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多次调停，使埃以在十月战争中得以实现停火。基辛格在埃以间频繁穿梭，最终解除了以军对埃及第3军的围困，埃以实现了军队脱离接触。之后又实现了第二次军队脱离接触。萨达特对美国的行动表示满意，特别是美国的斡旋实现了通过战争希望达到而未达到的目的，令萨达特欣慰。“六·五”战争，埃及不仅失去了它控制的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而且失去了地理位置险要、石油资源丰富的西奈领土。萨达特希望通过十月战争来收复失地，但在损兵折将之后依旧未能达到目的。在美国的斡旋下，埃及与以色列在谈判桌前以唇战却获得了不小进展，到第二次军队脱离接触协定签署后，埃及收复西奈领土的百分之十五。通过这些行动，萨达特认识到，尽管以色列态度强硬，但它必须听从美国的建议。他认为，只有美国才能给以色列施加足够大的影响。萨达特也看到，美国有能力、也有愿望解决中东问题，尤其是阿以冲突。他说：“解决中东问题的牌99%以上掌握在华盛顿的人手中。”

萨达特认为，打美国牌有助于埃及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历次阿以战争，给埃及带来不可弥补的巨大经济创伤。七十年代初，埃及经济已面临崩溃的

边缘。为迅速扭转国民经济，萨达特于 1974 年正式推行经济自由化和“门户开放”政策。其核心是要吸收和利用外资（主要是西方资本），而美国在此方面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不仅是世界超一流经济强国，而且是政治强国，它的一举一动常有导向性作用，埃美关系恢复后，美国及西方国家对埃及提供了大量援助；1974~1979 年，西方国家及国际金融组织向埃及提供借贷 165 亿美元，特别是埃以后和后，西方国家的援助成为埃及主要外资来源。1978 年达 34 亿美元，1979 年估计为 25 亿美元。美国也对埃及以优惠援助，1976 年美国给埃及的贷款，年息 2~3%，期限 40 年，其中 10 年为优惠期。萨达特切身感受到了美国的实惠，更加注重埃美关系的发展。

萨达特认为，美国领导人，尤其是基辛格、卡特非常信任他。基辛格无论作为国家安全顾问，还是作为国务卿，都把解决中东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之一。基辛格和萨达特很快建立了信任感，二人以“亨利、安瓦尔”相称。基辛格在中东穿梭斡旋中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华，特别是在埃以两次军事脱离接触的艰苦谈判中，基辛格的高超技艺令萨达特非常佩服。尤为重要的是，萨达特认为基辛格能够体谅其苦衷，能对以色列领导人施加有力的影响。基辛格奉劝以色列给埃及第 3 军一条活路，劝以军从运河东岸后撤 10~20 公里，后再撤 20 公里，这些都是基辛格为保持萨达特的威望而作出努力的结果。萨达特对基辛格也异常信任。

1977 年，卡特政府上任，将全面解决中东问题作为外交工作的核心。萨达特很快与卡特建立了良好的私人感情。卡特称萨达特是“勇敢和非凡的人物”，萨达特则称卡特是“一个对自己忠诚，对别人也忠诚的人”。萨达特说：“我知道我在和一位理解我的意图的人，一位为信念的力量和崇高的理想所推动的人交往。”卡特执政期间，屡派要员，他也曾多次亲赴中东斡旋。他是第一位将自己的命运全寄于中东和平进程，尤其是埃以和平的美国总统。为促进埃以和平进程，卡特向萨达特保证他将承担双方的责任与义务。他在埃及人民议会发表讲话说，“美国准备分担由于缔结和平条约而带来的负担”，表示将对埃及进一步提供军事援助，并提出美国将同埃及一起共同抵制苏联在中东的扩张。为压以色列让步，卡特曾向以色列领导人发火。卡特为促进埃以和谈所作出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在戴维营会谈中，卡特谢绝一切国事，专门调解埃以双方分歧，深得萨达特的敬佩。基辛格、卡特与萨达特的良好关系及萨达特对他们的信任感，使萨达特认识到，美国领导人中有为埃及考虑、能为他分忧的政治家。他认为，他可以通过他们为埃及谋利益。同样的，萨达特也给予卡特以理解。他说：“向卡特总统提出他显然做不到的事情，那是不明智的。我能要求他的，首先是符合美国的利益，其次允许美国作为大国承担起对世界和平的责任的政策。”

萨达特为打美国牌，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1974 年，埃美恢复了中断 6 年的外交关系。埃美领导人频繁互访。萨达特接受卡特的建议，将其“主动和平行动”付诸于实践，于 1977 年 11 月 19~21 日，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应卡特总统之邀，萨达特与贝京、卡特于 1978 年 9 月在戴维营举行三国首脑会晤，1979 年 3 月再会晤于华盛顿。此外，埃美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定、军事协定。

萨达特打美国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首要的是埃以实现了和平。在美国的极力斡旋下，1978 年 9 月 17 日，萨达特与贝京达成戴维营协议。1979 年 3 月 26 日，二人又在华盛顿签署《埃以和约》，埃以结束了交战状态，实

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埃及收复了西奈领土，从此摆脱了战争的沉重包袱。埃以和平为埃及专注于国内经济建设提供了和平环境。

其次，埃及与西方国家关系得到长足发展。七月革命以后，埃及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十月战争后，埃美关系的迅速改善，加之埃苏关系恶化，迅速带动了埃及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尤其是埃以和平、埃及实行经济自由化和“门户开放”政策，使得西方国家与埃及的经济合作大大加强，从而导致政治关系的发展。埃以媾和导致埃及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恶化，埃及为摆脱孤立状态，和西方国家关系得到更进一步发展。

此外，埃及经济条件也得到改善。大批外资流入埃及，为其提供雄厚的资金，这对埃及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促进作用。为压埃及与以色列签定和约，卡特政府即答应向埃及提供 50 亿美元的援助，其中 40 亿为军援，10 亿为经援。美国对埃及的军援，弥补了埃苏关系恶化造成的埃及军用武器短缺的状况。

五、建立联盟阵线

建立联盟阵线，就是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结成联盟。这一策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政治、外交上都得到广泛运用。如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战时期，为了共同对付德、意、日法西斯，20多个国家结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萨达特也将这一策略运用到了极致，即在十月战争中，使阿拉伯世界空前团结，形成抗以联盟阵线。

阿拉伯国家虽然各有差异，但也有众多相同点。同以阿拉伯语为国语，同信奉伊斯兰教，同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荣，这一些都使阿拉伯国家有兄弟之谊。近现代以来，阿拉伯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遭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奴役，尤其是十九世纪末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在英、美等国家的支持下，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猛增，致使阿犹矛盾激化，保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益，驱逐犹太人，成为阿拉伯国家共同的历史责任。巴勒斯坦问题随即成为阿拉伯世界团结的支撑点。1948年以来，阿拉伯人同以色列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战争，力图收复阿拉伯领土，将以色列消灭在巴勒斯坦，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阿方失地、亡人，蒙受了巨大的羞辱。萨达特上台后，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认为，对以色列进行一次成功的战争，收复失地，重树阿拉伯人的自信心是阿拉伯人的当务之急。他认为，只有对以问题才能把阿拉伯世界团结起来；只有阿拉伯世界团结一致，才可以壮大阿拉伯人的力量，取得对以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萨达特认识到，埃及自身力量单薄，无法单独和以色列对抗，需要阿拉伯兄弟从各方面予以支持。以色列虽然国小人少，但它有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作为强有力的后盾。美不仅在政治上是唯一站在以色列一边的国家，而且在经济、军事上对以色列以强大支持。可以说，以色列是站在美元基础之上的国家。加之犹太人保护生存之地的民族信念，使以色列成为阿拉伯人面前一个强大的敌人。萨达特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同样看到，埃及虽是阿拉伯世界的大国，但经济、军事力量远不能和以色列相抗衡。七月革命以来，苏联给埃及提供了大量援助，萨达特认为苏联只不过是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并没有真心帮助埃及和阿拉伯人。苏联不是埃及可靠的朋友，苏联一定程度上帮助埃及是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面对阿拉伯人雪耻民族情绪的高涨，萨达特认为，必须依靠阿拉伯人自己，将阿拉伯人再度团结起来，精心备战，才能狠狠地惩罚以色列。“

从阿拉伯人历次对以色列战争的经验教训出发，萨达特得出结论，只有将阿拉伯人团结一起，并肩作战，才有可能打败以色列。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在萨达特内心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巴勒斯坦战争初期，阿拉伯国家利用军队数量及装备上的明显优势，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将以色列逼到了绝境，使其军队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阿拉伯人并未取得最后胜利，相反，却蒙受了重大损失。阿拉伯人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阿拉伯国家的内讧。正如一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穆萨·阿拉米所言：“在敌人面前，阿拉伯人没有统一的国家，只有几个小朝廷；只是几个集团，而不是具有统一意志的民族整体；他们彼此戒惧，互相监视，尔虞我诈。他们所最关心的事和指导他们的政策，不是打败敌人和从敌人手中把巴勒斯坦拯救出来，而是在这场斗争结束后会出现什么局

面，谁将会在巴勒斯坦占据统治地位或谁将会把巴勒斯坦据为己有，以及他们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野心……。”苏伊士运河战争时，萨达特作为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对战争更具切身体会。埃及单独抗击英、法、以三国侵略者，其他阿拉伯国除了一些口头支持外，实际上没有给埃及以军事、经济援助。埃及虽赢得了政治胜利，但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伤亡达 6550 人之多，是敌方的 5 倍；损失飞机 215 架，是敌方的 10 倍。苏伊士运河被迫停运，给埃及财政收入带来严重影响。1967 年“六·五”战争，实际上又是阿拉伯人历史悲剧的重演。阿拉伯国家各自为战，任凭被以色列各个击破。萨达特逐渐明白，不将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一致对敌，阿拉伯人雪耻的愿望定会化为泡影。萨达特认为，阿拉伯人需要和以色列打一场有限战争，但首先是协调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否则，那带来的又是对埃及、阿拉伯人的惨重损失，随之而来的是他本人威望的剧烈下降。

为了发动对以色列的战争，萨达特进行了一系列准备。除装备军队、制定周密作战计划而外，萨达特战前开展了一系列争取阿拉伯国家支持的外交活动。首先是改善了和叙利亚、约旦的关系，并结成了军事同盟。埃及和叙利亚于 1958 年曾合并，建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因复兴党和纳赛尔主义的矛盾激化，1961 年阿联随即解体。加之叙利亚对巴勒斯坦一直有“大叙利亚计划”的野心（今巴勒斯坦地区和叙利亚同属阿拉伯帝国时期的叙利亚省，叙利亚试图建立大叙利亚），使得埃叙关系恶化。萨达特上台后，同叙改善了关系。1972 年 8 月，埃叙两国曾宣布一年之内实现合并（后未实施）。利用叙利亚也想收复戈兰高地的愿望，萨达特和叙利亚积极沟通，最终就共同军事行动问题达成一致。1973 年 2 月，两国决定采取联合行动。两国随后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萨达特本已决定 5 月对以发动战争，因以色列发布局部动员令，为达到出敌不意的效果，萨达特努力说服阿萨德总统同意将战争推迟到 9~10 月。9 月 28 日，萨达特和阿萨德总统签署开罗协定，将开战日定在 10 月 6 日。

由于对巴解组织及巴勒斯坦问题的分歧，1970 年约旦镇压巴勒斯坦游击队之后，埃、叙相继和约旦断交。为了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萨达特决定改善与约旦的关系。1973 年 8 月初，萨达特派特使卢特菲·扈利去安曼同约旦国王侯赛因晤谈，使原来认为反击以色列的“战争时机还未成熟”的侯赛因，终于同意埃叙的战争决定。9 月 11 日到 12 日，萨达特、阿萨德、侯赛因在开罗举行首脑会晤，一致确定了收复失地的共同战斗目标。随后，埃约、叙约相继宣布恢复外交关系。

其次，萨达特为争取其它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1973 年 1 月底，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军事首脑在开罗阿拉伯联盟大厦开会，商讨未来战争的共同战略。5 月下旬，萨达特邀请阿尔及利亚政府首脑布迈丁访问开罗，双方同意尽力动员阿拉伯力量，共同反对以色列的侵略。尤为成功的是，萨达特争取到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埃沙两国曾因也门内战而长期不和，为了阿拉伯民族事业，萨达特于 8 月 23 日到 27 日对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进行访问。他从两国取得 13 亿美元的援助款项，并就未来阿以战争中如何使用石油武器问题达成一致。

由于萨达特的积极努力，反以的阿拉伯联盟阵线终于形成，阿拉伯世界空前团结。萨达特的努力在十月战争中取得了辉煌成果。10 月 6 日下午 2 时，萨达特下令开战。与此同时，叙利亚在戈兰高地也开辟了第二战场，巴勒斯

坦游击队也加入到战斗行列中来，使以色列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阿拉伯军队取得了初战的重大胜利。埃及军队突破了被以色列奉为“坚不可摧”的巴列夫防线，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控制了运河东岸纵深 10~15 公里的地区。叙利亚也突破了以军防线，收复了戈兰高地东部大片土地阿拉伯军队的胜利，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洗刷了“六·五”战争时蒙在阿拉伯人心头上的耻辱。阿拉伯军队初战告捷，有众多因素，但萨达特建立起联盟阵线，不能说不是其重要的一个因素。

除了军事上的胜利而外，阿拉伯人也赢得了政治上的重大胜利。依据战前萨达特与阿拉伯产油国达成的一致协议，战争一开始，阿拉伯国家纷纷拿起石油武器。战争爆发的当天，叙利亚和黎巴嫩就关闭了通过其境内的输油管。次日，伊拉克宣布将美国埃克森和莫比尔两家石油公司收归国有。10月6日，伊朗和其它海湾五国决定将原油市场价格提高 7%。10月17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部长级会议宣布，立即减少石油产量，每月递减 5%；对于美国及其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的石油供应逐月减少 5%。10月20日，沙特阿拉伯率先开始对美实行石油禁运，其它阿拉伯国家纷纷效仿。阿拉伯各国把石油作为捍卫国家主权、收复失地和反对强权政治的战略武器，采取减产、提价、禁运以及国有化等措施，有力地支援了阿拉伯军事和政治上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以色列侵略者及其支持者。同时，石油武器的使用，也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分化，为阿拉伯人争取了更多的国际支持。西欧各国和日本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背弃美国，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持友好或同情立场。

六、以攻为守

七月革命以来，埃苏关系迅速发展，苏联成为埃及的依赖国，尤其是在武器方面，苏联几乎成为埃及唯一的武器供应地。苏联利用埃及对他的依赖性，加强了对埃及的控制，将埃及作为苏联在中东战略中的一个砝码。萨达特执政后，苏联以武器供应为要挟，试图控制埃及的对外政策。萨达特在苏一再拖延武器供应的情况下，果断地向苏发起进攻，将苏联军事顾问、专家驱逐回国，反而赢得了苏联的武器，夺回了埃苏关系的主动权。

萨达特认为苏联人对他怀有深深的疑虑，对他表示不信任。萨达特作出判断，苏联人不满意纳赛尔将他作为继承人。1969年纳赛尔在苏疗养期间，他对前去看望的苏联总理柯西金说，萨达特将作为他的继任者。柯西金对此甚表惊讶。当纳赛尔谈到萨达特之后是萨布里时，柯西金才表示满意。这一谈话传至萨达特耳中，萨达特由此产生了对苏联的不信任感。萨达特认为，苏联在埃及内部权力斗争中支持其对手。纳赛尔去世的次日，柯西金便率团至开罗，试图对埃及领导人的产生施加影响，未果。1971年初，萨达特与萨布卫派的矛盾尖锐化。自1967年以来，阿里·萨布里被认为是苏联在埃及扩大影响的最忠诚的支持者。他主张加强埃苏关系，坚持认为外交手段毫无希望，主张和以色列打仗，并认为为加强埃苏关系可以牺牲阿拉伯团结。苏联也把萨布里看作是其在埃及利益的代理人，在埃及国内权力斗争中，暗中支持他，并试图搞垮萨达特。1971年四、五月，萨达特粉碎了萨布里为首的“权力中心”，并专程向苏联作了通报，但苏联一直却为此而耿耿于怀。苏联人认为，萨达特不是个合乎苏联胃口的入选，他是个民族主义者，只要能为埃及的目标服务，他愿意和苏联人合作，也愿意和纳粹合作。苏联的种种举动，使萨达特认为苏联人对他很不友好，时机一旦成熟，得教训一下苏联人。

萨达特认为，驱逐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可以摆脱苏联的控制。埃及七月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对新政权采取敌视态度，埃及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为从外部取得在阿以冲突中对埃及的支持，以和以色列相抗衡，纳赛尔政府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埃及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从纳赛尔时期到萨达特上任初，苏联给予埃及以广泛援助，从经济领域到军事领域，处处充斥着苏联的东西；苏联成为埃及经济基本建设大项目的制定者与主要技术、资金提供者，苏联成为埃及同以色列抗衡所需先进武器的主要来源。从1967年10月到1970年春，苏联总共向埃及提供了价值约为45亿美元的各种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向埃及派驻2.2万多名军事人员，有4000多军事顾问和专家分布在从埃及总参谋部到陆军的营、特种部队的连、海军的舰艇和空军的中队等各级军事指挥单位。显然，苏联的援助对埃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萨达特认为，苏联并不是真正愿意帮助埃及，它是为控制埃及，为其战略利益服务。随着苏联援助的扩大，苏联掌握了埃及军队的指挥权。苏联在埃及建立了50多个导弹发射场，它们全部由苏联军人操纵和守卫。苏联军事人员还控制着开罗西郊机场和曼苏拉、因沙斯等军事基地。苏联军舰长年驻扎在亚历山大、塞得港、马特鲁等重要军港。埃及武装部队的重要作战命令，必须事先征得苏联在埃及的驻军指挥部的同意。尤为让萨达特气愤的是，苏联的霸权主义日趋加强。1971年，苏联提出要让苏联飞机享有在埃及机场作经常性停留和事先通报一下就可以飞越

埃及领空的权利，而对于埃及所急需的先进武器，苏联方面却一再推倭。正是由于苏联迟迟不提供已答应给埃及的武器，才使萨达特将 1971 年作为“决定性一年”的计划破产，使萨达特在阿拉伯人、在埃及国内丢尽了脸面。萨达特由此认为，苏联根本就不想像美国支持以色列那样援助埃及，相反，它却力图控制埃及特别是军事方面的行动自由权。萨达特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虽然认为必须依靠苏联的武器，但他不能容忍苏联人凌驾于埃及之上的行为。针对苏联提出的必须事先得到苏联的同意才能使用其提供的“伊柳辛”式飞机，萨达特当即拒绝说：“假如以色列再次轰炸埃及腹地，难道我在还击以前必须得到莫斯科的允许吗？这将把我置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我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首脑，我不能丝毫放弃我的独立行动的权利。”萨达特认为，为了有效地抗击以色列的侵略，必须有军事行动的自主权，而大批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的存在，成为埃及军事自主权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将其驱逐出国。

萨达特认为，将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驱逐回国，将有助于打破“不战不和”的局面。1967 年“六·五”战争之后，美苏在中东竭力维持一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美苏利用这一局面在中东地区争夺势力范围，又可相互勾结，在必要时拿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和领土作交易，避免引起直接对抗。“不战不和”对埃及产生了巨大消极影响。经济方面，长期军事对峙使国内工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苏伊士运河再度关闭，使财政收入更加拮据。1968 年至 1973 年，埃及遭受经济损失超过 100 亿美元。同时，军费居高不下，部队长年处于全面动员状态，成年累月在沙漠中进行训练和演习。此外，“不战不和”已影响到埃及政局的稳定。1972 年 1 月下旬，开罗爆发了 8 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游行示威和集会，强烈要求政府迅速动员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战争。军队中也群情激奋，要求向以色列开战。1972 年 10 月，开罗卫戍部队一青年尉官率领 7 辆装甲车开到市中心的侯赛因清真寺，慷慨陈词，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对以色列进行“圣战”。萨达特认识到，必须打破“不战不和”的局面。他说：“我理解这种不满情绪。时间过了 6 年，我们驻在运河的士兵以及我们的学生都要求采取行动。”但是，苏联却极力维持这种局面，并为萨达特设置障碍。苏联人认为，没有莫斯科的允许，萨达特什么也于不成，其关键就是埃及依赖苏联的武器。萨达特为争取到苏联的武器，曾向苏联方面力陈其必要性，并亲自多次飞往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商讨武器援助问题。苏联虽口头答应，但迟迟不交货。萨达特认为，苏联对“不战不和”持有既得利益。一方面它可以利用提供武器来影响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军事活动，另一方面可避免同美国发生正面碰撞。正，如海卡尔所指出的，“苏联对不战不和状况的确感兴趣，因为它会使这个地区更加依赖苏联”。因此，苏联极力阻止萨达特的战备活动，并同美国一道高喊缓和的口号。对于萨达特急需的武器，苏联多方拖延。萨达特气愤他说：“勃列日涅夫在 1971 年 3 月骗了我；波德戈尔内在 1971 年 5 月欺骗了我；勃列日涅夫在 1971 年 10 月又骗了我。难道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耍的把戏吗？你们同美国人商定：中东无战事。让我告诉你们，你们无权充当我们的监护人。”面对苏联的阻碍，萨达特认为，要打破“不战不和”的局面，必须摆脱苏联的控制。

1972 年 7 月 8 日，萨达特对苏联表示完全失望，对苏联驻埃及大使维诺格拉多夫宣布：结束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埃及的使命，埃及军事部门中的 2.1 万多名苏联军事人员，除以训练为目的留在埃及的技术人员以外，必须

从7月17日起在10天之内离开埃及。萨达特对此解释说：“看来苏联并不信任埃及领导，而且对局势的危急缺乏认识。在埃及注意维护同苏联的友谊的同时，它不能忍受包括苏联在内的任何国家的监护。”

萨达特驱逐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基辛格深感出乎其意外，叙利亚等亲苏的阿拉伯国家表示惊讶与不满，苏联则对此大加斥责。但在埃及国内，却赢得了一片欢呼声。与苏联、西方国家、以色列的理解不同，萨达特认为将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驱逐回国，并不是意味着放弃了同以色列再打仗的想法，而是“给敌人以打击的时候到了”，“重新开战已经不可避免”。

萨达特驱逐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沉重地打击了苏联在中东的势力，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与束缚，维护了埃及的民族权益。萨达特由此在国内获得了崇高的威望，重塑其新形象，即他并不是人们起初以为的那种唯唯诺诺、毫无魅力的领导者。

萨达特的行动，突破了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埃及终于摆脱了苏联的军事控制，赢得了军事行动的自主权。为了阿拉伯人的尊严，为收复失地，为雪洗“六·五”战争的耻辱，萨达特需要发动一次成功的对以战争。驱逐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消除了备战道路上的障碍。此后，萨达特加紧备战，终于于1973年10月发动了十月战争，并且取得了初战的重大胜利。

与众人判断恰恰相反，萨达特的果敢行动反而得到苏联更多的帮助。萨达特清楚，埃及需要苏联，特别是只有从苏联那里得到新式武器，才能与以抗衡，发动一场对以战争。同样地，他作出了准确的判断，他认为苏联也需要埃及。七十年代，美苏在中东展开了激烈争夺。埃及是苏联自五十年代以来苦心经营的桥头堡，它不能轻易地丢弃这一阵地。埃苏双方进行了一系列接触，苏联迅速提供埃及所急需的武器。在十月战争中，苏联还紧急空运武器援助埃及。事实上，就是在十月战争中，苏联的武器仍是埃及军备的主力。萨达特赢得了这场埃苏斗争的胜利。

七、以战促和

战争与和平，作为一对矛盾，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还可以相互转化。战争，并不是作战双方（或多方）的目的，它只是一种手段，而和平才是目的。由战争到最终的和平，大凡有两种：一种是一方征服另一方而强加的在武力下的和平，另一种是双方因互不能战胜对方而实现的相互妥协。战争，往往成为实现和平的手段。美军出兵波黑，最终签署旨在实现波黑和平的代顿协议，就是此类。其实，这也不是美国的独创。早在七十年代，萨达特就试图以战促和，即试图通过对以色列的战争，来实现阿以和平。

萨达特认为，战争不能解决阿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和平，已成为阿以双方的共同需求。从 1948 年巴勒斯坦战争到 1967 年“六·五”战争，阿以双方进行了大规模厮杀，对双方来讲，可谓两败俱伤。对埃及和阿拉伯方面来说，不仅没有将以色列赶入大海，而且亡人失地，屡战屡败。每一次阿以战争，阿拉伯国家在人员伤亡、武器损失及经济损失方面，都几倍于以色列。以 1967 年“六·五”战争为例，埃及、约旦、叙利亚等国在战争中伤亡人员达 10417 人，约为以色列的 2 倍；三国损失坦克 965 辆，是以色列的 2.5 倍；三国损失飞机 444 架，是以色列的 11 倍。阿拉伯国家不仅损失严重，而且丢失了大片阿拉伯领土。仅“六·五”战争，阿拉伯就丢失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总面积达 8.16 万平方公里。面对阿拉伯国家的惨败，萨达特在内心早已认识到，阿拉伯国家无法从军事上打败以色列。他还认识到，“六·五”战争，本已使阿拉伯人蒙受了奇耻大辱，埃及和阿拉伯国家无法再承受一次失败的战争。由此，萨达特认为，只有和平解决争端，才是埃及与阿拉伯人的现实选择。

对以色列来讲，虽然它接连赢得了三次阿以战争，占领了比它本国领土大 4 倍的阿拉伯领土，但从政治上讲，以色列是失大于得。特别是“六·五”战争，彻底暴露了以色列的野心，以色列处于世界舆论一片谴责声中，连以色列的坚定盟友与靠山——美国，也不得不对以色列加以指责。联合国安理会 242 号决议，就是由美国首倡的，要求以色列撤出它在“六·五”战争中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此外，长期处于敌对的阿拉伯国家包围之中，以色列不仅成为政治上的孤家寡人，而且也蒙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况且军费一直居高不下，成为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障碍。同样地，以色列领导人也得出结论，对阿拉伯人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实现以色列所要求的和平，相反，它只能是把以色列进一步带进战争的泥潭之中。因此，和平，也成为以色列当局的迫切需求。萨达特清楚地看到以色列的处境，他认为埃及和以色列都需要和平，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以及实现怎样的和平。

萨达特认为，虽然埃及打不赢战争，但战争可以促使以色列和谈。按理来说，阿以双方都迫切需要和平，和平应更易实现。实则不然，阿以双方在如何实现和平、以及怎样的和平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阿拉伯方面虽仍高喊消灭以色列，但“六·五”战争后已默认了自己的失败，也即默认了以色列事实上的存在。阿拉伯方面认为，以色列首先应撤出“六·五”战争中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权，然后才能谈及承认以色列的问题。而以色列则认为，阿拉伯方面必须先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要求和阿拉伯国家直接谈判，其它问题则避而不谈。以色列要求的和平实际上是武力强加给阿拉伯人的和平。以色列根本不想撤出它所占领的阿

拉伯领土。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果尔达·梅厄作为一个年轻的先驱者来到以色列。归还领土的主意几乎使她感到切肤之痛。作为交换，她要求对安全作出坚定的保证。很难想象什么样的保证才可能被她认为比实现占领更为安全。”以色列根本谈不上承认巴勒斯坦民族权益，梅厄夫人竟称“巴勒斯坦根本就不存在”。以色列一直不承认巴解组织（1993年9月以前），称其为“恐怖组织”。阿以双方的根本性分歧，使得阿以和平如水中捞月。以色列自恃其军事优势，态度异常强硬，企图将阿拉伯人置于被征服者的地位。以色列还经常节外生枝，使国际社会的调停以失败而告终。面对以色列不可一世的态度，萨达特认为，必须让以色列吃点苦头，使其不能小看阿拉伯人，冷静地对待阿拉伯人的要求。萨达特认为，对以色列发动一次成功的有限战争，既可以雪阿拉伯人之耻，也可以打击以色列人的嚣张气焰，促使其放弃武力，回到谈判桌上来。

萨达特认为，以战促和是他以和对和努力失败的必然选择。萨达特执政之初，便开始其和平行动。他在接见美国总统特使查理森（来开罗吊唁纳赛尔）时，就表达了与以色列和平的愿望，萨达特接受了罗杰斯计划，并向安理会提出建立，再延长停火期90天。1971年2月，萨达特提出和平计划，明确宣布埃及准备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结束阿以自1948年以来的交战状态。这一时期，以色列也高喊和平，接受罗杰斯计划，接受雅林调停。但是，以色列自恃有美国作为坚强后盾，以军事实力为依靠，态度强硬，并在细节问题上寸步不让，致使雅林使命一再搁浅，最后不了了之。对萨达特的和平倡议，以色列更是嗤之以鼻。同时，美苏在中东力图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使埃及处于欲战不能，欲和不得的两难境地。萨达特认为，和平是埃及的最终目的，但为了能够实现和平，他不得不进行战争。他说：“所有的和平大门都向我们关闭了，我们能选择的只有战争。”

萨达特在对战与和作了周密的权衡之后，随即决定通过发动十月战争来实现其战略意图。为此，萨达特作了一系列战争前的准备工作。在国内，调整了军队指挥部，制定作战计划，发布战时动员令，进行周密的战前演习。在国际上，驱逐苏联军事顾问，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同阿拉伯国家密切协商，与叙利亚、约旦结成战争联盟，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达成使用石油武器的协议。为保证战争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萨达特在战争爆发前对以色列施以疑兵之计，并将攻击日定干犹太人的赎罪日。萨达特认为，阿拉伯国家不能够通过武力消灭以色列，因此这次战争的目标是有限的，即旨在收复失地，振奋民族精神，促使以色列正视阿拉伯民族的要求，和阿拉伯人实现“合理”的和平。在萨达特主持下埃及总参谋制定的作战计划，充分体现了萨达特的战略意图。1973年10月6日，埃、叙两军同时向以军发动攻击，十月战争打响了。

十月战争初期，阿拉伯军队取得重大胜利。埃及军队勇猛无比，突过苏伊士运河，摧破了被称为“牢不可破”的巴列夫防线。开战仅三天，埃及军队便控制了运河东岸纵深10~15公里的西奈领土。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阿拉伯方面最后失败，但战争初期的胜利，使萨达特已经实现了其战略意图。初战的胜利，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重振了阿拉伯人的民族自尊心。同时，它对以色列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当局认识到，阿拉伯人并不是一头绵羊，以武力是不能使阿拉伯心服的。以色列人认识到，无休止的战争，已成为以色列发展的制约因素，十月战争后引发的以色列社

会、政治、经济危机，已足以说明了这一点。虽然以色列仍有让阿拉伯人恐惧的先进武器，强大军事实力，但那无助于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就梦寐以求的与阿拉伯国家建立和平愿望的实现，而真正的和平，只能在战场之外进行。这次战争，使以色列对战与和有了新的认识。

从十月战争以后阿以关系的发展来看，萨达特以战促和的谋略获得了巨大成功。埃以实现和平，可以说是以战促和的最重要的成果。

十月战争使以色列对战与和有了全新的认识。正是这一点，促使以色列当局放弃武力，积极寻求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办法。这种和平，已不是十月战争前以色列高喊的那种在武力强加下的和平，而是埃以双方相互妥协的和平。

八、借鸡产卵

经济的现代化，是所有取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任务。而资金的严重不足，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因素。如何筹措资金，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难题之一。萨达特为解决这一问题，采取了借鸡的办法，即利用外资，来发展埃及的经济。

引进外资，是萨达特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决策。众所周知，埃及长期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对埃及实施了残酷的殖民掠夺政策。埃及人民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最终于 1956 年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埃及，时常受到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还有苏联，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干涉埃及内政、外交，这使得埃及人民对西方发达国家心有余悸。另外，埃及人民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埃及之所以屡屡惨败，不能自强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未能独立。1878 年，正是英法等国利用埃及财政危机，对埃及实行双重监督。七月革命以来，苏联又企图以经济援助、军事武器援助来往制埃及的内政、外交。正是苏联迟迟不给埃及武器，才使萨达特“1971 年为决定性一年”的计划化为泡影，这一切都使埃及国内对利用外资抱有很大的忧虑。

萨达特并没有局限于埃及历史，他决定驾驭外资这匹难驯的马。萨达特认为，外资有助于迅速恢复长期阿以战争对埃及带来的巨大经济创伤。四次中东战争，埃及首当其冲，损失最大。仅从“六·五”战争到十月战争，埃及的损失就达 300 亿美元。长期的战争使埃及经济畸形发展，军事预算连年超过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1/3，通货膨胀高达 33% ~ 50%；国际收支和贸易赤字不断增加。战争打破了埃及正常的经济发展计划，致使埃及财政拮据，债台高筑。至 1976 年底，埃及应还的到期外债达 120 亿美元。经济的恶化，使埃及几乎成了阿拉伯世界中最贫穷的国家，埃及人民面临日益严重的就业、吃饭、住房、文化教育等一系列困难，并且已经引发社会危机。面对这种经济环境，萨达特认为必须尽快解决经济问题，但埃及国内显然是筹措不出多少资金的，因此必须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这一燃眉之急。

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是每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共同愿望。对萨达特来讲，这一愿望尤为迫切。由于长期战争的影响，加之纳赛尔时期经济政策方面的缺陷，埃及现代化的目标远未实现，萨达特非常清楚，作为阿拉伯世界政治大国的埃及，如若经济不能够得到强有力的发展，那埃及的政治地位将难以持续。到七十年代，阿拉伯国家经济迅猛发展。海湾国家因丰富的石油资源，几乎是一夜之间脱掉了贫穷的帽子。北非的突尼斯，经济同样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反观埃及，不仅未能实现现代化，而且经济已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十月战争，萨达特在政治上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使他雄心十足，决心要克服经济困难，实现埃及百余年来强国梦。萨达特吸取了纳赛尔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改变了对西方资本关门的政策，积极吸引西方资本和阿拉伯资本。

萨达特认为，广泛利用外资，有助于加强埃及的对外关系。首先，它有助于加强埃及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阿拉伯世界，一直是埃及对外政策的基础。埃及与阿拉伯国家同种、同文化，有手足兄弟之情。特别是二战以来，阿以矛盾尖锐化，地处战争前线的埃及，自身经济、军事力量远不能与以色列相抗衡，需要阿拉伯兄弟国家的大力支持。二战以来，特别是七十年代中

东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因其丰富的石油资源获得了巨额石油美元。这些国家国内投资市场有限，大量的剩余资本需要在海外寻找市场。埃及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合作必然促进经济合作。萨达特认为，埃及迫切需要资本，海湾富国又有大量闲置资本，对其实行优惠政策，很容易将其吸收进来，为埃及经济建设服务。同时，经济合作反过来又能进一步加强政治合作。

其次，引进外资有助于加强埃及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埃及七月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先是对埃及敌视，后又进行拉拢，均被纳赛尔所拒绝。因此，埃及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到萨达特上任时，埃及与美国关系尚处于僵化状态。萨达特执政后，对纳赛尔的“一边倒”政策进行修订，逐步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开始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萨达特认为，美国是以色列的后盾，只有它才能对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他认为，为了和苏联在中东争夺，美国也竭力想把埃及纳入美国阵营，因此美对埃及有所求。十月战争后，美国在中东异常活跃，特别对埃及以谈判所持的积极态度，使萨达特认识到，“中东和平的牌 99% 掌握在美国人手中”。萨达特非常明白，美国对埃及的积极态度，除了战略利益之外，还有直接的经济利益。美国资本需要打进埃及国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认为，埃及有所求于美国，也必须考虑一点美国的利益。为进一步加强埃美关系，萨达特放宽了对西方投资的政策。埃及媾和以后，虽然阿拉伯国家对埃及实行经济制裁，但美国给了埃及大笔赠款和私人投资，这使得埃及经济仍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这反过来又加强了萨达特利用外资的信念。

外资大规模进入国内市场，会不会重蹈历史覆辙？萨达特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萨达特认为，埃及近现代史上之所以由外资大规模入侵最终导致沦为殖民地，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埃及政治的软弱。现已今非昔比，七月革命以来，埃及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独立的主权国家。十月战争，萨达特因维护民族权益而享有盛誉。他认为，埃及民族主义是他行动的出发点。因此，他认为他完全有能力利用西方资本而不被其所束缚。

萨达特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立法措施以吸引和利用外资。1971 年制订了《关于阿拉伯及外国投资和自由区》的 65 号法，对外资提供一定的优惠条件：保证对外资不实行国有化和进行管制，五年之内免去商业及工业利润税，有权将利润汇往国外等。为进一步吸引外资，1974 年 4 月，萨达特正式宣布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同年公布的“十月文件”中指出：“门户开放和自由化政策规定更广泛地利用阿拉伯和外国资本的可能性。”为此，埃及政府颁布 43 号法，即新的《关于阿拉伯及外国投资和自由区法》，放宽了外资活动范围；允许外资对所有经济部门投资；外国投资公司及其职员不受调整国有部分活动的法律和规定的限制；有进口自由；外资企业投产的头五年免去所得税；允许将利润汇往国外；保证对外资不进行国有化等。1977 年 5 月，国民议会再次通过了 1974 年法的修正案，对外资投资进一步完善。

萨达特时期，尤其是十月战争后，埃及利用外资取得显著成果。首先是外国对埃及借贷款较前增长。1974~1979 年借贷款总数为 165 亿美元，其中西方国家提供 75%，达 123 亿美元；其余 42 亿是阿拉伯国家提供的。其次是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援助加强，在埃及建立投资公司，直接投资于埃及基础建设项目。1977 年 12 月，阿拉伯与西方资本和自由区总组织批准了 744 项草案，总数额 30 亿埃镑（43 亿美元）。主要项目有扩大苏伊士运河工程、石油勘探和开采、旅游设施等，阿拉伯投资公司提供资本，吸收大量埃

及劳动力。1978年在埃及建设项目中投资的阿拉伯私人资本就占外国投资总额的24%。

埃及利用外资取得成果最大的是石油工业和旅游业。埃及石油工业从1973年，特别是实施“门户开放”政策以来，得到迅猛发展。1974年前只有三个外国公司参加勘探工程，至1979年就达到23家。埃及和这些国家的外国石油公司签订了51个协定。从1973年到1979年，埃及用于石油勘探的数额达8.3亿美元，这其中外资占主导地位。埃及原油产量飞速增长。从1974年到1978年产量增加了1.5倍，埃及从一个石油进口国一跃而成为石油出口国。1978年石油收入达7.04亿美元，成为埃及的国民经济支柱之旅游业也得到突出发展。萨达特时期，埃及与阿拉伯国家、美、英、法和其它国家的公司签订协议的数额达10亿美元。在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等城市建设旅游设施，在金字塔区建设宾馆、旅馆等旅游综合体。旅游设施的改善，使本有富足旅游资源的埃及如虎添翼，旅游收入大增，至70年代末，已达7亿美元，成为埃及经济的又一支柱。

此外，借助外资，埃及还建设了一系列其它经济基础设施，如电力系统的改造、新建，扩大亚历山大港，建设水利灌溉工程，修筑铁路和发展水运等。

萨达特大规模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建设，虽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还是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埃及经济摆脱了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困难，国民经济有了较快发展。1967~1973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3.5%。1974年后增长率逐步提高，到1979年达8%~9%。1980年，国民平均收入达460美元，世界银行已将埃及从低收入国家划为中等收入国家。这其中外资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九、以私有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如何对旧的经济体制实行改造，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取得民族独立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实行国有化，成为二战后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措施。埃及在七月革命后，也实行了一系列国有化法令。它在给埃及国民经济打下坚实基础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严峻问题。萨达特执政后，对纳赛尔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修正。主张各种经济成份并存，尤其是提倡私有经济的发展。

萨达特认为，埃及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必须发展多种经济所有制。埃及是个古老的国家，但近代以来全面衰落，沦为西方殖民者、帝国主义事实上的殖民地。西方奴役者对埃及进行了残酷掠夺，埃及经济畸形发展。棉花几乎成为唯一可供出口、换外汇的产品，工业基础薄弱，所建的工业机构几乎全是为殖民者利益所服务的附属机构。夕卜国资本家和国内统治阶级大发横财，而广大人民却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到七月革命时，埃及几乎没有几家象样的民族工业，更谈不上基本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纳赛尔时期，埃及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埃及的经济落后面貌，埃及依；日处于生产力落后、经济困难重重的局面。面对这一基本国情，萨达特认为，必须发展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但是不能忽视私有经济，私有经济可作为国有经济的有效补充。

萨达特认为，鼓励私有经济发展，有助于迅速恢复长期阿以战争对埃及所造成的经济创伤。1948年以来，埃及与以色列一直处于战争次态，它极大地摧残了埃及经济的发展。从已勒斯但战争到十月战争，埃及损兵折将数万，丢失富有战略意义、资源丰富的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两度关闭，埃及经济处于战争的重压之下。军费支出一直高居不下，国内通货膨胀，财政拮据。尤为严重的是，战争打破了埃及经济的常规发展计划。如 1964/65 ~ 1969/70 的二五计划直至 1966 年尚未制定出来，1973 ~ 1982 年的发展远景规划因资金缺乏，不能按两个五年阶段进行，而只能采取逐年计划投资的办法。但由于十月战争，使该规划的实施中途搁浅，计划的任务和期限不断修订。为尽快恢复满目疮痍的经济，埃及迫切需要筹集资金。萨达特认为，在寻求外援的同时，必须注意从国内发掘经济潜力。面对战争对国民经济规划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萨达特认为，私有经济的发展可适当弥补国有经济发展不力的缺陷。

国有经济发展的缺陷，已引起资产阶级的不满。萨达特认为，必须对资产阶级作出一定让步。纳赛尔时期，依照苏联模式，大力推行经济国有化。到六十年代末期，埃及所有银行、保险公司、全部进口和 90% 以上的出口贸易、大建筑承包公司和交通运输等大中企业基本上都转归国家管理和控制。国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1967 年，工业领域的国营企业占埃及主要部门总生产的 74.6%。1967 ~ 1972 年，国有部分在工业生产中的份额增加到 76.9%。纳赛尔时期埃及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是限制外资（主要是西方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发展。虽然宪法规定存在国营、私营和个体经济三种所有制，但实际上，政府采取了加强国有经济作用，过渡到集中计划，广泛开展向外国垄断资本和大的民族资本进攻，限制并排挤大资产阶级和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对私人资本从立法上加以限制，同时将私人资本的部分利润用到国家经济发展上去的措施。这一系列措施，引起资产阶级的不满，特别是 1967 年

“六·五”俄争后，由于战争导致经济恶化，加之战争的惨败给了阿拉伯人带来的民族耻辱，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日趋强烈，已严重影响到埃及国内政局的稳定。面对这一危局，纳赛尔于1968年宣布实施经济改革，对私人资本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但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依旧未消除。萨达特执政后，认为必须进一步扩大私有经济，减缓资产阶级对政府的压力。

在萨达特看来，实行私有经济是和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密切相联的。为加速恢复埃及经济，1974年4月，埃及政府正式宣布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目的是广泛吸引外资（主要是西方资本）。为大规模利用外资，埃及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其核心是保护外资的私有权利。另一方面，外国资本在埃及国内投资时，除独资外，还和国有、私有经济合营，这就使得不可能对同一企业的外资、国有、私有经济采取不同政策。如若采取不同政策，会引起外资对埃及国内政策的忧虑。此外，利用外资，本身就是私有经济。因此，萨达特认为，鼓励利用外资，就是鼓励私有经济发展。

1973年十月战争后，萨达特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私有经济发展的措施。对待私人资本，1974年公布的“十月文件”强调指出：

“私有部分应在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应给私有部分提供更多的条件，并鼓励私营企业的活动。”1975年颁布法令，扩大私有部分在外贸中的权利。该法令允许私人 and 私营公司经营某些种类的进口业务，如交通工具、建筑材料、电视、电冰箱等。1976年初通过一项决议，确定对私有部分和国有部分的某些商品实行统一关税，1976年8月，颁布《关于以外币进行业务的条例》（即97号法令），规定采取埃镑对其它货币的“浮动价格”。这实际上意味着国家在外贸和外汇业务领域的垄断已被打破，埃及私人资本在这两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自由。此外，私有经济的发展也触及国有部分。1975年通过了关于出售国营企业的部分股份给私人的法案。1977年底又通过新法案，允许出售给私人49%的国营公司股份。在经济机制方面，埃及政府取消了经济管理的总组织，建立起经济各部门的最高计划委员会，私方也有其代表。在国营公司管理委员会中，也允许有私有部分一定数目的专家。

萨达特政府推行的一系列鼓励私有经济发展的措施，使私有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首先，私有部分在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1974~1977年，在基本建设总投资中，私有部分从4.3%增加到13.2%。工业领域的私有企业迅速增加。1972年给私人企业家发放建设工业企业许可证280个，金额690万埃镑；到1974年上升为358个许可证，1910万埃镑；1975年已达到740个许可证。每一个许可证平均金额1972年为2.5万埃镑，1974年则翻了一番多，达到5.3万埃镑，其次，埃及私人资本与外资，甚至与国有资本的合营的趋势加强。仅在1976年工业部就批准了175个埃及私人资本与外资合办的项目，总投资金额达2.25亿埃镑。其中的铝制品厂就是由埃及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和外资三方参加合建的。政府鼓励建立公私合营公司，如在苏伊士的水泥厂，建设资金为1600万埃镑，私人股份达1/4。

萨达特时期埃及经济的恢复发展，私有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它适应了埃及生产力落后的基本国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纳赛尔时期否定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对埃及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虽然，萨达特政府在鼓励私有经济方面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对私有经济的强有力引导，并不能由此否定提倡私有经济发展的政策方向。穆巴拉克总统上任后，继续鼓励私有经济发展，这就是明证。

伊扎克·拉宾谋略

伊扎克·拉宾是以色列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1922年3月1日生于耶路撒冷。自1940年开始了长达27年之久的戎马生涯，历任北部军区司令、总参作战部长、总参谋长等职，指挥了第三次中东战争。退役后，曾任驻美大使、劳工部长。1974年又跃升为总理，1977年下野。1984~1990年参加民族联合政府，任国防部长，提出分阶段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提案，成为以色列解决阿以问题的基本准则。1992年6月再度出任总理，大力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终于取得历史性突破，以巴、以约先后达成和平协议，以叙和谈也进入实质性阶段。1994年荣获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1995年11月4日在一次盛大和平集会上遇刺身亡。

一、有志方能有为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必是有志之人。拿破仑所讲的“不想当元帅的兵士不是好士兵”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只有树雄心，立壮志，加上个人的勤奋、努力，才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拉宾的一生，无时不体现出他那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精神，同时也表现出有志者的宽广胸怀。

历史上，犹太民族屡遭驱逐或屠戮，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园。饱经沧桑的犹太有识之士终于提出了“建立犹太国的呼声”，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由此诞生了。犹太复国运动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1939年得到英国支持。尽管英国、美国都在利用犹太人巩固和扩大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但在客观上却又加速了犹太复国运动的发展。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疯狂屠杀犹太人，而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也表明他们无力，也不愿意保护犹太人。犹太人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同化的幻想彻底破灭，更坚定了他们复国的决心。他们在犹太复国主义政党领导下，奔赴巴勒斯坦，建立起自治机构和保卫组织，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在巴勒斯坦实际上已形成了犹太国的雏形。

环境造就人才。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1922年3月1日，拉宾生于耶路撒冷。拉宾的父母都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为了民族大业来到巴勒斯坦，许多以色列高层领导人，包括本-古里安和梅厄夫人都熟悉拉宾的父母。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拉宾的父母把特拉维夫的家都贡献了出来。每天，来自各阶层的工党积极分子总是在那里讨论或争论到夜深人静。这里如同一个政治沙龙。由于父母热衷于政治活动，家境又贫寒，拉宾从小就学会做家务，懂得勤俭朴素，奋发自立。在客人慷慨激昂地发表高见之际，拉宾耳濡目染，犹太民族的苦难更深深地印在脑海中。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更是在他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拉宾在一所离家很远的工人子弟小学寄读，接受严格的集体生活教育。在当地上了两年初中后，为了学得一技之长，将来报效自己的国家，他报考了北加利利地区的卡多里农业学校。在农校，拉宾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积极参加各种劳动和公益活动，培养了集体责任感。一年级结束时，他成为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不幸的是，这时他的母亲溘然病逝，他更加成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立志像母亲一样成为对民族有用的人才。

毕业时，他成为名列前茅的受奖生。英国高级专员亲手向他颁发了毕业证书，还给了他一笔7.5英镑“农具资金”。但更重要的是，校方多方奔走为他争取到一个赴伯克利大学攻读水利工程专业的奖学金名额，这使他能够成为一个年轻有为的工程师。这是一个诱人的前景，同学和老师们纷纷向他祝贺，他却陷入了沉思。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要关头，纳粹德国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去深造吗？确实机会难得，但建国大业谁来干呢？他眼前又浮现出从美国登船向巴勒斯坦进发的父亲的身影，想起了为建国而累垮了的母亲。拉宾下定了决心，决不在这关键时刻离开家乡，离开亲友！他毅然放弃了深造的机会，加入了集体农庄。他梦想着，形势一旦好转便继续读书，但此后他又有好几次因为类似的原因与求学深造的机会擦肩而过，梦想终未成真。而他后来的经历证明，这是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

集体农庄汇集了一批有共同理想的青年。拉宾全身心投入到社会实践活动中。然而，发挥他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生活突然中断了。伊休夫（犹太人社团）拥有秘密武装力量——哈加纳。哈加纳的主要任务是自卫和联防。当

时伊休夫与英国当局打交道的机构是“犹太人代办处”，它与英国当局的关系时好时坏，反复无常。二战爆发后，德军在北非连连得手，在此情况下，犹太人代办处决定从哈加纳组织处抽调一批人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常备部队“帕尔马契”，即突击队。当一位哈加纳指挥官问拉宾是否愿意参加帕尔马契时，拉宾毫不犹豫地点了头。拉宾成为帕尔马契的第一批成员。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拉宾的远大抱负在从军之后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拉宾从军 27 年，历任国防军训练部长、北部军区司令，总参作战部长、总参谋长等职，指挥了第三次中东战争，为以色列立下了赫赫战功，被誉为以色列的民族英雄。由此他也获得了人民的信赖和尊敬，并为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期的阿以对抗，使以色列人形成了深深的不安全感，以色列人对军人出身的政治家因此有着特殊的信任感，尤其对战争英雄更是如此。当拉宾 42 岁出任总参谋长时，由一名普通士兵升为军队最高长官，仅用了 23 年时间，拉宾的杰出军事才能由此可见一斑。

拉宾退役后，出任驻美大使。他决心为加强以美关系并从美国争取到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为以色列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做出贡献。尤其是谋求以美步调一致，使以色列在国际上有一个坚强的后盾。事实说明了他的外交成就斐然。他为以色列争取到大量先进武器和巨额贷款，对当时以色列内外交困的局面确实解了燃眉之急。随后，拉宾又跃升为总理。对外他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因此，从美国那里得到一系列的承诺和保证。同时，他也注意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恢复了同埃及的谈判，与埃及签署了第二个西奈协议，从而为 1978 年 9 月贝京总理与萨达特总统签订戴维营协议打下了基础。对内则努力发展以色列经济，致力于加强军事实力和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由于工党积重难返，拉宾下台后直至 1992 年一直处于在野地位。在利库德集团和工党组成的“全国团结内阁”中，拉宾出任国防部长，其余时间则作为工党议员，一直活跃在以色列议会中。

1992 年，由于拉宾坚定的中东和平政策顺乎民心，适应国际潮流，拉宾取代以强硬手段对付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米尔，再度出任总理。上任后，他勇敢地面对现实，大刀阔斧地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使阿以和谈终于取得实质性进展。已以、约以实现和平，叙以也进入实质性阶段。这是他一生中的最伟大之处，他做了其他人不敢做的事情，由此得到了世人的尊敬。

综观拉宾的一生，他的才能的发挥及对以色列人、对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都源于他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忠诚，源于他有志于做一个对民族有用的人。

也正因为拉宾的远大抱负，他也常常显示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可以说，一个对民族、国家漠不关心的人，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也很难有宽阔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

1984 年，当工党与利库德集团激烈争夺领导权时，为了使工党能够东山再起，重掌政权，为了使工党上下团结，一致对外，拉宾主动退出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让佩雷斯居于竞选名单的首位，显示了工党的团结，终使工党联盟获胜。同样的情况又发生在 1992 年，工党在议员候选人的选举中，拉宾要求党员投他的竞争对手佩雷斯的票，不但表现出政治家的宽宏大度，而且也显示了党内的空前团结，极大地改善了工党的公众形象。

拉宾的博大胸怀还表现在他“择人而任势”，不计个人好恶，重用“战神”沙龙。阿里尔·沙龙身经百战，多次负伤，为以色列屡建战功。但是他无视纪律、命令，桀骜不驯的个性和他不顾一切、横冲直撞、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战斗风格，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批评他“行为过火”、“不懂政治”，致使他仕途坎坷。尽管拉宾也挨过沙龙的骂，但拉宾没跟他计较，因为他爱惜这个将才。1975年6月，拉宾不顾他人的反对，坚持任命一度被冷落的沙龙为国家安全顾问。

二、刚柔兼济因势制胜

“善战者，求之于势。”指挥作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固然极为可贵，一味硬拼却不足取。优秀的指挥官，应当做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准确判断战场情势的发展变化，根据自身实力，及时调整作战方式，“因势利导”，才能变被动力主动，创造性地完成作战任务。因此“刚柔兼济”最为可贵。

由于以色列独特的历史、国情，同其他著名领导人一样，拉宾的崛起也始自军事道路。他首次参加军事行动，就身先士卒，冲锋在前。1941年6月7日，拉宾第一次率领行动小组执行任务，具体工作是潜入到黎巴嫩境内，割断敌军的电话线。夜深了，一路急行军的拉宾小组到达了黎巴嫩境内的指定地点。拉宾年龄最小，但最艰巨的任务落在了他的头上。他负责爬上电线竿割断电话线。爬竿儿的铁齿蹬子下午才送到，根本没时间练习使用，只能光着脚往上爬。事不宜迟，他一咬牙，噌噌几下便爬了上去，接着掏出钳子剪断电线。这时，他觉得身子一歪，“咕呼”一声摔到地上，爬起来一看才明白，原来电线竿插得很浅，主要靠电线拉着才立在那里。军情紧急，事不宜迟，拉宾一跃又上了第二根电线竿……任务圆满完成了。从那时起，拉宾就成为帕尔马契部队的一名成员了。

帕尔马契的成立原为抵御德国军队的进攻。随着二战形势变化，德军眼看打不过来了，为了与英国当局搞好关系，也为节省一些开支，全脱产的帕尔马契被分散到各基布兹中去，变为半脱产的部队，一半时间习武一半时间劳动。帕尔马契都是最优秀的哈加纳战士，许多人不愿干农活，穿上英军服装去了欧洲战场。这种离队现象到二战末期尤为严重，因为许多人得到亲友死于纳粹集中营的消息后更是按捺不住。但拉宾没走，他不是贪生怕死，而是本能地预感到必须保住帕尔马契的组织不要散掉，因为它是唯一的一支可依靠的犹太武装，更何况这一时期还有许多更艰巨的任务。以后的形势发展便证实了他的预感。

1945年帕尔马契以营的建制扩大了规模，他被提升为第一营的训导主任。这年10月，拉宾负责执行代号为“连接战役”的行动，把关在海法市以南的阿色里特集中营里大约200名犹太移民解救出来。拉宾认真分析了情况，认为这次行动有一定难度。第一，行动不能以硬打强攻的方式进行，因为移民中有不少老弱病残，为避免伤亡不宜进行激烈的交火，也要避免与英国当局处于正面冲突状态。第二，集中营里主要守备力量是阿拉伯辅助警察，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开枪。为此，拉宾精心制订了一个里应外合的作战方案，派一些战士伪装成“教师”混入集中营作内应，并挑出200名最优秀的战士组成突击队。

漆黑的深夜，拉宾带领突击队逼近集中营。几位“教师”已偷偷敲断了卫兵的撞针，使突击队员在无声无息中控制了局势，移民们在“教师”的指挥下悄然无声地向外移动着。负责接应的车只来得及拉走一半移民，剩下的另一半因为行动迟缓，还在半路上。由于事出意外，拉宾临时决定这批移民由他设法带到海法附近的拜特·奥兰基布兹，但这些人已走不动了，拉宾遂下令战士们扛起孩子拖起大人往山上爬，直到天大亮，才把这批人藏到山顶的一片树林里。这时，英军已追上来并包围了山顶的拜特·奥兰基布兹，仅有两个口子还没有堵严。拉宾当机立断，指挥移民从缺口进入基布兹，迅速疏散开并藏好了武器。数以千计的犹太人也从海法赶到山顶，双方剑拔弩张，

互不相让。移民们趁机消失在人海中，英军只得撤回去。“连接战役”是拉宾“因势利导”方针的胜利。事先的周密计划和临敌对的审时度势、机智灵活、当机立断是这次行动成功的根本原因。

随后的打通“生命线”战役，是拉宾“刚柔兼济”、随机应变战术的又一次胜利。他另辟蹊径，不仅达到了作战目的，还避免了“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局面，保存了战斗力。

1947年11月底联大通过了分治决议后，阿拉伯武装人员便开始围困耶路撒冷市的犹太人。于是，阿、犹双方一场围困与解困的战斗逐渐拉开。这便是以色列历史上的独立战争即第一次中东战争。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大约有60万，集中在那路撒冷的就有10万人，而那市犹太人主要集中在新城，住在老城的仅有2500人左右。阿拉伯武装首先想拿下老城犹太区，进而占领全城。一旦那路撒冷这座宗教意义上的圣城被阿拉伯武装攻占，对犹太人心理上的打击将是难以承受的，于是这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战斗便在这里打响了。拉宾敏锐地意识到所承受的压力，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分析，他认为这个仗很难打。第一，联大决议规定了那路撒冷的国际飞地特性，伊休夫领导人因急于立国便接受了这一决议，因而犹太人不好抢占那市。掌握主动，这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反之，由于阿拉伯人不接受这个决议就可以抢先下手。第二，耶路撒冷市内尚驻有英军，这些明显亲阿仇犹的英军要拖到1948年5月14日才撤走。犹太武装显然不能和英军对垒，伊休夫领导人也不想过分与英对抗。第三，犹太人主要集中在西部沿海平原和北部加利利地区，耶路撒冷区犹如阿拉伯人大海中的孤岛，在地理上阿拉伯人占有围点打援的战术优势。耶路撒冷10万犹太人所需的食物、饮水、武器、弹药和人员等补给，几乎全靠长约70公里的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运输，阿、犹双方都深知这一“生命线”的重要性。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能否坚持、能坚持多久取决于“生命线”是否畅通。但从1947年11月底起，阿拉伯武装抢先卡断了这条交通线。哈加纳司令部把这一极其艰巨的任务交给拉宾去完成。

整条交通线基本上在阿拉伯居民区里穿行，而且有两处路段地形酷似“瓶颈”，极为险要。一处是拉特隆地段，车到这里便曲折爬坡，车速骤减。另一处为阿雅隆山谷的出口，公路变得非常狭窄，车辆仅能紧擦着山壁慢行，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目睹此状，拉宾一方面尽可能地亲自参加护送行动以提高士气，同时又开动脑筋找到钢板焊制土造“装甲汽车”，保护司机和战士。但这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时，本-古里安得到英国人准备提前撤出那路撒冷的情报，于是他下令拉宾旅随车队至那市抢夺地盘。拉宾审时度势，判断英国人根本不可能提前撤走。虽然拉宾的意见并没得到采纳，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准确的。拉宾的处境很艰难，部队已极为疲惫，需要休整。他顶住了上司的压力，放弃了死打硬拼的战术并将进攻时间推迟以便捕捉更佳战机。深入侦察后，他发现了一条可绕过特拉隆的便道。经过努力，他打通了这条交通线，避免了更多的流血，保存了部队战斗力。在第一次停火生效期间，拉宾又组织力量开辟了另一条通向耶路撒冷的“缅甸路”，基本上解决了补给供应问题。拉宾认为，只要达到了作战目的，能够避免更多的流血，尤其是在敌众我寡，敌占有利地势而我处不利地位的情况下，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作战目的决不在于攻克敌人的一块阵地。

特殊的“战斗”同样体现出拉宾的勇敢、机智灵活的作战精神。在以军作战史上，还有一次没有枪炮声的战斗，它被称为“转运营之战”。那是拉

拉宾任总参谋作战部长不久所指挥的另一场“战争”。当时，穆斯林国家的大批犹太移民向以色列涌来。这些移民既没有资金也无技术，但都幻想着一夜之间过上富足的生活，若不如意便怨气冲天。以色列建国伊始，经济困难，无法妥善安置这批移民，他们只能暂时栖居在等候安置的帐篷营地里。政府把安置新移民的工作交给了拉宾，任务是改善转运营的各方面条件，维护社会秩序，向移民们提供医疗、教育、生活上的服务等。时值1950年末1951年初的冬季，罕见的暴风雨和大风雪刮倒了无数帐篷，洪水也蔓延过来。拉宾亲率附近驻军官兵迅速前往营地。在恶劣的天气中，拉宾率先脱下军服给移民披上。官兵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脱下军装披在移民身上。很快，帐篷也树起来了，移民们又有了温暖的家。官兵们的行动使得移民们感到了依靠集体力量的重大意义，从而培养了他们的艰苦奋斗精神。拉宾的出色表现获得一致好评，本-古里安深情地称颂救助的官兵们为“民族的使者”。

“实践出真知”，多年的战地指挥生涯使拉宾对以色列的国防尤其是军备配置形成了独特的见解。以色列国土狭小，兵源不足，强敌环伺。据此，以“因势制胜”的原则结合以色列的国情，其最佳战术便是“先发制人的预防战”。这就需要以色列拥有最先进的武器和战争的预见性、主动性，拉宾比其他军政领导人更早地看到了这一点。

苏伊士运河战后，苏联东欧集团向埃、叙等国提供大量的重型武器和经济援助，使其军力大增。相形之下，当时以色列没有大国的可靠援助，武器的主要供应者是法国。拉宾感到前景很不乐观，一是法国并不可靠，把以色列的安危完全押在法国身上是危险的；二是法国武器的性能不能与苏制武器相比。拉宾力主从美国获得先进武器。为此，他不惜越级求见本-古里安，强烈要求打破“美国的封锁”，尤其是获得由先进雷达站组成的早期预警系统等先进武器。后来果然搞到了早期预警系统。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开端，它极大地提高了以军的主动性，为以色列军队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三、先打主敌的闪电战术

所谓“闪电”战术，就是选择最恰当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打垮敌人，掌握战争之主导权。一次闪电战的成功，往往意味着一场战争的胜利。古往今来，历代兵家都把“兵贵神速”奉若至宝。拉宾以以色列总参谋长身份所指挥的以少胜多的“六天战争”即是世界战史上实施“闪电战术”的成功典范。“选准敌人，先打击对己威胁最大的敌人”亦是拉宾在此次战争中视以色列国情而采用的又一成功战术。

进入1967年以后，中东局势日趋恶化。以色列以打击巴勒斯坦的武装力量为由，对约旦和叙利亚采取了数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4月7日，以色列飞机在叙利亚上空击落6架米格-21飞机，并侵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上空，以叙边界形势骤然紧张，与叙有共同防御协定的埃及随之作出反应，埃军进入埃的前沿阵地，接管联合国军队驻防地域，并封锁蒂朗海峡。一场中东战争已不可避免。

拉宾身为以军“总司令”——总参谋长，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以色列处于被动的军事地位，国土小，无战略纵深；人口少，兵源不足；资源贫乏，综合国力有限。更何况它被众多的阿拉伯国家包围着，犹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虽说打与不打的问题应由内阁决定，但内阁的决定应根据他的汇报和建议而定。如果不打或静观，时间拖久了，对以色列就很不利，一则丧失战机，二则长期动员后备役会把国家拖垮。若打，必须速战速决，几天之内就得解决问题。万一失败或陷入持久战，那将成为千古罪人。在以色列内阁尚犹豫不决时，拉宾勇敢地挑起了国家安危和民族兴亡的重担。

决心既下，紧锣密鼓的战争准备工作随之展开。以军虽然兵力有限，但它空中力量强于阿拉伯国家，机动性能好，有不停顿作战的传统，常常能够发挥有限兵力的最大威力。根据这个特点，拉宾与国防部长达扬、总参作战部长魏兹曼密切配合，集思广益，共同完成了布置周密详细的“闪电”进攻计划。拉宾信心十足地分析着以军的优势和敌人的劣势，对克敌制胜深信不疑。按计划，以军倾巢出动，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先集中重兵痛击南面的埃军，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打垮它并夺占尽可能多的地盘。排在第二位的打击对象是东面的约旦，目标是夺占整个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东北面的叙利亚放在最后，最好能清除叙军的炮击威胁。同时，海军打破对蒂朗海峡的封锁。其首要的前提是圆满地完成初步的空中进攻，成败取决于迅速摧毁对己威胁最大的主敌埃及的控制权。“以色列最好的防御，在开罗上空。”

在拉宾的强烈要求下，以色列很快又从美国搞到了“空中之鹰”战斗机，约250辆A-20和A-1型坦克、坦克引擎备件及150毫米口径的大炮等重型武器装备，以军的突袭打击能力更强了。决战前夕，拉宾对参战部队工作进行了视察。他满意地发现一切准备都已就绪，部队士气极其旺盛，拉宾信心更足了。内阁对进攻计划也批准了。为了慎重，他与达扬把所有计划细节又过了一遍，并根据两周侦察所摸到的埃及空军活动规律，制定了具体进攻的时间。

1967年6月5日7点45分，以色列倾巢出动空军所有200架飞机的188架，分批向埃及进发。之所以要选择这一时机发动进攻，是因为此时埃及的空防最薄弱，他们的晨班巡逻机正返航加油，而接班的飞机尚未起飞。在3

个小时内，以色列飞机共 17 批，以每次不到 10 分钟的时隔起飞，川流不息地开往开罗、苏伊士运河附近和西奈半岛的 19 个埃及机场以及萨姆—2 型导弹基地进行猛袭，一批又一批地投下专门用来作低空攻击的爆炸力巨大的炸弹。在可以立即起飞作战的约 340 架埃及战机中，有 300 架来不及起飞就在停机坪或滑行道口被炸毁了；飞机跑道受到很大的破坏，少数尚能使用的飞机也无法起飞。被视为以色列主要威胁的巨大的埃及空军就这样被打跨了。无数的导弹基地和雷达站也随之被摧毁了。

这段时间内，拉宾在空军司令部和总参“掩体”之间来回奔走，为的是能同时了解空军和装甲兵的进展状况。空袭捷报传来，拉宾当机立断，趁其它阿拉伯国家还没反应过来，立即对约旦的 2 个机场和叙利亚的 5 个机场进行了毁灭性轰炸。类似的战况再次发生了。埃、叙、约三国空军在同一天内几乎完全被摧毁了。

以色列最大和最具决定性的胜利，是在西奈沙漠中取得的。在夺取了绝对制空权后，以坦克和装甲车为骨干力量的以色列 3 个师的特遣地面部队同时越过埃以停战线，在北、中、南三条战线上对加沙和整个西奈半岛的埃及守军发动快速进攻，在空军的辅助下，以军歼灭了埃及主力部队。与此同时，以色列伞兵和海军配合，迅速占领半岛南端的沙姆沙伊赫，打通了亚喀巴湾，解除了对蒂朗海峡的封锁。

东线以军在整个西岸地区与约军展开激战。在这场激战中，拉宾平时组织的空、甲协同演练显示出效果，飞行员和坦克车手相互掩护，齐头并进。以军战机对约军的装甲和坦克部队进行了猛烈轰炸，确保了以军坦克能先敌爬上争夺的制高点，可以说，没有以军的空中绝对优势，南线和东线地面战斗的结果很难预料，这充分说明了这场战争中以军战略战术的正确性。闪电战取得了辉煌战果。

在打败主要敌人埃及并掌握制空权之后，剩下来的战斗就相对容易多了。以军争分夺秒，先是在 7 日夜全部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并不顾安理会停火决议，于 9 日向叙利亚发动了全线进攻，并攻占军事重地戈兰高地。

这次战争史称第三次中东战争。它于 6 月 5 日爆发，10 日结束，历时 6 天，以色列人颇为这场六天时间就连克数敌的战争感到自豪，于是把这场战争定名为“六天战争”。身为总参谋长的拉宾一下轰动了世界，被以色列人视为“六天战争”的英雄。拉宾的表现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他由此在军界声名鹊起。

以色列这次胜利可谓以少胜多，战果辉煌：在埃及、约旦、叙利亚三条战线上，以军共占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城的的旦管辖区、加沙地带、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共达 6.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相当于战前本土的近 4 倍，极大地改善了它们战略地位，阿拉伯国家阵亡 4296 人，伤 6121 人，7550 人被俘，包括 9 名将军；损失坦克 965 辆，飞机 444 架。以色列方面仅 983 人死于战场，4517 人受伤，损失坦克 394 辆，飞机 40 架。

短短的 6 天时间，以色列在三条战线上，同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部队作战，以一次罕见的闪电战，获得了“辉煌和决定性的胜利”。对此，英国中东问题著名评论家理查德·艾伦说：“这种惊人迅速而彻底的胜利，在严格的字义上已是一种闪电战了——的确，在历史上第一次发明这一词的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成功地预期达到那么迅速而彻底地击败敌人，以便结束战争。而以色列人现在却做到了这一点。”一语道破天机，“闪

电战术”就是以色列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作为这一战术的制定者和直接指挥者，拉宾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

“六天战争”影响深远，它摧毁了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力量及自信心，大大增加了迫使阿拉伯国家缔和的筹码。在犹太人当时看来，这场战争是“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拉宾在以色列人心目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以色列人为他欢呼。战争结束后不到3个星期，拉宾代表全体将士接受了耶路撒冷大学名誉博士的学位，这是该校全体师生对以军收复校园所在地斯克普斯山感谢的表示。以色列电台现场转播了这位战争英雄的即兴讲演。

四、用铁拳回击恐怖主义

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子说：“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意思是说，所以作战方式灵活到了极点，就可以做到不露一点形迹。要真正达到这种“用兵如神”的境界，离不开两个关键要素：一是知己知彼；二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才能将看起来似乎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拉宾于 1974 年出任以色列总理后，国际恐怖组织对以色列采取了“以人质换同志”的新策略，即用劫持到手的以色列人质去交换他们被关押在各国监狱里的成员，以色列政府对此很感头痛。以色列自称是“被抛弃的民族”，它的立国原则是：被抛弃的民族绝不再抛弃本民族的任何一个人。以色列公众不能容忍对被扣人质置之不理的情况，就是埋葬在异国他乡的死者遗骸也必须弄回来，即使是用那些被俘的间谍或将军换回以军阵亡士兵的尸体也罢。军人出身的拉宾在这种问题上历来都待强硬态度，力主用武力解决问题。他认为，被迫答应与恐怖分子谈判，满足他们的要求换回人质是下策，因为这客观上鼓励了恐怖活动，只能导致越来越被动的后果；若通过国际组织或有影响的人物从中斡旋，和平解决，不过是中策；以武力威慑，迫使劫持者投降或救回人质并消灭恐怖分子，用恐怖手段去反恐怖才是上策。因此，当在以色列国内一出现劫机事件，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派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去解决问题。要是这种事件发生在国外，则要慎重些，应区别对待。如果劫机事件发生在友好国家，就会敦促那个国家仿效以色列的方式用武力解决。如果发生在不友好国家，拉宾的第一考虑就是以恐怖手段反恐怖。只有在绝无动武可能性的情况下才考虑与劫机分子进行谈判，这也是迫不得已。

1976 年 6 月 27 日，不幸的事件再次发生了。一批恐怖分子将满载 230 名乘客的一架法航“空中客车”劫持到利比亚，在班加亚机场降落加油后，飞机又飞往乌于达的恩德培机场。随后劫持者将 230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扣押在恩德培机场的候机大厅，其中包括 83 名以色列公民。很明显。这次劫机事件是冲着以色列来的。劫机者提出条件：以色列在限期内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 53 名巴勒斯坦人，这批人质就获释，否则处死人质。

劫机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拉宾总理迅速组成了一个自己领导下的以军方为主的应急班子，及时分析情报部门搜集到的情报，专门研究处理劫机事件的对策。凭直觉，拉宾认为这次劫机事件是瓦迪亚·哈达德博士领导的激进的巴勒斯坦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策划的，它与西德的巴德尔-麦因霍夫集团、北爱尔兰共和军和日本的赤军等恐怖组织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赎罪日战争后这些恐怖组织对以色列发起了联合攻势。情报很快证实了拉宾的判断。此前拉宾曾下令对以色列易受袭击的目标，尤其是飞机和候机厅采取“软贝雷帽”的防范措施，伪装为乘客的保安人员多次挫败恐怖分子劫持以色列飞机的企图。而外国航空公司拒绝这种防范措施。恐怖组织正是利用这一可乘之机劫持了法航的班机。

次日凌晨，以色列国家广播电台发表了劫机消息。以色列被劫持者的家属出于对亲人的关怀，反应非常强烈，他们向政府施加压力，只要亲人获释，任何条件都可答应。拉宾面临着公众的强大压力。他决定承担巨大风险，采取空中军事营救的办法。

但是，空中营救的难度非常大。乌于达位于非洲腰部，距以色列约有 4000

公里以上的距离，中间隔着埃及、苏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这些国家全是渴望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永远抹掉的，尤其是容留劫机恐怖分子的乌干达本身，就是个狂热的反犹国家。这个国家的现任总统阿明，深为自己领导的非洲“反犹太复国主义斗争”感到自豪。他曾不止一次地嘲笑那些在阿以战争中屡战屡败的阿拉伯将军“软弱无力”，并表示，迟早要让不知天高地厚的“犹太佬”尝尝他的“乌干达铁拳”。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突击队一旦踏上乌干达土地，所面临的对手将不仅是几个恐怖分子，而是一个国家和它的国防军，力量相差太悬殊了。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营救的飞机和飞机飞行路线的选择；营救人员的选择、训练和行动计划；寻找一辆与阿明总统一样的轿车和挑选一名酷似阿明的士兵等等，尤其是中途还需要降落加油补充飞机燃料。因为当时整个黑非洲都是反以的，整个行动过程不允许有一丝差错，否则将危及 83 名人质的安全，整个行动就会失败。

事关重大，内阁会议上部长们大多同意释放在押恐怖分子换回人质。拉宾顶住了内部压力，力排众议，坚决主张采用武力营救的方式。一方面同意通过法国与劫机者谈判，以争取更多的准备时间；一方面召开特别会议，审议了营救方案和各种准备工作，批准了营救计划。在拉宾的催促下，整个国家机器运转起来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对对方的情况了如指掌，采取针对措施才谈得上营救计划。以色列情报部门不辱使命，提供了乌干达军队和动机分子的详细情况：候机大厅外乌干达军队的部署及火力配备，候机大厅内人质的位置，劫机者使用的武器，活动的规律等。美国也发来了有关恩德培机场的情报：机场新旧跑道的长度、宽度、方向；机场油库的位置，候机大楼外观及内部布局；机场雷达种类、数量和“盲区”特点，民航班机进场要领等。而从以色列最精锐的作战部队中精选出来的突击队员的战斗素质是不容怀疑的，更何况他们在一秘密大型模拟训练场地进行了认真的训练。机场模型同真机场形状完全一致，精确得连一级台阶也不差。整个准备工作无可挑剔。肯尼亚政府也已答应为这次行动提供必要的协助，以色列的飞机在返程途中将在内罗毕机场加油。万事俱备，只待出发。

拉宾的分析是，在恐怖分子眼中，以色列武力营救计划毫无成功的可能。劫机者也认为，世界上还没有可以不加油就能飞行 8000 公里的飞机，并且在非洲大陆找不到同意为以色列飞机加油的国家。他们也不相信以色列敢于冒武力营救的风险，因为赎罪日战争后以色列人害怕再遭受人员伤亡。更何况以色列已同意谈判，他们深为自己能把以色列逼得走投无路而自豪，这也使他们放松了警惕性。拉宾自信地认为，营救计划表面上看来是没有理智的、疯狂的幻想，但恰恰这点，使计划成为可能，这场赌博式的冒险一定会成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拉宾最后下定了决心。

1976 年 7 月 4 日，四架大型运输机在战斗机的保护下，载着 280 名武装到牙齿的以色列军人出发了。他们跨越 4000 公里，去突袭一个国家，一个首都，一个机场。运输机徐徐降落在恩德培机场上，机上驶出的大型豪华轿车上坐着冒牌的阿明总统和司机，一道道岗哨畅通无阻，突击小组冲进了候机大厅，一声希伯来语“卧倒！”令所有以色列人质立即伏倒在地上，夹杂其中的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守军暴露在突击队员枪口面前。大厅外面的突击队员也消灭了乌干达守卫部队，控制了机场，封锁了机场的一切通道。突袭成功

了！

满载着胜利的机群临近以色列之际，被激动的播音员们鼓动起来的以色列人高兴得发狂。全国各地响起了犹太教士拉比在节日时才吹奏的羊角号声，整个以色列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拉宾带领着他的应急班子仁立在沙姆沙依赫空军基地的跑道旁，眼里涌出一层激动的泪水，他要亲自迎接凯旋而归的勇士们。同全体人民一样，拉宾心里充满了欣喜和骄傲。

教授行动的成功意义重大。政府用铁拳回击了恐怖主义的恐吓，奇迹般的胜利扫除了赎罪日战争以来的国内阴霾气氛，以军官兵重新抬起头来，极大地提高了政府威望。拉宾认为自己领导的这场斗争给以色列这个丧失斗志的肌体注射了一针催人奋进的肾上腺素。

拉宾指挥的这场战斗取决于过细的计划和严密的准备，大胆的冒险和成功的执行。美国国务卿黑格将军从一个军人的角度，对此发表了意味深长的“专业性”评论：“对乌于达的突击行动既是针对恐怖分子的，也是针对一个敌对国家的。这种袭击一旦成功，其后果将是极其致命的。因此，它的真正意义远不止于营救出被劫持的人质，而是对现代化战争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

五、处乱不惊 八方出击

当今世界，国际政坛上的纵横捭阖、折冲樽俎往往对一个国家的利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外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国与国之间没有硝烟的特殊战争。在形势瞬息万变、环境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上，外交家能够保持镇定自若，处乱不惊，攻守自如，并能争取多方支持是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因素之一。

六天战争后，拉宾的总参谋长一职的4年任期满了。他得谋求一个适合自己的职务，拉宾的密友们力促他去从政，但他拒绝了。他认为现在从政还为时过早，而大使工作却可以为将来的从政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既可为自己多积累政治经验，又可增加资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美国的作用在中东日益突出，但以美关系还很薄弱，须大力加强，应当有合适的人去任驻美大使以加深美以特殊关系，而自己的总参谋长的军事和政治背景有助于这项工作。在以往不断升迁的过程中，拉宾的卓越才能深得曾有旧缘的本-古里安的赏识。这位以色列国的创始人早就私下许诺让拉宾出任驻美大使这一重要而令人垂涎的职务。接替总理职务的艾希科尔兑现了本-古里安的诺言，任命拉宾为驻美大使，拉宾开始了为期5年的使命。

拉宾深知此行将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为此，他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行前，他与外长及外交部官员们进行了一系列会谈，主要是为了交换对美外交的看法，也多了解一些情况。在此基础上，拉宾给自己拟定了具体的对美外交目标：确保美国向以色列供应武器；谋求美对以的军事经济援助；与美国协调有关的中东政策；谋求美国运用其遏制力量防止苏联的军事干预。有了明确的目标，拉宾开始了有针对性的活动。

赴任伊始，拉宾没有展开过多的活动，他要以静制动。他打算从一些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了解美国内外政策的实质。通过了解，他认为美以关系主要取决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和美国的利益。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的对比显然不同于战后初期。作为超级大国之一的美国，由于二战后期推行全球扩张政策，特别是深陷越南战争不能自拔，其国力的鼎盛时期到六十年代末终于告一段落。巨额的战争费用，财政赤字的迅速扩大，对外贸易的由盛转衰，美元危机的频频发生，使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同时，苏联地位在国际上稳步上升。苏经济力量、军事力量飞速发展，在全球展开了与美的争夺。这一切，使美国日益感到苏联已成为“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美国遇到了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种挑战。鉴于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化和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衰落，为了保住霸权地位，美国的对外政策不能不有所调整。在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型时期，美以关系将向何处去？还有，越南战争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年复一年美国政府都向人民许愿要让他们的孩子回家过圣诞节，但人们见到的是用塑料裹尸袋运回的尸体，美国人对这个国家的强大和他们的政府已失去了信心，社会形势急剧动荡。美国社会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产生多大冲击？

拉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越战使美国获得了处理位于冲突地区的盟友关系的经验，从此美国肯定不会轻易跻身于冲突的旋涡中去拯救自己的盟友，因为陷进去就很难拔出来。苏联会大力利用美国的谨慎小心和孤立主义倾向对外扩张，美国的国际战略防线会有所收缩。美以关系处于前途莫测的

凶险之中。拉宾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就像当年指挥战争一样镇定自若，处乱不惊，他要多方活动，八方出击巩固发展美以特殊关系，达到预期目标。

拉宾首先从美国公众最关心的越南战争问题入手，加深同美国政府的感情。由于拉宾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战争英雄，许多美国人对他很感兴趣。他们很想了解拉宾是如何打仗的，为什么弹丸小国以色列能横扫阿拉伯数敌势如破竹，而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却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越南。拉宾很清楚自身的价值，也想很好的利用。一次，基辛格请他到办公室去进行咨询。事情是美军已摆好阵式准备迎击北越军队发起的一场攻势，基辛格要请他判断一下北越军队会向哪些地方发动进攻。拉宾的判断与在场的美国所有将军都不同，但是事后的情况证明拉宾是唯一精确预测北越军队突击方向的人。五角大楼的将军们更加佩服拉宾，每当国会要卡一卡军方那惊人的武器要求时，他们便毕恭毕敬地请拉宾出来支持军方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官员们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他的观点去和国会争预算款，理由是用美制武器与苏制武器打过仗的人都认为美国武器还应提高一个档次。拉宾几乎成了美方的顾问，享受到一般外国使节不曾享受的礼遇。拉宾被特许参观美国战略空军地下指挥部，并可以了解绝密的美国核潜艇的通讯系统，也乘“鬼怪式”飞机上天兜过风。如此一来，拉宾争取到了美国军方对以色列的支持，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以色列在要求美国武器援助时的阻力大大减少了。

拉宾四处活动的重点是美国政界，他要与政坛巨子、各界要人广交朋友。1968年拉宾初到美国时，好奇的美国人都想一睹这位仅用6天时间打败所有邻国的弹丸小国的三军总长是何等风采。就连处于竞选高潮的罗伯特·肯尼迪也请求与拉宾合影，以壮声威。在竞选过程中，拉宾逐渐认识到总统竞选对美国外交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到了两党的竞选活动上。为了深入了解，他参加了两党推举候选人的大会，也多次与两党领袖尼克松和汉弗莱会晤，观察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以及他们在向以色列提供鬼怪式战斗轰炸机的立场。两人之中尼克松的亲以态度比较鲜明，使拉宾对尼克松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他希望尼克松上台，因此两人的朋友之情更加深厚，巩固了六天之前就确立了的朋友关系。在拉宾公开号召投尼克松一票的情况下，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大多数美国犹太人投了共和党的票，尼克松顺利地连任了总统。尼克松的竞选班子老板约翰·米切尔不无用意地半开玩笑对拉宾说：“我听说你准备回国后从政，如果你需要一个得力的竞选班于主管的话，鄙人甘愿效犬马之劳！”由此可见拉宾与尼克松的私人关系如何。尼克松上任后，他的国家安全及外交事务顾问基辛格博士与拉宾打交道最多。总起来说，两人尽管都忠于本国利益，但两人相处自然，合作比较愉快。此外，拉宾与民主党主席苏伦斯·奥伯林及参议员杰克逊和赛明顿等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拉宾与美国政界要人的融洽关系无疑对拉宾的外交活动大有帮助。

拉宾对美国犹太人也作了大量工作，因为他深深地感到，美国犹太人是他成功的保证。美国犹太人不仅从各方面支持以色列，而且全力支持他努力建立以、美特殊关系的工作。他们在内心深处是把自己与以色列国拴在一起的。他们不用别人动员，自觉自愿地组成了美国国会山上最强大的“院外游说集团”。拉宾与美国犹太人社团来往密切，频频出席他们的集会。可以说，他们使美国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到他们的巨大压力。这使得

拉宾的活动更加得心应手。

拉宾的八方出击的策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以说，拉宾的策略是对的，他成功了，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拉宾面临的是更多的困难与阻力，他的沉着镇静起了关键作用，使众多的冲突有了妥善的处置。

在国际上，1967年以后大国的中东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更多地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开始考虑通过各种途径谋求和平，以避免大国卷入冲突，并加强亲美的阿拉伯温和国家的地位。苏联出于寻求缓和避免大国冲突的目的，也试图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这在当时与以色列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先是约翰逊政府希望中东和谈能有进展，以便向美国公众证明民主党是有能力使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的。拉宾则寸步不让，与美国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痛陈美国屈服于苏联压以色列无条件撤军的利害，指出一个强有力的以色列可以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起平衡作用，并发动美国犹太人组织掀起责问约翰逊政府的声浪。最后，约翰逊政府在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害关系后向苏联政府指出：“中东的和平只能随着备方的谈判进程来达到……冲突的双方必须签订一个相互有约束力的契约式的协定。”这表明美国在中东和谈问题上已采取了以色列的立场。而且，约翰逊还同意了向以无条件出售鬼怪式飞机。尼克松上台后，先后提出“新亚洲政策”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三项原则：“伙伴关系、实力、谈判”是持久和平的支持。美国在亚洲一些地区实行战略收缩，加强在中东同苏联的争夺，试图通过改善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及与苏联的“谈判与缓和”来牵制苏联在中东的扩张势头，在海湾地区则扶植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以实现其海湾政策目标。尼克松还强调了美苏就中东问题达成谅解的必要。拉宾表示了对美国立场的谅解，但并未气馁。他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反映以色列的不满，另一方面他发现了可以改变美国人立场的方法，那就是把从1967年7月以来的埃以间的“消耗战”打下去。拉宾敏锐地注意到，美国人对这场消耗战的影响很担心，非常希望这场战争停下来。拉宾分析，这实际上是苏联人在怂恿埃及人继续打下去，因为这能使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大大增强。阿拉伯世界义愤填膺，激进主义已占上风。美国担心这场消耗战拖得时间越长，坚决支持阿拉伯人反以斗争的苏联的影响就越大，美国因向以提供了飞机大炮其影响就会下降。即使美国用切断武器供应的方法强制以色列停止消耗战，也加强不了自己的地位，因为那是埃及的胜利，苏联的影响会更大，美与苏谈判时地位会更不利，因此拉宾要求梅厄政府不仅放手大打，还应使用飞机轰炸埃及腹地。这既会损害纳赛尔的地位，削弱苏联的影响，又对加强以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如此一来，尼克松已经深深感到以色列是一个能使自己摆脱不利地位的工具，他明确了要使以色列保持强有力的观点，实际上承担了对以色列的义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尼克松先是于1970年4月派西斯科赴中东用阿以双方商讨恢复停火的解决办法，后又由罗杰斯提出一项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即所谓“罗杰斯计划”，其内容正是以色列最担心和激烈反对的——以国际边界作为埃以问安全的和公认的边界；两国恢复和平状态；埃以谈判解决加沙、沙姆沙伊赫和非军事化区的问题等。拉宾坚决反对，先是指责基辛格和尼克松，随之又把所有美国犹太人都鼓动起来全力展开了反罗杰斯计划的运动，直至美国再次做出让步，“罗杰斯计划”最终流于破产。此后，美国的中东政策与以色列更近于一致，那就是用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和被占领

土迫使阿拉伯国家求和。

拉宾的八方出击策略还表现在另一方面：改变本国政府的僵硬立场，顺应国际局势发展，力促埃以达成停火协议，从而达到改变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并加强美以关系的目的。为此，拉宾多次要求本国政府阐明立场，明确要求，以解除美以间一时的不信任危机。在他的努力下，埃以最终达成了协议，既维护了以色列利益，又从美国搞到了更多的军事援助，达到了自己设想的目的。

拉宾的成就证实了他的策略的成功。他任驻美大使期间，美以特殊关系进一步加强，以色列得到了美国大批的武器装备，拉宾可谓是成就斐然。拉宾出色的外交活动，既得到以色列政府的称赞，又得到美国官方的赏识。在拉宾以大使身份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尼克松笑着问梅厄夫人，拉宾回去后给他个什么职位，梅厄夫人故作玄虚他说：“那就要看他表现如何了。”尼克松开心地大笑起来，“那好啊，要是你们不想要他的话，把他留在这里好了，我愿意用他！”

六、抓住机遇创造奇迹

被誉为“以色列国之父”的大卫·本-古里安有这样一句名言，“凡不相信奇迹的人都不是现实主义者”，以色列人谈话时都很爱引用。这话确有一番道理，但一个人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努力奋斗与自信外，常常与机遇有很大的关系。拉宾就是一个相信奇迹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看起来似乎无法实现的事，只要能把握住机遇，大胆出击，奇迹就会变成现实。拉宾充满信心地投身政治活动，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由一名新议员跃升为总理，这确是世界政坛上的“奇迹”。

1973年3月1日，拉宾任驻美大使期满回到以色列。他的下一步打算是在政坛上一展宏图。他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困境，尽管他过去战功卓著并且驻外成就斐然，但工党的现任部长们资历都比自己深，自己在工党里的地位还很低，根本排不上号。但他没有气馁，下决心一定干出样子来，要让其它元老也看重自己，然后再抓住机会，能上则上。

一切从零开始。转眼间秋季到了，离大选的日子近了。拉宾带着当年帕尔马契新兵的劲头投身到政治活动中去。为了恰工党拉选票，他旋风般地奔走全国各地，到处发表演说吹捧工党的成就，闹得轰轰烈烈。在参与竞选活动的过程中，拉宾顺便温旧情交新友，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弥合任驻美大使时同国内政界人士疏远了了的感情。拉宾的卖力取得了效果，工党元老们被深深地打动了，于是工党候选人的名单上有了拉宾的名字。但排名仅列第20位，离当部长还差着一截。初战告捷，拉宾的信心更足了。他明白不进则退的道理，更上一层楼还需更大的努力。

天有不测风云，突然爆发的战争打乱了以色列政坛的秩序。对拉宾来说，这恰是千载难逢的良机。1973年10月6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了，萨达特与阿萨德用与六天战争同样的手法打了以色列一个措手不及。战争的头几天，拉宾跑到前线上担任军事顾问，随后财政部长平哈斯·萨皮尔把他从前线上调回来，让他负责紧急筹款工作。尽管拉宾对此毫无兴趣，但他还是痛快地答应了，而且成绩还相当不错，这得到萨皮尔的高度赞扬。拉宾也因此给萨皮尔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由于战争，原订于10月的大选推迟到了12月底举行。战争改变了中东格局，也改变了以色列人的信念。人们从战争的恶梦中醒来，郁积在心头的沮丧、悲痛、失望的情绪汇集为愤怒的指责浪潮，人们纷纷要求追查战争责任并开始对现任政府不满。政府中更是乱成一团糟，相互指责、揭短和拆台活动使得议会和工党内部打乱了原来的排列组合。拉宾看到机会来了，他要谨慎而且牢牢地抓住这个机会，使自己的地位飞快上升。在激烈的争权夺利和党内斗争中，拉宾开始受到人们的注重。一方面，拉宾没有参与此前的争权夺利，另一方面，拉宾与这场战争毫无责任。因此，拉宾是争斗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物。

当时的总理梅厄夫人虽为工党元老，但不善治理国家而且很易感情用事。12月底的大选后，梅厄夫人没能组成一个有威望的领导班子，尤其是她执意重用达扬更是缺乏深谋远虑。达扬是十月战争期间的国防部长，对战争责任难脱干系，国内舆论强烈要求他下台，达扬只好辞职。出于避免党的分裂等原因，梅厄夫人宣布内阁总辞职并同时辞去党的总书记一职。根据以色列法律，刚刚担任劳工部长才一个月的拉宾也随梅厄一起下台了。拉宾并未

因此而感到遗憾，与其搭上一条千疮百孔的破船，不如造一条新路。

梅厄夫人辞职为工党的革新开辟了道路，工党领导层决定遴选新的领导人。拉宾更加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只要利用好这个机遇就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当时工党权贵一致认为财政部长平哈斯·萨皮尔是最佳总理人选。他的资历根深且平易近人，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但出乎意外的是他坚决拒绝了总理候选人的提名，这就为其他觊觎总理宝座的人开辟了竞争道路。拉宾又有了新的目标：总理。他知道自己的实力与不足，但他决定奋力一搏！

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拉宾的强有力的对手是佩雷斯。佩雷斯原为拉菲党要人，在政府内任职多年，在党内和政界均有较大影响。他不但有能力有口才，而且在工党上层中有一批朋友，颇具实力。与之相比，除了拉宾在党内没有雄厚根基外，可以说二人是势均力敌。具体说来，在各方面都是互有胜负。佩雷斯当过国防部副部长，但那是文官职务，负责掌管计划和装备供应等，没有直接指挥过战争。拉宾以军事起家，身经百战，六天战争中身为总参谋长更是战功显赫，而以色列人对战争英雄向来持崇拜态度或有信任感、安全感，从这点上来说，拉宾占了上风。佩雷斯自本。古里安时期就一直担任各种部长职务，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前更是单枪匹马地为以色列搞回了大量的法国飞机坦克，在党内和政界的影响很大，根基深厚。拉宾在担任驻美大使时期加强了以、美关系，还为国家搞来大量的武器和贷款，成就固然不小，但在以色列政界仍属“初出茅庐”，人们对其是否有治世经国之才还有疑问，工党中央委员会对拉宾的支持不容乐观。在政界的资历，拉宾是处于明显的下风，好在拉宾始终为工党效力，是个忠诚的工党信徒。而佩雷斯早年曾随本。古里安另立“拉菲党”，稍有污点。拉宾与佩雷斯一交手，工党内倒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的公平竞争。

拉宾虽“初出茅庐”，但以当时国内党派斗争和公众情绪来看，“新人”恰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本。拉宾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从军界退出后便任驻美大使，跟党内各派没有过多的瓜葛，人们对他了解不深，也说不出他的缺陷，这种人好当领导。以色列人喜欢讲话直率的将军，而且崇拜战争英雄。拉宾恰好性格率直、战功卓著、堪当重任。拉宾竭力扬长避短，努力争取各方支持，最关键的是争取到了萨皮尔的有力支持。拉宾在当大使时从美国弄到的大批财政援助曾给萨皮尔这个财政部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战争筹款的上乘表现更是深得他的赏识，加上前总理梅厄夫人的大力支持，把中央委员会的人又一下拉过来一大批，形势立刻变得对拉宾有利了。

由 600 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以秘密投票方式表决二人的胜负。拉宾以 298 票对 254 票的微弱多数战胜了佩雷斯。拉宾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由一名新议员急速上升为总理，创造了以色列政坛上的一个神话。拉宾当选为总理，标志着非伊休夫时代的政治家在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担任了国家和党的领袖，以色列国的领导权已由早期东欧移民创业者转移到了以色列土生土长的下一代人手里。

七、先斩后奏

在复杂多变的中东地区，任何一项重大举措都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阿以矛盾更是一个极为危险的雷区，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选择和平是以色列的最大利益，而实现巴以和解是最好的突破口。为了保证巴以和解的顺利进行，拉宾总理以他非凡的胆略，采用先斩后奏的策略，即先同巴解组织草签秘密和解协议，造成既成事实，而后才公之于众的办法，最终使最棘手的巴勒斯坦问题有了初步解决。

拉宾本是行伍出身，当过 27 年军人，曾为以色列立下赫赫战功。在 1987 年的巴勒斯坦人群众性斗争中，他用“敲碎骨头”的政策镇压巴勒斯坦人起义。但是，长期的对峙和武装冲突使他认识到，单用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阿以冲突的，也征服不了巴勒斯坦人要求独立与解放的民族意志。“为了以色列的安全与繁荣”，拉宾在 1992 年的大选中高举和平旗帜，主动推进和平进程，提出用政治手段解决阿以冲突以维护以色列安全的方针，顺应了国际和平大趋势，也符合以色列选民思和思定的愿望，深得选民的赞赏，终于获得大选的胜利，就任以色列总理。然而，1991 年 10 月开始的阿以双边会谈进行了 10 轮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既不符合以色列人民的和平愿望，也不利于执政的拉宾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工党。拉宾只有推进和谈才能兑现他竞选时许下的上台三个月使阿以和谈获得突破的诺言。

拉宾决心采取务实步骤，首先扫除和平进程中的障碍。拉宾在 7 月 14 日的就职仪式上发表了充满自信和激情的演说，他要求以色列人摒弃 40 多年的孤独感，不要再抱有“整个世界是反对我们的”这一陈腐观念，应当但然和理智地处理各种棘手难题。他强调，他的政府将把致力于中东和平和结束阿以冲突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采取现实、灵活和大胆的步骤来推动中东和谈。在他做好了舆论上的充分准备后，接着便付诸实际行动。拉宾政府首先宣布暂时冻结在被占领区修建新的居民点，承认戈兰高地的主权属于叙利亚并准备将戈兰高地上的某些地方归还叙利亚以换取和平。随后拉宾总理提出的关于取消 1986 年通过的禁止同巴解组织接触的法律草案也获议会批准，为巴以高层人员的往来扫除了障碍，使巴以直接对话成为可能。

客观地说，拉宾的行动是明智的，可取的，但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拉宾面临着国内反对势力的严峻挑战。他上任不到一年，就出现了两次内阁危机和四次不信任案。右翼势力坚决反对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反对让出一寸被侵占的阿拉伯土地。他们一再抨击拉宾在和谈中让步过多致使以色列变得软弱，使暴力活动得以增加，指责拉宾政府“对恐怖分子实行绥靖政策”，甚至发生了“和谈对以色列没有好处”的叫喊声。同时，拉宾还受到左翼势力的攻击，左翼势力对和谈进展缓慢表示不满，批评拉宾只向巴勒斯坦人提供“极为有限”的自治，并且主张以色列撤出全部戈兰高地。除了右翼与左翼两个方面的夹攻外，拉宾坚持的不归还全部被占阿拉伯被占领土以及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立场，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阿拉伯方面的抵制。面对困境，拉宾的基本决策是坚持逐步推进和平进程，因为不如此以色列就不能得到和平与安宁，他也就不能履行他的竞选诺言。但是和谈越是接触到实质问题，他受到的内外压力也就越大。拉宾决定先寻找一个突破口。他首先想到了巴解组织。海湾战争后，巴解组织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和财政危机，相形之下，与巴解组织首先取得和谈的实质性进展的可能

性更大。因为叙利亚始终坚持先归还戈兰高地再谈判的要求，不肯做出让步，而巴解愿意做出诸如承认以色列及声明放弃恐怖活动等让步，与之和解的代价要小得多。倘若首先实现巴以和解，拉宾就可能实现各个击破的战略，与叙利亚、约旦等国家分别实现和平、更何况巴解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为摆脱困境已主动向以方伸出了和解之手。拉宾没有让人们失望，他决定大胆地从消灭巴解，坚持“不谈判、不承认、不缔约”政策的羁绊中挣脱出来，抓住和谈的机遇，率先实现巴以和平。

如何才能既使巴以和谈取得突破性进展，又能减轻国内外巨大压力并保证以色列政府的平稳呢？拉宾以政治家的敏锐和军人的果断，决定采用秘密谈判的方式，即先达成秘密和解协议以造成既成事实的先斩后奏的策略来顺利实现巴以和平。保密程度越高，风险越小，既要反对派保密，又要对自己的支持者保密，甚至对自己的核心——以色列内阁多数成员也要保密。因此从一开始拉宾就对阿拉法特提出了必须严格保密的先决条件。他提出，此事绝不能声张出去，参与者人数越少越好，范围越小越好，否则宁肯不谈。他担心的是利库德集团搞到密谈证据后在议会里发难，弄得事情还没办成就先翻了自己的船。其实，这种要求与阿拉法特不谋而合，他的境况也同拉宾相似。两个人都经受着沉重的内外压力。

接下来的问题是由谁谈，在哪儿谈，怎么谈，因为这对保密有重要的关系。当时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在和谈问题上表现出令人感叹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并做了大量的工作，深得拉宾的信任。于是拉宾选择了佩雷斯。阿拉法特派出了他非常信任的马哈茂德·阿巴斯。阿巴斯是法塔赫最早的成员之一，自70年代以来一直不顾巴解激进派的攻击，坚持与以色列和解完全符合巴勒斯坦但利益的观点。阿巴斯与佩雷斯都是非常理想的负责直接和谈的人选。谈判地点选在美国不行，不利于保密。最后选择了挪威的奥斯陆，因为那里偏僻不引人注目，还因为热心阿以和谈的挪威学者拉尔森擅长安排这类机密会谈，挪威外交大臣霍尔斯特也愿助一臂之力。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1993年1月的寒冬，在奥斯陆东南方80公里处的一座庄园里，巴以之间面对面的和谈拉开了序幕。和谈的突破性进展是在8月份，拉宾开始直接指挥谈判，哪怕是协议草案中微小的变动都必须经过他的认可。问题越接近解决，保密工作就越显得重要。除了经常更换会谈地点外，以色列领导人的名字还用上了代号。主要谈判场所设在保尔高德庄园，它是一座十九世纪的农庄，室内装饰古朴典雅，屋内的壁炉里燃烧着噼啪作响的木柴，屋外白雪皑皑的园林中潜伏着双目圆睁的警卫。双方共进行了14轮会议。当然，谁也不肯轻易做出让步，激烈地讨价还价和唇枪舌剑是难免的，谈判中多次出现使人窒息的僵局。但局面最终还是打开了。

1993年8月29日，耶路撒冷以色列内阁会议室里，主持会议的拉宾总理与外长佩雷斯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对他的部长们宣布：经过多轮秘密谈判，佩雷斯外长已于8月20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同巴解组织代表草签了秘密协定，在被占领土上的加沙和杰里科地区给予巴勒斯坦人有限的自治。此言一出，四座皆惊，部长们个个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他们万万没想到总理和外长佩雷斯背着自己来了这么一手。随即，佩雷斯向不知所措的部长们汇报了整个谈判过程及达成协议的要害。散会后，这一消息立刻闪电般地传遍了全世界，成为轰动全球的大新闻，欢呼、沉默、批评、愤怒皆有之。但是，即使那些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不得不佩服拉宾那非凡的胆略。因为他敢于于

其他中东政治家们不敢于的事情，敢于出来解决中东最棘手的巴勒斯坦问题。一些人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心头滑过这样一种感受：干得漂亮！又一个萨达特式的惊人之举！其实他们心里都明白：是先斩后奏的策略使巴以和解成为现实！

奥斯陆协议一签定，随后的步伐就快多了。8月31日以色列内阁批准了协议草案，9月4日巴解组织主流派法塔赫也批准了这个协议。9月9日，以、巴相互承认。9月13日，在美国白宫的南草坪上，克林顿总统陪着拉宾总理和阿拉法特主席来到麦克风前，3000多位来宾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在全世界的注视下，佩雷斯与马哈茂德·阿巴斯庄严代表双方在《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即加沙—杰里科首先自治协议）的正式文本上签了字，中东历史揭开了新篇章。

八、“成功源于梦想”

犹太复国主义创造人西奥多·赫茨尔曾说过“人们的成功源于他们的梦想”。犹太复国运动尽管经历了种种困难，招致了各种各样的非议，最终还是建立了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但是，这个犹太国家并不安全，它与周围阿拉伯国家长期处于对峙或军事冲突状态之下，至今已历经五次中东战争。不安全感始终是以色列人心头最大的阴影。犹太人的梦想是建设一个安全的“犹太人天堂”，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梦想的实现还需要化于戈为玉帛，实现阿以全面和解。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拉宾所倡导的中东和平进程是这一过程中关键而坚实的一步。

拉宾东山再起，二度出任总理之后，大力倡导中东和平进程，中东形势出现了“历史性转折”。拉宾极力主张和谈的鸽派思想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在长期的军事政治生涯实践中顺应国际形势和中东形势的变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拉宾思想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拉宾当过 27 年的军人，为以色列打过许多胜仗，特别是在 1967 年指挥军队攻占西奈半岛、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与戈兰高地等大片阿拉伯领土，为以色列立下赫赫战功，是以色列的战争英雄。在 1987 年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爆发群众性起义斗争后，他用“敲碎骨头”的政策镇压巴勒斯坦人民起义。但是，通过长期的对峙与军事冲突，拉宾逐渐认识到，单用军事手段不能解决阿以冲突，也征服不了巴勒斯坦人要求独立与解放的民族意志。他的立场逐步发生了转变。拉宾在 1984～1990 年参加了民族联合政府并任国防部长一职，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能量，在报纸上撰文阐述自己的和平立场，也多次公开发表和评论，直抒己见。但由于拉宾及其政党处于在野地位，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态度僵硬的利库德集团又始终坚持以“和平换和平”的主张，信奉强权政治，推行沙文主义，拒不让步，致使中东和谈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但拉宾在此期间提出的分阶段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提案，成为以色列解决阿以问题的基本准则。

拉宾深知国际局势和中东形势的变化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必将产生重大影响，海湾战争、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世界很多热点问题走向谈判解决，对话越来越成为主流，和谈越来越成为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模式，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独占中东舞台，特别是海湾战争的胜利，使它在中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导地位。原来苏联支持的阿拉伯激进国家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明显削弱，它们失去了与以色列对抗的后盾，阿拉伯国家倾向美国的趋势日益普遍。这又使美国过去向以色列一边倒的政策有了改变的环境和机遇，美国的经济安全思想使它重新注重于在中东寻求平衡，从而导致以色列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战略地位下降了，以色列得到的支持减少。中东战略格局的这一根本性变化，大大削弱了阿以对抗的锋头和强度。拉宾也认识到，选择军事手段解决阿以冲突根本行不通了，今后也更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1992 年是以色列的大选年，拉宾感到有种种迹象表明公众对利库德集团感到厌倦了，人们期望以色列的内外政策能有一个较大的转变。2 月，拉宾在党内竞选中击败了佩雷斯重新当选为工党领袖和总理候选人，这使他精神振奋，深信自己能够重振雄风，阿以和谈出现了新契机。大选中，拉宾领导工党对选民亮出了鲜明的和平旗号，明确地提出了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及停

止在约旦河西岸人口稠密地区建立定居点的主张，深得以色列人民的支持，以 12 票之差遥遥领先于利库德集团，取得大选的胜利，拉宾再度出任总理。在就职演说中，打破历届政府的常规，拉宾强调他的政府将把致力于中东和平及结束阿以冲突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他大胆邀请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国家领导人访问耶路撒冷，还邀请参加中东和谈的约旦—巴勒斯坦代表团到圣城举行非正式的建立信心的会谈，并表示“为了和平，我作好了今天或明天去安曼、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准备”。拉宾的表态给久滞不前的中东和平进程注入了一针兴奋剂。

拉宾如此大胆地改变立场是他面对现实，适应国际形势和中东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的反应。除此之外，他还有更多的考虑。第一，是为了以色列经济的发展。由于阿以处于敌对状态，长期以来以色列不得不把国民生产总值很大一部分用于军事，加之阿拉伯国家一直对以色列进行直接或间接经济抵制，已使它损失了近 500 亿美元。以色列广大人民对日益恶化的经济深感不满。为此，拉宾必须在阿以和谈中寻找突破点，以便开创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吸引外资，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繁荣经济，特别要解决就业和通货膨胀这两大难题。第二，为了缓和国内反对派势力的壮大以解决国内政治危机。工党的中东政策一开始就受到以利库德集团为代表的右翼的激烈反对和阻挠。一年来的中东和谈无明显成果，不仅右翼势力气焰上升，而且支持工党的部分选民也渐渐由失望变成不满，使工党在国内的地位有所削弱，频频出现内阁危机和不信任案。拉宾必须及早行动。第三，出于维护美以战略关系的需要。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以色列都采取与美国合作或保持一致的立场，以保障美国每年向以提供 30 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而美国在冷战后中东政策的核心是推动阿以和谈取得突破。第四、以色列处于战略优势，自己的安全已得到保障，拉宾想利用阿拉伯方面的矛盾和困难争取到有利于己的和平协议。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海湾战争后，以色列变得强大了，阿拉伯世界的威胁减小，内部矛盾增加了，拉宾在和谈中可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利用矛盾，先与一方达成协议，再压其它三方做出让步。鉴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正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和财政危机，同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哈马斯运动”的势力在被占领土上的膨胀已对持温和态度的巴解组织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拉宾要极力避免这些极端分子得势后的灾难性后果。同巴解谈判可以以最小的让步换取最大的利益。因此拉宾选择了巴勒斯坦作突破口。

随之是拉宾的一系列积极行动。他宣布接受联合国 242 号决议为和谈的基础，愿意以部分领土换取和平；宣布停止在被占领土上兴建“犹太政治居民点”：有限地缓和了对巴勒斯坦人的敌视态度，解除了与巴解组织接触的禁令，允许以巴高层领导人员往来，自 1993 年初以来，巴以双方代表在奥斯陆进行了 14 轮秘密会谈，终于达成了加沙、杰里科首先自治协议。巴以之间结束了敌对状态，坚冰终于打破，阿以和谈跨出了最艰难的历史性的一步。以色列人向着自己的梦想由此前进了一大步。

巴以这次秘密和谈的结果是将双方最为敏感的耶路撒冷地位和巴勒斯坦立国两个问题搁置不谈的前提下取得的。而加沙和杰里科是被占领土中面积不大又十分贫瘠的地方、拉宾让阿拉法特去“自治”这两个地方，既可以使巴解放弃武装斗争，又有助于遏制哈马斯力量的增长。以色列和巴解媾和，又造成了以色列和约旦、叙利亚及黎巴嫩也能单独请和的形势。阿以冲突便可能全面松动，阿拉伯国家一旦放弃对以色列的经济抵制，那么以色列可凭

其综合国力优势在中东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中独占鳌头。与巴解的谈判，拉宾真可谓机关算尽。

以色列人向着未来的“犹太人天堂”已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拉宾既然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必将沿着这条路一步步地走下去。随后的开罗协议、塔巴协议及约以和解是他留下的一个个新的脚印，而这些都是为了实现“勇敢者的和平”。

九、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

社会生活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利于政治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的安全。因此，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在政治、经济两方面双管齐下，并行发展。只重政治，忽视经济的作法是短视的，致命的。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东各国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外交问题时，首先考虑经济因素，这不仅有利于地区经济合作，而且可以加速阿以和谈进程，实现地区持久和平。

经济形势如何是决定以色列政治发展的第一大关键因素，也是决定哪个政党上台或下野的关键之一。纵观以色列主要政党的得失和力量的消长，无不与其经济政策的成败相关。拉宾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平民百姓和普通党员对经济看得比政治、外交更重要。事实也表明，以色列人是从他们的钱包和菜篮子的充盈程度来看待政府和领袖好坏的。如果光在政治、外交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经济没抓上去的话，人们是不会买帐的。只有发生了战争是例外。如果政府领导人民打赢了战争，那么公众会暂时忘记政府的治国无方，让它多干几年，但时间一长就不行了。战争不可能频频发生，更何况战争本身就是对经济的最大破坏，战争最终可能导致经济的崩溃。长期的政治生涯，使拉宾既有自己在这方面的前车之鉴，也有别人正反两方面的供他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拉宾自己的沉痛教训发生在他第一次执政时代。1974年到1977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2.9%，这有其客观上的原因。十月战争消耗的资金等于以色列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而海外石油价格的上涨对以色列国际收支也产生了巨大压力。但在主观上，以色列经济中固有的一系列问题更大大加重了其经济负担。拉宾政府建立之初，曾有人预言是一个短命的政府，但它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取得了有口皆碑的政绩。除了外交、防务和反恐怖方面的成就以外，拉宾政府也致力于解决经济困难、移民问题和战争后遗症，克服信任危机，不过收效不大。为了对付通货膨胀，政府采取了紧缩财政和扩大出口的政策，后者取得了成功，而前者则一败涂地。1973年后，由于战争失利使海外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安全丧失了信心，人口增长率因之出现了下降，劳动力不足，生产增长缓慢；而军费高速增长，私人消费增加，加上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导致了以色列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对外援和外部资源的依赖进一步加深。经济的恶化引起了社会骚乱和连续罢工，加上党内矛盾及机构的僵化，最终促成了拉宾的失败。但拉宾由此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在以后他更加重视经济的发展。

拉宾也善于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贝京时代，积极推行“大以色列”计划，加强实施定居点政策，仅在1982年宣布的新定居点计划和城镇建设工程预计花费达620万美元。占领区人民持久高涨的起义不仅给以色列带来空前的政治危机，而且使以色列蒙受了巨大损失。以色列上下对贝京能给以色列带来经济转机的希望落空了，这最终导致了贝京的垮台。随后的沙米尔执政时代，以色列失业率高达11%，1992年的财政赤字高达25亿美元，通货膨胀率不断攀高。沙米尔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考虑，一味大力投资在被占领土修建居民点，反而忽略了在以色列本上创造就业机会，安置新移民的计划。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日甚一日。在利库德与工党联合执政时期，工党

领袖佩雷斯两度提出新经济政策，使经济走出低谷走向复苏。经济政策的成功使以色列国内政治暂时趋向稳定。拉宾从中反复比较，权衡利弊，更加坚定了他重视经济发展的信念。

同时，拉宾高瞻远瞩，从长远利益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认为谋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了，阿以半个世纪的对抗与冲突，极大地消耗了有关国家的人力、财力和资源，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经济因素逐渐成为推动中东国家谋求和解，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最主要的考虑因素。这也是中东和平进程之所以取得历史性突破并向前发展的更深一层的原因，九十年代之后的阿拉伯国家利用其石油收入展开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并且实行经济政策的调整。面对这种现实，以色列不能不对其阿拉伯对手庞大的武器库感到担忧。如不能实现和平，以色列难以承受军备竞争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压力。为了给以色列在未来的长远安全战略作好准备，以色列就必须更加重视综合国力的竞争。另一方面，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也逐渐由对抗走向缓和，国与国之间的斗争越来越趋向于综合国力的竞争，保持稳定而有力的经济发展势头是以色列得以在中东地区保持强大甚至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最根本保障。既然拉宾以战略家的眼光预见到了未来的发展变化，认定发展经济是大势所趋，是主流，他随后便付诸实际行动。

拉宾再度出任总理后，从实际出发，首先从国外获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让美国解除冻结的 100 亿美元贷款担保，同时争取美国每年提供 30 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其次，改变投资方向，暂时冻结在被占领土修建新的定居点，把冻结下来的“政治性定居点”资金用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拉宾在经济方面也作了某些调整，继续积极地推行结构性改革。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实行一揽子减税计划；削减工业补贴，取消对基本食物的补贴，农产品的进口由私人公司经营；改革和调整银行系统，加快出售政府在银行里的股权和股份；努力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继续实行政府企业私有化等等，为此；拉宾还专门组成一个由他自己、财政部长、司法部长参加的私有化委员会。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拉宾政府还决定实施四项战略措施，大规模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教育、减税、结构改革和减少国内预算赤字。

拉宾实行努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的经济政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以色列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上升。1993 年，尽管由于对公共事业建设投资大大削减，这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增长 364%，1994 年已达 6.8%，超过了沙米尔执政时的增长率。1994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740 亿美元，人均收入 13700 美元，失业率下降到 6 年来的最低点 7.7%，1995 年人均收入达近 16000 美元，成为世界上 12 个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在近几年移民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更是难能可贵。目前，以色列的经济呈现出了强劲的上升势头。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利于政治的稳定，有利于工党继续执政。拉宾的经济政策在国内取得了巨大成功。

鉴于以色列国内市场相对狭小，对外贸易对其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拉宾除了继续致力于与传统友好国家加强经济联系外，还利用和平进程的发展，积极参与与中东国家的经济往来，为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为了开拓与中东各国的双边、多边和地区性合作，1994 年 11 月，以色列及其他大多数中东、北非国家的领导人和经济界人士出席了在摩洛哥举行的中东、北非经济首脑第一次会议，大会讨论了推动地区和平与发

展经济两大主题，并对未来地区经济合作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建议，如建立中东北非经济共同体，成立中东开发银行等。最后发表了卡萨布兰卡宣言，其中强调各国政府和经济界人士要加强合作，通过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来巩固和谈成果；要求各国政府采取实际步骤以实现中东地区和平与发展经济的双重目标。尽管阿拉伯国家还未宣布取消对以色列的间接抵制（海湾国家已宣布取消对以色列的间接抵制），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共聚一堂商讨地区经济合作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阿以开始和解并将成为经济合作的伙伴，也表明了拉宾的谋求经济发展的治国方针在国际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突破和成就。

十、全力谋求“勇敢者的和平”

拉宾确曾是个强硬派，他曾率领军队侵占大片阿拉伯领土，是以色列人心目中的英雄。但是，他的伟大和受人尊重之处更在于，他在其生命旅程的后期选择了同阿拉伯的和解之路，并且利用他独一无二的权威试图把部分被占领土还给阿拉伯人，寻找以色列在中东的和平与发展。他是实现“犹太人天堂”的漫漫旅程中的一块重要里程碑。他深知以色列国内的阻力，所以介入和谈伊始，他就声称要担当风险，谋求“勇敢者的和平”。

1993年9月13日巴以双方签订的《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为全面实现阿以和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拉宾的和平设想取得了初步胜利，他也将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随后的中东和谈步伐进一步加快了。

《原则宣言》签署之后，拉宾乘胜前进。为了进一步实施自治协议的各项条款，1994年5月4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代表经过7个月的谈判之后，在开罗签署了《加沙-杰里科协议》即“开罗协议”。这是继《原则宣言》签署后中东和平进程的又一个里程碑。这一文件包括有关从加沙和杰里科撤出以色列军队的谅解，以及以色列民事机构向巴勒斯坦当局移交行政管理权、巴勒斯坦当局的结构及组成、其所享有的管辖权和立法权、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及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当局关系等问题。这是一个实际行动的纲领。8月29日，以巴双方又签订了《权力与责任预备性移交协议》。这个协议的签订说明《原则宣言》的实施已进入第二阶段（先行移交权力阶段）。

此后，拉宾迈的步子更大，以巴双方于1995年9月28日在华盛顿签字《以巴关于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的过渡协议K即巴勒斯坦第二阶段自治协议，也称扩大约旦河西岸自治的塔巴协议）。这项由拉宾和阿拉法特亲自签署的协议使自治安排更具体化，其主要目标是通过选举一个自治机构——巴勒斯坦委员会来扩大巴勒斯坦人在西岸的自治。它为《原则宣言》的全面实施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和平解决阿以冲突问题上，拉宾实行的是各个击破的战略。在首先实现同巴勒斯坦和解后，他进一步采取务实步骤，放手与约旦签署了《华盛顿宣言》及《和平条约》，以约关系完全正常化；与摩洛哥、突尼斯达成设立办事处的协议。这些外交突破，更有利于阿以双方的和解，促使以叙会议也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当巴以自治协议的执行遇到阻力和困难后，拉宾认为，同约旦实现和解，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政治声誉，减轻巴以协议给政府带来的压力。于是，他加快了与约旦和解的步伐。在巴以《原则宣言》签署后第二天，以约向和平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双方签署了《谈判议程框架协议》。7月25日，拉宾总理和侯赛因国王在白宫南草坪上正式签署了约以《华盛顿宣言》，这标志着两国结束了长达46年的敌对状态，为关系正常化开辟了道路。10月26日，二人又签署了《约以和平条约》，宣布双方结束战争状态，以约关系完全正常化。

叙利亚对单独媾和一直持反对态度。在美国国务卿的斡旋下，叙总统阿萨德表示，他决定同以色列实现“正常的和平关系”。接着，拉宾总理马上表态说，以色列为实现与叙利亚的和平准备付出“痛苦的代价”。随后双方派代表进行了多轮会谈。1995年6月，以色列军队总参谋长沙哈克和叙利亚军队总参谋长谢哈比就以色列撤军后的非军事区、顶警系统及派维和部队

等安全安排问题进行了谈判。双方分歧较大，未能达成协议，但双方已进入了实质性会谈阶段。以色列军队已接受从戈兰高地撤军的原则。叙以会谈之所以未能取得突破的主要原因除了叙利亚的立场强硬，坚持以色列全面撤军，在领土问题上寸土不让之外，目前在以色列国内尚未形成在戈兰高地问题上和解和妥协的民意，毕竟，以色列在此居住了近30年，它的军事地位极其重要，以色列用水总量的22%来自戈兰高地。拉宾尚未最后下决心撤出戈兰高地。已以协议的执行给拉宾已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他不能因这个问题使自己前功尽弃。他一直公开说，以色列撤军的程度与达成和平的程度是相互联系着的。为了保证和谈成果，他要求用渐进模式，等时机成熟了再来解决叙以和解。拉宾深深知道，光凭一时之勇是不行的，勇敢固然可嘉，机智同样重要。阿以谈判需要时间和耐心，欲速则不达。

拉宾总理在阿以和平道路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得到了世人的尊敬。1994年，拉宾荣获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这无疑是人们对拉宾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所做的努力和成绩给予的最大肯定和鼓励。但是，拉宾遇到的阻力是多方面的。正当拉宾积极与各方协作，不遗余力地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时，死神却悄悄向他逼近。以色列右翼和极右翼势力对拉宾和平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最终导致了刺杀拉宾的事件。这更加表明，阿以冲突的和平解决是一个充满艰难与风险的过程。

1995年11月4日，夜幕降临后的特拉维夫灯火通明，热闹异常。近15万市民从四面八方涌到市中心的“基卡尔·麦尔海·以色列”广场（即国王广场），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支持和平进程的盛大集会。集会是由“支持和谈结束以阿争端总委员会”组织的，也是10多年来特拉维夫规模最大的一次公众集会，集会的主题是：“要和平，不要暴力。”拉宾总理、佩雷斯外长和许多以色列政府要员应邀出席了集会，一些著名演员还主动登台助兴，高唱和平赞歌。广场上万头攒动，活动渐入高潮。面对欢声雷动的人海、波浪翻涌似的彩球、横幅，拉宾站在主席台上，显得特别激动。他为有这么多人热情支持他的和平进程而异常欣慰。拉宾充满激情地发表了继续中东和平的演讲，在表达了他的决心和信心的同时，他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们有和平的敌人。”因为他深知在以色列反对和谈的阻力有多大，那些仍在做“大以色列”梦的人尽管仅是少数，但他们能量大，且有市场，屡屡给和谈带来困难和波折。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当拉宾及其夫人莉赫与组织示威的负责人道别，一步步走向他的专车时，枪响了。拉宾当即身中三枪，人事下省。虽经医院紧急抢救，但他却没能再醒过来。由于流血过多及心力衰竭，当晚即不治身亡，终年73岁。

凶手在开枪后几秒钟内就被警察当场抓获，他名叫伊格尔·阿米尔，27岁，系一所大学的法律系学生，属于鲜为人知的“复仇犹太人组织”。阿米尔是极右的宗教人士，以前曾两次试图行刺拉宾。

拉宾遇刺身亡的噩耗震惊了以色列，震惊了世界。当天晚上，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涌上街头，走向拉宾在那路撒冷的住宅。他们点燃蜡烛，寄托对拉宾这位“杰出的战士、和平的斗士”的沉痛哀思。6日，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美国总统克林顿、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约旦国王侯赛因及以色列总统魏兹曼、佩雷斯等参加了拉宾的葬礼。侯赛因国王称赞拉宾是一个勇敢、有远见而且忠于和平事业的人。克林顿总统称拉宾为伙伴和朋友，是一位为和平

而献身的烈士。他呼吁以色列人不要失去拉宾为和平献身的精神，消除仇恨，努力完成拉宾未竟的事业。作为拉宾多年的战友及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佩雷斯称拉宾是一个“出色的领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拉宾生前的对手、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闻讯后，强烈谴责这种“恐怖罪行”。

拉宾不是死于战争而是死于和平集会，他不是死于敌对阵营而是死于犹太人之手，他是为和平而死。大多数以色列人理解、接受他的和平主张，他们的实际行动支持了拉宾政府的决策。拉宾在他生命的后半程推行的是“勇敢者的和平”，他是和平的勇敢者。从最终意义上来说，拉宾是勇敢的胜利者。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谋略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 1923 年生于德国费尔特市，为犹太人后裔。1938 年因不堪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全家迁居英国，随后转到美国。1943 年加入美国籍，并于同年起在美国陆军中服役。1946 年退伍，入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1950 年毕业。1952 年获文学硕士，1954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任过讲师、副教授、教授。1969~1974 年任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69~1975 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1973~1977 年任国务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原籍非美国人的国务卿和第一个兼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国务卿，任职期间，推行“均势外交”。1971 年首访中国，1972 年 2 月又陪同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之后又多次访问中国。

一、“我的职务是要向总统提供最大量的选择机会”

1968年12月初的一天，在美国有名的皮埃尔饭店，刚刚在大选中获胜并即将成为美国第37届总统的尼克松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正是在这次会上，尼克松正式宣布他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高度评价基辛格：“多年来通过他的著作，在政府内的服务以及其他活动中，对国家安全事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尼克松之所以委任基辛格以重任，是因为他觉得，基辛格在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能够针对七十年代动荡多变的世界形势，代替已经过时失效的美国外交政策，是他不妨用来一试的摆脱美国困境、重振美国地位的唯一良方。

基辛格果然不负重任，他很快搭好了自己的班子，在白宫动手干了起来。

根据美国国会1947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和1949年对该法的修正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是，“统一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以便军队和政府各部、署（局）能更有效地合作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总统的顾问，协助总统进行决策。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是协助总统谋划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的主要顾问，他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主持它的日常工作。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杜鲁门在位时设置的，但无论是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还是肯尼迪、约翰逊，都没有使安全委员会起到真正的作用。尼克松不同于他的前任，他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十分重视。尼克松发现基辛格是自己的忠实信徒，同他一样主张由强有力的少数人统治，一样不信任官僚机构，因此一上台就要基辛格考虑如何改革这个机构，使它发挥重大作用，“成为制订对外政策的一个最高组织”。基辛格无疑是使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庞大机构复活的一个理想人物。在去皮埃尔饭店应聘之前，基辛格对这个决策机构急待改革的问题就已经考虑了很久，他主张用一种防患于未然并预谋对策的办法来代替“危机外交”。他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当是最终处理送呈总统的所谓“选择方案”的机构。

国家安全委员会下面设有七个小组（或委员会），它们是国防计划研究委员会、处理一切重要问题的高级研究小组、处理秘密情报的40号委员会、监督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核查小组，和对中央情报局进行指导的情报委员会。所有这些有关军事、外交与情报的小组，都由基辛格负责来抓。“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了美国决定外交政策最得力的机器，而基辛格则是这部机器的总工程师。”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在处理某一个（或应付某一“危机”）时先由一个在助理国务卿领导下的部际小组进行研究，确定各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分析各种不同行动方针的利弊，然后向总统提出报告。这个报告先要送到基辛格的手里，由他的班子加以核实情报、收集意见、权衡得失、作出取舍，然后提交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通过，总统点头批准，才付诸行动。此外，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部门上送给白宫的文件，都要经基辛格过目，由他决定轻重缓急，不管内容简繁，一律压缩到6页以下，加以批注，然后送交尼克松。

据《纽约邮报》报道，基辛格对于自己的职责，曾经归纳如下：

“首先，我要向总统提供采取行动的最大选择范围。”

第二，总统一旦作出决定，我要按照他的意图精神去贯彻执行。

第三，当他问到我的意见时，我有几分像顾问。”

《纽约时报杂志》也引述过基辛格的话。他说：“我的职务是要向总统提供大量的选择机会。我坚持每人的意见都得到听取，我没有涂改提交给总统考虑的文件的原本。我在提出各种办法的人面前摆出的各种抉择、各种各样的意思，都收集起来后，我把它们综合起来。我也向总统提出自己的判断。但是，我是公正的。”

话虽如此，可实际上这位总统助理在上交呈文、转述意见、提供选择、监督执行等方面都拥有很大的权力。由于他处在美国这部庞大的军事、外交机器的总枢纽的重要地位，同尼克松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他就不仅仅起一种咨询和协助的作用，而是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更大程度上参与了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其实，安全委员会下设的各个小组的成员往往都是同一批人，只不过由于处理的问题不同才安上不同的名称。但是，很少有哪项外交政策不是通过这个精心设计的体制而后决定下来的。结果，由于基辛格控制了 this 体制，他也就控制了决策的全过程，“人人向基辛格负责，基辛格一人向总统负责”，这是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历来工作方法的一针见血的概括。正如卡尔布兄弟写道：“基辛格的权力从一开始就比邦迪、罗斯托都大得多。尼克松发布的关于改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道行政命令，就把外交和国防政策方面的一切行政大权都集中于基辛格之手了。”

基辛格维护把权力集中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做法，说这是总统的主意。他解释说，总统“对组织工作有非常坚定的看法”，不想让副国务卿主持高级审查小组的是总统本人。把这项工作交给基辛格做，事情就简单多了，免得有时要否决一些决定。总统希望权力掌握在直接由他领导的主管外交政策的人手里，也就是说，他的顾问手里。明明讨了便宜的基辛格却又说：“我对组织机构没有什么定见，因为我认为总统怎么办都可以。”

事实上，基辛格认为，庞大的官僚机构，不论组织得如何完善，总是会扼杀创造性的。它把明智的政策和完善的管理混为一谈。在现代国家中，通常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运转官僚机构，而不是去明确这些机构的目的。尽管基辛格总是偏重哲理，尼克松偏重政治，但他们不仅对于美国需要什么政策，而且对于如何执行这种政策都有相似的看法，他们两者都爱好玩弄权术，都要求极端的可靠和绝对的审慎，都不相信局外人和不乐意分散权力。基辛格近乎本能地知道，只有他同总统和总统的政策合为一体的时候，他才能够控制政府机构，从而帮助整顿外交。因此他对总统毕恭毕敬，因为几个月之前他曾公开批评过尼克松，现在他要消除这个痕迹。要让基辛格把自己那种人所共知的自我中心屈从于尼克松的自我中心感，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需要使尽他赖以青云直上进入白宫的浑身解数——动脑筋，多联系，坚韧不拔，讲求实际。皇天不负有心人，机遇加努力，基辛格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二、限核谈判与“连环套”方针

“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对抗之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谈判的时代。”尼克松在196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说出这样一句话。

几个小时后，苏联外交部就在莫斯科举行了招待会，新闻司司长列昂尼德·扎米亚京和国际司司长基里尔·诺维科夫宣布，苏联已准备好就限制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库问题“开始认真交换意见”。

华盛顿这个和解的调子和莫斯科那个和解的响应，使许多美国人满怀希望。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冷战政策和铁幕政策，对抗和冲突，花费了不知多少亿美元来发展核技术，不断制造出越来越可怕的大规模杀人武器——这一切，使这些美国人忧心忡忡，而现在，还有什么比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更好的办法来开创苏美关系的新“纪元”呢？

事实上，美国前任总统约翰逊就曾打算在原订1968年初秋同苏联领导人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上开始谈判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但是，在苏联的坦克和部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后，他不得不取消了这次会谈。现在美国各界抓住这个机会，对新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它赶紧抓住苏联的这个倡议，实际上也就是把约翰逊政府未完成的事业接过来。

但是，这时无论尼克松还是基辛格，对于接过约翰逊政府那套未经考验的谈判方案就仓促去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主张，都不感兴趣。不管有压力也好，没有压力也好，他们决定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先拖一拖再说，他们认为限制核武器至关重要，但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一个同苏联进行更广泛的谈判中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们的策略是以他们称之为“连环套”的思想为基础的。

“连环套”这个思想，是基辛格均势理论的最新运用。基辛格认为，要实现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有赖于在敌对双方的要求之间取得平衡，而不能把一方的要求强加于对方。苏联却始终始终是这种平衡的潜在破坏者。就人口和核力量来说，苏联是唯一足以对美国构成致命威胁的国家——而且在一个正在奋力建立秩序的世界上，苏联一直是动乱势力的祸首。现在应该教育苏联领导人，要他们掌握如何使他们本国的利益同其他各大国的利益保持平衡的手腕。因此，美苏问题同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问题取得进展，都会影响到其他问题。

基辛格对“连环套”的看法是广义的，带有一些哲学色彩；而尼克松则着眼于实际，着眼于具体问题。尼克松就任之前已开始认为，要实现越南和平和保持中东的安宁，关键都在于俄国人，他觉得克里姆林宫同那两个动乱地区有着明显的联系。所以尼克松考虑的更多是某种外交上的以物易物，必须使俄国人相信，遏制而不是扩大局部战争是符合他们本国利益的。这样，苏美就有可能跨入两国关系的新阶段，从对抗转向合作。

基辛格的均势思想，加上尼克松一心想拖住莫斯科解决越南问题的念头，两者结合起来，便使“连环套”成了美国对苏政策的基础。莫斯科1月20日提出的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建议，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检验这项政策的第一个机会。1月27日，尼克松利用他的首次记者招待会来宣布他对苏联关于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倡议的决定。他始终没有用“连环套”这个词，但在他讲话中多处包括了这个意思，至此，“连环套”这个方针，才作为美国新的谈判策略基础而宣告出笼。总统一方面拒绝了苏联要求把限制战略武

器作为孤立的问题来谈判的倡议，另一方面又在俄国人面前指出举行这种谈判的可能性，要看他们是否愿意同美国一道使“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同时取得进展”。他提出了中东问题，还暗示了越南问题。

但俄国人的反应却很不满意。一国搞“连环套”就是对他国的讹诈。在新政府上台后的头几个月里，基辛格同多勃雷宁大使进行了一连串争论激烈的私下会晤。基辛格在见面时总是想开导这位苏联外交官，使他了解“连环套”的好处。但多勃雷宁却敬谢不敏。在他看来，“连环套”就是高压手段，就是强加于人，就是敲诈勒索。

为了使“连环套”能够顺利实施，基辛格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做了长时间的大量的准备工作。基辛格首先重新确认了美国的“战略力量布局”，由哈尔佩林和林恩领导的班子编制出一张两个超级大国战略力量的对照表，果然证实了基辛格原来的直觉：使美国对苏联在军事上保持明显的优势在七十年代是办不到的。

由于俄国人正在建造的类型“北极星”型的潜艇和比美国武器库中的任何一种类型都要大的洲际导弹，总统根本无法在七十年代实现美国以往曾对苏联保持过的五对一或六对一的那种优势。因此，基辛格向尼克松提出并使总统接受了自己的建议：“充足”应代替“优势”作为美国军事政策的目标。

根据总统对反导弹导弹和分导多弹头导弹的考虑和决定的背景情况，来拟定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采取的立场，是基辛格在准备工作中耗费精力最大的一件工作。在参议院批准禁止核扩散条约后才一天，总统就宣布美国将搞新的所谓“卫兵”系统反导弹导弹计划。起初基辛格并没有“大力支持”，他同学术界的许多反对者一样，把“卫兵”说成是“缺乏理论根据的武器系统”。但随即他就被总统的论点说服了：美国需要有一种新的武器系统上马，以便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交易。在手下的帮助下，基辛格主持写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关于反导弹导弹的调研报告。虽然他认为不应仓促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但他相信最终是会同俄国人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的。对于尼克松批准搞分导多弹头，基辛格也没有提出根本性的反对意见。一个原因是，他从来不相信单是武器这个因素就会引起战争，战争要归咎于人、政治和外交，武器本身是中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基辛格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教训记忆犹新，他对俄国人始终抱有疑虑。苏联一面呼吁举行新的武器谈判，一面继续扩充其 SS—9 导弹，这一点可能促使了基辛格支持搞多弹头的决定。

在以后的半年中，基辛格不断促使各个部门搞各种各样的调研报告，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提供谈判方案。为此，基辛格不断与莱尔德的国防部和罗杰斯的国务院发生争论，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作准备的头三四个月完全是浪费时间。此时，基辛格那种“单枪匹马”的牛仔气派和“三头西西里骡子”的韧劲起了重要作用，他毫不让步，在争论中逐渐占居上风。到7月初，各种选择方案开始接二连三送到国家安全委员会。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核查小组工作进展，最后一个难题——如何核查那些无法就地视察的武器——得到解决。这样，基辛格终于认为，美国已经具备了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坚实基础。

1969年10月20日，总统和基辛格同多勃雷宁大使秘密会谈。由于这时中苏在北京开始了边界谈判，俄国人也想回敬一个小小的“连环套”，通过莫斯科同华盛顿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的合作，对中国人产生一种压

力。5天后，美苏同时宣布，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于11月17日在赫尔辛基开始。

美国代表团团长杰勒德·史密斯，是尼克松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核武器问题专家。苏联代表团团长弗拉吉米尔·谢苗诺夫，是个德国问题权威。在谈判中，基辛格通过电报，重新强调“连环套”的重要性，其精神就是不准备急急忙忙达成军备控制协议，而是先作些试探，看看在政治问题上有无同时进展的迹象。为此基辛格运用了他的“积木组合”方法。代表团带到赫尔辛基去的谈判文件，里边竟没有一个具体方案，不过却有四个说明性的方案，全都是用作谈判依据。这四个方案内容广泛，从冻结进攻性武器到实际削减这种武器的储存都包括在内。基辛格给俄国人提供了选择余地，可以从中任意挑一个。实际上他等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哪个方案你们最感兴趣？说得更具体些，这四个方案中哪些部分你们最感兴趣？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部分捏在一起。”类似于儿童的积木组合。

使基辛格感到相当满意的是，俄国人很快就对限制战略武器的各种技术问题同美国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1969年12月22日，两国谈判代表休会度圣诞节。他们在联合公报中一致表示：“对于正在考虑中的问题，双方都进一步了解了对方的观点。”这一提法并非通常那种没有实质内容的外交辞令，而是表明朝着对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取得相互理解迈出了真正的一步。

但会谈不久就陷入僵局而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在于俄国人不肯接受基辛格的“到此为止”方案。基辛格坚持谈判必须将防御性武器和进攻性武器两方面结合起来，方案建议：在进攻性武器方面，允许配置的洲际导弹的限额每方为1900枚，并完全禁止陆上机动洲际导弹。在防御性武器方面，用来保卫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反导弹导弹的限额应为100枚，要不就干脆不搞什么反导弹系统。但俄国人却认为，凡是涉及到SS—9导弹的，不管是“到此为止”方案，还是任何其他方案，他们连听都不要听。由于苏方坚持只谈反导弹问题，谈判完全停了下来。

直到1970年12月，波兰暴动使得勃列日涅夫决定对苏联的经济来一次大整顿。由于需要西方的技术和贷款，勃列日涅夫考虑试行同西方缓和的政策。基辛格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建议尼克松，如果勃列日涅夫准备在诸如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各种陷入僵局的政治问题上松动立场，美国就准备帮助他使苏联经济现代化。

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很快就分别授权基辛格和多勃雷宁两人再作一番努力，以打破战略武器谈判的僵局。随着勃列日涅夫摆脱了国内的政治困境，他决定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进行妥协。在第四轮会谈期间，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多次秘密交换意见，俄国人改变了立场，基辛格和多勃雷宁终于取得妥协。俄国人接受美国的主张，把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联系在一起考虑；美国人则同意在包括某些类型的进攻性武器的广泛谈判中优先讨论反导弹问题。1971年5月20日，尼克松在电视里宣读了基辛格和多勃雷宁拟订的一则简短的联合公告，强调在两个超级大国以后达成的任何有关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中，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互有关联。尼克松指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三、用“双轨”方式打破美越僵局

1969年1月号的《外交》季刊上发表了基辛格《论越南谈判》一文，文中为新任总统提供了一个通过谈判来达到美国撤出印度支那的理论依据，因而成了以后四年白宫所提出的有关解决越南问题一切方案的起点。在文章中，基辛格认为：“谈判方式方法的重要性，可以说并不亚于谈判的内容。”他提议采取一种新程序来打破僵局，这种程序后来被称为“双轨”方式。在一条轨道上，河内和华盛顿将集中解决他们冲突的军事问题。在另一条轨道上，西贡和民族解放阵线将集中解决南越的政治问题。然后，等到两条轨道都达成了协议，就召开二个国际会议来“拟订对所达成的协议的保证和保障……包括建立维持和平的国际机构的问题”。如果河内不妥协，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我们就应当设法单方面尽量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应当采取一种减少伤亡而集中保护居民的战略。我们应当继续加强南越军队，以便逐渐撤退一些美军；我们还应当鼓励西贡政权扩大基础。使它更强大，以便他们跟共产党人进行那个迟早就要到来的政治较量。

基辛格认为，美国毫无疑问已经输掉了越南战争，但却不应承认错误一走了事。“不管我们是怎样陷入越南的，不管对我们的行动如何评论，为世界和平计，必须体面地结束战争，任何其他解决办法只能横生枝节，使国际秩序的前景复杂化。”

尼克松政府上台之后，解决越南问题的第一步就是改变了巴黎美国谈判代表团的“阵容”和职权，任命亨利·卡伯特·洛奇为新的谈判代表。将由洛奇向北越人提出新的方案，集中体现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在越南问题上的思想，基本上就是那个双轨方针，即把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问题分开解决，俾作为军事问题的第一步，提出美国和北越部队“共同撤出”南越。

第二步着眼于苏联这个东南亚“和平的关键”。充分运用“连环套”的策略，在俄国人面前摇晃诱人的钓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贸易、缓和柏林周围的紧张局势、欧安会，吸引他们采取新的合作态度，使越南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

第三步更为重要，那就是单方面把美军逐步撤出越南。这个计划除过尼克松之外，只有基辛格一人知道。

1969年头几个月里，基辛格对解决越南问题持乐观态度，这主要是基于：（1）他以为可以说服俄国人帮助结束战争，但事实并未如愿。（2）他认为巴黎和谈的气氛逐渐缓和，但事实上北越人的态度始终是强硬的。（3）他从南越获得的情报表明，共产党在南方的进攻现在已呈颓势。出席巴黎和谈的民族解放阵线高级代表陈宝剑作出了一个令人产生希望的政治姿态。（4）他认为“菜单行动”将对北越人产生一定的压力。“菜单行动”是秘密轰炸柬埔寨的军事代号，更确切他说，是轰炸同南越接壤的柬埔寨境内十几里宽的狭长地带内的北越部队集结和出击基地。他相信这个轰炸行动不仅将阻击5万北越军队进出柬埔寨边境使美军遭到重大伤亡，而且还将促使北越人在巴黎采取比较灵活的谈判方针。

“菜单行动”从1969年3月18日开始。到了5月初，基辛格断定美国采取主动，大力“推动谈判”的时机已到。在5月14日，尼克松发表了关于越南问题的演说，提出了解决这场战争的八项建议。过了几个星期，尼克松和基辛格终于打算宣布他们早在就职之前就已作出的决定，即美国将开始从

南越撤军。那时基辛格的确相信，总统只要一宣布开始撤军，就会使河内愿意来进行认真的谈判。但基辛格又一次犯了错误。

为了能在美国和北越代表之间建立起一种人与人的信任感，打破巴黎会谈的僵局，结束这场战争，基辛格劝说总统同胡志明建立直接联系。在总统访欧期间，基辛格从总统回国一行人员中小心翼翼地溜出来，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留下——名义上是向法国和北约组织的高级官员介绍尼克松出访情况，实际上是掩盖他同北越人的首次秘密会晤。同北越代表春水会晤的结果以及胡志明逝世带来的影响，使基辛格大失所望。河内领导人对局势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认为美国撤军一开始，只会削弱、不会加强美国的讨价还价地位；他们还认为这就等于表明美国的颓势已成，无可挽回了。到了9月，在美国第二批撤军之后，共产党方面把人员和物资源源不断通过胡志明小道渗透进来，迹象表明有可能在1970年初对南越首都进行一次“真正的歼灭性打击”。几乎与此同时，在美国却发生了全国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

等到尼克松和基辛格平息了这次反战示威活动之后，从莫斯科传过话来，河内可能又有意思进行认真的对话。基辛格抓住这次机会，通过各种巧妙的方式发出美国政府愿意和解的信号。到了1970年1月底，河内终于对美国一连串的信号作出了答复。从1970年2月底到4月初，基辛格先后四次去巴黎同北越代表黎德寿在首都附近的一所别墅里会晤。基辛格在这场持续很久的交涉的第一个阶段，极力避开那些不可能达成协议的问题，以便创造一个相互谅解的基础，然而黎德寿却毫不妥协，坚持要求南越阮文绍政府下台和美军全部撤出越南。到了4月初，基辛格感觉到再继续谈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路似乎走到尽头，但随之发生的美军入侵柬埔寨事件，却对美国在东南亚的行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使美国与北越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

基辛格担心，随着柬埔寨事件的发展，北越军在柬的庇护所越来越大，它就有可能使在南越的美军遭到更大伤亡，结果几乎肯定会妨碍越南化计划，从而有使美军撤退放慢下来的危险。所以他支持了总统入侵柬埔寨的计划。因为对基辛格来说，在柬埔寨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不是个道德问题，而只是他下述理由的合乎逻辑的引申，即有时为了推进外交事业（目前具体说来就是要谈判出一个美国从印度支那体面地撤军的可行性方案），实行武力政策是必需的。在这次柬埔寨事件中，他要看着美国对河内（也是对莫斯科和北京）显示的它是以自己的军事威力来迫使北越放弃武力征服南越的梦想。

柬埔寨事件后，尼克松总统又任命戴维·布鲁斯担任美国在巴黎的谈判代表团团长，双方在巴黎重新开始谈判。1970年10月8日，布鲁斯大使正式提出美国关于结束越南战争的第一个全面方案。这个方案中最重要一点是建议双方就地停火，这是基辛格坚持的，另外还包括从南越撤出全部美军等。北越人不接受美国的新方案，尽管这个方案规定美国从南越撤军，容许北越军队留在南越。他们仍然坚持美国必须先保证他们在南方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他们才允许美国人“体面地”撤出去。

谈判又出现了令人沮丧的僵局，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又一回合的军事较量——进攻老挝（美国只是空中配合南越军队）。基辛格起先对于在老挝作战并不积极。但也没有加以阻挠，但随着南越军队在老挝的胜利，他又有些想入非非：有朝一日让“善战的越南共和军”去进攻北越。

基辛格认为，激战之后必有和谈。1971年春季和夏季，美国同北越先后举行了六次秘密会谈，第一次会议是在5月31日，基辛格提出的方案同先前布鲁斯的方案基本相同，遭到黎德寿的拒绝。第二次会谈中，黎德寿提出了九点和平方案，此后，双方就这九点方案不断谈判。到了7月26日，基辛格和黎德寿两人达到了可以具体地衡量进展的地步了。此后，美国进一步作了让步，针对剩余两点提出：（1）美国军队全部撤出的具体日期为1972年8月1日，条件是必须在1971年11月1日前达成一揽子原则协议。（2）美国首先保证在即将于10月3日举行的南越总统选举中保持中立；其次，如果俄国和中国限制对北越的援助，美国愿意限制对南越的援助。

谈判似乎在一步步进展，此时基辛格非常乐观，他认为“和平已经差不多唾手可得”。然而随着南越现总统阮文绍在没有竞选对手的情况下连任，北越人在最后一次谈判中拒绝了基辛格的最新方案。他们抱怨美国所提的撤军日期大遥远了。另外，既然阮文绍在搞独脚戏选举，美国所谓的南越大选中保持中立的保证是毫无意义的。

基辛格现在才充分认识到，黎德寿一再坚持美国必须先把南越交给共产党，共产党方面才允许美国从南越脱身，原来这话是算数的。基辛格同北越人正式谈判一直到了第三年，才最后抛弃幻想，弄清了河内的中心思想。原来北越方面一心要美国同他们一道把阮文绍赶下台。

显然，双方都误解了对方的意图。基辛格乍来以为河内会欣赏他的主张的合理性和方案的灵活性，而北越方面则以为基辛格会同意他们对阮文绍那场独脚戏选举的鄙视态度。北越人看到美国方面从原先的谈判立场步步后退，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有意在南越选举中抛弃阮文绍。其实，基辛格从未打算同黎德寿一起把阮文绍政权搞掉，他一贯主张打开某种不“硬性规定其发展方向”的“政治进程”。然而北越方面也是直到9月13日最后一次会谈中才终于懂得，基辛格说话也是算数的，他不是寻求某种东西来掩盖彻底投降，而是在寻求真正的妥协解决。当北越人弄清了美国的真正立场后，他们就中断了谈判。他们不愿意只是为了得到一个试试看能否掌权的机会而接受和平解决，他们要的是肯定能掌握政权，做到万无一失。

基辛格在越南问题上沉浮了三年之久——今天升到了乐观的顶峰，明天又掉入失望的深渊——现在，感到达成交易依然遥遥无期。以至基辛格每提到“越南”这个词时，就会慨叹道：“真要命啊！”

四、战争边缘以强制强

基辛格并不是中东问题专家，但对大多数国际问题，他总是本能地从大国关系的角度去寻求解决办法。中东问题当然也不例外，他认为，苏联和美国有义务设法促使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和解。再加上基辛格原来是德籍犹太人，民族情感使他时刻保持着，对二战期间受苦受难的犹太人的同情和对战后以色列的深切关怀。早在五十年代末，基辛格就认为，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很有可能不久就要把他的控制范围扩大到约旦和黎巴嫩，创建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共和国，从而一举扩大纳赛尔的控制范围。这样肯定会促使以色列对开罗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那么苏联会立即支持埃及，美国则不得不支持以色列——结果势将引起这一地区出现大国对抗的局面。

1967年6月，这种对抗局面差点成为现实。在埃以“六日战争”中，由于美苏双方的极大克制，大国才没有卷入战争。对尼克松来说，越南是最伤脑筋的事，而中东则是最危险的问题。所以他上任不久就将中东问题交给了罗杰斯和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1969年10月末，美苏双方在华盛顿就共同方针问题达成了部分协议，最后解决方案中，规定以色列不得占有西奈半岛，但可以建立非军事化区。但苏联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肯让步，这使尼克松非常失望。虽然尼克松非常希望做成一笔交易——不仅为了中东的平静，而且还想为美苏在印度支那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等问题上达成协议创造出一个出色的范例，但他并不想拿以色列的生有作代价。

1970年1月，由于以色列飞机对埃及腹地的导弹基地和其他军事目标进行了一系列闪电袭击，导致了苏联人的激烈反应，他们不仅为埃及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而且还直接参加了军事行动。于是在4月初，尼克松不得不对中东政策进行一次更全面的审查，探索是否有可能再采取什么外交倡议，来制止该地区越来越剧烈的暴力行动。这样，由于苏联人卷入中东的新行动所造成的局面，使得基辛格在中东问题上第一次正式负起了责任。

对于基辛格来说，中东问题一直是一个有两层涵义的问题。一层是阿以争端，更上一层则是美苏之间可能发生对抗。他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大局”上——即超级大国的战略、克里姆林宫的意图、力量的平衡，以及局部冲突引起大战的可能性等等。他认为，苏联和美国都不想在中东打仗，但是，由于两国站在中东斗争双方中的各一方，因此两国就有可能身不由己地卷入一场全面战争。而苏联人在中东的所作所为，不管目的如何，从长远来看，总是对西欧、日本，也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基辛格有一种预感，如果阿拉伯的激进分子，在苏联人的怂恿下成功地接管了黎巴嫩和约旦，那么沙特阿拉伯的大量石油贮藏就有被左派夺取和控制的危险。其后，波斯湾那些盛产石油的酋长国，还有伊朗，也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以色列势将在一场恶战之后被赶入大海完事。西方从此休想染指中东的财富和战略要地，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也许就会无可挽回地转向对苏联有利。

基辛格在权衡利害关系之后，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力求达到加强阿拉伯力量中的温和派政权而不加强激进派政权的目的。应该力求把苏联人在中东军事力量赶走。当然，基辛格的意思并不是指美国要用武力把苏联人从埃及“赶走”，但他乐得让这个外交谜语带着一点这样的含意，它使苏联人又猜疑又担心。而基辛格的中心思想是，总有一天埃及人会看透国际环境中的某些征候，由他们自己作出决定来把苏联人“赶走”。事实上，

两年后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时，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美苏之间的缓和气氛代替了早先的对抗情绪。埃及人感到被出卖了，于是就命令苏联的战斗人员撤出埃及，并驱逐了一大批苏联顾问。基辛格那时别提有多高兴了。

但在1970年9月，苏联人并没有认真对待基辛格和尼克松。他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故意拖延，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摆出不合作的姿态，现在又在中东制造纠纷。他们开始侵犯西方在约旦的利益，引起一场一度超过越南问题的战争边缘危机。

1970年夏，约旦的形势变得十分危急。巴勒斯坦突击队组织在法塔赫的领导下，决心要摧毁侯赛因的亲西方政权，以便像利用黎巴嫩和叙利亚那样，把约旦也作为打击以色列的基地。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则决心要保持以色列和约旦边境的平静。即将爆发的约旦内战可能很快就会影响到美国在中东的利益。9月17日，约旦的内战发展得更为严重，叙利亚的坦克也逼近了约旦边界。而在白宫，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如果叙利亚坦克越过边界，美国要不要采取行动？如果采取行动，用什么方式？基辛格认为，美国必须防止侯赛因崩溃，必要时就直接进行军事干涉。他毫不怀疑，如果巴勒斯坦突击队在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苏联人的支持下推翻了侯赛因国王，以色列就会大举进攻阿拉伯人，该地区的力量平衡立刻就会受到威胁。但在具体如何干涉上，基辛格采用了西斯科的提议：美国如果直接干涉，从眼前看也许能挽救侯赛因，但从长远看倒是害了他，使他在阿拉伯人当中信誉扫地，因此，与其用美国军队来救他，不如考虑用以色列军队来救他。

9月19日，至少有100辆叙利亚坦克已经越境进入约旦，局势越来越严重。那天是星期天，基辛格主持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讨论美国的对策。在这场错综复杂、极端严重的战争赌博中，基辛格统一调度军事、外交、政治各方面的全部活动。他守在情报室里，在总统的严密指导下指挥一切行动，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士，摇身一变而为陆军上将兼海军上将的人物。

傍晚，消息传来，又有不少叙利亚坦克越境进入约旦。基辛格对苏联人十分生气。他们作了保证，可是说话全不算数，他建议美国军队进入战备状态，得到总统同意。首先命令82空降师处于戒备状态，同时把这个消息有意识地透露出来，然后下令驻在西德的空降部队开往机场，经过高速公路时故意做得显眼些，为的是让苏联人明确无误地收到这个信号。在这个存心炫耀武力的过程中，第6舰队实力扩大了，它的舰只徐徐驶向黎巴嫩和以色列。

在国内的讨论中，存在着两派观点。罗杰斯代表谨慎从事的一派，强调外交行动比军事威吓或军事行动更重要。基辛格则代表强调实力的一派，认为如果美国想保卫本国利益而不准备显示实力和使用实力，它在克里姆林宫、中东或世界各地就永远树立不起威信来。

9月21日，伊尔比德落入叙利亚手中，约旦境内已有300辆叙利亚坦克。在约旦东北，伊拉克有2万军队跃跃欲试，准备干预，而巴勒斯坦极端分子还扣押着55名飞机乘客作为人质，像是准备采取激烈行动的样子。美国驻在西德的5个师剑拔弩张，进入了全面戒备状态。第6舰队所辖的以航空母舰为主力的特混舰队，已由2支增加到5支。在此情况下，西欧多数国家都反对美国干涉。罗杰斯则建议对苏联人采取一种新的外交做法，如由苏美采取联合行动使该地区的激烈情绪平静下来。尼克松在基辛格的强烈支持下，否定了这个建议。很明显，在这个冒险赌博中，美国只有一个盟国——以色列。

尼克松指示，由基辛格担任美方的主要代表，跟拉宾共同协调美以行动。这时公众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罗杰斯和西斯科身上，但是，无形之中，在舆论不知、国务院不党的情况下，谈判一项在约旦危机中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空前秘密协议的重担，就悄悄地落在基辛格和以色列外交部长拉宾身上。

拉宾向基辛格介绍了以色列的全部军事计划。他每天向基辛格送两次最新的以方情报摘要。到了星期一（21日），苏联代表沃隆佐夫拜会西斯科，暗示苏联可能改变态度，透露出苏联正在约束叙利亚，希望美国也要约束以色列。入晚，有证据表明约旦已经制止住了叙利亚军队前进的势头。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是，叙军人侵约旦受挫后会不会增援，没有同叙利亚部队一起越过边界的苏联顾问，现在会不会接到新的指示而随军南下。对此，以色列内阁作出了一项决定，如果叙利亚境内的剩余坦克向前推进，不管有无苏联人在内，以色列都要进行干预。

深夜，叙利亚又有一批坦克越过了边界，看来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可能已在进行。约旦军队无力把叙军从伊尔比德撵走，侯赛因又一次发出“紧急救援”的呼吁，于是美国决心采取行动。基辛格和拉宾再次会晤。拉宾强调，以色列希望美国不介入中东战争，但尼克松必须保证，以色列军队开进约旦或叙利亚时，美国将对苏联实行威慑，防止苏联干涉。基辛格向总统请示，得到尼克松的同意。美国与以色列的协议是明确肯定的，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以色列将对进入约旦的叙军发动进攻；如果埃及或苏联军队对以色列采取行动，美国将对埃及和苏联进行干涉。局势太紧急了，把这一异乎寻常的协议写成文字的时间都没有了。两国分头同时行动起来。

以色列大批坦克向约旦河开去。在戈兰高地，到处可以看到备战情况。西斯科告诉沃隆佐夫，以色列有能力出动部队是毫无疑问的，美国决心把侯赛因从叙利亚和突击队的围攻下解救出来，也是毫无疑问的。

9月22日，星期二，紧张局势突然缓和下来。在美以协作的保证下，侯赛因向叙利亚人发动了全面攻势。到傍晚时，叙利亚坦克开始调头朝北向边界驶去。在当晚的一个宴会上，沃隆佐夫在无人的地方，急急忙忙向基辛格强调说明，苏联正在尽全力制止叙利亚。而基辛格的回答则是：“事情是你们和你们的受援国惹出来的，得由你们去收拾。”

9月23日，星期三。叙利亚的最后一批坦克正在从约旦撤出。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停止的速度同当初准备行动时一样快。基辛格和拉宾握手相庆，他们之间达成的这个未经公布但很重要的协议，已经同约旦危机本身一起成为历史了。但是两人都意识到，他们已创出一个先例：美国并没有同以色列签订正式防备条约，但同这个国家可以搞联合军事计划，甚至达到答应在苏联对以色列采取行动时提供“保护伞”的程度。

五、多极平衡思想下谋求发展对华关系

尼克松从总统候选人变为总统的时候，已经把新的对华政策各项要点综合起来了。他要设法跟中国领导人开始坦率的对话，目的在于使中国领导人同美国进行合情合理的会谈，1968年11月26日，北京电台广播中国外交部声明，建议早日恢复1968年1月8日中断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引起了白宫人员的注意。基辛格班子里和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于1969年2月下旬可能恢复的中美会谈都兴高采烈。但当美国给予在荷兰叛逃的中国外交官廖和叔以避难权之后，中国突然取消了原订于2月20日举行的中美会晤。

对于恢复会谈，基辛格并没有像他的僚属那样感到兴奋；对于取消2月会谈，他也没有像他们那样感到失望。在一开始，基辛格的着眼点是更长远更全球性的。他预料要出现一个五角的新世界——美国（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大），苏联（经济上脆弱而军事上是巨人），中国（人口上和地理上的大国，但在其他一切方面都只依靠其潜力），日本（经济上的巨人，军事上的侏儒，宪法规定不准拥有军队），西欧（经济上不断增长但军事上依附于华盛顿）。在这样一个扩大的世界里，同中国接近可以有很大的好处。这可以影响苏联采取比较灵活的立场，从而缓和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那种在战后年代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僵持局面，可以造成外交变化的种种组合，看来是无穷无尽的。这其实是基辛格把古典的多极力量平衡体系引入到现代世界政治中的灵活运用，是他早期论文《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问题》中所提的均势理论的实践。

1969年2月，基辛格正专心于一些眼前的问题——越南战争、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总统即将进行的访问西欧，因而他认为中国是次要问题，几年内大概不致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但形势的变化却改变了基辛格的态度，使他从尼克松政府开往中国的火车上的一个乘客变为一个司机——至少是副司机。

一方面，尼克松总统加快了同中国接触的步伐，他通过法国总统戴高乐、巴基斯坦的阿迦·穆罕默德·叶海亚将军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总统濒濒向中国领导人暗送秋波，并从1969年夏季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宣布一次同中国和解的单方面行动；另一方面，正好在美国对北京发出一系列信号的时候，中国人和苏联人在漫长的边界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珍宝岛事件，导致了这两个大国的同盟关系的瓦解。美国政府一度认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存在的那种牢不可破的团结，已经化为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沿岸的血泊而泯灭了。

在这种背景下，基辛格在8月下旬邀请中国问题专家艾伦·惠廷就中苏对抗问题举行了一次无拘束的谈话。惠廷认为，现在正是历史上的大好机会。美国是理解中国所处的处境的，它可以相隔20年后第一次向太平洋彼岸伸出友谊之手；而中国则在文化大革命之余立足未稳，又惴惴于苏联重兵压境，因而很可能欢迎美国的这个姿态。一时之间，太平洋大国可能来一个大改组的形势忽然变成了中心问题——对基辛格来说，这个形势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虽然基辛格的观点改变得晚了点，却终于成了发现新中国的当代马可波罗。

从1955年起，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官先后在布拉格和华沙举行过134次会谈，但却没有真正交换过意见。现在，基辛格决定建立一条认真会谈的渠道，

以结束那种“可怜无益费精神”的局面。在10月初基辛格打电报给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明确指出要他找到中国最高级外交代表，建议恢复华沙谈判。在12月3日的一次招待会上，斯托塞尔向中国大使馆代办雷阳表达了这一意向。对此中国人似乎没有什么准备，但还是接受了。12月11日，斯托塞尔和雷阳在中国大使馆正式会晤，双方同意恢复华沙会谈。到1970年1月8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华沙会谈将在1月20日恢复。在此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发言人第一次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字。

会谈如期举行，气氛是实实在在的，双方都提出了互派记者、学生和科学家的新方案。但只达成了一项协议——2月20日再度会晤。基辛格对于这个虽然不大但是积极的成果感到高兴——某种渠道总算重新建立起来了。

然而，这一渠道曾因美军入侵柬埔寨一度被隔断，好在形势总体上是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所做出的新姿态，和美国采纳“两个中国”方案，不再认为只有台湾可以在联合国代表中国这一重大态度的改变，都促使双方有了重新会谈的欲望。11月9日，巴基斯坦领导人叶海亚访问中国，给中国领导人捎去了代表美国发出会谈新信号的外交文书，在以后的两个月中，美中双方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通过巴基斯坦互相交换信件。而此后美国在老挝采取军事行动遭到的失败却保证了打开中国的局面，它使毛泽东确信，美国在亚洲事务中代表一股退潮，而苏联则代表一种日益增长的威胁，两国首都之间的间接通讯几乎马上恢复了，由巴基斯坦转交的信件，其语调也由以前的含糊不清变得具体明确。到了1971年3月底，美国一位高级人士访华已是势在盾睫了。

1971年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阿迦·希拉里将一封手写的短筒交给基辛格。这是中美两国首都间最新也是迄今最重要的一次秘密通信。这封信邀请一位“美国使者”去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高级会谈，信中提到了两个人的名字——罗杰斯和基辛格。基辛格无疑是最佳人选。

1971年4月6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乒乓球队邀请了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邀请表面上是为了促进两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实际上是向美国作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姿态。4月10日，9位乒乓球运动员、4位乒协人员、2名家属和最后一刻才得到签证的3名记者走过了罗湖桥。这是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个正式的美国代表团，由于他们是应中国的邀请前来为一项外交行动执行打前站的特殊使命的，所以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在5月和6月里，尼克松和基辛格共同研究了将在中国举行的秘密谈判中肯定会遇到的问题。基辛格又成为一名学者，他过着双重生活——在公共场合，他谈越南问题、苏联问题、欧洲问题；在背地里，他正在成为新中国问题专家。

基辛格的访华日期定在7月9日到11日。为了掩人耳目，基辛格“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他从7月1日起开始在亚洲作一次长途“了解情况的旅行”。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他利用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的安排，假装到郊外的蒂亚加利山庄休息，实际上却戴上墨镜和草帽，在巴基斯坦有关人员的掩护下，悄悄登上了巴航飞机，越过世界上最雄伟的山巅到达北京，前来迎接的是叶剑英元帅和黄华大使。

下午4点钟，周恩来来到了基辛格下榻的宾馆。这是极不寻常的礼遇，一般情况下，政府首脑是不会登门拜访来客的。因此基辛格受宠若惊，深为

感动。两个人同时握住了对方的手，这是中美抛弃前嫌迈出的第一步。双方在会谈时达成默契，对于有争议的各种问题，不急于作彻底的讨论。台湾问题只是简略提到一下。7月11日，基辛格给尼克松打了一个代号“尤莱卡”的电报，通知他说，这次访问很成功。从北京回去后，基辛格给总统起草了一份报告，非常高兴地说：“我替你和毛泽东共同翻开历史的一页奠定了基础。”7月15日，尼克松把基辛格的秘密访问和他将于1972年5月之前访问中国的计划，在电视上向公众宣布，使得所有人大为吃惊。

基辛格前往中国是为了打破20多年来中美的隔绝状态，打通两国之间的直接对话，他获得了成功。他去中国是要促使中国领导人采取灵活的、建设性的新态度，他达到了目的。他去中国是为了压北越人，也是为了战略上制胜苏联而走的一步棋，他希望这方面也将收到效果。早在访华前，他已有了一点名气，如今更一跃成为全国和全世界的大明星。7月17日，《纽约时报》给基辛格起了个“高深莫测的西方人”的雅号，说他“明里装得好像是成天只知出席酒会的贵宾，暗地里却在开展总统外交。这要求具有非凡的才智和惊人的腿功，要会装蒜，有时似乎还懂得耍点魔术呢”。

1971年10月，基辛格带了一个“先遣人员”小组去中国，为尼克松的亲自访问做准备。基辛格和周恩来用了25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讨论世界形势，还用了15个小时磋商一项声明，这就是后来人们知道的《上海公报》。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及其大批随行人员抵达北京，3个小时后，就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会见持续了近1小时。双方从基辛格第一次秘密来华、谈到美国总统选举。在宴会上，尼克松在祝酒词中表明，美国新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他说：“过去我们有时候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时，我们双方都不会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每天晚上社交活动后，基辛格都要同中国外交部高级官员逐字逐句地研究公报的每一个草案。台湾问题是双方争论的焦点，美国仍存在“两个中国”的概念，中国方面则要在公报中明确，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最后，《上海公报》这样表达：“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从此，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全世界都强烈地感到，这次访问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外交局面。在台北，蒋介石政府保持着一种闷闷不乐的沉默，却明显地对华盛顿作为一个盟国所作的保证已经丧失了信任。在莫斯科，苏联政府的评论是辛酸然而克制的，面对这一变化，却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整。在东京，佐藤政府跨了台，7个月后，他的继任田中角荣跟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在西欧，态度是赞成的，但也夹杂着忧虑。在河内，是一片沉寂。

1972年3月1日，基辛格私下会见记者时，对这次访问作了结论，说它不仅推动了当时只能隐隐约约看到的一种历史进程，而且使每个人都有了“选择未来”的权力。他和总统现在开始考虑莫斯科之行了。

六、在美苏谈判中演双簧戏

尼克松是踏着中国人的肩膀走向莫斯科的。他在 1971 年 7 月 15 日宣布访华之后不到四个星期，苏联人正式邀请美国总统在 1972 年春天访问莫斯科。基辛格又一次充当了外交先行官。1972 年 4 月 20 日，基辛格乘坐总统座机飞赴莫斯科。这是一次秘密访问，基辛格和勃列日涅夫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几项条款和一项共同的原则宣言达成了协议。这次访问在基辛格回国后才予以公布。

对于尼克松和基辛格来说，在 1971 年 5 月 20 日美苏所达成的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过失，就是没有将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包括在内，此外，基辛格还在幕后渠道里同意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对苏联导弹部队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化将不作任何限制，这引起了国内许多人士的不满。到 1971 年 11 月，当美国和苏联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代表在维也纳举行第六轮谈判时，白宫改变了它原来对现代化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主张，想使苏联限制它的制造潜艇计划，并放慢改进其洲际弹道导弹部队的质量。但苏联代表以 1971 年 5 月 20 日的协议为由予以拒绝，谈判陷入僵局。基辛格同尼克松只好再次利用幕后渠道来弥补已造成的损失。解决的办法是美国愿意为大宗出售谷物提供补贴，帮助苏联度过歉收之年，以换取苏联人在谈判中的让步。但基辛格和尼克松将来都不能透露此事，否则就说明先前的幕后交易中曾有失误，而且他们都将对苏联秘密购买谷物引起美国小麦价格上涨的丑闻负责。

在 1972 年的前几个月里，基辛格一直亲自参与了悬而未决的同苏联的谷物交易及其他贸易问题。在 4 月底基辛格的这次秘密访苏中，也提到了贸易和信贷问题，但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却坚持说，他不可能知道苏联迫切需要美国的粮食。

基辛格不仅是以粮食交易使苏联同意在最高级会谈中讨论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问题。在这次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他没有带任何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代表团成员，绕过负责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杰拉德·史密斯，独自同苏联人达成了协议：把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问题重新列入了莫斯科会谈的讨论议程，交换条件是，同意在双方代表团议定的临时协议有效期 5 年内，让苏联有权制造多达 62 艘潜艇和 950 个导弹发射器。而在此之前，史密斯团长曾多次反对基辛格搞这种幕后交易，基辛格向他保证：“请放心，不会搞这种谈判的。”但直到 4 月 24 日，即公开宣布基辛格访苏的前一天，史密斯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很明显，基辛格在这次美苏高级会谈的前后，就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一直对国内在演着双簧戏。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从来不信任官僚机构，而实行自己一人向总统负责制。由于尼克松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存在矛盾心理，对情况又缺乏了解，在莫斯科的所有关键问题都是由基辛格一手处理。如果他决定要在潜艇弹道导弹问题上作出让步的话，他就让步；如果他要把美国的让步说成是美国立场的胜利，他就这样讲。

基辛格这样做自己也有理由，因为在 4 月间，尼克松认为如果他不对河内南方的进攻作出反应就去莫斯科的话，他在政治上就过不了关；同时他还坚持，如果他去，就要取得完全的信任。基辛格则认为，如果他能把潜艇弹道导弹问题这块绊脚石，就可以为尼克松访苏打下基础，尼克松就有希望在莫斯科获得荣誉。这样尼克松就可以兑现他在 1971 年 5 月间的诺言。当

时他曾宣布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冻结进攻性武器和达成反弹道导弹协议方面取得了“突破”。基辛格则可以不顾在越南发生的事争辩说，在莫斯科收获少些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义务。

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后便同尼克松站在一起，为限制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辩护，共同对付杰拉德·史密斯等人的批评。基辛格反击那些他明知是正确的，而且他确实曾用编造假情报予以破坏性的攻击，这些假情报使在5月份的会谈中吃尽了苦头。其结果，史密斯尽管心里不痛快，但还是飞回赫尔辛基去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5月22日，反弹道导弹的问题解决了，尼克松同基辛格在100多名记者的前呼后拥下来到莫斯科，开始了为期8天的美苏首脑会谈。尼克松的心情很好，他将弄到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而基辛格则将再次证明谁才是总统的左膀右臂。双方高级官员都清楚，最高级会谈只是一个手段。会谈的敏感问题主要是越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在越南问题上，双方态度都比较强硬，尼克松要求莫斯科运用它通过供应军事所获得的影响，使河内三思而行；勃列日涅夫则要求美国扔掉阮文绍政府，接受河内“合理的”政治纲领。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基辛格和尼克松合作，对苏联人也上演了一出双簧戏——他们一个高举警棍，一个忙递香烟。尼克松扮演的是表现严厉的角色，在坚持了自己意见很久很久之后，突然提出与自己原先的立场极不相同的“大胆的新建议”；而基辛格则相反，显示出一副愿意花大本钱的样子，要钱给钱，必要时要命也行，为的是在交易中取信于人。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莫斯科完全控制了新闻界，这在华盛顿是办不到的。报纸的头版和广播电视都是重复他们的讲话。外人，甚至国务院的翻译都不能参加谈判会议。翻译工作都由苏联人担任。基辛格没有带任何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专家到莫斯科，甚至也没有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家去，坚持由他一个人进行谈判。所以尽管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代表团还在全力以赴阻止基辛格对苏联人的让步，即允许苏联的现役和正在制造的潜艇及由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数目超过美国情报机构估计数，但杰拉德·史密斯同他的专家都不许到莫斯科来，他们只得心烦意乱地通过海底电缆监听会议情况。史密斯自己也明白，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实际上在莫斯科最高会议之前就已达到，剩下的只是非常技术性问题，而且远不是总统的知识范围以内的事。

在谈判过程中，基辛格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一方面，由于他在4月间向勃列日涅夫作了让步，并为了向国内解释而编造了有关苏联武器的一些不真实数字，而苏联领导人现在却不肯作任何让步，他们坚持要以基辛格编造的潜艇数量为准。另一方面，除了史密斯及其成员在不断地反对和纠正基辛格的方案外，五角大楼也有想法，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黑格提出了一系列越来越尖锐的不满意见，好像准备要放弃他们郑重支持过的要在冻结进攻性武器中包括潜艇和潜艇弹道导弹发射器的条件。面临失去右翼支持的基辛格转而求助于尼克松的保护。尼克松当然明白，如果闹分裂的话传到新闻界，或者五角大楼不支持自己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达成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那么就会在国内引起破坏性的政治后果，但他告诉基辛格：“如果五角大楼不愿干的话，就按着我们自己的条件缔结一项协议，不必去管什么政治后果。”尼克松的信任使基辛格勇气倍增，他对黑格采取了粗暴的态度，也严厉批评了史密斯。

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是在5月26日签署的。史密斯在作最后的努力来改

变潜艇弹道导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在这天中午基辛格发来电报说，问题都已解决，并要史密斯当晚赶往莫斯科参加签字仪式。显然这是基辛格害怕史密斯节外生枝才在最后一刻通知他。当史密斯同他的人员飞到莫斯科时，没有美国大使馆的汽车来接他们，以至史密斯差点赶不上新闻发布会。而当史密斯在会上就记者关于潜艇弹道导弹问题作回答时，基辛格中断了新闻发布会并宣布在举行正式签字仪式以后，他将再次接见记者。这其中除了害怕史密斯有什么不合作的言论，将记者招待会搞糟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基辛格的肚量有些狭小，害怕史密斯分享他的功劳。

美苏首脑会谈除了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外，还签署了其他协定，如设立联合贸易委员会以鼓励扩大贸易的协定、污染控制、医药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协定。同时，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以扩大在若干科技领域里的合作。此外，还商定进行一次联合的空间轨道航行。最后，双方签定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它规定了双方共同遵守的12条行为准则。美苏之间的这种缓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当双方的军事力量暂时达到平衡时，谁想运用实力来取得好处都不大可能，于是就看能否利用缓和来维护各自的利益。就战略武器本身来说，基辛格的让步可能使美国受到了损失，使苏联走到了前边。但就美苏首脑会谈所产生的辐射性影响来说，基辛格无疑是有他的贡献的。

七、“我不像搞阴谋那样执行我的职责”

1972年6月17日晚，尼克松竞选班子总部的首席安全顾问詹姆斯·麦科德同4名工作人员一起，携带无线电对讲机、照相机和电子窃听器，悄悄潜入华盛顿水门饭店民主党总部，偷拍了民主党的档案和秘密文件，并在暗处安上窃听器，准备偷听民主党首脑在屋里密谈竞选策略的谈话内容。不幸的是5人都被当场拘捕，这就是著名的水门事件。

在大选之前，事情被暂时搪塞过去。自1973年起，美国政府、司法部门和国会先后组成了十多个机构围绕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和审理。在调查和审理过程中，查出了在总统竞选运动秘密捐款中的许多非法活动，揭出了挪用大笔竞选基金供掩盖水门事件之用，并且还暴露出了白宫与中央情报局假借“国家安全”的名义大搞窃听电话和其他特务间谍活动。司法部门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之后，要求对白宫人员，特别是尼克松的左右手霍尔德曼与埃利希曼进行传讯，甚至要求尼克松本人出席作证。

基辛格是尼克松的重臣，但不是尼克松的心腹。他同尼克松的关系，是从尼克松1969年初当上美国总统才开始的。他为尼克松效劳，不是出于党派利益或与尼克松的私交，而是为了实现他的谋略和政策抱负。这一点，使他和米切尔、霍尔德曼及埃利希曼这些跟尼克松交往多年的心腹人物有很大不同，因而也成了使他免于卷入水门事件的重要原因。

在水门事件发生之初，基辛格对它并不在意。尼克松连任总统之后，基辛格觉得美国国内外的情势表明尼克松地位的稳固和美国外交在许多方面取得的进展，会使他有可能进一步推行他的外交计划了。用他自己的后来说，就是在未来四年内“会有一个极富有创造性的时期”。可是，随着水门事件真相的逐步揭露，及其对美国内政外交影响的扩大，基辛格也受到了冲击，他对这一事件不得不关心起来。

1973年4月23日，基辛格在纽约华道尔夫-阿利斯托里亚饭店举行的美联社年度午餐会上，向报界谈所谓“欧洲年”的问题。有人在会上递条于要他讲讲水门事件，而且问他，水门事件发生的那天晚上他在哪里。

“我晚上的活动经常有很好的证明人，可以证明我不在作案现场。”基辛格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碰到这样的挑衅性责问，有点发火了。

不过，他当时还不了解水门事件的全部真相，尼克松本人和他的白宫助手也没有给他讲过实话。因此，他是相信尼克松的态度和立场的。基辛格在会上严肃地表示：“我毫不怀疑，总统将像他公开说的那样，坚持揭露全部事实。做到了这点，这个人间悲剧也就结束，美国将继续前进。”

基辛格固然对水门事件不以为然，但他对民主党和报界利用此事掀起轩然大波而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搞法也很反感。他在会上责问道：“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经得起一场互相攻讦。我们是否应记住，危机无论多大，美国还要长此存在下去的。”他的意思是，不应为了党派之争的利益而损害美国的利益。

可是，有东部财团背景，当时正热衷于揭露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在第二天报道基辛格这次重要外交讲话时，却对“欧洲年”的问题一笔带过，而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基辛格关于水门事件的谈话内容。虽然这使基辛格很生气，但事后证明，他的“欧洲年”计划倒真的成了水门事件的牺牲品。尼克松在年内访问西欧的计划，也因为水门事件越闹越大而告吹了。

到了5~6月间，水门事件又进一步波及到基辛格。尼克松的一些敌手通过《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等报纸，公布他们所称的联邦调查局材料，指责基辛格在1969年5月到1971年2月期间，曾经下令对白宫的13名高级官员和4名记者进行窃听电话活动，侵犯了人权。与此同时，在水门事件上一口咬定尼克松有罪而主张对他进行弹劾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也支持对基辛格的这一指控。这些行动的用意，是想借此对与水门事件无关的基辛格抹黑，把他攻倒，或者逼他引退，从而挖掉尼克松政府的墙脚，使尼克松陷于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

基辛格对此进行了理直气壮的反驳。他一再声明：“五年半来我一直设法以光明磊落的态度为政府服务”，“我不像搞阴谋那样执行我的职责”。他表白自己并未直接下令进行窃听电话，只是由他的办公室提供了一份能够阅读机密文件的人的名单，而其中有一些后来电话被窃听了，但这和他本人并无什么直接关系。基辛格的这种澄清，得到了国会的认可。国会两党的数十名议员联名发表声明为他说话，认为基辛格的“正直和诚实是无可非议的”。

由于尼克松在水门事件问题上遭到猛烈的攻击，处境日益恶化而越来越自顾不暇，需要借外交活动来掩盖自己的困境，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中的权力和地位，反而随着水门事件的演变发展而更为巩固加强了。1973年9月22日，尼克松任命基辛格为国务卿，一方面是缓和一下白宫与国务院以及国会之间久已存在的步调不一和牵制脱节的矛盾，争取国会的支持；另一方面是让没有牵连在水门事件中的基辛格来掌管国务院，借基辛格几年来在外“交事务中博得的“名声”来转移一下美国朝野的注意力。

基辛格在1973年9月担任国务卿之后的半年内，出访了25个国家，飞行了25万英里。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的中东穿梭外交活动期间，他差不多三天两头都要发表讲话，谈论国际形势与外交问题。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谈论。1974年1月3日，有一个记者在基辛格的记者招待会上问道：由于尼克松“受到水门事件的挑战和复杂情况的困扰，你作为国务卿是否正在以一种比你在头四年当顾问时较独立的方式执行着政策？”基辛格对此作了解释，他说：“宪法规定，执行对外政策的责任在于总统，国务卿必须是总统的代理人，否则他什么也代表不了。……因此，我完全反对那种认为我在试图推行一项独立的政策的说法。”

尽管基辛格如此解释，可是实际上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基辛格从事的外交活动越是繁忙，他在外交事务中的主动作用越是明显，他同尼克松之间的密切磋商越是相对地减少。例如，基辛格担任国务卿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只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的1973年10月24日晚才举行过一次会议，而且是没有尼克松在场的。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年内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基辛格已成了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统。《基辛格》一书的作者卡尔布兄弟认为，在1974年的前几个月里，基辛格“几乎成了唯一能站出来替那个被水门事件搞得狼狈不堪的总统撑腰的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真是颠倒得有趣，尼克松手下一介书生，竟成了护着总统不让人家拉下台的最后一座‘堡垒’了”。

到了1974年7月底8月初，水门事件的案情已经急转直下，水落石出。7月26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讨论对尼克松进行弹劾的决议。接着，弹劾之声很快在华盛顿传了开来。

在最后的几天里，基辛格的心里是非常焦急和复杂的。他看到尼克松大

势已去，却又对他的进退无能为力，某些程度上也是为了不把自己卷进去。只是在白宫办公厅主任黑格将军向他透露尼克松由于交出有关水门事件的三盘录音带而非下台不可之后，基辛格才如释重负。因为他这时可以解脱自己对尼克松个人的忠诚和情分，而仅仅效忠于他自己的职务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了。

8月8日晚上9点，尼克松在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向全国发表宣布辞职的电视讲话。第二天上午11点35分，基辛格在他的白宫办公室里收到了由黑格交来的尼克松的辞职信。全文只有三行：

亲爱的国务卿先生：

我谨辞去美国总统职务。

理查德·尼克松谨上至此，水门事件才告平息。在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既是基辛格的顶头上司，又成了他必须摆脱的一个包袱。据说“基辛格在促使尼克松作出辞职决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固然是为总统考虑，辞职可以避免参众两院的弹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基辛格强调“需要尽快结束危机；否则美国对外政策将受到严重损害”。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身败名裂，而基辛格却硕果仅存，像卡尔布兄弟说的那样：“在那被水门事件搅得昏黑的天空中，这颗彗星倒反显得更加光彩夺目了。”

这一连串的戏剧性的变化，在整个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8月9日下午，在尼克松离开白宫之后不到两个小时，福特宣布继任美国总统。他说：“我们国家长期来的梦魇过去了……这是一个使我们的心灵感到创痛的历史时刻。”

这位新总统的第一个任命，就是要基辛格当他的国务卿。

亚西尔·阿拉法特谋略

亚西尔·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革命领袖和象征。1929年8月24日生于耶路撒冷。为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他于1958年参与创建“法塔赫”，开展武装斗争反抗以色列的占领。1969年被选为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兼任革命武装力量总指挥，成为巴抵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73年十月战争后，他主张在不放弃武装斗争的同时，通过政治和外交斗争来争取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海湾战争之后，完全致力于政治解决巴以冲突。1993年与以色列达成临时自治协议，实现了巴以和平。1994年获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1996年1月，在巴勒斯坦人首次自治选举中，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

一、“我就是巴勒斯坦人民”

在争取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数十年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中，阿拉法特不仅成为巴勒斯坦人民的革命领袖，更成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一面旗帜。正是在这面旗帜的感召下，巴勒斯坦人民艰苦奋斗几十年才取得了伟大成果。在漫长的斗争岁月里，阿拉法特披肝沥胆，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维系在一起。他从不计较个人私利，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的事业。阿拉法特是民族的象征，他属于巴勒斯坦人民。

阿拉法特在外表上就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在一些重大场合中，阿拉法特最爱头戴花格阿拉伯缠头巾。这是一种极普通的头巾，在巴勒斯坦地区非常流行，但在外界看来却十分引人注目，特别是头巾的戴法更为别致：头巾缠在头上露出左耳，头巾的一部分从头上遮住右耳，垂落在右肩和胸前，酷似狭长的巴勒斯坦地图。头巾通常是红白相间或黑白相间，红色代表沙漠，黑色代表国家，白色代表城市。他还酷爱身着草绿色卡叽布军装，腰挎手枪。这一切使他的风度别具一格。他既是巴勒斯坦人民中的一员，又是一名英勇的巴勒斯坦战士，一名无畏的骑士。这几乎成了阿拉法特的象征。人们可以在报刊上经常看到他的这种英武形象。

阿拉法特擅长演讲，他的谈吐具有阿拉伯式的雄辩和激烈的风格，同时又下失政治家的沉着和稳健。他喜欢用一种粗犷的语调演讲而不过分讲究修辞。阿拉法特的演讲总是那样激动人心。他声音宏亮，铿锵有力，不时挥动那双有力的臂膀，富有战斗力和号召力，使人感到他正义在手，方向明确，充满必胜的信心。在阿拉伯世界，除了已故纳赛尔总统，他的演说才能可以说无人与之媲美。但他给观众的印象却与纳赛尔不同。纳赛尔演讲的口吻俨然是一位总统，而每一个巴勒斯坦人听阿拉法特演说时，则感到自己既是他的一部分，同时阿拉法特也属于自己。对人民的这种感情，阿拉法特总是引以为自豪。他常说，“我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他们。”的确，他只有生活在人民之中才感到自己的存在。

“阿拉法特属于人民”，并非是抽象的比喻，在时空概念上也是如此。在他的记事本上，从来没有专门用作休息和娱乐的时间。一年365天，他往往夜以继日地工作，他每天工作19小时，每天睡眠不超过5小时，甚至这5小时也要分作两段时间，第一段在清晨4时至7时，第二段在下午4时至6时，每天从早到晚，会见他的人川流不息。他几乎不能独自静坐片刻，甚至连打个盹也不成。只要他坐在那里，周围就一定坐着人，他似乎“害怕”一个人呆着。他甚至从未单独一个人吃饭，就连短短的用早点的时间也被安排接见当天无暇会见的人。有一天，一位记者在他下午吃茶点时采访他，然而就这点时间，工作也不放过他，进来向他报告情况和请他签署文件的人络绎不绝。有好几次他的嘴刚碰到茶杯，还未来得及呷一口茶，就不得不挪开，重又放下。采访结束后，记者说，单独与他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这位巴勒斯坦记者以责备的口吻对阿拉法特的一名随从说：“你们这样太不应该了，为什么不安排会见和会议日程，哪能如此消耗他的精力呢？”这位随从却惊奇地嚷道：“日程？你当我们在总统府里？我们在革命！革命怎能按部就班！”这位记者不无感慨他说，爱也是可以杀人的啊！确实，阿拉法特凭着对事业的热爱，为了工作和战斗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甚至从未想过要休一两天假。人民对于他的爱正是源于他对事业的爱。

阿拉法特的生活很简朴。他始终保持着阿拉伯人的传统习惯和朴素风格。他穿着朴实，不吸烟，也不喝酒，三餐也很简单。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员，不拥有宫廷，不喜欢头衔。承认阿拉法特高尚人品的，不只是他的巴勒斯坦人民和政治盟友，即使是巴解组织内部最坚决、最激进的政敌也承认他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献身于事业的人”，一个没有任何私利的领导者。

阿拉法特的一日三餐极为简单。早餐是一块奶酪、一片面包和一杯茶。有个局外人责怪阿拉法特身边人不应该给他吃得这样简单。这位随从带有几分委屈他讲述了这样一件往事：在贝鲁特被围困的日子，有一次早点为他准备几样吃的。他见了立即发火，问道：“为什么搞这么多，谁告诉你我要享受这么多好东西？马上拿给别人吃！这么多食物不该放在一个人面前。”实际上那天给他吃的仅是两种奶酪、橄榄百里香粉、橄榄油和蜂蜜，全是老百姓的家常食物。午饭他习惯于先喝点汤，然后把手伸向离他最近的食物，随便什么，取一点吃了即可，平时晚餐也只有奶酪和鸡蛋，有时还有蚕豆、酸奶或一杯果汁，不喝咖啡。整个白天，有时只喝一次茶，茶里加一勺蜂蜜，这可算是他最经常的奢侈品了。三餐之间则不进任何食物。即使在宴请别人时，他也吃得很少，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着交谈或为客人挟菜，并且一直陪到席终。倘若走进他的住所，那会令人大吃一惊。那里既是他生活的地方，也是他工作的地方，似乎他活着只是为了工作。巴解总部迁到突尼斯后，曾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幢小楼，但他拒绝去住，而是住进了一个由三间屋组成的地方。最大的一间作为办公室，室内放一张办公桌和一张长方形会议桌。为了能坐更多的人，会议桌几乎占据了大部分房间。办公桌上堆着厚厚的文件和卷宗，还有一块陶瓷做的标语牌。那是耶路撒冷一位素不相识的巴勒斯坦人送给阿拉法特的。他十分珍惜，因为这礼物来自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来自圣城耶路撒冷，它浸透着祖国泥土的芳香。标语牌的右边是一个地球仪，标有巴勒斯坦的一面始终面向主人。主人坐的椅子背后墙上悬挂着巴勒斯坦地图。紧挨着办公室由几张沙发构成一个小小的客厅。与办公室相连的一间小屋，只够放一张餐桌，阿拉法特在这里与客人一起用餐，有时一些特别会议也在这里召开。紧挨着的是警卫值班室，室内放有一张办公桌和3把椅子。出了值班室经过一条短过道就到了阿拉法特的卧室。屋里只有一张床铺，显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

阿拉法特的清贫生活完全是出于他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献身精神。他原出身耶路撒冷的一个殷实之家，祖、父辈都是当地富商。从1957年到1964年，阿拉法特曾先后在科威特的建筑业、公共工程部谋取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也做过建筑承包人。他有数次机会可以积聚大笔钱财，成为富翁，也完全有条件成家立业，享受天伦之乐，但他为了巴勒斯坦解放事业而放弃了这一切，走上了一条艰辛之路，开始了他四处漂泊，出生入死的革命旅程。阿拉法特完全把个人的幸福置之度外，做过一辈子不结婚的打算。他曾风趣地说过：“巴勒斯坦就是我的妻子。”事实的确如此，几十年过去了，阿拉法特始终恪守诺言，长期独身。他在回忆当初的决定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一个凡人，何尝不想有妻室儿女。但我知道，无数的艰难困苦等着我，我不忍心让一名妇女与我一起承受这些艰难困苦。因此，我决定终身不娶。我认为，我应该为我的人民，为所有的孩子做出牺牲！”这是一个铁骨铮铮的英雄的钢铁誓言。在大多数不带偏见的西方记者笔下，阿拉法特是一位吃

苦耐劳、不近酒色并放弃了其他世俗乐趣的极为清苦的革命者。这些记者喜爱引用他的许多“名言”，其中之一便是“我娶的是法塔赫，法塔赫是我的妻子，我的家庭，我的生命”。岁月匆匆，巴勒斯坦国宣告成立后，巴解的战略重心从武装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巴以和平也已是大势所趋。这时，年逾花甲的阿拉法特感到应该有个家了。1991年，他同苏哈·塔维小姐喜结良缘，婚礼在他的别墅里秘密举行，只有新娘的父亲和几位亲朋好友出席。婚后，夫妻情深意笃，但阿拉法特仍废寝忘食地工作，能同妻子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少。

同样，巴勒斯坦人也将阿拉法特视为自己的领导者和代表，而他也从不推辞这种信任和荣誉，甚至不过多地表示谦虚。正如他常说：“我就是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就是我。我是什么人，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做什么事。”阿拉法特赢得了巴勒斯坦人民的高度信任。

二、“革命暴力是解放家园的唯一手段”

阿拉法特领导着“法塔赫”长期坚持“革命暴力是解放家园的唯一手段”这一战略方针，为巴勒斯坦事业的复生点燃了希望之火。它体现了阿拉法特不为狂风恶浪所动摇的坚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决心，也是他发动人民，武装人民，使之众志成城，播下自尊自信种子的有力武器。战斗提高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地位，也使阿拉法特成为革命的领袖和希望的象征。

阿拉法特所坚持的：“革命暴力是解放家园的唯一手段”，既是一种策略，又是一个口号。作为一种谋略，它包括两个目标。一是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战争之后，成为无国无家的“难民”，他们饱受颠沛流离或以色列民族压迫之苦，为争取合法权利，重返家园，进行武装斗争是当时现实而有效的斗争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其中许多国家是通过长期武装斗争才取得独立的，特别是阿尔及利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对阿拉法特的影响很大。在这种时代的大背景下，阿拉法特的这一革命思想的产生是必然的。革命斗争的另一目标则是以此来确立巴勒斯坦人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阿拉法特的斗争策略是把革命暴力作为一种手段。因为阿拉法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他们所面对的是受大国支持的强大的以色列国家，国际上“强权即真理”的格局依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起相当大的作用，而人少力弱的巴勒斯坦人要想打败以色列几乎是一种神话，阿拉伯政权帮助他们打败以色列更是一种幻想。在阿拉法特看来，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出于不同目的却都怀有同样不明言的希望，那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应该消失。如果任其发展，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将被抹煞。为了提高以至确立巴勒斯坦人应有的地位，防止阿拉伯政权和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置之不理，进行武装斗争是唯一的选择。如果第一个目标不能实现，那么第二个目标的实现至少为将来巴勒斯坦立国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作为一个口号，它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它可以将离散各地的巴勒斯坦人凝为一体，激励他们积极投身于反抗以色列占领的伟大斗争中去，也使坚持暴力斗争的法塔赫成长壮大，逐渐成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中流砥柱。

阿拉法特的暴力斗争战略思想的形成与他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1929年8月24日，阿拉法特出生在耶路撒冷。他的父亲拉乌夫国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而遭到迫害，不得不带领全家迁居开罗。他的母亲在他4岁时就去世了，苦难的生活使他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阿拉法特十几岁时就参加了一些自发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1944年，他开始担任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领导人侯赛尼的私人秘书。侯赛尼的武装斗争思想深深地影响着阿拉法特，使他的思想日趋成熟。阿拉法特这时多次冒险参与从埃及向巴勒斯坦偷运枪支、弹药的行动，并成为关键人物之一。

在随后的阿以冲突中，阿拉法特积极投身于抗击以色列的斗争，日益显露出勇敢精神和出色的组织才能。这场战争令阿拉法特非常痛心。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尽管作战勇敢，但缺乏整体组织，落后的战斗方式和十分低劣过时的武器使他们无法在战争中确立自身的地位。阿拉伯国家失败的原因就更多了，如各大国对以色列的纵容和支持，特别是美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军事援助；英国的背信弃义，中断对阿拉伯国家的武器供应；联合国安排的两次停火等。但是，根本的原因在于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不团结和内讦内耗，在敌人面前，阿拉伯人没有统一的国家，不是具有统一意志的民族整体；他们彼

此戒惧，互相监视，尔虞我诈。他们所关心的事和指导作战的政策，不是打败敌人和从敌人手中拯救巴勒斯坦，而是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会出现什么局面，谁将会在巴勒斯坦占据统治地位或谁将会把巴勒斯坦据为己有，他们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野心，他们在内心深处希望一切全是自己的……。最终的结果是各行其是、互不协调的阿拉伯国家被以色列各个击破，以色列占领了除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之外的所有巴勒斯坦，大约 70 余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丧失家园、土地和生计，沦为难民，或者涌入被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及被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带，或者寄居到约旦、叙利亚、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等中东国家，丧失了民族自决权。阿拉法特陷入痛苦的思索中，如何才能使巴勒斯坦复生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他。他随父母逃亡开罗，后又移居加沙。在加沙，他亲眼看到了巴勒斯坦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他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都献于巴勒斯坦事业。

1950 年，阿拉法特进入福阿德大学（今开罗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他积极从事学生运动，1952 年当选为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并担任巴勒斯坦工会工作。通过学生会，他同散居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青年知识分子建立了广泛联系，为后来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打下了初步的群众基础。他还代表巴学生联合会向埃及当局递交了用鲜血写成的请愿书，表达了愿为巴勒斯坦事业献出生命的决心，并且创办了一份名为《巴勒斯坦之声》的杂志，号召人民为赢得应有的民族权利组织起来进行斗争。1956 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他毅然参加埃及军队，率领一支爆破队，奔赴苏伊士城同英法侵略军作战。

战争教育了阿拉法特。他认识到，只有靠武装斗争打败以色列侵略者，才能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为此必须建立巴勒斯坦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实现巴勒斯坦人的自我解放。因此，他在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后来到了科威特，以土木工程师的职业为掩护，开展反对以色列的政治活动。在科威特，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友们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他认为，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只有依靠军事行动才能确立，因为枪声远比语言更响亮。他们的任务是向阿拉伯国家和世界证实，巴勒斯坦人依然存在，他们的问题不能被掩盖起来。他还认为，如果任当时局面久拖不决，时间越长，就越容易使人以为巴勒斯坦人的斗志已经彻底瓦解。尽快采取一些军事行动来证明巴勒斯坦人并没有放弃斗争是紧迫而又十分必要的。同时，阿拉法特也被世界上发生的革命所激励，阿尔及利亚革命就像一把强烈的希望之火深深感染着他。当 1954 年阿尔及利亚开始他们的革命时，他们只有几百名战士反抗着 2 万法国军队和装备精良并富有战斗经验的移民。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启示是：一个民族能够自己组织起来并在战斗中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

1958 年，阿拉法特同他的战友们商定仿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体制，秘密筹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这就是“法塔赫”。“法塔赫”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征服”，它倒过来是“赫塔法”，正好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缩写。阿拉法特化名“阿布·阿马尔”，多方奔走，筹集资金，并在巴勒斯坦难民中开展宣传和发展组织。次年，他又创办《我们的巴勒斯坦》刊物，宣传“法塔赫”反抗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深受广大阿拉伯人的欢迎。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下，“法塔赫”不断发展壮大。起初，在该组织之下建立了一支武装小分队，后来又逐渐形成一支强劲的“暴风突击队”。1964 年 5 月，阿拉法特作为“法塔赫”的代表，参加了在耶路撒冷举

行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促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成立。

阿拉法特及他的“法塔赫”提出了“革命暴力是解放家园的唯一手段”，以此作为斗争的指导思想和号召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参加斗争的口号。阿拉法特的这一战略思想同时还意味着，他们与以色列的对抗，必然在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间创造一种对抗气氛，为了自己的尊严，阿拉伯国家不得不战斗，巴勒斯坦问题就会越来越突出，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就会随之提高。阿拉法特的这种激进的解决办法，也是为了矫正那种以不了解、否认和俯首贴耳地屈从既成事实来混淆历史根源的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1964年12月31日夜，阿拉法特率领“暴风突击队”潜入以色列占领区，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从此1月1日就成为巴勒斯坦革命发起日。当天，“法塔赫”发表了一份公报，宣布“只要巴勒斯坦没有获得解放，我们就不放下武器”。此后，巴勒斯坦各抵抗组织和广大巴勒斯坦民众逐步统一了认识，认识到暴力革命是确立巴勒斯坦人民的地位，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应有权利、最终返回自己家园的根本保证，于是纷纷拿起武器，进行更广泛的武装斗争。阿拉法特的“暴风突击队”日益活跃于敌占区，不断打击以色列侵略者。尽管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再次惨败，通过阿拉伯政权来解放家园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但是阿拉法特并未气馁，而是展开了规模更大、更频繁的游击战，巴勒斯坦抵抗力量的影响反而日趋扩大。特别是1968年3月在约旦河东岸的卡拉玛战役中，阿拉法特率领突击队伏击以色列侵略军，打退了1.5万名以军的进攻，使之遭受重大伤亡。这一战役大灭了以色列侵略者的威风，大长了巴勒斯坦解放战士的斗志。尤其是当阿拉伯国家还深深陷入1967年战争惨败的痛苦中时，卡拉玛战役振奋了阿拉伯民族精神。全世界都看到了巴勒斯坦人民是不甘屈辱、不能被消灭的。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及“暴风突击队”由此在国际上，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声名大振，队伍迅速扩大，发展成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一支最强大的力量。阿拉法特凭借巧妙的政治策略和组织措施使“法塔赫”最终成为巴勒斯坦事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卡拉玛战役不仅奠定了“法塔赫”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中作为主导力量的地位，也确立了阿拉法特的领袖地位。1969年，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可以说，如果没有暴力革命，就不会有阿拉法特及其事业。

阿拉法特的战斗口号是：“革命，直到胜利。”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也没有放弃武装斗争。他认为他所进行的斗争不是恐怖活动。在他看来，革命者和恐怖分子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为什么而进行战斗，不管是谁，只要他支持正义事业，并为自由和从侵略者、移民者和殖民主义分子的占领下解放其疆土而斗争，就不应当把他叫作恐怖分子。巴勒斯坦战士从阿拉伯前线国家出击，打击以色列，决不是恐怖主义活动。正是通过人民的武装革命，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领导成员和民族组织机构才最终得以具体化，包括所有巴勒斯坦派别、组织和有力量的民族解放运动才得以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实现。

正是通过富有战斗精神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才成熟起来，并且壮大到能够除了进行武装斗争外，还有力量和地位考虑进行政治斗争。由此可见，阿拉法特早期的暴力革命思想在整个巴勒斯坦人民斗争历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审时度势调整政策

巴解组织从武装斗争到政治斗争的转变，是巴解走出困境，由失败走向成功的关键转折点。这一转变是痛苦的而又艰难的，阿拉法特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实际上当时他为寻求一个真正的、现实的和平方案所做的工作，比以色列人、美国人和大多数阿拉伯人所做的工作都要多。他遇到的既有内部的压力，又有外界的阻力，但最终还是成功了。

1970年以来，特别是十月战争后，中东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阿拉法特及其领导下的巴解组织几度遭到重大挫折，巴解总部被迫两次迁移地址，损失严重。巴解组织将向何处去？痛定思痛，阿拉法特在不断地分析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他不再认为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方式，而是主张在不放弃武装斗争的同时，通过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争取实现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他大胆提出新的设想：对巴解组织的斗争目标和策略进行必要的调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右手拿枪，左手拿橄榄枝”。这一新战略包括：摒弃长期以来要把犹太人“赶进大海”的不现实主张，要求以色列撤出1967年占领的全部领土。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相互承认，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国，从而逐步实现在巴勒斯坦全境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设想。阿拉法特很清楚，这直接关系到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将面临内外两方面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和谈之路将极为漫长而崎岖。但是，阿拉法特没有退缩，也没有气馁。他认定，只要坚韧不拔地走下去，胜利一定属于自己。

1970年9月被巴勒斯坦人称作“黑九月”，巴解组织在同约旦的武装冲突中蒙受了严重的损失。但阿拉法特并不寻求这类对抗，而且他曾通过外交途径极力避免。然而结局是令人痛心的。作为一个能够发起反对以色列的重要军事行动的组织，在当时看来已无前途可言。阿拉法特开始努力说服那些转向恐怖行为的“法塔赫”成员，指出恐怖活动的后果将是严重削弱世人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历尽艰难之后，阿拉法特领导着巴解组织走出了困境。1974年是阿拉法特取得辉煌成果的一年。他决心并开始劝说巴解组织面对以色列存在的现实并作出让步。阿拉法特的外交努力使巴解组织起死回生。10月，第七届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使巴解组织的地位进一步加强。这在阿拉伯世界实际上就是给巴解组织以政府的地位，巴解的未来得到了保证。但是阿拉法特并没有陶醉在胜利中，他清醒地认识到，仅有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还不够，还必须赢得世界各国更广泛的支持。

1974年11月13日，阿拉法特应邀在第2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这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第一次参加联大会议。阿拉法特对各国代表说：“我带着一枝橄榄枝和一支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落下。”他呼吁各国人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11月22日联大通过了3236号和3237号决议，决定赋予巴解组织在联合国享有观察员的地位，并“重申巴勒斯坦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阿拉法特的努力使巴勒斯坦民族权利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承认。从此，巴勒斯坦问题成为联大议事日程中的一个经常性议题，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有着深远影响。

阿拉法特在联大上所持的立场是他根据形势的变化并取得巴解组织领导

层中的多数同意之后才决定的。十月战争之后，基辛格往来穿梭于埃及和以色列等国，力图使埃以达成和约，并进一步使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也达成和约。这种局面的后果将是，巴解组织将被其他阿拉伯国家所抛弃。面对这种挑战和威胁，阿拉法特的反应是迅速的、大胆的和富有勇气的。1974年2月，在阿拉法特的说服下，巴解组织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个被称之为“工作文件”的声明。它要求阿拉伯国家和国际上承认巴勒斯坦人“在从犹太复国主义占领下夺回的任何土地上建立民族权力机构的权利”。其中的含义是深远的，“民族权力机构”一词是巴解组织商定的“小型国家”的代号。这一文件，对以色列和全世界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它表明阿拉法特不仅仅是为谋求政治解决而负责工作。而且是为要求巴勒斯坦人接受他们原有故国土地70%的损失来换取在西岸和加沙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小型国家而作出更大的努力。这一现实的选择使阿拉法特赢得了世界各国更广泛的赞同，阿拉法特也得以出席联大向全世界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随后的大约5年时间里，阿拉法特对每一个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分别进行了疏通说服工作。当时有300名委员，在环境许可时，他一个一个地把他们从世界各地召集到贝鲁特，秘密地进行个别谈话。他还保存了一份记录，记载当他要求他们在适当时候投票赞成小型国家妥协方案时，哪些人表示同意，哪些人反对。阿拉法特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绝大多数委员表示了赞成。如果考虑到巴解组织内部的分歧和争议，甚至对抗的事实，那么阿拉法特为争取政治解决巴以冲突所做的工作确实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

1982年8月，巴解被迫撤离贝鲁特，失去了在黎巴嫩的武装斗争基地，主力分散在远离战斗前线的8个国家，使武装斗争的条件更加困难。但阿拉法特寻求政治外交斗争的策略却更加坚定。他赞同“非斯方案”和“约巴邦联”以及访问埃及实质上是抛弃了军事斗争选择了政治解决的道路。他含蓄地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并多次表示愿意坐下来同以色列谈判。但以色列总是采取拒绝态度，致使谈判始终未能举行。在丧失了军事行动的能力后，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主张是在新形势下对以色列的攻势，目的是变不利为有利，化被动力主动。这正是阿拉法特的真正高明之处。以色列真正害怕的是政治性的巴解组织。

1987年12月开始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民如火如荼的反占领斗争，对以色列打击沉重，国际社会也给予巴勒斯坦问题更大的关注。巴解组织抓住时机，于1988年11月的全委会特别会议上，通过了宣告巴勒斯坦国独立的《独立宣言》和一份《政治声明》，接受了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谴责并摒弃恐怖主义。这是巴解组织以全委会决议的形式完成了政治路线的战略转变。12月，阿拉法特在日内瓦联大会议上又提出3点和平建议，使上述立场更加明朗，从而打开了同美国对话的大门，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也得到长足发展。

阿拉法特为谋求和谈奔走呼吁，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有人称之为“阿拉法特旋风”。作为巴解组织主席，他不停地来往飞行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首都之间。他的外交活动甚至可以说比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繁忙。1989年5月他的法国之行更是被称为是巴解外交努力的一次突破。阿拉法特在访法期间阿时巴黎电视台的一次谈话中表达了许多新鲜内容。他宣布，20多年前通过的巴勒斯坦国民宪章已经“无效”，“已被历史所淘汰”。这是一个明确的表态。人们早就注意到，该宪章隐含用武装斗争摧毁以色列的内容，这与去

年 11 月巴全委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包含争端的决议相悖。现在，国际舆论认为，阿拉法特终于宣布抛弃前者。阿拉法特还宣布，如果以色列顽固反对巴解参加国际和会，他建议成立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联合代表团与会。他重申巴解接受在占领区举行选举的立场，愿同以色列的任何领导人会晤，准备接受以色列所需的一切担保。这显然也比巴解过去的立场前进了。新闻界评论阿拉法特的讲话是巴解谋求打开和谈之门的又一枚重型炮弹，顿时激起舆论千重浪。

这一切都表明，阿拉法特在继续调整政策，谋求政治解决的立场更趋灵活和现实。他在继续高举中东和平旗帜的同时，不再坚持必须在国际会议范围内同以色列谈判，转而呼吁同以色列直接谈判。巴解组织领导人把呼吁直接谈判的音像带送到以色列占领区，直接对以色列人做工作。为消除以色列的担心，阿拉法特还提出由美国派军队去约旦河西岸取代以色列占领军；由美、苏两国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提供保证，并进而提出巴、以相互承认永久性划界与和平共处的构想。

在阿拉法特的强大政治攻势下，以色列人被迫做出回应。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在 1989 年 4 月访美时，抛出在被占领区举行选举、从中产生巴勒斯坦同以色列谈判代表的 4 点和平计划。这个计划同巴解的要求相去甚远，但巴解组织在经过权衡后，仍然采取了“不把门关死”的方针，提出在以色列撤军和联合国监督两个条件下可予接受，并提出把选举同全面解决挂钩。

国际舆论认为，阿拉法特领导巴解组织调整政策顺应了时代潮流。他的行动使中东 40 年的战乱的和平解决有了现实的可能。法国舆论对阿拉法特的姿态深表赞赏，称赞在和谈方面“巴解已走了 90% 的路程”。美国官方也认为是“朝好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埃及等阿拉伯国家表示了欢迎和积极配合的态度。连以色列工党的一些领导人也承认阿拉法特的立场“十分重要”，应考虑同巴解组织对话。由此看来，阿拉法特锲而不舍地要感动欧洲，感动美国，并通过它们去感动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最终可能迫使以色列当局在内外一片要求和谈的呼声中改弦易辙。

阿拉法特为和谈所进行的不懈努力，为九十年代巴以和解的实现铺平了道路。阿拉法特的积极行动已为巴解组织争取了主动，改变了尴尬局面。但阿拉法特肩负的最终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神圣事业依然任重道远。

四、被动之中求主动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对话代替了对抗，和平代替了冲突。海湾战争后，阿以力量对比再次发生变化。出于现实的选择和未来的考虑，阿拉法特面对风险与困难，毅然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大胆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顺应时代潮流，为实现阿以全面和平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阿拉法特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阿拉法特善于总结经验教训。长期的军事、政治生涯使他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要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谈判解决国际、国内问题已成为时代潮流，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呼声，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九十年代美国构想的中东新格局及战略是，继续以西方价值观念遏制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分化、削弱阿拉伯与伊斯兰力量；牢牢控制石油通道的主导地位；构筑“中东安全体系”，建立美国的“中东新秩序”，使中东地区出现一种能确保美国战略利益的稳定与和平。海湾战争后，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阿以冲突问题。如果不提造成中东地区不稳定的最深刻的根源之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邻国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就谈论该地区的持久稳定和安全，那是不现实的。因此，美国急于缓和阿以冲突，把解决阿以冲突问题摆在了突出位置上。美国竭力敦促阿以双方执行联合国 242 号、338 号决议，并且正式提出了在确保以色列安全前提下考虑阿拉伯民族要求与利益的“以土地换和平”原则解决阿以冲突的主张。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布什为筹划召开西班牙马德里中东和会，派国务卿贝克 8 次穿梭中东，推动阿以和巴以之间的和谈。这对阿拉法特是一个极大刺激，他意识到，尽管巴解组织被排斥在和谈大门之外，但他仍有机会，关键是对机会的把握。

阿拉法特的考虑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国际大气候和美国的影响，还是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处境及立场的微妙变化，都使巴以之间有必要达成一项和平协议。阿拉法特的处境是艰难的，他所领导的巴解组织内部意见分歧较大。巴解是由“法塔赫”、“人阵”、“解阵”等许多组织构成的，一些组织有自己的后台和目标，它们并不完全听从阿拉法特的指挥。巴解武装没有自己的土地作根据地，以色列的报复使他们与这些阿拉伯国家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进行武装斗争，不仅力量不足，而且条件也不具备，阿拉法特的对手是强悍的以色列国防军和神通广大的摩萨德，在正面的军事较量中很难得手，40 年的阿以对抗表明，阿拉伯人无力把犹太人赶入地中海。军事上的一再受挫，失去家园的屈辱感和急于求成的心情，往往使巴解组织的某些组织成员挺而走险，采取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阿拉法特认为，这些造成以色列和西方平民大量伤亡的恐怖活动，非但没有达到自己的斗争目标，反而极大地损害了巴解组织的声誉。使阿拉法特倍感苦恼的是，他好不容易打开的和谈局面和争取到的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往往被极少数人的一两次恐怖活动断送了。同时，阿拉法特也看到，由于巴解组织长期流亡在外，巴解在被占领土上的影响日益下降。他也发现在被占领土的绝大多数沉默的人民已经把他们的心给了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另外，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热情日益下降。1948 年以后，阿拉伯国家确曾宣布过，全部解放巴勒斯坦是他们一项神圣的事业，他们对此承担着义务。然而经历过五次中东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明白他们无法在战场

上打败以色列。他们逐渐明白：解放巴勒斯坦，实质上意味着要同那些凭借着手中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手段控制世界的大国进行对抗。只要大国需要以色列生存下去，解放巴勒斯坦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使命。所以，阿拉伯政权在以色列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面前越来越软弱无力，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热情逐渐降温，阿拉法特领导的斗争越来越孤立。为改变不利局面，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阿拉法特决心以真诚的让步和妥协，以积极的和解态度来打破自身的困境。

尽管阿拉法特处境艰难，但他也有有利的一面——被占领土上人民的要求和支持是他的强大后盾。一般来讲，生活在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与生活在阿拉伯国家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的政治要求有所不同。

生活在阿拉伯国家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大都来自 1967 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只有以色列完全撤出或消灭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全境，他们才能返回自己的家园，重享居家之乐。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长期流亡在外，生活在阿拉伯国家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一直是他的主要支持者。赶走犹太人，消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国民宪章》就代表了这些人的利益，反映了他们的意愿。

然而对居住在被占领土上的 170 万巴勒斯坦人来说，情况则大相径庭。阿拉法特对被占领土的民的要求也了如指掌，他们的要求决不可忽视。他们也是难民，但他们仍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对他们来说，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以色列的占领，而是以色列的统治。他们的问题不是以色列占了他们的房子、土地，而是有以色列士兵在他们门前站岗，限制他们的自由。以色列政府在压迫着他们，他们在以色列被视为二等公民。如果以色列结束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控制，他们就可以充分享受居家之乐。因此，作为一个政治集团，他们更愿意接受一项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

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人通过起义明确表达了他们的意愿。然而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有足够国际影响和威望的领袖，既可以把他们的愿望在世界上传播，同时又有权与以色列签订协议。这样阿拉法特就是唯一合适的人选了。他所领导的巴解组织被世界公认为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代表，它有权与以色列签订协议。被占领土的人把自己的意愿明确地告诉了阿拉法特，并强调他们是巴勒斯坦政治生活中最强有力的组成部分，而巴勒斯坦境外的难民们则不是。阿拉法特认为，他自己为寻求巴以和解而多方呼吁的目的与被占领土人民的要求不谋而合。并且，顺乎被占领土的民意可以保证和谈朝着自己的设想发展，使巴解牢牢控制住和谈领导权，也可由此进一步扩大影响。

另一方面，阿拉法特看到以色列的立场也有松动。长期的阿以对抗，使以色列不堪重负。以色列只有与阿拉伯人和解，才能卸下沉重的军费负担，重整经济，放弃被占领土，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这是唯一的出路，也是现实的选择。尤其是以色列工党上台执政后，对巴以谈判的态度比较积极，给巴解和阿拉法特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阿拉法特认为机不可失，如果拉宾组织的联合政府不能在阿以谈判中取得成绩，以色列强硬派可能重新上台。届时，巴勒斯坦将面对更加不利的谈判对手，收回被占领土的希望更加渺茫。于是阿拉法特决定冒险让步。他摸准拉宾有放弃加沙的意向，率先提出了加沙—杰里科自治方案，换取以色列与巴解直接谈判，如达成协议，巴解就有了立足之地，并可改善处境，为日后实现建国大业开创一条活路。

阿拉法特和拉宾同时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双方抛开毫无实质性进展的马德里和会，抛开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挪威奥斯陆举行了秘密和谈。阿拉法特大胆让步，同意将耶路撒冷地位和巴勒斯坦立国两个问题搁置不谈，终于草签了秘密协议。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阿拉法特终于如愿以偿。1993年9月13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美国白宫正式签署了《巴勒斯坦人首先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自治的原则宣言》。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两位曾誓不两立的宿敌——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握住了对方伸出的手。世界为之轰动。这一历史性的握手，标志着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开始结束长时期的敌对，走上了和解之路，并且打开了解决整个中东问题的锁。

阿拉法特为中东和平乃至人类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因此获得了199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以及西班牙阿图里亚斯王子1994年度国际合作奖。阿拉法特为实现巴以和解锲而不舍的追求，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他的成功也表明：历史潮流不可阻挡，顺者昌，逆者亡。

五、循序渐进曲线救国

从事一项艰巨的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和耐心，欲速则不达。只有在现实条件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循序渐进，才有可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为了使巴以和谈取得实质性进展，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毅然采用渐进模式，将巴以和平进程分三个阶段实施。阿拉法特并没有放弃恢复巴勒斯坦全部主权的最终目标，而他的明智就在于知己知彼、面对现实，既坚持恢复领土的正义要求，也承认以色列的安全需要及其承受力。双方对抗 40 余年，敌意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只能在妥协中逐渐减弱敌意，构筑谅解，尔后在增加谅解中促成进一步妥协。巴以和平协议中关于加沙-杰里科实现自治，是阿拉法特与拉宾政府历经 8 个多月 14 轮秘密谈判后达成的幕后交易。自治协议虽是双方互有妥协的结果，但关键性让步却来自巴解。巴解后退一大步，同意暂不谈判耶路撒冷的归属、难民遣返、边界及安全、犹太人定居点、建立巴勒斯坦国等问题，先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有限自治。这就是阿拉法特的“曲线救国”战略策略。它的实质就是让步与进步，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让步就根本谈不上进步。它的进步意义在于逐渐实现最终目标。

尽管在阿拉伯人看来，加沙-杰里科自治有种种缺陷，不尽人意，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最现实的选择。巴勒斯坦人得到的仅是有限自治且分阶段实施，但毕竟拥有了一定权力，在实现最终目标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是“曲线救国”的第一个步骤。它标志着中东朝着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方面有了现实的突破。虽然阿拉法特的渐进模式有助于打破中东和谈的坚冰，但很多人认为阿拉法特这一着棋是拿巴解和自己的前途下赌注，承担了风险。然而冒险有冒险的必要，这恰是阿拉法特的高明之处。

从政治上看，巴解在国际上比较孤立。冷战结束后，巴解失去了前苏联和激进国家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的支持。海湾战争后阿拉伯世界重新分化组合，多数阿拉伯国家目光转向国内，对巴勒斯坦事业日趋冷淡。无论温和国家还是激进国家都倾向于阿以和解。阿拉法特意识到，时至今日巴解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在经济上，巴解外援几乎断绝，难以为继。海湾战争后，海湾国家全面停止了给巴解的财政援助。到巴以协议签署时，巴解已连续 3 年多没有得到援助。日趋严重的财政危机又诱发了新的政治危机。在严峻形势下，更有必要尽快同以色列和谈以摆脱困境。

在巴解内部，阿拉法特需要有重大举动来牢牢控制和谈领导权。巴解远离被占领土，其影响受到一定限制。1991 年启动的马德里和会巴解更是被排挤在外，虽然谈判代表与巴解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但巴解的领导地位面临严重挑战。尤其是被占领土上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的主张反映了一些巴勒斯坦人对中东和谈远远未获进展的不满和厌倦心理，它的追随者不断增加，在被占领土内已获 48% 的支持率。阿拉法特危机感日增，为避免巴解的领导地位被取代和巴勒斯坦内部出现新的纷争，他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扭转局面，以便牢牢控制和谈的领导权，维持巴勒斯坦的现有格局。

更重要的是，拉宾执政后，对巴以谈判的态度比较积极，给巴解和阿拉法特提供了转机。拉宾虽采取了比较现实的作法，但他同样面临国内的巨大压力。利库德集团的对阿方针始终是寸土不让，而且在国内也有很多拥护者。

利库德集团坚决反对以土地换和平的阿以和谈，不断制造危机，曾一度使拉宾政府面临垮台的危险。阿拉伯世界可以批评拉宾让步不够，可以要求以色列一口吐出全部被占领土，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拉宾的有限退让已经非常接近，甚至超过了当时以色列人心态中的安全要求和国家政治所能容忍的极限。这一点至关重要，很少有人能正确估计它的重要性，但阿拉法特看到了这点，这也是他实施渐进模式徐图建国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阿拉法特作出极大让步的原因。

阿拉法特“曲线救国”的设想包括循序渐进的若干阶段。它已在巴以关于首先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自治的原则宣言中得到充分体现。第一阶段，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相互承认，以色列在协议签署后4个月内从加沙地带和杰里科镇撤出军队和行政管理机构，由巴勒斯坦人实行自治；第二阶段，协议签署9个月内整个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将在国际机构监督下选举产生一个委员会以取代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行使行政和司法管理权；第三阶段，协议签署后2年内，巴以双方将开始有关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最终地位的谈判，将就耶路撒冷的未来地位，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自治区域内的军队部署和移民点的问题举行谈判。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在时间上比原则宣言的规定一再拖延外，前两个阶级的目标至今已基本实现。

1993年9月13日，巴以双方签署《巴勒斯坦人首先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自治的原则宣言》，阿拉法特的渐进战略开始奏效。次年5月4日，双方又在开罗签署了《加沙-杰里科协议》，第一阶段的措施开始付诸实施。

1994年5月11日和13日，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分别进驻被占领土加沙和杰里科地区。被以色列占领27年之久的这块土地上，终于升起了巴勒斯坦的旗帜。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7月1日下午3时许，阿拉法特在拉法海关埃及一侧，同前来送行的穆巴拉克握别后，在众人的簇拥下，踏上了阔别27年的加沙土地。他俯下身躯，双膝跪地，深情地亲吻故土。随后，人们把他扛了起来，缓缓前行。阿拉法特做出胜利的手势，向夹道欢迎的群众致意，这时，“真主伟大！”“自由的巴勒斯坦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撼人心魄。他依然是那身绿色军装，头缠黑白格头巾，面容清癯，眼里噙着泪花。几十年的血与火的斗争，使阿拉法特从巴勒斯坦流落安曼，从安曼移师贝鲁特，从贝鲁特迁到突尼斯，从突尼斯返回巴勒斯坦，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数不清的辛酸坎坷，凝聚成了这一悲壮的回归庆典。

阿拉法特的车队从拉法经贝特哈鲁·汗尤尼斯前往加沙市。沿途几公里长的道路两旁，成千上万的加沙人民，以标语、彩旗和歌声来欢迎自己的领袖。下午5时许，阿拉法特来到加沙无名战士广场，登上主席台，向聚集在这里的数万加沙同胞发表讲话。他用铿锵有力的声调，号召巴勒斯坦人民团结起来，重建家园。他最后重申，巴勒斯坦必将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和一块自由的土地。

1995年9月28日，巴以双方又在塔巴正式签署了关于巴勒斯坦选举的《巴勒斯坦第二阶段自治协议》，即扩大约旦河西岸自治协议，又称《塔巴协议》。由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分歧严重，加上各自阵营中的极端势力阻挠破坏，最后在美国、埃及、约旦的斡旋下，阿拉法特和佩雷斯经过长达9天，共百余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才终于达成。这是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经过艰难反复的斗争与较量之后取得的。这项协议确定了以色列

要撤出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口稠密区，包括 6 个城市和希伯伦市的一部分以及 400 多个乡镇。这意味着，在经过长时间冲突以后，以色列终于承认了巴勒斯坦人在这一块被称作“上帝赐与犹太人”的土地上拥有一定的统治权利，巴勒斯坦选举的道路已经铺平。

当然，第二阶段协议的执行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巴解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说实施这项协议将有利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总理拉宾强调在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诞生的，是一个“巴勒斯坦实体”，不是“巴勒斯坦国”。阿拉法特还要求继续努力解决耶路撒冷问题，他一直坚持认为东耶路撒冷是未来巴勒斯坦的首都，然而以色列坚持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不可分割的、永恒的首都”。尽管这一协议争论颇大，但无论如何，它仍是建设性的，毕竟，阿拉法特又争取到了更多的一些权利。

1996 年 1 月 20 日，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他们为之多年流血奋斗的事业终于有了初步结果——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上第一次举行自由选举。选举产生了由 88 名委员组成的、相当于立法权力机构的巴勒斯坦委员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以绝对多数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自治政府）主席。这标志着巴勒斯坦自治正式政权的诞生。

这次选举是巴勒斯坦人民首次行使民族自决权，是新时代的开始。登记选民超过 104 万人，占选民总数的 90%，巴勒斯坦选民的总投票率达 60% 以上，部分村镇的选民投票率超过 95%。有 20 多个政党参加了竞选。

这次大选实现了巴勒斯坦政权从“革命合法性”到“法律合法性”的历史性转变，这是巴勒斯坦人民通过长期的斗争取得的一个伟大成果。选举产生的巴委会具有有效的法律地位，应受到巴勒斯坦人民和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它所具有的法律约束力和权威性也是空前的。这是巴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转折，为将来成立巴勒斯坦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次大选是阿拉法特取得的空前辉煌的胜利。据巴中央委员会的统计结果，阿拉法特赢得了全部选票的 88.1%。在竞选巴委会 88 个席位中，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主流派“法塔赫”将在自治正式政权中处于领导地位，阿拉法特成为第一位通过民主方式获选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他和“法塔赫”在巴勒斯坦内地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这是对阿拉法特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肯定，并加强了他今后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的地位。

此次大选实际上是对巴以和平进程的一次“全民公决”。阿拉法特和以他为首的“法塔赫”在选举中获得如此广泛的支持，反映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对他所奉行的循序渐进的政策和最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充满了信心。阿拉法特的当选为他最终完成与以色列的和平进程和领导巴勒斯坦人民走向独立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正如现年 67 岁的阿拉法特在他投下庄严的一票离开投票站时所言：选举为新巴勒斯坦奠定了基础，一个巴勒斯坦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六、“革命者必须灵活”

古人云：“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其意为：善于防守的人，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既要隐蔽得很深，以求保存自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又要机动灵活，积极行动，逐渐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创造有利战机，才能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

从各种迹象来看，阿拉法特亦深谙此道。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阿拉法特饱经血与火的洗礼。巴勒斯坦抵抗力量本身弱小，无家无国也无稳固的根据地，面对的又是受到美国支持的强大的以色列，更无长期可靠的盟友，阿拉法特时时面临灭顶之灾。据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灵活机动的策略，最终化险为夷。他认为，只有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才能有所作为。因此，在政治上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从这点来看，如果再考虑到巴解组织内部或在国际关系中，在敌人威胁之下的阿拉法特的不利形势，可以这样说，阿拉法特是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幸存者。他始终表现出惊人的灵活性，正如他自己说过的：“我们应当灵活一些，这是成功的关键。革命者必须灵活，像蛇一样灵活。”

阿拉法特一生曾遇到几十次企图谋杀或灾难性的风险，但每次都神奇地逃脱了。他之所以活到今天，除了巴解组织的安全措施和他的好运气之外，主要还是靠他对安全的警觉性和他机动灵活的工作方式。他认为，保存自己是取得最终胜利的前提。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1970年9月，约旦军队对巴解游击队进行围剿。巴解损失惨重，阿拉法特本人也处在危险之中。阿拉伯世界舆论为之哗然。纳赛尔总统和尼迈里总统等阿拉伯领导人出面调停，要求约旦保证阿拉法特安全离开安曼，但约方不予理睬。这时阿拉法特只有冒险。他在科威特官员谢赫·萨阿德·阿卜杜勒的掩护下，身着科威特民族服装，化妆成阿卜杜勒的一名随从，躲过了约旦军队和情报机关的耳目，终于到达埃及驻约旦使馆，然后迅速前往萨迪克的专机，安然无恙地离开了约旦。

为了防备敌人睛算，阿拉法特出行常常半路换车，夜间常换住所，有时索性以汽车为家，甚至住在飞机上。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的日子里，他决定不住在任何建筑物内，有一个多星期住在汽车里，甚至住在桥下，身边只带一两个随行人员，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1985年10月1日，以色列出动6架F—16战斗轰炸机，两架空中加油机，突袭几千公里以外的突尼斯郊区巴解总部，一枚导弹击中了阿拉法特的卧室，室内一切毁于一旦，办公大楼变成了一片废墟。根据以色列情报局掌握的情报，阿拉法特那时不仅在突尼斯，而且在总部，但以以色列人失算了。阿拉法特因为遇到一个紧急事件要处理，耽误了归期，躲过了这场灾难。巴解领导总是处在高度的戒备之中，其方式就是带着全部设备不停地运动。有一位记者在两三天里采访阿拉法特6次，只有两次在同一地点。阿拉法特的一名随从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把客人送回旅馆，半小时后返回驻地时，阿拉法特及随行人员早已无影无踪了。直到凌晨4点才找到他们转移的地方。在空袭的45天里，阿拉法特一直住在飞机上，时而飞到东，时而飞到西，跟踪他的人是枉费心机。他乘飞机时，常常突然决定动身时间，一到机场就一刻也不停留地登机起飞。

当然，巴解内部也有斗争，对阿拉法特领导的主流派来说，有左翼反对派，也有右翼极端复仇派。当彼此尖锐对立时，阿拉法特总能耐心说服他们，

维护了组织的统一。比这更严重的情况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敌视。与约旦的冲突，在黎巴嫩的艰难处境所引起的与叙利亚的对抗等，都是在阿拉法特的灵活外交下，避免了全军覆没，保存了有生力量，使斗争得以继续。

在多次经历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之中，阿拉法特逐渐从一个思想传播者转变为“一个眼光敏锐的思想家和策略家”，表现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素质。他给人的印象是：目光坚毅，语调沉着，反应机敏。形势越复杂，斗争历程越漫长，他就越灵活。阿拉法特出身“圣城”耶路撒冷名门，那时的巴勒斯坦是在英国委任统治之下，他的家庭成员都具有反英、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因参加反抗斗争而遭到迫害，举家迁居开罗。在求学期间，阿拉法特就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权利而奔走呼号，宣传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他在当时就表现出来的奉献精神 and 领导才能使他成为巴勒斯坦学生的领袖。1958年，阿拉法特同战友们在科威特秘密成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次年创办《我们的巴勒斯坦》刊物，宣传“法塔赫”反抗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为壮大力量，阿拉法特决定到分散在各地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去招募“法塔赫”成员。他从科威特外交部的同情者那里搞到一张假护照，以穆罕默德·弗济的化名和科威特政府派遣医生的身份前往各难民营集中地。这次活动使他再度目睹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的悲惨命运。阿拉法特的斗争决心更坚定了。他决心依靠武装斗争打败侵略者，为此必须扩大巴勒斯坦的政治和军事组织。1964年底，阿拉法特筹建了“法塔赫”所属的军事组织——“暴风突击队”，开始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占领区内进行武装斗争。他指挥“暴风突击队”参加了1967年的“六·五”战争和1968年的卡拉玛战役。在此期间，阿拉法特曾三次被捕，但他为安全起见而使用的“阿布·阿马尔”的化名起了相当大的隐蔽作用，他很快就获释了。不久，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获悉了“法塔赫”内部的一些情况，从此阿拉法特成为他们暗杀的目标。由于阿拉法特活动秘密，他的组织和他的名字在事后很久才广为人们所知。他自己也因之数次脱险，并使队伍日渐壮大。大约从1965年年初以来，阿拉法特及他的组织以游击战的方式，日益活跃于敌占区，不断打击以色列侵略者。从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家突然出击，使以色列屡遭痛击，大长巴勒斯坦解放战士的斗志。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及其游击队由此在国际上，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声名大振，影响不断扩大，为以后的政治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一些阿拉伯国家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东问题。面对新形势，阿拉法特及时调整了对以色列扩张主义斗争的策略和方式，在不放弃武装斗争的同时，越来越重视以政治斗争相配合来实现恢复民族权利的战略目标。八十年代以来，阿拉法特审时度势，赞成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并以此作为“过渡步骤”。但他仍坚持在重返家园，实行民族自决和建立独立国家的三项权利的基础上和平谈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对话代替了对抗，和平代替了冲突。阿拉法特顺应时代潮流，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而多方奔走。海湾战争后，巴解处境十分困难，阿拉法特的立场更趋灵活。他毅然抛弃历史恩怨，宣布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摈弃和谴责恐怖活动，在原则问题上作出一系列重大让步，积极谋求打开巴以直接和谈之门。中东和平谈判自1991年10月在马德里首次举行后，双方在耶路撒冷地位、巴勒斯坦难民遣返、边界及安全、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

坦建国等问题上分歧很大，致使谈判几度陷入僵局。阿拉法特采取了更加灵活的策略，同意将上述分歧暂时撇开，先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有限自治。巴以双方终于在 1993 年 8 月 19 日草签和平谈判协议。9 月 13 日正式签署《巴勒斯坦人首先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自治的原则宣言》，被以色列占领了 27 年的土地上终于升起了巴勒斯坦的旗帜。

综观阿拉法特的斗争策略，其精髓就是灵活性。有人讲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事实上他是一个务实的、成功的机会主义者，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这也是他在变幻莫测的中东政治舞台上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

七、“自由是我的事业”

“我是一个造反者，自由是我的事业。”阿拉法特的这句话含义深刻。坚持拥有独立行动的自由是阿拉法特谋略思想的灵魂，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贯穿阿拉法特军事、政治斗争历程的始终。

阿拉法特的独立自主思想包含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特性，二是坚持斗争的独立性。这是由于巴勒斯坦人的独特处境所决定的。在欺诈、背叛、残忍充斥的中东，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是极其艰难的，其难度甚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客观环境迫使阿拉法特对一切，不管是对战争还是对政治，都采取极为现实的态度。他坚信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性，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力量将其控制起来的企图，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巴勒斯坦的立国之本。

在阿拉法特看来，自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斗争的实质、巴勒斯坦人真正奋起反对的东西是，当作为犹太人第二次进入的后果，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民在1949年成为无国无家的难民时，西方国家的政府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权，出于不同目的却怀有同样不便明言的希望，那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应该消失。

阿拉法特认为，以色列国的建立，是因为英国及当时一些大国认识到，以色列的存在是使阿拉伯国家处于衰弱和分裂，并无法对大国控制和剥削这一地区的资源和战略物资进行成功的挑战的最可靠保证。美国人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便是最好的明证。巴勒斯坦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被用来作为牺牲品。他们的真正罪过就在于他们拒绝从地球上消失。人们可以通过种种事实看到，阿拉法特为代表的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性从未消失过。

阿拉法特也看到，阿拉伯国家明白他们无法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这不是他们愿做不愿做的问题。多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知道，真正的战斗不是同以色列的几百万犹太人的战斗。如果巴勒斯坦的任何一部分得到解放，真正的战斗是同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造犹太国的大国的战斗。只要犹太国的存在是为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全面政策目标服务，他们就要保护和捍卫以色列国。因此，只要那些凭借手中的军事、经济、政治手段控制世界的大国需要以色列生存下去，解放巴勒斯坦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使命。阿拉伯政权的真正问题，是他们有一种失败和防守心理，这是他们感到无能为力的产物和结果。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某些阿拉伯国家力图约束巴解军事力量，以便在与以色列、其他阿拉伯国家乃至美国打交道时当作一个重要的筹码。

尽管如此，阿拉法特反对把这些阿拉伯政权当作叛徒的看法。毕竟，巴勒斯坦人是整个阿拉伯大家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以色列人侵犯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也损害了阿拉伯国家的利益。1948年之后，阿拉伯国家确曾宣布过，全部解放巴勒斯坦是一项神圣的事业、责任和目标。对此，他们承担着义务。如果阿拉伯国家能够做到，他们将摧毁以色列，这是真的。更何况，巴勒斯坦人在从事民族解放事业时，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处境——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被迫分散在阿拉伯国家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他们的斗争基地因之也就建在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土地上。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也非常需要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否则，人少、力弱的巴勒斯坦人民完全是孤军奋战，那是不堪想象的。

因此，阿拉法特在处理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时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为了拥有一个能对以色列发动出击的基地或者争取政治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帮助，有时不得不视具体情况，尽可能地迎合某个阿拉伯接受国的友善、一时的兴趣和爱好。但这种妥协是一时的，表面的。阿拉法特绝非一位凭藉幻想的革命者或者激进的领袖，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具备深谋远虑和高瞻远瞩的素质。在原则上，阿拉法特永远不会允许巴解组织成为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傀儡，更不允许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特性被抹煞，因为这将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放弃了自己的解放事业。他坚持巴解组织有独立行动的自由，并不惜为之作出牺牲；他主张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合作，不干涉他们的内政，但也反对他们干涉巴解内部事务。这是阿拉法特行动的原则，也是他能在变幻莫测的中东政治舞台上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原因。

实践中，在独立自主原则的指导下，阿拉法特及其领导下的巴解组织既重视同阿拉伯国家协调行动和团结合作，又时刻防止他们的阴谋。阿拉法特及其事业也就是在这种夹缝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阿拉法特在 1948 年就得出结论：巴勒斯坦人丧失自己的家园，部分原因是软弱、腐败的阿拉伯国家造成的。从那时起，他立誓将尽自己全力来维护巴勒斯坦人自己决策的独立性。那时，巴勒斯坦还没有自己制定政策的机构，但是，这一原则仍然被用来指导阿拉法特：如果巴勒斯坦人依靠别人来为他们做出决定，他们将永远不会收复任何失去的土地和权利。

苏伊士运河战争前夕，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友瓦齐尔成功地组织了巴勒斯坦人的示威游行，既反对以色列的进攻，也反对纳赛尔把巴勒斯坦人置于他的控制下的意图。这次活动的口号有两个：“如果你想拯救我们，请训练我们”，“如果你想拯救我们，请武装我们”。这次示威震撼了纳赛尔，也表达了巴勒斯坦人的心声。

为了获得独立行动的自由，阿拉法特离开埃及来到科威特。在这里，阿拉法特同战友们秘密成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简称“法塔赫”。这是阿拉法特为展开独立的武装斗争而建立的政治军事组织。为了更好地宣传独立自主的政治主张，他创办了《我们的巴勒斯坦》杂志。他亲自撰稿，极力宣传巴勒斯坦要靠巴勒斯坦人自己来解放的基本观点，力图说服更多的巴勒斯坦人放弃依靠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求解放的幻想，巴勒斯坦人唯一的选择是在解放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

嗣后，阿拉法特控制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法塔赫”成为其中的骨干力量。阿拉法特有了更多的力量保持他的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在埃及，在约旦，在叙利亚，在黎巴嫩，阿拉法特都为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甚至不惜与某些国家对抗。当时看来，巴解力量是受到了损失，但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正是他的这一思想，使巴解组织的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尤其是赢得了阿拉伯世界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承认，这不能不说是最大的胜利。它的成果就是：拉巴特会议正式承认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地位，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随后，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认巴勒斯坦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享有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力。阿拉法特也成为巴勒斯坦人民的领袖和民族的象征。

阿拉法特独立自主的思想也体现在他对领导问题的看法上。巴解组织是由众多历史背景、意识形态、政治主张各异的组织组成的联合体。阿拉法特认为，在复杂的斗争条件下，如果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将容易被阿拉伯和

外国政府及他们的代理人所操纵。这样的后果是，巴解组织将成为别国政府的工具，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将前功尽弃。因此，他主张意志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许多人把他看成是一个专制者，但事情远非他们想的那样简单。

阿拉法特谋求自主，当然也极力避免同阿拉伯政权的对抗。他积极谋求与他们的合作。他曾说如果认为巴勒斯坦人能够单独解放全部领土，那是不现实的。因此，他曾主张同埃及和叙利亚结成联盟，共同打击以色列。其后，反对埃及、以色列、美国签订的戴维营协议和埃及、以色列和约，参加了由利比亚、叙利亚、南也门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组成的“拒绝阵线”。他也不放弃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的机会。但是，阿拉法特把这些合作关系看作是同等地位的合作，巴勒斯坦人不能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

为谋求巴以和平，阿拉法特更是大胆行动。他单独与以色列签订和约，实现了巴勒斯坦部分自治，踏上了独立建国的征程。可以说，如果不是阿拉法特的自主行动，巴以和谈的成果短期内是不能想象的。

多年来，阿拉法特为寻求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与援助，在世界许多国家奔波往返，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活动。他擅长建立纵横交错、复杂的联盟，有时还能与相互敌对的双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使他得以在外事方面纵横捭阖，游刃有余。

八、稳定是最高利益

任何一个国家或政权，要想使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其首要前提便是政局稳定。稳定是最高利益，是政令畅达的保障。

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温和力量的代表人物，他不乏宽恕和仁爱精神。巴以达成《自治原则宣言》和《加沙-杰里科协议》以来，在以色列被占领土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哈马斯”却始终反对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的政治主张，反对中东和谈。它的激进主张和暴力活动不断制造麻烦，造成了被占领土上的混乱，破坏了刚刚起步的政治秩序，并一再影响巴以和谈的顺利进行。阿拉法特的渐进模式已取得显著成果，曲线救国的道路现实可行。他从大局出发，为了稳定人心，发展自治地区的经济，推动巴以和谈进程，加强对政局的控制，阿拉法特不惜举起铁腕，坚决打击哈马斯的暴力活动，以维护和平成果，维护巴解组织的尊严。

“哈马斯”全称是“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这个词是由“伊斯兰抵抗运动”这几个阿拉伯字的字首拼写而成的，意思是“热情”。“哈马斯”自称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武装组织，它成立于1987年12月7日被占领土人民起义之后，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伊斯兰宗教组织。

“哈马斯”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六七十年代，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的活动主要是在巴解组织领导下，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展开的。伊斯兰教在斗争中的影响并不突出。但从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巴解在斗争中一再失利，一些巴勒斯坦人开始失望，期待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领导斗争。哈马斯组织应运而生。可以说，是绝望的加沙人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原教旨主义的怀抱。到八十年代末，经过分化组合，在以色列占领区形成了两支最重要的反以力量。一支是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主流派“法塔赫”，另一支就是“哈马斯”。

“哈马斯”的创建者和领导人艾哈迈德·雅辛和阿卜杜拉·阿齐兹·拉迪西都主张把民族主义与伊斯兰结合起来，认为只有伊斯兰才能拯救巴勒斯坦人，呼吁通过对犹太复国主义进行圣战和展开军事斗争收复全部巴勒斯坦领土，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哈马斯”作为宗教组织，得到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的资助；作为政治组织，它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以色列和美国。它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是既反对中东和谈，又坚持在被占领土上举行自治选举；一方面反对阿拉法特及其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又多次要求参加巴解组织与巴解的领导。尽管“哈马斯”的主张在现实条件下有极大的局限性，但它迎合了一部分巴勒斯坦人的失望和急于求成的情绪，代表了一部分民意，因而在短短几年里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哈马斯”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公开部分。官由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组成。他们经常出入清真寺，参加教育与社会福利机构，并参加商会，大学生学生会和专业工会的选举。加沙地区的商会、学生会、工会领导和机构成员的多数是“哈马斯”成员。第二部分是秘密活动部分，它由“哈马斯”坚定分子组成，他们负责组织工作，并从事转移资金与情报活动。第三部分是军事部分，即进行暴力袭击活动。这一部分在被占领土上演出了一幕幕流血场景。

“哈马斯”拥有大量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哈马斯”人士认为，“哈马斯”得到群众的支持率超过了40%。尽管不能取代巴解的地位，但它在被占

领土人民与以色列的斗争中表现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直接威胁到巴解的领导地位。阿拉法特危机感日益增加。

阿拉法特认为，巴以和谈结果来之不易，已向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曲线救国的战略初见成效，他要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如果对“哈马斯”的活动听之任之，必将导致中东和谈进程前功尽弃。被迫走回头路是阿拉法特所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1994年5月加沙-杰里科实施自治以来，阿拉法特的基本策略是维护各派政治势力的团结，共创美好未来。他多次强调，巴解与“哈马斯”在争取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方面利益一致，但达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不同。阿拉法特在7月1日返回加沙的第一天便称呼雅辛为兄弟，并在全国权力委员会中为“哈马斯”及其他反对派留有席位。但“哈马斯”拒绝进入自治政府，表示不对自治政府承担任何责任。尽管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立后，“哈马斯”曾与“法塔赫”数次达成避免直接冲突的协议，但终因目标、主张不同而不断发生冲突。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阿拉法特不愧为一个政治家，他认为对“哈马斯”进行镇压有不利的一面。“哈马斯”在群众中颇有基础，特别是在青少年中间有很大的号召力。打击“哈马斯”势必将失去部分民心。若放任“哈马斯”在以色列占领区乃至自治区政府管辖地区大搞恐怖活动，必将对巴勒斯坦自治事业和整个中东和平进程造成不利影响。阿拉法特对后者有着深入长远的考虑。

首先，出于对巴勒斯坦政局和稳定人心的考虑。以色列军队陆续撤出部分被占领土，阿拉法特领导巴解初步组建自治政府，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调整、扩大和完善，在较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由22个部委，数千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功能较为完善并得到民众信任的政府，基本上控制了混乱的局势，政权建设成绩斐然。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饱受以色列统治之苦，大部分赞成阿拉法特推行的巴以和平政策，人心思定。巴解逐渐转换职能，从开展政治、军事斗争转向行政和经济管理，局势转好。但是，“哈马斯”等伊斯兰激进组织宣称要继续强化起义活动，惩治“出卖土地的叛徒”，不断制造恐怖活动，严重干扰了社会秩序。阿拉法特认为，巴解的稳定与团结以及他本人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了直接威胁，因此他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扭转被动局面，牢牢控制巴勒斯坦的政局，维护自治政府的尊严。

其次，恐怖活动严重影响了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经济生活。如果不对“哈马斯”采取行动，阿拉法特还将承受经济压力。以色列经常在恐怖袭击事件后关闭关卡，不准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境内做工。这种恶性循环在经济上给自治政府造成巨大冲击，至少已有6万巴勒斯坦人不能去以色列打工。如按一个工人养活5口人计算，就有30万巴勒斯坦人挨饿，这使巴勒斯坦人对阿拉法特及和平进程的支持率大大下降。加之以色列又大量引进罗马尼亚、泰国和菲律宾等国的劳工取代巴勒斯坦工人，造成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失业，生活无以为计。人们对恐怖活动越来越不满。

第三，恐怖活动严重干扰了中东和平进程。和平协议签署后，巴解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是巨大的。如果它不能有效地在加沙-杰里科实现自治的话，以色列今后可能不会按计划把整个约旦河西岸交给巴勒斯坦人自治，以色列撤军的最后日程一拖再拖就是极好的说明。这一严重后果将在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世界引起新的震动，从而危及中东和平进程。阿拉法特的曲线救国战略

会因之失败，长期的努力和已取得的来之不易的和谈成果将化为乌有，一切将前功尽弃。

两害相权，取其轻。阿拉法特为了使第二阶段和平协议和被占领土的大选成为现实，决心要对极端的伊斯兰分子采取坚决措施。1995年4月，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接管自治政权以来首次进行了坚决镇压活动。荷枪实弹的巴勒斯坦警察布满各个交通要道路口。并对加沙的“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采取大规模的搜捕和收缴武器的行动。据报道，巴勒斯坦警方不仅抓获大批激进的伊斯兰分子，还捣毁了“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加沙的一些秘密办事机构，缴获许多文件。

这次行动取得了一些成果。阿拉法特说，巴解组织已得到书面材料，“哈马斯”部分成员已公开宣布脱离该组织。“哈马斯”内部出现了分裂。但是，这次行动是不彻底的，阿拉法特的行动主要目标是“哈马斯”的第二、三部分。“哈马斯”力量依然存在。毕竟，无论巴解还是“哈马斯”都是兄弟，双方在最终目标上又基本一致。阿拉法特的目的仍是维护各派的团结，保持政局的稳定。

随后，巴以和谈又取得了新成果。1995年9月28日，巴以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巴勒斯坦第二阶段自治协议。1996年1月20日，在被占领土上首次举行了巴勒斯坦人自治选举。阿拉法特以绝对多数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产生了由88名委员组成的巴勒斯坦委员会。这次选举是朝着建立巴勒斯坦国迈出的又一历史性步骤。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主流派“法塔赫”为主体组成的巴委员会具有有效的法律地位，它所制定的法律、政策对西岸和加沙所有巴勒斯坦人具有约束力，在解决巴内部问题、分歧方面具有权威性。阿拉法特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尊严。

但如何处理好与“哈马斯”等激进组织关系仍然是一个难题。阿拉法特看到，一些极端分子仍拒绝放下武器，并进一步制造恐怖活动，仍然对自治政府与和平进程构成严重威胁，因而阿拉法特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些人的镇压。另一方面，部分“哈马斯”成员也有改弦易辙的迹象。1995年底，“哈马斯”同巴自治领导机构进行了和解会谈，取得了一些进展。“哈马斯”曾一度表示要参加大选，后又退出。“哈马斯”领导人之一哈马米说，“哈马斯”必须承认巴大选后出现的现实。他强调，“哈马斯”将参加建立巴勒斯坦家园和巴勒斯坦国。这是“哈马斯”同自治政权和解的迹象。另外，“哈马斯”的一部分力量已转入地下。总体上来看，阿拉法特未来对“哈马斯”依然是实行分化战略，使之逐渐团结到自己周围。但未来的发展仍是一个变数。

阿拉法特对“哈马斯”的镇压是他的总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是成功的。而他保持政局稳定和统一的思想不失为一个明智的策略。

九、以建设巩固革命成果

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革命领袖和民族的象征，是有深邃远见的政治家，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建设者。他认为，革命与建设紧密相关，革命成果最终需要建设来巩固，经济、政治建设与革命同等重要。

巴勒斯坦人长期无国无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进行经济、政治建设的难度可想而知。巴以实现和解，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刚刚取得有限自治，阿拉法特就把自治建设摆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更难能可贵的是，阿拉法特早在此前就十分关注自身的经济、政治建设。他从巴勒斯坦人民现实和未来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始终坚持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加强政治民主建设。

一位领导人，倘若不注意经济问题，那么他就看不清政治问题。因为政治本身就是浓缩了的经济，而阿拉法特就是一位有经济头脑的政治家。五十年代他毕业于开罗大学工学院，后来在科威特开办承包公司，经营得很成功。担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以后，他从实际需要出发，在经济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尽管规模有限，但却有着深远的意义。

1970年初，阿拉法特倡导建立了巴解经济机构“萨米德”（“萨米德”在阿拉伯文中意为“坚韧者”、“能经得住的”）。最初，“萨米德”仅是为了解决侨居阿拉伯各国的巴勒斯坦人的就业问题和巴解游击队的物质需要。后来，它发展成为巴解组织庞大的经济集团，其企业分布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据估计这个集团的年周转金已达4亿美元，该组织在四大洲拥有3万多名工人，单在贝鲁特就达数千人。

“萨米德”是在巴勒斯坦人取得政权之前建立的，是没有国家的国营企业。但其重要意义并不亚于枪杆子造就了巴解，因为，经济活动造成了另一个事实——一个巴勒斯坦人社会存在的事实。

阿拉法特说，每个战士与革命的联系是命运的联系，是生死与共的联系，应当是实实在在的，决不能建立在梦幻和空想之中。毫无疑问，经济活动的展开使得巴解组织更加生气勃勃，它给人的感觉是真实的，不容抹煞的。

阿拉法特还十分重视发展与外国的经济关系。他的经济顾问、“萨米德”组织总经理阿布·阿勒说，在对一些非洲国家进行投资的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往往与阿拉法特相左。我们认为这些国家外汇管理严格，投资价值不大。但阿拉法特的指示却斩钉截铁：必须在这些国家建立项目。他说：“我们不能向他们提供现汇援助，但我们有技术能力，可搞些示范农业项目等，尽管这微不足道。”

他还要求在每个农业项目区建立一个卫生所，不仅为其工作人员看病，也为周围村民服务。他嘱咐每个前往工作的人一定要成为巴勒斯坦事业真正的使者。

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巴解组织帮助当地居民建造了一座清真寺、一所学校和第一家超级市场，并帮助周围村镇接通了电。这些项目赢得了人民的友谊，收到了丰硕的政治成果。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称赞说：“你们可把这里看作是第一块被解放的巴勒斯坦土地，你们已在发展与几内亚人民友谊方面取得成功。

因为几内亚人民与曾来到这个国家的以色列人是一种被剥削、被压迫的关系。”

在阿拉法特直接指导下，巴解组织积极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和支持巴勒

斯坦解放事业的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先后与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古巴、尼加拉瓜和一些非洲国家签订了 23 个经济合作协议。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民族解放运动与这么多国家签订此类协议。民主德国商业部长说：“我们知道与巴解签订经济合作协议就意味着我们把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政治承认落到了实处。”

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合法权利的民族主义运动是统一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旗帜下展开的。巴勒斯坦各抵抗组织虽然都维系在巴解之内，但是，各派领导人在政治背景、指导思想、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很大，甚至截然对立。因此在处理同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上，在制定对以色列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时有分歧，甚至尖锐对立。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阿拉法特坚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他的看法是“集体领导将使决策的进程陷入瘫痪”。在他看来，“集体领导将容易被阿拉伯和外国政府及它们的代理人所操纵”，“一个受外来的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领导班子将无法在危急时刻或最有利时机作出有力的决定”。可以说，他的集权思想更多地是客观环境的需要。但无论如何，阿拉法特及其巴解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政权相比无疑是较民主的。阿拉法特内心里不乏民主思想，如他所说：“我们得以生存下来，是因为我们民主，它是我们的生命线。”阿拉法特在复杂环境下形成的这种政治传统无疑将对未来的巴勒斯坦政权产生巨大影响。在这一点上，在当时条件下阿拉法特的作法很可能是后来政治建设的模式。

巴以双方于 1993 年签署《自治原则宣言》后，巴以实现和解。

1994 年 5 月 4 日巴以双方又在开罗签署了《关于实施加沙-杰里科自治原则宣言》的最后协议，它具体规定了以色列撤军日程及以军撤离或重新部署后自治地区的安全安排。协议规定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拥有立法权等权力。5 月 11 日，首批巴勒斯坦警察开进加沙，拉开了自治序幕。5 月 17 日，最后一批以色列警察撤离加沙。同年 7 月 1 日，阿拉法特回到阔别已久的加沙领导自治，巴勒斯坦人民正式的经济政治建设重任落到了阿拉法特肩上。

自治经济建设困难重重，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经济基础大差。在以色列长达 27 年的统治下，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以色列和海湾国家，人才流失严重，投资不足，当地工业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0% 左右，大批工人靠在以色列打工维持生活。“哈马斯”进行的以反对以色列为目标的暴力活动，招致以色列当局用封锁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的措施进行报复，加深了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困难。其次，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忙于巴以谈判及政府的自身建设，无暇顾及自治区大规模的经济重建工作。第三，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原来承诺的援助款项迟迟不到位，资金缺乏成为突出问题。因此，经济建设任务非常艰巨。

阿拉法特毫不气馁，返回加沙后，他没有因为繁杂的具体事务而放弃积极主动的对外交往。他经常外出访问，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并在加沙频繁地约见有关国家的外交使节，以此保持广泛的国际交往和对外联系。他这么做的目的，不仅仅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他还要尽可能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在他的努力下，世界银行和 40 多个国家承诺 5 年内向巴自治区提供 20 多亿美元的援助，到 1995 年底已提供了约 6 亿美元的援助，合巴人均受援 600 美元。1996 年 1 月 9 日在巴黎举行的捐助国会议又决定 1996 年向巴自治区提供 13 亿美元的援助。

阿拉法特的努力已初见成效，经济也初步好转。包括 15 项大型项目的巴

勒斯坦经济发展计划已开始实施，其中包括耗资 4 亿美元的住房工程，准备安置从海外回来的几万名巴勒斯坦人，他们大多来自海湾国家、利比亚、欧洲和美国，就业人数有所增加。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还用捐款修路，建下水道以及计划投资 2 亿美元的发电厂、加沙机场和港口等。1995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 1994 年增长 33%，比 1992 年增长 50%。

政治建设比经济建设还要顺利些。1995 年 9 月 28 日，巴以在塔巴又签署了关于巴勒斯坦选举的《巴勒斯坦第二阶段自治协议》，巴勒斯坦的自治区域随即从加沙和杰里科扩大到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选举的道路已经铺平。1996 年 1 月 20 日，巴勒斯坦人第一次举行了自由选举，选举产生了由 88 名委员组成的，相当于立法权力机构的巴勒斯坦委员会，阿拉法特以绝对多数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自治政府）主席。巴勒斯坦自治政权正式诞生了。这次大选实现了巴勒斯坦政权从“革命合法性”向“法律合法性”的历史性转变。巴委员会具备了有效的法律地位，受到了巴勒斯坦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它所制定的法律政策对自治区内所有巴勒斯坦人具有约束力，在解决内部问题、分歧方面具有权威性。这是巴政治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转折，为将来成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未来岁月里，巴勒斯坦委员会和民族权力机构将为巴自治过渡期制定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并为即将开始的最终阶段的谈判确立大政方略。

在以阿拉法特为首的自治政权努力下，自治地区已组建了由 1.7 万名警察组成的保安力量，由三个准军事部队组成的卫戍系统，成立了包括情报安全机构、政治安全机构、国家安全机构和预防性安全机构的情报系统，建立了巴勒斯坦通讯社，电台和电视台，成立了巴勒斯坦银行及其他一些经济、社会与文化机构，发行了印制极为精美的巴勒斯坦护照和邮票。值得一提的是，此前这两个地区的巴勒斯坦居民持用的是以色列政府颁发的旅行证。巴自治政府发行自己的护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具有国家政府职能的性质。

自治给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近 200 万巴勒斯坦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及社会生活上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政治、经济建设为自治政府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下已经踏上了由自治走向建国的征程。建设巩固了革命成果。

玛格丽特·撒切尔谋略

玛格丽特·撒切尔 1925 年 10 月 13 日出生于英格兰中部林肯郡一个小商人家庭。1943 年考入牛津大学索默维尔学院，学习化学专业，同年加入英国保守党。1947 年大学毕业后从事化学技术工作。1950 年首次参加地方议员竞选，失败后转而自学法律，获律师资格，改行从事律师职业。1951 年与青年企业家丹尼斯·撒切尔结婚。1959 年当选地方议员，成为职业政治家。1967 年担任生活津贴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1970 年出任希思内阁的教育大臣。1975 年当选为保守党领袖。从 1979 年 5 月起至 1990 年 11 月，她连续三次蝉联首相，是英国历史上唯一的女首相，也是现代英国任职最长的一位首相。执政期间，为解决英国经济面临的生产增长缓慢、财政赤字增大、高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她摒弃了历届政府所推崇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代之以现代货币主义经济学，紧缩财政，降低社会福利，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使英国经济一度出现转机，收到一定的效果。在国际上，她极力维护英国利益，奉行亲美反苏政策，主张欧洲合作但抵制欧洲一体化。1982 年发动对阿根廷的马岛战争，以推行强硬外交闻名于世，有“铁女人”之称。她的一系列不同于前任政府的主张和政策，被称为“撒切尔主义”，在八十年代以来的英国政坛颇有影响。

一、“做好选择题”

撒切尔夫人是家喻户晓的世界风云人物。由于她固执强硬，塔斯社称她为“铁女人”；国内反对党骂她是“该死的女人”；政界人士认为她是内阁里最坚强的“男人”。她成功地接管了英国保守主义的大教堂——保守党，并三次蝉联首相，开创英国政治历史的先例。她的一系列主张被称为“撒切尔主义”，而英国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位首相有自己的“主义”。她对她的曾因墨守陈规而停滞不前的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在今日西方世界是绝无仅有的。那么，她是如何打开从政之门的呢？

有人说：“玛格丽特·撒切尔生来就是政治家，她的血缘关系和成长的环境，决定了她几乎不可能从事其它职业。”这话确有几分道理。

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25年10月13日出生于林肯郡的格兰森市。自古以来，这里一直是英格兰中部的缩影：没有现代化城市的“时髦”与喧嚣，生活平淡无趣，人们庄重严肃而又怡然自得，对外部的大千世界漠不关心。此种平静的地方，似乎不是造就雄心勃勃的政治家的地方，但却有利于养成不奢华、不浮躁、严肃认真、扎扎实实的品格。更重要的是，玛格丽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他名叫阿尔弗雷德·罗伯茨，是一位鞋匠的儿子，因家境贫寒，13岁时就辍学离校，开始经营杂货业。凭自己克勤克俭，精打细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已成为拥有两家商店的生意兴隆的商人。阿尔弗雷德不仅靠个人奋斗起家，而且靠自学成名。他酷爱读书，是当地图书馆的常客。他本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对教育极为热心，相信教育是使人生充实而有意义的关键。他看到女儿玛格丽特学业突出，便决意要让她受到自己儿时未受过的各种教育，为她安排钢琴课，送她去图书馆，给她选好学校，不厌其烦的解答女儿寻根究底的提问。他把自己学到的各种知识、生活经验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如何理财的体会，一古脑儿地都传授给女儿。他成为市议员、市政官员以后，又以自己为榜样，倾心给玛格丽特进行另外一种教育，这就是培养她对公益事业的献身精神，强烈的事业心，正直的道义感，坚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意志。正是从这位正直的杂货店老板身上，玛格丽特学到了做人的准则和宏大的抱负，学到了50年后治理国家的基本知识。

青少年时代的玛格丽特并没有认真想过终身从事政治职业，她只是循规蹈矩地学好学校安排的每一门课程。1943年，玛格丽特考入牛津大学索默维尔学院学习化学专业。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激烈进行之际，牛津大学的校园里弥漫着战争的气息，学生们观望着战争的进程，不可避免地为打败德国而从事种种激动人心而又极其秘密的活动。玛格丽特一上大学，就参加了牛津的保守党协会。

战时英国由联合政府执政，虽然声名显赫的保守党领袖丘吉尔雄距首相宝座，但他的党的地位实际上已一落千丈。1942年10月，该党议员威廉·斯哥特勋爵在给本党组织秘书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全国，保守党成为廉价的笑柄。新闻界和英国广播公司对我们不屑一顾。……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在全国还是在议院，作为行之有效的舆论机构，保守党已不复存在。”玛格丽特选择保守党，似乎不是深思熟虑的政治举动，她的解释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那里我有机会见到众多的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这显然不是真正的原因，因为参加其它俱乐部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人们有理由推测，是她父亲向她灌输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念在这里起了作用。

1945年的大选是玛格丽特政治生活的一个小小的开端。在牛津她为保守党人昆廷·霍格战胜工党候选人、争夺议员席位而呐喊助阵，这使她初次尝到了大选滋味，这年秋，她已是学校保守党协会的理事了，不久又成为协会的主席，因而能够结识许多保守党的重要人物，并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后来，玛格丽特仍然和这些人保持着特殊的关系。

牛津大学具有孕育政治家的独特传统，英国好几代政治家都是从这里脱颖而出的。玛格丽特在牛津大学的经历，为她以后的首相生涯奠定了基础。然而就眼前而言，她离职业政治家还有一段路要程要走，还要排除种种障碍，做种种关乎未来命运的选择。

1947年大学毕业时，玛格丽特心里清楚，她必须自谋生计。她虽然获得了化学学士学位，但从事化学专业与她的政治抱负是相矛盾的，此类人不会受到保守党的重视。尽管如此，她还是当了一名化学师，在埃克塞的一家塑料公司工作。幸运的是，战后大选遭到失败的保守党在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变化，它此时特别鼓励像玛格丽特这样的年轻人获得成功。玛格丽特瞅准这个大好时机，在埃克塞一找到工作，就参加了当地的保守党协会，这使她得以在次年秋出席保守党的年会。会上，她通过熟人介绍，认识了达福特市保守党协会主席。这位主席对她印象不错，于是推荐她参加1950年达福特区议员的竞选，24岁的玛格丽特因此成了这次大选中最年轻的女候选人。初次参加竞选的玛格丽特毕竟有些稚嫩，她的竞选演说充满了反社会主义的内容，其失败是可以预料的。

1950年竞选失败后，玛格丽特再次被提名为保守党达福特市的候选人，结果在第二年争夺议员的选举中再次败北。尽管两次竞选都失败了，但玛格丽特从此确立了自己的终身职业，进入了和她志趣完全相投的世界。在这两次竞选中，作为最年轻的女候选人，她比男候选人更引人注目，她的表现引起了保守党总部的注意。

当上候选人后，玛格丽特确信她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了。她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法律，期望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律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而且来去自由，不必受雇于固定的雇主。在被法律教育委员会招收为业余学员后，她没有选择大多数律师所喜欢的刑法，而是把与自然科学知识密切相关的专利法定为自己的专业，后来又学习了税法。经过不懈的努力，她在1953年12月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律师经历是玛格丽特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在英国，律师界向来是男人的一统天下，又是胸怀大志的保守党政治家云集之地，玛格丽特顶住男人们的偏见与歧视，很快就加入了保守党律师协会。她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工作，终于被选为协会执委会的第一个女委员。在这里，玛格丽特又结识了几位和她一样有远大抱负的人，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她竞选保守党领袖的竞选办公室主任的艾雷·尼夫。对许多政治家来说，法律就像医学那样神秘，法律条文虽然是法律制定者们关心的事，但政治家亦常常为此头疼。然而玛格丽特却由于当过律师，对法律思想和术语了如指掌，因而在出任首相后能坚定不移地把法律作为实施政治变革的工具。

在从事律师工作期间，玛格丽特还做了一生中另一个重要选择，这就是和丹尼斯·撒切尔结为伉俪。在一次达福特市保守党人的晚宴上，玛格丽特结识了对她未来生活和政治事业至关重要的青年丹尼斯。丹尼斯拥有祖传的产业，他的祖父是个农民企业家，开办了一个生产除草剂和羊毛清洗剂的工厂。当 he 从父亲手里接过这个企业时，它已是一个生产油漆和其他化学物品

的大公司了。从 1943 年起，他就担任公司总经理。那时他体格健壮，相貌英俊，正在物色理想的伴侣。她和他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对经济感兴趣，都相信保守党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德。

经过两年交往，1951 年 12 月，玛格丽特同丹尼斯举行了婚礼。她的婚姻标志着她与她的故乡、她的阶级以及她的宗教信仰的决裂。嫁给丹尼斯后，她一跃成为富裕阶层的一员。从传统观点来衡量，她和他门第悬殊，玛格丽特显然是高攀了。这一婚姻还标志着她已放弃了她原来所信奉的卫理公会教义。该教义是不赞成离婚的，而丹尼斯却是一个曾经离过婚的再婚者，但玛格丽特没有因卫理公会的清规戒律而拒绝丹尼斯。毫无疑问，她的父亲为女儿不守教规而生气，他没有参加她的婚礼。但玛格丽特自有她的考虑。有了他提供的经济保障，她可不必再为生计而奔波，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政治活动。成名以后，她曾坦率地说：“是丹尼斯的钱帮了我的大忙。”

结婚以后，撒切尔夫人雄心未减。她知道，走向国家政治中心的必经之路是当议员。她现在有钱了，但寻找合适的选区并非易事。达福特市肯定不是她的发迹之地，其他几个地方的保守党协会则拒绝接受她，因为她的争取妇女权利的要求不符合大多数保守党人的观点。但她并未灰心。经过努力，她的名字上了奥尔平顿区的候选人名单，但选举中又一次失败。1957 年，丹克纳和梅斯两个选区都拒绝接收她为候选人，她在牛津区的努力也没有成功。然而这些挫折并没有使她灰心丧气。1958 年，保守党人占优势的芬奇莱选区出现空缺，该区的保守党议员宣布他不再参加大选，这使撒切尔夫人有了竞选该区保守党候选人的机会。经过两轮筛选，她从 200 名竞选者中脱颖而出，并在 1959 年的大选中获胜，成为芬奇莱区议员。她终于成为一名职业政治家了。

二、用行动证明自己

政治家们都懂得，要在政界飞黄腾达，不仅本人要有超人的才华，还必须靠头面人物的扶植和良好的关系网，在重视门第和社会地位的英国社会和富人的党——保守党内尤其如此。因此，热衷于保守主义政治的人都愿意结识党内的伟人和政治名星。他们喜欢和名人在同一选区演说，参加同一次会议，在同一小组讨论问题。撒切尔夫人在进入议会前，虽然在牛津和律师界认识了几个政治家，在保守党总部也小有名气，但她没有参加任何派系，在政界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作为一个女人，尤其像她这样一个出生在偏远小镇、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很难结交知心的朋友。进入议会后，撒切尔夫人深深感到同僚们对她这个年轻的女性后座议员的鄙视。她决心用行动证明自己，打开局面。

按照惯例，每届新议员可以向议院提出议案，但必须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提出议案的先后次序。撒切尔夫人幸运地抽到第二名。她提出的议案是“公共团体”议案，该议案并非完全是她的创议，保守党在1959年的大选宣言中就提出了应允许新闻界参加地方议会会议的措施，其宗旨不在于新闻自由，而是要削弱工会势力。1958年，新闻界在工会领导下举行大罢工，但仍有部分记者为报社工作，客观上分裂了罢工活动。当时，一些工党控制的地方议会通过决议，拒绝这些记者来议会采访，以此声援新闻界的罢工。保守党自然反其道而行之，抛出新闻自由的主张。

虽然撒切尔夫人的议案内容没有新意，但她介绍议案的风格却颇独特。她没有唠唠叨叨地叙说“当选为议员深感荣幸”之类的套语，而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议案。她讲了27分钟，几乎没有看讲稿，她列举了一连串的统计数据来证明公民有权知道地方政府的开支。这一风格的形成与她平时广泛阅读、积累资料的习惯分不开。她在议会的处女演说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许，连政府住房部大臣亨利·布鲁克也为她的辩才而震惊。他说：“我很难用语言来形容这篇漂亮的引起了一场争论的演说。”

“公共团体”议案证明了她的演说才能，她因而成为年轻新议员中首批得到提升的人之一。1961年10月，撒切尔夫人担任生活津贴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这一官职地位处在行政官员阶梯的底层，难以出人头地，而该部的工作又非常枯燥无味，但撒切尔夫人对工作尽心尽职，一干就是三年，没有到保守党重视的外交、财政等部门另觅职业。她当然有雄心壮志，曾公开声明女人也要当财政大臣。但在当时，低微的职务和人们对女性本能的歧视远远把她抛在重大事务之外。不过，撒切尔夫人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务实主义和乐于干任何工作的精神，引起了党的某些要人的重视。

1964年保守党大选失败后，爱德华·希思成为党的领袖。他是木匠的儿子，出身卑微，说话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这在等级森严、门第观念极强的英国社会，显然是不利因素。他的成功，被认为是英才执政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给同样出身下层的年轻的保守党人带来希望，撒切尔夫人也借此跻身于影子内阁前座成员的行列。1969年，影子内阁的教育大臣博伊尔退出政坛，希思非常高兴，他想找一位工作勤奋、争强好战、能够坚持党的基本原则、与工党周旋到底的人填补空缺，撒切尔夫人被认为是合适的人选。希思向来歧视女性政治家，但对撒切尔夫人却评价甚高，认为她勤勉、可靠，而且与他政见相合，是他建立保守主义新世界的好帮手。撒切尔夫人任影子内阁教

育大臣时间并不长，1970年希思出任首相后，她也成为执政的内阁教育大臣。

在政府中，教育大臣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职务，撒切尔夫人一直在寻找晋升的机会。她打算干上几年后能调到与政治中心接近的部门去，然而希思却偏偏对她的工作不作变动，原因是他发现她非常固执，她的鲜明的保守性与自己的“共识政治”（即保守党与工党尽可能取得政治上的共识）相抵触，因而决心把她圈在职能范围较小的部门。对此，撒切尔夫人当然很恼火，一度几乎沉不住气，不过最终还是接受了她当时无法改变的现实。但她决非无所作为之人，她要充分利用手中既有的权力，实现个人的信念。

撒切尔夫人刚走马上任，就碰到财政危机，有人建议政府削减3亿英镑开支的计划应包括教育。撒切尔夫人坚决反对削减教育预算，她据理力争，保住了刚开始筹建的广播电视大学项目。她甚至逾越大选宣言的雷池，独自决定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她能言善辩，总是能够说服财政部，为教育部划拨大批经费。她的卓越的工作能力，勤奋的工作态度，就连她的对手也不得不佩服。在教育部一直与她作对的威廉·派尔勋爵就曾这样评价她：“她夜以继日的工作。她的文件柜总是空空的。她从不积压文件。所有文件上都有她用蓝铅笔写的批示。”“她工作有经验，开会从不迟到。如果她说两点零六分开会，她一定会准时赶到。”

撒切尔夫人的努力没有白费，1974年保守党大选失败后，希思任命她为影子内阁财政事务发言人。这一重要职务使她有了展示才华的机会。在抨击工党政府的税收政策时，她的机智和辩才给大多数不熟悉她的议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有一个议员为她的才华所倾倒，后来竟成了她的竞选活动的组织者，并成功地把她推上了保守党领袖的宝座。

此人叫艾富·尼夫，是一个富于心计的后座议员，撒切尔夫人在当见习律师期间与他同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但那时他们关系一般，他并不了解她。尼夫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很早以前就以暗中策划的本领闻名遐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勇敢机智地逃出德国战俘营，回到伦敦后，组织了大批战俘越狱，是

名符其实的战斗英雄。在当律师期间，他成功地起诉了一些纳粹战犯。然而显赫的功绩没有使他成为保守党的重要人物，他为此常愤愤不平。现在保守党四分五裂，组织秘书的指挥失灵，尼夫的地下工作才能派上了用场。他的目标是打倒希思。当他发现撒切尔夫人是一个可支持的候选人后，就积极说服党内那些嫉恨希思的保守党人，特别是像他一样怀才不遇的后座议员支持撒切尔夫人，最终使撒切尔夫人在领袖竞选中爆出了大冷门，以绝对多数票登上领袖宝座。

三、时刻注意塑造自己的形象

撒切尔夫人知道，要赢得大选，单凭吸引人的政策和策略是不够的，还必须设法提高自己的个人形象。在所有选举中，选民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未来首相本人而不是他所代表的党派身上，因之形象和妆饰对竞争者的成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保守党在野期间，政治要求撒切尔夫人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随和温柔的女性形象。保守党人从来不乏为提高党的领袖形象而卖力的专家顾问——麦克米伦特别器重广告代理人科尔门、普伦蒂斯和瓦利；希思雇佣广告商巴里·戴担任他的形象顾问；保守党总部则向来就扮演着政治推销员的角色。对撒切尔夫人这样一个信守正直坦率传统的人来说，这种靠塑造形象赢得选举的做法，似乎是卑劣的。然而七十年代的撒切尔夫人毕竟不是先前天真单纯的玛格丽特，她的政治手腕已日趋老道，如果说提高党的领袖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赢得大选的先决条件，不管要求她做什么，她都会毫不犹豫。据帮助过她的有关人士回忆，撒切尔夫人兴致勃勃地采纳了改变形象所必需的一切办法和建议。

在 1978 年大选中，为改变撒切尔夫人形象立下赫赫战功的是曾做过电视制片人的戈登·里斯，他安排了有助于提高撒切尔夫人形象的一切活动。里斯以前主要为联合电视公司制作喜剧和宗教题材的电视片，从未制作过政治片。他是保守党的支持者，也是最早采访过撒切尔并对她崇拜备至的人。还在撒切尔夫人任教育大臣期间，当时她要做电视演说，就是靠了里斯的帮助，她在摄像机前才显得比较轻松自然。他教她如何获得电视效果，鼓励她增强自信心，建议她讲话时放低音调，甚至连她在公众场合的发型和服式都作了变动。简单地说，他仿佛成了她的贴身男仆。但是，当电视艺术和高层政治结合起来时，这个男仆的作用就远远超过了为客人整理衣服、选择发型的范围了。撒切尔夫人深知这一点，她曾对里斯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大选失败，我可能被革职，你将被枪毙。”

实际上，撒切尔夫人时刻都注意塑造自己的形象，尤其注意仪表整齐。在许多熟人的记忆中，她始终是一个穿着整齐、性格恬静、长着迷人的棕色头发的女人，和她在一起使人感到愉快。在歧视女性的社会风气尚未改变的六十年代，撒切尔夫人刻意讲求仪表的做法，也曾引起某些同僚的非议，但她却以自己出色的工作抵制了此类非议。曾经在 1961 年担任生活津贴和国民保险部常务秘书的艾利克·鲍耶爵士起初反对撒切尔出任该部政务次官，因为他怀疑一个刻意打扮自己的女性能否全心全意地做好本职工作。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她总是仪表整齐，她的发型似乎是花了一个早晨才做出来的，她的衣服似乎是花了一个下午才精心打扮出来的。”但他后来不得不承认，撒切尔夫人所做的事情并不比她的前任少，甚至还要多。她的端庄而精力充沛的仪表有时候甚至引起她的对手的嫉妒。工党女政治家巴巴拉·卡斯尔在自己的日记中就这样写道：“如果她偶尔鼻子上有污点，头发蓬乱，脸上露出憔悴的神色，那该多好啊！”

撒切尔夫人十分注意她在议会的形象。虽然她从来没有学会天才议员那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雄辩力，但通过事先做细致准备，仍能使她发表的讲话取得预期的效果。对于议会两周一次的质询，她每次都要认真“彩排”。她的高令并没有使她对细节的注意减退，她在执政第 10 年为议会质询所做的“彩排”仍同她执政第 1 年时做的一样认真，一样充分。每次发表重大讲话之前，

她都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了某些细节，她甚至要工作到深夜。只有在极不正式的场合，她才允许自己做即席讲话。她还极大地改变了她的说话方式。她请国家大剧院的指导给她上发音课，并且进行哼唱训练，以降低她天然噪音的频率。训练的目的在于将她的噪音变深沉，语速变慢，使她说话的语气更具有国务活动家的语气特点。据专家用仪器测量，经过训练，她成功地将音频降低了46赫兹，为未来的女政治家创建了“形象上的先例”。

然而她的形象仍非完美无缺。在公众眼里，她是一个争强好胜、性格固执、工作勤奋的政治家，“是保守党内最好的‘男人’”，同时也是一个不理家务，没有家庭观念的女人。特别是她出任教育大臣时，迫于财政困难，撤销了对8~11岁孩子每天免费供应牛奶的规定以后，她竟成了全国共诛的恶魔。报界纷纷指责撒切尔给小学生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夺取牛奶的撒切尔夫人”成了庸俗小报和工党政治家的口头禅。一个女人从无辜的孩子嘴里夺去牛奶显得特别恶劣，人们把一切愤怒都发泄在她的身上，她一时成了“英国最不受欢迎的女人”。针对这种情况，头脑灵活的里斯在幕后出谋划策，为她拍了一张站在厨房水池旁边的照片。这张小小的照片一下子使她变成了慈善可亲的家庭主妇，更具女性魅力，在她进行保守党领袖竞选中起了积极作用。

英国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工会势力历来强大，处理好与工会的关系，是任何一届政府都不能忽视的问题。在历史上，工党一般对工会持同情态度，而保守党总是把工会看作敌人，撒切尔夫人尤其如此，她的许多主张都是以削弱工会力量为目的，她的众多的演说中也充满着对工会的敌意。在1979年大选前夕，虽然民意测验表明，保守党的支持率已比工党高出14个百分点，但撒切尔的支持率却比自己的对手工党候选人卡拉汉少6个百分点，原因是人们担心一贯同工会闹对立的撒切尔夫人执政后，不可能有效地驾驭工会，而会形成政府与工会对峙局面。里斯对人们的忧虑十分敏感。他曾私下说，要是让领袖只在每晚电视新闻节目中露面而不发表言论，那该多好啊！他担心撒切尔夫人流露出对工会的憎恶而对大选不利，建议撒切尔夫人对工会采取温和态度和政策。撒切尔完全接受了这一战术，暂时放弃了她的出自本能的嗜好。当时工党和工会关系十分紧张，也有利于她使用这张牌。她在演讲中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民族几乎是工会纠察的一统天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工人们是如何乞求工作权利的。”这几句话给工人造成的印象是，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懂得工会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将会满足工人的工作权利要求，因而不再对她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在大选中，撒切尔夫人不仅注意塑造自己的形象，而且放手让广告商推销保守党的主张，结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她改变了以往党对宣传活动钳制过死的毛病，而授权让萨奇兄弟开办的一个广告社制定竞选计划。萨奇广告社接过这一任务后，把几乎所有政治家都排除在政策制订之外，连保守党的上层人物在电视上露面也得经过他们的恩准，而且这些上层人物只能起到广告作用，不得表述政治观点。1978年夏天，萨奇广告社在全国各地民意测验办公室的门上张贴了一张引人注目的广告，上面写着这样一条标语：“工党仍在休息。”出人意料的是，这幅广告竟成了工党政府把原定1978年秋季大选推迟到次年春季的因素。工党以为，保守党意在挑动工党立即举行大选，因而反其道而行之。工党推迟大选日期的目的在于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实际上却对保守党极其有利，它为保守党解决重大政策问题提供了必要的

时间，从而扩大了保守党获胜的可能性。当时撒切尔夫人和党内温和派在工会改革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一下子还拿不出完整的竞选纲领。特别是这年冬天，通货膨胀直线上升，工业界发生了动乱，罢工浪潮席卷英伦三岛，工党政府因此失去了工会的支持，结果使保守党在 1979 年大选中获得胜利。一幅粗制的毫无根据的广告明显影响了一次大选的结局，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四、恩威并施宽猛相济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两党制政治的典型特征之一。1979年5月成为唐宁街10号主人的撒切尔夫人亦不例外。但历届首相仅只是把各部大臣换为自己的亲信，至于被视作政府机器的公职部门的官员则一般保持稳定。因为一则他们是行政专家，熟悉白厅的工作程序；二则是这些人也乐于为任何一届新领袖服务。然而以扭转乾坤、开创新时代为己任的撒切尔夫人却要割断新政府与旧政府的一切联系，早就把改变政府机器本身作为她的重要目标。

在撒切尔夫人看来，公职部门是过去的延续，是受了社会民主化污染的部门，因而是她与过去决裂的障碍。她的头脑中有这样一幅可怕的图画：白厅官员集结成一个方阵，他们像美国橄榄球运动员一样，身材高大，着甲戴盔，顽强地抵抗着对方的进攻。她认为，新政府每一项动摇传统观念的建议，不管是削弱工会势力还是减少对企业的干预，都将受到白厅官员出自本能的阻挠。如果政府本身不顺应她的统治，那么她的改革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她决心要斩断这种延续，削弱公职部门的势力，缩小它们的规模，挫伤公职人员的傲气，摒弃他们的正统观念，最终在政治上控制他们。她上任伊始，就以不同寻常的精力，不同寻常的手段着手建立自己的支配地位。

初次接受这一攻势的白厅官员都有当头一棒的感觉。他们已经适应了工党政府的统治：吉姆·卡拉汉首相不爱管琐碎小事，他的风格酷似董事会主席只管策略性问题，要求秘书起草的内阁文件不得超过一页的两面，然而新首相截然不同，她仿佛是一位严厉的女管家，一进入唐宁街10号，就表现出凡事都要躬身亲问的欲望。每一份文件她都要过目，而且总要写评语，“胡说八道”，“再简略一些”，“重新起草”是她常用的语汇。她觉得如果不干涉每一部门的工作，就不能使政治家和官员们相信她是真正的主人，如果她不亲临现场，任何事也做不好。撒切尔夫人事事亲躬的做法，使习惯于懒散清闲的白厅官员感到非常紧张，他们觉得仿佛有一把达摩利斯剑高悬在自己头上，不得不处处小心。

不久，撒切尔夫人发现，那些在她身边工作的人工作十分出色，对她十分忠诚，愿意“弯腰欠身”，欢迎新主人的到来。她同时还发现，尽管自己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但却并非无所不通，她在白厅世界的经历仅仅局限在高级官员不多的教育部，离开专家的帮助，她寸步难行。而职员们则发现，这位新首相除了极其严厉的一面之外，也伴有常人的热情。她是个女人，常以女人独特的方式关怀她周围的人，对他们的生活特别体贴。她经常询问他们是否吃过饭，妻子的感冒是否痊愈，孩子的考试是否及格等生活细节问题。在她的整个首相生涯中，她力图与私人秘书和在她手下供职的官员们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

白厅官员们喜欢来自首相的关怀，也喜欢她像他们一样注重细节琐碎问题。她善于批阅公文，尽管她总是对下属写的初稿提出批评，他们却特别欣赏她写的批注。一些原来认为自己会成为首相改革替罪羊的高层公职官员也感到心情舒畅。约翰·亨特是希思任命的内阁秘书，威尔逊任首相时期，他仍是重要人物。他原以为自己心遭清洗，然而撒切尔夫人不但没有把他当作前朝遗老治罪，反而重用他，他依然身居要职。首相就职几周后，就对他的一位同事说：“亨特起草的文件非常出色”。亨特自然感恩戴德，更加卖力

地为她工作。她的周围很快形成了一个无比忠诚的小集团。

但是，这只是撒切尔夫人控制下属的一种手段。她的热情和关怀只有极少数人，通常是那些每天能见到她而且她非常信任的助手们才能得到，更多的官员们所感到的却是她的另一副面孔——威严。

每当那些没有立刻追随她的官员们来到她面前时，她总是表情冷峻，目光逼人。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遭此待遇的官员多不胜数，政府“智囊团”的负责人肯尼思·贝里尔就是其中的一个。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10号三天后，就传话召见贝里尔。她以前见过他。她担任教育大臣时，他是大学奖学金委员会主席。希思政府垮台的前几个月里，他被擢升为财政部经济顾问。工党执政期间，他被调离财政部，主管政府的“智囊”班子。不管过去在教育部她对贝里尔的看法怎样，现在她把他列入了左翼成员之列。这次她把贝里尔召来，狠狠训了一顿。贝里尔出来时考虑，自己是否应解散“智囊”班子，重新找份差事。但他后来还是设法和领袖建立了良好关系，在原岗位继续干了一年。“祭神仪式不一定非要宰杀鸡犬”，这是撒切尔夫人的典型特征。她喜欢争论，不论是和大臣还是和职员，争论往往异常激烈，但不一定非要把对手逐出政府，她只不过是这种方式表现她在政府领地的存在。撒切尔夫人也像伊丽沙白女王那样喜欢查访，不过女王是查访王国的各个地方，而她是走出唐宁街去视察白厅各个机构。她要亲眼看看各个部门都在干什么，谁在干。别的首相也偶尔视察各部，但没有人像她查看得那么仔细，那么系统。她的到来使各部门的低层职员感到愉快，因为她常与清洁工、档案员们亲切握手，使他们感到她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家。但对高级官员来说，她的到来却犹如大祸临头。国务大臣吉姆·普赖尔做好了迎接首相的一切准备，天真地期等着她的褒奖，谁知他们的会见竟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她似乎从来不管这样会使大臣在职员面前丢脸，或者职员们在大臣面前难堪。在讨论工业法时，撒切尔夫人与一位最优秀、最忠诚的高级官员唐纳德·德克斯吵了起来。她显然对这一领域不大熟悉，但就是不愿意听取权威人士的意见，以致德克斯绝望地问道：“首相夫人，你真想知道事实吗？”其它的此类会见也多是欢而不欢而散。

尽管如此，她的查访活动仍有价值，这就是她收集到了白厅上层官员的大批档案材料，这些材料对她的人事安排很重要。她选人主要不是看实绩，而是凭她的最初印象。她担任教育大臣时曾对她的常务秘书威廉·派尔说：“我在初次见到一个人的10秒钟，就可以对他留下印象。而我几乎不改变我对一个人的初次印象。”同样，在视察白厅各个机构期间，官员们在她心目中的印象如何，关键就在于这短暂的几分钟。通常，她按照名单把官员们召集起来，他们发言时，她在他们的名字下面画着不同的符号。一些符号是小圆点，另一些是一条横线。圆点代表她中意的人，横线代表她挑剔的人。她心目中只有这两类人，每一个人不是属于第一类，就是属于第二类。前者是她要重用的苗子，后者则是清洗的对象。她就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为自己物色了新闻秘书。在现代英国政府中，新闻秘书是首相和新闻界的媒介，其作用越来越重要。对这样一个重要角色的选择，自然应该慎重考虑，但撒切尔夫人却随意选了一个。此人叫伯纳德·英厄姆，原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新闻官员，1967年他步入白厅，负责物价和收入委员会的宣传工作，后任能源部情报处长。他后来决定放弃情报职业这条死胡同，走行政管理大道，做一名文职官。1979年夏末的一天，英厄姆被召到唐宁街，他只知道要参加一次

会见。如果他事先知道要他做新闻秘书的话，他可能还不想干呢。来到撒切尔夫人面前时，他才发现自己误会了。首相一见他就开始给他分配着手要做的任务，好像任命和接受的程序仪式早已进行过了。如果说她以前见过他的话，那就是她在视察能源部时瞥过他一眼。然而，就凭这最初的印象，未经过理智的选择过程，她找到了一位知心的朋友，俩人结下了永久的友谊。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她同他的关系不亚于同其他任何朋友的关系。

经过最初 6 个月的努力，撒切尔完全控制了白厅的公职人员，他们都是首相的人，接受了她的信仰，忠心耿耿地为她服务。她生活在他们中间，来回穿梭于唐宁街 10 号的各种文件、记录以及频繁的审查活动，无一不证明她的存在。她也心满意足地感到，她已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首相了。

五、“我是一位反叛式的国家领导人”

1981年的英国多灾多难。2月份的煤炭工人罢工刚刚平息，3~4月份又接连发生两次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至下半年，社会仍然动荡不定，没有什么恢复和平的迹象。与此同时，持续多年的严重失业问题不仅未缓和，反而趋于加剧，人心惶惶，世风日下。保守党在这一年也是命途多舛，它的货币主义和紧缩政策受到各方面的抵制。虽然撒切尔夫人立志要推行她的主义，于9月份清洗了内阁，然而新组成的内阁并未显示出什么力量。相反，温和派人士由于被无情地挤出了权力中心而恼羞成怒，发誓要与撒切尔夫人抗衡到底。被革职的吉尔摩在一次会议上把财政部的几位大臣骂得狗血淋头，指责他们是一群愚蠢得连乘法九九表都不懂的原始人。财政部大臣杰弗里·豪的辩解又引起了基层委员们的极大不满，会议被激烈的宗派斗争所淹没。在保守党年会召开前夕，一批年轻的温和派保守党人发表了一篇措词谨慎然而观点明确的文章《换档》，呼吁削弱货币主义者的权力，以“挽救保守党，把它拉回到原来的路线上来”。

客观形势极为不利，撒切尔夫人被迫下台的可能很大。在这年下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她再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温和派虽然没有结成帮派集团与她斗争，但是，关于她被迫辞职的问题早已是他们家里餐桌上的热门话题，甚至一些强硬派也随声附和。1981年12月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只有23%的选民认为她工作很出色。这个数字意味着她是英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首相。严峻的形势使她的大臣们非常悲观，他们相信，撒切尔夫人要么改变政策，要么辞职。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看来，撒切尔夫人的大限已到。

23%的支持率一定会使大多数首相惊恐不安，然而撒切尔夫人毕竟不同于她的前任们，她非但没有惴惴不安，反而觉得很满意。面对如此难堪的境地，她竟然还有心开玩笑。工党领袖迈克尔·富特为矿工罢工取得胜利感到高兴，在一次议会辩论会后邀请首相“共进午餐”。她回答说：“毫无疑问，迈克尔不用提醒也知道，有时候女人是有权说‘不’的”。她不仅情绪极好，而且依然喜欢争论。如果没有争端，她会觉得一切都平淡无奇，就要设法挑起争端，不论是与内阁交战，还是与温和派交战，甚至与全国，全世界交战都行。”我是一位反叛式的国家领导人。”她有一次在首相官邸对来访者这样说。她脱下鞋，站在椅子上发表了一通即席演讲。她在整个1979年到1983年的第一任期内几乎天天如履薄冰，正是这种强烈的自我认识保护了她。

撒切尔夫人有她自己的形势判断。她知道，选民的支持率只在大选时起作用，而现在是1981年，离大选还有两年；温和派虽然在党的上层人多势众，但在整个保守党内仍然是少数，不可能翻起大浪。她从来没有觉得整个保守党与她作对，她自认是党的急先锋。尤其是她有力地控制着议会中的后座议员——他们在议会中占多数，通常是倒阁的真正力量，这是她确保首相职位的法宝。

希思曾说过，不控制后座议员，首相将无法渡过艰难时刻。撒切尔夫人深知个中三昧，她出任首相后一刻也没有放弃对后座议员的控制。她能牢牢控制后座议员，主要是因为她具有一种独特的争辩能力。众所周知，她不是卓越的讲演家，没有出口成章的天资，她出任首相10多年里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值得收入著名演讲集里的话，也没有做过一次令人难忘的演说。然而她

讲起话来总是胸有成竹，对各种细节了如指掌。她并不是因为拥有出众的口才，而是因为她讲话时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争强好胜，不屈不挠，“宁可用枪把对手打死，也不愿意把他当作人质留下活口”。

她之所以身处逆境仍然斗志旺盛，有意挑起争端，扮演反叛式国家领导人的角色，就是要显示自己的决心和力量，以赢得议员、特别是后座议员的心。她的辩才保证了她的成功。在 1981 年 12 月 10 日的议会上，年迈的工党领袖迈克尔·富特就有关削减社会福利问题向首相提出质询，他问撒切尔夫人：“一个结了婚、有两个孩子、如今失了业的男人，假定他原来拿的是平均工资，今天是否比政府削减社会福利费用之前每周少收入 13 英镑？”实行这一政策的正是撒切尔夫人，她理应回答富特的问题，但这又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尽人皆知，失业救济金的减少，确实影响了失业工人的生活水平。然而首相却不假思索地反问道：“请问那位给我提供这个数字的可敬的先生，您是怎样计算与收入相关的救济金的？”富特原以为会难倒她，没料到她会反问他，一时张口结舌。“我知道那位尊敬的先生对他所说的数字并没有什么把握！”她冷嘲热讽他说。“领取与收入相关的救济金的人仅占失业人口的一小部分，因此并不能说明所有失业者每星期都少领了 13 英镑。”

在公开场合，撒切尔夫人总是这样语不饶人，傲视群僚，然而在私下里，她也极其重视修补篱笆。她不仅利用一切机会与前来找她讨论问题的议员促膝谈心，而且极其重视协调党内各派的关系。她手下有一批“训练有素的修理工”，给她在修善关系方面帮了不少忙。尽管如此，撒切尔仍然非常担心可能出现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1922 年保守党委员会”。

“1922 年委员会”是保守党内以反映后座议员呼声为宗旨的组织机构，因在 1922 年后座议员联合造反，把党的领袖奥斯汀·张伯伦拉下马而得名。它的主席尤其举足轻重，任何一位保守党的首相都不敢轻视“1922 年委员会”主席的作用，因为他既可以在反叛领袖行为初露端倪时推波助澜，也可以息事宁人。撒切尔夫人任首相以来，对这个委员会的倾向一直捉摸不透。它的主席是爱德华·杜·坎，自 1972 年任职至今，在后座议员的帮助下，年年连任，这说明他是一位异常精明的政治家。他虽然职位卑微，但影响不小。他善于扰络人心，常常会做出一些令资历不深的后座议员感激涕零的举动：拍拍这个的肩，摸摸那个的背，经常去党的各位领袖的办公室走走，看看是否有人最近生病了什么的，不时说些俏皮话。然而，谁也不知道他到底站在哪一边。

在撒切尔夫人任首相的最初几年里，该委员会发表过一系列由杜·坎签发的批评文章，其中有些文章无情地痛斥了政府奉行的货币主义经济政策的弊端。他甚至允许下属起草了一份尖锐批评整个经济状况的文章。与此同时，他似乎又像是要否定这些文章，对首相大献殷勤，莫名其妙他说了许多效忠她的话。他一会儿向她讨好献媚，一会儿又是无情批评；一会儿引起轩然大波，一会儿又是和风细雨。撒切尔夫人想拉拢他，他却敬而远之，若即若离。

杜·坎的老练圆滑，令撒切尔夫人大伤脑筋。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后，她决定任命伊恩·高为她在议会中的私人秘书。任秘书是假，充当耳目是真。律师出身的伊恩·高不仅对撒切尔夫人忠心耿耿，而且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位同样忠于她的人这样挖苦伊恩·高：“玛格丽特做完一次讲话后，我的义务就是站起来鼓掌。然而首相刚一登台，还未开口，伊恩·高就激动得热泪盈眶了”。撒切尔夫人无论是国内视察还是出国访问，都要把他带在身旁。

高虽然不离首相左右，却没有耽误他在议会中充当耳目的特殊工作。撒切尔夫人每次到下院做报告或是做说服工作时，高总是先行一步，预做安排。一个叫朱利安·克林奇利的反撒切尔夫人的议员讲过下面一个故事：

一次我们五名议员在一块吃午餐，我们喝着廉价的葡萄酒，海阔天空地聊天，我们的兴致很高，突然我抬头一看，发现了伊恩·高的身影，他的眼镜片在阳光的照耀下发着一种不祥的亮光，我立即意识到麻烦要来了，说着撒切尔夫人就进来了，坐在我们的桌子旁，我们顿时哑口无言。她盯着我说：“朱利安，谈谈你对货币发行的高见。”

首相正是通过高掌握第一手资料的。高的情报网一点也不比那些组织秘书们的情报逊色，他的情报都是关于私人方面的，对首相更有用，至少可以使首相对即将来临的麻烦做到心中有数。同时，高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对反撒切尔主义者也起了震慑作用，使他们不敢拉帮结派，“采取具体的集体行动”要挟首相就范。

尽管撒切尔夫人可以与反对派巧妙周旋，然而由于经济不景气，危机并未真正过去，因之她也不得不采取灵活态度，做出某些妥协。不过，这种妥协是以她特有的方式作出的，她从来不会承认错误。这年11月，撒切尔夫人做了一次关于经济情况的讲话她不无乐观他说：“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竞争力增强了，萧条期过去了，贸易出口扩大了，市场零售回升了。政府虽然会在策略上做一些有限的调整，但是，基本的经济战略方针不会改变。有人说政府不顾后果，顽固地坚持一个统一计划，我认为说这种话的人是不顾事实的，是瞎说。”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她仍然坚定自信，且对温和派又一次进行了反击，然而温和派还是从中了解到这样的信息：首相将调整经济政策。随后制订的1982年财政预算方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财政部长杰弗里·豪曾提出下个财政年度再削减50亿英镑，新方案不再坚持；1980年风行一时的测定货币流通量的方法几乎只字未提，就连称作纲领性文件的“中期金融战略”也做了部分修改。

新的财政预算得到新闻界和后座议员们真诚的欢迎，也缓和了国内的政治气氛。次年1月28日开会讨论时，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首相的反危机措施初见成效，她不再觉得是四面楚歌了。温和派大臣觉得她“也不像以前那样专横了”，会场上有了一种“少见的和谐气氛”。而令撒切尔夫人尤感欣慰的是，到后来竟有300名议员认为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

六、精神上的自我拯救

在现代西方社会，教会虽然不再像中世纪那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宗教活动也不再是社会生活中心，但宗教信条依然是许多人尊奉的道德准则，教会在精神领域依然享有无可替代的权威。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撒切尔夫人比她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更为重视宗教。麦克米伦经常上教堂礼拜，希思喜欢在教堂的宗教活动中演奏风琴，但撒切尔夫人却更喜欢思考宗教问题。现代政治家上教堂、做弥撒、读圣经，多半不过是装饰门面，为的是取悦于教民，他们的政治主张未必与宗教理论相契合，而撒切尔夫人却不仅把宗教教条视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而且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企图以此指导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很难设想，如果失去这个精神支柱，她还能正常地行使首相职责吗？

然而不幸的是，正是这位最重视宗教信仰的首相，却遇到了战后以来来自宗教界的最严重的挑战。

1982年7月26日，圣保罗教堂为马岛战争胜利举行了一次大型庆祝会。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朗西应邀布道，他既热情地祝贺战争的胜利，又号召教徒为英阿双方的死难者祈祷。庆祝会上也没有唱通常在此种场合必唱的《基督教战士进行曲》。保守党人认为，朗西在布道中对双方阵亡者过分一视同仁表明他和许多教士对政府持敌对立场，必须予以无情抨击。由此开始，在整个撒切尔执政时期，宗教上层人士与政府之间一直处于病态的关系之中。

1984年春，煤矿工人为了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举行大罢工。新任达勒姆主教戴维·詹金斯博士对政府在矿工工潮中关闭矿井的做法提出质疑，指责政府的“漠不关心”造成了英国的贫穷和失业现状。他指出，政府关闭矿井而使矿工过剩的做法揭示了政府要让穷人来担负经济改革中最大负担的“险恶用心”。其他主教也对矿工们表示同情。保守党人把詹金斯看作魔鬼的化身，认为在许多问题上，大主教及其朋友们都是政府完全不能依靠的僧侣。

政府与宗教界的更大冲突发生在1985年。这年12月，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朗西博士的支持下，一篇题为《伦敦城里的宗教问题》的报告问世了。它是朗西所组织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两年来对伦敦市区生活条件考察的成果。这篇报告一方面对教会提出了严厉批评，指出许多神职人员都远离了内城贫民窟的实际生活，建议设立“教会市区基金”，用以加强市区教会的力量，另一方面则攻击了政府在许多方面的政策，督促政府用更多资金来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社会福利，大力改善儿童福利待遇。报告中还得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结论，即认为内城问题的关键在于内城居民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受害者，而保守主义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忽视社会对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负有的责任，乃是内城生活条件急剧恶化的根本原因。

《伦敦城里的宗教问题》立刻激起了政界的骚动。政府发言人指责报告中的集体主义偏见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出调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工党的追随者。保守党议员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攻击报告忽视了基督教教义。但朗西博士没有被这些大帽子吓住，他坚持说报告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只不过是“教会对政府的评论”。撒切尔夫人自称“带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这份报告，但她发现这份报告没有任何与居住在内城的个人和家庭有

关的建议，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一切社会准则的建立都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个人和家庭的利益，教会应从这一原则出发，向每一个家庭传道，她指出，教会在这份报告中没有做到这一点，她“对此感到非常震惊”。

她确实应该感到震惊，因为她的政府可能是二十世纪英国政府中最不受教士阶层欢迎的一届政府，保守党人普遍感受到教会对他们的冒犯，他们也对教会感到失望。尤其是，撒切尔夫人一直最大限度地利用宗教观点为自己的政治观点服务，她将高度复杂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看作简单的、仅仅与个人道德观念有关的问题，她喜欢个人奋斗，反对依赖国家和社会，而现在，作为撒切尔主义哲学核心的个人主义已面临被摧毁的威胁。果真如此，那么她的政府所推行的货币主义政策、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政策、政府放任企业的不干涉政策等等岂不全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她的政府还能存在下去吗？

虽然教士们的言行不断激怒撒切尔夫人，但她却不能不谨慎地克制自己的情绪。因为她知道向教会宣战意味着什么，同时，她对教会（不是对教士）根深蒂固的尊敬也不允许她这么做。事实上，她从未介入保守党议员对朗西和詹金斯的恶毒攻击与冷嘲热讽。她总是对各种团体和机构的人员任命横加干涉，却没有在神职人员的任命上指手划脚。尽管按照 1976 年修订的主教任命规章，她有权过问教会对主教的任命，但她只有两次否决了教会希望政府优先考虑的人选。

然而在精神上，撒切尔夫人感到十分孤独。她生来就是卫理公会的信徒，它的教义与自己的政治主张完全吻合，但这种宗教仅流行于威尔士地区，如果她这位保守党政治家在威尔士以外地区继续信奉卫理公会教义，那么她就会显得很孤立。况且，她和丹尼斯结合已经违背了这个教的教规，被认为是卫理公会教的叛逆者。罗马天主教在英国和国际上都很有势力，但对她这样一个不信奉英国国教的基督徒来说，罗马天主教会觉得更难以理解。为了在精神上得到慰藉，她在批阅繁多的公文之余，总是不停地阅读各种宗教书籍，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把自己的政治计划与人类生存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宗教。最后，她找到了犹太教。事实上，早在五十年代末，她就同犹太教建立了密切关系。1959 年她当选芬奇莱选区议员时，她意识到该选区有 20% 的选民是犹太人，必须发展与这一部分人的关系，同时她最尊崇的价值观念也与犹太人的价值观念极接近，因此她一定能获得犹太人的支持。近 30 年来，她坚持加强芬奇莱犹太教堂的宗教活动，而且她对犹太教的信奉已经渗透到她生活的许多方面。她所提倡的生活方式，她所偏爱的朋友和同事，以及她对以色列的坚决支持，无不反映出她对犹太教的敬奉。

撒切尔夫人认为，犹太人所尊崇的自立精神是犹太教教义的精髓。与基督教教义相比，犹太教更加旗帜鲜明的鼓励人们树立雄心大志，坚持个人奋斗。同样，在社会责任感方面，犹太人的表现比基督徒更加突出。但对撒切尔夫人来说，犹太教的意义主要在于它可以为她提供许多有用的箴言和志同道合者。伊纽尔·雅克博维茨就是这志同道合者的重要一员。自 1967 年以来，雅克博维茨一直是芬奇莱的犹太大主教，他同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她出任教育大臣时，他们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点。他对她说，人们应该称她为“国际大臣”，因为唯有教育才是社会未来的真正保障。他们都热衷于进行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谈话。在许多此类谈话中，他总是高谈阔论，她则洗耳恭听。撒切尔夫人就任首相后，首先使雅克博维茨获得了爵士称号，

然后在 1987 年又使他成为上院议员。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和撒切尔新保守主义的某个方面相吻合。事实上，他的讲话集已经成为撒切尔夫人珍贵的资料来源。1986 年，雅克博维茨在芬奇莱一座新犹太教堂的揭幕式上的致词中，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撒切尔夫人立即感到这个比喻完全可以用来形容企业文化——个人奋斗精神，难道企业文化现在不就是被丢失在某个仓库里的“行李”吗？

这位犹太大主教对《伦敦城里的宗教问题》的抨击，更令撒切尔夫人感恩不尽。他既攻击了这份报告所表现出的人生观，也攻击了它所提出的具体改良方法。他认为，这份报告对政府工作的看法是错误的。在他看来，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首先要考虑怎样才能让失业者有工作，而不是考虑怎样向他们提供社会福利。虽然他也称赞社会福利制度，认为这是一种必需的“安全网”，但反对英国教会反复强调政府的责任。他评论说，犹太教会“强调建立一种更具挑战性、更令人满意的工作观念。建立这种新观念的首要目的，就是要铲除人类的情性，培养人们自力更生的自豪感。这样做可以鼓励人们胸怀抱负，富有进取精神，竖立起自尊”。他还极力鼓吹犹太人的自强自立精神，认为伦敦内城的黑人应向犹太人学习，尤其应向美国犹太人学习，靠自己奋斗摆脱贫困，而不要在有些糊里糊涂的教会人士鼓励下依赖政府。在工会问题上，这位犹太大主教的态度更加严厉，他批评说：“工人们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不借加剧失业问题，给公众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种做法是极端自私的，这种自私与富人对工人阶级的掠夺一样是不道德的。”

犹太大主教对英国教会毫不妥协的挑战，使教会领袖们感到震惊。但撒切尔夫人却找到了撒切尔主义在英国真正的精神领袖，她不再惧怕英国教会那些地位显赫的主教们了。

与此同时，首相继续探索宗教问题。雅克博维茨无论写什么东西，她都是要拜读的，但她更重视溯本求源。她的兴趣先是放在赫伯特·艾加的思想，然后又放在海克的思想，到 1988 年，她的注意力转向更重要的东西——她决定从头至尾重读《旧约全书》，并每天向她的手下通报阅读情况。她对手下所做的通报是典型的流水帐，没有多少有意义的内容。有一天，她问他们，《圣经》中哪一篇没有提到上帝？当无人能够回答这一问题时，她的脸上绽出得意的微笑。

七、简洁明快直截了当

说到外交，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讨价还价式的外交谈判，委婉含蓄的外交辞令，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等等。然而撒切尔夫人走马上任后，却有着自己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这方式就是简洁明快，直截了当，从不搞拐弯抹角的外交手腕；一旦她认为那样做符合英国利益，就义无反顾，不怕树敌。她上任之初，在处理英国对欧共体承担的费用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最鲜明地表现了她的这种外交风格。

在欧共体的初创年代，英国曾经是这个欧洲经济组织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但自六十年代中期起，深感孤立的英国转而要求加入欧共体，麦克米伦首相为此呕心沥血地奋斗了多年，这一夙愿在希思首相任期内得以实现。这两位保守党领袖都热切地关注着欧洲的局势，都将英国的命运与欧洲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他们不断发表富于极大感染力的演说，对欧共体寄予莫大的希望。希思首相始终把英国加入共同体作为他的最大政绩夸耀，并且认为这是他对国际保守主义的最大贡献。他的教育大臣玛格丽特·撒切尔当时也和他一样为英国能够加入欧共体而感到无比兴奋。可是，当她在选举中击败希思后，她的观点逐渐发生了变化，希思的欧洲梦对她失去了昔日的吸引力。她不仅对布鲁塞尔共同体总部内的尔虞我诈现象极为不满，也为英国某些利益受损大感不平。强烈的民族主义，精明的经济头脑使她觉得有必要当机立断，采取相应措施。

根据英国财政部提供的数字，英国的会员费呈螺旋上升状态：1978年英国承担的费用是8亿英镑，到1979年已接近10亿。她入主唐宁街10号不久，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访英，那时她就明确表示英国承担的会员费太高。这次会谈，吹响了她攻克欧共体费用堡垒的号角。“索回我们的钱”，这个声音一直回响在她的第一任期。

在“索回我们的钱”的斗争中，撒切尔夫人首先遇到了她的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的阻挠。卡林顿勋爵不赞成首相的反欧洲观念，他是内阁中反对撒切尔夫人的欧洲政策的代表人物。如果说撒切尔夫人生性好斗，他则谦和忍让。他以习习和风应付首相的急风暴雨。撒切尔夫人发誓要首先攻克外交部这座堡垒，她找到了财政部这个天然盟友。财政部一直是外交部在权力和影响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历来对英国在欧共体中承担的巨额费用牢骚满腹。早在1978年，财政部就单方面着手调查费用问题。调查是由彼得·米德尔顿负责的。他后来把调查结果向报界吹了风，报界的极力渲染使原来默默无闻的米德尔顿声名大震。撒切尔夫人大选获胜后，立即把米德尔顿召到她的乡间别墅，详细询问了费用问题的来龙去脉，并将他提升为财政部的常务秘书，掌握了财政部的大权。他们决定将统计结果转交给共同体总部。总部虽认为这数字“纯属杜撰”，但还是首次公布了英国承担费用的“真实”数字。这个数字奠定了英国在同其官成员国之间一系列争吵不休的会谈中取胜的基础。

胸中装着共同体提供的数字，撒切尔夫人开始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谈论费用问题，意欲向人们证明，英国对共同体的贡献不论从政治上讲还是从经济上讲，都太过份了，是不合理的。为了避免在新的财政年度共同体让英国承担过多的共同农业费用，她访问了斯特拉斯堡、卢森堡、波恩和罗马。每到一处，她都不失时机地表示，英国除了支付应该付的钱以外，一分钱也不多

掏。

在 1979 年 11 月欧共体的都柏林首脑会议上，撒切尔夫人正式提出削减英国支付费用的要求。她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不仅使其他首脑感到震惊，而且也使她的外交顾问们感到诧异。她以饱满的热情与其他首脑展开辩论，而不屑于在微妙的外交技巧上劳心费神。她的锋芒毕露的言词和毫不妥协的态度几乎葬送了这次最高级会议。当她把共同体预算称作是偷窃英国国库的凶恶强盗时，西德总理施密特差点晕了过去，法国代表团则发动汽车准备退场。幸亏在最后一刻撒切尔夫人做了稍许让步：她虽然不同意共同体提出的下一年减少英国支付 3.5 亿英镑的方案，但同意就这个问题再次开会讨论。

为了缓和英国与共同体在费用谈判中出现的紧张气氛，外交部打算把石油、渔业和羔羊都纳入谈判范畴，最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难题。不料首相不能容忍这种柔弱的做法，说她没有时间玩弄花样，并公开表示如果谈判破裂，她“将立即召集内阁会议，讨论英国在共同体里何去何从问题”。

1980 年 8 月底，共同体在卢森堡举行了最后协商会，会上欧共体提出了一个在以后两年里减少英国 7.8 亿英镑费用的建议。撒切尔夫人依然坚决地拒绝了，因为它只是关于以后两年的费用情况，而据当时情况，第二年很可能比第一年要支付高得多的费用。“我们必须为英国利益斗争到底。”卢森堡会议破裂后，她气冲冲地说。会后她在广播电台高兴他说，欧洲人称她是一个“女戴高乐”。

1981 年 5 月 30 日，英国和欧共体终于就费用问题在布鲁塞尔达成初步协议，共同体不仅对第一年和第二年的费用做了平均调整，而且还根据相同的原则对第三年的费用额做了规定。但首相这次没有出席会议，而是由外交部代表英国政府谈判的。当卡林顿满怀喜悦地从布鲁塞尔凯旋归来时，首相却给了他当头一棒，她坚持认为外交部的谈判结果是无法接受的灾难，比她在卢森堡的谈判更糟，简直一文不值，他们只不过索回了十分之三的钱。由此卡林顿与首相发生激烈争执，双方互不让步，最后不得不将这个问题提交全体内阁成员讨论。会上，首相依然不留情面，将他带回的协议驳得体无完肤。但内阁最终还是拂逆首相的意愿，通过了外交部带回的协议。首相虽极为不快，然而不得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因为卡林顿威胁说，若首相再不让步，他将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支持她；她知道，卡林顿有 6、7 个同僚和 70 名议员做后盾，要分裂政府决非难事。

欧共体的会员费用问题至此告一段落，但问题并非最终解决。到 1982 年，这个影响英国与欧共体关系的者问题又变得炙手可热了。此后又经过两年半的艰难交涉，直到撒切尔夫人的第二任期才得以圆满解决。

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显示了撒切尔夫人顽强不屈的性格特征和独特的外交风格。她的性格在决定英国的外交立场和制定相应对策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她一反往日外交战中那种模棱两可、点到为止、平稳圆滑的策略，而采取了据理抗争、直截了当的方法，使英国获益匪浅。这一外交风格也奠定了她的政治地位，英国国民普遍欢迎她的做法，把她看作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当时的欧共体主席罗伊·詹金斯虽然蔑视她的做法，却不得不承认她的做法行之有效。他说：“我清楚她出任首相时的情形，她对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意见充耳不闻。要是换了别人，恐怕早就支持不住了。”

八、“不列颠没有永恒的敌人”

作为一个政治家，撒切尔夫人最初是以新的“冷战斗士”而闻名国际政坛的。她那一些强硬的反苏反共立场使人们相信，在她执政期间，英国与苏联是绝不会和解的。然而，撒切尔夫人的对苏政策也不是一味的强硬，她也有灵活务实的一面。

自六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欧洲大陆两个最大的西方国家法国和西德实行对苏谅解、缓和与合作的“戴高乐主义”和“新东方政策”，东西方之间持续 20 年之久的紧张局面显著改善。正当欧洲沉浸在“缓和”蜜月之中时，刚刚成为英国保守党领袖的撒切尔夫人却率先对“缓和”提出怀疑，并重弹冷战的老调。1976 年，她攻击苏联实行的“邪恶的共产主义”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威胁”。这些讲话引起苏联和国际舆论的密切注意，塔斯社送给了她一个“铁女人的”雅号。1979 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似乎验证了她的预言，东西关系重趋紧张。这一年她刚好当选为英国首相，她的政府立即对苏联的侵阿行径作出强烈反应，并且呼吁西方国家在面对苏联的挑战时要“坚定和团结”，要求欧共体国家支持美国的对苏强硬立场。当时一些西欧国家和日本对“新冷战”的开始有顾忌，在支持美国对苏政策上步调不够一致，但撒切尔夫人的英国却坚定地和美国站在一起。按照 1979 年 12 月北约理事会的协议，西欧的英、德、荷、比、意五国将从 1983 年起将部署美国的新式中远程导弹，以加强欧洲对苏联的威慑力量。当时西欧的反核和平运动声势很大，西欧国家领导人在压力面前犹豫不决，撒切尔政府则不顾民众的反对，第一个在英国领土上带头部署了美国的巡航导弹。

但是，撒切尔夫人很快就看到，新冷战并没有给英国和她本人带来什么实际好处。由于英苏关系恶化，英国同苏联东欧的贸易额急剧下降，这显然同她医治英国病的改革政策是相矛盾的，她自己也成了国内和平运动者的攻击目标。同时，她愈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则英国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空间就愈是有限，至多只能充当美国的小伙伴。撒切尔夫人是丘吉尔的崇拜者，和丘吉尔一样，只要对英国有利，她是愿意“与魔鬼合作”的。她也铭记着十九世纪英国著名首相帕麦斯顿的箴言：不列颠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有的只是永恒的利益。她决定调整对苏政策。

1982 年 11 月 10 日，统治苏联近 20 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继任苏联最高领导人，苏联外交政策出现某种变化的迹象。翌年 1 月，撒切尔夫人派外交部常务次官里夫金德出访苏联。他是自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英国政府访苏的最高官员，他的使命一是要向苏联发出和解的信号，二是实地考察勃列日涅夫去世后苏联的内部变化情况。里夫金德回来后，撒切尔首相又征求了一些苏联问题专家的意见，亲自主持召开了对苏政策专门讨论会。1983 年大选后，撒切尔夫人决定试行她的“向东方开放”政策。

1984 年 2 月 9 日，安德罗波夫去世，这给撒切尔夫人实行新的对苏政策提供了一个机会。当时她刚从匈牙利访问归来，匈牙利出现的亲西方的自由化倾向以及访问期间她所受到的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使她产生了到“铁幕”背后去看看的想法，她决定亲自参加安德罗波夫的葬礼。

2 月 13 日，撒切尔夫人抵达莫斯科，在凛冽的寒风中出席了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之后，她同契尔年科进行了短暂的会晤。但令这位远道而来，并且已经在冰天雪地里冻了几个小时的夫人扫兴的是，苏联新领导人并没有和她

交换什么意见，只是快速而带点结巴地念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不过，从契尔年科老态龙钟的面容上可以看到，他已经是风烛残年，苏联很快还会发生权力变动。因此撒切尔夫人开始把目光转向苏联年轻一代领导人身上。

当时国际舆论也已经在就契尔年科以后的权力归属问题作出种种猜测，普遍认为政治局最年轻的两个成员，即罗曼诺夫和戈尔巴乔夫最有可能接任。但是很明显，这两人是两种类型的人，前者可能会奉行老一代领导人的既定政策，后者或许会成为改革派的代表。撒切尔夫人不想打赌，她试探性地向戈尔巴乔夫、罗曼诺夫和其他几位高级领导人都发出了访英邀请，然后等待对方的反应。英方的试探很快有了回音：戈尔巴乔夫接受了邀请并希望尽快实现访英。

1984年12月15日，戈尔巴乔夫率苏联议会代表团抵达伦敦，英国政府以迎接国家元首的规格盛情接待了这位来自铁幕另一边的超级大国的使者，几百名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聚集在都铎王宫为苏联代表团举行欢迎午宴，古老的宫殿里烛光柔和，充满中世纪的情调。英俊潇洒、谈笑风生的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雍容华贵、漂亮迷人的妻子赖莎，成了宴会参加者注目的焦点。人们发现这对夫妇和自己想象的共产党领导人完全不同。午宴之后，戈尔巴乔夫夫妇到英国的“国庙”、著名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参观，他在丘吉尔和达尔文墓前仔细看了很久之后，以一种奇怪的神情对陪伴他的威斯敏斯特教长爱德华·卡彭特说：“我感到仿佛我以前来过这里。”英国和西方新闻界马上对这一段故事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

16日，撒切尔夫人在她的乡间别墅契克斯款待戈尔巴乔夫夫妇。她之所以把他们的会晤安排在这里面不是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显然是想制造一种亲热和谐的家庭气氛。然而出乎预料的是，宾主落座不长时间，客套的寒暄就被激烈的争论所取代。据撒切尔夫人说，其后每次见到戈尔巴乔夫都免不了是一场辩论，而她也乐此不疲。这第一场争论从餐厅的午宴开始，午饭后在客厅又继续进行。争论的问题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否政府包揽一切？苏联的制度有无优越性？苏联人是否有真正的人身自由？从争论中，撒切尔夫人对戈尔巴乔夫有了最初的认识：从政治思想上看，他也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从个性上看，他又与她以前见过的共产党领导人大不一样。他总是面带微笑，有时纵情大笑，用他的手势来强调和调节他的声音。他是一个敏锐的雄辩者，非常自信，并且能够轻而易举地切入高级政治问题的核心。他从不读事先准备好的提纲，只是有时参考一下他自己的小笔记本。以一个女人特有的敏感，撒切尔夫人发现她喜欢他。

有了这样的感觉，她与戈氏讨论也就更加诚恳了。对话转入双方都关心的实际问题——军备控制。当时美苏关系正处于微妙时期，双方都力图打破陷于僵局的军备谈判。戈氏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铁女人”之口向里根传达苏联领导人的信息，同时希望能在欧美之间打进楔子，以争取苏联在美苏裁军谈判中的有利地位。精明的撒切尔夫人在弄清了戈氏的真实意图后，一方面阐明了英国要保持自己单独的核力量的立场，另一方面则不适时机地开始扮演起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中间人”的角色。她说里根值得信赖，至少他不希望战争，美国也并不要支配世界。至于苏联最关心的“星球大战”计划，她声称她并不赞成里根关于该计划可使全球摆脱核恐怖的观点，但也不反对美国继续研制星战武器。在持续数小时的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在电视采访中公开说：“我喜欢戈尔巴乔夫，这是一个我可与之共事的人。”

对戈尔巴乔夫的褒奖，出自这位一向对苏联的制度和领导人抱有强烈敌意的“铁女人”之口，自然非同凡响，撒切尔夫人因之在国际舞台上名声大噪。由此开始，她不仅和戈氏建立起个人友谊，改善了英苏关系，“开始了英苏关系的新纪元”，而且还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紧张关系的调节人。在以后几年里，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她频繁地穿梭于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她说服里根政府同意把星战计划的“研究”与“部署”分开，以减轻苏联人的忧虑，又俨然以西方代言人的身份，在人权问题上不断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她甚至把她的“公关战”直接打到了苏联百姓中间。作为一个已沦为二流强国的国家领导人，她做了里根和西欧其它国家领导人做不到的事情。与此同时，她也没有忘记英国同欧共体国家的关系，在欧洲，她是美国意愿的代言人；在美国人面前，又充当着欧洲代言人的角色。她一手牵三家，成功地在欧、美、苏之间纵横捭阖，一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超级政治明星，使早已衰落的大英帝国竟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国际风云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她的精明和胆识令老谋深算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财大气粗的西德总理科尔相形见绌，也使以第一强国总统自居的里根让她三分。这一切，无疑有利于英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有利于她在国内推行经济改革。

九、沉痾须用猛药治

战后以来，英国经济发展一直缓慢，国际经济地位一降再降，至七十年代初，已先后被德、日、法三国超过，由1950年在西方世界的第二位退居第五位，世人讥之为“英国病”。为医治这一顽症，历届政府都开出了自己的药方。然而仙药难求，无论是保守党的新保守主义还是工党的凯恩斯主义，都未能扭转经济日益衰退的趋势。当撒切尔夫人接过政权的时候，她十分清楚，虽然新政府的工作千头万绪，上届政府遗留的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但最重要最根本的仍然是经济复兴问题。她立志要打开一个新局面，踢出新政府的头三脚，兑现她在 대선中提出的“使英国迎头赶上自由世界”，“不再充当落伍者”的诺言。在阻力极大的情况下，她雷厉风行地开始了被称为“撒切尔革命”的经济改革。

为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撒切尔夫人精心组织了她的第一届内阁。虽然她已担任了四年保守党的领袖，但至今还没有完全征服这个党，铁了心跟定她的人并不多，一些著名的党的政治家只是把她看作一个过渡性的领导人，他们相信保守党最终还要回到老路上去。考虑到政府的稳定，撒切尔夫人不得不做出让步，让这些人参加内阁。不过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即与经济决策相关的位置上，她都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最重要的财政大臣一职由对她忠心耿耿、又任劳任怨的杰弗里·豪担任。为了弥补豪才干上的不足，也为了保证财政部对首相改革措施的施行，又配之以经济学家约翰·贝弗恩做豪的助手，即担任首席次官。工业大臣由才华出众、锋芒毕露的基恩·约瑟夫担任，按照撒切尔夫人的说法，他承担的是“改变支配这一部门哲学的至关重要的工作”。贸易大臣约翰·诺特和能源大臣截维·豪厄尔也是撒切尔夫人改革的支持者。此外，撒切尔夫人还在较低一级职务上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内阁大臣，成为“撒切尔革命”阵营的干将。以上成员当时都是撒切尔夫人的志同道合者，即都是坚定的货币主义者。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有的后来因政见不同与她分道扬镳，有的在她陷入困境时离她而去，也有的因不能容忍她的专横而愤然挂冠，但他们毕竟在撒切尔改革的最初阶段做出了贡献。

新内阁一成立，撒切尔夫人就通过女王之口向全国“发出明确无误的变革信号”。按照惯例，英国每届新议会开幕时，都由国（女）王亲临国会致词，但讲稿出自执政党之手，国（女）王不能随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只能照本宣科地宣读新政府的施政纲领。新议会开幕式在1979年5月15日举行。这一天，人们在女王平稳、悦耳的语调中听到了“铁女人”想说的话：新政府将削减个人所得税，放松对私营企业的限制，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制定有利于居民购买私房的措施，放宽国家对居民日常生活的限制，停止强迫建立综合学校的做法，进一步加强英国防务，严格控制外来移民入境，等等。总之，所有一切都和前工党政府正好相反。这种激进的变革是以前历届新政府，包括保守党政府所没有过的。因此，女王致词刚一完毕，工党领袖卡拉汉就跳起来对这份改革清单大加鞭挞。

然而此后不久财政部提出的1979年预算案引起的震动比女王演说还要大。这个预算案一公布，议会大厅就开了锅。前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希利称它是“披着羊皮的母狼的预算案”，哀叹它“把工党政府降低通货膨胀的五年心血付之东流”。甚至在保守党内，包括多数内阁大臣也被这个预算案惊

得目瞪口呆，他们的思想仍停留在党的前领袖希思所鼓吹的保守主义上。实际上，这个来势凶猛的预算案的出台，正是“撒切尔革命”的开始。

这场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撒切尔夫人上台时，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为 11%，三个月之后又涨至 13%。她认为这是前工党政府干预收入政策，单凭扩大需求来发展社会福利工业的恶果，也是工党为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贷而采取的种种方法的恶果，她决定在她执政的第一年要把货币发行量控制在 11%。从第二个财政年度开始，她又推行“中期金融战略”，逐年降低货币供应量，到 1983~1984 年度降至 20 年来最低点。与此同时，撒切尔政府还紧缩政府开支，提高银行利率。1979 年的财政预算一下子就把公共开支砍去 40 亿英镑，涉及住房、教育、能源、就业、交通、外援等领域。此外，撒切尔首相还撤销了前工党政府设立的 3000 多个计划，关闭了一些咨询监督机构，使政府部门的借款从 1979 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4% 降至 1983~1984 年度的 1.5%，银行利率从 1979 年 8.5% 提高到 1980~1983 年的平均 12% 左右。这一系列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到 1982 年初步取得效果，到 1984 年膨胀率降到了 3%。英国经济随之走出“滞胀”的困境，开始回升。

撒切尔改革的主旨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发挥市场机制，为私有经济注入活力。为此，她大胆改革税制。1979 年财政部的第一个预算案就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 33% 降至 30%，最高税率从 83% 降至 60%；到 1988 年，基本税率进一步降至 25%，最高税率则为 40%，企业税也从 52% 降至 35%。税制改革幅度之大，为英国历届政府所仅见，整个西方国家也绝无仅有。为了平衡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在削减政府开支的同时，撒切尔政府增加了间接税，提高了增值税。按照撒切尔夫人的看法，国家干预过多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表现，也是“英国病”的根源，因之在改变税制的同时，政府还直接取消或削减了以前历届政府所拥有的干预经济生活的权力，如取消了物价管制委员会，缩小了国家企业委员会的权力，废除了 180 多项限制经济生活的规定。

在撒切尔改革中，影响非常深远的是她推行的私有化政策。战后以来，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和标榜社会主义的工党的推动下，英国政府建立了庞大的国有企业。撒切尔夫人上台时，国有企业职工已逾 150 万，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 20%，产值占全国产值的 11.5%。此类企业大多管理不善，经济效益低下，成为政府的沉重包袱。撒切尔夫人早已对国有企业深恶痛绝，认为它是“英国病”的症结所在。在她执政的头两年，考虑到工会势力的强大，她只是对部分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造，其余基本维持现状。从 1981 年起，撒切尔夫人开始对国有企业动大手术，到 1987 年，政府将 1/3 的国有企业转化为私有，60 多万职工从国有企业转到私人企业。国有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下降到 1988 年的 8.5%。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仅使一批企业扭亏为盈，而且推动了整个英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不只局限于国有企业，还波及到其他国有财产，特别是住房。六十年代以来，英国各地方政府建筑了大量公共住宅，以帮助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问题。许多失业者或靠养老金、救济金生活的人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只缴纳很少或象征性的房租。这种福利性的住房，占用了国家一大笔资金。撒切尔夫人上台后，积极推动出售公共住宅，回拢国有资金。在她任期内，政府总共出售了大约 100 万套公共住房，回拢资金 20 亿英镑。

为了减少政府开支，同时也为了整饬文官队伍，撒切尔夫人一上台就大幅度地裁减文官人员。在第一个预算案出台的第一天，政府就宣布停止征招新的文官，并将精简 7,5 万到 15 万的现职文官人员。这一举措曾招致在职文官人员的强烈不满，但撒切尔夫人顶住了压力，基本实现了原定目标，从 1979 年到 1986 年，英国的文官人数由 73.2 万下降到 59.4 万。

撒切尔夫人还想对英国的福利制度动手术。她认为正是这些日趋完备的福利制度造成了国民对国家的依赖，导致企业竞争能力下降，也使政府负担日益加重。但因福利制度涉及每一位选民的利益，撒切尔夫人未敢轻举妄动，她上台后最初只是进行了一些试探性的改革。直到 1985 年，在英国经济增长稳定，政府威信空前提高的情况下，撒切尔夫人才开始施行较全面的改革计划，内容涉及养老金、失业救济金的发放和医疗、住房补助等方面。尽管她在这方面行动比较谨慎，仍招致社会极大的反对。1987 年民意测验表明，88% 的英国人反对这项改革，这迫使她不得不知难而退。

在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中，最初两年是她最为困难的两年。且不说她的政敌工党的强烈反对，即使许多保守党人也对她如此激进的改革感到难以接受。由于她本人还没有在党内树立起绝对权威，许多内阁大臣都明里暗里阻挠她的改革措施。特别由于初期改革未见成效，形势相当严峻。当时，许多大公司亏损，小公司倒闭；失业人数激增，至 1982 年竟突破 300 万大关，达到战后失业的最高点；政府致力抑制的通货膨胀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大幅度上升。若不是后来的经济回升，她的政府很快就要垮台，她自己也将作为战后最不得人心的首相结束她的政治生涯。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撒切尔夫人没有动摇。她深信自己所走的路是对的，而且越是处于逆境她越不妥协。对反对党和党内反对派始终采取挑战姿态，凭着她那少有的坚毅与自信，她终于度过了难关。

从 1983 年起，英国经济发展出现上升势头。1984 ~ 1988 年间，英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法国快一倍，比西德也快 50%，使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呈颓势的英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被称之为“撒切尔奇迹”。撒切尔夫人的权势与威望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顶卢，被誉为“战后以来英国最伟大的首相”。

